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01 巴巴拉·W·塔奇曼作品

[美]巴巴拉·W·塔奇曼 – 著
万里新 – 译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11 – 1945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CITIC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巴巴拉·W·塔奇曼作品 01

[美]巴巴拉·W·塔奇曼 – 著
万里新 – 译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11 – 1945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CITICPRESS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美]巴巴拉·W·塔奇曼 著

万里新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

前言

致谢

开篇 危机

第一章 一个军官的成长

第二章 革命的访问者 中国，1911年

第三章 世界大战 圣米耶尔与山东

第四章 派驻北京 军阀年代，1920—1923年

第五章 “能干”团和蒋介石的崛起 1926—1929年

第六章 “酸醋乔” 1929—1935年

第七章 出任武官：中国最后的机会 1935—1937年

第八章 出任武官：中日战争 1937—1939年

第九章 仓促上阵 1939—1941年

第十章 “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1941年12月—1942年2月

第十一章 “一顿狠揍” 1942年3月—5月

第十二章 受助者 1942年6月—10月

第十三章 “花生米跟我上了一条船” 1942年8月—1943年1月

第十四章 总统的政策 1943年1月—5月

第十五章 史迪威必须走 1943年6月—10月

第十六章 中国在开罗的一刻 1943年11月—12月

第十七章 回程 1943年12月—1944年7月

第十八章 “整个亚洲的命运岌岌可危” **1944年6月—9月**

第十九章 “能干”的限度 **1944年9月—11月**

第二十章 “我们必须撤出——就现在” **1945—1946年**

附录 **1921年**筑路：谈话录

参考文献

序 [1]

费正清

巴巴拉·W·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是一部杰作，这是出于许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它流传下去。首先，它富于戏剧性。这是一部生动的传记，讲的是一位古怪但却真实的英雄，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当美国陆军1940年在路易斯安那举行军事演习以物色有才干的指挥官时，乔·史迪威（Joe Stilwell）[2] 表现得极为敏锐、富有想象力而又不墨守成规，当时他就已经是闪电战的高手。在陆军的九个军级指挥官中他得到了最高评价，并受命率军进攻北非。他本可以成为像欧洲战区的布莱德雷或者巴顿那样的人物。可是，由于他的中国经历，他被派去处理那里的危机。

不过，美国在中国的战时努力基本上是白费了——即便我们承认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战争本身不过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对人的耗费而已。史迪威将军恪尽职守，这使他能屡屡创造奇迹。他这次冒险本来就凶多吉少，当时在蒋介石委员长统治下的“自由中国”已经濒于崩溃，而史迪威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美国的顽强的理想主义者，决心训练出理想的中国军队并“打垮小日本”；另一个则是狡诈的军事政治家，同样很有决心，那就是不想让中国继续打下去，从而保住自己的位子。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对峙浓缩了美国在中国的战时目标所遭遇的种种挫折。

然而本书并非只是快节奏地叙述笼罩在悲剧阴影下的纷繁事件。隐藏在这个关于战争的故事后面的是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现在这种努力又再度兴起了。读者会发现本书的结语恰如其分（直到1971年前都是如此）：“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但在将近十五年后，另一轮的接触、旅游、交流、投资和外交活动又在开展了。现在是美国公众好好回顾从前的时候了，用中国人的话说即所谓“前车之鉴”。特别是当我们发现，帮助盟友国民党使我们成了共产党所发动的中国革命的敌人，对我们来说最糟的是，这场革命最后成功了。

总之，正如我们说过的，我们开始是想帮助中国，而之后在冷战的强权政治中，出于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又跟中国人对立起来。这样做真的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尤其在考虑到那就是我们的朝鲜和越南战争的序曲时？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直至今天仍然很重要的问题。

但这本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部一流的历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这种艺术的大家。一开始巴巴拉·沃特海姆·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就很自然地跻身于美国知识精英阶层中。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纽约从事实务的人中的自由派领袖。她的外祖父是老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老亨利的儿子，也就是她的舅舅，后来成了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她还是哈佛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的学生时，就曾陪祖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对她来说，眼界高远和公众人物的品性都是遗传的一部分。

在拉德克利夫的时候，她专注于既相关又各有专攻的历史和文学。1933年她毕业后不久，这个世界就不得不为反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而动员起来。她积极主动、思路清晰而又无所畏惧，这些素质使得她成为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研究人员。1934年她在纽约，1935年则在东京。该研究所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智囊团”和会议组织，20世纪20年代由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前干事在檀香山创办。它由十几个国家级研究所组成，分布于主要的环太平洋国家，还包括欧洲在那里的殖民地。它独自在太平洋地区开创了当代研究和定期国际讨论的模式，而现在的中心和协会几乎每天都在采用这种研究模式。1935年巴巴拉·沃特海姆从军国主义的东京去了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中国。

回到纽约后她开始为《国家》（*The Nation*）杂志工作，她父亲曾经是该杂志的受托人。然后她在1937年至1938年间去马德里报道西班牙内战。她作为伦敦《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驻美国记者回到纽约，并于1940年与莱斯特·塔奇曼（Lester Tuchman）博士结婚，之后生下三个女儿。1943—1945年，她在纽约战时新闻处远东新闻部工作。

对一个家道殷实又忙忙碌碌的母亲来说，这样的早期职业经历足以让她参加外国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从而为纽约的当权者们增光，但也就仅此而已。然而对巴巴拉·塔奇曼来说，她才刚刚走上轨道。1956年，她重拾早年的兴趣，出版了《圣经与剑：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时期的英国和巴勒斯坦》（*Bible and Sword: Britain and Palestin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Balfour ），一本从古代一直讲到1918年的历史著作。那以后她避免了那些牵扯她个人情感的题目，并作为面向大众写作历史的作家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某个把巴巴拉的这些书称为“通俗历史”的批评家与其说是在评论这些书，倒不如说是在评论他自己。确实，它们是“非学术性的”，因为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讨论那些历史“问题”——太多这类问题来源于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渗透。在大学里，那些寻求科学一致性的人入侵历史学后强调的是概括、事件的模式和比较研究的先验图式。这些很可能加速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的减弱。总而言之，巴巴拉·塔奇曼主张把历史看作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可以畅所欲言、深刻，并有广泛的说服力。对她来说，关键的是人们的感受和言行；相比这些，像社会流动性、合法性、投资比率和工作观念之类的问题则是次要的。她反复强调了事件、人物以及地域的独特性。

当然，多年来在历史学领域里个别性和普遍性一直在争斗，各方都期望获得更多的关注。这里我们很难用只言片语——不管我们怎样斟词酌句——来解决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其实这也用不着我们解决：巴巴拉·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她的秘密首先在于她惊人的勤奋。她在研究时发掘了所有的记录，哪怕是最小的纸片也不放过。酝酿《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花了四年，这个时间跟《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花的时间一样多；后者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月，是本畅销书，并获得普利策奖。1967年，当她开始创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的时候，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深入研究已经揭示了“二战”时美国对华政策在外交和官僚政治上的盘根错节之处。两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历史学家写了三厚本有关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著作。事件的框架已经有了。尤为可贵的是，史迪威将军的家人公开了他内容广泛的日记和私人记录。

要关注史迪威，塔奇曼夫人就得避开那些雷区，即那些自美国宣告“失去中国”之后所积累的单方面证据、指责，以及那些各怀心思的回忆录。另外，聚焦史迪威使得她可以探求美国与其盟友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才是关键所在。这样就避免了把注意力分散到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那场殊死搏斗。

1946年史迪威突然死于癌症后，国共之间的搏斗挣脱了美国的影响爆发了，美国国内政坛因此充满了抱怨。

另一个也跟勤奋有关的秘密则很容易被察觉到，那就是巴巴拉·塔奇曼通过掌握并运用这些记录而提炼出了她所谓的“确证的细节”。即便她已经感知了某些事件的相关性，她仍然必须通过现场证据——不言自明的一条引语、一个事实或者另一个事件——才可以将这一点传达给读者。这些细节使得不同事件联系起来了。因为她是在讲一个故事，并不是想证明什么，所以巴巴拉·塔奇曼瞧不起计算机打印出来的那些玩意儿，也不喜欢引用其他历史学家的话。“我从来不觉得引用某人在旁边大学工作的邻居的话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来源；我想知道某个事实的原出处，而不是最近谁引用了它。” [3] 幸运的是，她除了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独立精神（虽然她不是位教授），对众多学者所关注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制度或“因素”也具有敏锐观察力。例如，她对蒋介石在中国所达成的脆弱又耗神费力的权力平衡的分析，便是本书阐发的最为清晰的地方之一。她回顾的史迪威的早期经历——他的语言天分和海外游历，他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以及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中国的探索——既是他本人的传记，又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塔奇曼夫人善于发掘和运用各种记录，这使得她可以把故事贯穿起来。

从20世纪80年代的视角来看，史迪威以及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是怎样的？

历史地看，1911—1945年是中国摸索建立新政体的时期。直到1928年国民党一党专政终于取代了君主专制。不过，自1931年起，由于日本入侵，中国的政治生活重又陷入混乱。

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和虚弱使得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难得地有了参与中国生活的机会。在很多中国爱国人士看来，美国那些用条约维持的各种特权不过是19世纪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延续。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竟然提议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中国对日作战部队，这无疑是整个帝国主义历史中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刻。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然而……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体是独立自主的，但它的经济看起来仍然需要外国的贸易、技术和投资。自1949年后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这消耗了革命成果。中国的贫穷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人，包括那些阔绰的美国游客，又一次成了贫穷中国的特殊人群。我们再次跟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人密切交往起来，跟他们谈生意、交朋友。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所看到的中国改革是史迪威未能看到的——这是个社会和工业革命的富于活力的交替变化，是乡村和城市人民渴望的此消彼长。仿佛有一个内置的钟摆，引导中国就像一个盲人一样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先在农民中间开展平均主义的社会改革，然后转而在现代技术领域培养出新的统治阶层。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所展现的可不是一种单调的稳定。

自巴巴拉·塔奇曼完成此书后，其他历史学家又有什么新见解？有关赢得了未来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新见解有很多，但有关20世纪40年代美国战时努力的却很少。也许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4]，此书利用了根据《自由信息法案》刚刚解禁的秘密政府档案。沙勒的研究仅仅加深了美国对战时中国的意图和所作所为的幻灭感，而塔奇曼在她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里早已明确传达了这种幻灭感。

举例来说，她记载了统率美国驻华海军的米尔顿·迈尔斯（Milton Miles）中校的工作。迈尔斯走在了美国陆军的前面。通过1943年4月罗斯福总统所签署的一个秘密协议，迈尔斯让美国海军利用中国自己的飞机向中国运输军火，并帮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目戴笠对其人员进行培训，从而更好地打击蒋介石的对手——中国共产党。迈尔斯好像有童子军的素质，看上去也很像。他还在海军军官学校（U. S.Naval Academy）的时候，朋友们就叫他“玛丽”，因为他也有酒窝，长得挺像舞台明星玛丽·迈尔斯·敏特（Mary Miles Minter）。在“自由中国”，迈尔斯统率着2500—3000名美国人。有些帮助戴笠进行反共活动，从事暗杀、投毒、抓捕和镇压工作。由于有美国海军上层的支持，迈尔斯屡次挫败了史迪威试图控制他的努力。迈尔斯感到戴笠有种“磁石般的吸引力”，因为他“本身是个自由、民主人士……建立的集中营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他爱自己的母亲并支持妇女教育”[5]。据迈尔斯的批评者说，他参加了戴笠主持的集体审判，审判后那些政治犯就被活埋了。这位浪漫而可怕的海军军官提前在中国揭开了冷战的序幕，后来他得了夸大妄想症并于1945年9月被送回美国。中国共产党对迈尔斯的活动进行抗议是完全正当的。

迈尔斯一事说明，史迪威在中国的战时努力是怎样被限制在国民党的冷漠和中美反革命行为之间的。乔·史迪威这个带兵高手很想教中国那些被征募来服兵役的农家子弟们怎样保卫自己的祖国。他身上体现了我

们引以为荣的美国人的优点，如民主和主动尽职。他的经历说明了一个有天赋又有超人毅力的人能够取得什么，以及不能够取得什么。

毫无疑问，史迪威很幸运没有成为中国抗日军队的统帅——在史迪威1944年被召回前罗斯福总统曾经这样建议过。那将使他置身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中国的爱国情绪正在高涨，而国共战争已经开始。这个曾被蒋介石拒绝的（由史迪威统率中国军队的）任命将使美国卷入“二战”后的中国，从而招致一个致命的“超级越南”。即便如此，直到30年后美国才承认了中国革命。

---

[1] 本序写作于1985年。——编者注

[2] 全名Joseph Warren Stilwell, Joe为Joseph的简称。——编者注

[3] 这句话引自《历史泛滥》一文（“History by the Ounce”），载于《哈泼斯》（*Harpers’Magazine*），1965年7月，第74页。

[4] 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

[5] 这段话引自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41页。引用迈尔斯在1945年8月的话。

前言

本书的主题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广义上说是美国跟亚洲的关系。这个主题的载体便是史迪威将军的职业生涯。为什么一定要选取史迪威呢？因为他在工作上专注于中国问题，但其背景和个性又是典型美国式的；因为他与中国的联系所跨越的那段时间影响了今天的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这个戏剧化的开场，一直到1944年国民政府走向衰败的关键一年；因为他在这两个时间之间的岁月里的工作也折射了当时时代的情况—1920年至1923年的军阀时代他是语言教官，1926年至1929年蒋介石逐渐得势上台时他是美国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军官，1935年至1939年日本入侵时他是美国驻华武官，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中缅印战区司令；还因为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几年里，他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位不耐烦的、尖酸无礼的“酸醋乔”并不是担当这个角色的理想人选。但是，由于他对中国语言和这个国家的了解，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对自己任务的自信和执着，再加上他的官方地位和权力，这使他代表了他的国家在亚洲所做的最大努力，并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也体现了这种努力悲剧的局限性。

我完全意识到了涉足美国对华政策领域的危险性。自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美国所做的巨大努力都付之东流后，美国对华政策这个话题近来在公众生活领域激起了最令人愤慨的和极具破坏力的诋毁浪潮。不过，因为中国是我们卷入东南亚的根本原因，所以尽管有风险，这个题目还是值得探讨的。还应该加上一句：虽然本书的叙述结束于1946年，但着重于探讨本源，并非简单地局限于昨天。史迪威将军在1945年写给西点军校毕业班的信里说：“你们会听到这样那样的说法，说这一代或者那一代人怎么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并把我们拖入战争。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所有还活着的人和那些死去的人一样，都需要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责。”

我还想补充说明一下史迪威将军的日记，因为很自然地，这是他传记作者的主要材料来源。但我因此冒犯了他，因为这些日记原本只是供他自己阅读的。“这个小日记本，”他在1906年那本便携式日记的扉页上明确警告说，“跟你他妈的毫无关系！”我认为个人有隐私权，因此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后代有“权利”违背某个公共人物的意愿去了解他的

私人生活。不过就史迪威而言，历史的需要已经超越了隐私权。在战争之后，让史迪威用自己的声音去说话，去解释在他引起很多争议的指挥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但重要而且必需。经他家人许可，他在1942—1944年间的战时日记和信件经过前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编辑，以《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 ）之名于1948年出版。这些文件的原件以及其他战时文件还提供给了查尔斯·罗曼努斯（Charles Romanus）和莱利·桑德兰（Riley Sunderland），他们都是中缅印战区官方陆军史的撰写者。这些文件后来捐献给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的胡佛图书馆，以供公众使用。既然做出了上面这样的决定，那么向他的传记作者开放其他有关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经历的档案材料也就顺理成章了。史迪威太太给我看了那些她所保存的迄今尚未出版的日记、信件、文件、剪贴本和家庭相册等。这些材料在参考文献中有进一步说明。

《史迪威文件》出版后引起轰动，成了畅销书，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更成了他们引用各种珍贵事实和生动语句的来源。不过听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的日记并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这些日记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别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借助日记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放毒”；他这方面原本就有天赋，而当时那种让人沮丧的环境自然又是火上浇油。有时光写日记还不过瘾，之后他还会用大笔记本或者用单张纸把日记改写或者进一步展开，而这些他也都保存下来了。有时候这个过程本身也被记录下来了：“写啊写，可怕。”或者是：“我这么涂涂画画，只是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热器。”这些在其他人那里不过是稍纵即逝的烦恼都变成了历史的陈迹。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怨气往往会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这里被以过高的比例保留下来了。

最后一点是，我很清楚，这本书就其主题而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不公平的。由于本书尤其是后半部所关注的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低潮，而且集中关注了军队素质，有不少负面描写。那些使得中国人民列于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质，如和蔼可亲、艺术想象力和哲学思考力、性格坚毅、聪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劳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来。作为作者我只能对此深表遗憾。

致谢

很多人对本书都有贡献，在这里我对他们的帮助、建议和批评表示诚挚的谢意。首先要感谢约瑟夫·史迪威夫人（Mrs.Joseph W.Stilwell），她准许我使用并引用所有她保存的有关她丈夫的文件和家书，并在我研究这些材料时给予我热情接待；感谢贝蒂夫人［Mrs.Bettye，前本杰明·史迪威夫人（Mrs. Benjamin Stilwell）］一丝不苟地誊抄日记，并整理好文件；感谢将军的长女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夫人（Mrs. Nancy Stilwell Easterbrook）以及她的丈夫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Ernest Easterbrook）将军，在本书写作期间他们一直有很多真知灼见并提供了很多信息；要感谢史迪威将军的妹妹斯图尔特·瓦尔德夫人（Mrs. Stuart Wilder）提供的回忆情况。

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心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在知识上给予指导，抽时间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意见；感谢史迪威的高级助手、多年来在很多场合中与其共事的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准将，他提供了跟费教授一样的帮助，并接连不断地提供了大量信息；感谢大卫·包瑞德（David D. Barret）上校，1927—1945年他曾在中国服役，大多数时间是与史迪威一起，他给予我的指导十分生动，并真诚地说服我要“淡化个人魅力”；感谢马歇尔将军的传记作者弗里斯特·珀格（Forrest Pogue）博士对我的疑问总是给予及时回答；感谢前中缅印战区物资供应处主任雷蒙·威勒（Raymond A.Wheeler）中将给予我热情的关注并帮助安排采访和引见。

我还要感谢很多曾经经历了这段历史中的事件的人，他们亲自回答我的问题、给予解释、回忆那段历史并提供了各种其他帮助。其中包括：特莱弗·杜普伊（Trevor Dupuy）上校和塞缪尔·格里菲斯（Samuel B. Griffith）将军，他们不约而同地分别给予这个计划以最初推动力，那时这个计划还只是我头脑中一个隐约的想法；感谢前总参谋部对外联络局局长商震、前军械署长俞大维、前交通部长张嘉璈、原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霍拉斯·殷（Horace Eng）；感谢原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八师的四位军官，他们曾参加缅甸战役，给我提供了作为亲历者的看法和信息；我还要对前驻华外交官们表示感谢，其中负责中国事务的有埃德蒙·克拉布（Edmund Clubb）、约翰·塞尔维斯（John Service，中文名谢伟思）、

约翰·培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约翰·爱默森（John Emmerson）、菲利普·斯普拉斯（Philip Sprouse）和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感谢他们提供了他们非常了解的事件的情况以及人物情况；此外还要感谢克拉布夫人（Mrs. Clubb）、谢伟思夫人（Mrs. Service），以及文森特夫人（Mrs.Vincent），是她们提供了补充材料；还要感谢罗斯福总统的同事们，这包括艾弗莱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大使、塞缪尔·罗森曼（Samuel Rosenman）法官、本杰明·科恩（Benjamin V. Cohen）以及总统的女儿詹姆斯·哈尔斯台德夫人（Mrs. James Halsted）；感谢缅甸的蒙巴顿伯爵（Earl Mountbatten of Burma），他在百忙之中抽出一个上午并生动地回忆了当时的很多情况；感谢约翰·凯斯威克（John Keswick）和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进一步从英国的角度提出了看法，并且热情地招待了我；感谢曾在中国或者中缅印战区工作过的记者们，这其中包括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白修德，提尔曼·德定（Tillman Durdin）、布鲁克斯·埃金森（Brooks Atkinson）、埃瑞克·塞瓦雷德（Eric Sevareid）；还要感谢下面这些跟史迪威共事过的军官、朋友，或者有其他关系的人：陆军五星上将奥马尔·布莱德雷（Omar Bradley），雅克布·德弗斯（Jacob Devers）上将，马修·里奇维（Matthew B. Ridgway）上将，迈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上将，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上将，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少将，托马斯·廷伯曼（Thomas Timberman）少将，波特纳（H. L. Boatner）少将，托马斯·阿尔姆斯（Thomas Arms）准将，托马斯·贝茨（Thomas Betts）准将，克里斯特（W. E. Crist）准将，麦克纳里（E. J. McNally）准将，弗里德里克·蒙森（Frederick Munson）准将，亨利·拜罗德（Henry A. Byroade）大使，乔治·德莫特里亚迪（George Demetriadi）上校，小托马斯·阿尔姆斯（Thomas Arms, Jr.）上校，约翰·马格鲁德夫人（Mrs. John Magruder），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夫人（Mrs. Simon Bolivar Buckner），詹姆斯·麦克休夫人（Mrs. James McHugh），保罗·琼斯（Paul Jones）夫妇，迪恩·拉斯克（Dean Rusk）夫妇，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夫妇，迪仑·雷普利（Dillon Ripley），理查德·扬（Richard M. T. Young），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还有将军的家庭成员埃利斯·考科斯（Ellis Cox）上校及其夫人、本杰明·史迪威（Benjamin Stilwell）博士以及已故的查尔斯·迪尤尔（Charles Duell）先生。

我要特别感谢切斯特·波尔斯（Chester Bowles）大使使我可以去阿

萨姆邦（Assam），感谢瓦特（J. T. Watt）夫妇在那里给予我热情招待，还要感谢福坎（J. Phookan）先生的陪护。在台湾所得到的协助要感谢哈里·科里尔（Harry Collier）上校和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先生，在香港所得到的协助则要感谢美国领事馆的阿兰·怀廷（Alan Whiting）先生和威廉·维特森（William Whitson）上校。

在研究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帮助，这主要要感谢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军事部的约翰·泰勒（John E. Taylor）先生和斯坦福市胡佛图书馆的肯尼斯·格莱奇尔（Kenneth Glazier）博士；我还要感谢在史迪威研究方面比我做得更早的查尔斯·罗曼努斯先生，他是三部内容翔实、极具参考价值的中缅印战区史著作的作者之一，感谢他的热情接待和阐释；还要感谢他在军事史处主任办公室的那些同事，包括斯戴森·康（Stetson Conn）博士、查尔斯·麦克唐纳（Charles MacDonald）先生以及汉娜·齐德里克夫人（Mrs. Hannah Zeidlik）；还要感谢西点军校战术与工程学教授托马斯·格里斯（Thomas Griess）上校；要感谢美国陆军军官学校（U. S. Military Academy，即西点军校）图书馆档案和历史部的约瑟夫·奥多奈尔（Joseph O'Donnell）先生；要感谢国家档案馆电影部的里昂·威廉斯（Leon Williams）先生；要感谢国防部副官署办公室的西摩·庞雷泽（Seymour Pomrenze）先生和他的同事；感谢国防部书刊部（还有其他各种名称）的凡特（Fant）上校、韦布（Webb）上校、额尔班（Urban）小姐和斯布里格（Sprigg）小姐；感谢海德公园（Hyde Park）罗斯福图书馆前馆长伊丽莎白·德鲁里（Elizabeth Drewry）小姐、她的继任者詹姆斯·奥尼尔（James O'Neill）博士，以及其他同事；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口述历史项目的朱莉·豪（Julie How）小姐和伊丽莎白·梅森夫人（Mrs.Elizabeth B. Mason）；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及档案部主任赫曼·卡恩（Herman Kahn）博士以及他的助手朱迪斯·希弗（Judith Schiff）小姐，感谢他们帮助我查阅史汀生文件（Stimson Papers）；感谢国务院历史部主任威廉·富兰克林（William Franklin）；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参考部的工作人员；感谢杜克大学的多拉茜·博格（Dorothy Borg）小姐以及西奥多·罗普(Theodore Ropp）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多克·巴尼特(Doak Barnett，中文名鲍大可）教授，威廉斯学院的詹姆斯·麦克瑞格·波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教授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莱曼·凡·斯莱克（Lyman Van Slyke）教授。

写作过程中有人阅读书稿并提出宝贵意见是不可缺少的，否则任何作家包括我的灵感都会枯竭。为此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女儿们以及一位女

婿：露西以及戴维·艾森伯格夫妇（Lucy and David Eisenberg），杰西卡·塔奇曼（Jessica Tuchman）以及阿尔玛·塔奇曼（Alma Tuchman）；还要感谢我的丈夫莱斯特·塔奇曼博士。


2100611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开篇

危机

1944年7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式要求蒋介石委员长任命一个美国人，也就是约瑟夫·W·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中将，来统率国民政府所有的武装力量。这个提议是前所未有的：此前还从来没有哪个美国人去直接指挥盟国的国内武装力量。更为不同寻常的是，史迪威将军在中缅印战区表现不凡，但同时又争强好斗并引起很多争议，在蒋介石眼里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而且蒋介石在这之前就曾经要求美国将他召回。

然而，中国的情况被认为已经“非常危急”，因此需要“非常手段”才能解决。让中国继续打下去，保持它的剩余战斗力并阻止日本在中国大陆巩固其占领地，这些目标对美国的战略以及战后政策均至为重要。“整个亚洲的命运岌岌可危，”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同时美国在那个地区所做的巨大努力也可能付之东流。”他又说他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想法”，但是“我现在想不出还有其他人有他那样的能力、力量和决心去对抗正在威胁中国的灾难”。

这场危机是由日本对其当时尚未占领的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引起的。这场在4月展开的进攻势如破竹，直逼虚弱且不断退缩的中方防线。“自由中国”面临被扼杀的威胁，而美国空军基地所在的地区也可能被侵占。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由于美国穿过太平洋向西发起进攻，日本在那里处于防守之势，同时由于从中国南部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的打击，日本的海上供给线遭到了致命的削弱。日本发动这场战役的目的是想清除掉美军的机场，以确保从东北到东南亚的陆上通道能够贯通起来，如此即使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被孤立的中国也无法与之联系。

日本的这些企图很有可能得逞，因为它迅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而中方则缺乏协同防御。那样的话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还会拖多长时间。日本可以在把它的交通线连接起来后，清除掉美国能发起进攻的基地，并进一步巩固它对中国的占领，这样，即使日本失去了本土岛屿，它仍然可以将其政府撤到中国大陆。

然而中国的前景可能比这更加黯淡。如果中国崩溃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全部目标就可能全部落空。美国的目标是战争取得胜利后中国能够保持强大和稳定，从而可以取代日本成为强国并维持远东和平。中国已经经历了七年抗战，这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长，抗战早已使它虚弱不堪。它饱受打击和封锁，敌人的占领使它经济凋敝，它的政府疲惫不堪，贪污腐败。国民政府的战争努力由于国内共产党的压力而受到很大牵制。自1937年达成停战协议之前的十年里蒋介石一直想消灭共产党，但是没能成功。如果蒋介石的政府垮掉了，那么中国将陷入内乱和分裂。日本发动的新攻势使国民政府的地盘不断减少和分裂，即便国民政府在那里得以生存下去，来自其内部的失败和消极情绪也会加强。最后，在经历了这场战争之后，这个饱受蹂躏的中国是不是还有能力接受日本投降，并维持自己的完整呢？如果它不能，那么谁是未来维护亚洲稳定的基石呢？

这些问题困扰着美国的政策，而且，如果最终事与愿违的话，巨大的战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从一开始罗斯福的政策就基于一个希望，那就是强大的中国将成为战后和平的四个支撑点之一，正是这样的希望让美国在战争中始终努力支持中国。与此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军事战略。这个战略的意图就是，在中国大陆参与战斗的应该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需要借用中国领土用作空军作战基地，而将来要用作陆战基地；尤为重要的是，需要中国继续抗日，从而把100万日军牵制在中国大陆上，否则的话，这些日军部队就会被腾出来，用于对付那些在太平洋上一个岛屿一个岛屿艰难推进的美军。重庆政府代表了远东最后一个自由国家，它无论是崩溃、投降还是跟敌人合作，都会促使亚洲其他国家与日本妥协，这是罗斯福最为担心的。基于这些考虑，长期以来美国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仍然千方百计地给中国提供物资，为它鼓劲，想把它动员起来，此外，还想重新打通经过缅甸的后门。这些也就是史迪威将军自珍珠港事件后一直在做的事情。

长江三峡以西，位于偏僻的重庆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制订任何阻止日军进攻的防御计划。这位委员长的才干主要是在政治而不是军事上。他在防御上主要倚仗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空中力量及其自信的司令官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将军。这位将军保证说，只要他能够从自己国家那里在供给上得到足够支持，他就能阻止甚至打败日本人。这种安排对委员长来说是正中下怀，因为有人替他去打日本，他就可以保存有限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内部敌人。他最精锐的师没有用来打日本，而是驻扎在北部靠近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前沿阵地上。其他方面的异己势力也一直困

扰着他。南部地区一些地方军阀原本就跟他不和，现在看到重庆政府的种种弊端更是蠢蠢欲动，开始鼓动新一轮的分裂运动，而这种分裂一直是中国的一大祸患。

面对这种种压力，蒋既不想把他的嫡系部队用于消耗很大的对日作战，又不想让那些对他不太忠诚的部队得到美国人的培训、武器和装备，以免有朝一日他们会倒戈对付他自己。他急切想得到美国可以给他的军火、金钱和供给，但这不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反正他知道其他盟友早晚会打败这个敌人的——而是为了作为总统的他认为对自己国家至为重要的目的，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生存。他被缠进了这个网里，同时这也为他与史迪威之间的长期斗争埋下了伏笔。

史迪威可不想替人打仗。他一直认为，空军跟那些保卫机场的地面部队相比并没有什么优越的地方。日军现在步步逼近，这让他的论点有了惊人的说服力。他的目标和既定使命是让中国的地面部队能够发挥其战斗力。要好好训练、武装中国士兵，保证他们得到粮饷和医疗护理，从而使之成为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他曾经对一个记者说："如果我能够证明中国士兵跟任何一个盟国战士一样出色，我也就死而无憾了。"通过在缅甸指挥的中国两个军的出色表现，他证明了这是可能的。他计划通过美国教官和装备为中国60个师进行培训，但是这个计划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斗争，要斗争的是各种障碍和拖延，而其中很多是人为制造的。

对蒋介石来说，美国人每训练一批人就意味着他对这批人的控制削弱了。由于他完全依赖于美国的援助，因而他无法拒绝这种训练计划，但是他可以制造种种障碍，还可以把军用物资挪作他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两个所谓的盟友都固执地不肯让步，互相看不惯，为了中国的命运你争我斗。蒋介石曾经三次亲自或者通过别人要求美国将史迪威召回，史迪威则对委员长充满蔑视，而且对此毫不掩饰。

史迪威被称为"酸醋乔"并非空穴来风。他精明强干，刚直不阿，对其他达不到这两点的人往往很快就充满厌恶，若位高权重的人如此，他就尤其憎恶。他本性里无法让自己去讨好一个他不尊重的人。如果把没有其他人协助而他能完成的工作交给他去做，他也会欣然接受。当时他已经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驻印度中国陆军司令和缅甸中国陆军作战指挥官、名义上的中国战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中国训练与作战司令部总指挥以及《租借法案》（Lend-Lease）对华调拨物资官员——这里每个头衔都有一群助手，讲排场和大量文牍工作。因为他讨厌阿谀奉承和虚张声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偏喜欢

去缅甸的丛林中跟那些蚂蟥、霉菌和凶残的敌人打交道了。

在前线的时候他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将军一样，而且为了使自己更舒服一些，他喜欢脱掉佩戴徽章的军服。他穿着非军用毛衣和美国大兵用的靴子，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保留下来的旧硬檐军帽，往往在距离火线只有几百码（1码约0.9米）的地方和一个中国营长站在一起，嘴里嚼着口香糖，一边用烟嘴抽烟一边用汉语交谈。他当时61岁，身体单薄，瘦骨嶙峋，高5英尺9英寸（约1.75米），削得短短的黑发中已经有些白发，脸上布满皱纹但是神情果敢坚毅，身体看上去硬朗，但这不过是假象罢了。其实他的体质之虚弱犹如钢丝。他曾经在不同时期在中国工作，先后经历了军阀时代、国民党兴起以及中日战争[1]。作为一名军官，他一直关注士兵的福利，不管是美国士兵还是中国士兵。这不仅仅是做给记者看的，而且是一以贯之的，有时这个问题甚至会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对美国公众来说，他是遭遇失败时有名的步行走出缅甸的英雄，对美国大兵来说他是“乔大叔”，在英国人看来他“难以相处”（除了那些他喜欢的人外，他通常是讨厌英国人的），而在战区杂志《中缅印战区简报》（CBI Roundup）看来，他专心致志，志在必得，并富有幽默感——“只有在雨季来临和遇到自命不凡的人的时候”他才失去这种幽默感。他的格言是Illegitimati non carborundum，他自己把它翻译为“别叫这些杂种把你搞垮了”。

为了让蒋介石比较容易接受对史迪威的这项任命，史迪威被晋升为四星上将，而当时的四星上将只有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将军、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将军、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以及阿诺德（Henry‘Hap’ Arnold）将军。

让一个外国人统率中国军队，这样的提议对蒋介石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易接受的。然而，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和一个盟友对另一个国家元首和盟友说话，罗斯福的语气十分严厉，简直近乎侮辱，有最后通牒的意味。美国占了上风，但是在中国整个历史中从来不轻易顺从他人。蒋介石“原则上”接受了，但提出了一些修改，更改了一些主张，坚持要求控制《租借法案》的物资，进行了一些曲解，也做了一些妥协。由于形势所迫，中国人早就把以弱胜强变成了一门高超的艺术，而蒋介石的每一步无不经过精心筹划。蒋介石提出美国派一名特使来“协调我跟史迪威将军的关系”，于是华盛顿派遣了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John Hurley）将军。蒋介石不断哄他，敷衍他，华盛顿则开始不耐烦，进一步施加压力。两个月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9月12日，赫

尔利在最后一次会谈后垂头丧气地回去了，报告说蒋委员长“很难打交道”，事情并无进展。临别时蒋介石说了一句话既有东方人虚伪的谦卑又有些真实的怨气的话。他说：“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比我的权力还要大。”

这当然并非事实，不过蒋说出这样的话本身便显示了这个美国人的奇异命运。他早在五年前（1939年　）那次离开中国时便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并且永远地离开了中国。

---

[1] 即抗日战争。——编者注

第一章
一个军官的成长

1911年11月，28岁的史迪威中尉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这个历史最为悠久的独立国家刚刚跌跌撞撞地走进20世纪。在他到来之前六个星期革命爆发了。这场部分由于意外而爆发的革命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对清政府军队发起了猛攻，并最终推翻了没落的清政府。这场偶然爆发的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并不完美，因为它赶走了清王朝，却未能填补由此产生的真空。这个曾经凝聚了地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帝国没能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继承者。由于群雄争逐，中国分崩离析，其主权亦遭受外国列强入侵而损害。失去了凝聚力和自信的中国即将进入世界上最为狂暴的岁月。

这个来访者正在菲律宾服役，是请假去中国的。他从遗传上说是纯粹的美国佬。他是尼古拉斯·史迪威（Nicholas Stilwell）的第八代嫡孙，尼古拉斯1638年从英国来到美洲，在斯达丹岛（Staten Island）、长岛（Long Island）和曼哈顿拥有房产。他母亲的祖先姓福勒（Fowler），也是在17世纪30年代来到美洲的。后面的各代中史迪威家族又吸收了这个美洲殖民地的主流血统：英国人、法国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和荷兰人。在乔·史迪威出生的时候尼古拉斯·史迪威的后代已有约1600人，其中有两人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这就是理查德·史迪威（Richard Stilwell）上校和加莱特·史迪威（Garret Stilwell）将军。

军旅生涯与其说是乔自己选择的倒不如说是他父亲一时兴起强加给他的。他父亲本杰明·W·史迪威（Benjamin W. Stilwell）博士是位聪明英俊的绅士，性格果断，家境优裕，多才多艺但都不突出。本杰明的父亲约翰·史迪威（John Stilwell）是位“很有商业头脑又生活严谨”的绸缎商人，到退休时通过之前的投资房地产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并在扬克斯（Yonkers）定居。他在那里造了一座可以看到哈德孙河的漂亮房子，做了扬克斯银行的董事，而且是卫理会教会的支柱之一。他的家族此后就一直住在扬克斯。



扬克斯市中心



位于扬克斯栅栏街的史迪威家



扬克斯中学



扬克斯中学橄榄球队，前排左二是史迪威，1898年

本杰明·史迪威21岁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法律学位，但是并没有成为开业律师。他1880年跟玛丽·A·皮恩（Mary A. Peene）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后搬到佛罗里达的帕拉塔卡（Palataka）的一个种植园，想经营南方松树木材生意。1883年3月19日，他的大儿子在这里降生了，起名约瑟夫·华伦（Joseph Warren），这是为儿子接生的医生、本杰明朋友的名字，而这个医生的名字又是随波士顿的约瑟夫·华伦医生的：这位波士顿的医生拒绝了军医局局长的职位，为的是能到危险的战区工作，结果死于邦克山（Bunker Hill）战役中。

本杰明·史迪威放弃了木材生意并带着家人回到扬克斯。他在那里学医，并取得学位，但是这个职业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他去开业行医。到1892年时，这个家庭已经又添了次子约翰和次女玛丽，就在这年，史迪威医生把家搬到了靠近伯克夏（Berkshires）的大巴林顿（Great Barrington），并打算过起乡绅的生活。四年之后他得出结论认为，他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尽职尽力。于是他又回到扬克斯，接受了一个在公共事业公司即维斯特切斯特照明公司（Westchester Lighting Company）的职位，并最终担任了副总裁。

按照清教徒的想法，一个人不工作则良心上过不去，因此史迪威医生终于可以心安理得了，之后他还颇为得意地成了扬克斯的杰出公民，担任过学校董事会董事长，以及维斯特切斯特多家银行和公司的董事。本杰明·史迪威医生自命不凡又性情温和，相当有魅力，其家人和周围社区也因为他的风度把他看成天才人物。有个女儿的评语是“父亲很了不起”。他有足够的风度和财力可以经常出头露面并展现自己的才气，然而他从来没有想到去扬克斯之外的严酷世界里好好利用或者试试自己的才气。1889年，法兰西共和国建立百年庆典时他带领全家去了巴黎，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同时还为《扬克斯政治家》（*Yonkers Statesman*）发回了一系列出色的、富有趣味的游记。他会画画，会弹钢琴，对自己的孩子管教很严，家人吃饭时一天三次由他亲自带领进行餐前祷告。此外，他还有无数的故事、俏皮话、建议和指教，总是能让家人开开心心，而他的子女对他也是崇敬有加，因为他们相信——或者一直来已经习惯相信——父亲是了不起的，是永远正确的。

家里人都管乔·史迪威叫华伦，这是个活泼、机智又很有冲劲的男孩，爬过屋顶，曾把野兔淹死在马槽里，还极为厌恶周日的礼拜，可他偏偏每个周日都得参加三次礼拜活动，包括去教堂、参加主日学校和晚祷时的布道。他在60多岁时写给自己女儿的一封信里回忆道：“由于被强迫去教堂和主日学校，我产生了犯罪的冲动。既然明白了宗教对人没有多少真正的好处，所以我劝你们姑且对宗教置之不理，而代以常识。”

华伦跟父亲一样能说会道，但是他的心思和精力主要还是投入到体育运动中了。他打网球，在哈德孙河上划赛艇，还在扬克斯中学橄榄球队中打四分卫。一个同学回忆说他是球队的“推动力、灵感和场地指挥”。在他的率领下，1898年的扬克斯橄榄球队击败了纽约市和维斯特切斯特郡的所有预科学校的代表队，结果让扬克斯公立中学大为得意，

居然给所有队员都发了钱。在田径赛场上华伦的特长是400米跑，不过他的兴趣还不只限于此。他还是维斯特切斯特校际联合会田径赛的组织者。他是这个联合会的发起者之一，同时还是《扬克斯政治家》的体育记者。组织体育活动成了伴随他一生的事情，除此之外他还积极锻炼，使身体保持运动员的水平。

1899年在他中学的最后一年结束时，校长托马斯·贝克（Thomas O. Baker）在给他的最后评语里把他说成是一个模范生——不过后来证明这样说有些为时过早。这个学生“各科学习优异”，而且“精力充沛，有管理能力……并热心维护学校利益”，“没有不良习惯”且“完全值得信赖”。

史迪威医生为自己的儿子们选择了耶鲁大学，不过他觉得16岁的华伦现在进大学年纪还太小。他认为无论哪个孩子，留在家里才是最好的，因此他决定让他聪明能干、精力超群又效率极高的儿子毕业后在扬克斯的一所学校里再待一年。除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外，他从5岁开始就一直在这个学校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种过于关爱的举动把乔·史迪威引上了军旅生涯。不难想象，他在学校里很快就觉得没劲，成绩也下降了。他跟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叫“四巨头”的俱乐部，又用木板搭在阁楼的椽子上隔出一个藏身之处，然后跟这一伙人在那里打牌，有一次还用绳子把校长的桌子悬挂到天花板上。另外一次，他们把比利时林堡干酪摆在学生的桌子上。登峰造极的一次捣蛋发生在1900年的高年级舞会上，后来被称为“冰激凌大战”。以华伦为首的这四个“突击队员”袭击了点心桌子并与守卫者交火，在此过程中连贝克博士也不小心“挂了彩”，之后他们拿着成桶的冰激凌和一托盘一托盘的糕点撤退。第二天，教育委员会特别召集会议处理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结果这些惹事的孩子有的被停学，有的被开除，有的不得毕业，唯独华伦是个例外，因为他已经毕业了。



哈德孙河与西点



西点军校一景

尽管史迪威医生开始无法相信史迪威家的人会这样胡作非为，但是经过一番调查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他认为需要立些规矩了：华伦必须入伍。他好像并没有特别严厉或者做出惩罚的样子，因为他对华伦说：“哈德孙河上游有个不错的地方，你可以在那里玩玩网球。”（家人有这样的说法，尽管这种说法无法被证实。）尽管这样一来华伦将无缘去耶鲁打橄榄球了，但是据说他对此并没有表示反对。美国当时刚刚在古巴“小有战果”，在菲律宾还在与叛乱分子作战，而且美国步兵当时正跟其他外国军队一道打打杀杀地去解救在北京被义和团围困的外国使团。对一个饱受父亲束缚又在中学待得腻味的孩子来说，当兵似乎是一个颇为诱人的前景。



西点军校中高年级生欺辱低年级生现象，出自《莱斯利周刊》（Leslie's Weekly），1902年

总之，他跟做任何别的事情一样，开始全力以赴争取进入西点军校。一个邻居记得当时他曾经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因为根据当时一种有趣的说法，这样可以使身高伸长四分之一英寸（约6毫米　），如此他就可以满足学员的身高要求了。

因为当时申请去西点军校已经太晚，史迪威医生就去通了通路子。街道那边有个邻居是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的朋友，通过他华伦成了一个全州候补生。史迪威医生先轻轻地用铅笔填写申请表的空格，然后让儿子用钢笔再抄一遍。参加入学考试让华伦饱受折磨，他以为数学会不及格。不过当那些考试不及格者的名字被无情地大声公布的时候，华伦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落在剩下的那些成功者中了。

他即将加入的这个群体还不像欧洲那样已经发展出一个军事阶层。到1900年为止，毕业于西点军校的4000名军官中只有139名或者说3.5%是从前西点毕业生的儿子或孙子。国会一向对“军国主义”很是戒备，因此保留了为军校录取学员的权力，而且由于担心会出现一个军事阶层，便倾向于避开那些军官的儿子，更喜欢录取平民的儿子。这种情况下入学的学员从背景来看主要是思想保守、出生于本土并属于中上阶层的。一年级学员的年纪从17岁到22岁，史迪威属于年纪最小的学员之一。1900年7月的一天，刚刚被录取的学员奔向最近的电报局向家人报

喜，然后，根据史迪威在日记中的说法，新学员们便“回到了地狱”。

对于1900年西点军校的新学员来说，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在这个时期折磨新生的做法已经登峰造极，据说两个学员由于被折磨而退学并在稍后死去，国会因此在1901年2月展开了调查。其中很不情愿地为此作证的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比史迪威高一个年级，有一次经过了这样一番“锻炼”之后他躺在吊床上抽搐不止。新生往往要蹲在刺刀上；裸奔，与此同时身上被泼上一桶桶冷水；捆住手指被吊起来或者在浴池中倒立；长时间伸长手臂平举步枪；进行“发汗”（在7月里裹着毯子或者雨衣）；吞食墨西哥塔巴斯哥（Tabasco）辣椒油或者吃下大量的食物，比方说一盘糖浆或者两百个梅干；互相打架或者蹲在桌子下面吃饭。此外，还有其他很多种侮辱方式。

这种做法并不完全是胡作非为。据说跟官员的刻板的繁文缛节一样，这可以培养学员自我控制，避免恐慌，更重要的是服从权威。军人的核心是纪律，而纪律的实质便是服从。由于对于具有独立意志和思考能力的人来说，服从并非生来就有的，所以他们必须培养出服从的习性，因为有一天这可能是关乎生死和胜负的事情。合情合理的命令服从起来不难；可是恰恰是那些变化无常的、官僚气息十足的，甚至白痴的命令才能帮助养成服从纪律的习惯。这其中最有代表性、最能说明实质的便是西点军校的挺身立正——这是一种固定不动的站立姿势，要求肩膀向后挺，下巴和腹部则要内收。

“立正，立正，立正，”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训练，训练，训练。哦，上帝啊……疲惫不堪，开始训练，喝水，休息，班操练，吃饭，擦枪，班操练，解散，晚饭前在周围进行连队训练……熄灯号，睡觉，4点30分起床，一直立正，每吃进一口饭就得用脚尖站立一个半小时。”高年级学员总喜欢用立正来折磨人。有时一年级新生一边干活一边在“肩上顶上手纸（满身是汗时这倒不难）”。夏天在帐篷宿营时他参加了一个折磨人的“晚会”，当时的情况他只是零零碎碎地记录下来：“抽烟时用烟头烫人家的下巴。真他妈的刺激。啊，过瘾。老鼠的葬礼和臭虫。收起刺刀看了好几个钟头。”乔（从这以后除了他家人，别人都这样叫他）想家了，感到难过，便秘，这个毛病将伴随他终生。“有次睡过了头，结果听到了枪响——吓得半死……收拾床，打扫帐篷，卷起来，喝口水，戴上领口袖筒……一直骂娘。”

他在从图书馆借来的历险小说中寻求慰藉，其中有《绑架》（*Kidnapped*）、《呼啸营地的幸存者》（*The Luck of Roaring Camp*

）、《所罗门国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两面旗帜》（*Under Two Flags*）、《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而且还有一本他最喜欢的作品，那便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y）的《一个吸食鸦片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Opium Eater*）。最后一本书他借的时间最长，达两个星期，而其他书的借阅时间都在两天到五天之间。

终于第一年过去了，就仿佛从黑暗的隧道走入阳光之中一样，他成了一个高年级学生。这个时期军校的课程主要是为了从头培养一个军官，因此着重于士兵所需要的技术知识，但是对一个公民可能更广泛的必要知识则很不重视。学员最后往往都十分擅长画地图以及地貌图，但是对人类历史以及社会制度则所知不多。人文课程包括一门历史和一门综合英语语言、文学和作文。此外一个学员还要上法语与西班牙语、数学、化学、法律和“自然哲学”（即自然学科概论）课程，再加上一些军事学科。除了训练条例之外，还有军械学和射击学、测量学、筑城学、战术学以及两年的绘图课；绘图包括地形测量学、绘制测量结果、阴影和投影、直线透视、色彩学和着色法、战场侦察轮廓绘制、制图史、工程学和军械绘图、景物速写等，足够培养出一个达·芬奇了。

学员军事课程中的核心课程是军事工程系教授的“战争术”。这门课原来叫“战争学”，当时军校认为唯一可以教授的便是防御工事学。后来军校最了不起的教官之一丹尼斯·哈特·马汉（Dennis Hart Mahan）通过研究过去的战役和优秀指挥官的经验，把它变成了研究战术战略原则的一门课。在马汉任教的1832年到1871年间，拿破仑发动的战役被视为典范，重点是在进攻。当时强调的是速度、机动性、出其不意以及其他进攻方面的要素。在史迪威做学员的时候美国南北战争已经取代了拿破仑的战争。甚至1898年那场战争的经验战例也进入了课堂，不过提供的多是反面材料。

乔展示了学习语言的能力，第二年法语成绩名列第一，其他课程也不错。不过他缺乏高度严肃性和自信，而正是这些品性使得在他之前的罗伯特·李（Robert Edward Lee）、约翰·潘兴（John Joseph Pershing）以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毕业时能够在军事潜力评估方面名列前茅。乔曾经两次因“训练时发笑”被记过，这可不像是优秀指挥官的样子。其他几次记过则是因为“晚饭时在食堂里把食物扔掉”，“棒球队离开时在浴室大喊大叫制造混乱”，“预先安排好使两名学员徒手搏斗”以及“下午点名时躲在宿舍里”，等等。

除了这些事情，他的体育活动量依然惊人。他有早饭前跑几英里

（1英里为约1.6千米　）的习惯，做过越野长跑队的队长，1903年获得过一英里赛跑冠军，在1904年的运动会中赢得了致胜的关键分数，次日他还参加了两场划船比赛。正是他最先在军校展开篮球运动，在1903年至1904年间，他不但是第一支球队的队员，同时也是组织者和教练。尽管他身材瘦小没有什么优势，但是在毕业那一年他还是成了校橄榄球队的队员。在进行了这些体育活动之后他还有精力做连队的社交活动代表，负责组织舞会，而且一做就是两年。

他成了学员尉官，毕业成绩不错但并不优异，在124人中列第32名。这离前十名还相去甚远，而只有前十名才可以优先选择他们想去的部门。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选择工兵——这是和平时期工作最有意思的兵种——把那里还剩下的位置全占据了。乔又不喜欢骑兵——虽然他会骑马，但他讨厌马。他称马是“吃燕麦的家伙”，并说它们脑袋的形状表明它们的脑子跟恐龙差不多。他选了步兵，并在1904年6月15日他21岁时得到任命，成为一名少尉。据学校年鉴说他是“填写祖先是‘美国佬’（Yankee）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此时身材挺拔，身高5英尺9英寸，重145磅（约1.75米，65千克　），面目端庄，头发很短，总是目不斜视，黑眼睛透出严肃的目光。毕业那天他的日记只说了句“终于拿到这个羊皮证书了”。跟后来一样，遇到一些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他总是变得言语简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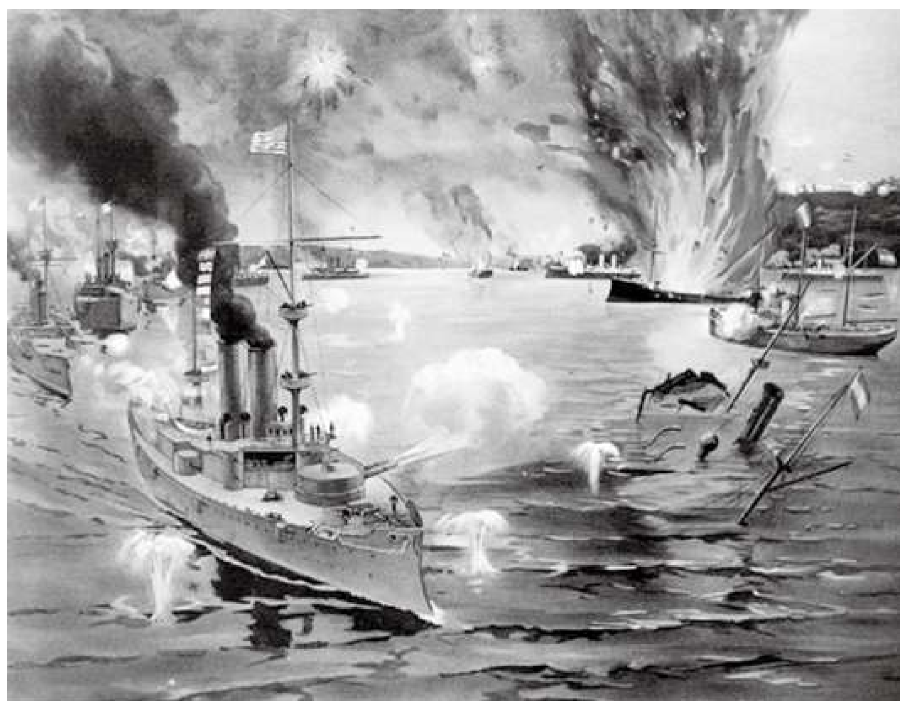
在史迪威准备从西点毕业加入陆军的时候，陆军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1900年时这还是个散漫的谋生途径，但是经过清理、重组和改造，到1904年的时候它已经成了一个专业化的职业，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如果说这些改变大多还只是停留在纸上的话，至少专业化的基础已经确立。促成这种改变的与其说是最近的那场战争，倒不如说是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

1898年对古巴作战动员时所出现的混乱情况，显示了陆军的管理体制是多么不可救药。它没有总参谋部，而是通过十个几乎完全独立的局在运作，这些局包括军需局、军饷局、军粮局、军械局等。单独一个命令不能调动陆军的任何队伍，因为其军火、供给、辅助部队、运输等都分别需要得到不同局的调遣命令。管理各局的军官都是长期任职的，这使他们养成了惰性。

鲁特于1899年被任命为陆军部长以改革陆军体制。他着手改革是基于这样一种常识和原则：“要陆军就是为了备战。”他还认为正规陆军是一种核心力量，但“绝不是发起战争时可以动用的整个机器”。他改革的

主要动作是建立总参谋部，这是以二十年前埃默里·厄普顿（Emory Upton）将军——他是西点最出名的毕业生之一——以及斯宾塞·威尔金森（Spenser Wilkinson）所制订的蓝图为基础的。威尔金森写有一本书叫《陆军的大脑》（*The Brains of an Army*，1890年初版）。正如这个书名所说的，参谋部将是“陆军的大脑”。它将取代从前各个局行使行政职能，此外它还有个美国陆军过去从未有过的职能，这便是拟定作战计划。

为了培养这种战略方面的人才，鲁特建立了陆军军事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此外对在炮兵、骑兵和步兵学校以及利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的陆军指挥参谋学院（U. 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学习的前线军官的研究生课程进行了改进。他引进了晋升的考核依据，并建立了作战学员和参谋学员互换职位的制度。这种体系还不断接受实战的检验。在1901—1903年的国会召开期间鲁特成功地使他的改革在国会通过。虽然各局的控制并不能一下子解除，但是他奠定了统一陆军组织的基础。





1898年4月22日，美西战争爆发，4月27日，美国亚洲分舰队从中国香港出发，三天后抵达菲律宾马尼拉湾并轻易歼灭西班牙舰队；人头像即美国亚洲分舰队的司令乔治·杜威（George Dewey）

从规模上看，陆军已经从战前的2.8万名士兵和2000名军官上升到在菲律宾战役最激烈时的总计10万人。尽管有人惊呼出现了“军国主义”，国会还是要求之后陆军人数不能少于6万人。在史迪威1904年加入陆军的时候，其规模缩小到了大约5万名士兵和3000名军官。名义上，陆军有31个步兵团和15个骑兵团。这些部队，加上炮兵兵团和工兵兵团，分驻到美国及海外的45个基地。每个团的编制为三个营，每个营满员为800人，又分成四个连。在1904年那样的和平时期，平均每个地方的守卫部队人数仅为一个团的核心力量，约为700人，或者说不到一个

营的兵力。

除了在菲律宾还有零星战斗之外，美国本土的守备军生活并不艰苦。跟印第安人发生的最后一次武装冲突是在1890年，不过地方各区及其国会代表一直反对废除本地的“拴马柱”（hitching post）要塞或者与其他地方的驻军合并起来。就这样，这些驻军被半死不活地保留下来，为了让这些官兵不至于太过无聊，便不断进行日常操练，练枪、擦枪、保养枪，记诵条例规定。对准确要求甚高，崇尚枪法，因此在射击方面美国兵往往比欧洲兵技高一筹。工作日中午以后即可休息了。入伍士兵住处叫“肥皂泡营地”（Soapsuds Row），这是因为早期士兵的妻子往往为那些军官们洗衣物。在1904年，列兵每月的薪饷是13美元，上士最低45美元，如果射击合格另加2美元，步枪射击高手再加5美元。入伍人员往往性情粗野，公众对他们并无好感。

总体说来，美国人并不羡慕他们的军人。为军人设计的服装有意省去了带尖铁的钢盔和铠甲，也没有熊皮帽子和大红领章，因此也就不像在欧洲那样能靠这些装束而博得爱慕和尊重。1900年出现的帝国热很快消退，国会又一如既往地在拨款方面很是吝啬。运送士兵的火车的等级排在货车的后面，因此要等在一旁让客车和货车先过去。公众态度越来越过分，结果国会不得不在1911年通过立法，对任何歧视穿制服者的公共娱乐场合处以500美元的罚款。

在1904年看，世界会经历长时间的和平，因此史迪威所在的军官阶层可以指望的生活是有保障的、相当舒适的，但是也不会出大的风头，更不会有什么实现雄心大志的机会了。薪俸不算很高，从新任命少尉的每年1400美元到上校的每年4000美元。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便是官阶，但是在1904年升迁是很慢的。从指挥官往下是指挥官的老婆［commanding office’s wife，简称COW（母牛）］，一直往下，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社交场合，包括住房方面，官阶都是决定一切的。如果官阶相同就要看资历了，也就是任职的日期。如此一来，一个6月份得到任职的军官可能发现要搬进一幢中意的房子的希望落空了，因为刚刚调来的一个新人的任命时间是5月。在下午的招待会上，职位最高的军官的太太会倒咖啡而不是茶，因为人们觉得咖啡比茶高级，在美国咖啡比茶更受欢迎，所以会有更多人聚拢在桌子供应咖啡的那一头。

由于工作和住处都在一起，由于学校就在驻地，由于换防频繁使军官无法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这样，军官们只能彼此结交，他们的生活交叉再交叉，而军内刊物的社交消息让大家都知道谁要结婚了，哪里有

牌局以及谁在哪个驻地接待了谁——跟平民生活的紧张关系和政治对抗相比，军旅生活变成了一种封闭的生活，简直是一种单纯的生活。尽管官阶会引发嫉妒和阴谋，但是他们之间也有一种很强的团队精神，其表现便是相互问候，按照条例的说法这是“军界同胞间相互致意和问候的信号”。军校所灌输的价值观认为军官是绅士，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共同的荣誉观和行为准则，以及对兄弟军官的个人忠诚。对指挥官的忠诚，不管这指挥官是团级上校还是总司令，这既是公事公办，但同时也是一种个人之间的关系。

由于总司令是“行政当局的得力助手”，因此陆军承认自己相对于行政权力来说处于从属地位。它很清楚自己是服务于国家的。西点军校的校训是“职责、荣誉、国家”（Duty, Honor, Country），因此军官阶层的主导概念就是职责。为了能够无论何时、无论通过何种手段都能响应职责的召唤并有效地完成职责，军队应当培养一种超越党派之别的心态，这样才能够不假思索地按命令行事。从理论上说，它认为自己有义务摈弃常人的那种政治激情，这正像一个宗教派别摈弃肉体一样。西点军校校友联合会的一项规章是“莫谈国事”。按照《军务报》（*Military Services Journal*）的说法，军人“很少意识到”他们的选举权，也很少使用这种权利。



史迪威少尉在菲律宾，1905年

因为天性好动，史迪威选择了菲律宾作为他这个初出茅庐的军官首次服役的地方。那是唯一有美国军队参战的地方。作为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而且成绩排在前三分之一中，他可以表达他希望做什么事。他被分到了第十二步兵团，并于1904年10月乘“谢里丹”（Sheridan）号运兵船前往。这是陆军1898年买下的船，原来是穿越大西洋的运牛船。船要在夏威夷停靠一下，到马尼拉需要三十到四十天。为了打发时间，乔在甲板上锻炼身体、读书、睡觉、吃饭、突击学习西班牙语、跟朋友发牢骚、跟军官的太太们聊天，还有写信——有一天写了“8封厚信和16封明信片”。他当时写东西已经是得心应手，而且终身如此。他还显示了另一个特性：不加入那些“每天晚上灌黄汤的酒鬼”行列，这其中包括H上尉，他“喝酒就像喝牛奶一般”。虽然史迪威并非绝对不喝酒，而且也不

喜欢在酒这个问题上小题大作，但是他喝酒喝得很少。

让美国难堪的是，它发现自己像旧世界那些渴望征池略地的邪恶大国一样，开始卷入对外征服；更难堪的是，它遭到了积极抵抗。为了让自己在良心上过得去，美国政府急忙赶来扶植菲律宾的文职统治并宣布暴乱结束，而实际上并没有结束。虽然阿吉纳尔多（Emilio Aguinaldo）1901年被捕后有组织的民族抵抗运动已经支离破碎，但是很多岛屿仍然拒绝投降。他们的弹药供应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就用致命的大砍刀（bolo）作为武器，在占领区进行游击战，时不时地进行突袭。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曾经提到，在他到达前三个月，仅在宿雾省（Cebu）一个地方就有803个摩洛人在“冲突”中被杀死。

他很快就投入战斗，在向沿海的进军过程中“担心大砍刀突袭而吓得要死”。1905年2月，他所在的第一营D连奉命在萨马（Samar）境内溯甘多拉（Gandora）河而上去攻打反叛的普拉杰人（Pulajanes）。他长途跋涉，“翻山越岭赶往圣何塞（San Jose），到处是沼泽、藤草、泥浆、山丘、断层、瀑布……天黑在林中宿营。士兵站着睡。雨一夜未停。士兵湿透了，还有泥，等等。见鬼！”他们第二天又冒雨挺进一天，沿着一条很难走的小路爬过去，不断有人掉队，结果发现圣何塞已经是空城。派菲律宾侦察队在前面走，结果发现一股普拉杰人，之后是一场小遭遇战。后来他们又发现50个拿着大砍刀的人跑掉了。在丛林中待了两周后，乔在日记中写道：“大喝一场，呵！”在河边宿营的间隙，他很快开始组织体育活动。“造出一条有座位、桨和桨架的‘巴罗达’[1]——有趣极了。是萨马第一条有八只桨的赛艇。”

在行军开始继续的时候，乔在几个小时里学到的有关指挥的东西是任何军事院校都不可能教给他的。出发第二天连队没有水了，上尉急于找到水源便很快地在前面走，并叫乔殿后防止部队走散。在酷热中乔押着一个普拉杰俘虏行进，路上发现上士由于酷暑昏倒在地。开始他停下来想唤醒他，可是队列还在前进，他想叫住队伍，但是厚厚的丛林挡住了他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到他的声音。他和俘虏轮流背着不省人事的上士艰难前进，很快就走错了路，再回头重新找，渴得要命，只带着一只38毫米口径的柯尔特式手枪，一直担心会有普拉杰人“从丛林中跳出来把我们砍成碎片”。队伍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他越来越疲惫，急切盼望在天黑前能走到什么地方，最后终于听到前面有谈笑声。当他踉踉跄跄走进连队的宿营地时，他们正在吃晚饭，上尉毫不在意，只是问了句：“你们来了？”他没有派任何人回去找掉队的这个上士和少尉，乔能

挺过来完全是因为他体力好。假如他因为疲惫而倒在了敌对区，那么他的生命就可能在距离他22岁生日不到两天的时候在萨马结束。这个指挥官的责任意识——或者说没有责任意识——给史迪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三十年后他写道："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如果我没有挺过来，福尔斯上尉是不是会因此做点什么。"

驻扎在帕奈（Panay）沿海的一个叫吉马拉斯（Guimaras）小岛的乔斯曼营地（Camp Jossman）时，生活没有那么艰苦了。史迪威寥寥数语描写了在将军住处的一次晚会："粉黛佳丽、着制服的军人、侍者、英国四对舞。"当地的事物他都感兴趣，从孩子们用作风筝的蕨叶到当地人偷粮食的方法：将楼上的粮袋钻个洞，让粮食通过楼板的板条间漏到在楼下张开等着的口袋里。战术练习、训练、熟习条例、步枪和手枪射击、网球、帆船以及跟"骑兵蠢货们"的比赛使他忙个不停。乔还组织徒步旅行和体育比赛，为连队舞会负责装饰，为陆军部翻译了一本法文的有关当时日俄战争中旅顺港之围的小册子，以及一本西班牙文的有关"智利军事地理"的论文。作为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决定生出点事情来"。事情之一便是跟骑兵团无休止地争执，为的是证明炮兵的优越性。其中一个插曲是他让士兵列队站在战壕里，给他们一些床单。当骑兵冲击的时候，他们突然站起来挥舞床单，结果那些马被吓得乱了阵脚。这让乔开心不已。尽管搞了这些名堂，或者说正因为这些事情，D连上尉在他的成绩报告中称他各个方面都"极为优秀"，而且说他"极为聪明、实干和高效"。

1906年2月，在菲律宾待了十四个月后史迪威接到命令，调往西点军校任现代语言系教官。"是1904年级里第一个回来的。"他不无自豪地写道。能反映出他极端敏感的细节是，他还列举了7个向他表示过祝贺和9个没有向他表示祝贺的人的名字。

他立即利用担任语言系教官的机会申请两个月的休假，并要求准许经欧洲回国。在申请中他说，从西贡搭乘法国轮船到法国，如此可以"每天跟法国人交往和谈话"，这样他就能提高自己的法语水平。这个请求落入那些官僚之手，尽管他连发急电，但是在4月他准备乘运输船出发时仍然没有收到回复。在日本长崎时船停下来装煤，他又尝试了一下，结果终于收到了答复。这个答复说明尽管有鲁特的改革，军界的效率仍然十分低下：这个答复所使用的密码竟是在日本没有人可以译出的。史迪威不得已只能乘船继续东行，到了美国下一个军事驻地夏威夷的时候才得以破解这份电报的内容："准假，经欧洲回。"可是那时候已经太晚，

他当时对此反应之强烈简直难以诉诸笔端。他只好经旧金山回国。

在军事这个行业中，通过实践学习的机会往往不可多得，因此，从事教学和训练便成了和平时期军官的主要职业。在史迪威做教员的头三年里，他教授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在第四年里，他又接受了教授战术的额外任务，并由教授语言转向历史。他对那些头脑迟钝、不努力或者任何“不诚实”的人很不耐烦，但对那些真正努力的人总是乐于帮助。在战术系工作期间他担任过篮球、棒球和径赛教练，在第四年还担任橄榄球助理教练。陆军体育协会在1908—1909年度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史迪威少尉的不倦努力，（橄榄）球队才得以如此成功。”将球队体育项目归入战术部是出于方便还是出于哲理方面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是这些运动本身确实也体现了一种战术，特别是橄榄球。这种运动后来常常出现在史迪威和其他指挥官的计划和讨论中。据1909级的雅各布·德弗斯（Jacob Devers）将军说，作为一名教练，史迪威“非常尖刻，不过他的尖刻让你奋进。我乐于为了他做一切”。

然而军校生活并不能满足他，因为离家很近，就更是如此了。他不安分，富于探求精神，在1907年、1908年和1909年，每个夏天都要求休假去“海外”，借口是提高西班牙语水平。跟之前他申请休假以提高法语水平相比，这时候他的运气要好些，结果他得以三次前往拉丁美洲。第一次是政府负担费用，是完成一次“秘密使命”——对危地马拉进行地貌勘察。他受命在旅行时使用假名，并不得携带任何可能暴露他作为政府特工身份的东西，任务是在一张草图上详细标上一些地貌特征，还要增加其他信息，如桥梁、浅滩、渡口、铁路、公路、拉货马车、军用马匹、港口、登陆点、防御工事、电话和电报线、河流、湖泊、运河、城市、乡镇和村庄、驻军、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食物、燃料、饲料、政治状况、疾病和气候等。完成这个使命的期限是六个星期。

史迪威在危地马拉徒步以及乘骡子游荡，有不少发现。他发现这个国家到处是跳蚤，枯燥乏味，他得了痢疾并开始发烧，过了几个星期就想回家了。然而他却仍然不断地观察，把自己看到的事实和想法记在笔记本上，自己也深为后来在中国也常见到的沉闷压抑局势所触动。这种压抑局势激起了他对普通人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愤慨，而这他在国内是不会感觉到的。他写道，危地马拉人干起活来总是能怎么懒散就怎么懒散，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果都将被那些“像贼一样甚至更坏”的政府官员偷去。史迪威对官员、土地所有者以及专门职业阶层“评价很不高”。他写道，农民不识字，不能接受教育，这对“政府来说正中下怀，因为这就可

以随时把他从农田上拉走，让他无限期地在部队服役，而不必关心他的家人是不是会饿死。然而……他什么也不说，默默忍受这一切”。这些感受后来在中国又重复出现了。正如他的一位好友说的：“史迪威有出于本能的开明豁达和同情心，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他是保守的。”

第二年，也就是1908年，他的暑假是跟自己的同学加朋友、绰号“饥饿”的弗朗西斯·哈尼卡特（Francis Honeycutt）少尉一起在墨西哥旅行度过的。从军事上说他们可是很好的一对，因为据说哈尼卡特是正规军中最好的击剑手，而史迪威枪法极好，曾是陆军步枪射击队成员，当时曾有报纸说他是“美国20名步枪神射手之一”。他们从华盛顿出发，先去了陆军军事学院和国会图书馆。“国会图书馆是个桃子 [2] 。”乔写道。这是他的最高评价。他最喜欢的东西都是“桃子似的”（peachy）。

在墨西哥时他们或徒步或骑马旅行了两周，乔记下了大量有关墨西哥文化、历史、风俗、农业、宗教以及阿兹特克（Aztec）象形文字的笔记。取道古巴回国后，他和“饥饿”还把墨西哥这个主题带到了普拉希德湖（Lake Placid）的一个化装晚会上；当时他们“化装成两个光腿袒腹的女人，扮演蒙提祖马 [3] 的女儿，引起了轰动”。8月份连续两周在艾迪隆山区（the Adirondacks）举行的娱乐活动中，这场晚会是个高潮，之后暑假也就结束了。他们不停地参加野餐会、网球赛、徒步旅行和舞会，跟朋友打趣，跟姑娘们到附近旅游。这次他的日记总算没有什么尖刻的评语了，而是很罕见地承认过得很快活，周围都是“热情而友好的正派人”。

就在出发去墨西哥之前，25岁的史迪威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那个女孩。她就是锡拉丘兹（Syracuse）市的威尼弗雷德·A·史密斯（Winifred A.Smith），史迪威妹妹玛丽在寄宿学校的同学。到目前为止，史迪威除了曾经把一个女孩的相片带到菲律宾去之外（他父母对此表示同意，认为这“能帮助他走正道”），他还没有真正经历过什么浪漫的事。他在西点军校毕业晚会上的舞伴并不是照片上这个朦朦胧胧的女孩，而是自己的妹妹，当时只有13岁的玛丽。现在玛丽也要表示回报了，邀请他参加自己学校6月的舞会，还要他为她的朋友温妮 [4] 把“饥饿”也带来；温妮是个很漂亮的19岁女孩，长着一头鬈发，眼睛很有神。

哈尼卡特穿着野战炮兵的带红臂章的精美蓝色制服，可是温妮所心仪的是穿着笔挺白色夏装的玛丽的哥哥。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英俊、长着如此迷人的深褐色眼睛的人”。他们在一起很快活，于是他问

是否能给她写信。一年后他邀请她参加西点军校的军官舞会，可是她母亲对军人怀有戒心，没有同意。不过他参加了她的毕业舞会。后来她在自己母亲的陪同下去了西点军校，还见了他家人。他写来的一封信称她为“甜桃”（Sweet Peach），这让她很难为情，不过在1910年春，在她参加了那年西点军校的舞会后，他们订婚并于同年10月结婚。他在结婚前给她的一封信里写道：“我对你作为妻子的爱要胜过你作为未婚妻时，胜过很多……我会尽最大努力照顾你，让你快乐。但是我离完美还差得很多。我还经常需要得到你的帮助——比如我不耐烦了，发脾气了，不高兴了……如果我有时候变得难以忍受，亲爱的，请记住，我会摆脱这种情绪的，而且我唯一的希望便是使你幸福。因为我用所有的爱爱你。”



史迪威，西点军校学员时期



史迪威的未婚妻温妮，1908年

甚至在恋爱时史迪威也不甘心待在家里，他一如既往每年还是有到“海外”走走的冲动。1909年的夏天他去了中美洲，1910年他申请利用

他订婚到结婚之间的几个月时间再次去执行地貌勘察的任务。在给陆军部的信里他强调了自己的西班牙语水平和上次的经验，而且有些咄咄逼人又有些含糊地指出，他对工作的性质并不在乎，“只要带我去那些国家的工作符合美国利益而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尽管信写得情绪高昂，但是国务院和总参谋长都拒绝了，前者是因为跟尼加拉瓜“近来的摩擦”而想避免进一步的麻烦，后者则有些神秘地反对让年轻军官去完成这种任务，这是“考虑到对过去曾经到过那里的人所产生的影响”。

结婚前夕，史迪威恰好碰上派遣性任务与团队服务轮换制的新规定开始实行。根据这个规定，在和平时期，上校军衔以下的战斗部队军官每六年中要有两年待在部队里。这些规定旨在将到华盛顿执行派遣性任务的时间限制在四年以下，它们由国会在1912年批准为法令，称为《满族法案》（Manchu Act），这是将把陆军官僚从华盛顿调出去跟把满族从北京赶出去相比拟。由于史迪威在第十二步兵团所待的时间未能满足规定，他再次被派往自己的团里。1911年1月他跟妻子一起乘“谢尔曼”（Sherman）号运输船前往菲律宾。

他第二次来到这个岛国，是在距离马尼拉不远的威廉·麦金莱堡（Fort William McKinley）执行常规驻防任务。这期间唯一的大事是他在3月份升为中尉，其他时候无非是闭着眼睛都可以完成的连队每天的队列训练，到卫戍学校学习打发时间一直到下午1点结束，或者为了消耗能量组织“班卡”[5]划船比赛和教士兵在河上用竹子搭桥。他关注着墨西哥正在发生的革命，并提出参加在边境所发生的“事件”，但是并没有成功。到9月份他已经积累了三个月的假期，便打算跟妻子更多地了解一些东方，然后再回家等待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到来。

他们于9月14日乘船去日本，先抵达长崎，然后他们游览了整个内海海岸，一直游览到广岛。史迪威逢山必登。在他用一个半小时登上宫岛（Miyajima）山顶之后，据他的记录，“向导对我的腿脚羡慕不已”。在之后的六个星期里，凭着无穷的好奇心和精力，他跟温妮细致地游览了日本。他立即开始学习日语。有一次在火车站买牛奶时引起了窃笑。后来查了字典才知道他是在要“妈妈的奶”。他的记录极为详尽，但是限于他此时对日本的了解程度，这些看法主要是描述性的，还算不上是判断和意见。

报纸上充斥了有关中国发生革命的惊人事件，但是史迪威显然太专注于其他事情了，根本没有留意到这件事，因为他的日记里没有提及。11月中旬他将妻子送回美国，然后自己继续旅行，前往中国。

[1] 巴罗达（baroda），印度巴罗达人使用的一种小船。——译者注

[2] 桃子（peach），这个词在俚语中是“好东西”的意思；下文的“peachy”则意为“极好的”。——译者注

[3] 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 II，1466—1520），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第九代皇帝，1502—1520年在位，因与西班牙占领者科尔特斯（H. Cortes）之间的戏剧性对抗而闻名。——译者注

[4] Win，威尼弗雷德的昵称。——译者注

[5] 班卡（bancas），菲律宾等国使用的有舷外护木和竹蓬的一种独木舟。——译者注

第二章

革命的访问者

中国，1911年

史迪威首先来到上海，这是中国通商口岸中最大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他首先看到的是各国的战舰——两艘日本的，两艘法国的，一艘英国的，一艘德国的和一艘美国的——这些在港口咖啡色江水中游弋的战船是占领者，不是来访问的。经过外国企业的开发，中国的这个大都市和商业中心大部分已是被外国控制的租界。它位于长江的入海口，而长江是这个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和亚洲最繁忙的河流；中国的一半工业都集中在上海的范围之内，一半的贸易都是经过这个港口进行往来的。史迪威在吴淞口第一次看到了黄包车，在黄浦江上看到了舢板和小帆船。来到上海本埠他首先是“吃了一惊”，这是大多数刚到的外国人都免不了的，因为他们下意识地希望看到某种东方风味和异国情调的东西，但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西方式城市的高大的宾馆和银行，宽阔的街道与公园。从宾馆的窗户往外看去，史迪威觉得仿佛是在费城。他在公共租界吃惊地看到了头上裹着头巾的高个子锡克教信徒，这是从英属印度雇来做警察的。

这场革命给史迪威增添了一丝兴奋，不过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方便，因为跟大多数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动荡一样，这些事件在历史上固然显著，但是对亲历者则未必如此。在中国老城，他看到了造反者的征兵站。在那里，红底上有十二个锯齿的黑太阳的革命者旗帜代替了清王朝的黄龙旗。他跟一些士兵交谈，发现他们带着中国制造的毛瑟枪，而且似乎是些“看上去不错的小伙子们”。他看到贫民窟里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到处倒满了垃圾，一个苦力为了三毛钱把一大堆行李从码头扛到宾馆，一个街头小贩一瓣一瓣地卖橘子，庙里有些穿着白色丧服的奔丧者，“阔太太们排列在门口，在灯光下衣着华丽，披金戴银，可是目光迟钝，无精打采”。他去开创自明朝的一个老茶馆喝茶，发现通往茶馆的桥是弯弯曲曲的。这是为了避邪，因为中国人认为那些鬼怪绕不过去，会在这些拐弯的地方掉到水里去。他还在其他人家看到很多神像和佛龛，于是得出结论，中国宗教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为了驱除那些要加害

于他们的鬼怪”。



上海码头，19世纪90年代

或者出于偶然或者因为他的悟性高，他领悟到了中国生活的一个关键事实——人们害怕那些会带来灾祸的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外国人被称为“洋鬼子”，有时还加上“长鼻子”或者“长毛”之类的修饰语，在中国人的心中，外国人是跟鬼怪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的本能反应是不要让自己的地盘受到外来的污染。清政府在1898年之前没有负责处理与别国关系的外交部，因为他们不希望也不认为有必要建立这样的部门。那些想从事贸易、传教或者建立其他关系的外国人是由理藩院处理的。

在整个历史中，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周围都是野蛮人。它叫中国，是宇宙的中心，其皇帝是天子，是顺应天意的。中国人相信自己的价值观至高无上，并认为中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社会秩序的原则是由圣贤制定，再由一些有学问而又仁慈的精英将其应用于融洽和睦的芸芸众生的。那些不幸生活在他们国家之外的“夷人”只能是低人一等的，只能指望，甚至必须来亲近中国。而且，假如他们坚持要来的话，那就要带上贡品，并且要叩头表示臣服。

从马可·波罗的时代到18世纪，那些来访的惊羡不已的西方人往往都接受了中国人对自身的认识。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始于约公元前3000年，它的青铜器跟金字塔一样久远，它的古典文化跟希腊的古典文化差不多

同时，孔夫子的伦理学经书尽管也许没有《旧约》早，但要早于《新约》。它发明了纸、瓷器、丝绸、火药、钟和活字印刷术，建造了世界几大奇迹之一的长城，还创造了精美绝伦的纺织品和陶器以及技法高超、富于表现力的绘画艺术，而当时欧洲的绘画还处于原始的平面状态。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到处是房脊上有龙雕饰的庙宇、大理石桥、梯田和多层的宝塔，国家由一位圣明的君主和一些卓越的朝臣统治着，他们受到无数辛勤劳作的民众的支持。中国不像西方那样受到宗教战争的破坏，在基督教的影响之外遗世独立，热爱秩序、崇尚学问的同时还蔑视战争，无怪乎欧洲旅行者认为它是个乌托邦。事实上也似乎是这样的，因为它的圣哲们声称掌握了合理治国的秘密。与此同时，大众的贫困则让人感到矛盾和困惑。同样让一些观察者感到不解的是每个朝代总会走向衰落，其文化仿佛是一个没有齿牙的轮子，在历史的车辙中来回不停地转动。不过，尽管有种种疑惑，西方人为了适合某个时期的理论，还是习惯于把中国理想化。

在18世纪末渴望得到茶叶、丝绸和棉花的西方船只和商人涌向中国海岸的时候，他们发现对方并没有表示出相应的热情。处于封闭中的中国有很强的优越感，根本不想让那些陌生人进入；这些人来自叫作英国、法国或者荷兰的那些原始岛国，他们无非是垂涎于中国的财富，但是他们带来的、用来交换的东西都是些无用的东西。他们的鼻子很难看，举止粗鲁，穿的衣服很可笑：袖子和裤腿很窄，领子也很紧，大衣在后面有尾巴，但是前面却敞开着。这些服装都不是正常人穿的。

这个视线投向过去的社会只有在封闭中才会感到安全，因此面对纠缠不休的西方它嗅到了威胁的意味。帝国政府设置了无数障碍：拒绝、推诿、拖延、禁止外国人进入或者居留、不许建立正常关系。远在北京紫禁城“大内”中的朝廷对不停的敲门声置之不理。那些希望通商的外国使节，只有对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后方可进入。英国使节历尽千辛抵达北京，由于不肯叩头只好空手而归。

由于西方商人用银子购买中国物品，因此朝廷并没有完全驱逐他们。为此颁布了一些条例，为的是阻止他们进入的同时又可以让他们的钱进来。他们被限制居住在最南部的港口广州，以尽可能地远离都城北京，同时还要求他们通过城外的“商馆”做生意；这种商馆将住地、办公室和仓库合为一体。为了防止他们永久居住下去，还禁止他们将妇女带来。为了不让他们学会中国的语言，中国人教他们中国话是非法的。

即便如此，贸易还是在增长，不过这种贸易是用一种改变了历史的商品来支付的，这就是鸦片。欧洲和美国对茶叶和中国工艺品的需求使得商人的获利前景很好，但是这种单方面的以钱换货的方式无法在扩张的同时产生足够的利润。将在印度和波斯种植的鸦片带入中国之前，外国人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什么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随着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不断增加，这种毒品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许可的运货人的主要货物，随后还成了美国趸船贸易商的主要货物。财富滚滚而来，贸易量大增，以至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开始依靠鸦片的收入了。

尽管清政府宣布鸦片贸易为非法，但是很多人也靠它发了财。经销商和中间商可以抽取佣金，而各级官员因为对这种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得到了好处。他们虚张声势，假装追击走私船，追击趸船时总是保持安全距离再轰隆轰隆放一阵炮，这样就可以向远处的皇帝汇报说取得了胜利。对于东方人来说，形式比实质更加重要，因此这种摩擦也算满足了中国人面子上的需要。由于鸦片带来了丰厚的获利机会，清政府日益腐败。西方人时不时不免有些羞愧，但是看到这么赚钱也就释然了。不过对双方来说，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实在无助于增进彼此间的尊重。



外国军队与太平军交战。出自《哈泼斯周报》（Harper's Weekly）

在这种情形下爆发了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的鸦片战争，而这两次战争也定下了后来中西方交往的基调。由于关税方面遭受了损

失，吸食鸦片在民众中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恶果，担心挡住外国人进入的封锁正在瓦解，清政府认为必须中止鸦片贸易。此时英国人正急于出售自己的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因此要求开放其他港口并以条约的方式确立通商权。根本问题并不仅仅是鸦片，而是这个事实：中国人想限制而西方人想扩大双方的交往。结果西方人占了上风。

中国的海岸大炮本来就陈旧，加之清朝政府的无能，这些炮已是锈迹斑斑，面对英国的战列舰根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缔结了《南京条约》，这实际上就把中国向西方开放了，并为后来外国的入侵铺平了道路。除了割让香港之外，条约还开放了从广州到上海的5个沿海城镇，后来被称为通商口岸；在这些口岸城市英国人可以安家（带上妻子），开设领事馆，设立法庭，以便根据英国自己的法律审判违法者，并可以在缴纳5%的固定关税后从事贸易活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拿着长矛的清兵在北京城外被英法远征军所击败。这次战争确立并扩大了治外法权原则。外国人可以出入的通商口岸又增加了10个，可以在长江上通行，并可以去中国的任何地方。他们还得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权利，如在北京派驻外交代表和居住，传教士可以在通商口岸之外拥有财产。最终的妥协是鸦片被合法化了。美国和俄国尽管没有直接参加战争，但是也参加了条约谈判。在打开中国大门的整个过程中，美国一直是沿着英国开辟的道路进入的，它避免主动出击，但是得到的好处并不少。



New Elgin Marbles.

中英鸦片战争



"Seaside Lodgings."

俄国垂涎旅顺



Open at Last!

英俄在中国的贸易竞赛



The Avenger!

关于义和团的传闻



Jap the Giant-Killer.

中日甲午战争



In the Movement.

慈禧逃离北京城

中国清政府是凭借其威信统治的，但由于被夷人打败，这种威信被

严重损害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岁月中，灾难不断，农民的税赋增加，政府官员的腐败已经体制化，当局的威信降低了，权力分散了，盗匪猖獗，这些从本质上动摇了政权的基础。1850年，所有这些衰败和不满汇集成了一场叫太平天国的大规模民众起义，历时十五年，平息时已经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太平军从受压迫者那里汲取力量，并成功地在南京建立了另外一个首都。似乎又到了朝代更迭中上天把天意从一个乱朝收回的时候了。然而外国人为了能继续享受他们通过条约获得的特权，开始扶持清政府。在他们的帮助下南京被攻破，同时还杀戮了10万太平军。这个中国式的法国大革命就这样被镇压了。

在外国帮助下得以生存下来的中国的“波旁贵族”们开始依赖这些外来入侵者。这种依赖的方式之一是在至关重要的关税领域。在发生革命的混乱时刻，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代替政府征收关税。由于他们的效率较高而且较少出现贪污受贿，北京政府在这方面所得到的收入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通过签订协议，这种做法推广到了所有其他通商口岸，并且有了在一个英国人监督下并由外国职员任职的常设机构。

很多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要对付来自西方的威胁，中国就必须在坚持自己信念的同时用西方技术武装自己。不改革必然亡国。似乎外国的方法是可以单独借鉴过来并且可以部分地应用在某些方面的。这种“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开始设法为陆军和海军引进西方培训项目，建立西式兵工厂，而且不顾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在北京开办了一所大学堂，在这个大学里除了要学习体现中国教育本质的经学和礼学之外，还增加了西洋课程。中国当时主要还靠独轮车做陆上运输工具，因此这些改革者主张首先建造铁路，此外还要架设电报线，开工厂，造机器，建立邮政系统，更重要的是，还要创立现代教育制度。然而保守势力竭力反对，而且由于缺少像当时日本明治天皇那样有执着信念的推动者，这种现代化运动缺少动力，而且也未能积蓄自己的力量。在朝廷里，心胸狭窄却又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最终颠覆了改革者的努力。

中国的政府所依靠的是一些头脑还处在中世纪的王公大人们组成的小集团以及正在变得松散和低效的官僚体系。变革的动力来自外国人那里。铁路是外国资本和影响渗透的途径。政府将修铁路的特许权卖给外国，各个国家为此争得不可开交。雇用的外国顾问越来越多；传教士大量增加，说明中国多么需要拯救；外国棉花和其他产品开始输入，这导致了小作坊工业的衰退。中国对外国的依赖越大，中国的不满也越大，这种不满最后酿成各种“事件”，但是每个事件的结果只不过是无奈地签

订另一个“不平等”条约，又一部分主权被割让，又增加一块治外法权的地方，外国人用脚又踢开另一个通商口岸的大门而已。外国人开发了中国的资源，但同时也耗尽了中国使用这些资源所需要的意志和能力。

西方帝国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885年，虽然清政府打得很辛苦，但是却不得其法，结果被西方抢去了两个属国——法国抢走了东京（Tonkin，越南北部　）与安南（Annam），英国夺走了缅甸北部。同一年又向英国开放了10个通商口岸。不到十年，另一个属国被一个中国人习惯称作“倭奴”或“倭寇”的近邻夺去。1895年日本突然崛起，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中国，迫使它放弃了朝鲜（委婉的说法是“独立”），又失去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付出一大笔赔款；最为严重的损失是割让具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这是通往东北的门户，也是进入华北海上通道的控制点。

欧洲列强对这个竞争者的出现感到吃惊，加上想独占东北的俄国的竭力鼓动，结果它们匆忙联手迫使日本吐出了辽东半岛，然后又分别冲过来向还没有从战败中镇定下来的中国索要各种租借地、特许和特权。俄国接管了日本原来占领的地方，此外，还在辽东半岛的南端租借了地方，在旅顺港建立海军基地，并在大连修建了商港和铁路。英国占领了旅顺对面、位于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并在其北部建立了自己的海军基地。德国占了山东半岛下部面向黄海的青岛并建立了海军基地和铁路，此外还获得了采矿权。在南方，英国夺取了香港对面位于中国大陆的九龙，而法国在与印度支那相邻的广州湾海岸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同时还得到了修建一条从印度支那到中国南部的云南的铁路特许权。

接着它们又开始为给中国提供贷款的份额争吵不休，这些贷款是用来支付给日本赔款的。贷款是修建铁路之外最有效的渗透方式。竞争使它们变得更加贪婪，结果各国列强开始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势力范围内这些国家有开发资源的特权，并在中国被瓜分的情况下可以用作进一步兼并的据点。它们兽性发作，开始大谈特谈如何瓜分中国，这不免让美国苦恼，因为它渴望占有，但又不能完全不顾原则。

在内战后迅速发展的美国也加入了剥削中国的行列中来，不过在此过程中，它对抢夺别国领土还是有所顾虑的。1898年，海约翰（John Hay）将这种把逐利和原则合为一体的方法上升为一种外交信条。所谓的“门户开放”（虽然这门不是由它先开）听上去宽容、高尚，甚至有些保护中国的意味，但其实它的含义——如果有含义的话——不过是渗透之门应该对所有人平等开放而已。

美国在这段时间对中国的渗透是通过生意和福音双管齐下的。美孚石油公司的代理商为使用煤油灯的中国各个家庭提供煤油，这也许是受到这些顾客欢迎的，但是长久影响两国关系的是那些传教士。

地域广大的中国让这些传教士兴奋不已。它看上去是一片拥有广阔未来的土地，一旦其广大民众皈依了基督教，那么基督教，甚至说英语的民族就可能主导这个世界。这些传教士无视中国人所适应的社会、伦理结构，企图改变这种结构。他们灌输的观念是：个人是神圣的，民主原则至上，他们并不关心这些概念是否能跟中国的生活方式有关联。这些传教士看到19世纪的中国处于苦难之中，并认为这证明了中国人不能管理好自己，其问题只有在外国帮助下才能解决。这些无处不在的、狂热的美国传教士把“美国援助东方”视为自己的使命，并在给国内教友大会的报告中反复提及。因为他们自己要依赖国内支持者的财政资助，他们必须让人信服这是项有价值的事业。美国各地的教友大会都聚精会神地听那些回国的传教士用幻灯片讲述中国人的品性多么好，那里可能潜藏着怎样多的基督徒。当时在公众中制造的印象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维持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传教士则竭力把中国描绘成为美国的保护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对受保护者有了某种施恩的义务。

在1898年曾短暂地出现了一丝希望，中国似乎在迈向现代化。被日本打败之后，看到昔日被自己蔑视的邻国转变成了一个军事强国，在惊诧之余，中国的维新派也在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下重新活跃起来，提出了规模庞大的现代化措施，其中包括发展交通和工业，设立学堂和报馆，改革政府机构，而最激进的一个措施是废除了基于书法和儒家经典的科举制度。皇帝发布了一系列法令，旧中国坚硬的外壳已经被打破，在一百天的时间里似乎有个新中国在艰难诞生。但是守旧派掌握了强大的军队。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逮捕了维新派领袖并处决了其中6人。慈禧将她的外甥囚禁在皇城中南海中一个小岛上的宫殿中，自己再次临朝“训政”。她是个在太监簇拥下的脸上涂粉、身着绸缎的暴君，在清朝的最后岁月当政，那时这个王朝已是风雨飘摇。

不断遭受的挫折和屈辱导致了1899年到1900年的义和团叛乱。当时的口号是“灭洋”，尽管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其倡导者是一些叫作“义和拳”（Harmonious Fists，外国记者将它译作“Boxers”）的秘密团体。其狂热的领袖们将中国所有的弊端都归于外国人，鼓动民众参与屠杀，并自称有蔽弹之术。他们很像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无知狂”（Know-Nothings）[1]。义和拳其实并不是一场反叛，而是横扫北

部的疯狂杀戮。他们并不反对清政府，反而打着皇帝和清王朝的旗号。实际上这个运动受到了政府的支持。政府既想借义和团运动把民众的不满转移到一只替罪羊头上，又对其寄予一线希望，指望它能彻底赶走外国人。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各地爆发，共杀死了两百多名传教士及其家人，此外还有至少两万名的“二鬼子”——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国人，直到最后汇聚北京包围了外国公使馆。虽然清廷意见并不统一，但是六十年的仇恨还是让它愤怒了，最后决定对西方列强宣战。

由六国派遣部队组成的外国联军从海上攻入 [2] ，以解救被围困的公使馆。为了报复义和团的进攻，这些前来营救的军队开始烧杀抢掳，疯狂发泄。“军队所到之处，无论城镇、村庄还是农舍，均先被掠夺再被焚烧。”曾目睹了这一切的老记者托马斯·米勒德（Thomas Millard）这样写道。他总结说，外国军队所干的一切“将在世界上给以后好几代人留下道德上的阴影”。据美国公使说，在北京城内，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从将军到普通士兵，从公使到随员，从主教到传教士，他们都在“偷窃、抢劫、破坏，都在让自己蒙羞”。胜利者所强加的条件十分苛刻。十二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宣布中国犯了“反文明”罪，而且违反了国际法。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公使馆区划入治外法权区并由外国驻军保护。两年内禁止中国从外国进口军火。从北京到海岸的要塞均被毁掉，由外国军队维持通往北京的道路畅通无阻。中国被迫缴纳巨额赔款，并用关税作为抵押。四名政府官员被处决，其他一些人或被革职或被永久放逐。

外国的做法无论多么可恨，但同时也把中国带入了20世纪。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民众的政治觉悟被唤起，封闭状态已经被打破。由于显然需要维新，想摆脱清朝统治的情绪在蔓延。第一个致力于推翻满族统治的秘密社团是兴中会，1894年由28岁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基督徒孙中山博士创立的。孙中山是广东人，而广东是受西方影响时间最久的。他在檀香山接受过西式教育，并曾在香港学过西医。他的追随者代表了维新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的形式很多，如一些学生勇敢地剪掉表示效忠清廷的辫子，另外也体现在打破经书中僵硬模式的文学复兴运动上。即便官僚统治阶层（他们并非都是顽固分子）也开始出现了变化，于1904年建立了最早的一批国立学校。1905年9月，自公元前1世纪就开始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 [3] ——这个中国文化上的长城——被废除了。满族朝廷为了维持王室权力采取了一些改头换面的措施，答应五年内制定宪法，并在经历一段时间以便对人民进行教育之后通过选举组建议会。在学堂的科目中加入了西方课程，而作为新学来源的教会学校也开始扩张了。有进步思想的中国人跟日本人一样为西方学问所吸引，因为

他们在这些学科中看到了对付西方挑战的办法。

日本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这进一步激励了“自强派”。日本看来是值得效仿的。那些想接受顺应时代的高等教育的学生开始去东京留学。美国1904年的《排华法案》（Exclusion Act）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个法案的狂热鼓动者是一些仇视华工的人，而这些华工被运到美国原是为了铺设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这个法案明确规定永久性地排斥华工，但是其他阶层的人则例外。1905年，中国的不满演变成了抵制美货运动。抵制扩展到从北京到广州的25个城市，并与反对清廷的革命情绪汇聚到了一起。现在这两者都变成了敌人：篡位者和外国人将同所有束缚中国的东西一道被扫除。不过被抵制的东西并没有包括西方的思想，这些具有维新思想的中国人仍然认为西化是实现变化的必要工具。

那些从欧美归来的留学生往往得到了工程学、农艺学或者政治学方面的学位，他们穿西服戴眼镜，神情真挚，跟那些穿着绸缎长袍、头戴显示官阶的瓜皮帽、长髯垂胸的朝中大员，无论在形象还是在精神上都是迥然不同的。



孙中山

刚刚得到了夏威夷和菲律宾的美国此时已把视线投向了亚洲，远东巨大的创业机会和商品消费潜力让它头晕目眩。中国仿佛成了美国未来的保障，地位日益重要。据说海约翰曾说过，谁了解了中国便等于掌握了以后五百年世界政治的关键。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总统在1905年说：“美国的未来将更多取决于我们在面对太平洋彼岸的中国的立场，而不是我们在面对大西洋彼岸的欧洲的立场。”1908年，他免除了庚子赔款中中国应付给美国的部分，并要求将这些免除的赔款用于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这显然是个姿态，是个天才的自我宣扬，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屡被美国人和中国人提及，并被作为两国之间具有特殊关系的明证。



袁世凯

美国的“美元外交”就没有那么为别人着想了，而是跟别国一样狂热地以极高的利率迫使中国接受贷款修建铁路。一个中国人不论身处何处，总是可以看到自己国家的国土、主权或者重要事业设施已经落入外国人之手。根据条约，外国人的轮船可以在中国的内河中自由航行。外国银行在为中国的工业和贸易提供贷款的同时还控制了中国的关税收入以及外国贷款利息的支付。同时这些银行也为中国那些富裕公民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存款的地方。外国法庭所依据的是治外法权，外国邮局负责治外法权区的邮政业务。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中国人要缴税，但是没有选举权，也不得进入某些公园，还可能被外国警察逮捕。

在很多位于内河地带的通商口岸经常可以看见穿着制服的外国海关官员，而特别划出的治外法权区是供外国人做生意和居住用的。中国人的居住区拥挤不堪，一片嘈杂，到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喊叫声、争吵声和嘻笑声不绝于耳。码头上轮船、各种帆船和舢板挤在一起，船夫扯着嗓子吼叫，而乘客则在一堆堆货物中间绕行。街上到处都是露天小摊

贩、黄包车和独轮车，富人乘坐着轿子，前呼后拥的保镖吆喝着开路，苦力用竹子扁担挑着的货物上下晃动着，瘦狗在人脚下嗅来嗅去找残渣剩饭吃，还有些人蹲在露天的水沟边上。

通过一座桥走到河道的那边，一切都变了。一切突然都变得安静而整洁。干净的街道两侧绿树成荫，一个身着白制服的看门人坐在椅子上打盹，一艘船体发亮的炮艇停靠在外滩附近。住宅区外面有个通常叫作维多利亚公园的地方，那里有各种娱乐设施，如网球场、板球场和俱乐部等。俱乐部大多由英国人开办，而英国人所经营的俱乐部是禁止中国人进入的。每天下午，租界里的上等人便乘坐轿子去公园。抬轿子的中国人穿着各个领事馆和商号的制服，比如英国领事馆的是白底红边制服，而英国庞大的贸易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的则是蓝底白边。一旦遇到骚乱、暴徒抢劫或者其他威胁，炮艇上就会有一小队身着蓝色制服的军人下来在外滩上进行一番演练以示警告。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辽阔又动荡不安，生活在这些隔离的飞地——或者说“外港”，如果没有那些小炮艇时不时的访问，生活就会处在危险之中，这些炮舰总是以鸟类命名，比如“鹬”（Snipe）号、“凫”（Teal）号、“矶鹞”（Sandpiper）号、“丘鹬”（Woodcock）号。

在很多人看来，革命是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独立和平等地位的唯一途径。虽然外国租界代表着敌国势力，但是由于孙中山受到过西方教育，因此他不但不排外，反而坚信他的国家对外国的依赖由来已久，没有外国的贷款和技术帮助，中国要迈入现代化是很难的。他认为，革命首先要反对清朝，因为清朝导致了中国的衰落，只要这个篡权的王朝仍然在统治，中国就无法强大，“且其软弱势将引起外族之贪欲，危及世界之和平”。他认为革命会使中国快速迈入现代，这将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而且中国也将欢迎列强提供的外援——这些国家在意识到外援能起到的作用后是一定会提供的。他夫人说：“他不是胸怀一个中国，而是胸怀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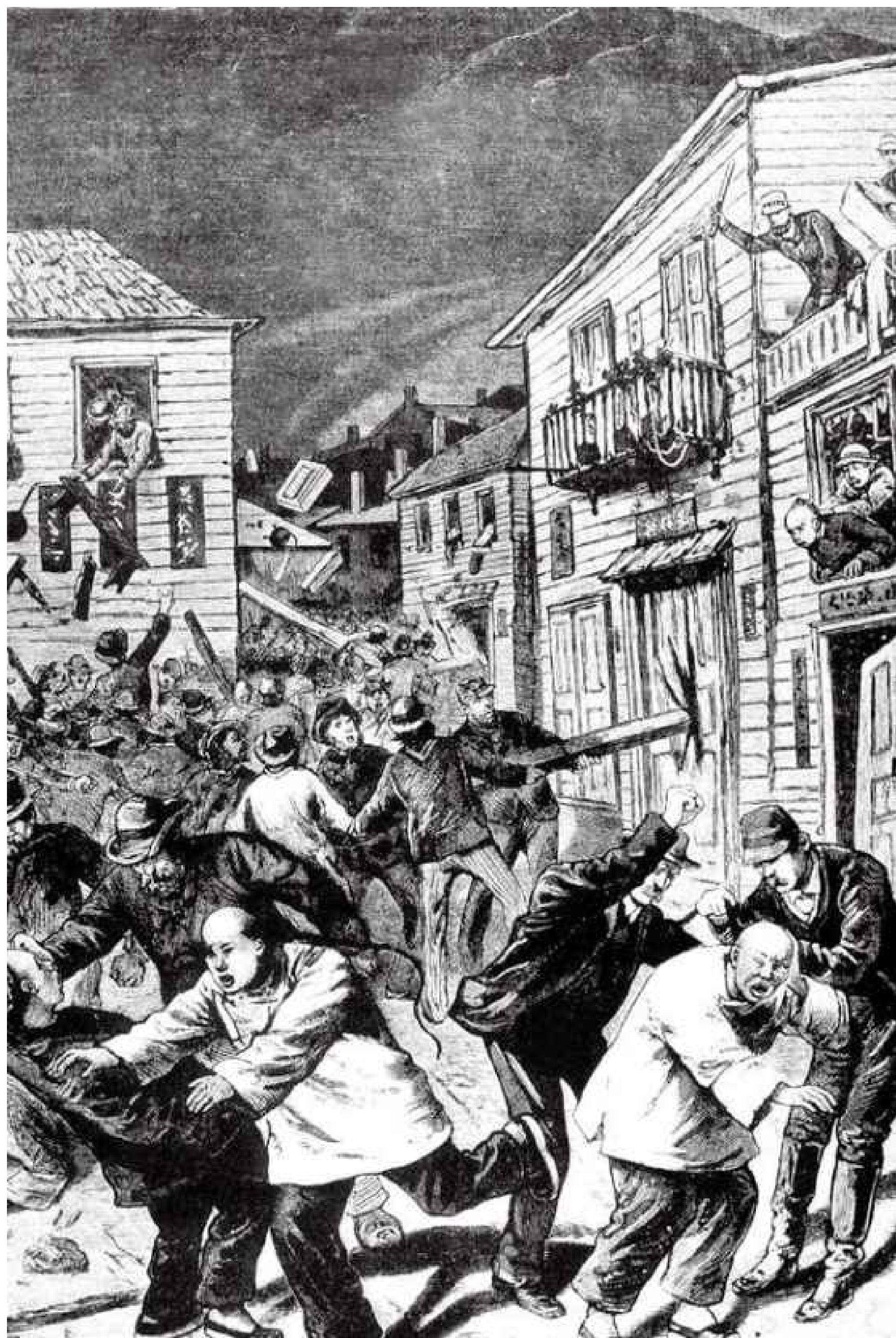
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孙中山的）非法革命团体首先在日本，然后在海外社区中发展，并开始在中国本土发展追随者，特别是在广东和广西这两个南方省份。由于广东的省会广州控制了与香港的贸易，因而广东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而当地的人民也同情革命，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能够维护富强的政府。1907年至1909年间，旅居河内的孙中山策划了六起南方起义，这些起义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指望这次或那次起义能够引起响应。1910年，当孙中山博士正在欧洲和美国筹款时，革命

的节奏加快了。革命党人试图在广州、汉口甚至北京发动政变，其中在北京，孙中山的副手汪精卫想炸死摄政王，但由于事情败露，汪被判处终身监禁。由于军火未能到达、领导者错过了约定时间，或者其他方面的偶发事件或错误，所有的起义都失败了，不过起义者宣扬了他们的事业，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并传播了反抗精神。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又在长江上位置关键的武汉三镇（汉口、汉阳和武昌）策划起义。他们在汉阳设立了一个弹药库，并在武昌的清朝军队里进行了策反工作。

由于发生了意外爆炸，这次起义提前泄密了，于是决定立即进攻总督府并占领军队驻地。10月10日（后来成了“双十节”）起义奇迹般地成功了。驻军叛变，总督和镇统逃往上海，群龙无首的革命党人一下子成了这个中国心脏地区的主人。当他们召开会议选举领袖时，革命委员会选择了标统黎元洪，并随即派代表去通知他。听说有革命党来了，黎元洪感到大难临头，便躲到了床下，可是没有藏好脚，暴露了。结果他被从床底下拉出来，代表正式请求他担任革命领袖，否则就要枪毙他。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并以革命军都督的身份宣布推翻清王朝。

不出两天，武汉三镇就全部落入起义军之手。广州的同志也起义响应，这次成功了，他们刺杀了镇统并建立了革命政府。这些事件在中国其他地方引起了各种叛乱——省会被烧，官员被杀，驻军反叛。不出一个月，就有九个省宣布从清廷独立，不过它们未必都忠于一个革命政府——分裂开始了。



丹佛排华惨案，1880年

清政府终于慌了，召来了实力人物袁世凯。个头不高、身材敦实的袁世凯眼神机警，还留着小胡子，很像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而且也跟他一样有才干、有野心。袁世凯在10月底收

复了汉口，随即屠杀了所有剪掉辫子或者支持过起义的人。革命党人将基地转移到上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处于治外法权区的外国租界找到了庇护。最后上海各方面达成了协议，有资金、工业、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上海在11月3日接受了共和。顺应时势的袁世凯表示愿意就建立君主立宪进行谈判，日后事实证明他实际上想自己做皇帝。根基极其薄弱的革命党人既没有稳固的基地，也没有意志坚定的领袖，便同意谈判。他们坚持要建立共和国，并答应，如果袁世凯能把中国北部归于新政府之下，那就让他当总统。北京方面则请他做内阁总理，这在历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革命和反革命同时寻求他的领导。袁世凯接受了清政府的总理职位并继续进攻，革命党人则开始从上海沿长江对南京发起进攻。

在这些重要事件发生的背后，旧体系正在混乱中分崩离析。各省的实力人物拼命扩大势力，叛军攻下城市后烧杀抢夺，而清朝军队在他们掌控的城市里也干着同样的事情。一无所有的难民们流离失所。农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因为现在除了土匪，士兵也在四处游荡抢夺农民储藏的粮食和牲畜。土匪日益壮大，因为领不到军饷的士兵把弹药卖给土匪，或者干脆加入到土匪那里去了。村民用锄头、叉子和棍棒进行抵抗，封堵大门，加固围墙，来访者只能攀绳而入。政府的崩溃已经指日可待，可是革命党人并没有把握机会取而代之。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写的：尽管革命的目标是好的，但是却“由于缺少凝聚力、资金和领袖而一无所成……这个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中的伟大民族正在激情、恐怖和狂热中爆发”。

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于11月23日到达上海，在这个国家总共停留了十七天。他仅仅有限地看到了这场大动乱的表面现象，也就不可能对此有怎样深刻的判断。但是他孜孜不倦地进行细致观察并做了记录。他所看到的东西正是历史学家常常忽视的：不管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普通人的生活跟过去一样仍在继续，也只能继续。去了上海之后史迪威乘船去了香港，看到这个“仿佛悬在半山腰上”的富于进取的城市俯视着一个壮丽的海港。这里跟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其他地方一样，在地势最高的地方挂着英国国旗，无非是炫耀大英帝国的威风。史迪威进港时那里停泊着36艘远洋轮船。他所乘坐的轮船周围拥挤着许多舢板，上面有一家老小，甚至鸡也在上面。“妻子掌舵，孩子摇桨。每个人都有事做。”在一家美国人开办的家庭旅馆吃了感恩节晚餐后，史迪威乘电车到达太平山顶，从山顶朝港湾望去的景观是很有名的：“棒极了，记忆中最好的景象。”

他注意到那些刚刚剪去辫子的中国人看上去怪怪的，他对那些训练中的英国训练士官（中国人　）则是称羡不已，说他们“就指挥、形象和结果来看胜过我们一般军官五倍”。然而他对英国军官的评价则成了一种历史性偏见的始作俑者，他认为他们“一团糟，至少在香港如此。不整洁，脾气坏，懒散，拿着手杖游手好闲。给士兵树立了很坏的榜样”。让他厌恶的是那些手杖。在史迪威的一生中，不管看到哪个国家的军官拿着手杖敲打靴子，他都会感到深恶痛绝。他的结论是，在香港任何一个应征者都比他看到的（英国　）军官更像一个军人。

史迪威在香港的时候，那里的报纸充斥着有关广东陷入混乱的报道：巷战，武装歹徒抢劫商店，旁观者被杀，革命政府完全无能为力，广州几乎落入匪徒之手，西江海盗肆虐。据说他们已经截断了去梧州的通道，并杀害了一艘英国江轮的大副。史迪威认为：“所有这些事端都是凶残的英国人挑起的，因为他们把局面搞得越遭，他们就越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干涉。”于是他立即去广州，并从广州沿江去梧州实地察看。

在广州的时候史迪威置身于色彩和活力之中，不同的气味、声音和身体混杂在一起，古老和各种机巧随处可见，中国人生活的迷人和可怕之处同时并存。他看到一个猫狗市场，在那里人们先把猫煮熟，然后切开，再挂起来出售，而狗肉则炖在一个大锅里，再装盘出售。一个制造于1325年的水钟的水滴滴入一串容器而推动浮在水上的一根垂直指针以报时，而且“还挺准”；庙宇的屋顶上是雕梁画栋，两个凶猛的红色大狮子守在大门口。他在迷宫般的用石头铺成的街道和弄堂里行走，那里的中国人摩肩接踵，用大声嚷嚷、吆喝、铃声或者敲打木块来“骂人，叫人避让或者叫卖自己的货物”。所有商品的买卖双方都在街上进行交易，过秤，讲价钱，妇女们围在篮子旁拣鸡骨头，一个裁缝在做衣服，一名男子往罐子里塞稻草，另一个在称鱼，还有一个在卖头发（“一个中国人剪了头发后放在报纸里卖”）。他还提到了吸食鸦片的人，在帆船上养鸭子，歌女，坟墓，在门廊烧香，一些闲人一边聊天一边在衣服的缝隙里捉虱子，捉到后放到嘴里咬，用稻草孵小鸡，当铺，笼子里养的云雀，猪和母鸡的叫声，尿味以及公厕的味道，所谓公厕无非是“一排排蹲坑，人蹲在一块木材上，有些地方小孩当街大便”。中国是个对比鲜明的地方，一方面中国像在搪瓷上的用翠鸟羽毛制作的精致饰画，由剪成淡蓝和紫红色的碎片粘贴而成，另一方面则是“水坑，泥巴，污垢，垃圾，破布，还时不时隐隐呈现那神秘的内部”。

他谈到了“叛军，一群乌合之众”，有些“像不错的人，但大多数是十

足的土匪”。他们也算穿了制服——带有红边的浅蓝上装和裤子，咔叽色背带，绑腿，还有土匪常用的裹布。“很多人配有新的子弹带，弹药很多，有些人提着手枪站在周围，手指搁在扳机上……我给他们看我的红领带和蓝衬衫，说我也是个叛党，结果他们都被逗笑了。所有的人都鞠躬道别。”他还写道，广州炸弹团由300名精干的士兵组成，他们都誓死战斗，所用的武器都是小型自制炸弹，里面有雷酸贡和凡士林。史迪威去了外国租界区的沙面岛，还去了外国人“拼酒量”的俱乐部。他听说有钱的中国人在沙面岛上所藏下的金锭和各种值钱东西的总价在200万至600万美元之间。他还收集了中国的一些传说和迷信说法，此外还有些贬低传教士的故事。有一天他跟一个鼓吹传教士如何如何努力的美国人一道旅行，此人大谈特谈新教基督徒为中国人做了多少事，还说：“当我们进入这里的时候，我们在一瞬间把跨越一千二百年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

史迪威在去了广州之后乘轮船逆西江而上200英里（约320千米），在85吨的英国战舰“矶鹞”号的护送下去了梧州。有关有强盗出没的传闻看来并非耸人听闻。在一次船靠岸的时候史迪威他们正好看到叛军在跟江上的强盗遭遇后归来，叛军的舰队包括两艘炮船、三艘汽艇，还有五六条帆船。他们看到江上有死尸漂下来，得知两周前曾经跟土匪有过一次大规模交火。当时梧州的部队袭击了一群土匪，抓了66个俘虏，第二天砍了土匪们的头，接着又挖出他们的心烤着吃了。史迪威听说吃被处决的人的心肝是很平常的事，他甚至有一次听说还有把整个人都吃掉的：“人们吃掉他之后他就不会再投胎成土匪了”。史迪威的想象力自然也被大大激发了，结果有一次在三水抛锚时他一下子被惊醒了：“我以为我们肯定遭到了袭击。本来睡得很香，一下子跳起来就要抓枪。”

等他再回到广州的时候他已经在河上待了一个星期，不断观察河两岸以及河上所发生的生生死死，对路途上的见闻非常留意，把看到的生活习惯以及各种东西的制作方法和价格都记录下来。因为有人对他说，鸭子见到外国人是要嘎嘎乱叫的，他就得出结论认为，普通中国人尽管也会勃然大怒，但是人可以通过言语化解掉。他看到过无数次的冲突碰撞，但是没有一次打起来。

还在香港的时候他曾经在日记中记道：“南京一天有400颗人头落地。”这是11月27日这个南方古都落入叛军之手的结果。这个事件加快了事情发展的进程。为了使清朝的统治可以维持下去，摄政王让政于已故皇帝的遗孀，但是南方的革命党只接受完全退位。大量满族人开始沿

着很久以前他们祖先进关时走的路退回东北。外蒙古宣布独立。尽管在通商口岸时不时有人感到应当对叛军进行干预，但是各国列强都没有介入。各国普遍的感觉是，由于革命是倾向西化的，因此应该不会像旧政府那样排外，再加上对义和团运动记忆犹新，所以各国列强并不是很想保存旧政权。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陷入政治混乱，干预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前途攸关的时刻，有个头脑依然保持清醒的人 [4] 是这样说的："凡是对此事曾经做过仔细研究的人，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亚洲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是20世纪最大的难题。"

其他一些人则更加乐观，他们由于革命者许诺的自由、西方和议会制而受到鼓舞。有个美国商人写道："我们对中国以及崭露曙光的新时代怀有崇高的想法。"总体来说，这也是当时美国公众的看法；他们相信那些传教士不断给他们允诺的东西，那就是有4亿人的中国将转化成为他们所喜欢并熟悉的国家，即民主国家。至于说4亿人中的70%到80%的人都不识字，其饮食中没有牛奶或肉类，没有卫生设备，没有自来水，没有隐私，没有电，没有选举权，其工业90%仍然是手工业，交通大部分仍然依靠人力——所有这些即使有人考虑到了，也并没有人觉得这是跟民主不相容的。汉口的一个起义军领袖以东方人认为的应该讲别人爱听的话的那种礼貌对记者说："我们起义的目的是要使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一样。"这种话美国读者听到时是再顺耳不过了。

史迪威在12月9日离开中国去马尼拉。革命艰难地进行下去。谈判代替了军事解决，结果袁世凯正式向朝廷说明了接受共和的必要性。孙中山终于在12月25日回到了中国，并被选为建都南京的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由于各方面对清廷的支持已经不多，结果已经不可避免。1912年2月12日，摄政的皇太后代表清廷宣布结束帝制。

中国现在成了共和国。因此美国国会两院共同发表了联合决议对此表示欢迎："鉴于中国人民已经成功地表明主权来自人民"，同时又由于美国人民"本质上、传统上对采取代议制政府的所有努力都表示同情"，因此美国"祝贺中国人民承担起了自治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并希望共和政体"能够保证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进步"。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袁世凯仍然控制着北方，而且没有使之归入民国政府之下。他还在施展诡计并等待时机。由于缺少整体上的支持、有力的权威以及可靠的军事力量，孙中山难以支撑下去。继续进行的谈判的结果可想而知。1912年3月12日，孙博士辞去总统职务，让位给了袁世凯。袁在北京重新建立了政府。就这样，中国在求得了这个不稳固

也不彻底的解决结果之后迈入了现代。

---

[1] 无知狂，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党徒。一无所知党，又名美国党（American Party），19世纪50年代盛极一时的美国政党，是当时强大的反移民倾向特别是反对天主教情绪的产物。——译者注

[2] 此六国为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六国先自海上攻入，于天津登陆，再乘火车抵达北京。数日后德国、奥匈帝国抵京，八国联军初步集结完成。——编者注

[3]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作者此处说法有误。——译者注

[4] 头脑依然保持清醒的人指约翰·福特（John Ford），当时的美国——亚洲协会（American-Asiatic Association）秘书长。

第三章

世界大战

圣米耶尔与山东

从1912年至1917年，也就是史迪威在29岁到34岁之间的时候，对于这个美国陆军军官来说，这段时间并没有多少挑战性，也没有给那个年龄的人提供多少机会让他们消耗旺盛的精力。尽管欧洲的军人阶层在这个时间段的中期遇到了致命的挑战，但是对于美国陆军来说，周遭仍然是风平浪静，几乎没有被大西洋那边的战火波及到。

史迪威于1912年1月从菲律宾回到美国。他以中尉的身份又在团里干了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Monterey）郡的普雷西迪奥（Presidio）执行极其平静的日常勤务。他的第一个儿子小乔那年3月在锡拉丘兹出生，但史迪威六个星期后妻子带着孩子来加利福尼亚避暑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孩子。这个夏天史迪威第一次见到了卡梅尔（Carmel）这个小村庄，这是个蒙特雷南边滨海的村庄，当时还没有被开发，也没有被人为美化。他们在海滨野餐，在海风中踩着被太平洋拍打的石头散步，当下决定这里就是他们日后要居住的地方，退休之后便在此安家。

史迪威还是跟从前一样不安分，想争取去圣多明各做武官，但是没有成功。然而西点军校要他回到英语和历史系担任教官，于是1913年8月他再次回到西点军校重操旧业。尽管在军校教学不像在步兵团工作那么枯燥，但是同样也无法使他的精力完全集中起来。他的上级在向上汇报他的工作时说：“他是个很有才干的军官，不过对在历史系的工作好像并不是很有热情。”他为篮球队和橄榄球队担任教练，次年6月他的女儿南希（Nancy，中文名史文思）出世了。不过此时他对做父亲的至关重要性的认识还不是很强；随着孩子们的长大，而且有更多孩子降临之后，他才开始看重父亲的角色。据他太太回忆，乔在西点工作还不满一年就“拼命想离开西点”。



西点军校教官史迪威，1914年

1914年夏天，他的机会来了。当时他被调到现代语言系去教西班牙语，于是他设法争取到马德里进一步学习西班牙语。6月29日他到乡村玩了一天。他在日记里叙述了游玩的情况，最后加了这么一句括号圈起来的话："波斯尼亚暗杀"。此后几周里，他跟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没有再更多地考虑发生在萨拉热窝的这件事，直到7月30日他读到了有关奥地利炮轰塞尔维亚的消息。"很严重的战争消息。难以置信欧洲即将陷入深渊。"

回到军校重新执教并不能让他兴奋，而且在此后两年里这种刻板的日子也没有什么改变。史迪威试图去法国陆军担任观察员，但是没有成功。陆军部在1915年12月答复他的申请时解释说，当时已经外派了5名军官去观察欧洲战争（当时这场战争已经涉及从英吉利海峡海岸到美索不达米亚的10个国家的部队），因此"不打算再派人去"。

但是战备运动加快了。1916年4月通过的陆军法案准许在五年的时间里把陆军常备军增加一倍，最多可达28.8万人。史迪威第一次在战时的工作是1916年夏在纽约的普拉茨堡（Plattsburg）训练营担任教官，

这是第一个从平民中培养预备役军官的训练营。当年9月，在当了十二年的中尉后，他晋升为上尉。

1917年4月，当时拥有13.3万陆军的美国参与了这场战争，当时交战各方仅在西线集结的人数就超过了600万。欧洲各国的部队都编成集团军，每个集团军下辖三到五个军，每个军有两个师。而美国陆军没有超过团的军事单位。尽管名义上有师级组织的存在，但是自内战之后，美国军人从来没有以师为单位，在步兵和炮兵、参谋部和战场指挥人员、情报部门和作战部队进行必要的协调的情况下打过仗。所有这些都必须从头学起并进行实践。必须建立一支规模比现有团级构架大10倍的国民军队，这意味着要征兵、配备军官、训练、提供装备、运至海外、集结起来、补给、对其各个分支的工作进行协调，而且在投入实战前还需要进一步训练。尽管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总参谋部并没有做出安排，也没有什么动员总计划。

还是事态的发展促进了这件事，1917年5月颁布的《选征兵役法》授权招募100万名新兵。通过考察欧洲的情况所得出的结论是，要实现未来的计划，这个数目应当增加两倍。想到这样一支庞大的新军队会需要多大数量的军官——每20名军人需要1名军官或者100万军队需要5万名军官——这个景象把正规军吓坏了。在战争的第一年，训练营通过一系列为期三个月的课程总共培养了5.7万名军官，这是西点军校自建校以来所有毕业生总数的10倍。

培训是当时压倒一切的重任。通过训练造就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是当时美国的首要目标，过了二十五年后这也成了史迪威在中国的首要目标。一支部队的第一要素是不会临阵脱逃，而这只能通过训练达到。不经过训练，一名士兵担不起他被赋予的责任，一名军官毫无用处，这样的部队只是乌合之众。亨特·莱格特（Hunter Liggett）将军当时是陆军军事学院院长，之后不久开始指挥第一师，最后指挥美国第一集团军；他曾经毫不客气地说，一名接受过严格训练并装备良好的外国军人可以战胜10名虽优秀但未经训练的美国军人。他还指出，在1812年的战争中，一支5400人的未经训练的美国部队在遭遇了1500人的英国正规军后落荒而逃，一直跑到离华盛顿15英里（约24千米）的地方才停下来。在他们花三天时间做重新集结的时候，英军已经放火把首都给烧了。要想在战争中让美国军队扮演独立作战的角色，而不是仅仅作为协约国部队的替补队伍（这正是协约国所希望的），就要求把美军训练成为美国军官统率下的美国军队。职业军官突然变得十分抢手，不久他们

中的很多人便被从自己的部队中抽调出来，到各个地方参与了各种培训任务，后来他们中有一半人没有被派到海外去过。

尽管最初要求史迪威到训练营担任教官，但是调派他担任驻弗吉尼亚李营（Camp Lee）第八十师副旅长的命令得到了优先考虑，因此他摆脱了这个命运。他被晋升为临时少校，于1917年8月25日到达李营，并与另一个可能改变他命运的提议擦肩而过。他多年来执意想去说西班牙语的国家，现在终于有了结果，这就是任命他为驻西班牙武官。陆军部给他写信的人说，这可“不是坐在转椅上的工作”；相反，“西班牙到处是间谍和德国特务”，而且“为了建立一个间谍体系”需要一个能干的人过去。当时要求史迪威“立即”通过电报答复，可是当这封任命信发出的时候他已经到达了李营。

四个月之后，也就是1917年12月，他受命去法国向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报到，从事情报工作。他要成为一名参谋官了。像他这样体力好又富于冲劲的人被分配去做参谋而不是去作战，未免有些讽刺意味，但是考虑到他之前的职业经历，这又合情合理了。虽然他不是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或陆军军事学院指挥和参谋方面的毕业生（美国远征军担当要职的都是这类毕业生），但是他会法语，而这是当时所急需的。

自美国参战以来，协约国军队就一直不断地对上至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总统，下至营或者营以下单位的美国军官的每一个人施加压力，让美国军队填充到不断减员且疲惫不堪的协约国的各个师中去。他们坚持认为，虽然美国军队缺乏训练，但是只要跟有经验的部队一同作战，这一弱点就可以得到弥补，这样还可以节约时间。



“一战”时美国政府募兵海报

那位意志坚强的骑兵、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潘兴将军对此断然拒绝。从政治上说他也是奉自己政府的命令行事，因为很显然，如果将美国士兵融入协约国队伍中，无异于将美国的前途交付给协约国，美国将无法自行决定政策，在和平谈判时也无法发挥主导作用。此外，他这样做还有军事方面的考虑。他认为，要打破堑壕战的僵局并赢得胜利只能通过重新展开运动战，也就是要放弃已经成为西线常规的、先进行有限目标的进攻然后巩固阵地的打法，而采取以纵深突破而非巩固阵地为目的的野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想引入进攻精神以及美国的战争原则，即要求士兵和各级军官必须最大程度地发挥能动性，当然首先要训练他们学会把握一切机会。潘兴希望下命令言简意赅，他注重的是说明目标，而不是像协约国部队那样制订繁复的、分成各个阶段的作战计划，并对部队行动进行死板的控制。由于英军和法军已经适应了堑壕战的方法和武器，潘兴要证明他这个方法的有效性，只能先对美军进行这种训练，然后在美军负责地域单独实施他的战术。这种作战精神和战术也正是史迪威这个潘兴式的将军在下一次战争中试图移植到中国去的。

1917年7月，潘兴带着自己的司令部参谋抵达法国之后，就开始寻找一个可以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地方。他选中了凡尔登（Verdun）和梅斯（Metz）以南的三角地带，自1914年以来那里就是德军所占领的圣米耶尔（St. Mihiel）突出带。这个突出带控制了富裕的布里埃（Briey）铁矿盆地以及为驻法德军提供补给的两条重要铁路中的一条。潘兴认为这里是敌人的太阳穴。梅斯是德国防御体系的核心，任何它的周边地区被

突破，都会使进入德国的道路畅通无阻。潘兴认为要在这里发起战斗，只能依靠一支有冲劲的新部队才能成功。由于德国人意识到了圣米耶尔容易受到进攻，所以对它严加防守，而协约国部队也望而生畏，从来没有试图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同时潘兴必须创建一支新队伍。在欢迎了仓促中组建并在7月运到法国的第一师的到来之后，此后三个月再没有新队伍到达。这种迟缓固然是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士兵，但缺少船只和陆军部的混乱也是原因之一。10月份又有美国三个师到达，但是按照潘兴的计划，要完成对这些部队的训练还需要三个半月。到1918年4月，也就是美国宣战一年后，抵达法国的只有7个师。

当史迪威于1918年1月21日到达法国的时候，协约国军队正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中，士气普遍低落，失败主义情绪正在滋长。俄国退出战争的举动眼看就要导致灾难，因为这将使德国把更多的师投入西线。联军1917年发动的攻势是鲁莽的冒进，导致了大量伤亡，但并没有得到什么战略上的优势。由于部队严重减员，指挥官们开始担心，如果德国再发动攻势，联军将难以抵挡。美国部队没能补充进来，同时他们又不能独立出战。联军原来指望他们可以展开消耗战，直到美国来改变力量对比；现在这种打算靠不住了。要想通过发动进攻取胜，通常认为必须保持20%的优势，但是在没有美军加入的情况下不可能有这样的优势，而美军在夏季之前又不可能做好准备。因为德国人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夏季到来之前就别想指望他们会安静等候。

另一个参战国也想趁机占便宜，这就是协约国之一的日本。日本一开始就把白种人陷入战争看成它在中国和太平洋扩张的机会。按照1914年担任首相的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的话说，日本立志要成为世界的“支配国”之一。中国看来已经衰老而且不可救药，因此被确定为第一个殖民地。达成这个目的的主要障碍并不是中国，而是其他列强。当这些列强在1914年开始相互厮杀的时候，日本也加入了协约国阵营，夺去了德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山东半岛上的租借和铺设铁路等特许权，以此作为参战的贡献。它还从德国手中夺取了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Marshall）、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和加罗林群岛（Caroline），从而横挡在美国通往菲律宾的路上。

日本的下一步是与中国签订《二十一条》，这是为了在行政上和经济上控制中国。这项于1915年递交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要求中国确认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将它从俄国手中夺取的旅顺和大连

的租借期延长到九十九年，给予日本在东北、内蒙古和长江流域的经商、拥有土地、铁路筑路权和发展工业的特权，没有日本许可不许与任何其他列强签订租借和贷款合约。最后的第五部分则无异于要中国放弃主权，其中要求聘请日本人为军事、政治和财政“顾问”，并和日本共同合办兵工厂、警察和学校。

正试图恢复帝制并由自己做皇帝的袁世凯不得人心，亟需支持。这样日本就有了好机会，代价便是《二十一条》。袁世凯表示抗议并进行了有限的抵制，但是他不可能得到其他协约国的支持；其他协约国不想触犯日本是担心它改变立场跟德国结盟，而这种结盟原本是更合乎逻辑的。美国同样不想干涉，这时候抛出了不承认原则，就是说它不承认任何强加给中国的、违反门户开放政策的安排。这跟其他一些表明原则的声明一样于事无补。袁世凯又施展谋略，最后拒绝了《二十一条》的第五部分，但是对其他部分都接受了。当条约内容被世人所知后，中国人义愤填膺，酿成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人总体上而言一直是反日的，尽管寻求跟日本妥协的集团也一直存在。

签订《二十一条》三个月后袁世凯称帝。虽然他想建立中央权威的用意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到了那种程度，革命就开始动真格了。舆论哗然，有些省开始宣布独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宣布取消帝制，并在两个月后死于“疾病和愤懑”。接替他总统职位的是黎元洪，就是那个被人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高位的标统。

但是黎元洪无法控制局面，混乱出现了。中国开始落入那些各怀野心、拥兵自重的督军（将他们称为“军阀”未免抬举他们了）之手。有些是集能干的官员和掠夺者于一身，另一些人则不学无术，是一些过去的土匪和胆大妄为的人，在大动荡中被抛向巅峰。北京的名义上的政府任命他们为各省的军事长官，这无非是因为他们有实际控制权或者是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这些督军自己组建部队，军饷也由他们自己筹措——尽管有些并不发饷。中国的士兵不是为国家，而是为封建军阀效力。这些军阀不断变换盟友，为了势力不断争斗，像老鼠一样吞噬着残余的共和国。列强所承认的中国“政府”仍然在北京，掌控在安福系（因他们来自安徽和福建）北洋军阀手中。安福系之所以可以控制，是因为有日本的支持和贷款。他们名义上是共和政府，有总统、总理、部长和一个傀儡议会。

孙中山在广州重新建立的国民政府宣布北京政府为非法。他在1917年回国，将原国民议会的残余人员召集到广州，并自称是中国唯一的合

法政府。尽管他的政府是按照西方理念创立的，而且是在中国建立新政治秩序的唯一希望（尽管它也许并没有这个实力），但是这个政府并没有得到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或者由于政治惰性，或者由于自己固有的偏好，继续跟北京政权那些当政的军阀打交道，不管这些军阀是谁，因为这保证了连贯性，不至于出现令人不快的中断。已经在中国稳固立足的各国政府往往不喜欢改变，哪怕改变是合乎其利益的。孙中山实际上是通过与南方军阀的脆弱联合而获得军事支持，从而维持着另外一个政府。此后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期，中国陷入分裂，傀儡和军阀控制着局面，而天命则不见了。

至于山东，日本知道要牢固占有就必须得到列强的确认。1917年3月，通过利用（简直可以说是鼓励）别国对它可能在战争中改变立场的担心，日本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秘密缔结协议，让它们在和平谈判时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的权益。美国参战之后，日本想再得到美国的认可，并在1917年11月成功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Lansing-Ishii Agreement），这是美国外交史上最为奇特的违背原则的事件之一。这个协议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虽然口头上表示尊重这个政策），承认由于“领土相近”，日本“在中国具有特殊利益，特别是在那些跟日本领土相邻的地方”。除了一个为了让美国良心平安而签订的承认中国主权的秘密议定书之外，文件的其他部分都公开了，因而这个史无前例的协定就表明了美国默许了日本在中国占有特殊地位。石井喜气洋洋地回到日本，而中国人的沮丧也可想而知。中国政府在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自然已经默许此事，但是美国这么做无异于背叛。对此的解释是，在1917年11月那个黑暗的时期里，美国跟协约国其他国家一样都不敢让日本成为敌人。

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拥有北京和广州两个政府的中国在1917年8月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了。做出这个决定原因很复杂，中国人、日本人以及协约国各怀心思，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和平谈判。中国人喜欢说名实相副，以为不顾自己的军事现状而以协约国成员之名就可以在和会上得平等之实。那时候作为回报和权利，中国可以要求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甚至可能重新收回山东。由于协约国需要得到中国的劳工，同时也看出这是消除德国租界和商业竞争的机会，所以各国一开始并没有点破这一切。

作为第四军的首席情报官，史迪威在这场战争中的任务主要是为美国攻打圣米耶尔做准备。参谋工作主要由总参谋部情报部和作战部完

成。从师到军、集团军和总司令部，所有这些较大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参谋长以及负责各部门工作的副参谋长。情报部负责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以全面了解敌人的部署、意图和弱点。它必须构建一条稳固的信息流，通过前沿单位、上级指挥部再到总司令部，同时也向友邻部队通报。在团营级，战斗情况通常由参加各种巡逻和袭击任务的侦察兵和跟踪敌人行动的观察哨获取。在师一级，监听站、截获的文件、俘虏的口供可以提供进一步信息。在军一级，材料通常由气球和飞机侦察以及连续摄影汇总而成，这是种新方法，判读结果需要运用新技术并进行研究。所有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都要经过综合、评估并在地图上用图表示出来，然后分发到相关人员手中。在参战前，美国陆军参谋部只在军事学院处有两个军官和下属工作人员负责情报工作。



“一战”时的潘兴与马歇尔

为了使部队可以独立参战，潘兴将军必须在法国继续训练部队。除了总司令部的参谋部外，还要为未来的军一级配备参谋，而每个军由四个师、一个后备师以及一个新兵训练站组成。一个军满员包括6000名军官和17万名士兵，这比战前整个陆军的规模还大。当务之急是在师级和军级配备参谋人员，由于以前没有这个建制，所以必须重新设立。为此，在巴黎东南靠近美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肖蒙（Chaumont）的朗格勒（Langres）建立了一所参谋学院，此外，还有培训其他军事人才的学校。

联军考虑到美军开始准备参战可是还没有参谋部，感到更有必要敦促美国部队融入它们的体系中去。一个法国将军告诉潘兴说，按照欧洲的方式组建参谋部，要先制订动员和战争计划，这要“花三十年”。“美国从来不会花三十年做任何事情。”潘兴厉声说道。

史迪威在去朗格勒的参谋学院学习情报学之前，受命先去英军第五十八师报到以熟悉前线情况。他在1918年2月10日到达这个师位于努瓦荣（Noyon）的司令部，这个地方也是兴登堡防线 [1] 纵深最远的地方。周围一片苍凉：很多村庄都成了废墟，有些地方仅仅剩下墙壁的地基和断壁残垣；地面上旧壕沟纵横交错，到处都是弹坑。第五十八师是他接触的第一个处于前线的联军部队，对这里的同仁他既感到讨厌又觉得可爱。“这些英国人我实在吃不透——他们大多数很随和，但是有些人傲慢无礼……他妈的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自视甚高，根本不把一个美国军官放在眼里。”他觉得英国人不如法国人。法国人真诚，有礼貌，乐于帮忙，他说“我喜欢他们”。他花了五天时间跟英军熟悉各种前线工作——战壕，掩体，观察哨，夜间巡逻，对道路进行伪装，研究地图以及空中摄影侦察。他忙于观察、学习、交谈和做记录，结果淡忘了对主人的不快，还发电报要求再跟英国部队多待一天。他后来高兴地写道：“他们同意了！”

史迪威在朗格勒待的时间不长，当时亨利·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上校正好也在那里。史汀生在塔夫特（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当政时是陆军部长，当时50岁，是炮兵军官。他后来第二次出任陆军部长，并成为决定史迪威前途的重要人物。由于肖蒙的总司令部急需人手，史迪威一周后被调去协助为总司令部组建情报部。三个星期之后，他再次被派往驻扎在凡尔登的法国第十七军接受直接训练。在过去的两年半里，攻守双方在这里共有50万人死亡。法军正是在这里提出了“他们无法跨越”的口号，也正是在这里那条提供补给和增援的“圣路”得以保持畅通。德国人无法从这里突破了，但是似乎对这里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仍然不满意似的，炮火仍在继续。

3月20日，也就是在史迪威到达的时候，这里发生了小规模交火，法军伤亡20人，而在一个很小的地点，德国佬就死了42人。史汀生上校很热情，饭后邀请史迪威打桥牌，跟英国人不同，史汀生并不回避个人话题。“你结婚了吗？”他问道，“你有孩子吗？他们是你的吗？”

史迪威在凡尔登的时候，更西边的前线遭到了大规模进攻。这是1918年德国大规模进攻的开始。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试图在

美军参战前奋起一击，一举夺取胜利，然后结束战争。此时，德国部队已经得到了从俄国战线下来的42个师的增援，而美国不过为联军增加了8个师的兵力，其中有4个师仍然在接受训练。鲁登道夫的目标是试图集结全部剩余力量将英军和法军分开，并通过在不同地方发动一系列进攻避免正面交锋，从而耗尽联军的后备力量，并最终突破联军的防线。

鲁登道夫的进攻时断时续，从3月一直打到7月，已经胜利在望。德国人突破了联军的防线，自堑壕战开始以来攻占了最大的地盘，俘获和打死打伤的联军数以十万计，并重新夺回了距巴黎60英里（约96千米）的努瓦荣，从而可以用远程加农炮轰炸巴黎，将英军逼回英吉利海峡，并在5月份再次进攻四年前他们未能取得的马恩省（Marne）。这种危急局面迫使联军做了过去即使经历了很多无谓伤亡也没能达成的事，那就是统一指挥。3月27日福熙（Ferdinand　Foch）在战火纷飞中被任命为总司令。甚至潘兴也做出了让步，同意美军暂时接受联军指挥。美军在夏托捷里（Chateau-Thierry）、贝洛林（Belleau Wood）和康蒂尼（Cantigny）投入战斗，以阻止德军继续前进。

史迪威在凡尔登待了六周，但没有参与第一阶段的战斗。他被派遣去第十七军情报处长阿尔芒·贝洛姆（Armand　Belhomme）上校的办公室工作，但大部分时间是去巡查当时每天仍然遭受炮轰的要塞和指挥哨。在充满死亡气息的端蒙堡（Fort Douaumont）下面的一个掩体中，他看到了“半月来的情形……整个地方已经完全改观，到处是铁丝、工具、鞋子、炮弹、骨头、制服、弹药箱、手榴弹、头盔、轮子、尖桩、铁块……为了掩盖德国佬的尸体到处撒满了石灰”。端蒙堡的地下通道潮湿，泥泞，到处是臭味，根本无法保持整洁。在沃堡（Fort Vaux）他借助大雾走到前线，在那边看到了“还戴着头盔的脑袋四处都是，一块块尸体，大腿骨，下巴，断手，上面还挂着破布”，在一个掩体里他还看见从墙面露出一条人腿，有个士兵还在上面挂过野战背包。



史迪威（前排中间）与法国第十七军军官们合影

有一次，为了侦察，他走到距离德军前线不到60码（约54千米　）的地方，直到凌晨2点才回去，从晚上9点就一直走个不停。“摔倒在泥窟中，到处都是德国佬的导火索在燃烧，弹药兵一直在工作，一晚上都在体验前线生活。”由于遭到炮轰，他一整天都躲在一个仅够两人藏身的掩体里，他估计共有150到200发77毫米的炮弹打过来，所幸这些炮弹不是打得太低就是太靠左。史迪威的评语是：“很有趣的一天。”他这并不是充好汉，因为只要他真是感到害怕的话，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在日记上写上“吓得半死”。这种“吓”通常是担心遭袭、被俘或者预感要出事，但是遭到炮火攻击往往并不让他担心。贝洛姆上校曾多次在战事正酣时同史迪威一道侦察，他后来曾经写道：“我们开始欣赏他的修养，他的笛卡儿哲学和他的镇定。”

史迪威的法国东道主让他熟悉了第十七军的各类参谋工作、前线的

步兵任务以及各级情报工作的运作情况。他是第一个在第十七军服役的美国人，由于他会法语，他与周围人结下了良好的关系。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他们待我就像走失多年的兄弟一样。什么都给我看，什么地方都带我去。"他的感受跟记者海伍德·布龙（Heywood Broun）的颇为接近。他当时写道："法国人是理想的士兵。他们不但会打仗，而且善于给你说打仗的事。"法国人还安排史迪威乘侦察机观察。尽管他在一次旋转时头有些晕，但是他还是觉得飞行员的生活是比较舒适的，"干净的衣服，没有风，工作时间少，痛苦很快结束，回去午餐"。

食物一如既往地引起史迪威的兴趣，在日记里记载吃饭的情况是伴随他终身的习惯。在第十七军的时候，军官食堂的饭似乎是值得记录的。有天晚上他跟康托（Cantau）上校一同在食堂吃饭。康托是个60岁的秃顶的胖子，戴着军帽，挂满了勋章，不住地折腾仆人，胃口很好，"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恰好这天是无肉礼拜五 [2] ，这顿饭包括两种煎蛋卷、鱼和米饭、蔬菜沙拉、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香槟、两种甜酒和奶酪。勤务兵过来先敬个礼并说："夫人请用餐。" [3] 史迪威问为什么要说"夫人"（Madame），上校反问道："你结婚了吗？""是的。""你妻子在哪里？""在美国。""不，她在你的心里，因此她就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让他说'夫人请用餐'的原因。"难怪史迪威对法国人有好感。史迪威的妻子始终在他的心里，每次收到家信他都要记下来。

史迪威要离开这里回到肖蒙时，第十七军为他举行了排场很大的送别晚会，第十七军的参谋人员都参加了，由三个处长主持晚餐，所有的桌上都摆上了鲜花。他的桌子中间是一个由法国公鸡和美国鹰装饰的果仁糖。他一晚上喝了很多香槟，各种奉承话让史迪威都不好意思了。所有人都要他在他们的菜单上签名。他们还送给他一个墨水盂，是用德国的炮弹壳做的；还送他一张他跟大家的合影照，照片后面写上了各人的名字。有个军官动情地写了一首诗留在了史迪威的桌子上。自己这样受人喜欢和欣赏，让史迪威很感自豪，他用地道流利的法语致谢，感谢他们让他学到了这么多东西，并保证说尽管肖蒙有那么多讨厌的事在等着他，他还是会带着"无比的欣喜"记住这些第十七军的好朋友的。

4月29日他闷闷不乐地回到美国总指挥部，知道等待他的是各种文牍、糟糕的食物和那些装模作样的人。他讨厌浪费时间，"像个办事员一样待在办公室里……炮制出一些人云亦云的废话，到处都是办公桌、打字机和各种文件"。很多比他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作战军官都已经是中校

或者上校了，而他还是个少校，这刺痛了他，不断提醒他在前线做指挥提升更快。但是，由于更需要参谋官，他想做作战军官的想法未能达成。另外让他恼火的是某些文职出身的军官却得到很高的军阶，这其中包括一个“花生米俱乐部的一个眼神游移不定的笑面虎”。史迪威所说的“花生米俱乐部”，指的是“得到少校以及更高职位，并被派给各种舒适工作的富豪、政客和各种社交明星”。在争夺马恩省的桥头堡战事正激烈的时候，史迪威对案牍工作更加厌倦了。“情况不妙……传说要放弃兰斯（Rheims）……法军、英军都吵着要我们的部队去……办公室里跟往常一样死气沉沉。”

终于等到了一个调动的机会，让他处在了计划攻打圣米耶尔突出地带的美军的核心位置。在此后的八个星期里，史迪威的任务是为即将进行的战斗做好情报准备工作，此外，还负责组织师级情报部门，并建立培训参谋人员的学校。这些工作让他在各个师部之间奔波，并往返于肖蒙、朗格勒和位于纳夫夏托（Neufchâteau）的第四军总部之间。

他必须搜集敌人在突出地带的前线和防御情况，根据各种迹象估计敌人的兵力，每天和每周都要总结敌人炮火的配置，发布地形勘察报告，绘制并发送各种比例和坐标的地图——最终他为圣米耶尔准备了十五吨的地图。

正在准备对鲁登道夫的进攻做殊死抵抗的时候，局势出现了变化；主动权开始转到联军的手里。联军开始全线反攻，收复失地。自3月以来德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打破了僵局，占领了好几英里（1英里约为1.6千米　　）的地方，并造成近100万人的伤亡，但现在德军已经耗尽了气力，正在走向失败。8月8日鲁登道夫对德皇几乎承认了这一点，然而此时福熙正在计划发动一系列进攻，希望在1919年能结束战争。其中第一个进攻就是9月7日计划由美国人对圣米耶尔突出地带所发动的进攻。

为了发动这次进攻，潘兴于8月10日组建了第一集团军，这是他全部计划中的一个大目标，而史迪威所在的第四军就是其中一部分。这个集团军总计50万人（包括一支法国军），是美国有史以来组建的最大部队，而其战斗也是美国参谋人员所策划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计划工作的主要部分是第一军情报处副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中校所承担的。马歇尔在史迪威后来的生涯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需要攻取的是个三角形地带，两个边长25英里（约40千米　），一边长35英里（约56千米　）。自1914年起这里经过了加固，不断地架设铁丝网，建立了混凝土地堡和掩体，在山里挖了隧道，修建了窄轨铁路，并有选择地修建了野战炮和机

关枪的交叉火力掩体。为了达成战术上的突击性，美国人试图在夜间把携带着供给的14个师集结起来，然而保密方面出现了纰漏，美军的调动很快就成了巴黎街头的话题。史迪威写道："为了保密拼命工作。这里神秘兮兮的，可是纳夫夏托的理发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任何德国飞机要是看不到我们的繁忙准备的样子那准是瞎了。卡车驶来驶去，行军的队列，火车，汽车，摩托车，等等。"他日夜忙个不停，到各个观察所看地形，为了视野更大，还乘气球上去看了看。

到各个师团走访让史迪威"想当兵打仗"，特别是集团军总部的那些人并不好相处，"那些杂种骑兵俱乐部把持一切"。跟法国食堂的融洽气氛和朗格勒那些朋友的嬉戏相比，第四军的食堂让他感到无聊和恼火。"跟老B一起吃饭太可怕了。无聊得要死，好像吃饭没完没了。"提到他带客人去吃饭时他的言语更加刻薄，好像为缺少有趣的话题而感到羞耻。之后他在日记中多次发牢骚，提到"郁闷"或者"无聊之辈"或者"G-D满口废话，让人不快，他妈的混账食堂"。史迪威一向无法忍受那些无聊的人，对那些傻瓜、势利眼、装模作样的人或者任何他认为是这样的人始终感到不耐烦。

9月11日，在战斗的前一天，史迪威晋升为中校。雨一直下个不停，这使得美国经受考验的前夜变得更加令人紧张。史迪威一夜未睡，忙着完成最后的零碎事宜。第四军以前从来没有以一个军的建制参加过战斗，不过这个军包括了美国远征军中资格最老和经历战斗最多的两个师，即第一师和第四十二（"彩虹"）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第四十二师的参谋长。部署在其右边是第一军，指挥官是亨特·莱格特将军。

在黑暗中炮兵首先打响战斗。"凌晨1点开始，首先对圣米耶尔发起猛烈轰击。从那时直到5点天上一直亮光不断……我们的士兵冒着泥泞和雨水向出击战壕推进。5点时他们出击，接着电话和电报不断。到处都在迅猛前进……一切都很顺利。指挥人员干得不错……第一师和第四十二师都很成功。第八十九师由于中了某种诡计，结果没有完成好。"他到第八十九师指挥部去看个究竟，结果发现"一团糟——没有报告"。与此相反，在第一师指挥部看到"似乎这些人都很能干……受伤的人躺在外边，榴弹炮不断发射，坦克和步兵井然有序地冒着榴霰弹前进，德国佬撤退，炮火跟上去……一个法国军士很兴奋，大叫'打得好！打得好！'[4]"美军俘获了大量俘虏，史迪威押解其中的一些军官去专门的审讯室进行审讯，然后又出去察看据说用于轰炸图尔的炮弹的规格。"我们的飞机今天有了制空权，沃埃夫勒（Woevre）所有的城镇都着火了。第一天

的所有目标都已达到，开始转向第二天的……发了脾气，把地形科训了一顿，之后深感羞耻……第一师和第四师完全成功。了不起的一天。”实际上第四师比第一师遇到了更顽强的抵抗，但是到第一天中午的时候就达成了所有目标。

史迪威跟在前进部队的后面也前去检查敌人的掩体，他穿过烧毁的坦克和卡车、翻倒的炮架、难民、死马以及其他到处散布的战争痕迹，之后，为了写总结他又一连两天没有睡觉。军官们聚在一起开始评议战斗得失，但是总体上都情绪高涨。尽管圣米耶尔的敌人不算强，正如莱格特将军说的，“不是最强的，也不是第二强的”，但是攻下了这个历时很久、非常坚固而且是德国占领的最后一个突出地带，还是大大鼓舞了联军的士气。德军大多为换防的二流部队，跟美军相比，在人数和士气方面均处于劣势。尽管美军在计划和实施方面都有不足，但是这场战斗还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向德军表明美国的一个军已经出现在战场上，这表明德军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德军原先还指望能跟疲惫不堪的英军和法军僵持下去，并最终取得满意的和谈条件，因为这个新敌人的出现，这个希望破灭了。从这一刻开始，处于绝望之中的德军开始奋力一搏，企图退回到可以展开谈判并避免投降的阵地中去。

除了在情报部门的工作之外，在这次战斗中史迪威还由于他灵机一动炮制的施美尔凯斯（Schmeercase）事件而声名大噪。在战斗早期，报告数量少，第一军同为情报官的舍尔曼·迈尔斯（Sherman Miles）上校每个小时都打电话给史迪威，问他有没有最新进展。最后恼火的史迪威突然顺着说：“是的，了不起的德国氯气毒气专家奥托·施美尔凯斯（Otto Schmiekäse）被俘获了。”电话那边的人激动万分：“告诉我他的名字和氯气怎么拼。”史迪威没有想到自己用德国软干酪杜撰的这个名字竟然如此成功，现在也只能假戏真做了。他添油加醋地加了一些细节，没想到迈尔斯上校通知他，马上派毒气方面的军官前来审讯这个俘虏。史迪威刚想招供这是个闹剧，没想到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掉了。当这个毒气方面的军官来到的时候，史迪威的同事们向他解释说，就在五分钟前俘虏已经被押送到第一军的情报部门去接受审讯了。从那以后这个神出鬼没的俘虏总是在审讯人员到来前一刻离开。史迪威的玩笑在军部和师部中传开，大家听了这个闹剧都大笑不止，可是受到捉弄的迈尔斯上校自然对此有些怨恨。路透社捕捉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有关施美尔凯斯的报道见诸巴黎、伦敦和纽约的报纸，并作为史实报道说：“据圣米耶尔前线消息，一个德国著名的毒气专家被美军俘获。他是在安装一个毒气发射器的时候被俘的。”史迪威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写道：“奥托是我发明

的，我对他甚感自豪，这种感觉与日俱增……现在奥托成了美国远征军中人人皆知的人了。”



巴黎和会“四巨头”：（从左到右）意大利总理奥兰多（Orlando)、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

在9月底时联军展开了全线进攻，打头阵的是美军对默兹——阿尔贡（Meuse-Argonne）地带的进攻。尽管美军一开始犯了一些战术错误，并为此解除了几个将领的职务，但由于美军凌厉的攻势，鲁登道夫企图有秩序地退守德国前线的坚固阵地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根据史迪威的记录，10月5日传出了“特大新闻”：德军向威尔逊总统请求停火。威尔逊拒绝了，理由是只能由联军总司令决定是否停火。在其后的一个月里，随着战斗的进行炮火越来越猛烈，德军竭尽全力想守住阵地，但最后已是无计可施。德军派出使者向福熙请求停火。在战争进行到第五个11月的一个冬日的早晨，西线的战火终于平息了。

第四军受命到德国科布伦茨（Coblenz）地区执行占领任务，指挥部设在摩泽尔（Mosel）河畔的科赫姆（Cochem）市。史迪威是个什么都看不惯的人，对敌人也不例外。进入德国时，他对农韦勒

（Nonnweiler）的市长做了以下描写："典型的野蛮人，无情、残酷、坏脾气、阴郁的德国杂种。我们走的时候他站起来鞠躬。"

当政治家们聚集在巴黎开会的时候，史迪威正在科赫姆生气。他在1月给妻子的信中说："坐着，一天到晚坐着。但愿我们那晕头晕脑的傻总统不久会对他所接受的掌声、仰慕和其他那些废话感到腻味，这样就可以开始和谈，美国部队也可以回家了。"有很多地位显赫的人前来参观，其中包括英国威尔士亲王，而史迪威竟然被指派负责接待亲王。所幸史迪威发现他"沉静，不张扬，很有修养，有礼貌，让人喜欢"。乔治·马歇尔也来了，他显然不大高兴，"试探性地问了一下有关施美尔凯斯事件的情况，并知道了是谁干的"。



巴黎和会日本代表团

根据10月份才到第四军新任参谋长的布赖恩特·威尔斯（Briant Wells）将军的推荐，史迪威被晋升为临时上校并授予卓越服务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这是一个为奖赏非战斗人员新创设的勋章。威尔斯非常喜欢和敬佩史迪威，并报告说他"异常机智"，"是这场战争所锻造出的最能干的情报官之一"。他还写道："凡是曾经跟我军共同作战过的师团对你处无不赞扬有加。"

1919年5月7日，《凡尔赛条约》这个历史上缺陷甚多的文件的草稿完成了。由于预计即将签订和约，第四军被解除现役，因此史迪威的占领任务也告结束了。像很多处于1919年那些令人幻灭的月份的人一样，和平会议的那些事情并不会对史迪威有怎样的教诲，他对联军之间的合作也不抱奢望。"他们都想贬低我们的部队和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争吵不休，相互交易……停战三天后法国和比利时就开始打卢森堡的主意……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既谈不上慷慨大方，也谈不上真诚……它们相

互提防，老是想搞点小动作。”史迪威发现他回家时的心态跟当时在美国日益滋长的一种情绪是一致的：“完全相信我们要做的只是待在家里，别管别人的闲事，对任何想碍我们事的人都毫不客气。什么国联！”



1921年11月12日的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三位全权代表，从左至右分别是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首席代表）、大理院院长王宠惠

在那些对和谈感到失望的国家中，谁的失望也不像中国的那样大。和约的问题并不是条款本身有什么不公正，而是在和约和威尔逊总统让人产生的期望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威尔逊总统承诺的公正的和平、民族自决以及其他十四点原则让世界深受鼓舞，也像其他那些怀有憧憬的国家一样，燃起了中国那些热血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威尔逊的承诺一触及冷酷的现实便瓦解了。这个现实包括了日本跟协约国就山东问题缔结的秘密协议。此外，尽管日本并未参加战斗，但它的军事和海军实力却不容忽视。中国唯一的现实情况便是自身的各种需要。中国要求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提议未被理睬，这更促使中国把全部热情都倾注在山东问题上。从法理上说中国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它自己曾经为了得到日本贷款而同意将德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但基于自然主权和十四点原则的精神，中国在公众舆论方面却有很充足的理由。中国那些出席和会的代表都是具有很强民族主义情绪并毕业于美国大学，他们在巴黎充分利用了这种舆论。

日本由于和会拒绝声明种族平等而恼火，因此他们也在山东问题上施加了他们全部的压力。这成了和会的主要问题，也让威尔逊总统甚为尴尬。他自己的原则，他自己代表团的建议，美国驻中国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的极力呼吁，美国传教组织就山东问题所煽动的公众舆论——所有这些方面都支持中国的诉求。但是和会已经陷入日本问题而纠缠不清，以至于要不想使和会中断的话，就不能忽视这个问题。由

于还受到其他方面的争执的干扰，和会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在威尔逊看来，国际联盟是纠正所有国际间弊端的灵丹妙药，因此他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是自己的灵魂做赌注，试图把签订国际联盟盟约作为和会条约的一部分。日本威胁说，如果它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它就会退出会议。如此其他国家也有了退出的借口，这让威尔逊觉得那个可以拯救世界并使他不朽的大制作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尽管国务卿蓝辛和其他美国代表认为日本威胁要退出只不过是讹诈而已，但威尔逊还是妥协了。1919年4月30日，五国会议在最后会议上确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作为一种妥协的姿态，日本口头上承诺“最终将主权归还给”中国。而威尔逊也心安理得了，因为他认为只要有国联在，它就能补偿在组建国联过程中不幸做出的各种牺牲。

此事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有关巴黎和会的争执的报道本来已经激发了公众的热情。在中国年轻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中心国立北京大学，学生们号召在5月7日的“国耻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签订《二十一条》。有关山东问题的裁定以及安福系政府的亲日分子接受裁定的消息传开后，3000名学生在5月4日举行了大规模集会。他们一边高喊着“打倒卖国贼！”“还我山东！”“抵制日货！”的口号，一边在街上游行，并袭击了那些傀儡部长的住宅。抗议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上海、南京、汉口和广州。学生涌向街头要求抵制日货，各地商店纷纷关门。中国有尊重文化人的传统，因此学生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他们号召抵制日货很快得到了商人阶层和新成立的工会的响应。五四运动发展成了一个有意识地摧毁日本在华市场的运动，持续了一年之久。这个运动为重新激发新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平台，其影响是辛亥革命以来最大的。由于无法镇压这次运动，政府最终不得不解除那些首当其冲的部长们的职务，并同意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签署和约。

不管有多么浓重的人为色彩，这个位于遥远的黄海之滨的半岛的命运成了美国国内政治激烈斗争的焦点。由于威尔逊总统把国联和和约联系到了一起，他在参议院的对手就势必要否决这个和约，并为此目的而视山东问题为该条约的“显著罪恶”。各种论争愈演愈烈。参议院和媒体上充斥着“合谋掠夺”“臭名昭著”“无耻”“该受天谴”和“不可饶恕”之类的字眼。特别是西部的参议员，他们利用这个事情来附和他们那些州的反日情绪；在那些州，排斥东方联盟（Oriental Exclusion League）正鼓动各方通过决议反对外国人拥有土地。山东问题一箭双雕，成了同时可以对付日本和威尔逊总统的武器。

日本已经崛起成为海军大国，它在墨西哥所从事的或者被认为是它从事的活动以及对巴拿马运河可能产生的影响，它对太平洋岛屿的抢夺，它过于热衷于干预西伯利亚——所有这一切综合来看，总体上传达了一种侵略性，引起了美国的反感。一个旨在霸占世界的强大的日本被看成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利益的直接威胁，参议院对此事极为重视，而赫斯特（Hearst）报团也对此非常关注。它宣称中国遭到了“诡计多端、好战成性的日本”的“肆意掠夺”，并指出在美国与日本关系上“实际上有战争的意味”。排斥东方联盟的发源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每周都以“美国名声的污点”为题发表演讲。但是他们跟义正词严的博拉（William Borah）参议员相比都相形见绌了。博拉谴责有关山东的条款“极为不道德和不公正……以至于我们都不敢面对它。我们被迫要为它进行辩护，这让我们感到厌恶”。博拉还用夸张的辞藻表达了对威尔逊和国联的强烈不满：“……丢人和堕落……战争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令人作呕的不公正……为体面人所不齿……让良心感到震惊……赤裸裸的，邪恶的和令人作呕的……一个恶魔……无与伦比。”

媒体和公众人物为了山东问题费了这么大的心思，甚至提到了战争，那么公众认为此事是攸关美国利益的大事也就不足为怪了。此外，还有些人的声音不像博拉和其他那些“不共戴天者”那样富于震撼力，他们认为中国的事情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当代评论》（*Current Opinion*）的总编质问道：“中国甚至无意保护它自己，除非这相当程度地涉及我们的利益，难道美国一定要像博拉参议员说的，为了保护中国不惜流血吗？”这个基本问题在此后好几十年里都一直在回响着。

山东问题在美国和中国都留下了历史性的印记。这除了帮助美国内部一部分人拒绝国联之外，同时让美国对中国产生了负罪感，还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屡受挫折和萎靡不振的国民党重现生机，使之生存下去并最终掌权。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史迪威于1919年7月回国。到了9月份，由于对临时官阶进行了普遍裁减，他跟战争开始时一样，又成了一名上尉。

七月四日下午三鐘外交部會議關於和約不簽字後辦法之決議

一我國此次既未簽字關於膠澳交還問題自不能遽向日本有所提議至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關於山東省條約以及交還膠澳換文應否認為有效亦不可輕向日本表示惟有暫持冷靜態度以待專使回國妥籌解決辦法

二對德宣告戰事終了似應從緩辦理蓋恐對德訂約條件未經簽字敵僑審判辦法暨遣送德僑以及治外法權關稅等事根本上既未解決恐難免發生交換條件之問題

三似應根據專使來電以　大總統明令公布對於協約各國藉可作為一種宣言對於國民亦可同時警告以此後問題踵起未

可樂觀上下一心知所兢惕庶免對日發生意
外問題
四不簽字既已成為事實自應內外一致抱定宗
旨徐圖補救現在一線希望惟有待國際聯
盟成立後將山東問題重行提出雖成敗利
鈍未可逆覩而國內風潮或可就此告一段落
以上各端究應如何妥籌辦理以期周密之
處仍候
院議公决

北洋政府外交部会议关于《凡尔赛条约》不签字后办法之决议，1919年7月4日，台湾近史所档案馆藏

---

[1] 兴登堡防线（Hindenburg Line），“一战”期间德军在西线建立的防线，得名于德军统帅兴登堡。1918年被协约国突破。——译者注

[2] 无肉礼拜五，指复活节前的礼拜五，耶稣受难日。——译者注

[3] 此句原文为法语“Madame est servie”。——译者注

[4] 此处原话为法语：Magnifique! Magnifique——译者注

第四章

派驻北京

军阀年代，1920—1923年

从法国回到美国十天后，史迪威的职业生涯出现了重大转变，并让他此后一直跟中国联系到了一起。他回国后立即发现，一支庞大的军队，再加上美国的厌战情绪，这一切使得通过军职获得晋升的希望变得渺茫了。他生性不是坐等命运赐予的人，于是7月25日他前往华盛顿去为自己的下一个任命进行活动。他拜访了现在是陆军部人事局军官的老同学强西·芬敦（Chauncey Fenton）。史迪威开门见山地问道："把我派到离家尽可能远的地方怎么样？"

芬敦回答说："真有意思。我们今天上午正在谈论要派人去日本和中国呢。"他告诉史迪威，军事情报处（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正准备派军官到这些国家去接受语言培训。史迪威精通好几门语言，而且之前从事过情报工作，是担任这项任命的当然人选。他要求去日本。芬敦说："日本的名额都用完了。中国怎么样？"

"好吧，就中国吧。"史迪威同意了，事情也就这么定下来了。1919年8月6日，他被任命为代表美国陆军的驻华首任语言教官。

由于战争，军事情报处的规模扩大了很多，因此参谋部决定，把过去由武官零星搜集情报的方法改为系统搜集。军事情报处希望通过精选和系统训练造就一批武官，并希望这些人能"详细了解外国的语言、军事设施、政治情况以及风俗习惯"，并"真正揣摩……他们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可能反应"。后来的实际情况是，由于至少在一些较大的武官处，武官职位需要有额外的收入，因此这类令人渴慕的职位大多给了那些"武官帮"了。但是除了武官之外，扩大的军事情报处还需要语言方面的毕业生，特别是远东部门。



北京西直门



20世纪30年代的前门和正阳门

对该项任命要求有总体“军事效率”——这是指一个军官在效率报告上的总的评分，该效率包括语言能力，能否抽身赴任和主动性。年龄限制是35岁，同时要求担任此项任命的人只能来自作战部队，也就是从步兵、骑兵和炮兵中选拔。36岁的史迪威已经超过了年龄限制，但是因为他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符合要求，对于他的任命出人意料地没有耽搁，顺利得到批准。

当时中国问题正是报纸关注的焦点。报纸的大标题经常出现诸如“山东浩劫”、“山东之罪”、“山东之耻”以及其他各种刺眼的贬义词。山东问题导致了国联的失败，也毁掉了威尔逊，之后还成了1920年总统大选的话题。共和党人把对中国的不公正当成了抨击当局的有力工具。哈丁（Warren G. Harding）在门廊演讲 [1] 里把中国描述为美国的被监护国，现在却遭到了背弃。他说，由于美国返还了庚子赔款，中国人相信了“美国的榜样、民主和公正”，结果却发现在巴黎它好几百万同胞被转交给了一个敌国。哈丁继续说：但是在参议院，一些坚定不移的美国人却对此说“不”，并“坚决维护我们约二十年前给中国人的信念”。

中国人所看到的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们所不断宣扬的是，美国在1919年（即使不算上1900年）给了中国人一个教训，那就是协约国是背信弃义的，依靠外国朋友是愚蠢的。然而在史迪威开始他中国生涯的时候，哈丁的这种说法却是美国人对美中关系的主流观念。

1919年8月，史迪威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加利福尼亚，他第一年的语言学习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不到一个月他就得出结论认为，这里的课程不适合他并妨碍了他进步，因为课后没有可以一起说汉语的人。他向军事情报处报告说，他以及参加培训的另一个军官劳埃

德·豪斯福（Lloyd P. Horsfall）如果立即被转往中国学校的话，效果会更好，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听到并练习口语。尽管其他语言军官也赞成他的提议，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带来变化。

在各种语言中，汉语由于有独特的声调变化，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听说才能学会。汉语的意思在官话中取决于四种声调，在广东话中则有八种声调 [2] 。书面语之所以难，主要不在于要认识几千个单字，而在于要学会这些字的不同组合以及它们非常复杂的含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能认识六千个字，一个学者约认识八千到九千字，但日常使用三千字就足够了。只要通过掌握约一千个基本字，就可以间接达到这些量。

中国字由笔画组成，像“一”（如“一个”“统一”“一切”“一律”等）只有一画，而“灣”（如“海灣”、“河灣”）则有二十五画。虽然西方人看到这些字仿佛进入了密林，莫辨东西，但是这些字都是有特定规则可寻的。在字典中这些字分成了214个意符，如“男”“女”“口”“山”“工”（“工作”或“工人”的意思，原指木工尺）、“宀”（“屋顶”）、“車”（从上面俯视一种两轮车的样子）。这些意符原是象形的，后来有了固定的指代意思。其他文字通过给意符加上所谓的“声符”而来；例如“論”（lun）是“讨论”“探讨”的意思，由意符“言”和声部“侖”（意为“整理”、“排序”）组成，这个字兼顾了声音和意思：“将字排序”，即“讨论”之意。但是声符并不总是很有帮助的，也并不都合乎逻辑。有些字既不表声也不表意。

汉语共有约880个声符，这些声符跟意符（有些同时还是声符）组成了一个学生要会读写中国字所必须掌握的1000个基本单字。要掌握这些单字，必须持之以恒，花大量时间练习并反复复习，显然这不但限制了乐意并最终能够学会读说中国字的外国人的数目，而且在采用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会识字的人的数量也是很有限的。

官话是长江以北（此外还有些长江以南地区）的通用语言，也是全国的政府用语。所有的官员都要会说官话。说官话与说广东话以及其他各种方言的人虽然彼此无法相互了解，但是全国统一的书面语却使得文人之间可以交流。

史迪威在加利福尼亚时是在卡梅尔度过1920年的暑假的。他在门多西诺岬角处购买了五块土地，准备把这个可以俯视海洋的地方作为将来的安家之地。他在7月被提升为少校之后，带着全家与豪斯福一家一道于1920年8月5日乘船去往中国。

9月18日，他们乘坐的陆军运输船在黄昏时绕过山东半岛，玫瑰色的斜阳映衬着曲折的海岸线和中国帆船的棕色的、像蝙蝠翅膀一样的帆。两天后船进入秦皇岛，这是中国本土靠近北方边境的一个开放口岸，也是长城跟大海相接的地方，这里的渔民伴着悲凉的号子一天两次收起他们的渔网。这些旅行者往南经天津再坐火车走250英里（约402千米）就到达了目的地——华北平原上的著名城市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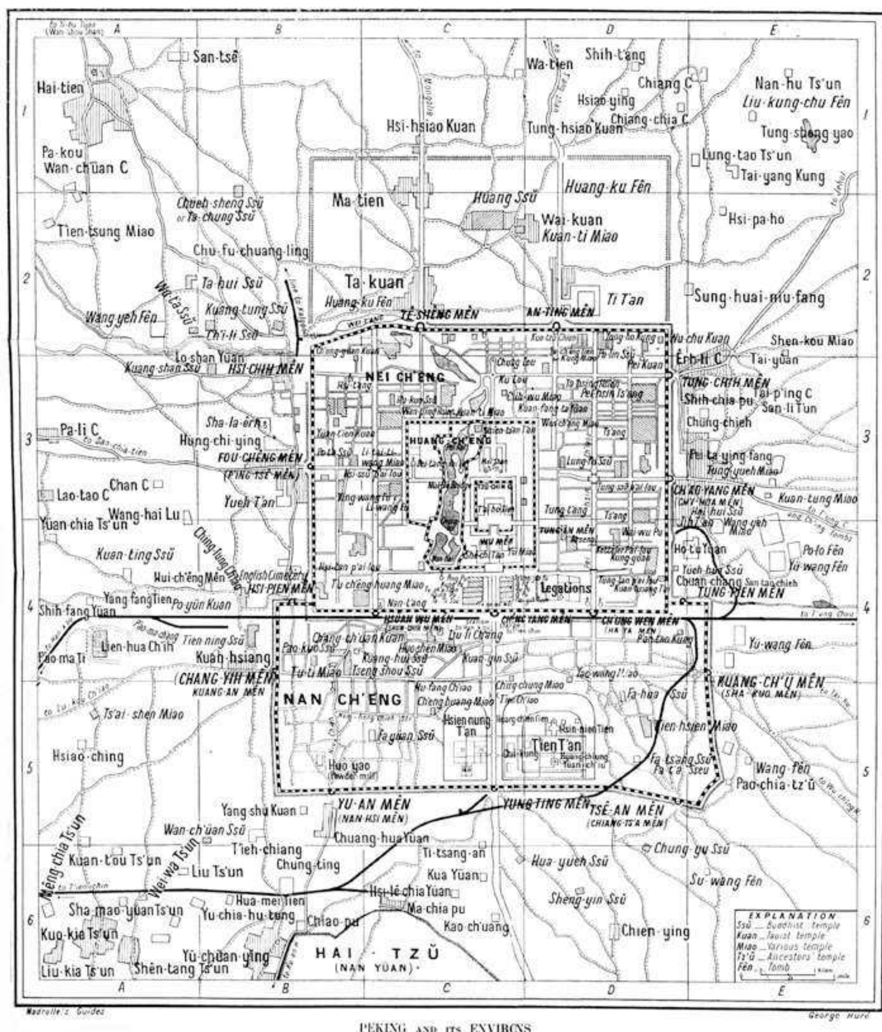
史迪威用开始的十天时间找到了安家之所，还走遍了北京——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都城之一。在这里，老式的达官显贵与贪婪的冒险家混杂一处，各种改革的谋划和希望让当时新共和的中国兴奋不已；外国人养尊处优，过着安逸享乐的生活；精美的大理石制成的天坛则静静地仰望着天空。护城河内是紫禁城，屋顶是代表着帝王的黄色琉璃瓦，皇城里面有三个人工湖（北海、中海和南海），湖内有很多小岛。岛上有宝塔和雕梁画栋的凉亭，还有最后一个皇帝被他姑母囚禁的宫殿。湖岸边长满了枝条拳曲的柳树和柏树。此外，这里还有镂空的岩石造的假山，其景象是中国画家所喜爱的。据说在其中一个湖里捕到的一条大鲤鱼还带着一块金牌，上面刻着15世纪明朝永乐皇帝的名字。

上层人士的住宅都有围墙围着。每个都有庭院，里面有荷花池和茶室，盆栽的牡丹，经几百年流水不断侵蚀的镂空的岩石，墙上还开有一个月洞窗。那些没有弹簧的、有顶篷的马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着，来自西北的骆驼带着沙漠的傲慢慢慢行进，而穿着深黄色袈裟的和尚则站在喇嘛庙的红色圆柱旁。横扫平原的沙尘暴时不时地折磨着这座都城和这里的居民。在城墙以外，北京平原还一直延伸到颐和园和西山脚下，碧云寺和其他寺庙就掩映在西山的苍松之中。玉泉山的泉水流下山后一直流入紫禁城的湖里和护城河里。

在使馆区有外国人的住宅和宾馆、马球场，街西头有威严的美国公使馆、高大的银行和办公楼，但是这里并没有上海那种喧闹的商业气氛。北京跟通商口岸的情况不同，这里的外国人甚至跟有教养的中国人有交往。北京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这里有国立北京大学、洛克菲勒家族创立的协和医学院，用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以及很多其他教会大学。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其倡导者认为改造中国使之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推行白话文。推行白话文可以提高识字率并使民众可以阅读现代报纸；报纸是新近从西方引进的东西，保守派对之深恶痛绝。

除了外交使团、记者、教育家和传教士外，北京还吸引了艺术收藏

家和汉学家、那些来了之后再也不走了的旅行者，还有一些退休后自愿留在这里的外国人，因为这里的生活优雅安逸而且钱很经花。他们仆从成群，在西山有避暑地，有专对公使们开放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和赛马俱乐部，夏天有野餐，冬天可以打野鸡。对外国人来说，北京代表着——正如一个十分怀旧的曾经在此居住的人所说的——“那美好的岁月”。



1912年的北京

史迪威一家和豪斯福一家在使馆区外靠近东皇城根的北总布胡同三号合租了一幢中式房子。跟所有的中国房屋一样，这所房屋是平房，是多进的套院，每个院落都是个小四合院，窗户是用纸糊的，没有玻璃。当时租用这样一座有四个卧室、用餐室、起居室、书房、办公室以及下

人房组成的院落每月需15美元，此外，还有相应的雇用仆人的费用。通常一个军官家雇用五到六个仆人，需要约35美元，此外还要给回扣。在中国，回扣在任何交易中都是少不了的。在1921年2月史迪威的第四个孩子、女儿艾莉森（Alison，中文名史文森）出生的时候，他们一家雇用了一个男仆做管事，管家并负责杂事，另外还有一个男仆、两个厨师、一个洗衣服的女仆、一个带孩子的保姆和一个苦力。

语言教官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学习。这所学校成立于1910年，最初是为了教授传教士汉语，后来扩大后也招收在中国服役的很多外国顾问、商人以及其他想学习语言的人。这里为300名学生雇用了100名教师，采用的是适于速成的直接听说教学法。第一年的课程每周上五个小时的课，首先是半年的听说以及发音和字意练习。之后是半年的阅读、翻译和跟导师对话。一年结束时学生应当认得约七百个汉字并基本能够对话。此外，语言教官还要参加有关中国历史、宗教、经济和时事的讨论会和演讲。语言教官在学习一年后还要学习技术和军事词汇。旅行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这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另一方面作为武官也是为了收集情报。每年年末都要考试，在完成三到四年的学习后，作为语言教官应当能够认识三千个汉字并能够流畅地说汉语。

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威廉·佩特斯（William B. Pettus）博士抱怨说，史迪威和豪斯福在加利福尼亚把口音学坏了，这可能会导致麻烦，因为即使说最流利汉语的外国人也可能遇到困难。爱德华·休姆（Edward Hume）博士是个能说标准汉语的老派人。他告诉史迪威说，有次在乡下他问两个农民到长沙的路怎么走。他们一脸茫然，又重复了几次问话后他只能放弃。当他走开时偶尔听到一个农民对另一个说："好像这个洋人刚才在问'这是去长沙的路吗？'"

史迪威跟其他外国人一样，根据自己名字的发音"SHIH TI-WEI"起了中文名字"史迪威"。他的姓是"历史"的"史"，名字中的第一个字"迪"是"启发""引导"的意思，而第二个字"威"则是"威风"之意——这可是个具有挑动性的名字组合。课余时间他喜欢到集市、市场和商业街去逛游。他第一次买的是牙雕，然后开始收集镶嵌扇柄，并为他将来在卡梅尔的家收购家具。

他看到中国的魅力和残酷是并存的。放风筝是中国人喜爱的运动，这些风筝被制成龙、楼阁或者蝴蝶，其翅膀用染色的薄纱做成。风筝上挂有哨子、铃铛或者木钟，它们让空中充满了色彩和动感。正如一个人

所观察到的，这仿佛是“东方的小天使……发出柔和、非尘世的音乐”。处决犯人的情景同样很受民众欢迎，往往有大群人急切围观，刽子手把双手捆着的犯人踢跪下，然后刀起头落，博得一阵叫好声：“好！”当鲜血喷涌而出的时候，妇女和儿童会冲上前，用一串串铜钱蘸在血里，据说这种钱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可以驱邪。在附近凉棚下往往可以看到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的说书人，周围也许蹲坐着成百的苦力和工人，他们鸦雀无声，听得津津有味，讲的故事往往是古代的英雄事迹或者传说。说书人往往会随着节奏轻轻敲击竹板，有寓意的段落会唱出来，而讲到打仗的地方则会敲起鼓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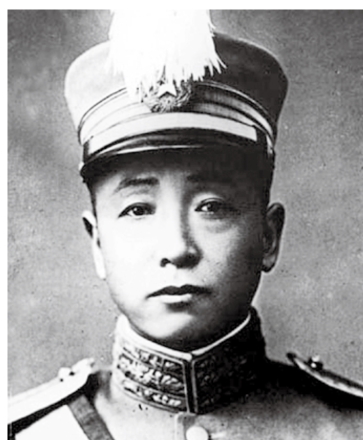
中国的魅力已经起作用了。史迪威到北京还不满一个月时，陆军部对他进行了问卷调查，问他最喜欢的职位是什么；对此他只划了“武官，中国”，而包括“西点军校”在内的其他选择他都写了“否”。

就在史迪威到达两个月前的时候，三个声名显赫的军阀联手赶走了安福系政府，但随后马上彼此开战，以争夺对首都的控制权，因为有了这个控制权便会处于主导地位。现在成功控制了北京的是吴佩孚大帅，一个科举考试出身的温文尔雅的官员；失败者是张作霖大帅，他从前是个土匪，现在称霸东北；能够在中间维持力量均衡的人是农民出身的“基督将军”冯玉祥。

吴佩孚真诚地把自己视为公仆，非常关心公共秩序并希望在中国恢复统一的国民政府，他的这种期望甚至比个人野心还强烈。他体格瘦长、匀称，窄长的脑袋，琥珀色的眼睛，尖尖的鼻子表明他出身世家，说一口用词考究的官话，外交使团认为他正是中国迫切需要的铁腕式人物的最佳人选。为了做给一个美国记者看，他在自己的衙门里挂了一幅乔治·华盛顿的像，同时告诉来客说，他要像华盛顿统一美国13个殖民地那样统一中国。他带兵纪律严明，经常给士兵发放全饷，这招致了其他军阀对他的不满，但这也使他的部队不会随意弃他而去，同时他也得到了农村民众的拥戴，因为他们免受了乱军的骚扰。为了重建代议制政府，吴佩孚恢复了1913年成立的议会，并让召之即来的黎元洪官复原职。但是，尽管吴佩孚在打仗时像头雄狮，在政治上却不够坚决，他的对策看来是不稳定的；此时“奉天虎”张作霖已经跃跃欲试。



阎锡山



张作霖



冯玉祥



吴佩孚

张作霖体格矮小瘦弱，1895年中日战争时，这个后来很有名的东北大帅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来成了土匪。他接受了招安，作为对他带兵归顺的回报，他受命驻守在奉天（沈阳）城外。通过这个基地，他在日俄战争中先是给俄国人提供补给，然后又给日军提供补给，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他的黑色缎制瓜皮帽上带着一颗著名的珍珠，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他在东北的大房子里摆满了雕花的柚木家具、丝质地毯、铜器、玉器、字画和珍贵瓷器。他在自己的领地里跟日军保持着微弱的平衡，日军把奉天视为东北飞速发展的工业基地的总部。

在这两个争夺华北控制权的军阀大帅的周围还有些分分合合的其他派系。这其中最有实力的是冯玉祥，这倒不是因为他身材魁梧，而是因为跟吴佩孚一样，他也精心建立起了一支对他忠心耿耿又勇敢善战的部队。还在袁世凯的部队里当兵的时候，年轻的冯玉祥就皈依了基督教，而且接受了孙中山所宣扬的革命理论，并认为要造就好的士兵，除了要有吃的、穿的和军饷之外，还要在道德方面进行教育。在纷繁混乱的共和时期，他跟吴佩孚的军队联手并在1920年被任命为西北陕西省的督军。他在北京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结了婚。他用水龙头为自己的士兵施洗礼，教他们唱福音赞歌和进行曲，歌词是“我们不喝酒不抽烟”和“我们不赌也不嫖”。他不赞成吴佩孚喝酒，为了暗示这一点，有一次在宴席上他送给吴佩孚一个精美的瓷瓶，吴佩孚打开瓶子从里面倒满一杯子向赠给他礼物的冯玉祥敬酒，结果刚喝了一口他就吐了出来，原来里面装的是水。尽管冯玉祥并不完全赞同吴佩孚的做法，然而他认为吴佩孚的最终目标跟自己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中

国，因此他更倾向于跟张作霖对抗，而不是联合。

在1920年到1923年间，当时史迪威正在北京，冯玉祥联合吴佩孚对抗了多名督军的联军。1922年，当奉天虎张作霖再次企图控制华北的时候，冯玉祥又开始打张作霖。有时战斗就发生在离首都不到10英里（约16千米 ）的地方，结果城门有时会因此关闭一个星期。到了晚上，住在北京饭店的客人们站在屋顶上就可以看到炮弹划过。大炮轰击时宾馆也开始颤抖，仿佛遇到了一场轻微地震。有一次史迪威不在家的时候子弹在街上乱飞，有些飞进了他家里。史迪威夫人让所有的孩子趴在桌子底下，自己冒险跑到隔壁的一个传教士家里打电话给公使馆报告遭到了射击。公使馆对此漫不经心，让她回家去，说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武官及其同事要学习的内容之一是考察其所在国的士兵的情况。正是在督军混战的背景下，史迪威开始了解这些他后来指挥过的士兵。他看到吴佩孚的士兵穿着灰色军服列队开赴前线，旁边是骡子拉的携带军火、行李和供给的两轮车。这都是上等的装备，普通的军阀运送补给的只能用咯吱咯吱的人力独轮车。跟别的士兵一样，吴佩孚的兵往往不到14岁，不过他们装备不错，有背包、挖战壕的镐头、铁锹、马灯、茶锅、油纸伞、闹钟和热水瓶。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用扁担抬着棺材的苦力，这是为了向他们保证，即使他们战死也不会曝尸荒野。跟中国所有的部队一样，吴佩孚的士兵也穿着灰色的制服（冬天加入棉花则为棉袄），但他们都戴着红色的袖箍以示忠诚。通常这些袖箍不是缝上去的，而是用别针别上的，这样当军队倒戈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地取下。

普通部队的战斗力不强。当士兵抵达战场的时候，他们先站一会儿四处看看，然后取下步枪，也不瞄准就随便放几枪，然后坐下。炮兵胡乱开火，打的地方往往距离目标达四五百米。如果天下雨了，那么士兵就会都打起油纸伞，就像突然冒出了很多蘑菇，战斗也戛然而止。吴佩孚的军队比大多数其他部队要好，并在1922年跟冯玉祥一起把张作霖赶回了东北。

为了组建国民政府，吴佩孚请孙中山给予支持，但被残缺的国民议会授予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的孙中山拒绝了。他想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纲领统一全国，即民族、民权、民生。但孙中山的谋划和联盟都失败了，他的伙伴也都转而对抗他。他不断向美国公使说明他的宏伟计划，希望西方民主国家支持他的新政府，但是没有人对此感兴趣。这种谋划跟孙中山一如既往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不相容，但是在辛亥革命后让人痛苦的十年中，孙中山开始觉得中国无法仅靠自己的力量挺立起来。为了

取得华北，他一度甚至与张作霖勉强结盟，自然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由于西方拒绝帮助，同时也没有得到同胞的支持，孙中山转向主动提出帮助他的苏俄，并在1923年1月与共产国际结盟。1919年苏俄宣布废除所有沙俄签订的条约和特权，作为第一个自愿这样做的西方大国，这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等到要兑现的时候苏联又反悔了，不愿意放弃在东北的中东铁路或者在蒙古的特权。然而，在那些对自己革命的进展感到失望的中国人看来，莫斯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共产主义。就苏联而言，它正在寻求朋友和另一个基地，以便最终推动世界范围的革命。尽管苏联承认在当时情况下中国还不具备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同意帮助国民党实现国家统一和独立。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同意跟孙中山结盟，因此为了让国家获得新生，共产党作为盟友加入国民党，并暂时同意由国民党领导中国革命。

孙中山跟其他军阀一样，也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全国的领袖。他有政治哲理但是没有实力，军阀有实力但是没有纲领。孙中山缔造了革命，并且制定了革命方略，但缺乏统领和组织的才能。当时有人说他兼有圣保罗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素质，不过即使他能兼有乔治·华盛顿和列宁的素质，恐怕也难以驾驭这个古老而执拗的国家。由于取消了帝制，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占了上风，难以实现有效的全国统一。

史迪威到北京才半年就设法找到了一个机会，这使他可以摆脱公使的生活并真正了解中国。在前一年即1920年经历了严重饥荒之后，红十字会国际赈济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把他从陆军部借出去，到山西担任筑路工程的总工程师。1921年4月到7月这四个月里他都待在工地现场，每天跟中国官员、村长、承包商、工头以及劳工一道工作，按照中国的方式吃住，每天步行或者骑马督工，不断发号施令、哄骗、讨价还价，玩弄保住“面子”的把戏，了解中国人的习惯、特点和人际关系。他除了在西点军校做学生时学过的一点东西之外，在工程方面并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他很有自信，跟尤利西斯一样从来不愿意长期待在一个地方。他急切地想找机会出去，并在现实生活中使用他刚刚掌握的汉语，因此他听说了这个筑路工程之后便要求去工作。参与山西筑路工程加深了史迪威生涯中的中国印记，并在一年后促成了他另一项意义更重大的使命。

为山西设计这条道路部分是为了使灾民有工作的机会，但更重要的

是一项防止灾荒的长期措施。通过改善交通，将来就可以把从未经历饥荒的西北各省的剩余粮食送到灾区来。除了铁路和河流外，中国几乎没有供车辆通行的公路。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修建赈灾工程的习惯。即使开仓赈灾往往也不及时，无法避免发生大饥荒。中国人常常发现西方人有“做点事”的冲动，因此他们让那些外国积极分子去做那些他们自己也能做的事情，但是东方人的处事态度一定程度上不主张人定胜天。几百年来的灾难让中国人习惯了天灾人祸，人口大量死亡，但是又会有大量的人出生。在1920年发生了据说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大灾荒，“一些极为肮脏、衣衫褴褛的人骨瘦如柴，瞪着眼睛摇摇晃晃，几乎已经没有人形”，他们连绵不断地涌向城里，挤满了小小的火车站。农村一片荒凉，看不到有春季作物播种；褐色的土地上引人注目的只有一座座坟丘，同时大风裹挟着黄色的沙土刮向废弃的家园。

国际赈济委员会在北京开会，会议上有报告说食物的运输情况很糟糕，官吏腐败无能，并有人通过粮食牟利。但委员会还是“看法乐观”，认为中国政府终于觉悟，“会让外国委员会和美国红十字会负责这方面工作，并不再信任省县级官吏了”。这就是西方积极进取和中国人被动接受的典型方式。在呼吁美国公众捐款给中国赈灾时，威尔逊总统经典地表明了美国的观点，他说：“中国人民在极大程度上依赖我们给出建议并进行有效的领导。”其实就中国人自己而言，他们指望从美国那里得到物质援助，但他们从不把援助跟美国的建议或者领导混为一谈。在传教士的鼓动下，美国的募捐活动征集了大量款项，结果出现了结余，这使得筑路工程可以进行。

史迪威自己认为那些传教士有意夸大了饥荒的情况，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通过在危难时给中国提供钱和粮食，他们是在推进基督教的事业。史迪威写道，他“必须顶着官员们的消极抵制”完成工作，因此他和他的同事们有机会“为人民做一些政府不能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

在施工的时候，由于直接关系到山西省的利益，他发现当地的官员更愿意帮助而不是阻碍筑路工作。这要归功于山西督军阎锡山的影响，阎锡山是个进步的重实务的物质主义者，人称“模范督军”。他聪明地意识到，通过改善本省的状况，他能够比通过盘剥百姓积累更多的实力和财富。道路必须从一些人的土地上通过，阎锡山把修路的好处讲给那些人听后，他们顺从地允许筑路者从平掉的老坟中通过，对于那些新近死去的人的坟墓，他们甚至也同意迁走。

规划的道路共计82英里（约131千米 ），起自汾州 [3] ，终于黄河

边上的军渡。史迪威指示要让路宽达到22英尺（约6米 ），石子铺面，坡度不得超过六度，并要求8月1日前完工。他有12名外国助手，包括美孚石油公司的土木工程师、一名瑞典籍的采矿工程师、两名挪威传教士以及一名英印籍的预备役军官。这里石头多、山多，有农产丰富的山谷，这里从来没有粮食歉收的问题。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带着温顺的牛和原始的犁”在山坡上耕种。山坡极为陡峭，“每天光是到达田地的路程就足以让一个白人生畏”。

道路沿着河谷走，穿过一个关口又进入一个河谷，“之后的路线尚待确定”。史迪威每天要步行或者骑马走好几英里，每天晚上都睡在不同的地方，经常为了躲避臭虫和虱子要睡在外面。他指挥着6000人工作，教中国的测量人员该怎么测量，帮助工段工程师，指定施工队的位置，确定坡度、交叉路口，什么地方要削掉山，什么地方要填土，并努力想听懂当地方言。所幸很多人会说官话。

这里的人大多住在建在山坡上的窑洞里，里面用石头砌成弧形衬里，正面是石头墙。这里石匠很多。史迪威经常跟一些小的承包商打交道，让他们承包砸石头、提供石灰、做记号的木桩、骡子、水桶等工作，但他有意躲开那些态度圆滑，穿着丝绸衣服，想独揽整个工程的城里的商人。他更愿意跟穿着补丁裤子和脏衬衫的李茂林交往，而不喜欢跟那些肥胖的绅士打交道：“这些人文质彬彬，走不上六步便气喘吁吁。”

大多数使用镐头和铁锨干活的人都是为了挣点钱的农民。他们每30人被编成一个组，每组有一个监工和一两个厨师。段长（监工）拿着一根棍子，头戴草帽，身着干净衣服，常常躺在荫凉地呼呼睡大觉。他们派人放哨，一旦史迪威来了就通风报信。如果活没有干好，有关“面子”的争斗就开始了。史迪威会批评监工，而监工又会对干活的人大喊大叫。干活的人“也挺喜欢这种把戏——他们知道监工不过是做做样子，如果这个洋人在监工的背后对他们眨眨眼的话，他们还会咧嘴笑起来”。当“总工程师看到一个又一个人都看穿了这种玩笑，虽然玩笑可能是针对这些人自己的，他们也跟旁观者一样开怀大笑，这时他对这个种族的好感也就油然而生”。

在永宁州 [4] ，史迪威受到当地一名军官和长官的欢迎和款待。席间上了五十七道菜，有些史迪威连名字也叫不出来，吃饭时还不断用小酒盅喝当地的一种高度酒。他们还邀请史迪威去检阅当地一所军校的学员。这些学员伴随着响亮的军号声表演队列，“小号走了调，但是毫不在

乎”。早晨他们很客气地把他送到城门口，穿着崭新军装的军官和穿着绸缎长衫、身材魁梧的长官都“低头作揖，并目送这个穿着旧衣服、骑着一匹瘦马的洋鬼子离开。他很想早晨喝杯咖啡，但还是感到很荣耀”。



史迪威在工作，修筑黄河公路，1921年

由于没有北京那种安逸的生活的蒙蔽，史迪威在山西看到了中国所匮乏的东西：中国缺少什么，需要什么，以及当地的一个铁腕人物是在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阎锡山能够攫取大权，靠的是一种值得效仿的、成功的机会主义。袁世凯在1912年任命他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 [5] 。他相机跟安福系协商，结果在1917年把省长的位子也得到了。通常一个省将军和省长的职位是相互牵制的，但正如后来史迪威在为《步兵杂志》（*Infantry Journal* ）所写的阎锡山传记中写道的：“当一个人占据了这两个职位的时候，他就完全掌控了政府的运作，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了。”在此后的十年里，阎锡山使自己和山西省都避开了为统治中国而展开的各种争斗，而致力于使他由自己的辖区里获取可观的收入。

他开始修路建桥，开挖了很长的灌渠，鼓励种植树木、棉花和制丝，采用了在加利福尼亚试验过的拓荒方法，从不同国家引进美利奴羊、谷物和草类，推动读书识字和公共健康，建立小学和职业学校，开

展运动反对留辫子、缠足和吸食鸦片，还出版发行了一本公民手册，山西的1000万人都必须阅读或研习。物质上的福祉是新共和的中国才有的观念。中国传统的改革只关心品行和道德。阎锡山并没有忽略这些方面，他建立了“净心院”并自任院长。不过他尽管关心人民的福祉，但并没有减少地租和税赋。

正当大家都急切地想为中国找一个可能的领袖人物的时候，阎锡山引起了众多关注。一个美国杂志载文以“中国是否找到了摩西？”为题发问道：“他会带领自己的人民走出荒野吗？”很多外国人来到这里参观，并受到“模范督军”的招待。阎锡山身材高大，脸庞肥大，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显得很有教养。晚饭时他坐在主座上，旁边是他的在牛津受过教育的秘书，餐桌的摆设都是西式的，有缎子桌布、银器、石榴色水晶葡萄酒杯，以及叠成玫瑰花、小鸟与塔形的餐巾。晚饭后仆人用长竹竿挑着罩在涂有彩画的薄纱中的灯笼，陪着客人们到月光下的花园。阎锡山说他希望山西对整个中国来说能够起到一种类似酵母的作用，但是他又很有自知之明地说：“中国是块很大的面团。”

然而史迪威可享用不到这种种优待，他顶着尘土和酷暑在筑路工地上，带着野战背包，里面装着筷子、汗衫、罐头食品和换洗的袜子。他来到传教士家庭钟爱的避暑地，那就是泉水汇集而成的玉涛河谷地，他发现这是个带家人避暑的好地方——一个盛夏在这里租下一间庙或者一间老磨房需40美元。

他6月份回北京把家人接来。他们先乘火车到达晋中，然后驾着一辆只剩下空壳的老福特车继续走。他的妻子、孩子包括装在篮子里的婴儿都小心翼翼地坐在木板上，而史迪威则驾车仔细避开各种车辙和坑坑洼洼。仆人和行李都在后面的大车上。很多农民穿过庄稼已经成熟的田地，为了看史迪威他们的“火车”不惜践踏麦子。史迪威夫人写道，路上每到停下的地方“我们都被一些惊奇的目瞪口呆的人团团围住。孩子老哭，因此我经常要给她喂奶，这时他们就会围上来，看看洋人是不是也是那样喂奶的”。卡车有时陷住了，这些乡下人就会帮着把车推上高高的陡坡或者从沟里拖出来，并对车子遭遇这种意外大笑。“他们帮忙的时候乔会散发一些铜钱，而他们总是不愿接受。”经常看到的是笑脸、肮脏和疾病，一个乐呵呵的妇人的下巴下面长了一个甲状腺瘤，足有一个橘子那么大。

史迪威一家住进了一间磨坊。这里房间大，通风好，墙壁经过粉刷，屋梁都是粗制的，外墙上爬满了牵牛花。屋外有小鸟在丛林中鸣叫

着，有一口清泉可供饮用，成片的草地，上面点缀着金凤花，此外还有成群的绵羊和山羊。7月底的时候史迪威把剩下的筑路工作交给自己的一个助手负责，自己则在这个磨坊里打发剩下的夏日。除了野餐和跟其他外国人打网球之外，他还继续从事自己的爱好——写作，根据自己的见闻创作短篇小说以及异域生活特写。他把一篇有关筑路的文章投寄给《亚洲》（*Asia*　）杂志发表，结果得了100美元的稿费。但是第二篇题为“中国生活一瞥”的文章遭到退稿。这可能挫伤了他的积极性，结果他没有再试图投稿。不过他还是继续写作，其有关中国生活的特写生动地刻画了他自己在中国旅行时的情形：在一个火车站，下车和上车乘客这两股人流交织在一起，他们“大声尖叫，拼命挣扎”，扯着嗓子叫苦力，有些人把箱子、篮子和行李从火车窗户上往下扔，而其他人则把这些东西往上扔并竭力想挤上去。等到混战结束了，乘客们“把自己和行李安顿好，并开始很有礼貌地打听彼此的名字，老家在哪儿，以及是做什么事的”。

在一个小客栈“院子里到处是骡子，驮子和驮鞍，鸡和猪……顾客都围坐在一个大屋子的木桌旁低头吃面，他们借助筷子和嘴的吸力把面条吃下去……厨师把面汤从一个有1码（约91厘米　）见方的大铁锅里盛出来，所用的碗就是刚刚被用过的，他只不过用一片像车间抹布一样的东西抹了一下。接着厨师把一双筷子在自己的裤腿上擦一下后放在碗上，交给跑堂的，再由跑堂的摆着架势吆喝着端给客人”。这个洋人喜欢用开水洗洗自己的碗，“还假装要把开水倒在厨师的头上。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之后，在座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很有幽默感的好汉，之后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了，甚至在用筷子前还用小刀把筷子削了一下……因为到处是臭虫，他不住在炕上，而是把自己的小床放在院子里。在一群人好奇的注视下，他慢慢地睡着了，周围是猪的嗷叫声、骡子的号叫声、苦力的吆喝声，时不时还有驼铃声，那是夜行的驼队经过”。

他描写中国民众不是从社会学和分析的角度，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情节质朴，对话生动，就跟契诃夫笔下的农民一样栩栩如生，充满了人性。　[6]　碛口的父母官希望公路通过碛口，而不是隔壁的县，因为如果经过隔壁县的话，那么碛口这个黄河港口的名气就会被盖住。有个老太婆在高昌开一家客栈，她把这个洋人带到一个满是苍蝇和好奇的围观者的屋子里，因为她坚信这个洋人能治好一个小孩的病。还有些乡下人：当史迪威问路时，山西那些沉静又讲求礼节的农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之后还邀请他停下来喝点开水再继续赶路。路上有些拾粪的孩子拿着篮子跟在驮队后面拼命跑，“并会准确找到这些牲畜可能掉

下的任何东西。路上的粪被捡起，轻轻擦去灰尘，然后放进篮子里。等到这个路面都检查完了，这些宝贝粪蛋被交给老太婆们，由她们把粪摊开晒干”。

北京的社交生活，就史迪威的脾气来说还是令人愉悦的。在北京的武官和助理武官自西点军校时就是他的好友，直到助理武官的职位被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少校所接替，后来马格鲁德有关中国事务的工作经常跟史迪威的工作交织在一起。新来的语言教官、他们的妻子以及美国社区的其他人，包括美国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的女儿们以及她们的朋友和追求者——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圈子，他们经常互相请吃饭和见面。但是温妮不会打桥牌，而她的丈夫也不会玩马球，他们俩在那些公使圈内的人看来有些“不一样”。史迪威喜欢在东交民巷（Legation Street，即使馆街）的两个饭店里跟妻子跳舞，有一晚甚至在六国饭店（Hotel Wagons-Lits）被薄荷酒给醉倒。有一天晚上打麻将，看来“不像想象的那么糟”，而在舒尔曼家举办的有25人参加的晚宴实际上“很让人愉快”。跟过去一样，他对那些无聊或装腔作势的人很快就感到厌倦。他曾经这样写到一对夫妻：“男的是个装腔作势的蠢驴，女的是个沾沾自喜的傻瓜。”

他喜欢跟家人在一起。随着孩子们的长大，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感和乐趣也增加了。他在家里亲自教最大的两个孩子乔和南斯（Nance，南希的昵称），为他们的病担心，带他们到城墙那里散步，参观明陵，用诗体编了一本带插图的动物寓言集，还指导孩子们自己排演节目。

11月时，史迪威带着一群记者和赈济委员会的人第一次乘汽车通过他主持修筑的这条道路。十一年后，当时曾经是参观团成员之一的国际新闻社记者约翰·格特（John Goette）寄给他一张《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也称《华北日报》）的剪报，其中谈到了中国经常疏忽对公路进行维护的事。那篇报道说，史迪威修的那条从汾州到黄河的公路从来没有进行任何维护，“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在1922年的时候，这条公路的总工程师引起了邻省陕西省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兴趣。这个省是中国文明最早的中心，这里是山区，有窑洞和梯田，十几年后经过“长征”的共产党就驻扎在该省的延安。陕西出产棉花、羊毛和小麦，而且山上富于矿藏，本来这里应该是富庶的地方，但现实不是这样，这是由于当地人吸食鸦片，并且土匪猖獗，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交通太差。这个省没有铁路，唯一一条“所谓的路”有约90英

里（约144千米　）长，是从黄河转弯的潼关到西安的。这不过是用铁锨挖出的一条小道而已，没有做过任何测量。冯玉祥跟赈济委员会的人经过协商，委员会同意修一条从潼关到西安的公路，仍由史迪威任总工程师。

他先尽可能乘火车前往，但是在河南距离陕西约100英里（约160千米　）的地方火车没有了。到了这里他跟一支驮队走，队伍由50辆骡车组成，此外还有各类骆驼、驮载的牲畜、独轮车、行人，外加20个士兵护送这支队伍通过有匪患的地区。“我们在飞扬的尘土、各种吆喝声和噼里啪啦的鞭子声中出发……就像是迁移的卡尔马可人 [7] 或者是1849年淘金热时一群奔赴加利福尼亚的人。”由于道路很糟，队伍行进很慢，并不断跟对面来的独轮车纠缠在了一起。这些独轮车装着棉花，婴儿被包裹好放在一边，婴儿的母亲坐在另一边，前面还有一两个男孩用绳子拉车。由于路边躺着一些要饭的人以及拿着四齿粪叉和粪篮拣拾人畜粪便的小男孩，交通变得更加拥挤。行进变成了“不断努力、浑身冒汗的中国人和他们笨拙的车子以及怠工的牲口之间的持续斗争”。当两个独轮车在尖叫和诅咒声中陷入冲突的时候，剩余的队伍“只是停下来，等着他们解决问题。若不是亲眼看他们是怎么过去的，有人能够通过这条路真是个奇迹。这只是因为每个人都愿意等一等，或者让别人先走过去”。

这支队伍用了四天到达陕西边界，又用了四天到达省会。为了避开车子的拥堵，史迪威每天要通过各种沟沟坎坎和泥坑，冒着尘土步行8英里、10英里或者12英里（约12—19千米　）。他晚上就住在“肮脏、到处是跳蚤的小镇”或者“污秽的客栈”，有一次还待在一个供吸食鸦片的烟馆里。辛勤劳作的苦力“不断成群结队地进来，花上10个、15个或者20个铜板过过瘾：他们掏出钱，拿出烟锅，并得到一些鸦片”。史迪威还写道，10个铜板就相当于他们一天工钱的30%，这是“对他们财物的巨大消耗，更不用说对他们健康的消耗了”。中国的这些穷苦人吸食毒品，因为这能麻痹他们因饥饿带来的痛苦。开始是偶尔为之，后来上了瘾，如果瘾大的话这种毒品能耗尽他们的能量，并使他们变得冷漠。“为什么冯玉祥不制止呢？”史迪威愤怒地写道，“收缴并焚烧鸦片，并把那些卖鸦片的人拉出去枪毙。”史迪威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冯玉祥如果想这样做，就会触发一场暴动，此外，他通过征收鸦片税还能有可观的收入，这些收入一部分给了吴佩孚，还有一部分用来给他的士兵发饷。

穿过陕西的时候，史迪威立即感受到了“基督将军”统治的痕迹。士兵们在街上行进的时候唱着赞美诗。在有关“节约你的军火”为主题的歌

曲中还唱“听啊天使在高唱”，而荣耀颂则成了使国家免于堕落的呼吁。用蓝字在粉刷的墙壁上书写的标语劝诫公民“不抽烟，不喝酒”，“诚信经商”，“孝敬父母”，“耕地，织布，读书”。店铺的招牌上引用了各种富于教育意义的格言。然而史迪威有些疑问：“要对这个至少算得上顽固的民族移风易俗就这么简单吗？”



美国国务卿休斯和后来成为罗斯福总统外交政策顾问的萨姆纳·威尔斯

冯玉祥的努力并不只限于劝诫。为了让士兵们成为现代国家的合格

公民，他开展了识字运动，并要求每个士兵在饭前都要学会两个字。军官，甚至军官的妻子和女儿也上课学习读写。冯玉祥除了像阎锡山在山西那样开展水利和改良土地方面的公共工程之外，还为文职官员、地方官、警察以及公共卫生官员安排了课程。史迪威冒着尘土前往西安时几乎没有看到有什么变化，不过他还是写道，士兵们“都精神饱满，枪也擦得很干净”。

有很多让人气馁的事：糟糕的道路和瘸腿的骡子，懒惰的赶车人“还在打呼噜不肯走”，客栈院子里到处都是粪便，烦人的乞丐，一次持续两三天的尘暴，接着好几天雨，然后雨转为雪。路上也有紫罗兰和有明代特征的标志性建筑。从黄河的一个关口上看，景色很是壮观，太阳照在下面的平原上，而远处则是绿油油的刚种下不久的农作物。再往西则是山脉，在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皑皑白雪。

进入匪患地区后，车队在一个地方看到一颗人头悬挂在树上——就在那天晚上，土匪穿着军服杀了一个中尉和士兵。继续前行，在城外他们看到一具不久前被枪决的土匪的尸体，尸体丢在那里示众。在中国，死亡就跟风刮起的沙尘一样平凡，随处可见的坟丘提示着这种死亡；这些坟丘在几百年中慢慢销蚀，直到重新耕作变成田地；但是死亡也是可以直接看到的：一个刚出生就被杀死的女婴的尸体没有掩埋就扔在坟丘之间，等着被狗吃掉。

在距离西安还有一天行程的一个温泉处，史迪威听说督军已经吩咐让他使用督军自己的专用浴池。这是他离开北京后第一次洗澡。

4月3日他进入西安，这是汉代和唐代的古都。西安的城墙在中国是最高的，也是最厚的，不过城墙内有很多地方已经废弃，包括满城，那里现在只是种着一片片油菜，这是一种像芥子一样的作物。主要的商业街是用巨大的石块铺成的，但是少量的砖结构的学校和政府办公楼却是让建筑师不忍目睹的建筑。这些“建筑的正面仿佛是西班牙教会式建筑、乡间修理厂以及消防公司的混合体”。在街角的一个市场里按斤卖煤——煤是这个城市的主要燃料，是由独轮车从90英里（约144千米　）外的潼关运过来的。兽皮在户外的木架上晒着。主街道拥挤繁忙，到处都是拿着伞的士兵。史迪威很难想象这从前是个了不起的都城，但是尽管西安已经衰落，当地的人民仍然可以找出乐子来。他们把不同调子的竹哨绑在鸽子的尾巴上，这样当成百只鸽子在空中盘旋的时候，它们的声音就好像是从飞翔的风琴中发出的。

史迪威被人带到督军府见督军，这原是旧的皇城，冯玉祥让士兵利

用废墟的砖头把这里改建成了整齐干净的兵营和训练场。冯玉祥41岁，他没有一般军阀的那种排场，住在“整齐的小砖房里，说话慢吞吞的……身材魁梧，没有架子，很容易交朋友”。开始讨论筑路计划，但是冯玉祥好像对此并不感兴趣。史迪威在后来的谈话中知道了原因：“他对我修不修路并不在乎，他只是想了解军事方面的情况。”冯玉祥邀请史迪威次日再来参观军工厂，同时还带他参观兵营和作坊。

兵营里每个士兵的房间里都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用醒目的红色画出了在过去50年里所失去的土地——印度支那、朝鲜、台湾，以及旅顺。陕西地图、中国地图以及世界地图则画在屋子墙壁的下部。这里的士兵比一般的中国士兵要更加整洁，他们在单杠上练习大轮转，其熟练程度让人惊奇：“我还没有见过世界上哪个组织里每个人都能做大轮转。”另一个让人惊奇的是看到士兵在闲暇时阅读《圣经》。在课堂里他们学习读书写字，在作坊里他们学习一门技艺，如织布、木工、做家具、制鞋、裁缝及打铁等。一个制鞋的作坊由一个军官负责，他跟士兵一道做活。“这也让人吃惊。看一个上尉粘鞋面，这跟我们通常理解的军务可是格格不入的。”史迪威发现那些有才干的普通兵不须考核便被提拔为尉官。晋升到上尉时他们要接受半年的学习，这是他们所接受的唯一的理论方面的训练。

第二天，冯玉祥的总参谋长过来，问了“很多有关飞机、坦克、枪榴弹等的问题”，然后督军亲自过来跟史迪威就有关武器问题谈了一个小时。“他们对新发明的用途毫无概念，说要用一辆坦克守卫桥梁。”史迪威为冯玉祥“讲了斯多克迫击炮”，并“竭力解释飞机、坦克和枪榴弹是为什么而设计的，以及能够发挥什么作用，还告诉他别浪费钱买这些东西。只要有了步兵和机关枪，他省里的任何地方出了问题用不着多大工夫都能解决掉”。这不是冯玉祥想听到的，但是史迪威坚持己见：“希望这位真正让人钦佩的人不要浪费钱财在那些对战争无关紧要的装饰品上。”

他那天晚上跟冯玉祥一同吃晚饭，让他意外的是饭菜非常好。由于有很多有关他信奉基督教和农民英雄本色的报道，冯玉祥成了外国媒体所喜欢报道的人物，他们喜欢把他描写成穿粗布棉袄并跟士兵一同吃饭的人。但是史迪威发现，这顿饭“根本不是‘跟士兵一同’吃的东西，有肉圆汤、鲜菜、鸡肉、烤羊肉、莲子、荷包蛋以及馒头”。

史迪威在西安待了四天时间，跟承包商、中外工程师及其助手商谈。最后，冯玉祥分配给史迪威40名士兵，这些人是从冯玉祥部队中抽

出来做监工的。他们一同奔赴城北20英里（约32千米　）的工地上。史迪威让工头在黄河支流渭河以东建造了一段样板路，结果竟然令他十分满意。这些人看来非常聪明，史迪威觉得他们稍经培训就能派上用场。河上的渡口一片混乱，有六到八条平底船上挤满了骡子、大车和乘客，船夫从船尾用力推，结果骡子掉下河去，船夫时而大喊大叫，时而大笑，通过的时候终于掉进了窟窿里。史迪威由一名苦力用肩扛到了对岸。

筑路工作开始了，这800名劳力拿着的是“唐代的镐头”和木锨，此外还有很少的筐子，但没有打夯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着手进行筑路工作；工人干得不好，工头也让人失望。过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进展。没法让这些人干活……给他们讲了二十遍，可是还是弄错……工作一团糟”。但是逐渐地“混乱变成了有序”，史迪威觉得工程正在取得进展。可是正在这时北洋军阀重新开战了。

谣传张作霖要“起事”，因此冯玉祥的部队奉命去帮助吴佩孚。冯玉祥的部队开始往东开拔，史迪威的各种大车被征用，他的工头不见了，显然这个工程只能放弃。冯玉祥的总参谋长邀请史迪威随军开拔。尽管这个使者极力请求史迪威再等等，但是这种请求的用意无法被理解，于是史迪威在4月21日又往东返回了。走了2英里（约3千米　）之后，一个筋疲力尽的使者骑自行车追上了史迪威，他的背上有一块地毯，这是督军送的礼物。这个骑自行车的人刚送上礼物便累倒在地。史迪威继续前行，遇见了冯玉祥的一队参谋，他们“都闷闷不乐，为中国的命运而感伤”。他跟他们一样郁闷。史迪威想，如果冯玉祥能够在几年里不受干扰，那么他就可以增强控制力，扫除土匪，并可能成功地禁止鸦片贸易。但是现在“这个唯一可能维护法律、秩序和体面统治的人”重新卷入派系纷争，陕西只能故态复萌了。

潼关是黄河拐弯处的一个边境要塞，有石头铺成的引路通向大门口；在这里，史迪威跟冯玉祥在一个老庙里吃了一顿告别饭。冯玉祥召集了一个团的兵力供客人检阅，他向士兵介绍史迪威时说他是“欧洲的史营长”。在边远地区的中国人看来，外国人就是外国人，至于国籍，那是很少区分的。

史迪威回去时沿着往黄河北部东北部支流汾河的河谷抵达山西省城太原；这一路花了十八天。他们这群人跟来时一样穿过荒地以及种植作物、树木和葡萄的农田，仍然要冒着尘土和雨水，忍受各种臭味和肮脏，所不同的是炎热的天气让他们更加不适。在一家客栈里史迪威被一

只蝎子蜇了一口，“一夜躺着没睡着，浑身冒汗，觉得满身都是蝎子”。路上，他吃惊地发现石拱桥极多，可往往拱桥的一半已经损毁。“修一修？天哪，不，为什么修？”他的结论是，今天的中国人是“过去修建了这些桥的中国人的不肖子孙”，不过这并不是全部原因。缺少公共服务设施是由于下级官吏没有薪俸，只能通过收税和盘剥过活，结果无法进行修路建桥或者建立卫生体系。

不过中国人的毅力和好脾气还是令人钦佩的。一个赶车人老是把车子赶进沟里，其他人“一等他陷进去就乐呵呵地帮着把车弄出来”。为了把车子拉出来，“他们把三头骡子架在一起，一个人牵着挽绳”，然后开始拉，“喊着号子，一边笑一边滑倒在泥水里”。为了临时搭个桥，他们“把车轮去掉，把车子翻过来，然后架在沟上。这样桥就搭好了”。尽管有次发火时史迪威认为“按智力排序应该是大车、骡子和赶车人”，史迪威还是慢慢喜欢上“两个爱开玩笑的人，老郭和老匡。他们都不到40岁，都对自己的职业很有自豪感”。他为他们每人买了一双鞋子，有一次还请六个赶车人一起吃早饭。

史迪威经过多日的颠簸和跋涉，冒着尘土和炎热的天气，克服了种种不适。接近目的地时下起了大雨，他不得不摸黑在一尺深的水里步行了两个钟头，到达时发现城门已经关闭了。不过史迪威终于抵达太原，并从那里乘火车去北京。这次他没有筑成路，但是他跟中国士兵和老百姓共同生活和工作过了，并结识了一位出色的领袖。在回北京的途中，史迪威看到运送张作霖部队的火车正从东北南下，为了跟冯玉祥和吴佩孚的部队作战。结果张作霖失败了。两年后冯玉祥转而对抗吴佩孚，并成为北方的领袖。史迪威在20年代后期再次来到中国时，冯玉祥已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一次以及后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史迪威来到中国，他们都会相见。很久之后，史迪威夫人在丈夫去世几天后的一天正在卡梅尔她家里的楼上。她听说有客人来，是“那个基督徒”，这让她感到迷惑不解。她下楼在客厅里看到的是身材魁梧、脑袋很大的冯玉祥。他对她说：“我是来同你一起悼念我的朋友史迪威的。” [8]

在1921年过渡到1922年的冬天，也就是史迪威进行两次筑路工程之间的时间里，远东正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其受关注程度是义和团围攻各国公使馆之后所没有过的。那年冬天举行了华盛顿会议，从时间上说这正是义和团运动和珍珠港事件中间的一个时期：这次会议促成了后来的很多事件。这次会议是美国在与英国协商后倡议的，他们试图不在海军军备竞赛方面花费太多而又在太平洋保持一种可靠的均衡。因为

美国公众显然不愿意为了超过日本而花巨资加强海军，要想保持有利的海军实力比例并保证菲律宾的安全，只能通过相互协商进行军备限制。这次会议还想通过缔结国际公约在这个地区对相关利益做出安排。这种和约取代了已经到期而尚未续约的英日联盟，因此这给英国提供了一条体面的退路，可以让它摆脱这种它并不想要的联盟，而美国和加拿大也跟英国一样不想跟日本结盟。

美国还想促成中日纷争的解决，并希望这能够加强中国的地位。此事的主要推动者是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以及前国务卿伊莱休·鲁特。他们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动机，那就是试图倡导这种国际努力而展示美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责任感，并庶几减轻自己由于拒绝国联而产生的不安。

山东问题让美国感到良心不安。共和党通过在竞选时对此事大事渲染，最终使得哈丁当选总统。一个民主党官员认为这是“最能够帮助共和党拉选票的事情”。也许因此共和党觉得自己有义务改变这种他们大声谴责的不公正，但是仅靠良心往往并不能召开国际会议。休斯国务卿之所以想把中国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原因在于日本的扩张使得这个地区有被它控制的危险，这最终会消除美国以及别国的利益，因此休斯试图通过在国际上支持中国“独立”并重申门户开放政策而限制日本的扩张。

关注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主要是美国的政策。英国人对此并不相信，也没有热情，但是它附和了美国的政策，因为英国想从会议上得到其他东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远比美国的要大，其基础是一种通商口岸时代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永久不能自治。很多美国人也有这种看法，但是美国公众的意见总体上体现了传教士和教育家们的看法，那就是认为西方的教育和方法可以改变一切。受过西式教育的孙中山及其信徒传播了西方的观念，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从而证实传教士的努力没有白费。

中国想要的——同时也是它在会议上所极力主张的——其独立的真正证明便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虽然美国公众舆论支持这个目标，但最终要为此负责的国务卿休斯以及其他政策制定者却不想走这么远。因此，中国收回山东便更加有理由了。休斯坚持收回山东。“我已经是个老人了，”据说他这样说（他当时60岁），“我想在死之前看到山东问题的解决。”

尽管美国不断敦促，日本还没有像它承诺的那样将租借地的主权归还中国。不过它既没有一意孤行地想继续扩大其利益，同时在1921年时

也不想成心跟西方作对。实际上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好战的，一个是人文的。正像那个胖子肚子里的一个瘦子叫喊着想出来一样 [9] ，那个瘦小的、人文化的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虽然受到围攻，却曾经短暂地辉煌过，但很快又被吞噬。“一战”中民主国家的胜利让日本印象深刻，这增加了其议会团体和温和派领袖的声誉。这些人无意展开海军实力竞赛或者鼓动侵略性的军国主义，而是推动跟中国取得善意的解决方式。他们渴望跟英国结盟，同时也希望美国能够认可日本对太平洋诸岛的控制权。日本就是出于这些原因而参加华盛顿会议的。

会议持续了不到三个月，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只有巴黎和会一半长的时间。九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包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以及葡萄牙。它们参加会议的动机各异，或为民族自豪感，或为海军实力，或为远东利益。苏联跟中国接壤而且也一直主张自己的利益，但尽管它愤怒地抗议，还是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因为苏联政府未被承认。中国代表与会的想法很坚决，那就是修改条约、关税自主以及收回山东。休斯国务卿费尽口舌，好不容易说服中国代表直接跟日本接触，商谈那些相当隐晦的跟山东有关的权利、贷款和租借事宜，从而避免了公开在会议上谈论。中国代表最终同意了，条件是休斯和英国首席代表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会谈。第一次约定的会谈时间到了，但中国代表却未能出现，经打听才发现这些代表被一些反对直接与日本谈判的愤怒的中国学生堵在了公使馆的厕所里。之后，经过了36次会谈才达成了解决方案，据此日本首次通过条约而不是口头保证，在保留一些经济权利的同时把租借地区归还中国。

会议总体上的成果体现在下述公约和协定里：《四国公约》，该公约规定美英日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实力保持在5：5：3的比例；《五国公约》，规定不在太平洋的领地设防；有关中国的《九国公约》，此外还有分别签订的协议，涉及山东问题，日本从西伯利亚撤军问题，有关那个麻烦不断的雅浦（Yap）岛问题，还有那个最后还让美国一直良心不安的问题，那就是《蓝辛——石井协定》。限制海军实力最引人注意。会谈一开始休斯的提议振奋人心，在这个出色的开场白里，休斯提议三个主要的海军大国取消总计66艘主力舰和其他舰只的建造计划。但是更加命运攸关的是不设防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不在其托管岛屿设防，美国不在菲律宾岛、关岛和阿留申岛设防，而英国则不在香港设防。

会议最大的成就是《九国公约》。该公约的四项原则用恢宏的语言

规定了要达到共同——或者几乎共同——愿望所必须做的：一个强大的、独立的、统一的中国。根据公约，各签约国保证：1.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2.给中国最充分的、不加阻碍的机会，以使之建立并保持一个有效而稳固的政府。3.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4.不得利用中国现状谋取会削弱友邦公民的权益的特别权利和特惠。

这个公约实质上是各签约国保证尊重中国的完整，但并没有保证在这种完整被侵犯的情况下要给予保护。通过用公约的效力体现了美国的门户开放信条，这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加强了美国是中国在道义上的保护者的印象。它驱除了在山东问题上的负罪感，同时又不必承诺采取任何行动。这个公约看上去具有很高的原则性，完全无害，而且显然是倾向中国的，结果通常对公约没有什么好感的美国参议院以66票对1票通过了这个公约。由于中国还没有可靠的政府，缔约国并没有放弃不平等条约，但是它们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的姿态。它们答应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治外法权问题，同时成立另外一个委员会“审查”关税问题，并且同意如果无法归还中国所要求的关税自主权，那么可以先增加它的海关收入。两个委员会后来在1925年和1926年召开会议并做出决议，但由于当时中国爆发了内乱以及中外冲突，结果这些决议没有得到施行。英国在会议上承诺归还威海卫，这后来在1930年得到了实现。

总体看来，《华盛顿公约》好像是一种了不起的自我克制的训令，就尊重国际秩序这一点上说，可以算得上是个奇迹。任何相信和平和集体力量的人都会相信，这些公约的确达到了裁军、国际平等和捍卫中国的目的。公约结构基本上是普遍放弃侵略性的意图，但由于没有制裁和保证，因此一旦团体利益不复存在，这些条约也就失去了效力。当时日本当政的温和派和其他缔约国一样有理由对公约感到满意，而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民族主义分子只会对《华盛顿公约》恨之入骨。他们认为由于公约限制了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自由，日本处于劣势。不到一年，他们更有理由感到敌意了。1922年11月美国高等法院再次通过了之前国会通过的法案，规定取得公民权仅限于“自由白人”，这实际上宣告了日本人不可能通过归化成为美国公民。1924年，由于西部各州的极力倡导，国会通过了法案，规定日本人不受上面那种限制的约束。但是这种做法并未增加好感，对《华盛顿公约》的未来也不是什么好兆头。

作为武官的特派员，史迪威受命就《华盛顿公约》的一项条款的执行情况做出报告，即日本定于在1922年9月撤出西伯利亚的条款。在这

个月里他开始了北部的旅行，去了东北、西伯利亚、朝鲜和日本。

东北是当时各种野心和后来冲突的焦点，这是中国长城以北宽广的边疆地带。其面积比法国和德国加在一起还大，有肥沃的草场和丰富的煤炭、铁、农业和水资源。这是俄国和日本这两个敌对的殖民主义者争夺的核心。俄国的领土像块马蹄铁一样环绕着，东至日本海沿岸的滨海省。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由西向东穿过东北，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则由南向北纵贯东北。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掌握在关东军手里，关东军跟英印军一样实际上是一支独立的部队。史迪威的第一个目的地便是东北的首府奉天，这也是关东军和南满铁路的总部。

他立即感到自己不喜欢这里。“在这个破地方，中国的邮件无法送出去，只有日本的邮政。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中国邮箱，谢天谢地。”作为南满铁路的煤炭和钢铁中心，这个城市“非常繁忙……充满了做大生意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发财的计划，但是总有些阻碍”。他接着去了哈尔滨，这是10万俄国侨民汇聚的地方，史迪威又从这里乘火车往东去海参崴。根据他一路上在城镇的观察，日本似乎并不忙着撤退。实际上日本部队好像“在从东面撤到西面。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两架飞机嗡嗡地飞来飞去。并没有撤军的船只”。这里仍然是经历了战争和革命后的样子。史迪威通过探索、交谈和四处溜达，发现“小日本正在城西的一个山上挖什么”。“那里正好可以俯瞰阿穆尔（Amur）湾。这些不可一世的小杂种……今天上午满城都是，他们坐着美国的汽车，布置宪兵岗，挺着肚子……真想狠命朝他们胸前踢上一脚……他们有计划地就护照问题找美国人的麻烦，跟美国人过不去……好像有意让别人瞧不起他们，憎恶他们。”

在去了日本一周并在回来的途中去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一周后，史迪威的这种印象加深了。他发现日本有种侵略性的沙文主义，而这在中国是没有的。日本是东方国家中唯一在自己的领土上完全拥有主权的，同时按照现代标准看又是富于效率的，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血液中感到了一种统治其他民族的冲动。这除了要求被奴役人民对此加以认同之外，日本还利用一切可能的官方接触的机会，对那些很久以来在东方趾高气扬的外国人进行骚扰并颐指气使。史迪威写道：“叫我在船上等着吃饭。小日本却已经在吃了。”“先招呼日本人，他们不用排队，比如在买票窗口等地方。对证件检查很严。必须要进行冗长的问话。到处都有人讪笑。”他认为这些只是“小烦恼”，也没有妨碍他游览日本名胜时的快乐。他在宫岛周围的山上享受着松林的幽静和香气，而且可以看到远处

的海峡。史迪威觉得“我可以在这里躺上好几个月”。他喜欢这个国家，但是不喜欢这里的人，他们让他想起了德国人。他在旅行结束时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人“是德国人拙劣的模仿者，没有德国人的头脑和能力。爱国，很有组织性，勇敢，富于艺术性，自高自大和愚蠢”。



东北成为日俄利益争夺的核心。出自《哈泼斯周报》（*Harper's Weekly*）

1923年，史迪威在他的语言教官任期就要结束的时候，又提出去两个彼此相隔甚远的地区。4月时，他通过乘船和步行，在没有翻译或者伙伴陪同的情况下，对长江南岸的三个省进行了一个月的游览。这包括地处沿海的浙江以及在内地的江西和湖南。这里没有筑路的机会，因为这里的人除了独轮车外没有带轮子的交通工具。货物通过水运，或者由人用扁担挑。这些运货的人沿着水稻田埂走，或者直接爬过山。透过云雾，群山突然出现在眼前，仿佛是一幅幅中国山水画变成了现实。这里的农村要比北方的更加吸引人，到处栗树花盛开，帆板船沿着运河行驶，各处是一片片观赏性的竹林、风铃叮当做响的塔，此外还有豌豆花在春天发出的阵阵清香。孩子们懒洋洋地躺在水牛背上，赶着它们转圈拉水车，不断汲满一排排水桶来灌溉农田。

史迪威报告说这里鸦片买卖盛行，这受到当地督军部队的保护。与

此适成对照的是，毒品从来没有在日本成为社会问题。在湖南，为了给受命稽查鸦片的官员提供保护费，一百多家烟馆每家每天要缴纳40个铜板。史迪威的船夫是个烟鬼，结果史迪威不得不给他买些大烟“以免他喊叫。每天要花50个铜板，要吸两三次，否则他就会难受”。

他跟各类中国人都有交往，包括他隔壁船舱的富商，“排场应有尽有，包括奴仆……以及有四层之多的饭盒”，也包括“乐呵呵的船工，他们不管衣服是湿的还是干的，不管冷热、饥饱，总是蹦蹦跳跳的，互相开着玩笑”。船上到处都是“得了梅毒的和拉二胡的人”。离开这条河之后，他有好几天在乡间徒步旅行，有时一天能走二三十英里（约30—50千米　）。这些百姓受到当地部队的欺负，“多为强奸和抢劫”。所谓的道路不过是独轮车道而已，状况极糟。只有中国人才有耐心和力气把装得满满的独轮车从这种道上推过去。这些人好像对外国人挺友好，史迪威还报告说，他们“都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他们对本国的政治毫无兴趣，只希望不受干扰地好好过日子”。

到了马可·波罗宣称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杭州，史迪威却感到失望。西湖以寺庙和塔而闻名。史迪威觉得西湖是美，但是有些被夸大了：“有很多房屋是中西结合的怪物……像是二流的美国海边避暑地”。他旅行的最后一站所去的城市，阿诺德·汤因比几年后是这样描述的：

你这个流着伦敦眼泪的士麦那 [10] ，

你这个受到士麦那泪水折磨的伦敦，

繁忙，令人厌恶的上海，

我们起锚了，感谢上帝。再见。

史迪威的看法跟汤因比的差不多，只是原因不同而已：“这个城市很快就会把任何人都毁掉。那些遗弃在旅馆周围的婴儿抽搐着，亟须得到照料，以至于很难不注意他们。”

一个月后的1923年6月，他去了外蒙古。这里跟灯红酒绿的上海的差别之大，就跟从此处到上海的距离一样。从长城脚下的铁路线终点万全 [11] 到外蒙首都库伦 [12] 有650英里（约1000千米　），乘汽车要走三天。路上史迪威睡在蒙古毡房里，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睡在外面。中国、苏联以及“独立”的外蒙古的主权之争仍然悬而未决。好像谁都不知道谁是国家元首，这里的政府只是个闹剧而已。史迪威报告说蒙古人决

心不让中国再取得控制，并相信这个国家将会永久分离出去。苏联干预的痕迹处处可见。装备有一些机枪的包括步兵和骑兵在内的500名苏联红军控制着这里的局势。他们的弹药不足。由于没有铁路以及其他运输方式，在此地作战将会困难重重。库伦的喇嘛数量达1.5万人。史迪威观看了这些喇嘛拜佛，觉得他们“肮脏、堕落和颓废”。梅毒很常见，很多妇女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对此他未免简单化地报告说：“几乎完全没有小孩，可能五十年后蒙古人就会绝种。”

自1919年史迪威接受中国任命以来已经过了四年，他作为语言教官的任命结束了。在陕西和山西的路基上，在他独自旅行时去过的村庄和龌龊的旅馆里，他逐渐了解了外国人经常出没的通商口岸、公使馆区与传教士区之外的人和地方。他在中国的条件下知道了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

1923年7月9日，在过完40岁生日四个月后，他跟家人一同乘船返回家乡。在那天的日记里他写道：“我现在已经是个中年人了。”

---

[1] 美国总统竞选的一种方式，指候选人在其居住地发表政治演讲，而不是到各地进行竞选。——译者注

[2] 另一说法为九声，分别是阴平、阴上、阴去、阳平、阳上、阳去、阴入、中入、阳入。八调的说法将阳上等于阳去或阴上。——编者注

[3] 汾州，1912年改名为汾阳。——译者注

[4] 永宁州1912年改名为离石。——译者注

[5] 一省军务最高负责人，此职位1916年改称督军，1922年又称督理。

[6] 史迪威写的三篇“谈话录”，见本书附录。

[7] 卡尔马克人（Kalmucks），居于蒙古西南等地的游牧民族，经常迁移。——译者注

[8] 这是冯玉祥第一次到美国。他在前往苏联访问的途中，因乘坐的苏联轮船失火而死于黑海。

[9] 弗洛伊德曾说，每个超重的中年男女体内都有一个穿得很少的青年竭力想挣扎着出来。——译者注

[10] 士麦那（Smyrna），希腊语名，爱琴海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今称伊兹密尔（Izmir），土耳其港口城市。——译者注

[11] 万全（Kalgan），即今张家口。民国时为万全县，1928年后曾为察哈尔省会，1939年设张家口市。——译者注

[12] 库伦（Urga），即今乌兰巴托。——编者注

第五章

“能干”团和蒋介石的崛起

1926—1929年

回到美国后，年过40的史迪威重新回到学校。在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四年后的1923年，在美国的陆军部队里实在没有什么好干的。战败往往激励军队的发展，但没有什么比完全的胜利更能促进军队的颓废了。美国现在又退回到海洋屏障之内，眼前再也看不到威胁，而日本人似乎也受到了《华盛顿公约》的约束，这样美国又沉浸在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总统的阳光中了。股市上扬，到处是装束大胆的少女和私酒贩子，而军务则废弛了。1922年的裁军使得晋升几乎停滞下来，美国部队没有在任何地方作战的，唯一晋升的希望是参加进修。

还在中国的时候史迪威就请求参加佐治亚州本宁堡（Fort Benning）的步兵进修课程，这里招收250名步兵军官，分别参加连级培训课程和高级培训课程。史迪威提出申请，于是被分配参加高级课程培训。参加过这类培训的顶尖毕业生往往会继续到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的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参加培训。如果一名军官没有参加过利文沃思的培训，那他是不大可能担任高级指挥官的。1923—1924年，史迪威在本宁堡参加步兵课程培训，此后又待了一年，身份是该校校长、史迪威在“一战”中的朋友和钦佩者威尔斯将军的助理执行官。

他去利文沃思堡参加1925—1926学年的培训。利文沃思堡所灌输的是根据既定使命、对敌情的分析、行动选择、解决、决定和计划来找到“问题解决方案”。在授课、地图解题以及地形练习中，课程涉及了动员、部队调遣、行军、救援、供给、侦察与安全、阻滞作战、撤退、改变方向、追击以及其他人们在把战争变成一门科学时所孜孜不倦地设计的各种谋略。课程非常难，要取得优异成绩的压力也很大，结果在20世纪20年代引发了一系列自杀事件，以至于后来学校被关闭了。



天津美国领事馆

军官为了学习熬夜到凌晨2点，这让军官的妻子们都感到无聊和躁动不安，不过尽管史迪威称这是“地狱般的一年”，但是他并没有怎么拼命。他在这里年纪偏大，而在西点时年纪偏小。他离开军校已有二十年，觉得一定要争得最好成绩的意义不大。他知道自己能过，这足够

了，其余的都是“瞎闹”。他只是学完必须学的东西，然后10点钟就上床睡觉，这让他的同学们感觉几乎受到了侮辱。他班里学习最刻苦的人之一、191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史迪威毕业时，校长对他的评语是：“有常识和幽默感。”

史迪威周期性地有离开美国的冲动，因此他申请到法国参谋学院（Ecole de Guerre）学习。这项派遣已经得到批准，但是他得知又有一个去中国的机会。现在陆军部任职的西点时的同学威利·惠普尔（Willie Whipple）告诉他有个在第十五步兵团担任营长的空缺，这个团是根据庚子协定驻扎天津的。惠普尔问他是否想去。史迪威放弃了去法国的机会，竭力想去中国。自他回家以来他第一次变得很急切，他在利文沃思的整个学习期间不断急切地向惠普尔打听此事。他的朋友向他保证说事情很有把握，在2月的信中说：“你被认为是从事该项任务的最有资格的作战军官，简直是个出色的中国人。”但是史迪威还是不住地烦他。惠普尔在3月的信中又安慰史迪威说：“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得到这个……毫不畏惧那些有参议员撑腰的人……我支持你。事情已经定下了。”可是到了4月任命还没有下来，这次史迪威发了电报。惠普尔答复说，“别着急”，任命就会下来。的确，在学期结束前任命下来了。史迪威一家在卡梅尔度过了暑假，然后在1926年8月20日再次乘陆军运输船去中国。史迪威夫人写道：“我们都觉得这是在回家。”

然而天津使他们的美好憧憬幻灭了。天津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城墙没有了，变成了有外国部队驻扎的外国在华北的根据地。租界被铲平，又用厚重而丑陋的后维多利亚西式风格重建。那里的生活不像北京生活那样有魅力，而中国也不再是史迪威一家三年前离开时的中国。南方经历着巨变，即将产生一位领袖，使斗争达到高潮并终于缔造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事情的起因是：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的一个纱厂里，当一些中国学生和工人在举行罢工游行时，英国巡警命令“开火”。12个中国人被打死，17人被打伤。这个后来称为“五卅运动”的事件只是众多历史事件之一，但是就像在波士顿大屠杀事件中英国步枪队开枪射击一样，这一事件助长了动乱，最终使中国收回了全部主权。

此时的国民党由于跟共产国际结盟而汲取了新的力量，正处在上升时期。孙中山从苏联所得到的最大帮助便是两名外国顾问，这就是民事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和军事顾问加仑（Galen），后者就是后来担任苏联远东军司令的瓦西里·布留赫尔（Vassili Bluecher）元帅。

鲍罗廷是个性情温和并有深谋远虑的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直到后来被称为广东的皇帝。苏联顾问，再加上苏联的军火以及其他物质支持，标志着国民党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他们告诉孙博士说，革命不可能通过与那些没有共同目标的人结成机会主义的联盟而取胜。首先要有一支经过思想教育的武装力量。因此，1923年成立了黄埔军校，在加仑的指导下由30个苏联教官担任学校教员。为了接受苏联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孙博士向莫斯科派遣了一个军事使团，带队的就是卓然出众的37岁的蒋介石。

1924年孙博士宣布了他的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这激励了中国人民。但他还是跟过去一样希望通过权力安排而获得权力，因此他接受了张作霖和冯玉祥在北京发出的邀请，去参加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改组”会议。1925年3月12日他在北京死于癌症，留下了他的三民主义、一场运动，还有一个已经沉迷于中国权力政治现实之中的继承者。

蒋介石不属于在西方留过学的人，也没有成为亲苏派，相反，去莫斯科最后让他成了反苏派。1886年他出生在浙江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说话时那种粗俗的口音始终没有改掉。他曾在保定军校和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时他加入了孙中山的政党，并在后来参加了革命。此后的十年里他时隐时现，有时候参与孙中山试图发动的政变，有时混迹于上海青帮这样的黑帮里。青帮是“tang”的前身，控制了各种非法生意，同时也支配了中国式的职业政治活动。蒋介石跟浙江的一位商界领袖陈其美建立了联系，陈后来成了孙博士主要的财政上的支持者。蒋介石还一度成为福建军阀的幕僚，他们时而是孙中山的盟友，时而是孙中山的敌人。

1924年蒋介石从莫斯科回来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他开始享有教师的威望，而学生对教师的忠诚度在中国是最高的。由于黄埔军校的任职，他得以控制革命军，因此成了国民党的主导人物。根据加仑的建议，他率领黄埔第一期学员接受对新军的首次考验，结果在对南部各省军阀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在这个时期里还形成了黄埔系的各种联盟，这使蒋介石有了一批亲信。他赢得忠诚和尊重的方法不像孙中山那样是通过政治上的启迪，而是通过其富于磁性的人格魅力。他身材修长，言辞简洁，面无表情，只是两只黑眼睛炯炯有神，警觉的目光仿佛从隐藏在面具后的内心直射出来。他的主要才干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上的，是他在各个派系和集团之间掌握平衡的过程中磨砺出来的，结果他

被称为不倒翁。

由于孙中山去世，约束没有了，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两派之间的分歧开始表面化，而蒋介石则成了右派的领袖。他和他的追随者想恢复全国的主权，而共产党及左派联盟则致力于社会革命。争夺党的控制权的内部斗争开始了，手段是小宗派、阴谋、逮捕和暗杀。

在纱厂和码头工作的中国无产阶级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对他们进行的革命努力导致了1925年的上海事件（即“五卅惨案”）。经过各种鼓动，对外国人的仇恨情绪传遍了华南华北，其程度超过了义和团运动以来的任何一次爆发。6月11日在汉口发生骚乱，骚乱遭到了更大规模的镇压，有更多的人死亡。在广州，由黄埔军校学员率领的工人、学生和士兵顺着沿江马路举行大规模示威。由于发生了一些挑衅举动，对面的英国和法国海军陆战队开火了。这一次有50人被打死，100人受伤。



蒋介石

之后在香港发生了对英国人的抵制运动，历时十五个月。一切都处于瘫痪，英国人损失数百万英镑，仆从逃走，货运和服务受到妨碍，这向每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昭示了他根本性的脆弱。跟义和团运动时期一样，内地的传教士受到骚扰和攻击，有些不得不停止活动或者逃走。这些传教士都居住在他们带有围墙的西式房屋里，在中国人看来他们跟那些领事、美孚石油公司及怡和洋行的买办一样，都是不平等条约的倡导

者。尽管传教士从事了医疗和教育事业，但是他们的存在更多是种对中国人的侮辱，因为其基础是这么一种假设，即中国的信仰是低劣的，应当丢弃，转而接受西方的信仰。

国民党在这种民众排外的怒火中看到了机会，并在1925年7月宣布自己成立国民政府。争夺成为孙中山继承人的斗争并未结束。现在的领导权由两个结成脆弱联盟的人共同掌握，这就是军事首领蒋介石，以及英俊的、口才甚好并曾在法国学习过的政治首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1910年，年轻的汪精卫曾因为企图刺杀摄政王而遭到囚禁。蒋介石不久赶走了他的盟友，并在1926年3月试图清除共产党，结果打了个平手。这个时期的活动仍然是革命性的。共产党在香港的抵制活动和组织农会、工会的活动中都很积极。以周恩来为首的政委式的政治顾问们属于黄埔军校的教员，他们的口号经常出现在墙上："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工站起来！""世界革命将拯救你们！""打倒外国文化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黄埔军校礼堂里挂着三幅反映外国压迫的巨幅油画：1842年焚烧鸦片的场面；八国联军1900年进入北京时枪杀或者用刺刀刺杀义和团拳民的场景，背景是燃烧的城门；还有就是1925年"五卅惨案"时外国人用机枪（实际用的是步枪）射杀学生、妇女和儿童时的情形。虽然这是宣传，但是反映了中国人内心对白种人的仇视，但是西方却很少意识到这点，或者不愿承认。

到了1926年春天，两广地区的两位进步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依附了国民党，这使得国民党有了基地，也有了北伐并夺取全国权力的实力。在此后的二十年里，李宗仁和白崇禧跟蒋介石一直联系在一起，其关系是中国那种特有的时而敌视、时而联盟的关系。孙中山曾多次试图发动北伐但未获成功，现在这个时机来到了。作为北伐第一阶段的目标，战斗首先于1926年7月在长江江畔的三个大城市进行，这就是汉口、南京和上海。国民党人的军队人数不足10万人，总司令是蒋介石，但是他对部队的控制并不稳固。他们的对手是各种督军的部队，人数超过100万。这些人从前都是对手，曾经在过去的某个时间里互相打过仗，现在由于遭遇危机而勉强结盟。这个联盟包括张作霖、吴佩孚和张宗昌。张宗昌是臭名昭著的山东军阀，据说他有"大象的体格、猪的脑子和老虎的脾气"，是"连望一望都很危险的"；此外还有孙传芳，他是江浙沪地区五省联军的总司令。在西北的是史迪威曾经服务过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和基督将军冯玉祥，他们都在观望和等待时机。对其他督军来说，阎锡山是个非常靠不住的盟友，而冯玉祥据称有意成为国民党人的盟友。

国民党士兵遵照革命的教导不骚扰或压榨人民，他们在最初几个月里顺利挺进，取得节节胜利。很多北方部队归附他们或者不战而退。他们在9月份攻克汉口，这正是史迪威到达中国的那个月，10月份他们打垮了吴佩孚的部队。蒋介石的第一军在江西遭到挫败，但在其他地方他们像滚滚洪流，继续向北面前进，直指南京和上海。道路畅通无阻，因为已经厌倦了压迫的人民对国民革命军抱有希望，对他们热情接待。国民党能够轻易取胜并非由于其军事力量，而是由于他们允诺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当国民革命军进入距离上海100英里（约160千米 ）的杭州的时候，成千的人带着笑脸夹道欢迎这支装备很好的部队列队入城。过去还从来没有士兵受到过百姓的欢迎。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当时就站在欢迎的人群中：“我的心脏剧烈挑动，欣喜若狂……中国现代部队又有了好名声。”他的感觉证实了蒋介石的断言：“我认为赢得这场战争三分靠打，七分靠宣传。”

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移到汉口，那里由左派把持。在蒋介石正在向六朝古都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集中的时候，汉口正笼罩在热烈的、有外国人插手的反叛气氛中。鲍罗廷在后台操纵，是真正的领袖，实际主持的领袖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新的外交部长则是陈友仁，号称是国民党最聪明的人。陈友仁个子不高，聪明而刻薄，出生于西印度群岛，有部分黑人血统，受过西方教育，戴金边眼镜，穿白色鞋罩。他不会写汉字，几乎不会讲汉语，让他出名的是他一口文绉绉的英语并极端仇视外国人，而这一点不久就得到了应验。

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中，国民党的崛起引起了通商口岸社区和传教士之间的激烈争执：前者仍然把中国视为殖民地，而后者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存，主张捍卫中国的权利。传教士组织此时处于鼎盛时期，在1149个布道场所中有8000名新教传教士，这是天主教传教士数目的一倍半。如果这些传教士想消解中国的敌视，就必须跟外国的条约体系划清界限，然而这正是保护他们在中国地位的东西。传教士们受到国外自由主义杂志的支持，竭力为中国争取自主权，并认为自己的事业所涉及的“正是我们自己从大英帝国分离出来时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们让自己相信，由基督徒孙中山所缔造的国民党是个真正进步的力量，它将最终结束中国的内乱并给中国带来秩序。他们抨击商人和大使们所持的冷嘲的看法，通过给各种机构和自己的教会写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巡回讲演以及召开公开会议等形式为中国的权益呐喊。

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的看法自然得到支持他们的美国信众的响应。当

有2000万会员的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呼吁美国政府放弃不平等条约的时候，这代表了规模空前的为中国进行院外游说的组织。1925年，一些在中国有利益的团体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聚会。代表之一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燕京大学校长，后来是美国驻华大使。他呼吁美国带头“积极行善”，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争辩说，只有通过美国的行动才能改变各国同中国的关系。

这些活动激怒了那些维护通商口岸的人，因为通商口岸所依靠的就是不平等条约。他们认为传教士们正在恶毒地使用他们“巨大的影响力”。愤愤不平的通商口岸报刊指责教会团体在谈及中国的权利和愿望方面“粗暴无礼”，“多管闲事”，是在“喋喋不休”。

那些代表商业社区的“俱乐部人士”无疑认为，西方当然有权利竭力为任何地方的西方人的福祉和商业利益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中国人努力限制西方人的特权，这被视为“侵害了外国的权利”，同时传教士所展开的西方教育也遭到指责，认为这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并产生了一些不适合中国的思想。

通商口岸的吹鼓手布兰德（J．O．P．Bland）曾撰文说：“选举议会制和民主体制完全行不通，因为亚洲人的头脑无法理解这些东西。”这是实情，但是布兰德之流进而认为：因为民主是政府管理的恰当方式，而中国人认为民主体制不适合他们，所以，他们“显然是无法自理的”。

这种观点显然不能引起美国公众的共鸣。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民正在为自由而进行正义的斗争，而且想当然地认为，因为他们在争取主权，所以他们必然也是在争取民主。这只是西方的错觉而已。中国争取的东西有很多——权力、国家，有时甚至包括人民的福利——但选举和代表制，这些对西方人来说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却并非中国人的目标。

美国政府与其人民一样倾向于支持中国的权利，至少理论上如此。但是美国并没有任何作为，因为根据它所奉行的政策，只有中国出现了稳固和负责任的政府时美国才能放弃治外法权。1926年，当根据华盛顿会议承诺而成立的两个委员会在北京和上海开会审查关税自主和治外法权问题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政府。国民党仍然有名无实，那些北洋军阀在最后一年跟不同舞伴表演完方舞之后，北京督军们的傀儡政府实际上已经解体。张作霖和吴佩孚组建的摄政内阁没有得到各通商口岸签约国的承认。这些国家因此可以宣称，放弃通商口岸特权的时机尚未成熟。

1926年是“积极行善”也就是主动放弃的最后机会。通商口岸各缔约国并不蠢，它们做出了一些姿态。上海工部局中增添了一些中国成员。关税委员会同意应当在1929年的一个确定日期前将关税自主权归还中国。然而治外法权委员会得出了意料之中的结论：要放弃治外法权，中国必须在建立合理的司法和行政程序方面有所进步。报告在1926年9月公布，当时国民革命军正在挺进汉口。这之后不可能再有自愿放弃的选择了，中国开始不经商量就收回主权了。

10月份陈友仁宣布准备对外国人征税。各公使馆都感到恐慌，认为除非对此极力抵制，否则这将是在中国通商口岸特权的终结。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政府无法就联合行动达成一致。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愿意对一个正在迈向主权的人民使用武力。尽管过去他们没有准备放弃自己的特权，但他们也并不准备为了维护特权而使用武力。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蒋介石在誓师大会上讲话

这一次领先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在一份申明政策的圣诞节备忘录中，英国表明了其结论。该备忘录号召各国认识到中国要求更改条约的“基本公正性”，并满足“中国人民的合法诉求”。随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美国终止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与中国订立新的条约。美国把中国革命等同于他们自己的独立革命。根据《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报道，国民党所代表的“精神

不亚于激励乔治·华盛顿部队的精神”。总体上，美国报刊［《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总是个例外］并不认为赤色威胁是个值得担心的问题。“蒋介石的部队跟在福奇山谷（Valley Forge）的华盛顿的部队一样是赤色的。”纽约的《世界》（*World*）杂志这样认为。考虑到共产党的出现，这显然有些轻描淡写。受到有利于中国倾向的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历史上第一次转向对赤色威胁采取了轻描淡写而非夸大的态度。

驻扎在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感到了这些事件带来的震动，但对此并没有过分担心，因为美国的政策禁止其部队卷入中国内政。第十五步兵团驻扎在租借区，营房是三层楼的砖房，对面便是操场。其军官照管团队事务，喝茶，晚餐舞会，或者参加赛马俱乐部打马球；这里的士兵患性病的比率是美国陆军平均水平的3倍。该团周报《岗哨报》（*Sentinel*）的“国内”栏目是发布有关美国消息的。这份报纸如果在驻美国某个团队发行，其内容也无须改变。

天津位于河流入海口上游60英里（约96千米）的地方，是华北的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跟上海一样，这里的租界也是由英国人提供的锡克人负责维持秩序的。租界对中国人并非没有好处，在军阀混战时期，曾经有两位总统、一位总理以及26位省长在不同时候到这里避难。租界的主街道在不同地段被命名为威廉德皇路（后重新命名为伍德罗·威尔逊路）、维多利亚道、法兰西路和意大利道。美国过去在这里并没有租界，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接收了原德国租界的一部分，大约有一个街区的大小，现在称为美国区。除了兵营，这里还有驻军医院、服务俱乐部，以及娱乐厅。娱乐厅反映美国的潮流，每周要放三四部不同的美国电影。史迪威上次在中国时有意不去天津，他指明要一幢中式房子，结果却气恼地发现这里只有西式房屋。他只能接受一幢“可怕的三层楼房”，里面有各种繁复的陈设，位于英国租界马场道242号。

第十五步兵团的一个营曾经在1900年镇压过义和团，但这个团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才在中国驻防的。这个团的常规编制是三个营，其中一个营留在了菲律宾。在中国的两个营总计有50名军官和800名士兵，这要略少于英国和法国派往天津的部队，大约跟当时日本派遣的部队相当。第十五步兵团的团训是“能干”（Can Do），这取自洋泾浜英语[1]，根据团手册，其意思是“完成使命之能力”。在完成一年的训练之后会举办一个“能干周”比赛，包括田径、射击、骑马及运输表演，并颁发很多奖杯和奖章。日常勤务主要是军士负责的步枪和机枪练习，通常

时间很短，一般中午就能结束，野战训练也很少，因为可供操练的场地很有限。这个团在天津东南85英里（约136千米 ）处还有一个分队，是为了守卫北京——奉天铁路线上的铁路修理站；在海滨靠近山海关的地方有一个夏季训练营；还有一些当过骑兵的军人乘坐东北矮种马巡逻。整个团由中国苦力照看，每个连都有个身穿着蓝长衫、头戴黑色瓜皮帽的杂役。中国苦力在野外训练时帮助军官支帐篷，照顾他们的膳食，并干各种杂活，有时甚至帮助士兵擦枪。士兵延长服役的比率很高，以至于陆军部对此甚为不满，因为据说这表明了“跟当地低级妇女同居”的情况，此话是脾气很大的（美国驻华陆军）总司令卡斯特纳（Joseph C. Castner）将军说的。他曾经愤怒地报告说：“只用几分钱就能买到各种女人、酒和毒品。”为了减少性病发病率，还专门配置了免费人力车以便在酒吧关门的时候把士兵拉回来。

团长是伊萨克·纽厄尔（Isaac Newell）上校，原来是驻北京的武官。他个头很高，头发花白，威风凛凛，具有典型武官的风度，在团里很受敬佩。他有个端庄的富家太太，这倒是符合第十五步兵团传统的。这些传统有些并不能让史迪威接受。按照规定的习俗，穿制服但未携带武器的军官“要佩带第十五步兵团标准制式的马鞭或者文明棍”。所有的军官和上士在值勤时都要佩剑。鼓励进行“经常的”礼节性拜访，以增进“团队精神和团结”。每逢纪念日要祭扫义和团阵亡军人墓。每个军官在任职期间都有一个月的队外勤务，以便在华北旅行。

1924年开始执行一项教授军官和士兵基本的汉语口语的计划。课程每周四次，每次一个小时。这个课程对军官是必修的，但对士兵是自愿选修的。所有通过考试的人都可以在袖子上别上一个绿色袖箍，上面用红色写着一个“中”字。因为“中”是“中国”的第一个字，在美军制服上别个“中”字有时让中国人大惑不解。这种语言教学的效果显然不佳，因为后来史迪威觉得有必要说服一个比较年轻的语言教官，让他给一些军士教授一些可以问路的汉语。这个军官就是能够说些汉语的廷伯曼（Thomas Timberman）中尉。

出于级别和声誉的考虑能干团设立了总司令一职，这要由一位由美国驻华陆军指派的准将担任。现在担任这个职位的是卡斯特纳将军。他时年60岁，是个精神紧张、有些不太稳定的人。他穿着邋遢，这在以着装讲究出名的第十五步兵团很不协调，而且他也不是西点军校毕业的。1926年，第十五步兵团的团部和美国驻华陆军总部合并，自这时起这个团开始直接由他负责。卡斯特纳很为自己的体格和善于步行而自豪，因

此对体格锻炼充满热情，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史迪威能够理解他的一个原因。此外，史迪威也是卡斯特纳从未与之吵过架的少数几个军官之一。卡斯特纳曾经在阿拉斯加广袤的荒野中担任过指挥官，因此他打算让这些只会喝茶的狗娘养的真正尝尝当兵的滋味，而且还要“把团里的胖子数量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共产党发动了排外攻势，在卡斯特纳和很多其他军官看来，北京的情况已经甚嚣尘上，跟义和团运动时差不多了；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最糟情况，他决心对团队进行充分训练，这样，一旦北京公使馆再遭到围困，他们就可以通过三天的急行军赶去解围。他向陆军部解释说，将来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他自己为了做好应付这种情况的准备，每天都坚持在天津跑马场步行锻炼。



1927年3月10—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部分与会代表合影，前排左五到左七分别是孙科、宋庆龄、宋子文，中排右三是毛泽东

在第十五步兵团服役跟在美国本土服役有显著的不同。按照美国陆军的传统，在举行野战训练后营地都要进行清理，甚至不会遗留一块马粪、一片土豆皮、一根麦草、一个罐头盒或者一根绳子，而厕所也会被填埋好。然而有一次邻近村庄的一群长者过来，他们礼貌地询问指挥官今后是不是可以不清理营地，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那里的垃圾。自那以后厕所就不再填埋了，垃圾也不清理了。部队离开几分钟后，这个地方就已经跟厨房的地板一样整洁了。

没有多少机会实践那些在利文沃思教授的练兵原则。因为这个团最

初的使命是保护北京的公使团，因此它被视为公使团的一个组织，1922年开始归国务院管辖。这个团所接受的命令颇为矛盾，那就是避免冲突。这不仅是为了避免麻烦，也是为了不妨碍中国国家的发展。这样一来，遇到危机时这个团在军事上是不能完成其使命的。一旦受到挑战，这个团只能虚张声势。在最近与北方督军对抗时它曾经成功使用了这种战略。1924年，吴佩孚那些一无所有和乱糟糟的部队开始涌向天津，从而引起了可能发生劫掠的恐慌。市政当局请求第十五步兵团帮助，于是这个团对敌人进行侦察，结果发现这个营多为伤兵，缠着绷带，年龄多在14到18岁之间，其全部供给是一驴车的罐子和毯子，还有一名骑在小马上的军官。第十五步兵团设立了五个岗哨，准备了大米、白菜和茶，用这些东西来换取这些绝望士兵的武器。就这样分散了这支部队的注意，并部分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为表示感激，市民给步兵团送来了一个白色的大理石牌坊。这个牌坊从此树立在美国租界里，成了“能干”团骄人业绩的明证。

第十五步兵团所面临的限度很好地体现在1925年到1926年给一名军官发布的命令中。当时报告说张作霖的部队正在向城外的限制区挺进。后来成了四星上将的马修·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上尉受命带领尽可能多的士兵出去“引开”张作霖的一支1.2万人的部队。他可以使用“吓唬、劝诫或者恳求”，但绝不许开火。考虑到这些限制，他只带了两个士兵去。他们骑着东北矮种马成天尾随行进的中国队列，然后回家，而他们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这种驻防本身充满了矛盾。1926年初卡斯特纳的前任威廉·康纳（William Duncan Connor）将军回国就任西点军校校长，当时他就建议撤回部队。康纳曾是工兵部队的智囊之一，并曾是西点军校的顶尖学生。在中国时，他通过对自己周围的观察发现中国有种“民族主义精神”正在发展。在谈及最近跟军阀部队的摩擦时，他指出：“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极为勉强地避免了冲突。”他敦促同时撤出所有外国驻军，如果这不可能的话，就单独撤出美国部队，“因为我认为，总体看来我们的继续存在损害了美国利益”。陆军部认同“最终从天津撤军是明智之举”，并周期性地跟国务院和公使馆讨论此事。但是从来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决定，因此这个团又继续驻扎达十二年之久，直到新的事态发展使得这个团变得完全无济于事。

在史迪威1926年来到天津担任营长期间，他跟一位对他的未来举足轻重的人再次相遇并建立了联系。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时认识的、现任第十五步兵团执行官的乔治·马歇尔中校。他们在中国的任职时间上只有八个月的重合，但彼此的关系已经从认识发展到了相互尊重。放在任何其他两个人身上，这种关系都可以称作友谊了，但是这两个个性封闭的人在这个时期却没有留下多少提到对方的文字，而且马歇尔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称为朋友的人。马歇尔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态度文雅而冷淡，跟所有人谈完话后都是冷冷的一句“十分感谢”，而且从不称呼他人的名字，也很少能正确叫出别人的姓。据第十五步兵团的一位士兵说，他是“整个陆军中最具军人气质”的人，难怪他受到潘兴的青睐。

史迪威一家到达天津两天后到马歇尔家喝茶，接着在那个星期又去参加“专门晚宴”。史迪威这时已经可以轻松地借用主人的大衣穿了。另有一次马歇尔夫妇举办晚餐舞会，其中一对受到邀请的夫妇迟到了。稍微等了一会儿后主人宣布他们开始吃饭。刚刚上完汤的时候门铃响了。男仆刚要去开门，马歇尔拦住了他。他亲自去开门，客人们听到他说：“真是很抱歉，不过晚饭都快吃完了。”然后门被重重地关上了。因为马歇尔自己没有孩子，他很喜欢史迪威的孩子，对他们很好，但是他对大多数成年人仍然很矜持，这让有些人觉得他“高高在上”。

在马歇尔看来（不知何故，这段时间史迪威的日记仅仅简单地提到手球），国民党人的北伐部队似乎可能“随时在某个月突然控制华北”（他在写给潘兴的信中这样说），而公使馆“可能要遭殃了”。就在他这样写的时候，在汉口以及位于长江更下游的九江，民众受到激进分子挑唆，夺取了那里的英租界。英国没有渲染此事，只是撤出其侨民，并准备增援上海的驻军。英国跟陈友仁商谈放弃汉口和九江租界，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英国第一次放弃租界。与此同时，那些强硬派却在他们的俱乐部里涨红脸咆哮着，大英帝国也为之震动。在其他地方，尽管传教士竭力表明自己的不同立场，他们跟其他外国人一样受到了攻击，并不得不放弃了很多边远地区的传教点。



张作霖与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康纳将军，1926年

正当蒋介石的部队向关键城市上海挺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那里组织了10万工人进行罢工和游行。尽管军阀孙传芳的守军竭尽全力并杀了100人，但仍然未能成功镇压。这些罢工和游行帮助国民革命党开辟道路并赢得战争。租界里的人又看到了革命的幽灵。通商口岸缔约国开始紧急商量对策。英国宣布派遣3个旅。美国不想再看到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因此只是很小心地把25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关岛转移到马尼拉，又经过了三个星期的犹豫才把部队派到上海。当蒋介石的部队到达郊区的时候，上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另外又有1500名美军和1500名日军登陆，以补充9000名英军和上海义勇队。外国居民已经做好了被围困的准备，雇用了成百名中国人挖战壕，布设铁丝网，并浇注混凝土碉堡。

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共有5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到来。指挥这支部队的是获得过国会勋章（Congressional Medal）的英雄史沫特莱·巴特勒（Smedley Butler）将军。他经历过从美西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陆战队的每一次行动，其中包括义和团围困公使馆的事件。

他向报界宣称，他的使命仅仅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性命，而不是保护通商特权。这种显得怯懦的声明立即招致其他指挥官的不满。在1925年到1928年中国处于动荡的时候，柯立芝总统任职时的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Frank Kellogg）坚决奉行这个原则。凯洛格是个自学成才的律师，曾是明尼苏达的参议员。他坚持认为，派往中国的美军不是为了保护国际租界区或者任何别的通商口岸特权，而仅仅是为了保护受到直接威胁的美国侨民。巴特勒将军拒绝让上海抱有任何别的希望。有记者问他，要派兵进入中国并镇压国民党人需要多少部队，他的回答体现了他强烈的现实感："50万，在第一年结束前可能还需要增派100万。"

3月24日，即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前一天，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并对外国人展开了一天的恐怖活动，在中西历史上这成了载入史册的清算日。这次行动是有意的，受到了暗中挑唆。士兵们在城里横冲直撞，一边大喊大叫一边四处射击，袭击外国人，抢劫并焚烧外国人的住所，杀了6名外国人，其中包括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John E. Williams）。其他外国人则到美孚石油公司所在的美孚山（Socony H ill，即栖霞山）避难。英美指挥官痛苦地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犹豫，然后决定开火驱赶袭击者，这样，这些外国人才得以从那里翻过城墙并逃到停泊在长江的军舰上。一位叫赛珍珠（Pearl Buck）的传教士太太跟家人蜷缩在一间棚屋里，这是她曾经帮助过的一个贫穷中国妇女的家。她一边听着外面残暴的声音一边想："旋风起来了……我正在享受苦果，尽管这不是自己种的……我们为了活命四处躲藏，因为我们是白人。"

经历了南京事件之后，传教士不可能继续伪装下去了。跟其他外国人一样，他们正在享受自己种下的苦果——这就是没有平等对待中国人。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通过电报迅速传遍中国，于是发生了更多的事件，外国人只能逃往江河的军舰上或者寻求通商口岸的保护。最终有2500人在上海和其他租界避难，另有5000人离开了中国。学校、大学、医院和基督教青年会被国民革命军关闭或者接收。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传教士又开始返回中国，但其数量从来没有达到南京事件之前的水平。

与此同时，通商口岸却为南京暴行而闹得不可开交，坚持要求采取"强硬"政策。公使馆敦促要惩办罪犯，赔偿损失，发出最后通牒和实行制裁，而且，如果这些要求不能执行的话，就计划采取惩罚性措施。问题是：不管是在那时还是之后，谁都不知道谁该为此负责，是那些据说跟蒋介石不和的地方军阀，还是国民党指挥官，抑或汉口的激进分

子？据说是这些激进分子挑拨蒋介石袭击外国人的，目的是想让他卷入纠纷。日本人相信最后那种说法。他们担心苏联人通过激进分子对中国渗透，并认为蒋介石所代表的集团是日本可能与之打交道的。美国公使约翰·麦克默里（John V. A. MacMurray）报告说："日本人正在对蒋介石采取公关，这似乎证实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麦克默里一贯主张采取强硬路线，坚持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坚决应对，则西方在东方的影响和利益将面临崩溃"。凯洛格则不想仓促行事，特别是现在上海的事态发展出人意料地表明蒋介石作为领袖应当受到外界鼓励，而非限制。他最终不但为中国带来了"秩序"，同时也带来了跟何人结盟的正确顺序。

在进入上海之前，国民革命军的挺进在通商口岸通常被认为是"长江的赤潮"。当时，外国人还不知道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严重分歧。完全受鲍罗廷和布尔什维克影响的汉口政府似乎处于主导地位。而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如果自己也想发展势力，那就要有财政收入和贷款，而这只能通过跟资本家结盟才可能。工潮、农民暴动以及排外骚乱使属于他们自己阵营的有产者以及他们需要其支持的有产者都感到恐慌。那些跟国民党共事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正在湖南的两百万农民中开展减租减息和斗地主的运动，而且毛泽东还说，不久在中国的大地上"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朝着解放的路上飞追"。蒋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持。共产党组织者在上海的无产阶级群体和工会中也同样活跃。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认为这个商业、银行和对外贸易中心的大都市绝不能像汉口那样落入左派之手。必须在上海进行决裂。



马歇尔

约有3000人的国民革命军在3月22日进城。这主要不是靠军事行动，而是因为城里进行了罢工，另外还因为已经没有士气的孙传芳部队四处逃散了。蒋介石乘坐军舰到达后，通过他的老关系跟商人和银行家进行了接触，并凭着他的承诺得到了一笔贷款。作为总司令，蒋介石已经把北洋军阀中的很多叛离的军官吸收进自己的部队，并让他们担任指挥官，其中很多人是他在保定军校的校友，他们无疑增加了他对付左派的砝码。通过特务他得知革命党人正在夜间收集军火，准备发动政变以

夺取控制权。正在此时，4月6日张作霖的宪兵搜查了远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所披露的文件表明苏联在鲍罗廷的指导下对中国事务的渗透程度。除了缴获文件，在使馆还抓到了19名中国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他们党的领袖李大钊。李大钊后来以叛国罪被绞死。

蒋介石进行了更加猛烈的一击。在4月12日到13日，他在青帮特务和法租界巡捕的帮助下，对左派展开了血腥镇压，对他们进行缴械并抓到了所有可能抓到的人，还杀了300多人。蒋介石的政变是个转折点，同时也是个再也无法回头的历史事件。他现在开始统一全国，但也埋下了分裂的伏笔，这后来导致了对他进行的报复。汉口把他作为叛徒开除了，但他倚仗自己掌握军权，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

现在，外国观察者发现蒋介石原来并不是红色的。正如凯洛格国务卿所惊喜地发现的，他“显然是个温和派的领袖”。因此美国的政策又后退了一步，转而不让蒋介石为南京的暴行负责。凯洛格拒绝了麦克默里坚决要求惩罚的主张，并提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原则，认为“领袖的特质在于温和和决断”。柯立芝总统也同样平和。在合众社的一次晚宴上他对记者们说，在革命的时候，要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并非总是可能的，并说他“坚信”一旦中国出现了真正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将对我们所承受的任何不公做出适当补偿”。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通情达理的情况，是因为当时的舆论并没有要求惩罚。美国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曾对法国大使说：“我们相信，这个国家总体上说完全反对采取任何制裁行动。”没有人出来进行煽动，把捍卫西方通商口岸特权变成一个政治事件。情况恰恰相反。博拉参议员宣扬说：“4亿被独立和国家完整的精神所激励的人民最终是不可战胜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它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

史迪威以及其他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却不能保持那么冷静。国民革命军已经过了长江，现在正在继续向北挺进。这时华北的外国人担心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也会在济南、天津和北京发生。史迪威是个总是喜欢把事情往坏处想的人。他在日记中提到了他的仆人是不是可靠，谈到了计划准备一旦出事立即逃往天津的租界，还谈到“因为冒险在这时候把妻子和孩子置于这种国家……而感到懊丧”。

北洋军阀的部队让人难以信任。吴佩孚没有跟已经被任命为北方大元帅的张作霖合作，而其他联合起来的军阀也常常闹翻，不肯彼此支持。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和其他外国驻军紧急商讨如何保护他们在北京的侨民，并建议把各国的兵力增加一倍。卡斯特纳向陆军部报告说，为了

保证铁路能够畅通，最好能使总兵力达到2.5万人。他提议说，预计5月抵达的下一班陆军运输船应当把马尼拉的部队运来，并把华北的美国妇女和儿童带回美国。日本把一个旅从大连调到山东青岛。巴特勒认为北方的局势比上海更为紧急，因此把一个整旅的4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上海调到天津。

海军陆战队配备有20架飞机和一定数目的轻型坦克，这是其他驻军都没有的，因此这在天津引起不小的震动，也让第十五步兵团很恼火。陆战队员们开始十分麻利地卸下野战炮、迫击炮、榴弹炮、机枪、筑垒沙袋、卡车、坦克、飞机以及成堆的补给。这时步兵们只能站着围观，尽管他们表面上满不在乎，其实怒火中烧。巴特勒警告说他不能容忍跟中国人发生冲突，还说“如果哪个海军陆战队队员胆敢动一个黄包车夫一根指头，这个人就要上军事法庭”。然而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随时准备去北京解围。他的卡车都加满了燃料，上面放好了机枪、弹药和十天的补给，随时可以出发。公路桥已经加固过，可以通行坦克。在白河河口修建了一个机场，巴特勒在天津和大沽之间飞来飞去反复观察。冬天的时候，他要求昼夜不熄火，以保证发动机的燃料随时可以用。有了这种种安排之后，一旦接到警报，一个营的兵力就可以十四分钟内乘卡车奔赴北京，而飞机则可以五分钟内出动。跟公使馆商量的计划是，一旦外国人遭到袭击，那么陆战队首先立即占领天坛公园，把那里作为外国人的集结点，然后再用卡车和飞机把他们疏散到沿海地区。

5月，形势更加紧张，这时国民革命军已经逼近徐州。徐州位于山东省界以南，是南北和东西铁路干线连接的枢纽。自古以来，徐州之战往往就是改朝换代的关键之战。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徐州者得天下。”现在驻守这里的是山东的魔头张宗昌，就是那个“看一眼都危险”的人。但是张宗昌在战事上还没有站稳脚跟。如果徐州失守，那么国民革命军就会进入山东，如果山东失守，那么这些南方的军队就到了天津的大门口。要不要现在撤出外国妇女和孩子？应该怎么计划？南方军会打到哪里？正如后来史迪威所写的，如果“他们（南方军 ）势头已过，把我们的侨民汇集起来送到海边未免有些不像样。但是如果不撤，我们在通商口岸遭到入侵，那么接着该怎么办？如果南京事件重演，谁会为此负责？”

美国公使馆需要首先对南方部队的实力做出可靠的估计，当然对北方军也要估计。那些记者、领事馆人员以及传教士的说法多不可靠，无法据之对形势做出判断。考虑到仇外情绪甚嚣尘上，这个使命很危险，

但必须要一个美国军人亲自去。这个人选不是美国武官约翰·马格鲁德或者他的同事，而是第十五步兵团的史迪威上校。史迪威了解中国并通晓汉语，以前曾经做过冒险性的旅行，精神顽强，除此之外他还具备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愿意去，尽管这样就要丢下四个孩子和即将为他生下第五个孩子的妻子。

到达徐州后，他必须亲自把自己的证件交给那出了名的恶魔张宗昌。张宗昌年轻时是码头工人，身高将近7英尺（约2.13米　），他的绰号叫“三不知”，指他不知道有多少钱、多少兵，以及多少小老婆。据说，他经常性维持的女人数目是42人，其中有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21名白俄人，还有一名邋遢的美国人，就是打仗他也要用两节车厢把这些女人拉上。另外他还有个绰号叫“老八十六”，即如果把86枚银币摞起来，其高度据说正好是他那个最宝贵的器官勃起时的长度。他有个奢华的衙门，里面有很多军官，吃饭时极尽铺张，佐餐的是香槟和白兰地，用的是一套比利时雕花玻璃餐具，共有40件，他吹嘘说光这套餐具就花了5万美元。他私人专列上还装上雕刻精美的上了漆的柚木棺材。他吹牛说如果他不能取胜，他就会躺在棺材里从战场上下来。不过他从上海撤出时确实是坐在棺材上，还喝得有点醉醺醺的。在他的统治下山东在1927年发生了大饥荒，不是因为发生了旱灾或者水涝，而是因为这个将军的掠夺。

史迪威在5月26日乘夜间火车赶往徐州。跟他一起去的是他的赵姓仆人，史迪威后来写道，如果没有这个人他可能就回不来了。“当赵的同胞都在叫嚷着要杀掉‘老毛子’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自找麻烦，甘愿冒生命危险，忠心耿耿地陪着这个外国人呢？”史迪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他承认自己敬重这个“勇敢忠诚的人”。在当时局势恶化的情况下，赵本可以自己轻易逃脱，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当火车隆隆地驶进山东的时候，史迪威看到了一些显示局势动荡的迹象。火车站停着一些插有安全通行旗子的马车供人租用，这表明当地已经没有安全可言了。这些车子实际上是流氓控制的，他们从车夫那里收取保护费。那些神情忧虑的村民正在加固自己的土围墙。“本来这里应该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争执不休，可是这时却是不祥的安静。”随着火车继续前进，他开始看到北方的士兵，“无所谓的样子，没有表情……编制混乱……看不出有任何组建阵地的迹象”。铁路机车“状况很糟……每个车库里都有几辆完全报废的机车”。

第二天天黑之后他们到达徐州，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士兵；他们的武

器各式各样，军阶也什么都有。醉醺醺的士兵以及这个军阀的骑兵队里那些愁眉苦脸的白俄士兵在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旅行者问路只会得到很无礼的回答，客栈里也都没有了房间。赵建议去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最终他们睡在了会长唐（音译 ）先生的家里。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徐州屡次经受战乱，已是“一片废墟”。被饥荒或者战火赶出家园的无家可归者四处露宿，食物供给已经快断绝了，街上到处是倒毙的人的尸体。“跟其他行人一样，我们从尸体上跨过去，然后继续赶路。”史迪威看到有15个盲人妇女排成一排走路，街上看不到别的妇女，只剩下几个老太太，女人因为害怕士兵都躲在家里。难民只剩下身上的破衣服和几个做饭用的罐子——他们“并不乞讨，只是坐在那里绝望地看着这个无法理解的世界”。这些难民只能分到一点点豆饼糊口，这是用豆子榨完油之后的豆渣压成的，史迪威注意到在中国东北这种豆饼是被打碎后做饲料或者用来喂猪的。这些难民过去也是辛勤劳作的农民，可是现在“他们的马车和牲畜被士兵征用，他们的家被拆掉当木柴烧，他们的妻女遭到欺负，他们的孩子可能已经走散了——这是中国战争最为可悲的一面”。面对中国这由来久远而又无穷无尽的苦难，史迪威带着理解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些情况，这跟他在美国时就社会问题所发表的那些陈腐的见解是大不一样的。

他未能见到张宗昌，于是便在城里到处转悠。“俄国骑兵”在街上奔驰；这些骑兵是这个军阀所珍视的辅助部队，很有威慑力。他们的军服是深绿色的，几乎接近黑色，黄色马靴几乎没过他们的膝盖。他们还带着各种武器：他们马鞍的槽子上插着顶端挂着小三角旗的长矛，木质枪套里放着长管毛瑟枪，此外还有大刀，样子像个大号斧子，捆在肩上一个帆布刀鞘里。这些士兵没有自己的国家，性情残忍暴烈，是“我看到的最凶恶的人”。除了约100名骑兵外，为这个军阀服务的还有涅查耶夫（Netchaeff）将军所率领的约3000人的一支俄国步兵旅，这支部队有4列装甲火车。

在火车站停车场上，史迪威看见了200节车厢、20辆机车和3辆由俄国机组人员开的装甲机车。他努力想辨别士兵的番号并估计他们的数目，同时推测出每100人中大约30人配有步枪。在训练的队伍中一半有枪，还有一半没有。有个“吓唬人”的连队有200到250名士兵，其中20%的人不到4英尺6英寸（约1.36米 ），很多还不满14岁，都很脏，有的还光着脚，总共有50条步枪。“如果这些乌合之众上了战场，即使再富于想象力，除了想象他们逃跑之外别无可能。”一个人向他透露说北洋军阀的兵是不肯打仗的，他们都害怕“红枪会”。这些小股的抵抗力量是农

民自己组建的，农民们实在无法忍受士兵的骚扰，因此成立了红枪会，袭击他们能够对付的小股士兵。红枪会杀人毫不留情，留下的伤口往往会让受害者死前还要受三四个小时的罪。

食物越来越少。赵四处寻找才弄到一些罐头食品。正在准备进行大规模调遣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史迪威继续在两个火车站和停车场观察，清点枪炮数和口径大小，记下运兵火车的情况，并想从这些混乱的情况中“揣度”出张宗昌想干什么。他从士兵那里了解到，有些部队已经五个月没发饷了，有的甚至一年没发了。他们的补给就是馒头、大米和水。他听说冯玉祥已经占了郑州，这是东西铁路线西边的大站。这个消息是真的，而且很重要。

在去莫斯科待了一年之后，冯玉祥再次统率“国民军”——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部队，有20万人，是冯玉祥在陕西创建的。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战略中，这支部队属于中国革命军的北翼。跟这支部队会合是国民党的重要目标，但是冯玉祥是会选择汉口的共产党和左派联合政府还是选择蒋介石，这还是个未知数。史迪威竭力想了解变化不定的冯玉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可以背叛任何人——他完全是为自己的。”但是，他同时承认冯玉祥是个“真正的战士”，他“从来不许他的部队扰民”，并说如果中国能有10个像冯玉祥那样的指挥官，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汉口方面和蒋介石都在协商与冯结盟，这时冯玉祥由于北洋军阀几次不能履行承诺便攻占了郑州，这使得那里的北洋军撤退到黄河以北，从而使得徐州失去了屏障。这种情况迫使张宗昌撤退。

史迪威赶紧奔向电报局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公使馆，可是太晚了。电报局已经关闭，发报员也逃跑了。第二天，也就是他在徐州的第四天，情况已经毫无疑问了：北洋军正在撤退。根据他的计数，在半小时里共有六列火车离开。一旦他们走了，南方军就会涌进来，那时也许他们会用私刑处罚一个外国人。史迪威现在的目标是跟赵尽快离开这里。部队的火车停在站台上，但是不让他们上去，他们又试图挤上一辆塞得满满的运兵车，但是被赶了下来。他们想用钱活动，可是没用，因为这些兵都急于离开，不肯让出自己的位子。当火车离开的时候，史迪威感到周围士兵的恐慌情绪正在增长。“他们的军官何时能把他们从这里弄出去？……现在已经很难控制了……每个人都凶巴巴的。”这些士兵挤上了其余的车，“来晚的拼命爬上去，随便什么地方都行——有的在上下车的梯子上，有的在火车连接处。很多人后来被甩下去……”正在他看着的时候，一个人掉在了开动的火车轮下，只能等死了，“没有医生，没有任何

救助，只有一群苦力好奇地挤在他旁边看”。

现在要跟北方军离开已经太晚了。他怎么办？走路？能不能走到在西面约50英里（约80千米　　）的冯玉祥那里去？但是在这中间有红枪会，而“他们是不会优待我们的”。往东是更多的红枪会，“还有俄国人，而我怕俄国人”。唯一的办法是坐等南方军来到这里，“而他们跟俄国人一样让我恐惧”。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唐先生声称自己同情南方军，并建议他们留下，说这样比离开安全。

在火车离开后的两天里，“这个城市在等待着，屏住呼吸等着下一波劫难的到来。……一个祸患走了，只是为了让位给另一个祸患？”北洋军的后卫部队经过了，他们到处开枪抢掠并大喊大叫，这更增加了夜间的混乱。他们之后是“一支残余的退却部队，状况很是可怜：伤病士兵挣扎着勉强跟着部队走，前面遇到红枪会必死无疑”。店铺都关门了，骡子卖到300美元一头，而食物根本就没有人肯卖。到了晚上“一片喧闹，一个警报器发出刺耳的声音，那些士兵一边喊叫着一边开始用野战炮、步枪和手枪射击。有几颗子弹嗖嗖从我们这边飞过”。一架飞机飞过上空并扔下几个炸弹。那些在后面躲在装甲火车中的俄国人是最可恶的。他们开着架设机枪并在尾部架设舰用火炮的火车来回走，“通过射击吓唬人，然后把能搬动的东西全都偷走了”。有些农民拆掉铁轨试图阻止这辆火车，这些俄国人就把最靠近破坏点的“全村人都杀死”。史迪威每天都在停车场观察，他看到另有一个孩子兵被火车碾过，躺在一张席子上等死。他心中充满了对中国麻木不仁的愤怒和同情，并为了发泄狠狠地说：“在这里过上一个来月，你就恨不得想用绣花针刺他们的睾丸了。”



冯玉祥和蒋介石在北伐战争南口战役阵亡将士周年纪念仪式上，1928年7月9日

6月2日早上唐先生进来说，国民党部队到了。这支部队军纪良好，不打人，也不抢劫，但是赵还是坚持要史迪威隐藏起来。周围的人都知道唐先生家住着一个外国人，因此史迪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把他

在这里的消息报告给士兵。他想象会有一支小部队破门而入，大声叫嚷着要这个外国人出来，因此史迪威竭力想别的事情。他躲在这里除了画画无事可做，过了四天便受不了了。“必须做点什么，唯一可行的看来是步行到南面去。”次日“为了不让自己发疯”，他花了半个小时在一只木马上跳来跳去，最后他认定“无论如何要离开这里”。唐先生的态度现在已经变得冷淡了，也许他已经后悔自己留下了这个外国人。躲到第六天的时候，赵最后同意做一次冒险。他们走出去想跟南方军的士兵认识认识。这些人“都乐呵呵的，多数是不到16岁的孩子，都是些肩头窄窄的小矮个儿，体重很轻……所有的士兵都接受了亲美宣传的灌输。他们认为美国会积极帮助他们”。城里到处都挂着国民党的旗帜和欢迎的标志，商店重新开业，妇女又开始在街上露面，木匠忙着修理各种破损，但是已死的和垂死的人仍然躺在弄堂里，而难民居住的临时性棚屋里仍然充斥着饥饿、肮脏和疾病。“这个城市的现状让人触目惊心。”

国民党部队不像史迪威他们想象的那样凶残。史迪威决定南下去上海。北洋军队把所有的机车都开走了，不过有消息说次日又要开出南下的火车了。跟那些疯狂拥挤着要登上火车的人群一道，他和赵通过一番拼搏，忍受着重重的大蒜味，总算上了车。接着他们在焦急中过了三个小时，旅程中又经过了让人焦心的各种停车和延迟，他们终于在凌晨3点到达蚌埠，这里距离可能有外国军舰的长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乘客都被清下车，显然火车不会继续南下，他们就在黑暗中被撂下，只能站在站台上。

接着的一天半陪伴史迪威的是一种让他感到恶心的恐怖。他和赵又饿又渴，被困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南下的火车从这里经过。他们不敢去问，因为担心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也不敢去寻找食物或者水，因为担心会错过火车。他们担心要一直等到天亮，那时会有更多的人到来，而且那时史迪威会更显眼，但是他们别无他法。在早晨6点的时候有些火车被拉到南去的岔道上。他们跟新来的一批人一起挤上去，同时还要竭力不引人注意。他们在一辆旧的运煤车上找到了位子。史迪威感到其他旅客的目光都在投向他，觉得随时都会有人叫喊“老毛子！”，或者会有一个卫兵或者官员过来带他出去检查。车厢里非常热，里面堆满了“鸡蛋壳、鼻涕、葵花子、茶叶、水、痰、瓜皮以及其他各种中国佬喜欢扔的脏东西”。混迹于这些“不住地吐痰、咳嗽、打嗝、抠鼻子、咂嘴和哼哼唧唧”的人当中本来已经够糟的了，更糟的是他们还窃窃私语或者不断打量史迪威。他和赵越来越感到饥渴难当，但又不敢到站时下去，因为害怕下去就上不来了。

终于来了一个可怕的警官，“是个恶狠狠的苦力，大约暂时得到了点权力”。他搜查史迪威时发现了手枪，于是得意扬扬，拿走手枪向乘客们展示，好像他抓住了一个企图刺杀蒋介石的罪犯、叛徒和刺客。其他人开始小声议论起来。“我们该拿他怎么办？把他带出去枪毙。”被缴了械的史迪威感到，除了赵之外，四周一片敌意朝他袭来。到了下一站这个警官下去报告去了，这时敌意开始变得更加明显。有人用伞戳他，有人把茶水倒在他腿上，还有人往他背上吐唾沫。他突然恍然大悟：“他们想让我做出反应。他们想让我反抗。”这样他们就有了进攻的借口。最后他可能被谋杀。“赵警告的眼神证实了这一点，他慢慢地摇头暗示我‘不要反抗’。他吓得要命，不过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戳人以及别的侮辱人的花招仍在继续。史迪威怒火中烧，但是他竭力控制住了自己。在停车的时候这群人开始争论是“把我们拉出去枪毙呢，还是到浦口把我们交上去”，浦口是最后一站。赵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赵说：“对，把我们逮捕，把我们交给浦口当局。我们要求这样做。这个外国人很有势力，任何伤害他的人都会有大麻烦的。”他们骂赵是外国人的走狗，但是还没等他们采取行动，火车又开动了。赵想到一个办法。他要求把他们送到蒋介石那里。“我们要向他告状，我们会把一切都向他报告的。”各种侮辱和戳弄史迪威的动作停止了，但是他们还是威胁要在浦口将他逮捕。

史迪威不想让他们有机会实施他们的想法。当火车驶入与南京隔江相望的浦口的时候，他和赵在车还没有停稳时就跳下了车，推开那些吃惊的人们朝江边跑去。他们感到后面有人紧紧追着他们，但是不敢回头看。他们爬上一条渡船，渡过江之后他们放慢脚步，开始找住处，到处都有人向他们投来怀疑的目光。钱终于打动了一个开旅馆的人，尽管害怕，他还是同意给他们一间屋子。他们又累又渴，开始一壶又一壶地喝着茶水。史迪威伸手还想要茶水，结果难为情地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紧张的气氛并没有缓解，因为听说有个洋鬼子来了，有一群人正聚集在街上。史迪威又开始担心可能被抓住或者会被施以私刑。由于担心，加上有臭虫和跳蚤，结果他没睡多少觉。早晨他们又冒险在街上走，不过顺利到达火车站，并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这段行程燥热而紧张。到达后，他们看到墙上有幅巨大的宣传画，画的是一个肥胖而又可恶的外国人趴在地上，中国士兵把刺刀刺进他的身体，鲜血四溅。画的解说词鼓动所有的爱国者都来杀死那些外国猪猡。

通过出口以后又经过了一个岗哨，史迪威终于看到广场对面象征着安全的公共租界铁丝网，距离只有100英尺（约30米　　），只要走半分

钟。“我们穿过广场时脚上仿佛绑着50磅（约22千克　）的东西，接着走过了铁丝网……终于站在我们自己人这边了。”一个舢板把他们送到停泊的“匹茨堡”（Pittsburgh）号巡洋舰上。船头有个海军陆战队员站岗，“我，一名陆军军官，真想张开双臂好好跟他拥抱一下！”

在史迪威回去后提交的报告里对南方军给予了好评，这充分说明了史迪威在军事上能够保持其客观性。他说南方军的士气高，纪律性和信心也很强，他们很乐意服从命令，不抢劫东西，受到民众欢迎，其证据就是妇女又开始出现了。连级军官都是18岁到22岁的学生，他们很有决心和信心，与军阀部队里的那些“废物”大不相同。军阀部队的那些连级和营级指挥官都是些没有受过教育的苦力。尽管跟北洋军相比南方军装备较差，但是，如果打仗南方军肯定能够击溃那些督军的“乌合之众”。不过史迪威预计，由于缺少机车，南方军难以在徐州以北作战。他们没有把机车带出长江以北，物资运输只能依靠人力车和牲畜，但是，一旦他们可以使用铁路了，他们就会向北挺进，不大可能遇到顽强的抵抗。张宗昌的部队除了那些俄国人外都没有什么战斗力。“我认为，如果南方军进行一次坚决的进攻，那张宗昌必然溃败。”

在美国公使馆里，麦克默里对这有关局势的第一份权威报告表示欢迎。他听着史迪威的叙述并读了他的报告，对他“勇敢无畏的个人品质”表示“极为钦佩”。卡斯特纳将军正式表彰他“极高的效率、军事智慧、超群的决心和勇敢的举止”——但还不止这些。这个头脑有些混乱的人倒很能够欣赏史迪威真正的过人之处：“跟战友一道时表现勇气往往可以被人看见，但任何人要完成像史迪威那样的使命都需要一种更高的勇气——要孤立无援地近距离接触两支相互敌对的中国部队的几百名无知的、对外国人充满敌意的中国人。”史迪威也许是唯一可以完成徐州使命并能安全回来的人，因为他兼备了必需的军事知识、对中国的了解和“更高的勇气”。

史迪威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他的第五个孩子本杰明（Benjamin，昵称“本”）是在他回来一个月后的7月出生的；他后来一直对这个孩子疼爱有加。9月份的时候他到韩国和日本度过了三周的休假。他在韩国爬山，经过一个又一个清澈的湖泊，“跳进水里……光着身子坐在石头上吃午餐”。在日本他很喜欢在京都转悠，吃饭，聊天，四处看，购物并收集东西。回到中国后他得知，正像他预计的，北伐军在徐州停下了。除了缺少机车，这支部队还受到其他问题的困扰，结果在1927年没有继续北进，而且在这一年里差点儿因为派系斗争而崩溃。6月份，冯玉祥的

依附使得蒋介石占了上风。饱受教条之争困扰的汉口政府又因为共产国际的不适当的命令而分裂，结果国民党左派跟共产党分道扬镳。当汉口的军事组织、号称“铁军”的张发奎转而继续独立并回到其家乡广东的时候，到处是废墟和恐惧的汉口政府解体了，而革命统一战线也就此结束了。共产党不肯放弃，在江西省首府南昌建立了一个短暂的政权，发动了一次军事行动，失败后便退向更南面的广东，在建立广州公社时做了最后的努力——进行了三天流血斗争。由于受到蒋介石部队的追击和打击，其残部退至江西和湖南的农村，试图寻求最后的落脚点以生存下去。

蒋介石已经不像开始那样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了。由于他跟资本家结成了联盟，他不得不发动攻势展开对共产党的镇压，而镇压越来越带有白色恐怖的意味。搜查、没收、出版审查、随意逮捕和处决，很多人开始时相信国民党会带来好日子的承诺，但他们现在感到恐惧和失望。赋税很重，军队跟过去一样无处不在。国民运动也受到妥协和争权夺利的污染，已经跟袁世凯当权时期以来的任何势力都没有多大差别了。

由于再次受到汪精卫及其左派的挑战，同时由于8月在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蒋介石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辞职并前往日本等待召回，以显示他是不可缺少的。各种分裂和混乱开始填补这个权力真空。汪精卫和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在广东另立政府。但是由于时局所迫，11月他们向蒋介石发出邀请希望他回来。12月，当各方正在协商统一事宜和条件的时候，蒋介石通过跟宋美龄结婚而增强了自己的地位。宋美龄是宋子文和孙夫人宋庆龄的妹妹，其自身也是一位非常出众的人物。

宋氏兄妹出身于富裕的上海基督徒家庭，受过西式教育并对孙中山博士十分崇敬。他们母亲一方信奉基督教已有三百多年，属于耶稣会最早感化的一批人。他们的父亲宋耀如（查理宋）是孙中山的朋友和支持者，在美国长大并接受教育。他回到中国原是为了传教，但却积累了大量家产，在法租界建造了带有规整的花园和一个网球场的漂亮洋房，并生了六个孩子，所有孩子都在教会学校和美国大学接受教育。大女儿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孔祥熙是个银行家，毕业于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出身于山西一个殷实的世家，据说是孔子的嫡传。第二个女儿宋庆龄成了孙中山的第二任妻子和遗孀。最小的女儿宋美龄毕业于卫斯理大学，但像慈禧太后一样渴望权力。三个女儿都聪明漂亮，而且跟日本妇女适成对照的是，她们与很多中国妇女一样意志坚强。

蒋介石对这些资产兴趣颇大，据说在孙夫人守寡后蒋曾经通过中间

人向她求婚，遭到拒绝后他把注意力转向宋美龄。为了赢得她，蒋介石安排好了两任前妻并在宋母的坚持下皈依基督教，这样做的一个附带结果是他从此永久性地获得了传教士方面的支持。1927年12月1日，他们先在宋家举行了一个基督教家庭婚礼，然后又在大华饭店舞厅举行了公开的西式婚礼，来宾有1300人之多，包括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Bristol）上将和外国领事。婚礼现场挂着巨幅孙中山画像，两边是国民党党旗。那里布置了几十名侦探和保镖，上面是钟形的玫瑰花天棚，仪式由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主持。陪侍的是四位穿着桃红色软缎的女傧相和两个穿着黑天鹅绒外套与白色缎子马甲的男童和女童（孔祥熙的儿子和女儿），由宋子文把妹妹交给蒋介石。此时一位男高音唱起了《啊，答应我》，而摄像机将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蒋介石现在的地位已经坚不可摧。1928年1月，他重新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因此也就成了在重组并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首脑。由于宋子文通过其各种经济关系重新得到了各种财政支持，4月北伐又重新展开。

在北方，吴佩孚已经退出联盟，现在张作霖成了通称为安国军的军阀部队的大元帅。张作霖在12月宣布自己为执政官，他也传染了袁世凯的病，有做皇帝的野心。他的椅子像皇帝的宝座，两边是两只栩栩如生的用虎皮填制而成的老虎。他任命了一个礼部负责有关宫廷礼仪，召来工匠制作了皇家专用瓷器，还仿效皇室的规矩，一到某个城市便封闭街道，商铺窗户放下，人行道上还洒上“金沙”。有一阵子满清贵族和遗老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是尽管张作霖对中国影响甚大，但他并没有登上王位。

1928年1月，由于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司令部出现纠纷，根据卡斯特纳将军的要求，史迪威被调往总参谋部担任总司令的代理总参谋长。当年7月任命正式通过。卡斯特纳将军与纽厄尔上校以及其他军官，包括他的总参谋长的争执愈加激烈，根据史迪威日记的记载，有阵子卡斯特纳出现了幻觉，面临“精神崩溃”。奇怪的是，史迪威在这里成了一名调和者，他是这个精神混乱而难以相处的指挥官所唯一信赖的人。他古怪的专制做法导致了更多不满，而且由于他坚持练兵时的行军速度要超过常规的每小时2.5英里（约4千米　），结果又爆发危机。每年两次他自己在前面带队确定速率，带领整个团的部队急行军，连军官也要下马参加。虽然他从来没有达到他三天走100英里（约160千米　）的目标，但却曾成功达到10小时里走35英里（约56千米　）——当然代价沉重。精疲力竭的士兵踉踉跄跄地走到终点，有些拽着或者背着自己的战友，他

们不想让一个士兵掉队，以免让卡斯特纳看笑话。团里的很多人认为，卡斯特纳行军的用意是想让性情平和的纽厄尔掉队，但是他从来没有掉队。自然史迪威也毫无问题地通过了。



宋耀如一家全家福，1917年

当纽厄尔上校以及其他人想通过指控卡斯特纳精神有问题而使他离职的时候，卡斯特纳请求史迪威为自己作证。在史迪威后来任职期间，美军驻华陆军司令部的混乱并不亚于中国的混乱。马歇尔已经走了，他于1927年5月回国担任本宁堡步兵学校（Infantry School at Fort Benning）的副校长和教学主任——他在那里对课程和教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马歇尔想让史迪威担任战术科主任，其重要性仅次于他自己的职位。马歇尔一直保留着这个位子，直到史迪威可以回国接受此职位。

1928年5月，史迪威晋升为中校，《岗哨报》表彰他是“整个驻华美军最受欢迎的军官之一”。他被视为步兵团的中国问题专家，并已经开始

担任教师的职位。除了担任语言学校校长的职位外，他还每月在娱乐厅介绍中国局势。有位听众印象深刻，说他是个“聪明犀利的”演讲者，对中国的纷争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对《岗哨报》的影响。这份报纸在一个陷入痛苦的国家出版，最终它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身处的环境，在头版开设了一个每周一次的专栏，这就是史迪威的“中国局势中的重要人物”。这个系列所反映的事件是通过当时一位驻华美国军官的视野来看的，这个军官自己就得应付这些事件。尽管由于当时距离太近而未免对历史有些曲解，但是同时也避免了事后观察所造成的曲解。

史迪威的专栏系列在1928年1月开始，开篇是谈张作霖的。史迪威认为张作霖的前途并不光明。在1928年1月到6月这局势变化不定且影响深远的半年里，史迪威每周都要写文章，其观点更接近公使馆那种对国民党采取的冷眼旁观的态度，而不像国内某些美国人那样采取“情绪化”的态度，史迪威认为国内那些人不了解中国，也误解了革命。

史迪威对“老百姓”本来就关注，在文章中他谈到人民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生命和财产没有保障，铁路被损毁，商业凋敝，土匪猖獗，经常发生饥荒，“没有一个省份……能尊重人的权利”。在国家面临危机时被认为会出现的“英雄”尚未出现。两个月后，在1928年4月有关蒋介石的文章里，史迪威认为他是个派系首脑而不是党的领袖，不过他可能会在中国重整乾坤。他敬佩蒋介石的“决心和精力”，并认为如果蒋介石胜了，“那主要归功于他自己的计谋”。然而蒋的北伐“更像一次示威，而不像一次战争”。北伐进展顺利，因为没有领到军饷的北洋军已经“闻风而逃”。

史迪威通过自己的观察总结了中国战争的基本原则。他说山东军阀张宗昌将名垂青史，因为他是最擅长“战略退却”的人。战略退却后来也让史迪威经受了很多挫折。这跟西点军校由马汉和潘兴所建立的进攻作战原则相反，反映了根本的文化冲突。

1928年5月，突然爆发了严重的外国干预事件，而史迪威很快意识到了这件事对未来的意义。国民革命军现在继续向北挺进。当他们沿铁路线从徐州向山东省会济南前进的时候，日本人指责他们袭击日本侨民，并从先前登陆青岛的5000名日军中调派2000人前来“救援”。双方发生了几次冲突，互有死伤。在此过程中，日本人为了挑起报复并制造公开对抗“事件”，杀害了国民党驻山东外事专员及其妻子以及其他14名军官。这场冲突之后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革命军撤出济南。

中国可能统一并将民族主义情绪蔓延至东北的前景让日本感到担

心。田中义一（Tanaka　Giichi）男爵当时是日本的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田中奏折”即便不是他起草的，肯定也是受到他影响的。这个用他名字命名的著名计划阐述了关于日本前途的军事构想，这就是通过逐渐渗透“满洲”、蒙古、华北、全中国以及东南亚而控制整个亚洲。蒋介石无意对此进行试探。当时日本有6艘军舰、8艘运兵船和11艘装满军火和补给的船正停靠在青岛。蒋介石尽管自视为了不起的将领，但是他还不至于以为自己的部队可以跟日本的现代化部队抗衡。他紧盯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北京和全国统一。他谨慎地绕过山东从而得以保全自己的部队，渡过黄河，然后从西边向北京挺进。但是中国人民可不会那么容易就对日本的行为忍气吞声。日本对中国国民自尊“不可忍受的侮辱”再次激发了早期山东事件所导致的反日情绪，加上各种宣传画和口号的鼓动，又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抵制日货行动。

史迪威在5月11日《岗哨报》的专栏文章中认为，济南局势“可能是多年来最为危急的”。他对那些煽动反日情绪的做法毫不同情，因为他认为这无助于最终解决问题。他认为，即使所有的中国派系都团结一致，“他们也无法对付日本这样高度组织化的大国”。他写道，中国人“对中国人自己施加的再严重的不公正和残酷做法都会处之泰然”，但是一旦出现涉及外国人的纠纷，“每个街头就都会出现一个雄辩的爱国者慷慨激昂，大声叫嚣，谈及外国人的压迫和中国人的权利”。他指出，日本一旦被激怒，那么他们可以不费什么事就占领天津到上海的战略要地，并控制铁路线和长江——十年后日本的确这样做了。史迪威认为，济南事件将会导致“后果更为严重的事件”。

没出一个月就发生了第一个事件。北洋军的抵抗被瓦解后，张作霖觉得自己的皇帝梦破灭了，他必须捍卫自己的地盘——即便他在北京待的时间并没有太长。他乘坐自己由20节车厢组成的私人列车退回到东北，车上装满了他的私人财物，私人专列后面是京奉铁路上的大部分车辆。连续三天各种机车、客车、公务车、豪华卧铺车以及装满士兵的货车源源不断地驶出天津站。他的撤离留下了权力真空，于是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和其他驻军只能承担防卫任务。6月4日，当走在最前面的火车已经接近奉天的时候，火车被一颗炸弹炸毁，张作霖被炸死。毫无疑问是日本人除掉了他，这或者是因为日本人担心张作霖会跟蒋介石合作，或者是因为张作霖拒绝按日本人的要求跟日本合作。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在当时，日本人的盘算落空了，因为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在几个月后刺杀了两个有名的亲日派官员，并在东北举起了国民革命军的大旗。

北伐军终于到达北京，实现了目标。在与守军交接后，国民党在7月3日正式接收了首都。向公使馆区挺进时，四周都是漠无表情的旁观者。按照一位观察家的说法，是种“可怕的沉寂”。跟高大的北洋军相比，蒋介石的部队“显得身材矮小而且饱受战争的煎熬”。他们同时夺取了天津，当时天气酷热，在树荫处的温度都高达111华氏度（约43.8摄氏度 ）。美国领事报告说，之后几天是各种谈话，大喊大叫，各种奇怪又复杂的政治委员会和政府机关的干涉，“而我们也开始陷入新的混乱之中”。蒋介石到西山对孙中山的陵墓进行凭吊，告慰他统一中国的梦想终于在国民党率领下实现了——至少名义上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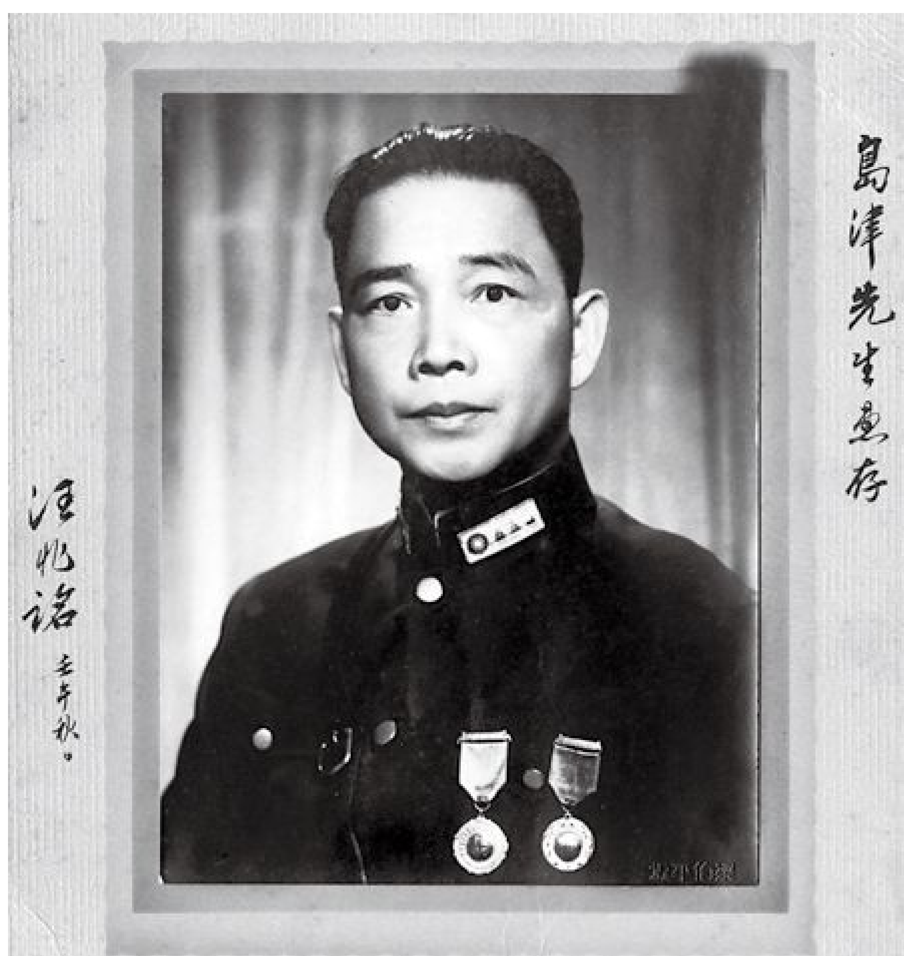
废除不平等条约仍然是首要目标，而各国列强也愿意做出一些让步，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增加新政府的声誉并有助于稳定。作为商谈修改条约的第一个国家，美国在7月25日签订条约，同意就美国而言将关税自主权交还中国。在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十八周年纪念日，国民政府正式接受了全国性政府的权力和称号，其基础是一党制和“训政时期”。根据孙中山的计划，军事统一之后是训政时期。主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行政权掌握在由36名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而真正的权力则掌握在常务委员会手中，该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武装部队总司令蒋介石。尽管这跟中国那些西方朋友所设想的民主还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中国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采用了民主的称呼。可是这种观念本身仍在原来的地方，始终没有进入中国的理论范畴。

北京改名为北平，意思是“北方的和平”，因为这里不再是新政府的首都。政府仍然在南京，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感到远离自己部队的家乡没有安全感，而且无法在北方维持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军，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的公使馆区是个“丢脸”的存在。

为了保护胜利果实，蒋介石采取迅速行动化解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各种私人部队。这些部队数目很大，对国家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同时也使得中央政府不可能稳定地掌握国家权力。7月，他召集冯玉祥、阎锡山和白崇禧到北京参加遣散会议。这三人每人掌控着约有23万人的部队。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国民革命军总数不超过60个师，每个师1.5万人，即总数为90万人，而现有武装力量为222.5万人。划定了6个遣散区，但在这次试行的遣散中各个将军都不愿意裁减。1929年1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遣散会议也不了了之。这些首领回到自己的领地各行其是，有时是独立而不可靠的盟友，有时是对手，但并不是下属。在未来

的岁月里跟过去一样，还是不断地结盟、分歧和反叛。在南方有两广地区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的部队，在北方有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这些武装部队时而同意时而反对，时而跟这个结盟对付那个，时而跟那个结盟对付这个，时而拥蒋时而反蒋，但从来没有一心一意过。1931年，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广州再次支持建立一个在顽固的汪精卫领导下的分裂政府。蒋介石的政府从来没有摆脱过这种异己发出的挑战，从来没有真正地稳固地享有权威。蒋介石要继续统治下去，便要不断讨价还价和施展计谋，从而使挑战者失去平衡，而自己则能维持平衡。

1928年底史迪威意识到遣散私人武装是"真正的问题"。他在《岗哨报》中指出，那些宣布的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那些私人武装不但没有裁减，反而在扩充自己的部队。在对新政府进行总结时他写道，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对国民政府理想化，相信中国现在已经统一，政府高效而负责，重建阶段已经来到。然而，对那些"冷酷的事实"还需要细细检验。那些边远省份仍在私自开战，他们并不效忠南京政府。国民党内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并未解决。除非军队置于文官政府之下，否则遣散的目标就不可能达成。80%的税收本来应该用于工业化，但实际上用到支持武装力量上了。尽管国民党现在在国外得到正面宣传，但史迪威对国民党能否真正取得进步仍表怀疑。



汪精卫

济南事件和遣散问题——或者无法遣散的问题——是史迪威认定的两个关键因素。这两个因素的发展对中国至关重要，最终不但影响了中国，同时也影响了史迪威自己的生涯。这倒不是说史迪威先觉先知，史迪威只是有兴趣、有意识并随时准备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关键的两年半中对中国的现实进行第一手的观察。

1929年4月史迪威开始返回美国，作为一件小的纪念品，他带回了东方手球锦标赛冠军的奖杯。

---

[1] 洋泾浜英语指一种语法不标准，带有中国音的中国化英语。——编者注

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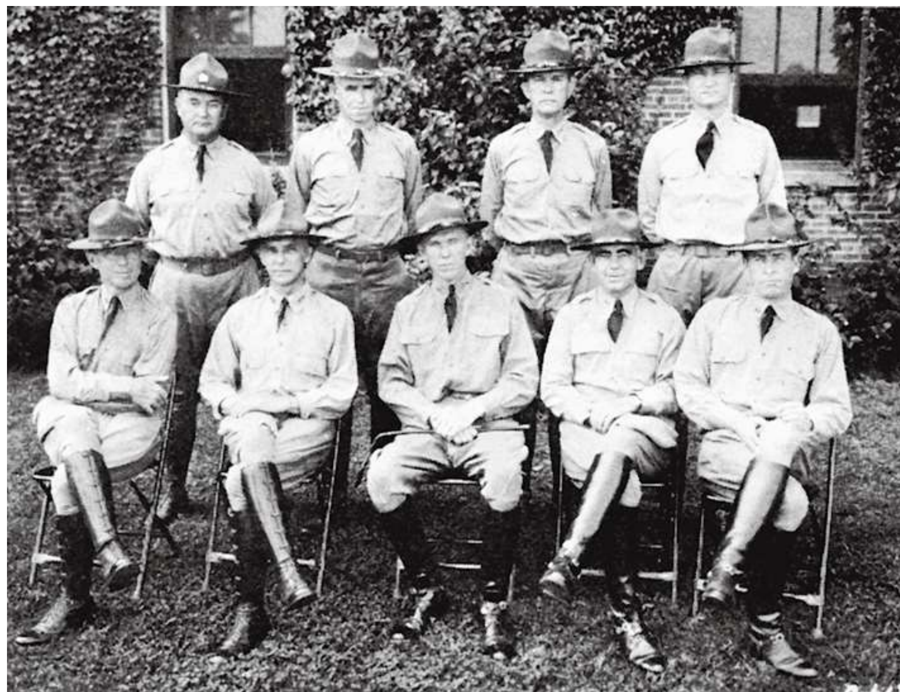
“酸醋乔”

1929—1935年

1929年7月史迪威回到本宁堡步兵学校担任战术科主任时，马歇尔发动的“本宁变革”正方兴未艾。这场变革的目标是通过实践进行教学，而不是通过野战条例和课堂上纸上谈兵。处于军事核心位置的战术学是关键科目，因为它教人怎么独立思考。

本宁堡步兵学校是陆军的基本战术学校。在旧体制下军官接受的训练是解决一个书面问题，所给予的敌情信息要远比实战完全。马歇尔在中国时，在第十五步兵团的一次训练时发现，一名军官受命包抄敌人的侧翼，却由于无法向70名士兵起草一份书面指令而不知所措，原因只是给这名军官的有关地形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后来马歇尔得知这名军官在本宁堡步兵学校是名列前茅的学生，这让马歇尔有了“好好整顿本宁堡步兵学校的强烈愿望”。在开始负责本宁堡步兵学校后，他抛开书本，开始通过实际训练培养主动性和判断力，而不是仅仅培养解题能力。

马歇尔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人跟他一道进行试验，接受新的解决方案，欣赏非常规的方式，只要这能表明学员在战场上是在独立思考的。马歇尔知道史迪威符合这些要求，因此把第一科即战术科主任这个关键职位保留给他。史迪威跟马歇尔一样都是潘兴的信徒，主张发布简短的命令，只关注所要达成的目标，但对具体步骤并不详细说明。在真正的战场上敌人可不会等你，连级和营级指挥官必须当机立断。马歇尔变革的意图就是解放这种能力，并造就一批真正能带兵打仗的战地指挥官。



史迪威在本宁堡，1932年；前排左二史迪威，前排正中马歇尔，后排左二布莱德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让史迪威意识到，指挥的方法和原则必须要能够被快速培训，这样一旦再次爆发战争，那么应征的民众就可以很快接受培训成为军官。正如他说的，必须找出“某种可以指导一支大规模应急部队的方法”。他的解决方式便是简单。赢得战争靠的不是“花哨的战术……只有简单、直接的方式才可行”。他把战术战场层面上的军事力量浓缩为“移动、射击和通讯”。

马歇尔主持本宁堡步兵学校校务的那段时间是激奋人心的，因为在军事发展方面学校对新的想法、争论和积极思考都能兼收并蓄。由于有了马歇尔这么一位后来成为战时总参谋长的人物，这里成了一个无可比拟的高级指挥官的摇篮。用马歇尔自己的话来说，他自己的“记性邪好”。尽管平庸不会给马歇尔留下多大印象，充其量不过是“短暂的不快”，但他永远不会忘记一次出色的表现或者一个倒霉的笨蛋。这段时间跟他一同执教高级课程的军官有以后的将军奥马尔·布莱德雷（Omar Bradley，时任武器科主任）、马修·李奇微、考特尼·霍奇斯（Courtney Hodges）、劳顿·科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和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军级或集团军级指挥官。

史迪威让下属承担主要的课堂教学工作，但是他自己对所有的战术训练事必躬亲。他习惯于提出一个“怪想法”，征求不同人的反应，然后进行验证。那些学员军官发现，他提出的战术问题都很有挑战性，要解决它们必须要用独特的方式。他通过实际应用战术原则进行教学，而且“会抛弃那些不符合常识的东西”。在真正的训练过程中他展现了课堂中无法显现的问题——战场电话出现故障，通讯员迷路了，命令被误解，地图经常是错误的，复杂的调动“总是出错”。

本宁堡步兵学校培养的军官是连级和营级的，不是司令部一级的。正如史迪威写到的，从一个营级指挥官的岗位上看问题的视角跟一个师级或者军级指挥官的视角是不同的。在高级指挥官看来地图上的一条线到了一个作战军官那里就是一个地区，其特定的地形特征限制了他的行动。一个连队在地图上从来不会迷路，但是在地面上就不是这样了，尤其是在本宁堡这样地形像丛林一样的地方。史迪威总是强调估测地形是一切决定的基础。本宁堡周围的松树林使得炮火支持方面的原则难以实行，妨碍了野战炮的应用，这就要求依靠迫击炮“在丛林密布地区的前线迅速使用”——这正是他后来在缅甸所遇到的情况。

机械化战争及其带来的巨大的战术变化在军事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史迪威研究了诸如联合机动性、渗透以及后来应用于德军闪电战的突袭等理论，此外他还偶尔向《步兵杂志》投稿，但是他的思想从根本上说还是实用性的而不是思辨性的。1932年他充当军事演习的裁判，他写评语时是这样归纳他的信条的：“不要做任何假设——去看看！”

一年后，马歇尔说史迪威是“天才教员”。有一次马歇尔写鉴定报告，有个常规性问题是让他评价该军官可以担任的最高指挥职务是什么。关于史迪威，他写道：“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均可胜任任何指挥职务。”他感觉到史迪威是个不会或者不肯谈论自己的人，对此他评价说：“由于谦虚和不事张扬的个性，该军官未能被公认为陆军中绝顶聪明和最有修养的人。”他评价说，史迪威“有远见。极端聪明……一个领袖……”，甚至还不无唐突地说史迪威“为人含蓄”，尽管这显然不是史迪威待在本宁堡的此后四年里最为持久的品质。

当史迪威遇见无能或者愚蠢的人的时候，他可能变得很尖刻。在本宁堡，正是这种情况使得他有了那个著名的绰号。有一次，史迪威对野战训练的表现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一名军官学员回到营地后就画了一幅史迪威的漫画，画里表情凶巴巴的史迪威正从一只醋瓶子里冒出来，瓶子的标签是三个X [1] 。人们，甚至是主人公自己，都对这幅漫

画颇为喜爱。史迪威问漫画作者他是否能够保留原稿，并拍了照片分送给自己的朋友。

多年后，他的老朋友威尔斯将军来信谈及一幅史迪威“酸酸的”报纸照片，信中对史迪威性格中“酸醋性”做了很好的理解和阐释：“不管什么时候你露出那种表情，那必然是因为某事或者某人造成了一种本质上荒诞的局面——有时甚至是很臭的局面。”威尔斯继续写道，在史迪威其他的特有表情中还包括“一种完全绝望和完全感到厌恶的表情……这就是在决定或者行动显然乖张，但又不得不忍受时，你灵魂中的某些痛苦会在你的面容中显露出来……乔，这不是酸醋——这是其他什么跟它有点像的东西”。威尔斯的结论也许过于宽容了，因为史迪威的个性中毫无疑问地有些酸醋的成分，尽管也有随和、人性的因素对此有所中和，这是史迪威自己也承认的。他很喜欢讲一个有关他自己的故事。有一次他心情郁闷，独自一人在中国一个城镇里散步。一个中国商人向他走来，作了个揖，然后说：“你好，牧师。”

“你为什么管我叫‘牧师’？”史迪威狠狠皱起眉头问道。

“因为你看上去像牧师。”这个中国人回答道。

“我怎么像一个牧师？”

“因为你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先生。”

“因此不要以为中国人没有幽默感。”史迪威讲完故事后总要再加上一句。

有一次他给家人写了一篇文章，谈了他自己和他对家人的愿望。他承认自己有时“不讲理，没耐性，脾气不好，阴郁，光火，顽固，说脏话，庸俗……”。让一个人承认这么一大串东西并非易事，而且都是真的。尽管他愿意的时候可以做谦谦君子，比如在凡尔登跟那些他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完全可以彬彬有礼，但是跟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有意做出一番粗鲁的样子。他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的厌恶，也许无意中还表示了自己的不自在。他使用脏话也是口头上对各种虚伪表示不满。如果有适当场合，他的用语可以很粗俗，日记里也经常出现脏话。这些脏话污秽但不下流，只让人觉得他有深深的敌意。

史迪威自己似乎也喜欢这种憎恶的感觉，在日记中常常会让自己激奋起来，先是来一句尖刻话，然后好像意犹未尽似的，开始变本加厉地说更多的脏话。他的灵感往往来自那些他认为装腔作势的人，比如那些硬要用英国口音说话的“恶心的”美国人。

他对富人和势利眼尤其毫不留情，有时甚至让人觉得他太不遗余力了。或者因为天性，或者因为他过去的经历，他对富人一向没有好感。他自己一直家境优裕，但由于他父亲的某些古板做法，成年之后史迪威再没从家里拿过钱。1933年他父亲去世并没有让他的境况有大的改变，因为老史迪威博士除了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点股票之外，把大部分产业都留给了自己的妻子，而史迪威的母亲一直活到1942年。仅靠一个陆军军官的一份收入，有五个孩子的史迪威在一片繁荣景象的20世纪20年代显然过得有点紧巴巴的，但是在大萧条的时候军官的日子就要比其他很多人好过多了，因为至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

史迪威一家人没有什么要花很多钱的嗜好。史迪威不像其他军官那样参加狩猎或者打马球，他妻子不骑马。他们不玩桥牌，在中国时也没有参加那种外国殖民地的俱乐部活动。他们在家里请客，上的是勃艮第葡萄汽酒，这让那些喜欢喝酒的朋友很不满意。马一直让史迪威深恶痛绝，也许因为传统上马是富贵人家的摆设。有次一位军官同事没完没了地谈马，感到无聊透顶的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好好发泄了一番："如果有什么让我窝火的东西，那就是那些白痴般喜欢马的人……如果地球上还有比长着个锤子般脑袋的马更木更傻的动物，那你指给我看看。这畜生只知道跳和放屁，却毫无头脑。"这样发泄一番之后，他马上抱歉自己用了一个"粗"字。

他还喜欢用一些不太粗的字，不过似乎并无恶意：英国人是limeys（英国佬），法国人是frogs（青蛙）（"在船上遇见一个青蛙和他老婆"），德国人是huns（蛮子）或者squareheads（方头），意大利人是wops（南欧佬），中国人是chink或者chino（中国佬），菲律宾人是googs（菲律宾鬼子），黑人是niggers（黑鬼）或者coons（黑家伙）。这些词本不是像史迪威这种受过教育或者有身份的人所用的，不过就跟他骂人一样，这些用词反映了他总体上说对自己的同胞没有太多好感。用他一位军官同事的话说，实际上他"颇接近于厌恶人类者"。不过，这种对人类憎恶的源泉不知从何而来，因此史迪威的这位同事在跟史迪威相识多年后承认说，最终史迪威总有些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史迪威。

史迪威喜欢的是家庭或者自己促成的快乐。他不知疲倦地组织业余戏剧表演或者古装表演，随便打网球玩，为保持身体健康还经常越野长跑或者打手球——这两种运动是所有锻炼中最耗费体力的。每周有两三次，人们总会看到他身着咔叽短裤和T恤衫在本宁堡的松林中轻松地慢

跑。在一次5英里（约8千米　）赛跑中，他最后被第一名落下了有1英里（约1.6千米　）之多，但是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说，他觉得很少有人在48岁时还能达到他这个水平。

他的家庭便是他的城堡，他在这里有安全感，可以避开那看来充满敌意的世界，他爱家人，自己也被爱，在这里他无须防卫。这里有笑话和笑声，有伙伴，有相互间的娱乐，大家都无拘无束。离开家人时他总是有些不自在，但是，如果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的话，比如如果连续待了几个月的话，他又会坐卧不安，渴望离开。他和妻子是婚姻美满的一对。由于他个性很强，他妻子接受了他的很多看法，这往往反射或者加强了——而不是化解了——他对周围人的敌意。

他的笔记本中充满了他对他五个孩子的持续而深切的关注：他们每年甚至每月身高体重增加了多少，他们的零花钱和账目，学校和旅行，他们说的第一个词以及说过什么特别妙的话，说某句话时的年龄以及当时的场景他都会记下来。小乔在5岁时曾说过的一句话是"你旧了，我们还新着呢"。不在家的时候，他也总是在日记中记下他们的生日。甚至在徐州的混乱形势下，6月1日这个日子也没有遗漏掉，他记道："南斯的生日。"有时学校不能令人满意，在中国时，有一次他最小的儿子和女儿因为挨老师的训哭着回家。他发誓说谁也不能这样对待他的孩子，于是他有一年没让他们上学，在家里自己教他们。在练习写字时，他自己先写出漂亮的大字，然后让大女儿南斯抄写，这印证了马歇尔所说的：他是个天才教员，他很懂得怎样通过幽默和不恭让自己的学生着迷：

先从Cat这样的短词开始，

不久你就会写hippopotamus了

它高高跳在我们头上坐下…… [2]

紧靠桌子坐得笔直，

把吃的东西吐到空中；

等落下来时再用嘴接住。

你的朋友们都会开心。

他们以为自己是在看马戏……

用刀子插住土豆，然后——

整个吞下。刀子除外。

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陪着小儿子本画画。他们画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用一种剪纸法把一条鲨鱼变成一架飞机，或者让一条有三个脑袋的龙变成各种东西。在本宁堡时，家里人为史迪威起了奥尔老爸（Ol’Pappy）的绰号。当时孩子们正模仿当地的佐治亚人的“穷困白人”，并“推测奥尔老爸怎么会出去抓住一条响尾蛇并活剥它的皮”。他们很喜欢这个形象，开始用这个名字叫他们的父亲，结果这个名字就流传下来了。

史迪威老是喜欢记些东西。除了写日记、信、散文和特写之外，他还在单页纸或者纸片上写下“随想”或者“杂想”，内容涉及他的想法、梦、奇思怪想、玩笑、逸事、备注、引语或者他那永远不停思考的大脑中想到的别的什么东西。下边全文照录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纸片：

亨利·法布尔的昆虫研究

鳗鱼史

圆顶硬礼帽的历史

拿滑铁卢怎么办

高个子和大房子上面都没有什么东西。——培根

威尔斯的“艺术简论”

“上刺刀”

另一片纸记录了他思考民主这个基本问题时所经历的思想上的冲突；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这个标题为“普遍选举权＝及≠”：

赞成——每人一票。但有些人要更多——

无知者的力量应该小于受教育者

聪明人应当能够克服大众在数量上的优势

反对——难以找出分配额外选票的标准

财产？（常常是个偶然事件。跟民主精神不容。）

（上院议员）

教育。（未必真实。未受教育者有时更有见地。）

另一张题为“罢免、动议权和全民公决”的纸条表明，他除了在考察昆虫、鳗鱼和艺术之外，还在考虑宪法程序。他抄录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些段落，其中不可避免地并不出所料地包括了霍茨波 [3] 的慨叹：“他简直使我发疯……讲起话来活像一个使女的腔调，偏要高谈什么枪炮战鼓、杀人流血……”

史迪威聪明但不深沉，他思维敏捷，跟任何人谈话往往都能赶在别人前面，于是他不停地、不耐烦地用“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打断别人。除了时不时地产生一些疑问之外，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总体上是合乎传统的。尽管史迪威反对父亲对宗教的虔诚，但他保持了家里的共和主义传统，自然也欣然参与了敌视罗斯福的运动。尽管陆军传统上没有党派偏见，但正如史迪威的一位军官同事所说的，当陆军“咕哝什么的时候”，他们也跟普通人一样充满政治激情，而史迪威也不例外。实际上，正因为他是史迪威，所以他的看法更加犀利。

他的记录中还包括梦境，往往带着十足的热忱和信任写信向梦见的人清晰而连贯地叙述自己的梦境。结婚前他曾写信给温妮讲述梦中与她温存的事。尽管信写得很委婉、很文雅，但是在1910年给自己的未婚妻写这些东西，这还是让人吃惊，因为当时的大众在这些方面是主张缄默的。给他父亲的信中他写到做梦跟自己的弟弟打架，之后他父亲开始追他，他认为父亲想“把我打成肉酱……当你追上我之后……并没有打我，却掏出一枚硬币递给我。我站着呆呆地望着这枚硬币，问这是什么。你神情悲哀地说‘这个世界的一枚硬币’（a coin of this realm）。我听了‘这个世界的一枚硬币’后很受震动，结果男孩醒来了，久久不能入睡”。他做的梦经常是跟争斗或者用劲有关，比如：“爬一座高山去某个国家。这是唯一的路。山的一边不断塌陷，变得越来越陡。”或者跟他母亲看一个男孩带着一个石制加农炮竭力想爬上科洛敦大坝，结果却被一点一点地推向边上，最后这个男孩掉了下去。“我说：‘不要看。’我慢慢爬下去到石头那里。男孩被击打了之后再也没动。他身下有红色的痕迹。我说‘他当场死去’。”其他的梦还有从一个汽艇上通过梯子下去，或者在水下争斗，或者在中国遇到一群野兽相互厮打，“最后这些野兽整个从山坡上滚下去，结果是乱七八糟，到处是断腿、扭断的脖子和挤烂的躯干。唉，我醒来吓得身体都僵了”。

在本宁堡他身处熟悉或者同级别的人中，没有像大使或者英国人那样的让他不舒服或者怨恨的集团，但是他仍然可以变得充满敌意，难以相处。马歇尔后来承认说，校长坎贝尔·金（Campbell King）将军曾经

三次要求他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史迪威在很多军官中引起怨恨的一个原因是他的标准极其严格，除非他认为学员真的非常优异，否则他不会在鉴定报告上打“优”。结果，他负责管理的军官很少能进陆军军事学院，而在按常规办事的武器科“优”可以随便给，这就方便了学员在职业生涯中的晋升。史迪威后来成为战斗指挥官或者战区司令时对晋升和奖励的这种严格态度继续招致不满。毫不奇怪，在本宁堡的第二个学年，马歇尔对史迪威“为人含蓄”的评价已经降了一级了。他接下去的评语中透出一点儿对他已经忍了又忍的意味：“原则性强。工作太努力。脾气有些无常……”不过马歇尔继续留用这个刺儿头同事，在对他的评价中还说他“在战术和技术方面走在了时代前面”。

史迪威把他在中国的经历作为例证帮助他讲解，并唤起军官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他强调说：“我们在将来某一天可能都会与之打交道。”1929年他在题为“东方人的心理”的演讲中探讨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一个基本的障碍，这个障碍太显而易见，因此常常被忽视，他说，西方人常常动不动就说中国人“不可捉摸”，其实他们只是发现中国人“跟我们不同”。为什么中国人不同？史迪威说，这是因为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跟我们的文明是“分割开的”，因此在不同条件下他们发展了自己的文明。“那么怎么可以指望一个中国人做出像一个西方人那样的反应？……回答是，不可能。”这其实是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还指出，由于中国社会非常古老，而且固守成规，因此中国人有种“保守的心态……惰性极大”。谈到东方对“面子”的看法时，他阐述的东西足以表明，日后他未能跟蒋介石处好并非由于无知：“因此尊严是最受珍重的东西，谁剥夺了别人的尊严他就会树立大敌……跟中国人打交道不要扫他们的面子，除非你想侮辱他们，或者你不在乎与他们为敌。”

在跟同事聊天时他强调了中国的巨大需要，特别是从道路到电台的各种联络方式。据一位朋友说，史迪威的兴趣是在于“中国会发展成的样子”。他认为现在所进行的政府改革将会“把治外法权这根刺从它的身上拔掉”，而且他还时不时地让自己相信，中国这个新政府可能真正使中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并调动其潜力。他常说：“只要方向对了，这四亿人民凭借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必然屹立起来，而我们最好跟他们站在一起。”

在本宁堡时他的笔记表明，他读过了标志着中国新磨难开始的一个历史性文件，可惜他没有就此写出评语。这就是国联的李顿委员会关于“满洲危机”的报告，这个危机后来导致的种种事件把整个世界都卷进去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借口中国炸毁南满铁路，为了“自卫”夺取了奉天，并迅速对东北进行了军事占领。这是自谋害张作霖之后的一个更大举动，但这次达到了目的。导致这次事件的是1929年蒋介石所做出的努力，他试图联合爱国少帅张学良恢复对东北的主权。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苏联的中东铁路。中国的挑战立即遭到苏联部队的报复，结果中国军队屈辱地遭到失败——这也让日本人震惊。中国和苏联再次蠢蠢欲动，让在日本国内代表扩张派的日本军界下了决心，准备加强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军界行事一向直达天皇，这样可以避免文官政府的牵制。军界通过关东军导演了“九一八事变”。这次事变在日本国内和中国都引起了巨大争议，此外，由于华盛顿会议和国联条约，也在西方导致了种种影响深远的问题。

当日本人袭击的时候，蒋介石的军队正在进行第三次围剿共产党的战役。此外，当时中国长江发生大洪水，结果几千英里（1000英里约合1600千米 ）的土地被淹，200万人死亡，还有无数人变得一无所有。东北没有做出任何试图组织军事抵抗的努力。蒋介石反倒命令在长城内外坐拥40万军队的张学良“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尽管蒋介石的部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他知道无论在训练上还是装备上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因此他不想跟日本进行决战，而是希望进行战略退却。他的主导原则是不要任何事情妨碍他清除内乱的主要目标。

蒋介石已经下了决心，认为“戡乱”是压倒一切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或者对入侵者的抵抗都是次要的。如果蒋介石可以称为伟人的话，那就是他一旦有了某种信念，就会紧紧抓住这个信念，毫不动摇。对付日本人他可以利用中国那种总是存在的优势，那就是可以退却到广大腹地，与此同时，他可以致力于将中国统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一旦达成了这个目标，中国就可以开始对付日本人了，在这之前估计东北就能够满足日本人。



张学良在渭河渡船上，身后是蒋介石、宋美龄等，1943年10月21日

历史总是出现各种落空的盘算，而蒋介石就犯了好几个错误。成功的入侵很少会自行终结，而且人民抵御入侵者的愿望也不那么容易违背。然而蒋介石没有多少选择，他在长城以内的任务已经够艰巨的了。他执政第一年就遇到了各个领袖的反抗，这些人帮助他上台，接着又拒绝遣散。在1929年到1930年间，广西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以及北方的冯玉祥都曾先后武装对抗政府，结果蒋介石只能去进攻或者收买他们。边远省份如云南、四川和新疆由于在政府控制之外，仍然可能进行反抗。广州仍然时不时地支持成立另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由仍然具有活力的左派领袖汪精卫、陈友仁和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维持着。北平曾有一段时间再次建立了由汪精卫、冯玉祥和阎锡山控制的分裂政权，但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中央政府恢复了对北平的控制。这种种争斗牵制着国民党的注意力，使它无暇考虑社会变革，而刚刚出现安稳的迹象，蒋介石又开始镇压另一波国内敌人，这就是深深扎根于江西农村的共产党。在日本进攻的前一年，国民党连续三次所谓的“剿匪”攻势占用了其全部军事力量，而且由于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围剿遭到了挫败。

在一个亟须改革的国家里，在八十年中有三次革命高潮被挫败。蒋介石关心的是把零散的政治力量统一起来，而不是建立新的社会基础。

对于一个又转而跟旧官僚和土地所有者结盟的政府来说，减少地租已经不可行。在浙江，有人真正尝试了减少地租的计划，但是其领袖人物和倡导者遭到了暗杀，计划随之放弃。在“训政”阶段的政府仍然是一党专政，而且变得日益专制和具有压迫性，这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共产党由于已经不可能在政府框架内部进行改革，而且被作为匪徒清剿，因而，按照驻汉口的美国副领事埃德蒙·克拉布（Edmund Clubb）的说法，共产运动“被迫……成为一种反叛，带着对中国现政权的强烈仇恨，这种反叛传遍受压迫者——自由派学生等”。与此同时，现政权仍然紧紧抓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它当作一种符咒，这样就无须付诸实践了。为了填补由于废除王位而出现的真空，对孙中山进行了神化。他的画像无处不在，他的包括三民主义的遗嘱也在各种场合诵读，无论是每周的纪念活动、公共集会、政治会议、爱国节假日，或者是每周一早晨学校的仪式上。他的遗体也被从北平重新迁到南京紫金山侧的一座造价600万美元的陵墓中。

即便没有进行社会革命，现代化还是在通过各种方式推进，例如修建道路，发展航空和电气化，修建新铁路，改进农业，制定法规，开办采用新科目的现代学校，还有各种现代组织方式的最基本的要求——一种逻辑的信息处理方式以建立档案系统。中国缺少字母也许跟缺少公路一样造成很大的阻力。某些省份的一些方案有了一些进展，但另外的省份则没有进展。中国的需要极多，但这个时代给它的时间太少。

日本军队占据奉天后不顾国内的意见分歧，继续进攻锦州，这是位于长城以北的张学良控制的重要据点。他们在1932年1月夺取了这个城市并将少帅赶出东北。2月份，宣布成立“独立”的“满洲国”，3月份，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立为皇帝。日本政府由于受到陆军和海军大臣的钳制，在既成事实和激进民族主义的要挟下只能妥协。由于日本不想让国联或者《九国公约》签约国有理由宣布日本和中国之间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于是东京试图使在中国大陆的每一步都合法化，被看成是“自卫”或者东北人民的“自决”。但是当时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东京造成震动。1931年12月政府辞职。天皇任命了温和派的犬养毅（Ki Inukai）为新任首相，试图扭转迅速发展的局势。犬养得知天皇希望他能够阻止陆军“插手内政和外交事务”——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命，等于签署了这位首相的死亡书。这位不被西方所知的首相上任一个月便派遣秘密特使去见蒋介石，试图解决“满洲问题”，但是日本政策其实已经不再掌握在文官政府手中了。

西方大国在从“九一八事变”到接受《李顿报告》这十七个月期间试图控制局势，它们做出的努力对20世纪具有关键影响。这时的姑息做法使国联受到了严重损害，是对进一步侵略的鼓励，开启了此后十年通向战争的道路。政治家并非先知，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形行事，并无长远想法。危机往往是分阶段发生的，不像看历史的人可以看到事件的全貌及其后果。很难说“满洲危机”的某个阶段是否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因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人们不可能抓住机会改变局面，或者有与机会擦肩而过的情况。有的时期酝酿伟大，有的时期酝酿软弱。“满洲危机”是历史上产生重大后果的事件，造成这个事件的不是各种悲剧性的“如果”，而是人和国家的内在局限。

中国所赖以防御的基础是这个世界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而设置的保障：《九国公约》《国联条约》以及新近签订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1928年这个公约在巴黎由包括日本在内的15个国家签订，公约宣布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并同意解决所有争端“只能通过和平方式”——当然例外情况是涉及“自卫”和“重大国家利益”的时候。日本发起进攻后五天中国就正式向国联提起控诉。这时侵略还从来没有对集体意志进行过试探，这是第一个主要的案例。尽管在日内瓦有人急切地想为世界和平做出一些“美妙的”事情，但是谁又都不想做点具体的事情。1931年的世界在经济风暴下畏缩了。在远东的主要西方大国英国当时正经历着政治和财政危机，准备放弃金本位制；欧洲的股票交易所颤抖不已，面临恐慌；魏玛共和国已经垂死，而美国正深陷于经济萧条之中。考虑到各种为了防止侵略而设置的机制，日本的行为的确让人难堪；但是正如法国总理安德烈·塔迪厄（André Tardieu）说的，当时还“来日方长”。



史汀生

在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看来事情却已经非常急迫，史汀生极力倡导通过裁军和集体努力消除战争。史汀生在1927年到1929年任菲律宾总督，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时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因此曾经密切接触过太平洋问题。他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伦敦海军条约》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极大的怨恨，因为这个条约使得海军扩建的停顿时间和广受憎恨的《华盛顿公约》的5：5：3比例又延长了五年。日本的极端爱国者怒火中烧，终于刺杀了对该条约表示强烈支持并建议天皇批准条约的滨

口雄幸首相。

通过史汀生的影响，进攻满洲的行动重新使美国涉及国际事务，结果却令人失望，美国重新陷入孤立。史汀生在这次危机中有两个目标：首先是避免日本在亚洲大陆上进一步扩张，这跟1917年后美国所做出的努力是一致的；此外，还要维护集体安全的体制。但是，当国联为了让美国分担责任或者承担责任而希望美国特别支持国联理事会的时候，史汀生却退却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日记中抱怨说不想把这个婴儿“扔掉”“托付”或者“丢”在自己的怀里或者门口。他希望通过世界舆论的“富于活力的判断”，而不是美国自己来遏制日本。

日本意图何在，是暂时占领还是另有所图，是日本政府的一致政策，还是军国主义者通过关东军而迈出的冒险一步——这都是西方所不清楚的。在1931年剩下的几个月里，史汀生所抱的希望是通过“调动反日舆论”，再加上经济制裁的威慑，这可能加强议会各党并最终遏制住日本军界。在20世纪的前四十年里，日本政体中总有个瘦弱的自由派人士的身影，他一直在招手，仿佛呼之欲出，正是他诱惑了美国的政策。在1931年的时候，国际上对“满洲冒险”的谴责再加上制裁的威胁，当时谁知道这是会加强日本温和派的力量，还是会把日本团结在激进爱国者周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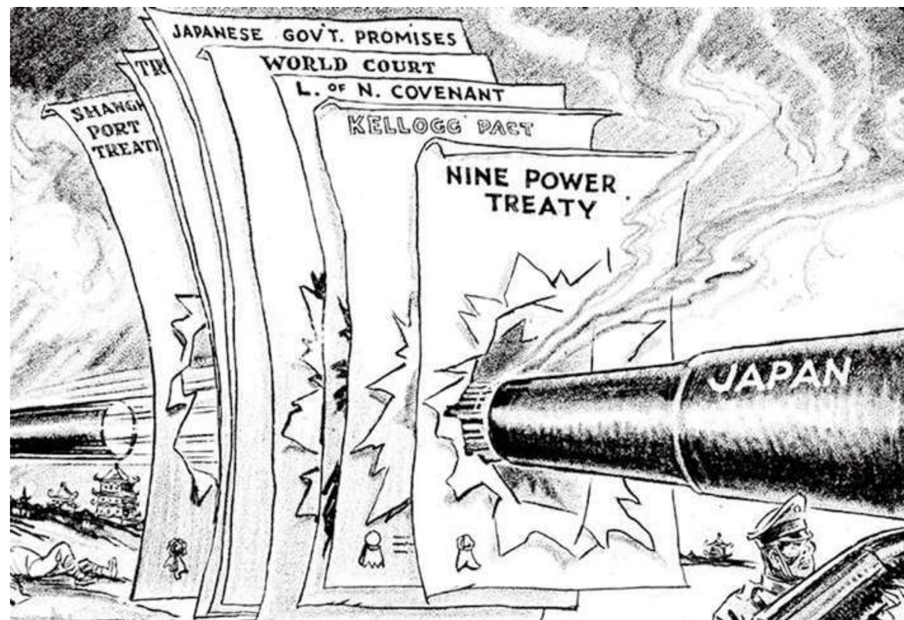
由于英国并未采取强硬立场，因而史汀生所期冀的大国的“富于活力的判断”并未形成。当时主宰英国外交政策的是绥靖主义之父约翰·西蒙（John Simon）爵士。他是英国有名的律师，既冷淡又殷勤，想法谨慎，脸上总是挂着假笑，脑袋相对他的身躯显得太小。作为外交大臣，他使得英国自布尔战争后最不得人心。后来的记录显示他也希望遏制日本，但是他在日内瓦却给出了相反的印象，结果史汀生得出结论说，英国更喜欢看到日本吞并东北，而不希望日本在长江流域威胁英国的主导地位，或者插足大洋洲或者印度。

史汀生所代表的这个国家本不想用大棒来增加自己话语的分量。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总统对经济制裁的想法很是担心，他不无道理地认为，除非最后以武力制裁，否则经济制裁无异于“用针刺老虎”。史汀生认为，尽管这么做有风险，但必须考虑到如果日本的行动不受约束的话，则将对和平事业造成“极大危害”。此外还要考虑的危险是，“日本可能对中国发动一场可能会波及全球的战争”。随着日本越来越深地涉入东北，他越来越担心这对世界和平和美国在远东利益所造成的威胁。他认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有过这样长时间的交往后却“冷漠地

让中国听天由命”的话，那么这会对美国在中国的信誉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由于未能让《九国公约》《国联条约》或者《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发出一致的声音，史汀生决心采取某种形式的单方面行动。但是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案卷中翻出在1921年签订《二十一条》时当时的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一项声明。这项在1932年1月7日重申的声明后被称为“史汀生不承认原则”。这个原则向日本和中国表明，美国对任何中日两国之间签订的危害门户开放政策或“中华民国主权、独立或者领土或行政完整”并可能通过违背中、日、美为缔约国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方式的任何安排，均“不承认其合法性，也不会承认”。该声明声名远播，态度毫不含糊，但作为一种限制工具来说却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由于这是很明显的事，因此两个月之后国联采纳了约翰·西蒙爵士的提议，一致认可了这项原则。

在中国，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行动非常有效，结果日本试图通过在抵制运动的中心上海采取惩罚性的行动来结束抵制活动。跟往常一样，他们以“事件”为借口，这次是一个被杀的日本和尚。日军开始用飞机和从军舰上运来的部队进攻上海闸北。1932年1月29日对闸北的空袭是第一次对平民发动恐怖轰炸 [4] ，此后这种轰炸开始变得司空见惯。上海的外国人亲眼看到炸弹纷纷落下，死亡者数以千计，房屋变成废墟，到处是受伤者和难民；西方人在感情上对此感到震惊和厌恶。史汀生想起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的事情，决心不能像威尔逊那样“无所作为，不显示我们对比利时的同情”。闸北事件，再加上日本宣称《九国公约》的条款中有关中国完整的部分已经过时，让史汀生相信已经无法通过姑息的方式约束日本。但是采取惩罚性措施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也不是这个世界所愿意看到的，因此他要么敷衍一下，要么无所作为，结果他选择了前者。



《日本：公约粉碎机》，漫画，1931年

他想再次试图得到英国的合作，这次引用了《九国公约》，但他发现约翰爵士“柔弱无力”而且“很胆怯”。史汀生只能再次单方面发出警告。他在2月发表公开声明，宣称美国人民“坚决相信”中国的未来，并重申了《九国公约》的原则——必须给中国机会，以使之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和开明的国家”。他告诉日本，《华盛顿公约》是相互关联的，废除有关中国的条款则意味着废除有关海军和不设防方面的条款。但是这种威慑是空洞的，因为美国无意采取强硬立场展开军备竞赛。后来当史汀生忙于裁军会议的时候，胡佛总统通知日本说美国不会采取经济制裁。

这场危机开始暴露出美国承诺的软肋：美国支持中国的完整，但是由于这不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因而美国并不想为支持这项政策而大动干戈。所谓门户开放只是纸面上的罢了。这些词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听上去也委婉动人，而且给人以勇敢、自由、机会之门洞开的印象，这触动了美国的两种基本概念，即领土和自由事业。正像海约翰在说到他创建的另外一种说法时所说的，这“有一种出人意料的成功”。最终这使美国陷入了那种最纠缠不清的结盟之中——不是跟一个国家，而是跟一种信条结盟。这使得美国有义务对一件并不危及美国安全的事情——中国的完整——进行干预。

在未满足中国诉求的情况下，国联只能勉为其难地兑现盟约的承

诺。如何限制日本，在限制无效时又该怎样在谴责日本的同时又不使它退出这个国际社区，这让大国们担忧和困惑。日本提出的各种借口和合法化的理由，总是造成一些对此争论的机会。为了调查事实真相，李顿委员会被派往东北。与此同时，战争正在扩大。东北的一个领袖马占山将军开始给日本造成麻烦。在上海，几乎是在违背蒋介石命令的情况下，中国第十九路军展开了英勇的抵抗，而且出人意料地成功，他们使日本人不得不打一场他们意料之外的仗。因此，在东北还有很多麻烦的日本人乐得找个借口，通过当地外国势力安排的合约撤出了闸北。

奉天事件的后果正在不断加强。在2月到5月间，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先后暗杀了大藏省大臣、三井工业集团首脑以及首相犬养毅（Ki Inukai）。暗杀他们的都是穿军服的陆军军官。犬养毅曾多次向国民政府让步，他的死标志着政治党团制度宣告结束。在日本舆论看来，史汀生是罪魁祸首，要为世界对日本的误解和美国对日本的反感负责。日本的政论家开始大谈“亚洲门罗宣言”，并指出，美国对日本在亚洲“命运”的任何干涉都会导致战争。由于预计到李顿委员会会提交对自己不利的报告，于是日本先发制人，9月份率先对“满洲国”给予法律承认。

《李顿报告》在10月提交。报告的措辞尽可能委婉，这是因为还心存一线希望，指望能尽可能顾及日本的脸面，从而使它能够接受报告。报告不可避免地指出，日本违反了公约，而它的“自卫”和“自决”的两大理由也得不到事实的支持。报告意识到回到原先的状态已经不现实，因此建议恢复中国主权，成立自治政府，但对日本的经济利益做出特别安排。在就是否采纳报告进行的长时间争论中，国联竭力想避免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谴责侵略则可能使日本与西方闹翻，重新实行回归亚洲的政策。如果通过某种合法化的方式对此事粉饰一下，则能够保证国联结构的完整，但无法保持其宗旨的完整。

当《李顿报告》公布后，国联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1933年2月报告获得通过，自以为是的日本代表团为自己进行了激烈的辩解并发出警告，并于次日退出国联。为了说明日本的不在乎和没有实质性举动的国际公约的徒劳，日本部队又占领了长城以北的察哈尔省，并派兵进入河北，在北平和天津之间建立了30英里到40英里（约48—64千米　）宽的非军事化区，规定未经日本同意中国部队不能进入非军事化区。此时，日本的行动暂时告一段落，最终通过跟中国政府签订的，或者说强加于中国政府的《塘沽停战协定》对自己的侵略合法化。蒋介石接受了这个协定；就在日本入侵河北的当月，蒋介石还调集25万精锐部队对南方的

共产党展开第四次“剿匪”行动。他跟太平天国起义时的摄政王恭亲王一样，认为内乱乃是中国命门之疾，外夷不过是肢体之痛。

自“满洲危机”之后，中国的完整就只能取决于日本胃口的好坏了。这彰显了日本军方的优势地位，但是这是个内在的发展过程，即使日本的其他盟国没有对此谴责，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这使得精心构造的《华盛顿公约》成了一具空壳，暴露了集体意志的弱点。国联、《九国公约》以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无论是单独还是结合在一起，都是不够的。渴望集体安全与施行该公约之间的鸿沟已经非常明显。人们开始怀疑，对于一个决心要侵略的国家，除了武力，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可以阻止它。“满洲危机”之后，各国都觉得——正如史汀生所承认的——“困惑和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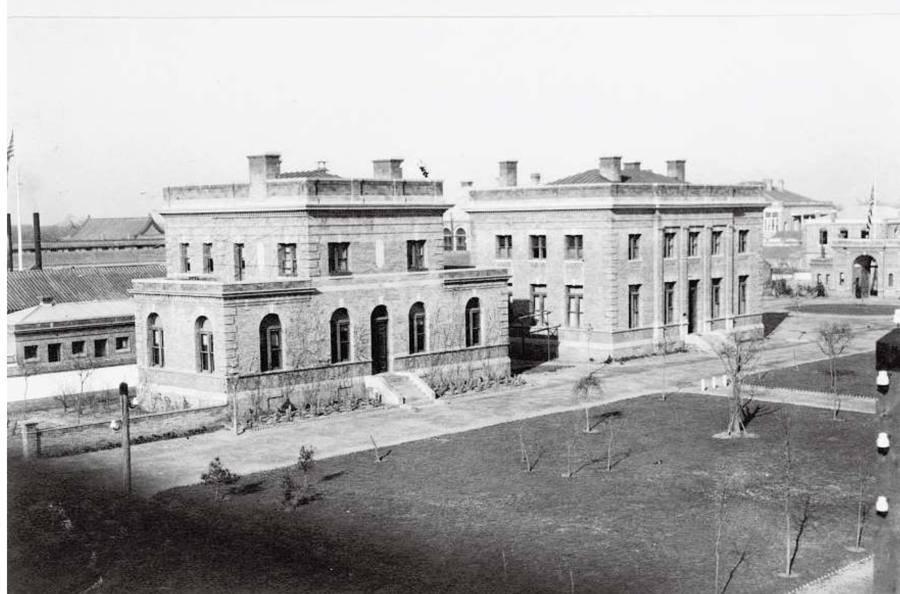
1933年5月，也就是签订《塘沽停战协定》的那一年，史迪威在本宁堡步校的任职结束了，但这期间一件反映官僚作风的事情让史迪威很恼火；正如威尔斯将军谈及这类事情所说的，它们让“你灵魂受苦”。还有不到两周就是小乔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典礼，但由于罗斯福总统紧急创建的国民预备队急需军官，转换工作之间的例行休假全部取消了。每个军官都必须立即到新岗位报到，不得以任何理由休假。史迪威为了能晚点儿报到提出各种请求，甚至最后向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请求，但均被拒绝。由于未能参加长子从自己母校毕业的典礼，这位父亲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他很自然地迁怒于白宫里那个人。史迪威夫人和他们的二女儿“杜特”[5] 代表全家参加了西点军校的典礼，而史迪威则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南斯和一只狗开车奔赴他加利福尼亚的新岗位。他开了一个星期的车终于赶到，结果发现他的前任仍然在那里。他在那里没有接到任何指令，无事可做。温妮在乔毕业典礼当天发给他的一封电报，更加重了他对缺席典礼的感受；他写道：“嗨，这让我对官僚机器的憎恶无以复加了。”

史迪威在本宁堡待了四年，其间马歇尔在1932年离开；但史迪威已经变得不安分，以至于他称自己的离开是“摆脱奴役”。他并没有申请上陆军军事学院的高级参谋课程，尽管这是最高级别的；当他的同事、同为步兵军官的奥马尔·布莱德雷申请这种课程的时候，乔告诉他说：“布莱德，你为什么要去陆军军事学院去做那些自己本不想做的事情？”他想再次申请驻外服务，但是没有成功。不过陆军部满足了他的第二个愿望，即“任何西海岸的任命”，分配他去圣迭戈训练第九军区的预备队。尽管这个任职让他失望，但是有个好处是那里离卡梅尔比较近，他们早

就决定把家安在那里并已经买下了房产。

在圣迭戈的两年里，史迪威竭尽全力试图把实战训练的教学原则转而应用于预备队。在孤立主义盛行的时期，人们对参加军事训练的热情并不是很高。那些参加两周训练的办公室和销售人员对史迪威来说，并非最好的专业教学材料，但是他知道这些人在战时都是国家的资源；一个学员说：“他拿我们挺当真的。他很可能是我们所有教员中最好的。”他结合陆军实战中的很多要素组织教学，在真正指挥时只给出通情达理的指令，这使学员们兴趣盎然。一个一致对他表示赞赏的小组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像现在这样好的指教。”

然而史迪威私下里却觉得无聊和气馁。他感到，如果陆军部只是让他从事这类工作的话，他现在已经51岁但还不是上校，那他也就别指望会有怎样辉煌的军事生涯了。“我不可能做出什么历史性的工作了。”他在一份个人小结中写道。有很多次，对“官僚机器”的厌恶差点儿让他退休，而他现在则已经跟家人认真谈论这种可能性了。在卡梅尔的房子是1934年造的，用了2.7万美元，这钱来自他父亲留给他的股票和温妮母亲留下的钱；现在房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史迪威打算依靠储蓄、退休金和发挥他的才能去教书来维持生计。然而当时正笼罩在大萧条的阴影中，史迪威感到前景黯淡，没有贸然退休。这时马歇尔上校跟他一样也很苦恼，当时马歇尔正在伊利诺伊国民警卫队任职。马歇尔对升迁缓慢愤愤不平，1934年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看不惯平庸之辈占据高位，而有才之士则因为官阶低而默默无闻”。



美国使馆

在史迪威正处于低潮的时候，机会来了。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做武官，因为这个职位过去一直需要自己有额外的收入才行。但是1934年为了能选录更多的有资历的军官，陆军部决定为这个职位增加一笔额外的补贴。他在陆军部的朋友马上问他愿不愿意被派驻北平（公使馆仍然在那里）。由于史迪威的资历，朋友很容易地为他谋到了这个位子。尽管武官职务是由军事情报处任命的，他却是作为外交使团的一员任职的。1935年1月，史迪威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那里接受委任，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一名外交官，但是为了回到中国，这种不幸还是可以忍受的。他的一名军官同事在写给他的贺信中说："此时东方的国际形势是多么引人注意啊。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我们可能卷入其中。"

显然，当时出现了各种麻烦的征兆。1934年，日本在一项宣布其控制中国之意图的声明中，把开放门户砰然关上。宣布声明的是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Eiji　Amau），他说日本的意图是要"充当和平和东亚秩序的维护者"。因此日本有权利反对其他国家对中国提供贷款或者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并否认中国有权"利用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响对抗日本"。天羽声明震惊了世界，但是美国的反应却很低调。当时罗斯福政府的精力正集中于极端耗费精力的国内改革上，因此政府不愿意在外交方面出现争执。赫尔国务卿的政策是想消除史汀生所招致的反感。他回答

时尽管不得不在书面上表明美国反对天羽声明，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发布这项声明是本着“恭敬和友好精神”的。

实际上，日本通过与傀儡政府的各种政治安排，以及通过有组织地走私鸦片和日本商品而进行的经济上的倾销等手段，继续加强对内蒙古和华北的渗透。在华北正在被蚕食的时候，蒋介石仍然消极抗日，同时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对他的部队进行重组和重新训练，准备用来对付共产党。1934年，他调集70万人以上的部队对约16万的共产党部队发起第五次“围剿”。这次由于有大炮、飞机和德国顾问的帮助，蒋介石终于战胜了敌人的游击战术。他们不断用碉堡进行封锁并不断缩小包围圈，旨在迫使共产党转入阵地战，或者通过包围和饥饿而歼灭之。国民党的政策是彻底清除跟共产党结为一体的当地农民并将该地区变成荒野，使之无法支持游击队。房屋被烧毁，牲畜和人被赶走，农田撂荒，村子里有成堆的尸体在慢慢腐烂。国民党通过处决或者饥饿的方式清除了无数中国同胞。1934年10月，共产党余下的9万至10万人向西突围，他们分散开来以躲避敌机的轰炸，开始了通过中国后方的战略转移。经过长5000英里（约8000千米　）、历时一年的长征，他们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他们被赶走了，但是并没有被消灭，因此问题仍然存在。

1934年12月，日本照会准备不再遵守两年后才到期的《华盛顿海军条约》。由于军国主义者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取得海军实力的均衡，并摆脱5：5：3比例的束缚，日本与西方的最后一个条约关系也断绝了。

1935年6月，在去中国的船上，史迪威在题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文章中对局势进行了评估。这个分析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的判断都很精到，反映了他对局势有过透彻的研究。他认识到日本的目标是成为“远东大国”，要控制东西伯利亚、朝鲜、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由于空中力量的发展，为了竭力使本土不受苏联的进犯，日本要“把边疆推到戈壁的沙漠中，并迫使俄国在沙漠另一边作战”。这就必须逐渐蚕食并控制内蒙古和华北。这种意图已经清楚地体现在在北平和天津设立“非军事区”，即用日本军队代替中国驻军上。这种做法还会继续向北部省份延伸，直到日本完全掌握长江以北地区并掌控华北的贸易，而把上海留给“所谓的国民党”。

“这种蚕食有没有可能被制止？不，中国人不可能制止。”史迪威写道。现在是抵抗的至关重要的时期，否则就太晚了。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显示愿意跟日军正式开战的迹象。“他知道自己将被击败，而这意味着接下来将会爆发反叛。因此他会按兵不动，抓住可能抓住的一切，紧紧依

靠外国力量控制住上海；这是很多外国商业的中心。”

史迪威认为，日本在中国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对俄国建立一个“坚固的西部边疆”。他认为，中国人将失去华北，外国将束手旁观，最多“哼唧哼唧”，美国“最多发发照会”，而且“既成事实将会再次被承认”；日本将不会受到中国和整个世界的认真抵抗。

史迪威最后一句话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干——能够在历史过程发展的时候就理解它。他写道：“非常矛盾的是，蚕食会越来越被视为不可避免，而那些大国会越来越不愿意呼吁停止侵略。”这是绥靖时代的一个经典定义，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称呼。

---

[1] X表示醋的浓度，XXX表示醋的浓度很高。——译者注

[2] 原文Hip up on top of the whole lot of us，快速读起来和hippopotamus（河马）有些接近。——译者注

[3] 霍茨波（Hotspur），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译者注

[4] 这次轰炸事件即“一·二八事变”，事件发生的时间一说1月28日深夜，一说1月29日凌晨。——译者注

[5] 杜特（Doot），谐音Daughter（女儿），史迪威夫妇对二女儿迈尔德里德（Mildred）的昵称。——译者注

第七章

出任武官：中国最后的机会

1935—1937年

史迪威晋升为上校并于1935年7月7日重返北平时，作为军事观察员，摆在他面前供他研究的是中国的未来、日本的扩张以及对美国的影响。驻在国的能力和意图是武官的主要观察任务。他的职务是情报官员，任务是让陆军部了解那些具有军事意义的因素和发展。他的消息来源既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视察部队，观看野战演习，跟重要人物接触并结交外国同事，研究报刊、秘密特务的报告，还有耳闻目睹的各种传闻。通常武官最认真对待的那部分工作是社交方面的，其理论依据是参加晚会便是工作。但社交并非史迪威的强项；他避开了北京俱乐部，那些常去俱乐部的人觉得他“不是我们这类人”。但是他和一个叫丹夫人（Mme. Dan）的满族贵族关系很好；她是个满族公主，原是慈禧太后的侍女，是老式贵族中最出众和最有教养的妇女之一，经常受到史迪威夫妇的款待。他还结交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一个史迪威称之为“玉乔”的古玩商人。作为武官，他住在一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中，那原是为广州总督建造的，有很多院落和油漆过的柱子。他在休息室的一面墙上挂了一张定制的国画，增加了他收藏的象牙扇子柄，购买了一些蒙古马鞍垫子，搜集了慈禧太后的一件华丽的袍子，此外还有其他珍品。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在中国生活的魅力是它的人民品质，这抵消了肮脏、残酷、对痛苦的漠然和对人生命的轻视。此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之所以喜欢中国，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生活得更好，更有地位，仆人更多，而且比在自己的国家更舒适。但是对史迪威这样的人来说，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在这里可以接触到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中国人有内在的自尊，富于幽默感和毅力，思维敏捷，中国妇女身段优美、非常可爱。史迪威的助理武官戴维·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尉是美国军界最有才能的语言学家；他认为中国人“最聪明，在很多方面最文明，通常是最有魅力的（特别是他们想这样的时候），而且平均看来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民族”。



史迪威夫人和丹夫人，1938年

也许中国人有时似乎缺少西方人所说的忠诚，把官场的贪污视为理所当然，不太把诚实看作优点，有时傲慢，有时过于敏感；但作为让人肃然起敬的一种古老而发达的文明的继承者，他们弥补了自己的缺陷。孙子是公元前5世纪有关军事理论和实践的作家，他的一些论述比克劳塞维茨（更不用说拿破仑了）超前很多。史迪威和他那些同事们读起孙子的书仍然颇有教益。

面对日本的压力，华北的完整正在崩塌，正像海岸上沙质的峭壁受到海浪不断的拍打。两年前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后日本人停止了军事占领，之后他们不断发起旨在威胁的攻势，试图分割华北，使之成为像“满洲国”那样的“自治国家”。在史迪威到达的前一天，中国又丧失了部分主权，这次事件史称“何梅协定”。关东军借口中国对取缔反日活

动“缺乏诚意”，因此违反了《塘沽停战协定》，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要求解除所有反日官员的职务，代之以傀儡官员，并撤出河北剩下的国民党部队。国民党在北平的代表何应钦将军签字接受了这些条件。对蒋介石不满的人越来越多。桀骜不驯的山东军阀韩复榘对日本人和国民党一样仇视。他拒绝从河北撤出的国民党部队经过山东地界。河北那位不幸的省长宋哲元虽然忠于自己的国家，但是不得不跟侵略者合作；他每天忍受日本的侮辱，只能表面上行使中国的主权。

过去两年中，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施加了各种压力，试图迫使南京“和好”，意思其实就是顺从日本的渗透和控制。它要求中国退出国联，并阻止中国各种试图从西方取得贷款和帮助的努力。日本想使中国完全得不到外部援助。蒋介石深信，中国跟日本相比，在军事上和工业上均处于劣势，因此认为除了采取顺从合作的政策别无他法，只能希望时间能够带来转机。但是时间对日本更有利。欧洲法西斯正在兴起，而美国正在流行的是孤立主义，美英两国都不愿意公开支持中国而跟日本惹上麻烦。1935年，已经使德国退出国联的希特勒（Adolf Hitler）宣布废除《凡尔赛条约》，并宣称德国准备再次装备自己。同年5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在美国，奈委员会[1]透露了出售军火和卷入战争的关系后舆论一片哗然；接着国会准备起草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提供援助。

日军正在加强对华北的渗透，他们在街上横冲直撞，用枪托敲打那些挡住他们路的中国人，对那些傀儡省长和官员发号施令，不断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一些情绪激昂的声明，表明日本有领导亚洲人民的“神圣使命”；此时在北平比在南京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受奴役的生活现实。虽然外国使团在南京开设了领事或者代办等的办事机构，但是大使们并不想完全搬到长江边上那个泥泞不堪的城市去；那里常年下雨，新的馆舍不易找到，而且政府能够存在多久也是个未知数。这些外交官在北平的使馆区拥有馆舍，有俱乐部去逍遥自在，夏天可以到西山的别墅避暑，他们当然喜欢在这个皇城过那种安逸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的结束已经为时不远了。

南京已经有几百年没有作为都城了，而且那里住的是——正如史迪威说的——“那些讨厌的长江河谷的人”，他们比不上那些为人随和的北方人。北平的居民都认为，越往南去那里的人越坏。但是国民党强烈要求把公使馆迁到南京，以示对政府稳定的承认；在经过了八年后，这一点面子上的事总不能老是拖着。尽管不情愿，但是正式迁移还是要在

1936年完成。北平的美国公使馆将变成领事馆，有些大使馆员会留下，让史迪威高兴的是，他这个武官也在留下之列。考虑到事件发展的趋势，显然有必要对华北军事情况继续观察。

1935年，英国和美国带给南京的唯一的鼓励是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这样就跟已经这样做了的日本平起平坐了。9月份，也就是史迪威抵达中国不久，美国公使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Trusler Johnson）在其他馆员陪同下，在南京举行的正式仪式上递交了国书。有张集体照记录了这一时刻，里面的史迪威穿着挂着勋章的白色制服，看上去是个十足的态度平和的武官。

10月，他很高兴能一起去访问暹罗；这里跟中国一样也属于他工作的范围。他之前的那些武官都没有访问过这个小小的富于异国情调的王国；暹罗在东南亚是唯一的独立国，其独立是由于各自从相反方向挺进的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相遇，之后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分别夺取了一些边境省份，然后同意让这个王国作为一个方便的缓冲国存在。史迪威旅行时乘坐的是美国海军的“奥古斯都”号，这是正在进行正式访问的美国亚洲舰队的旗舰。让他吃惊的是，他觉得很乐意跟海军打交道。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每个人都把我当作来访的王室成员，而不是一个混账的陆军乘客。”曼谷是外交人员难得到来的地方，为此这个首都殷勤接待了“奥古斯都”上的这群人。在参加宴会、晚会和皇家接见之余，史迪威还设法视察了步兵、骑兵和空防部队，并写出了详细的报告，介绍了有关暹罗陆军的训练、构成和防御等问题。

他11月回到北平时，日军所采取的一个新的举动使得华北的局势再次陷入危机。日本竭力想让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独立，因此在非军事区屯兵，其意图是恫吓并对宋哲元将军施加压力，迫使他宣布将这个地区从南京独立。身材高大的宋哲元出身山东农民家庭，他像如来佛一样面容平和但又让人过目不忘，手里老是夹着一支大雪茄。日本人批准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因为他们认为可以控制住他。其实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日本人对他威逼利诱让他不胜其烦，于是他打算回到自己老家的村子给祖宗守墓去。名义上他统率第二十九军，共计4个师6万余人，但根据日本要求，他只能在河北北部驻扎1万人。11月，面对新的压力他委曲求全，但是从来没有屈服过，一直希望南京能够痛下决心奋起抵抗。蒋介石有理由认为日本在何种程度上支持陆军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因此蒋再次按兵不动。

对蒋介石意图的担心在增加。有人认为他不会冒险跟日本人对抗，

另有一些人认为到了一定时候他就会转变态度，不再退却，即便是迫于公众压力也可能这样。宋子文曾对《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记者哈利特·阿本德（Hallett　Abend）说："现在是战斗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抵抗，那么我们就可能会永远失去机会。毕竟哪怕是失败也会有所收获。与其不战而退，不如战而失利。"这是一种浪漫的西方观念，对蒋介石是毫无吸引力的。尽管据约翰逊大使说，蒋介石和宋子文代表了其政府中"唯一的脊柱"，但是他们的意图有所不同，而美国的政策将取决于谁的意图占据上风。

华盛顿从使领馆那些观察员那里所接收到的有关中国的观点是悲观的。自1934年以来，他们一直对国民党作为统一和改革中国的力量感到失望。有个热忱的中国人也同意这种看法。胡适曾对一位美国朋友说，国民党"已经死亡，但是还没有掩埋，所有没有掩埋的东西都会对那些活着的人造成麻烦"。国民党从来没有像皇室那样发挥过统一的作用。现在失去的不仅是王位，而且还有它的政府工具，即帝国文官制度，但是却没有合适的替代物。与此同时，国民党领导层已经退化，政府在专制和军事阶段变得强硬，但并没有像许诺的那样进入有关国民福祉和民主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国还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有一半在30岁之前死去，75%的人死于可以预防的、由于肮脏而引起的疾病，那里的农民要缴纳44种税——这些税有时是提前几十年就征收的。这些税五花八门，从土地到床到锅子都要缴税，为军队缴纳的税有11种，与公共开支有关的有9种。如果这些还不够，那还可以随时增加"临时经费税"或者"非常税"。跟过去一样，"老百姓"支付政府的费用，不管当政的是皇帝、军阀还是国民党，情况都是这样。蒋介石将80%的税收都用于军事上。

大学教员、合作团体和改革者试图迈向现代化，废除各种非法税赋并帮助农民买回失去的土地，但是，这种努力尽管勇敢却受到旧势力强大惰性的阻挠。政府依然腐败低效。自1927年后湖北省更换了五任最高军政长官，而安徽则换了六任，与此同时更换的还有各局长、区长和各种地方领导，因为这涉及任命亲信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把这些职位给予那些对自己忠诚的人。华盛顿驻华机构经常会报告一些有关高官贪污的传言。据说在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的时候，宋霭龄"对所购买的军事飞机都要拿回扣，数目虽然不大，但是一笔不少"。还有传言说宋霭龄和宋美龄还操纵政府债券，并在孔祥熙博士推行币制改革时通过投机白银而聚敛了大量财富。约翰逊大使认为，孔祥熙博士及其小舅子宋子文不可能对中国的问题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因为这涉及他们个人的

各种财务利益。

约翰逊大使（作为使团的首脑，他也是史迪威的上司）虽然对国民党已经没有了先前那种信心，不过他还是认为蒋介石是可以把中国统一的唯一的领袖。约翰逊是个48岁的中产阶级人士，脸庞又大又圆，头发正在变少，看上去面容和善，尽管有些日耳曼人的气质。他1907年作为语言学员开始来到中国，之后在从汉口到重庆的一些城市中担任过领事。1925年到1929年，他从领事升至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在职期间他反对麦克默里敦促在1927年对国民党进行干预。在远东司继任他职位的是斯坦利·霍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此人在此后十五年里成了远东司的霸主，而约翰逊则于1929年回到中国担任公使，他是多年来担任这个职位的人中第一个能说汉语的使馆人员。他对中国的了解不算深入，但是很广；他不装腔作势，不喜欢举行正式晚会，也不喜欢跟北平的社交界来往。约翰逊接受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信条。不管他的办公室搬到哪里，墙上总是悬挂着写着这句话的精美书法作品；这是很适合他个性的。

约翰逊报告说，由于关东军在中国的领袖们心目中造成的“恐慌和畏惧”，“华北所有敌视日本的领导力量均被清除”，而且根据各种情况看来，“南京政府已经是惊弓之鸟”。为了摧毁中国的经济并切断它的税收，日本对中国的走私正在日益猖獗。整船的包扎好的棉制品、人造纤维、食糖、煤油、香烟和各种其他工业品都运到后，再由武装卡车从东北和各海港偷运进来。当地官员对此都默许，他们或者被收买或者受到威胁。日本在天津的租界里从事大规模的海洛因和吗啡的交易。约翰逊在1936年写道，对中国海关的进攻“是我所知道的一国对另一国最为残酷的做法，我毫不怀疑这种做法会成功”。1907年就来到中国的驻南京使馆参赞威利斯·佩克（Willys Peck）所提交的报告也同样悲观。在就中国重建的困难所进行的常规报告中他突然爆发了，写道：“太晚了，太晚了，这个船长喊道。”华盛顿对此大多不予理睬，不想鼓励积极支持中国的政策。



外国武官（自左到右：意大利、英国、日本、法国、美国）在北平，1935年7月，右一为史迪威

1935年11月，日本就分割华北发出最后通牒，这时约翰逊就预计日本人可能得逞，除非中国人通过加强抵抗“迫使他们使用武力”，因为这就将给整个世界——特别是国联和美国——造成一种非常“棘手的”局面。

罗斯福政府竭尽全力避免遇到这种棘手的局面。总统在第一任任期里主要专注于国内事务，无意招致美国公众对卷入别国麻烦的极端反感。当时对外交事务尚能有一点关注的是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史汀生的努力只产生了负面的结果；他未能帮助中国，却招致了日本的敌意，而史汀生的继任者无意再重复这个过程。新政府的政策主要不是要遏制日本，而是要避免与它对抗。英国也希望采取慎重态度。它们在欧洲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不想在远东地区陷入争端。

但是日本人还握有王牌：菲律宾、香港、贸易利益——此外还有道义上的问题，这既有关对中国传统的支持，也有关对抗入侵的集体安全问题。西方大国并不想被赶出远东，也不打算放弃中国。那时的政策是，中国的独立对门户开放政策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些大国试图通过提供贷款和共同提供其他援助的方式支持中国独立的做法，招致了日本的强烈反应，结果只能作罢。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一直想对中国进行财政支持，但却不了了之。美国有

些负罪感，因为参议院所采取的白银购买政策不幸扰乱了中国的银本位币制，但是摩根索的努力却因为中国乱糟糟的财政状况而终于搁浅。

美国要想让中国独立已经变得困难，更不要说使它强大了，而且鉴于美国的这种行为所引起的日本的敌意，这样做也是很危险的。由于对中国是否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日渐悲观，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一些决策者开始产生疑虑，不知道这种努力是否值得，不知道中国的完整是否对外国在大陆上进行贸易是必需的，不知道最终是不是就不能跟日本人打交道。既然中国不能或者不愿意帮助它自己，那么为什么要冒挑起日本敌意的危险去帮助中国呢？否定的回答显然更加可取，这时发现门户开放的基本原理，即认为美国贸易机会巨大，不过是幻觉而已。无论是远东作为一个整体也好，还是特别就中国而言，它们均与1900年那些帝国主义者的乐观估计相去甚远。在美国1935年的海外投资中，远东占6%，中国占1%。在美国1931年到1935年的外贸总额中，中国在总体份额中的比重不到4%。中国尽管有四亿人口，但是所占美国贸易和投资的份额仅相当于具有7000万人口的日本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在远东真正有很大利益的英国开始发出这样的疑问，那就是，跟日本的扩张相比，中国的虚弱是不是威胁更大。由于中国未能强大到能够捍卫自己的主权，为了远东的和平，必须要有某种权威来填补这种真空。考虑到目前局势的危险，英国大使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爵士对约翰逊大使提议说："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日本在亚洲为所欲为。"但是他同时承认，"要在日本进攻前做好撤出的准备"很难。

在华盛顿，决定政策的主导因素便是对日本在受到挑衅后发起战争的担心；约瑟夫·格鲁大使曾经多次警告说，考虑到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无为成了主导方针。日本人在没有采取公开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继续对华北进行渗透，而由于受到日本温和派不断的熏陶，美国仍然对此保持沉默，希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狂热在不遭到对抗的情况下会自行消退。赫尔国务卿写道，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外交官总是竭力向我们说明在日本有两种面目：一种是人文的、和平的和民众性的，另外一种是军事的和扩张主义的……如果我们不阻止军方在远东扩张的权力，那么政府中的和平因素就会最终占上风并维持和平。因此不使日本出现最糟情况的决定权其实在我们自己"。

中国对美国的缄默感到震惊，开始焦急地询问，并暗示说中国可能被迫与日本结盟。它的暗示没有引起任何反应。赫尔国务卿决心把与日

本的关系维持在不太危险的水平上。在1935年12月就远东政策对媒体的声明中，他对待这些问题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毫无干涉的意味，几乎是向日本保证美国不会干涉。

最终扭转事态的是中国人民，或者说是一些慷慨激昂的北平市民。日本在华北的存在导致了一种可能挫败日本计划的局面，这就是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南京政府竭力想通过新闻审查和镇压来阻止这种情绪的公开表达，但是这只能造成压制下更强烈的情绪沸腾。有些绝望的中国军官公布了日本要求中国在12月10日前宣布华北“自治”的最后通牒，于是民众开始公开要求抵抗，而12月7日北平的大规模学生请愿就是公开对此表示支持的。在一旁观看的民众拍手欢迎，然后无视警察的阻拦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甚至人力车夫也喊起了被禁止的爱国口号。示威活动扩展到其他城市；在北平和天津，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游行。请愿书纷纷涌向南京。学生们征用了京沪铁路的列车并鼓动沿线人民迫使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全国救亡联盟成立了，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又成立了三十个爱国阵线集团和协会以及抗日“统一战线”。

共产党的地下党人和宣传机关推动了这种运动。共产国际现在的官方政策就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在1935年7月到8月间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的。对苏联来说，在西线出现一个军事化的德国，而在背后的亚洲大陆上又出现一个军事化的日本，这成了其命运的主导现实。当时普遍预计会发生日俄冲突。

在关东军在中国北部大陆上的各种冒险活动中，自“满洲事件”开始，观察家们就一直不清楚，日本是想同苏联发起冲突还是想继续吞并中国。因为关东军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本身就没有拿定主意，因此这两种均有可能。对苏联来说，如能将日本引向南方，从而陷入跟中国战争的泥潭之中，这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因此共产党感到重要的是唤起反日情绪并激发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战，不但因为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工具，而且也符合共产党自己的利益。因为如果蒋介石不得不抗击日本的话，那蒋介石就不可能继续对共产党进行追击了。此外，他们还意识到，尽管这也许不是马克思的信条，但是确实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他们认为民族战争比阶级战争更能打动人，而这种爱国事业给了他们与北方民众连接的渠道。

正如约翰逊所预计的，全国抵抗运动的发展是迫使日本使用武力的一个因素，这再次让世界“难堪”。在经过了12月的示威之后各种呐喊声

已经无法再忽视了，而日本炮制的华北“独立”看上去也根本不像什么自决。这种独立被取消，而日本暂时只能满足于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此作为他们的控制基地。自此之后，所有的反日活动都被指责为是共产党鼓动的；日本成了亚洲反共的先驱，并竭力想迫使蒋介石加入反共联盟。正像跟希特勒结盟对英国和法国的右翼有吸引力一样，这对很多中国人也很有吸引力。但是蒋介石很清楚，跟日本结盟就可能使他失去全国领袖的地位。他那样做就会给共产党和他的很多对手一种对他群起而反之的借口。南方李宗仁和白崇禧那一伙人已经在以要求对日抗战为借口准备驱逐他了。

蒋介石仍然保持了平衡，继续私下谈及武装抵抗，但并没有真正采取行动，除非是针对共产党的。他不想转移自己歼灭共产党的力量，因此他逮捕并囚禁了煽动抗日情绪的领袖，并取缔了全国救亡联盟。跟入侵者的方针不同的是，他想尽可能长地延长这个问题。尽管他和中国人民害怕日本人，但是他们一直认为这种祸患只是暂时的，凭借中国人的无比智慧——更不用说人数了——中国人必将能够坚持到最后。蒋介石无意妥协，相反，他已经开始促进四川的发展，准备一旦事情紧急就将政府迁至边远的四川重庆。

蒋介石仍然指望美国早晚会进行援助，因此他告诉约翰逊大使说，他的政策是“继续”武装抵抗日本。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要弄清这种意图有多大的真实性，中国的积极抵抗在多大程度上会使美国“难堪”。军事准备情况可以提供某种答案，而找到答案正是武官的任务。

跟过去一样，史迪威开始了从华南到东北的一系列旅行。第一次旅行是1936年4月去广州和两广地区；那里李宗仁和白崇禧正在酝酿反叛，但是这次旅行并未了解情况。他没有直接乘火车去，而是通过从内地乘坐客车、汽车、江轮、渡船以及步行去的。在去桂林的路上，他曾经从一个边远小镇步行30英里（约48千米　）到达下一个小镇。事后一个认识他的人写道：“你恐怕是美国大使馆中唯一到过这些地方的人了。”并不令人奇怪的是，在一节可以容纳125人的三等车厢里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南方人太可怕，而且太多了。”在广州他视察了军官学校，乘江船到达梧州，又从那里乘当地的客车到达南宁。他在那里遇到了正在闹分裂的领袖之一李宗仁。北上经过汉口时他认识了美国领事罗伯特·嘉维斯（Robert　Jarvis）；史迪威觉得他“看上去很有头脑，因此在汉口显得颇为与众不同”。

他从汉口乘火车回到北平。在餐车中吃早餐时，咖啡的味道就仿佛

普鲁斯特笔下的“小玛德莱娜”（madeleine），又使他想起1920年时初到北京的时候——“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树梢在风中晃动，太阳还是相当强烈，空气清新，什么都是崭新的。孩子们还小，我们前面还有很多东西。现在没有那么好了……是什么造成了那种感觉？东西是新的？……那时没有烦恼，期望未来还有奇异和有趣的事情，孩子们还小，前面还有很多时间……”当史迪威沉痛地写下“现在没有那么好了”并奇怪地预感到时间不多了的时候，他53岁，生命只剩下十年了。



史迪威在中国南方步行调查，1936年

只是在6月他第二次去的时候，他才得到了问题的答案，知道了政府是否在认真准备军事抵抗。答案是“否”。史迪威准备沿东西向的陇海线从徐州出发，查看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军力部署情况。跟1927年大不一样的是，徐州已经很“繁荣”。史迪威通过河南北部去开封和洛阳——“平坦，肮脏，到处是尘土和沙子”。回到徐州，然后乘货船经大运河。在确定了部队的布防和番号之后他报告说：“没有迹象表明对日本进一步蚕食计划抵抗。没有增加兵力，甚至连这种想法都没有。没有训练

和演习。”要么是中国已经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而且“以当今其他军事大国还未曾掌握的方式对之进行了隐藏，要么就是中国没有进行任何准备”。他报告的副本除了按常规送交情报处外，还被约翰逊送交国务卿。

从部队的布置来看，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评价甚低（他在私下的笔记中表达了这种想法）：“他（蒋介石　）也许无意做任何事情，也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跟一个世界强国作战意味着什么……如果他准备沿陇海线作战，那么，要么他是个大傻瓜，因此没有做准备，要么还是个傻瓜，以为战争一旦展开他就可以奋起战胜敌人。”从蒋介石这种毫无行动的情况判断，“似乎日本人告诉他，他们现在不会再继续进攻了”。但是就未来而言，如果蒋介石想守住陇海线的话，那么他就应当改善交通情况：“要改善铁路。往南敷设支线。在铁路后面建造公路网。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做。”

相反，他不无厌恶地写道：“蒋介石到处指手画脚。‘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挤。’”跟大多数西方人一样，史迪威对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的、旨在让人们暂时忘却日本入侵的“新生活运动”中提出的种种口号十分反感。这种运动旨在端正品行、态度，改进社会服务，保持清洁、诚实并消除吸食鸦片和贪污的行为。这代表了儒家对“礼教”的追求，对某些中国人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不了解情况的西方人来说，在国难当头、百废待兴的时候劝告人们不要吐痰、吃饭不要出声、要“准时”、要“坐端正”和“消灭苍蝇老鼠”，这未免显得轻佻。

史迪威对中国部队做了估计。他按照各省进行登记，并分解到各军和各师，列出指挥官名字、指挥部位置和各部队不同的兵力规模。据此，在1936年8月，不算非正规军的话，中央政府部队共有130万人，另有36万受各省控制。在取代了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的冯·福尔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将军的指导下，蒋介石正竭力组建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黄埔军校原来是苏联教官，现在他们被30名德国教官所取代，并通过这些教官的关系开始购买德国武器。然而，如果不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话，那么中国军队不可能被铸成一支全国性的军队。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国王一样，蒋介石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各省的军阀们愿不愿意对他效忠。至于进行基本的改革，也就是改变普通士兵原先的生活，或者是他们要为之用战斗去捍卫的生活——在这方面很少有所作为。蒋介石并非一个急于推翻旧体系的积极进取者。他什么都没有改变。他是个得过且过的人，没有什么打算，过得去就行。

正如史迪威在前一年的情报报告中写到的："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看不到还有别的什么有影响力的领袖……可以取代他（蒋介石　　）的位置，并凭借他那样的威望继续做下去。"他指出，缺少替代性的领袖人物是"所有独裁者"的通病。

为了继续研究局势，史迪威在7月和9月两次去南京，并在那里视察了步兵和炮兵学校，结识了各类中国官员，其中包括后来他十分憎恶的何应钦。他开始收集有关共产党红四方面军和现在驻扎在西安的张学良的东北军的情况。据知情人报告，这位少帅已经戒掉了鸦片，但是"没有对部队有任何举动。他只是乘坐他的私人飞机 [2] 飞来飞去"。

南京对史迪威没有吸引力。"要是命令我去南京怎么办？"史迪威这样问自己，而他写下的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出路是"回家退休"。自从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之后，在日本的蹂躏下，甚至北平的魅力也在减少。在公使馆北面，每天都可以听到日本步兵和骑兵伴着刺耳的喇叭声训练的声音。插着日本太阳旗的日本军官乘坐的汽车在街上飞驰而过。日本军官骑的马对他们来说总是显得太高大，结果他们只有在别人帮助下才能骑上去；需要的话有时还有勤务兵在后面跟着跑。宾馆到处是日本商人和其他日本人，他们开设自己的咖啡馆和妓院，并在高尔夫球场上打球。一群群日本学生集体在"满洲国"和华北旅游，参观天坛和颐和园。不用说，史迪威跟其他热爱中国的人一样憎恨日本人，只是他憎恨的程度更深罢了。他在河南时看到有些日本人受到当地警察的折腾，于是史迪威写道："我喜欢这个，鼓励他们继续这样干。"

在这种心态下，他在"满洲国"旅行可需要进行一些自我克制。他采访这个"自治国"的"外交部副部长"，结果并不意外地发现这是个叫大桥的日本人。"我们是唯一阻止俄国实现亚洲苏维埃化目标的。"他宣称道。针对史迪威的提问他回答说："当然俄国想"在远东"继续扩张"，而那种情况"将对日本至为危急"。如果"满洲国"和日本失败了，那么中国将轻易成为牺牲品；因此日本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在今后的五年里必须想方设法解决这种危机。这次谈话是在1936年9月进行的。史迪威提交给情报处的有关这次采访的报告在政府中广为流传。

10月，蒋介石集结部队准备对共产党进行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清剿"活动，而且希望通过英国和美国的斡旋能让日本人在此期间不要有军事行动。中国人希望美国能敦促日本保持克制，但是美国无意进行干涉。当中国大使询问如果发生冲突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的时候，赫尔国务卿只能回答说："我们的国家当然对和平有浓厚的兴趣"以及"我们

真诚希望不会发生冲突”。

史迪威也被试探过。一个中国上校带着其上司的提议前来见史迪威，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就阻止日本达成“默契”，并在华盛顿建立中美联合总参谋部以制订作战计划。此人告诉史迪威：“如果美国采取行动，那么它可以阻止日本”，但是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日本就会控制中国的资源，这会妨害美国的利益。史迪威在报告中评论说：“这再次表明中国人希望由别人做他们自己不敢去做的事情。”他还很有见地地说：“可能这说明，如果得不到援助，他们就不打算进行抵抗。”

史迪威也对道家清净无为的想法印象深刻，并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上抄下了这句话。那里写着的只是这句话最前面的两个字“无为”，而中国人的头脑中自然会补全这句话后面的部分“而无不为”。史迪威认为，“无为”是中国人性格中典型的东西，因此他得出结论：“他们从个性上说不想影响事态的发展。”尽管这个结论有很多例外，但他觉得这是东方人生活的一种特点，是让西方人非常不耐烦的特性。这正像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墓志铭上写的：“躺在这里的是一个企图让东方人动起来的傻瓜。”与此相反，欧洲人及其美国后裔们则受到另外一种冲动的驱使——他们想改变令人不满的现状，想行动，想摆脱压迫，想寻找边疆，想跨越大海，他们是些相信行动之效力的乐观派。然而中国人则一直待在原地，被各种墙壁围困在房屋、村庄或者城市之中。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生活在家庭的专制之下，在自己祖先的坟地周围种植粮食，他们永远延续了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和谐比争斗更加重要。

1936年的世界乌云密布，法西斯正在变得大胆，而民主国家正在变得虚弱。当年2月，极端主义的日本下级军官发动政变并谋杀了数位年老政治家；尽管政变失败，但是对反对军国主义的人却有一种威慑作用。3月，希特勒未遇抵抗便进入莱茵河地区。5月，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国联口头上说要对意大利制裁，但最后只能取消制裁，而不想挑起争端的英国舰队则从东地中海撤出。蒋介石并非唯一未进行抵抗的人。在日内瓦，被流放的海尔·塞拉西 [3] ，那个形单影只、身披斗篷的矮小人儿，最后呼吁大国帮助他；他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来支援，那么西方将死去。”7月，在独裁者的帮助下西班牙右翼发动叛乱，这使西班牙陷入内战。在共产党的鼓动下抵抗开始了。世界反法西斯的热情都倾注到了西班牙，结果“统一战线”变成一股积极的力量；尽管民主国家都躲在“不干涉”这块幕布的后面，想眼不见为净，但是最终双方均卷入了即将到来的斗争中。日本对此看得很清楚，它于11月跟德国签署了

《反共产国际协定》。

在中国，共产党似乎拿起了抵抗的火炬。1936年他们在山西发起的一场攻势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的军事对抗主要是针对阎锡山的地方武装的，但是由于他们宣传爱国抗日，加之枪杀了一些地主和收税人员，这在当地激起了很大热情。

史迪威在3月初去山西北部的太原和汾州调查此事，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尽管打着“打倒阎锡山”和“打倒日本人”的口号，但共产党的行动是由于陕西缺乏粮食造成的，他们“除了寻找新的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外并无具体目标”。他在其情报报告中指出，由于阎锡山的部队战斗力弱，因此渗透相当容易。有个旅没有试图阻止共产党部队进入山西，“因为这不属于他们的驻防地区”。另外一个旅被红军伏击，“原因是电话通讯出了问题，以至于汾州卫戍司令还以为他是跟自己的部队通话”。“如果就中国军队的表现来对之判断的话，那么谈抗日纯属无稽之谈。”

共产党加强了抗日的宣传攻势。8月，他们向国民党发出公开信，表示愿意积极赞助建立一个“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All-Chinese Democratic Republic），以共同抵抗入侵者。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想让蒋介石跟日本公开对抗。

在一则未标明日期的笔记中，史迪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推动了共产党？某种道义上的支持。这是什么？”紧随这个问题的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想法：“给贺龙写封信问问他怎么样？”贺龙是红二军团总指挥，1928年到1935年11月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地区活动，后来在主力红军出发一年后的1935年11月也进行长征。史迪威的文件中没有提到他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结识了贺龙，也没有提到他准备怎么把信交给他。

他在笔记中继续写道：“他们有很好的情报工作、很好的组织工作和很好的战术。他们不想要城市。愿意在乡村艰苦度日。他们的武器和装备都很差，但却把政府吓个半死。”这些因素跟正在衰退的国民党成了鲜明对比，给外国观察家造成很深印象。史迪威已经对共产党的情况了解了很长时间，显然已经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了其他武官。英国大使馆在1936年2月感谢他“对中国共产党形势的很有意思的简报”。

熟悉中国农民困苦但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史迪威把共产党看成一种局部现象，认为是压迫的必然结果。他在写到农民时说：“他们饱受饥荒和旱灾之苦，忍受各种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受到各种中间人和地主的盘

剥，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想调整土地所有制，因此他们成了共产党——至少他们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他们的领袖采用了共产主义的方法和口号，但是他们真正追求的是合理的土地所有制。中国人天性并不倾向于共产主义。”

这种分析在当时是很正常的。那些外国人把自己国内的共产党视为邪恶的威胁，但却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视为地方现象，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各种积弊和试图改变这些情况的改革者作用下在当地的特产；正如嘉维斯领事对史迪威说的：“他们根本不是共产党。”在上海的美国商业界喉舌《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通常采取美国商会的见解，但它宣称中国共产党有些“很聪明的想法……根本上说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通常人都可以接受的想法”。简而言之，他们在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他们的军事组织和对待士兵的方式跟中国通常的做法有所不同，这让乔治·林奇（George A.Lynch）印象深刻；林奇跟史迪威一样也毕业于西点军校，在史迪威担任武官时他担任第十五步兵团团长。1932年林奇在菲律宾服役时，曾经利用休假的时间来中国旅行，当时他在江西观察了共产党；他发现他们不抓壮丁，给他们发饷，不让他们骚扰民众。“这种做法跟南京政府控制区的做法恰好成为对照。”他向情报处报告说。结果很多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开小差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

两年后，美国驻云南府的副领事阿瑟·林沃尔特（Arthur Ringwalt）描述了他看到的长征中经过西南时共产党士气高昂而且“几乎堪称狂热的目标一致”。尽管他们装备简陋，吃不饱且由于多年争战而精疲力竭，但是他们的领袖是饱经磨难的人，作为一个集体，他们显示了“一种执着奉献和不谋私利的气质，这是自太平天国起义后未曾在这样大规模的人群中显现出的”。

外国公众对共产党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作为第一个访问陕西延安的外国记者，于1936年11月开始在《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 ）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是他在延安这个“独立王国”中对共产党领袖的采访以及在当地的见闻；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在南京自然是负面的。这些文章以《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 ）结集出版并在国内外大量印刷，第一次让世人听说了长征并首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性格、生活方式、信仰和意图。他渲染了他们的反日情绪；在20世纪30年代那种人们正旗帜鲜明地反抗法西斯的氛围中，这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马克思主义也不那么显眼了。



毛泽东，斯诺摄

正如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所解释的，打败日本应该在社会变革之前，因为必须先打败外国帝国主义并赢得独立；只有那时，向社会主义的奋斗才可能成功。出于这种原因，他愿意同国民党一道抵抗这个帝国主义敌人。毛泽东的话很有说服力。“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他坦率地表示，在

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摧毁帝国主义最强大的基地之一，会加快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地发展。”[4]

其他美国记者也紧随斯诺来到延安，他们都为其采访对象的简朴生活所吸引。他们共同参加农活劳动，言语朴素，勇于实验，相对于衰败的国民党无异于一股清风。因为他们将革命置于第二位，外国记者对革命没有怎么注意；就像史迪威认为的一样，“共产主义”看来不过是一纸标签。

1936年12月，蒋介石去西安准备发动第六次反共“围剿”，结果遭遇了一个现代国家元首所能够经历的最奇特的事情。负责此次战役的张学良为了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共同对日，结果扣留了蒋介石。这些被赶出东北的少帅部队无意跟共产党作战。蒋介石已经动员了坦克、轰炸机和十个师的部队，他本是前来督战的。之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绑架行动。

一般认为蒋介石难逃一死。不但蒋介石自己这样想，而且张学良的一些部下也怂恿他这样做。最后救蒋介石一命的原因是——当时仍然是需要他的。在西安，在延安，在人心惶惶的南京，尤其是在莫斯科，所有的人们都立即看到了一种前景——如果蒋介石被除掉，那么中国将陷入混乱，内战将延长，因此只有日本会是赢家。蒋介石在被绑架前既不受公众欢迎，也没有得到其支持者的热烈敬佩，但是传统上对家长的服从习惯，以及在家长制下人们所体验的安全感现在均已转移到国家元首的身上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分量可以替代他，也不会有别的政党能够执政时间超过三个月。如果要制止内战并使国家的资源能统一对日，那么现在也只有蒋介石能够办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参加绑架后的谈判的共产党帮助蒋介石活了下来；这主要是因为莫斯科坚持要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愿意这样。苏联人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希望蒋介石活下来，而不希望中国出现混乱并使日本人因此受益。

在蒋介石的命运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各国武官纷纷前往最靠近西安的国民党基地洛阳；洛阳当时已经陷入反叛者之手。虽然西方大国不像苏联人那样感到情况十分危急，但是他们也担心中国出现混乱，因此希望武官们在那里可以施加一些压力并有助于释放蒋介石。这次旅行后来证明是多余的。史迪威于圣诞节抵达洛阳，当时蒋介石刚刚乘飞机到达南京，让世人吃惊的是，扣留他的张学良也随后到达。听说了蒋介石被释放的消息，欣喜的民众举行了示威游行。蒋介石的声誉增加了，而张学良此后一直被软禁，从那时直到今天，对他的不同程度的监视一直未

断。 [5]



1936年12月7日，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宴请驻陕各军高级将领。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劝谏，两人起争吵，遂有其后的兵谏



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端纳带着宋美龄的信飞到西安面见张学良。端纳曾任孙中山、张学良的私人顾问，此时则是蒋介石夫妇的私人顾问

尽管为了顾及脸面尽量避免给出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为了蒋介石的释放而达成了妥协，不过实际上蒋介石同意取消第六次“围剿”，并与共产党在名义上结成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共产党同意停止对地主的斗争，并将他们的军队置于国民党的统率之下。在此后几个月中进行了错综复杂的谈判，双方都觉得没有理由相信对方，也都没有放弃最终摧毁对方的目标。国民党很无意过深卷入抵抗。蒋介石的意图仍然是，尽可能避免或者延迟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直到外国进行干涉并向他提供帮助，从而使他能够将日本和共产党一同击败，这样他就是最终唯一的、绝对的胜利者了。

西方对西安事变后出现的国共统一对外的迹象印象很深。共产党的各师团改编成八路军并由南京政府统辖；他们在南京设有办事处，甚至还出版了一份报纸。华盛顿通过约翰逊大使以及别的方面的报告感到，中国最终真正开始出现变化，开始对政权民主化，开始进行真正的融合。

日本人同样也在西安事变的结果中看到了一种信号。他们认识到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国民团结的精神，正如1937年5月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Sugiyama Hazime）将军所说的，这“可能根本阻碍日本的和平挺进”。关东军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开始要求采取直接行动。

史迪威并没有被西安事变后所出现的和解假象所迷惑。“中国目前有关民主的言论纯属空谈，毫无意义。”他在1937年初一份有关中日局势评估报告中写道。他预计政府方面会“继续实施拖延战术，坚持说准备应战，但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希望由别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中国的匮乏极其严重，外界援助似乎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史迪威还写道，相对日本来说，中国唯一的资本便是“人数、仇恨和一个庞大的国家。它没有领袖、士气、凝聚力、军火，也没有很好的训练”。此外，一旦发起战争，那么日本就可以封锁中国的港口。

但是，史迪威也相信中国人的内在品性，这让他相信中国有潜力。在研究1853年到1855年太平军进攻北部以及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将军镇压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史迪威发现，这些征伐“对那些认为中国人已经退化到不可救药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教训”。对于任何对中国的军事能力表示怀疑的人来说，“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战役之一”的左宗棠战役无疑提供了反证。“胆大心细”又“进取有恒”的左宗棠显示了“对局面的彻底把握”，在完成周密计划后又“立即乘胜追击”，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当今著名将领也会感到困惑不解。史迪威不但对士兵同时也对将领（军事史

家很少如此）饱加赞赏，觉得中国将士完成了“一个杰作”。他通过这些研究所形成的看法在他后来在中国任职期间起到了作用。

他觉得中国前途黯淡，因此在6月时索性跟朋友、法国武官萨巴迪埃（Sabatier）结伴去了绥远和蒙古。他给妻子温妮写信说，他打算去五台山，然后从那里步行去铁路，行程约150英里（约240千米 ）。

他作为专家的声誉正在增加。林奇上校从第十五步兵团回到华盛顿时汇报说，“在我看来，史迪威对中国和远东的了解要超过任何一位现役军官”。他在中国的探索“使他有了别人无法企及的背景知识”。

---

[1] 奈委员会（Nye Committee），以其首杰拉德·奈（Gerald Nye）参议员得名。——译者注

[2] 这是个被称作“飞行皇宫”的双引擎单翼飞机。飞机外表银色，里面有红色衬里，有两个长沙发、一个精致的写字台、包布的椅子、电台以及冰箱。尽管张学良雇用了一名叫劳埃尔·莱昂纳德（Royal Leonard）的美国飞行员，但是张经常自己驾驶飞机，驾机时他的长袍裹住腿，头上歪戴着紫色穆斯林帽。在自己的辖地上视察时，他跟部队的联系是通过往下扔纸条的方式，而下面作答则通过在地面上铺上布，无法这样的话，他们干脆自己躺在地上排成某种形状。

[3]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译者注

[4] 此处为斯诺在《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记录。——编者注

[5] 张学良后来一直住在台湾，周日的时候，人们常常可以在蒋介石做礼拜的同一个教堂看见他。

第八章

出任武官：中日战争

1937—1939年

在1937年7月7日这个满月的晚上，一群美国大使馆的人正在紫禁城幽深而静谧的北海上乘船游玩。这条船由船夫撑着，船上点着灯笼。这群人中有史迪威上校及其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南斯，大使约翰逊及其夫人，海军陆战队使馆卫队长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上校及其夫人，还有史迪威的朋友约翰·格特。大使带来了他的吉他并弹唱了他最喜欢的歌曲《走在那遥远的路上》，而船夫则在船边有节奏地划动船桨。船上灯笼发出的光在水面上闪烁，而月光下大理石白塔则在黑暗中挺立着，仿佛是佛教圣杯的样子。这群人仿佛觉得自己沉浸在老北京的氛围中，直到他们遇到另外一条坐着日本军官的船后，他们才又回到现实世界中。

马斯顿上校提到说，作为外国派遣部队的高级军官，他已经接到日本人的通知，说日本军队那天晚上要在京汉铁路以西12英里（约19千米）的铁路桥卢沟桥进行演习。日本人在这个地区的演习已经有两个星期，这在当地的报刊中引起了不安的猜测。在通向北平的交通方式中，这条铁路是唯一尚未被日本控制的，而卢沟桥则是这条铁路上的一个战略要地，这里有条支线跟天津相连。跟这条铁路桥平行的还有一座已有八百多年历史，有石狮子雕饰的桥栏及11个石拱的石拱桥。13世纪来到中国的第一位西方人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这个宏伟建筑赞叹不已，因此西方人也把这座桥称为马可波罗桥。

在乘船游玩的次日早晨8点，史迪威在办公室获悉在那座桥上发生了小规模交火。日本人声称受到驻扎在宛平附近的宋哲元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袭击，因此他们包围了宛平，并用迫击炮和榴弹炮射击，以迫使中国部队交出所谓有罪的军官。史迪威命令助理武官包瑞德少校与格特一道开车去查看一下。那里的景象很平静，只是偶尔有步枪声打破这个美好的夏日清晨的宁静，但是被派去的两人找到了引起事端的原因，这就是被一个排的日军看守的一具日本士兵的尸体。包瑞德和格特

意识到日本可能利用此事件作为借口提出苛刻的条件，于是他们知道自己可能在亲身经历一个历史事件。结果那实际上是一场战争的开始。



1937年，长城上的日本兵



1937年，北平29军伤员



卢沟桥

中国驻军司令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条件，当时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等到包瑞德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史迪威已接到报告说关东军正大规模向关内调动。尽管表面上日方在宛平还进行着谈判，但是史迪威和包瑞德都认为日本人已经开始了决定性步骤，准备占领华北。北平的气氛很紧张，谁也不知道交火背后的真正意图，也不知道蒋介石会怎么做。史迪威在第三天驱车赶往宛平试图与中国驻军接触，但是在他通过最后500码（约450米　　）的时候，双方开始激烈交火。司机没有停车就赶紧拐弯，“我们是用两个轮子着地才得以逃脱的”。

史迪威的办公室得到的报告显示，有1万名日军正在越过长城进入河北，运兵车正在以半小时一班的间隔通过山海关。为了了解发展中的局势，他组建了一个情报网，把他手下担任助理武官的五名资深语言教官派驻到各个城市中。他们中有四人已经在美国第十五步兵团服役过，还有两人，即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上尉以及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上尉后来再度跟随史迪威在远东服役。史迪威的儿子小乔当时在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工作，也被征调过来作为情报人员；此外征调的还有记者、领事、美孚石油公司职员以及任何可能透过各种流言的迷雾获取蛛丝马迹的人。要估计当时事态发展的轮廓，只能依据

一些琐碎的事实：天津上空日本飞机的数量，日本运送兵力以及物资的火车及卡车的频次，中国部队的位置，此外还有最难以捉摸的，那就是中国部队是否有集结的迹象以及是否有显露政府的意图的线索。

对于一个武官来说，史迪威采取了不合常规的方式；他把自己给情报部的电文放在办公室桌子上供记者参考。他告诉包瑞德说，他的目的是使别人尽可能多地了解真实情况，“这样世人就可能了解日本在关内进行入侵的真实情况”。由于他跟中国人站在一起，因此深深感到了中国所陷入的危机。

南京的沉默并不让人振奋。据说蒋介石当时甚至不在都城南京。日本人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7月18日前答复。蒋介石终于在牯岭（庐山的中心）发话了。牯岭是避暑胜地，外国人以及华人显贵为了躲避长江谷地的酷暑，乘着轿子到这里避暑。蒋介石没有号召抵抗，也没有排除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但是他宣布将不会再放弃任何华北的领土，并说跟日本达成的任何解决方式均不得妨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认为有必要进行武装抵抗了。当蒋介石的声明在北平广播之后，激动的民众涌上街头敲锣打鼓。

但是这种热情只持续了几天而已。由于政府没有制订和做出任何进行全面抵抗的计划和准备，日本人不到一周便控制了北平。日本人指责中国人挑衅，声称是“自卫”，日本人施加了各种暴行，而美国却对此无动于衷——所有这一切都让史迪威感到愤怒。赫尔国务卿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但是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对此史迪威评论说：“赫尔先生再次声明我们是反对战争的，这番话应当很快就能够阻止战争的。”

史迪威孤身一人，情绪低落。他的家人去沿海送两个大点的女儿回美国，之后他们一直待在秦皇岛海滨，直到8月中旬。他写信给温妮说：“这里的气氛让人悲伤和压抑，所有的事情都笼罩在黑幕中。上帝啊，想到战争已经爆发，这足以让你感到恶心了……这可能预示着这个阶段的结束，也可能是一场大风暴前的短暂平歇——谁也说不准。不管怎样，华北没有了。”

北平城外的零星战斗仍在继续，不过谁也不知道宋哲元的意图何在，甚至有传言说他已经“屈服”了。7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天津，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连续四个小时，他们的飞行中队从天津城外3英里处的一个机场依次起飞，并对大学内建筑物“系统地并不慌不忙地”投下密集的燃烧弹。日本司令部对记者说这些建筑必须铲除，因为这里窝藏着“反日分子”，也就是学生。轰炸是为了摧毁学生的活动基地，这样，

他们将无法组织游行或者印刷传单。日本在整个对华作战期间跟他们之前在朝鲜一样，有意攻击教育机构，因为这里是全民觉醒的源泉。

日军在通往天坛的路上伏击了一支中国部队，在地上留下了五六百具尸体。这些人大多没有武装，很多人被炸碎，连头和四肢都没有了。史迪威和包瑞德一道去查看情况，他看到30辆卡车上满载的士兵均被杀死，无一幸免，一些尸块贴在卡车的车厢上，而司机则倒在方向盘上。附近村民说，日本人提出，如果这些部队缴械就会接受他们投降，可是当他们走出村子的时候，他们用机枪和手榴弹袭击他们。死马在7月的烈日下胀得很厉害，而死去的士兵则倒在沟里，“有一个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上面有苍蝇爬着”。

在河北察哈尔傀儡政权的驻地通州，当地保安队听信了谣言，以为中国在北平取得了“胜利”，于是他们发起暴动，杀死了日本人和傀儡官员，并试图守住这个要塞。这种企图最终失败——日本增援部队消灭了他们，同时将这座城市化为废墟。

不到四天，所有的中国部队都从北平、天津地区撤出，从而使日本人完全控制了这些地区。中国缺乏统一的政策或者防御计划，加之卢沟桥和通州那些士兵的无谓牺牲，这些都让史迪威怒火中烧。中国人失去了那么多好机会，以至于“你不可能不对他们深恶痛绝”。他写道，中国人不大可能打败日本人，不过，如果他们协调行动并发出进攻命令的话，他们至少可以重创日军。

尽管有些晚了，但中央政府还是调集部队准备防御。全国救亡联盟被囚禁的领袖得到释放，禁止抗日歌曲和口号的命令也解除了。现在人们开始在街上唱这些歌曲，电台也开始公开播放这些歌曲。在南方，白崇禧专程飞往南京，在经过八年的对抗后，宣布两广部队效忠中央。为加强这个联盟，白崇禧被任命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云南和四川的军阀也拥护政府。到了8月底，包括共产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内的所有军事力量均联合起来并声称接受中央指挥。

最初一场小规模但却振奋人心的胜利引起了史迪威的兴趣，这就是林彪指挥下八路军的一个师在山西北部山区取得的平型关大捷。这个师利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借助在当地百姓帮助下建立的农村基地，在长城的一个关口伏击了日本军队，攻取了指挥部并截获了各类补给物资。尽管这对日军仅仅是个暂时性的阻截，但是这也说明共产党创造了一些值得研究的作战方法，因此几个月后史迪威曾经跟阿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花了半天工夫分析平型关大捷。史沫特莱是自由

撰稿的记者，曾在北方跟共产党一起待过数月。

9月24日，日本人夺取了宋哲元位于京汉铁路上的总部保定。日军兽性大发，3万名日军进行了一周的奸淫杀戮。残暴的日军就像嗜于征服的豺狼，吃得愈多愈加贪婪。日本人清楚，一个敌对的中国将使他们无法达成成为亚洲领袖的目标。在他们侵入中国大陆的这些年里，最使他们恼怒的莫过于不断出现的“反日”情绪。他们每年都坚持认为，必须强迫中国“诚心诚意地”与他们合作。他们原本想使中国依附日本，结果发现他们必须要征服中国；但是他们的每一步都招致更多的仇恨，而他们因此又变得更加野蛮。在保定，日军除了对人实施恐怖暴行，他们还在长达一周的焚烧中烧毁了所有的教科书，此外还烧了河北医学院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设备。农业研究所长达十年的作物统计资料也被蓄意销毁，这些资料是农业改良计划的基础。

到了8月中旬，这场还未曾宣战的战争已经蔓延到长江谷地，尽管日军最初并没有这样打算。在卢沟桥开战的时候，日军原先打算在约90天的战役中占领华北。他们认为南京政府会像从前一样只能无奈地默许，或者在日本不断增加对城市、工业和交通的控制后，南京政府只能妥协，并作为一个傀儡政权进行配合。蒋介石有意把战火引向上海，企图通过把日军引入中国的心脏地带而增强全国的抵抗决心，当然也很可能他是在遵循他从未放弃的一种战略——挑起国际干预。蒋介石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目标：摧毁共产党并等待通过外国帮助打败日本。上海是个有大量外国投资的国际城市，他认为，在这里发生战斗会引起外国出面调解，甚至会引起英美以及其他国家的干涉。

蒋介石把他由德国人训练的精锐师从南京调至靠近上海边缘的闸北，也许他认为在那里发生任何战斗都会导致涉及外国人或者外国财产的事件。日本在公共租界有海军驻防，同时黄浦江中还布满了他们虎视眈眈的炮舰。这些炮舰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用来威慑的。与此同时，关东军紧紧把守在北方。但是中国人向上海进发挑起了日本膨胀的支配欲望。他们让部队登陆，试图延长他们的阵线从而赶走中国人；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被中国顽强的进攻击退了。从那一刻起，这场充满悬念和悲剧性的战斗就在旁观的外国人眼皮下展开了。在第一周，中国人的顽强进攻几乎把日本人赶到了江边。由于有海军炮火以及制空权的优势，日本人得以进行增援和反攻，并最终使登陆部队包抄了中国阵地的侧翼。尽管日军通过驻扎在台湾的飞机以及停靠在黄浦江上的军舰不断轰炸，但是中国人仍然进行了三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捍卫了

他们的阵地。这恐怕是自1918年摧毁兴登堡防线之后世界上最受关注、最广为报道的重要战役了。

笼罩上海的硝烟和战火即便没有招致外国的帮助，但还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1927年北伐时著名的“铁军”领袖张发奎的指挥下，中国人向国人和世界展示了他们的战斗决心。在比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伤亡还要惨重的情况下，尽管白崇禧和其他人都主张撤出，他们仍然奉命坚守早就已经没有希望守住的阵地。蒋介石在上海除了死守外并无别的打算，不过他在博得世界舆论的支持。他由于延长了防御时间而受到了猛烈抨击，很多中国人对此永远记恨他。他性格的主导特性是坚韧不拔，也许他认为防御者所经受的痛楚最终会感化外国列强。

后来，在日本俯冲轰炸机和60码（约54米　）外发射的野战炮的轰炸下，中国军队的防线由于精疲力竭、饥饿和损失严重而崩溃了。最后几天的防御毫无意义，只是消耗了部队。等到下令撤退的时候，日军增援部队已经在海岸登陆并对撤退路线形成包抄。用一位中国指挥官的话来说，“撤退的悲剧简直难以描述”。损失了60%的部队，包括20%的经过训练的军官。

淞沪会战使得世界意识到了中国。有幅最有名的战时照片让美国人对这场战争有了人性方面的触动，这幅照片显现的是在一次轰炸后，一个哭泣的婴儿坐在一个遭受轰炸后铁轨旁边空荡荡的街道上。记者们奔赴现场，并在每天两次由中国政府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温习那些报道的有关英雄主义、流血和苦难的故事。中国被视为是在为民主而战，其体现便是坚毅的委员长以及极具魅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英勇无畏的委员长夫人。通过他们的形象，美国人看到中国意志坚强、目标统一。一旦这种印象得到固定，那么无论是从上海撤退时所犯的军事错误还是中国空军的大失败，这种印象都再不会有所动摇。中国空军好几周试图攻击停靠在黄浦江的日本战舰都未成功，结果却由于投弹失误炸死了2000名自己人，此外还炸了美国军舰“胡佛总统”（Hoover）号。

上海沿长江上溯200英里（约321千米　）的地方就是南京。日本人已经比计划更深地进行着战争，而且他们感到了战线过于拉长的危险，因此决心在南京这个首都结束战斗。他们有关“彻底摧毁中国抵抗意志”之必要性的声明中有种狂热的意味。日本首相广田告诉国会说，南京政府“展开了最恶毒的反日攻势”，必须“强迫其改悔”，以使之“通过日中之间的真诚合作携手维护东亚持久和平”。接着日军对南京、广州以及20个华东城市的空袭，据日本的声明说，其“目的是为了尽早结束敌

对”。仍然坚强不屈的蒋介石准备防守南京。这个决定从军事上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在南京后面设防的话将会赢得时间，避免大量牺牲，而且防御会更加坚固。他的意图又是为了引起世人注意，或许还为了引起外国干涉，因为南京有各国的大使馆。



惨烈的淞沪会战，《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王小亭摄

在北平，人们头顶上由气球悬挂的条幅，上面宣告了日军占领的中国城市，此外还有诸如“日军维护东亚和平”之类的神话；在此情况下，史迪威从职业需要上说必须跟华北的新主人搞好关系。要视察前线必须得到他们的许可，这是史迪威的个性所不能接受的。他的朋友格特感叹说：“他跟他们交涉时事情往往会出错。”为了改进这种局面，史迪威提出要一个会说日语的助手，结果借调给他一位在东京的语言教官，这就是马科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上尉——他当时36岁，是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的，后来成为美军参谋总长。有人警告泰勒说，他的新上司是位不同寻常的军官，很有能力，但是脾气不好，不好相处，但是让泰勒吃惊的是，他到达火车站时发现史迪威上校正在那里准备接他。他对这种礼遇很感动，跟他原先设想所不同的是，他发现这是个他所喜欢的人。他认为史迪威是个重情感和行动，而不重思索的实干家，一旦发现事情出错就想改正之。他认为史迪威在脾气不好的时候会做出很糟糕的判断，但是像一名战士一样具有勇敢而坚决的品质。

泰勒尽管无法控制结果，但是提供了一种缓冲，能够做出一些安排。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史迪威在一位日本大佐的陪同下去参观，结果他承认，由于问了一些尴尬的问题而被从铃木（Suzuki）将军的办公室中轰了出来。出于建立职业关系的需要，史迪威硬起头皮，但是根据温妮的记录，在访问田头（Takashita）将军后，乔“已经准备今天退休回卡梅尔了”。在“那些傲慢的小杂种”的统治下北平已经无法忍受。他们的飞机在美国大使馆150英尺（约45米　）的上空嗡嗡地飞，“向我们宣示他们根本不理会我们”。他们强迫学生游行以“庆祝”保定被日军占领，这样日本人就可以拍照显示他们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了。“他们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而我跟他们打交道还要带着笑脸。”经过泰勒的劝说，为了职责的需要，他甚至请五位军官吃午饭。其中有两名军官接受了邀请但没有赴约，一个既没有答复也没有来，而对剩下两名赴约的军官，史迪威唯一的评论是：“让他们见鬼去吧！”

由于华盛顿竭力避免引起麻烦，这种屈辱感也是其他人所共同感受的。第十五步兵团的亚历山大·麦克安德鲁斯（Alexander McAndrews）上校一边引述陆军部对他的指令——“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卷入纠纷”——一边抱歉地告诉史迪威说，他觉得必须中止对日本部队调遣的观察，因为日本副领事暗中发出了威胁。

由于中国人希望别人通过正式的公报了解他们的战斗情况，史迪威既无法抵达中国前线，也无法去日本前线，而他屡次向华盛顿“发火”要求施加压力也没有结果。他只能满足于在日本人陪同下参观保定。根据日本人的说法，为了攻克这个城市，杀了25800名中国人。史迪威发现城墙未受损坏，也没有其他迹象表明中国人曾经进行过抵抗，更不用说是顽强抵抗了。史迪威对只能待在距离作战前线50英里（约80千米　）的地方，感到很是苦恼，觉得自己“实际上一直在受到禁闭，并向他们直言这种感受”。不出所料的是，三天后，当组织外国武官进行另一次参观的时候，他被通知不在受邀之列。“因此我觉得自己已经跟这场战争无缘了。我被视为中国人的朋友，在道德上是个‘麻风病人’。”他同样也对军事情报处感到失望。“这群华盛顿的傻瓜”不通情理地老是对他喋喋不休，因此在后来几个月里他跟他们的关系持续恶化。他给在美国的两个女儿写信说，总而言之，“我在7月8日之后所发的脾气足以浮起一艘战舰”。

在8月底时他仿佛预示中国命运地提到，在四周前交火中被杀的30名中国战士的坟前“有一些很新鲜的水萝卜”。每天都有一群群外国家庭

离开，阿妈站着哭泣，丈夫们擦着眼泪，而乐队也适时地演奏《友谊地久天长》。国务院担心，如果美国公民发生意外的话，这可能使美国卷入争端，因此鼓励他们离开。很多人都走了，其中包括约翰逊大使的太太和孩子，结果温妮发现自己已经成了还在北平的地位显要的美国官太太了。9月7日，总统下令所有美国公民离开，同时国务院和海军也命令撤出有关家属，但是陆军部“并没有对我们发号施令”。后来史迪威的两个女儿也从美国过来跟他们重逢，他们一直待在中国，直到史迪威任期结束。

尽管史迪威厌恶中国的那些领袖，但是他意识到：“他们的道德准则跟我们的完全不同，因此在我们看来赤裸裸的全民畏缩，并不能损害他们的道德力量……如果我们的领土遭到入侵，我们会誓死战斗，直至最后一人，但是他们所关心的是种族延续，因此为了能让孩子不断降生到世界上，他们迫不得已可以暂时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种族的源流延续下去了。”即便如此，史迪威仍然会深感厌恶，大骂中国那些“油滑的政客……狡诈的责任逃避者，自私的、没有良心和原则的骗子”。在保定陷落后，军事情报处发电报问他，中国人什么时候会奋起反抗，他发电报答复说“直到他们失去对进攻性战斗的内在反感为止”。

史迪威认为中国人军事上的弱点归因于想依赖持久战而取胜。中国喜欢将局部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的传统，导致了最为严重的军事错误——他在淞沪抗战前线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侧翼部队不去援助遭受袭击的友军。职业军官总体上质量低下也同样是个严重问题。史迪威写道：“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听说中国军官很糟糕都很吃惊。”他们马上就能够理解他所阐释的积极性、选择进攻点和集中兵力的可贵之处，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们能用五年时间培养出这样的军官吗？我只能告诉他们，这大概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够做到。”

但是史迪威对中国士兵的战斗素质很有信心，认为只要有好的将领，他们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中国士兵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同时“对最琐细的事情也能开玩笑，在最艰险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欢快”，因此这些士兵如果有他们所信任的军官带队的话，则“无往不胜”。史迪威认为日本文化是人为的和模仿性的，但他对中国很有信心，尤其是中国的北方人。他和泰勒上尉到野外辨别日军部队番号时同上尉讨论了自己的这种看法。在走过村庄时，史迪威会拿起一个水果，用手绢擦擦，然后吃下去，这把他的同伴吓坏了，因为上尉也只能这样做。有一次他们走了一天却一无所获，

在一尊佛像下休息时却发现，三个日本兵把各自的名字和番号刻在了佛像的背面。

他们不停地观察运兵火车。有一天，当他们坐在山顶上时，看到远处有个长长的东西在缓慢移动，两边有脚，就像百足虫一样。后来，他们看清楚原来那是一列货车，正被一个连的中国士兵从两侧推着前进。史迪威默默地看了一会儿这速度仿佛蜗牛般的货车，然后说："就是这种精神最终一定能征服日本。"但是当蒋介石接受采访呼吁《九国公约》签约国援助中国时，史迪威却很是尖刻。按照史迪威的说法，"蒋介石叫起来了：'我们在为全世界而战。看在基督的分上，干涉一下吧！'"

对于那些看到西方民主正在受到新兴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人来说，进行干预从而阻止侵略者是当时的关键问题。提出这种观点的是前国务卿史汀生；他大声抨击"不道德的放任"并竭力劝说总统，认为有必要对公众舆论进行更加直接的指引。



罗斯福总统最初支持史汀生的远东政策，但就美国退出中国以免卷入其中而言，尽管罗斯福并非这种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但是他后来却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在1936年海军限制不复存在后，他对远东最为关注的便是加强那里的海军力量。1936年3月在伦敦召开海军会议是为了续签《华盛顿公约》。由于美国和英国反对让日本具有同等的海军力量，结果日本退出会议，这个已经垂死的公约也就寿终正寝了。鉴于日本的狂热情绪，在格鲁大使的敦促下，罗斯福和赫尔都认为有必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使任何国家都不敢贸然向我们发起进攻”。但是达成这个目标进展缓慢，为主要建造计划的拨款直到1938年才投票通过。与此同时，卢沟桥事变后几个月里美国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卷入与日本人的纷争。

然而在表面上的这种官方情形之下，历史的声音激励着总统，让他产生了一些在此后八年中影响了美国政策的想法。尽管罗斯福热衷于谈论德拉诺家族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喜欢讲他们跟中国商人和达官贵人结交的事情，但是罗斯福更关注的是日本的威胁，而不是中国的完整。他的外祖父华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曾经是美国重要的贸易公司拉塞尔公司的一个合伙人；这个公司成立于1824年，不久就跟东印度公司一样富裕和有影响力，在各个口岸开办有分支机构，其合伙人同时兼任美国领事。他们驾驶着最快的飞艇，有的时候赶在英国人之前将新茶运到伦敦，在中国敷设了第一条电报线，在长江开设了第一条定期班轮，从事茶叶和丝绸贸易的同时也经营鸦片生意。罗斯福的母亲萨拉·德拉诺（Sara Delano）做姑娘时曾数次住在香港玫瑰岗（Rose Hill）的家里。她的两个大姐姐在那里出生，后来她们跟拉塞尔公司的合伙人结婚；其中福布斯夫人（Mrs. W. H. Forbes）继续把家安在玫瑰岗达三十五年之久。

在海德公园长大的罗斯福的周围到处都是中国的装饰品，其中在图书室有个蓝白色的瓷盆，按照家里的习惯，这个东西在玫瑰岗是用来为孩子洗澡的。通知开饭用的是一个青铜钟，这是罗斯福的外公从两个逃避苏州1863年的劫难的苦力那里收购的。罗斯福收集邮票的爱好是从收集中国和香港邮票开始的，这些邮票是他母亲在他10岁时送给他的。1933年罗斯福在为他支持史汀生信条进行辩解时对雷蒙·莫莱（Raymond Moley）说，由于他的祖先曾经跟中国人做过生意，他一直对中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他无法理解怎么会指望他会不支持中国抗

日。这种想法很天真；罗斯福支持史汀生是因为他们想法一致，而不是因为罗斯福前辈的缘故。1932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后跟史汀生讨论了远东政策，在就任后宣布他将继续坚持不承认政策。

他私下里曾告诉史汀生说，他对日本夺取东北印象很深。他回忆说，1902年他的一位哈佛同学曾告诉他，日本在1889年拟就了一个共有12个步骤的百年扩张计划。这个计划一开始是对中国发动战争和吞并朝鲜，然后是跟俄国开战，兼并东北，然后是热河，再然后在从长城到长江之间的华北建立自治领，最终占领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包括夏威夷在内的太平洋岛屿，顶峰是在所有黄种人中间建立自治领。总统在这些已经实施的步骤中嗅出了不祥的意味。

据总统最亲密的外交政策顾问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说，“满洲事变”之后罗斯福对日本的所作所为“更加恼怒”，而到了1937年他“越来越关注”日本的威胁，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德国的威胁。他一直想找出办法阻止日本的前进。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向海军要了一张大比例尺的太平洋地图挂在办公室中，并同威尔斯讨论过对日本实施禁运的可能性；禁运可以由美国和英国舰队施行。在无法获得原材料后，日本只能被迫撤出，而且他认为这样不会挑起日本对中国开战，因为日本已经过多地卷入了中国。但是当时公众舆论完全倾向于孤立主义，这使总统意识到，一项可能导致战争的措施不可能得到国会的批准。

罗斯福喜欢从私人那里得到情报，他有关中国的消息来自助理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Evans F. Carlson）上尉；这恐怕是曾经报告中国情况的美国观察家中最富于浪漫色彩的人了。他后来以领导卡尔森突击队而出名，这是他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方法和“工合”信条创立的一个营；卡尔森是个具有强烈信仰和勇气的人。他是个美国的“坎戴德”[1]，相信“委员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会取得相互信任”，因为“他们都关心中国的福祉”。他喜欢用自己成长中所接受的理想解释所有他遇到的事情，认为蒋介石和共产党“都致力于代议制政府”。他对任何人物都喜欢加以美化。蒋介石夫人不仅浸透着“知天命之意识”，而且“内心平静，成熟优雅”。

卡尔森是公理会牧师的儿子，最初作为应征士兵开始其军事生涯，1927年到1929年曾在斯迈里·巴特勒将军手下的海军陆战队服役，1933年到1935年在学习语言时又在上海和北平服役。1935年卡尔森曾经在总统度假的温泉指挥一支海军陆战队卫队，罗斯福就是在那里跟他结识并结成了亲密的关系。卡尔森在温泉的圈子里被看成是密友，在他1937

年6月去中国时总统敦促他给白宫写信。他在8月中旬到达上海。在战时照顾那里的美国利益的是三个人，即亚洲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哈里·雅奈尔（Harry E. Yarnell），总领事克莱伦斯·高思（Clarence Gauss）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普莱斯（F. B. Price）上校。他们每天上午都在高思的办公室会面。卡尔森每周写信描述这段富于戏剧性和悲剧性的日子，并生动描写了他在前线亲眼看到的中国士兵的情况。他觉得这是史无前例的时刻："所有杰出的中国人都在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这甚至包括了"所谓的共产党人"。总统对这些信兴趣很大，以至于在10月份通信停顿了一个月后他专门询问卡尔森的下落。米西·勒翰德（Missy Le Hand）为此写信对他说"我的上司喜欢读你的信"，还"让我转告你务必继续写下去"。

1937年11月底，卡尔森去陕西延安，想看看有关共产党采用游击战术打击日本人的传言是否属实。作为证据，他把缴获的日本文件，一个日记本和一套毛皮军装寄给了罗斯福。后来在他不得不写一本书的时候，有关延安那一章节的标题透出了他的观点："中国自由主义的源泉"。他在书中阐述的观点比在给罗斯福的信中的观点更为花哨，代表了一类美国人的看法。他告诉陕西省长说，他这次出行"发自内心……是以自由的名义"。在他自己的国家，人民视自由和平等为"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他在中国也看到了"同样对自由和平等的热爱"，"这种精神跟激励列克星敦、特伦顿和瓦利福奇 [2] 我们那些祖先的精神并无二致"。这就是经过美国梦的华丽辞藻过滤后的中国，对亚洲政策来说未必提供了最为合适的依据。

尽管在西班牙内战时罗斯福曾经引用《中立法案》禁止与交战方贸易，但是罗斯福在中日战争中未采用这个法案，因为这对侵略者有利，而对受害者不利。禁止用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向中国或者日本运送军火，但是并不禁止出售军火。借助于自己的自由裁量权，罗斯福超越了国内大行其道的孤立主义情绪。在1937年9月一周内白宫和国务院所收到的两千封信中，大多数是在各种和平社团的倡导下写的，这些信中有95%要求美国继续保持和平，80%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和平，70%敦促立即采取中立方案，只有15%反对，理由是这会有利于日本而损害中国。

对这种倾向甚为担心的总统发表了强调国际合作的谈话。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提议对那些制造"国际混乱"的势力进行集体"隔离"，他把这种势力比喻成疾病的携带者。结果这招致了前所未有的反对。六个

主张和解的组织指责总统在把人民“引向”战争的道路，他们联合发起了有2500万人签名的活动，旨在“让美国远离战争”。美国劳工联合会不同意总统的这番讲话，众议员费西（Fish）建议对总统弹劾，而国会的一次投票以2：1的结果拒绝美国参加国联在远东采取的一致行动。总统对他的一个朋友说：“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你想在前面领队，可是回过头去却发现后面一个人也没有。”

因此，10月6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会议试图解决中日纷争时，美国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因为日本之前已经拒绝第三方调停，而经济制裁又有赖于九国的共同行动和相互担保，但是美国和某些国家又不愿参与其中，结果这个会议毫无结果。对于那些感到急需抵制侵略的人来说，这段时间似乎是一片黑暗。史汀生在一封公开信中敦促对日本实施禁运。他在信中写道，尽管美国采取了《中立法案》，但美国不必“被动而羞耻地默许那些正在实施的不公正行为”。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又出现了：什么时候抵制不公正成了关系国家利益的事了？

在中国，政府以及随后的外交使团从南京撤到溯江而上400英里（约643千米 ）的汉口，史迪威是1937年12月的第一周去到那里的。由于从北平过来的铁路被阻断，现在这段行程需要八天，先要通过海路绕过山东半岛，然后经陇海线到达郑州，再南下去汉口。正如温妮写信给女儿时说的，史迪威“对所有的人和事都感到厌倦”，他在徐州登上了一辆装满难民的列车：“八个座位上坐了十三个人，不敢起来去上厕所。很冷……没有食物，没有水。”两天两夜后，趁着一位旅客睡着的时候，他偷偷喝了他茶壶里的凉茶，这是他四十四个小时里第一次湿润一下喉咙。



陇海铁路上的中国军队，1938年

在后来的八个月中，汉口（或者是包括武汉三镇）是未被占领的中国的首都。委员长把总部设在江南岸的武昌。外国使团纷纷挤进汉口租界区临江的洋房里，不远的江面上停靠着属于长江巡逻舰队的美国军舰“吕宋”（Luzon）号。城里一片混乱，数以千计的人，用史迪威的话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四处乱跑：官员，寄生虫，记者，发国难财的人，难民，福利委员会以及各种战时层出不穷的事物，既有尽职尽责和精神抖擞的，也有懒散和冷漠的。跟往常一样，看到对普通士兵的治疗马马虎虎，史迪威又感到了恼火：“北站到处都是伤员。他们没人管，而且他们自己也意识和预料到了，现在只能用死来偿付生的代价……为什么蒋介石不组织一个医疗队，或者至少弄个担架队？”

史迪威到达汉口一周后的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了，其情形即使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极为惨烈的。在上海壕沟中的抵抗赢得了时间，但是南京并没有做好防御或者撤退的准备，结果这个首都陷落后人员和物资的损失极大。兵工厂完好无损，红十字会医院也是如此，连同各种珍贵物资和伤员均落入敌手，此外还有火车站的机车以及其他各种车辆和仓库。由于没有设立防线掩护士兵和平民的撤退，人员损失极大。

日本人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首都，因此把在长江三角洲已经展开的杀戮又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5万名日军奸淫烧杀，据当时传教士以及国际救济委员会看到和收集的部分证据，日军亲手在南京杀死了数万平民。一群群男女老少被排成排，之后或被机枪扫射，或被用作活靶练习刺刀，或者被捆住，在身上浇上煤油后点燃，而军官们则在四周看着。美国教会的出版物中充斥着那些由于恐惧和无助而吓呆了的传教士医生等的报告。很多后来在国外发表的照片都是日本人自己照的快照——他们把照片送到上海的普通照相馆冲洗，结果被洗了备份并送交到了记者手中。

在长江三角洲，有的城镇整个被毁，大片房屋由于轰炸而燃烧或者变成废墟。街道上空荡荡的，唯一的活物是狗，由于饱餐了尸体，这些狗变得异常肥大；偶尔有活人，那也已经饿得半死，仿佛幽灵般在瓦砾中走动。那些生存下来的人都大规模逃离了这个地区。水稻已经在地里腐烂。日本部队在道路上行进。他们绕过黑黑的废墟和烧掉的农舍，赶着偷来的驴子和水牛，炮车上绑满了猪和鸡，而装满赃物的小车则由农民挽着车把上的绳索推着。

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不少中国人都认为停战要比这样的浩劫好，但是大多数人不愿意投降或者和平解决。史迪威写道：“蒋介石无法退出。

他号召全国，现在有了回应。现在他只能继续下去。”日本也只能继续下去，尽管其战线拉得太长，很危险，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南京大屠杀之后，蒋介石在12月17日公开宣布将要誓死抵抗，其战略是典型中国式的。他解释说：“总有一天日本将会耗尽其军事实力，因此中国将取得最后胜利。”

作为回应，日本人断绝了跟中国的关系（这之前还一直保持着关系），无限陷入战争的日本人气急败坏，只能硬着头皮派遣更多的师团去中国，最终在中国大陆的日军数量超过了100万。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还屡次向蒋介石发出和平的呼吁，先是通过德国大使，接着经过美国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但是这些和平条件都会使日本控制中国。不知是不愿意还是不可能，蒋介石并没有屈服。正如约翰逊大使所报告的：“目前的中国政府无法媾和，但同时也无法进行毅然决然的战争。”

12月12日，让美国政府最担心的事情，即涉及美国人流血的事件发生了。当时正值南京陷落之时，傲慢至极的日本人向停泊在长江上距离南京仅几英里的美国军舰“帕奈”（Panay）号开火并将其击沉，造成两人死亡，48人受伤。在第一轮进攻后，“帕奈”号舰长已经受伤，舰炮也已经无法使用，但是低空飞行的飞机第二次对正在沉没的军舰进行袭击，还殃及两条美孚油船和旁边一条较小的船。所有这些船只跟“帕奈”号一样在甲板和遮篷上均绘有美国国旗。英国长江巡逻舰中的“瓢虫”（Ladybird）号和“蜜蜂”（Bee）号也被炸伤。日本岸上的火炮在飞机飞离后朝军舰开炮，而日本的快艇也追赶逃跑的船员并用机枪扫射。由于华盛顿不想卷入事端，这些在长江巡逻的舰船在对南京空袭期间仅作为使馆人员躲避之用，而且也已经向日本陆军和海军提供了地图，准确标明了这些舰只的位置和行走路线。这次进攻显然是蓄意的，只能是一次直接的挑衅。

就像在其他命运攸关的时刻一样，史迪威对此反应极少：“昨天‘帕奈’号受到攻击被击沉。麻烦极多。”几乎可能发生任何事，包括战争。当时史迪威正在为他的助理武官罗伯茨上尉担惊受怕；罗伯茨当时在“帕奈”号上，后来才知道，在船只被损坏后他开始担负责任并带领船员逃到岸上。到了下午时史迪威得知罗伯茨安全无恙，结果他对大使非常恼火，因为大使上午就知道此事却没有告诉他。

第二天，紧张气氛有所缓解，按照史迪威的说法，“日本佬道歉说：‘很为你们难过。’没有看到标记。这些杂种”。他没有再提到这件

事，但毫无疑问，他的国家在这件事上只能忍气吞声，这无疑让他的脾气更加不好。

这个事件没有引起什么后果，因为在不想打仗的时候是不会发生战争的，无论日本还是美国当时都不想对抗。东京政府对这种冒险举动大为震惊，立即道歉，而且不到十天就完全接受了美国提出的赔偿要求。东京有很多日本人到美国使馆去表示歉意。罗斯福考虑罚没日本的一些资产作为一种预防性的制裁，以避免再发生挑衅行为，但是由于日本充分表示了道歉，他未能这样做。在其他方面，美国的官方反应是有节制的。军界意识到美国的海军力量不足以对日本人产生威慑，美国国内普遍觉得应当尽量阻止那些可能导致对峙的举动。就国会所代表的公众舆论来说，他们的反应是畏缩而不是怒吼。众议院立即通过了《拉德罗决议》（Ludlow Resolution），要求如果使宣战生效，则必须先进行全民公决。之前主张这项决议的人无法收集到足够的签名让这个决议可以在参众两院委员会讨论，可是在“帕奈”号被炸沉两天后签名数一下子就够了。后来，只是由于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这个决议表决由于少于21票而未被通过。

这次事件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美国为了避免再次与日本发生摩擦，两个月后从中国撤出了第十五步兵团。由于该团受到多种限制，华盛顿很长时间以来就在讨论撤退之事，而陆军部也一直在敦促这样做，因此据一份美国报纸说，这件事可以算是“在错误的时间干了一件正确的事”。当“能干”团撤出的时候，当地的妇女流着眼泪送别，而天津的其他外国驻军的乐队则在街上奏乐，甚至日本的号手也吹起了小夜曲。

史迪威在汉口这个“造物主所不屑的地方”酸醋性越来越厉害。让他感到压抑的事情包括天气，“阴冷，灰暗，小雨绵绵”，此外还有中国的局势，完成他本职工作所遭遇的种种挫折，以及华盛顿那边的茫然无知。中国军政部不允许他视察前线，因此史迪威无从得到有关汉口军事形势的可靠情报，而他那些在战场上的助手也没法搞到；罗伯茨上尉提醒说，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根本就无战场可言。史迪威认为中国人“对未来日本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因此不愿意让外国观察员到前线去，因为这样他们会看到并报告指挥官和士兵的糟糕状态。由于史迪威正式向外交部提出申请要求到前线参观，因此他不能私自“溜到前线”去查看，而多恩上尉发现这才是最好的方法。多恩在任职期间曾经六七次往返于日军和中国军队之间，第一次带回了有关中国部队调遣情况的准确报告。而他的上司只能在汉口发火，“我只能在这里咬指甲”。再把汉口的环境

跟他在北平的住所相比，“我只能怒火中烧”。

尤其是军事情报处让他不胜其烦。负责这个部的是一个迂腐的有学究气的小暴君麦克凯布（E. R. W. McCabe）上校。此人成天缠着他要作战报告，对每项开支都要问个究竟，往往不经过史迪威就给他的部下下命令，提出的一些要求根本不考虑战斗局面，甚至不顾及中国的地理常识，他不断告诉史迪威说从他那里“收到那么少的情报让人难堪”。“华盛顿的杂种不喜欢我。”史迪威得出了这个结论。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麦克凯布这样对他，显然有报复的意思，尽管他也威逼其他武官。史迪威有一本叫“狗娘养的”黑色小本专门记录那些他厌恶的东西。[3]

史迪威住在嘉维斯领事的公寓里。他在那里感到舒适——“他（嘉维斯 ）跟我说同一种语言”——而且他们的办公室也在一起，“我们经常在一起说‘上帝啊’。”但是跟“使馆帮”的其他人在一起“空气总是有些紧张……我觉得自己在这里格格不入”。史迪威原谅了约翰逊大使。大使人很不错，随和，喜欢说话，有要人来访时总是让史迪威参加会见。现在中国政府准备迁往重庆，约翰逊受命要一道迁去，但是他让史迪威自行决定自己的去留，因此大使跟嘉维斯一道被史迪威列入“好人”（good egg）之列。史迪威对约翰逊大使的称呼现在成了奈尔斯 [4] ，大使私下告诉史迪威说，自己跟中国人打交道也遇到过史迪威说的那些困难。约翰逊写了一篇“杰作”向陆军部解释这种情况，这甚至让史迪威有些后悔，因为他曾经为“大屎”写了首很不友好的诗并寄给自己的妻子。他忍不住想出了一个具有双关意义的绰号，是“在火车上想起了这个绰号，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不说它——因为说习惯后它将脱口而出”。的确如此。温妮回信说她没有收到这首诗，这让史迪威吓了一跳，因为这可能落入不该看到此信的人之手——他马上又重写了一封信给她寄去，这未免是在挑逗命运女神。

他也有朋友，生活中也有欢快的时候。一些中国人，特别是汉口市市长，“非常讨人喜欢”，此外他很高兴再次遇见冯玉祥。史迪威十五年前曾经为冯玉祥筑路，现在冯玉祥在武汉“耽搁”，是有关重组政府吸收共产党的事情。“这个老兵看上去不错，很有信心。说他们能够支撑六个月。”此外，史迪威的偏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令人吃惊地报告说：“整个城市中最让人开心的是英国海军人员。”有次他受邀到克莱布那里吃午餐，他很开心，说他的主人是“好人”，“…… 法国人也很好”，甚至“英国佬领事”也是个好人。他发现同自己最投缘的人是一些记者，通常是那些同情中国革命并富有冒险精神的自由撰稿人——他们跟卡尔

森一样，“发自内心”喜欢在这个国家晃悠。这些人中包括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和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尤其是贝尔登，他是个28岁的了不起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者，阴郁，有冲劲，时而欢快时而郁闷，按一个朋友的说法是个“忧伤、衣衫褴褛、憔悴和不可思议的人”。贝尔登后来成了史迪威一个亲密的伙伴和很有价值的消息来源。贝尔登毕业时正值大萧条最为严重的时期，因此他无法找到工作，于是他上船做了水手，并在1933年在上海弃职离船。自那以后他一直探究中国问题并学习汉语，靠写各种小报道为生，直到日本侵华后他被合众社雇作记者。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消失，去探求中国那些纠缠不清的人事关系，也会给史迪威带来大量有关中国部队调遣和意图的报告，此外还会带来有关各指挥官声誉以及内在关系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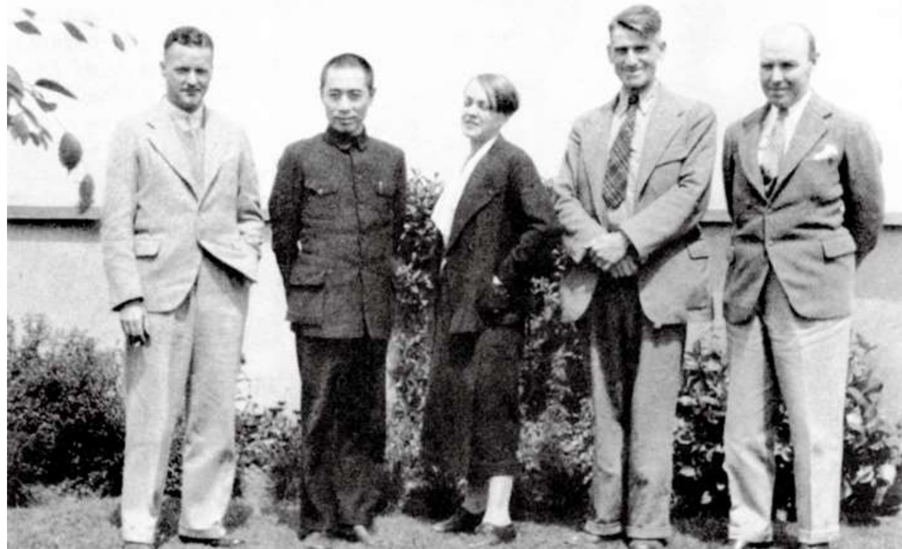
史迪威经常跟阿格尼斯·史沫特莱谈共产党；史沫特莱觉得他“强硬，脾气大，饱受战斗锻炼……直截了当，而且很诚实”，他对伤员的同情也让她感动。她当时为援华委员会工作，有一天正把一些物资搬到卡车上，这时史迪威正好走过，于是他问：“你在干什么？”

“把药装到卡车上。你在干什么？”

“我站在这里看你干活，”他闷闷不乐地说，“我还要告诉你，国际红十字会的仓库里装满了新运来的药品，包括一些新的磺胺药。”他让她到那里去要一些给部队。

1938年1月，由于不断施加压力，史迪威终于冲破阻碍，开始了在后来的一年半中到中国很多作战地区的旅行。在一个很冷的季节他经过江西和湖南时，发现前线已经不再积极开展作战了，但是当地也并没有任何和谈的言论。省长们都谈到三年抗战，并且已经开始开展游击战术的训练项目。史迪威发现中国人热衷游击战，但是军火和装备是个严重的问题。一个中国军官问他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史迪威回答说：“利用人力上的优势进攻。”不过这种回答并不被欣赏。

由于结识了河南第二十军的商震将军，史迪威又一次离开了汉口，这次是去位于陇海铁路的东西两端开封和徐州。离开乌烟瘴气的汉口让他很是欣喜。在他上路的最后一刻陆军部来电，建议他从开封“回来”时顺便去一趟兰州；但他太高兴了，对此只不过耸耸肩，并没有大发雷霆。他只是评论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兰州是苏联物资经由中亚到中国的入口，靠近内蒙古边界，在开封西北600英里（约965千米）。


周恩来与史沫特莱等在武汉

在河南的时候他恢复了对中国人的信心。他们在积累经验，正在对补给的流程加以组织和改进；他开始相信，如果他们能够到达采取主动积极进攻的程度（也许这可以在一年内达到），“那么转折点就会到来了”。旅行时天气很冷，他有一个星期没有脱下衣服或鞋子，因为担心脱下就穿不上了。冻坏的脚有好几天让他很难受，但是后来“我再走30到40英里（约48—64千米 ）也完全没有问题了”。史迪威在商震的陪同下来到徐州，史迪威认为商震是中国最可靠的将军之一。史迪威终于看到了前线的中国部队，这时他又变得悲观了。他认定“他们并没有进攻精神”。如果他们晚上发起攻击，他们可以“在白天抵达阵地从而使日本人失去炮火上的优势”。“蒋介石不是打仗的。商震不错，还有白崇禧——但只有这么多。”

史迪威跟国民党的刘将军进行交谈，史迪威的谈话记录显示，他有通过对话抓住说话者个性的非凡才能；通过这番谈话，他提炼了中国统治阶层的态度。刘将军承认损失严重，大约有60万人，但那“其实是好事……中国士兵都是些盗匪和流氓无赖。我们把他们送到前线去送死，这样就可以清除我们当中的坏分子”。问到士兵的军饷是多少，刘回答说是每月8元，并说“如果给他们更多钱，他们就不会打仗了”。至于战争的持续时间，刘将军认为至少要一两年。到那个时候日本的财政将会破产，他们的士兵开始想家，而外国列强也会参战。实际上日本占领的土地越多越好，因为那样的话就更容易同化他们。“长远来看日本人将会消

失，他们会像蒙古人和满族人一样被汉族人同化。”当问到如果中国受到封锁，那么怎么解决食盐和机车燃油问题，刘回答说，日本占领的地方越多，则留给中国的地方越少，“那样我们就无须在大面积上运转”，也就用不了那么多汽油了。



史迪威在一节中国运兵列车上，开封，1938年

史迪威问刘将军为什么不把受过教育的人吸收进来做军官，刘回答说：“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都是些胆小鬼。他们会逃跑的。我了解这一点，因为我自己就是上过大学的。”另外，“中国人很早以前就知道怎么让下层人打仗。最初贵族自己打仗，但是不久他们就不这样了，开始让人民为他们打仗”。刘指出，英国人利用印度人为他们打仗，法国利用摩洛哥人和安南人为他们打仗，现在日本人在利用蒙古人和“满洲人”。

通过跟中国刘将军的结识并交谈，史迪威并不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在为民主而战，而这是诸如卡尔森那样的思想家所津津乐道的。他在汉口结识了卡尔森，史迪威对他的看法还是不错的。他是个“好的观察员，没有受到太多教育……但是个实实在在的公民和一个战士”，而且尽管他在

晚宴上穿的衣服不对，他“还是一位绅士”。私下里他叫卡尔森“勇气上尉”，并对卡尔森有关八路军训练方法充满溢美之词的报告不以为然。史迪威告诉他，十五年前自己就亲眼看到过冯玉祥部队用这种方法进行训练了。

尽管当时流行说“八路军不是很棒吗”，史迪威对此仍存有疑虑，但是出于职业需要还是对此很感兴趣。通过阿格尼斯·史沫特莱的介绍他认识了周恩来。周在共产党的等级制度中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同时也是驻汉口代表，此外他还结识了共产党军队的总参谋长叶剑英。他认为共产党提出的“军事上独立自主”和“动员群众”的政治主张“非常含糊——都是些老一套的口号”，不过从他自己来说，在跟周恩来及其一行见面并一道吃饭之后，他发现他们都“同样坦率、彬彬有礼、友好而直接。他们同国民党那些穿毛皮领子、脚蹬带马刺靴子的新式拿破仑人物适成对照——那些人都很做作和傲慢”。周恩来英俊、有教养且温文尔雅，很受外国人欢迎。叶剑英“像大多数共产党人一样属于好人”这种范畴之内。跟这些壮怀激烈、精力充沛、追寻中国革命未竟之业且尚未被权力污染的人交谈，史迪威意识到了他们跟刘将军那样的人之间的“鸿沟”。他确信，如果中国战胜了日本，“那么内部将会再出问题”。

对此很少有人怀疑，因为在那个冬天，汉口的政府和统治阶层中正弥漫着一种衰败的氛围。南京陷落后史迪威曾经表达过这个意思，提到过“对目前的大溃败要负主要责任的腐朽败落的政府”。与此类似的是，卡尔森此时在给总统的信中说，他“对知识分子甚至是中产阶级的态度都感到厌倦。城市里充满了对战争没有明显兴趣的男男女女。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并无任何责任感”。卡尔森在汉口参加一个中国人的晚宴时提议为抗战的中坚力量“老百姓”干杯，可是据当时在场的约翰逊大使说，当时应者寥寥。约翰逊也觉得通常人的态度是“让我们战斗到底，直到流干苦力最后一滴血”，而“与此同时宋家仍然不断施展阴谋诡计，这有时让我深恶痛绝”。



抗战时期悬挂于重庆的蒋介石夫妇巨像

国民党青年时代的那种热情都转到共产党那里去了，结果重庆正在演绎历史上最悲惨的故事：每一场革命最终都会承接被罢黜的暴君的衣钵。蒋介石夫人有一次很难得，简明扼要地承认了这一点。一些从延安回来的记者做了热情洋溢的报告。她请他们去喝茶，尽管她自己并不相信，但是还是想亲自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热情赞扬共产党的正直、理想精神和为事业的献身精神，听到这些后说她无法相信他们的话。她走到窗户旁边，默默朝江对岸凝视了几分钟，然后回到屋子里，说出了她平生最忧伤的词句：“如果你们告诉我的有关他们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正当史迪威准备动身前往安徽前线视察汤恩伯将军的第十三军时，陆军部却阻挠了他的计划，命令他去兰州收集抵达中国的苏联援助物资的情况。史迪威费了很多周折才得以安排去安徽的行程，这是战争开始八个月来第一个外国军官被派遣到作战部队，因此取消这次行程让史迪威极为恼怒。他寻找各种理由不想去兰州，几乎已经到了违抗军令的程度。但是陆军部还是命令他服从。陆军部似乎是在奉总统之命行事，因为总统要求报告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大陆的军火的性质和数量，这些途径包括香港、印度支那、缅甸，同时也包括通过陆路来自苏联的。情报处并没有对史迪威交代这些情况；实际上，这个让他的恼怒达到极致

的兰州事件完全是可以化解的，这跟他与情报处遇到的其他麻烦一样，只要对他进行简短的交代即可。“他带着对华盛顿那些指手画脚的杂种恨之入骨”的情绪离开了，还写信给温妮说，他打算现在或者下一年就退休，“完全听从家里的决定”。他在去兰州的路上过了55岁生日，考虑到自己跟陆军部的关系，他觉得今后的职业生涯不会有太大前途。

史迪威是第一个参观兰州苏联空军基地的外国人，他带回的证据说明了苏联对援助中国的关切程度。他先乘火车到西安，在那里访问了八路军总部，然后乘公共汽车和卡车去兰州。他到处寻找线索，贿赂苏联人所住宾馆的工作人员以了解苏联来客的人数，询问哨兵、警察、客车司机、客栈老板、仆人、甘肃省长及其秘书、西安的传教士、一个藏语翻译、一个经营汽车的商人、中国军官、飞行学员以及当地的蒙古人等。这些蒙古人“结实、肮脏、顽强、饱经风霜，他们的脸就像印第安勇士‘公牛’[5]”。他请他们在客栈喝茶，后来他在街上又遇到他们时，他们“都满脸笑容，向我问好”。尽管史迪威的举动受到监视，谈话也被监听，他还是得以视察机场并确定苏联共提供了300架苏联飞机，其中有30架还在基地培训中国飞行员。这些苏联飞行人员体格都很魁梧，食欲很大，每天要吃四顿饭，但是他们“都表情阴郁……我没有看到他们中有任何人笑过”。他搜集了运送补给和燃料的苏联卡车车队的数量，根据运输距离和装卸货时间等估计出了运量，此外还确定了供给的类型，“尽管未能找到箱子的标号或者破裂的箱子”。运输总量跟从香港通过海运的运输量相比数目很小。他的结论是，建立这条路线主要是为了运送航空燃料，并是在广州沦陷后用作紧急运输线的。

他在4月15日回到汉口的时候，由于4月6日到7日中国在山东台儿庄经历了第一场真正的胜利，中国人的情绪获得了巨大的改变。整个国家都“欣喜若狂”。日本人毕竟不是不可战胜的，对抵抗产生的新希望把悲观情绪一扫而光。这是战争开始后第一桩值得庆贺的事。

台儿庄是日军通往徐州路上的城镇，如果徐州失守则日军就会占领陇海线，从而打开通往内地的门户。在广西将军李宗仁的指挥下，根据德国参谋的计划，由防御转入反攻，并有一个军的增援部队截断敌人后路。担任增援任务的是汤恩伯的部队，如果史迪威没有被派往兰州的话，他本来是要陪同这支部队的。看到援军到来，大受鼓舞的防御部队也“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一起冲上去向敌人发起进攻。他们消灭了这个日本步兵旅团，这个旅团弹药补给和坦克燃料都被截断，看来日本步兵在没有机械化力量支持下无法抵御果敢的进攻。为期十七天的战斗结

束后，日军伤亡1.6万人，损失了40辆坦克、70辆装甲车和100辆车辆，此外还有枪炮等其他军火物资。这是日军自组建现代化军队以来第一次遭受大败。中国的伤亡人数也大致相当。

像所有支持中国的人一样，史迪威很想探究乐观的原因。他的朋友们在台儿庄大捷后说，他们认为中国会取胜后，史迪威写道："我也这样认为。"与此同时他知道，从军事上说，由于中国未能乘胜追击而失去了他们的优势。军事参谋长、德国人福尔肯豪森将军气得"乱揪自己的头发"，因为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行动。"我让委员长前进，去进攻，去扩大战果。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做。很快日本人就会在徐州布置8到10个师团。那时候就太晚了。"白崇禧跟史迪威和德国参谋们分析了这场战役，但是他对进攻的战术不感兴趣。他再次转向通过消耗取胜的理论："如果日本人损失一个人，我们经得起损失四个人。"他这样说；同时他还指出，中国除非损失人数达到5000万，否则是"微不足道"的。史迪威对此评论说，中国人的"头脑无法接受进攻的想法"。

史迪威参观台儿庄战场时跟李宗仁进行了交谈。李宗仁对有关这次交谈的记录代表了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对史迪威的看法之一：李宗仁说史迪威态度"直率"，同情中国的事业，但是"对中国未来的抵抗非常悲观"。李宗仁把这种悲观归咎于这位美国上校是在"物质化文明"情况下接受的教育。他敦促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贷款以购买战争物资，还争辩说美国帮助中国实际上是在捍卫自己的安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台儿庄大捷的结果便是坚定了蒋介石总体上的防御政策，因为这次胜利似乎表明，日本人已经没有了锐气。几周之后日军再次发起进攻，攻破防线后向徐州挺进。徐州在5月底陷落。由于另外一支日军部队正从北部准备在开封以北跨越黄河，因而包括汉口在内的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地区都处在危险之中。穷急之中的蒋介石不是诉诸中国的部队，而是转向中国的忧患之河黄河。他命令商震将军在日军先头部队过河之后炸开郑州的黄河大堤。蒋介石屡次打电话给商震问自己的命令是否得到执行，而商震一直在拖延，直到他自己的部队安全撤出。然后他们引爆了炸药。在现场的杰克·贝尔登的报告描述了整个经过。旁观者在痛苦的煎熬中看到，充满泥沙的河水一往无前地沿着旧河道涌下，不住地向炸毁的河堤翻滚，然后伴随"可怕的咆哮"大堤被撕破，河水向低处倾泻下去，开始向东边的大海奔腾而去。一共淹没了11个城市和4000个村庄，3个省的作物和农田被毁，200万人流离失所，而在这广大的、被浸泡的荒野中又积蓄了另外一种对政府的怨恨。日军

陷入泥泞之中，这大概为中国赢得了3个月的时间。

中方的战斗给美国留下了印象。出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或者因为跟中国有某种联系，记者、传教士和其他观察家都专注于那些值得敬佩的方面，但是对各种缺陷和不足则避而不谈。因此美国人民心中开始产生了一种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蒋介石夫妇成了1937年《时代》（*Time*）的封面人物，他们忧郁而高贵地望着美国人民，冷静，坚决，勇敢，真实。《时代》的出版者亨利·卢斯（Henry Luce）出生于中国，其父母是传教士，因此在美国人民心中，中国对蒋介石夫妇产生这种崇敬看法并非偶然。传教士以及支持他们的北美外国布道团大会、美国基督教联合委员会、基督教青年会以及中国救济委员会都饱含热情和干劲，热心于他们帮助对象的事业，而且很有影响力。由于美国在长达一个世纪里在中国的传教工作，美国人对中国有种责任感，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一位欧洲评论家说，不管传教士是否在中国产生了影响，“他们显然在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对蒋介石夫妇积极支持，他们的忠诚是有私心的，因为作为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夫妇信奉基督教，这证明了传教士的努力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他们对蒋介石充满溢美之辞，而一旦认定他是完美无瑕的，那么所有认为他有不足的说法都是不可接受的。《世界传教评论》（*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宣称：“中国现在有了历史上最开明、最爱国和最能干的统治者。”

同样，这本杂志对共产党的评价也不错，称这个组织旨在促成“跟所有进步人民诉求一致的社会变革”。这种表现“一心一意”的画面对忙于为中国募集善款的教会团体很有必要，对国民政府的那些特使和宣传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正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提供贷款并进行干预。承认中国社会的巨大裂痕是会引起负面影响的。因此美国舆论并没有把共产党看成异己，而是认为他们是阵营内的体面的社会变革者。国民党要求记者们不要管中国共产党叫共产党。蒋介石在1939年对一个德国记者说：“中国已经没有共产党了。”美国人都在加强这种幻觉，包括共产党本身，因为这符合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路线。尽管他们并不否认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们也开始谈及“新民主主义”，说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一个阶段。

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根本上塑造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以及狂热的三段论：民主国家正在受到侵略国的威胁；中国正在受到一个侵略国的攻击；因此中国是个民主国家，他们的战斗是在为世界民主而战。对所有那些认为世界斗争具有不可分割性的充满善意的人们来说，这是显

而易见的，因此帮助中国显然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尽管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未必有效，可在战略上显然是有效的。但是经过意识形态包装过的战略更具吸引力，因此凡是“我们一边”的人，不管他们的政治经历是怎样的，都会被视为民主主义者。美国人不大容易记起来这个事实，那就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并没有到亚洲活动过。

民主成了中国支持者的主题。民间救济中国委员会是个曾经容纳了各种委员会的组织，有一大批卓有声望的理事。他们发起了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是在1913年予以承认的），在这个“民主日”举行了宴会，并通过网络向全国播放发言。同样阐释这种主题的还有纷纷成立的各种委员会，它们是为倡导支持中国和反对继续向日本提供战争物资而建立的。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教会团体［这些团体团结在主席哈泼·西布里（Harper Sibley）周围——西布里是美国前商务部部长］、世俗团体，如美国反对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以及联合阵线左翼团体，如中国人民美国之友（American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等。热情的代言人形形色色，其中包括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他是曾在山西传教的医生，回到美国后成了蒋介石最虔诚的支持者；另外也包括卡尔森上尉，他回国后也开始在公开场合宣传自己的观点。

由于卡尔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赞扬了八路军的战斗力，海军新闻检查人员要求他不要再公开发表言论，他借机于1938年辞去军职，回国后开始对公众进行宣传，认为如果美国停止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那么中国就能赢得胜利。他坚持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会决定“东亚是会受到一个军事独裁国的统治，还是中国幼嫩的民主之芽会长成参天大树”。这是滥用意识形态，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不论是在国民党内部还是在延安，都还没有出现民主的萌芽。国民党实行一党执政，进行新闻审查，组织蓝衣社和秘密警察。延安则依据教条办事，一心追求革命的社会主义。

尽管中国的美国友人们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美国的孤立主义仍然要比同情来得强大。民意调查显示，2%的公众支持日本，74%的人支持中国，但是这种情绪并不表明他们愿意卷入其中。在政府层面上危机感正在加重。总统急切地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发展。一方面他受到财政部长摩根索的鼓励，摩根索对抵制法西斯侵略有很深的危机感，认为支持中国至关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受到赫尔国务卿的牵制，赫尔认为应当

对任何“不中立”的姿态（包括经济援助）毫不犹豫地进行抵制，认为这将会使美国卷入中日纠纷。他非常谨慎，甚至拒绝接受宋子文作为经济特使，因为他是个著名的反日人士。

当财政部驻华特派员罗兴·巴克（J. Lossing Buck）1938年8月30日去见史迪威以了解军事形势的时候，史迪威提出了李宗仁的观点，认为应当通过帮助中国购买军火而帮助美国自身。根据巴克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报告，“史迪威上校感到……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的政策应当更加积极，并通过提供财政贷款和军事设备的方式帮助中国，因为这比只是加强我们自己的防御设备是要好得多的防御。哪怕是这种防御开销的很小部分，一旦提供给中国，那么结果就会有效得多。”

摩根索同意这种观点。他对大局有强烈的认识，但是有关中国的知识有限，他认为“我们要在太平洋保存一种民主形式的政府的机会已经很小”，因此极力敦促总统向中国提供贷款。1938年12月通过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

尽管日本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是他们未能结束战争；1938年8月他们决定向一个新的目标挺进，这就是汉口。史迪威在8月从北平回到汉口，在那之前，他自行决定跟家人在北平一起度过了那个夏天。这个决定让军事情报处感到异乎寻常的恼火，本来史迪威为了他五个助手的任职问题已经跟军事情报处争吵不断了。麦克凯布上校告诉他说，史迪威在6月回到北平与家人团聚，“在主要军事发展仍然进行的情况下……是种严重的判断错误”，并命令他未经许可不得再擅自到外地去，外出旅行要提请批准，详述“每次旅行的理由、路线、目的地和预计开销”。这种训斥的语气更适合一个士官生而不是一个上校。史迪威还被告知，陆军部准备直接指导他和他助手的调遣，因为“所收到的情报的覆盖面、质量和数量均不能（重复一遍：是不能）令人满意”。在距离现场7000英里（约11265千米　）的地方，麦克凯布表明情报处有权力“调派你或者任何在中国的军官从事任何情报处认为适当的使命”。在进一步的通讯中史迪威还被告知，他提供的情报跟卡尔森给海军提供的报告相比相形见绌，提供的情报无法合理说明他所花费的情报处秘密资金的数量，并敦促他解释通过这些花费所获得情报的“明确性质和价值”。显然麦克凯布企图刺激史迪威辞职，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个职位上安插“武官帮”那些跟他关系好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几乎成功了。史迪威一度决心请求解职，还用铅笔怒气冲冲地起草了一封信要求派检察官来，以“查明在自1937年6月以来的条件下我履行职责的状况”。然而，中国挽留了

他。

当北平武官办公室秘书蒂莉·霍夫曼（Tilly Hoffman）回国休假的时候，她听说了军事情报处的各种抱怨，主要涉及史迪威认为无须加以解释的各种行动和决定。虽然同僚都认为史迪威是他们情报处里最好的观察员和报告者之一，甚至就军事行动来说是个“完美的观察员”，但他们对他擅自行事颇为不满。蒂莉问为什么没有人拿起钢笔直接向上校说明，回答是“有严格命令禁止任何军官通过非官方渠道跟任何人交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史迪威任职结束为止。

当时汉口与北平的陆上交通已经断绝，从北平过来只能先从北部乘船经上海到香港，再从那里乘飞机到达汉口。当史迪威在8月26日到达的时候，政府已经迁走，围困的感觉正在加重。共产党想起了在1925年到1926年时汉口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想模仿马德里对城市进行“人民保卫战”。马德里曾经在被围困两年后仍然坚持下去。共产党敦促政府成立一支15万人的由工人、学生和市民组成的队伍，队伍由具有“最高革命觉悟”的青年精英团领导。蒋介石对这个计划没有什么兴趣，他不想看到在共产党控制下确立的工人干部，也不相信武汉能够抵御日本人的进攻。在这之前，在长江上有两个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阵地，一个未经战斗便失去，还有一个被敌人采用计谋从后部攻下，因此他这样想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中国防御不利的本质原因却是深层的文化偏好，这也是总司令自己所赞同的，这就是倾向于拖下去，而不是作战。

史迪威跟一群人开始去前线，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武官以及新闻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卡帕曾经在西班牙工作过一年，是个“不错的家伙”。英国人“发了火，退出了”，法国人得了痢疾也回去了，但是史迪威仍然留下来了。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他的行踪：“晚上走，步履艰难，卫兵迷路了。马帮，苦力，筋疲力尽的人蜷缩着等死……日本飞机在200英尺（约60米）远的地方用机枪扫射公路。我估计可能他们有几个人受伤了。野鹰战机！……庄表示欢迎。继续往前，没说的。越靠近前线接待越热情。谈话并吃东西。他们给了我铺盖……早餐吃面包奶酪，卡帕找来的，发霉了，不过还能吃。坐到9点，然后去前线。热得要死，很难走。爬上一座山，沿着长江可以看到九江。到处都是山丘和灌木丛。可以一直坚守下去……从湖的北边过来了各种炮。为什么？匡和张说这些炮不能用了，但是现在拖到阵地后面还能用。”

回到汉口，“到处是路障和铁丝”。法国武官罗塞勒（Rousselle）上

校死于痢疾。这是奉天事件七周年之际，欧洲列强正因为慕尼黑危机而战战兢兢。“天哪什么世界！如果欧洲再次发生战争我们会在哪里？……卡梅尔的家乡突然显得很遥远。”日本飞机每天在城里轰炸，没有受到抵抗。蒋介石曾经寄予厚望的中国空军毫无成效，只剩下很少的飞机或者飞行员来保卫汉口。流行的中国做法是囤积物资以备将来之用，这使得燃料不足更加严重。史迪威看到有些75毫米炮在经过了之前在上海和徐州的战役后甚至没有使用过，于是他写道：“中国人舍不得使用他们的物资。如果他们用了这些东西，他们就可能丢掉这些东西，那没有了物资，战争后他们怎么办？”

空军人员是个更大的困难。中国机械师不像美国人那样对内燃机有亲和感，他们对待机器漫不经心，也没有什么敬意。由于缺乏专业维护，他们的飞机很快就不能飞了。飞行员和导航员都来自受教育阶层，他们这类人总体上没有尚武精神，也无意在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本人的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失去性命。那些成为飞行员的人倒是勇敢的，但是鲁莽张扬，意大利军官对他们的训练也不能令人满意。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从墨索里尼那里接收了这些人训练其空军。由于他们与日本人的友谊日渐深厚，意大利最后撤出了所有军官，这些军官把他们为中国人准备的航空地图也拿走了，这让依靠别人做事的中国人一筹莫展。



陈纳德与蒋介石夫妇

为了建立空军，蒋介石在1937年雇用了一位出色的美国飞行员，这就是陈纳德上尉。陈纳德由于耳聋和争执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到1938年时，陈纳德已经在中国空军系统中晋升为上校，他开始了大规模机场重建计划并组建了有效的电台预警系统；但是他的飞行员训练计划不太成功，后来他开始招募一些美国的雇佣兵组织了一支志愿军来保卫中国领空。当时日军飞机未受任何抵抗地飞来袭击汉口，警报声不住地尖啸，而街道上是成千上万的人逃难时鼓点般的脚步声；他们想逃往外国

租界区躲避危险。

当一队队衣衫褴褛、浑身血迹的伤员零散进入城里的时候，市内的平民却开始向外地疏散了。在最后几周里，共有4万人通过轮船、舢板或者在陆上通过卡车以及手推车撤往湖南省会长沙。蒋介石夫人组建的妇女委员会在战区收容了很多饿得半死、衣衫褴褛的战争孤儿，足足装满好几列火车，他们吃饱饭，洗好澡，穿着整洁的蓝外套乘船疏散出去。企业合作组织已经开始拆卸工厂和设备，准备长途运往内地。伤员来到某些医院，结果发现医院已经拆掉了，于是他们只能坐在或者躺在人行道上，精疲力竭，无法继续走下去。

在汉口做“最后抵抗”的人包括蒋介石夫人。史迪威在9月份见到了她，认为她“很有魅力，非常聪明和真诚”。尽管他认识到她“在政府事事为百姓打算这方面不乏宣传之辞”，不过“她人不错，很会做事”。蒋介石夫人施展魅力时从来没有办不成的事，而对一个武官下一番功夫是值得的。史迪威在会面后还给她送去了一束鲜花。

10月，史迪威又去南方前线，在一个营长的指挥部观察一次为期五天的争夺德安的战斗——德安位于日本从长江向南进攻江西省会南昌的路上。“步行去王亮峙（Wang Lia-chi）指挥部，15里（约7500米 ）。桥都被烧毁了，路每隔200码（约180米 ）左右就会中断。见到王。热情欢迎。他正在挨训——损失50%……没有重机枪。有一些小炮弹箱。没有炮。每支枪200发子弹。4挺轻机枪。桥断了。没有车。没有电话，等等。睡在草里。”王上校开始守住了山上的一个阵地，但是后来被迫撤到城里。战斗在城墙内继续。在最后一个小时里，王上校亲自率队在夜间通过狭窄的街道发起袭击。史迪威后来是这样描述的：“分队冲进一个日本人的机枪据点……中国人匍匐在街道右边。日本人开始开火，但是没有出来，要是出来的话他们就可以对街道扫射。子弹从对面墙上弹回来，没有打到任何人。这时需要采取迅速行动，中国人证明是可以做到的。一个班从建筑物后边悄悄过去，从后面用手榴弹结果了机枪手……当时一片喧闹，在黑暗中跟这个班失去了联系……”在那个晚上的剩余时间以及第二天，战斗仍然继续，双方之间仅间隔几米远，直至日军对已经虚弱的阵地发起猛攻，此时守住阵地已经无望。师长派的一个传令兵在下午6点赶到，下令撤退，这是派出的六名传令兵中唯一送达命令的。王上校趁着夜幕带着65人跟营里其他人会合，带着不到400人离开战场，原来他们有1500人。他们已经连续打了五天，很少睡觉，也没有食物和水。在1100名伤亡者中有600人是战死的。

通过这些战斗史迪威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在他四年后来到中国战区时伴随着他。他认为王上校很勇敢，但是欠缺判断力。王不应该进城，因为城里已是一片废墟，根本提供不了掩护，而且，只要占领城外的小山头，就完全可以控制住这座城。在依据亲自观察为情报处提交的战争分析报告中，史迪威描述了中国防御战术的内在缺陷。在开阔地区，面对日本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缺少这类武器的中国人只是敷衍地进行一些防御，然后很快放弃阵地。然而在山丘隐蔽良好的情况下，他们能更好地守住阵地，仅凭步枪、手榴弹和机枪就能阻滞日军前进。敌人继续向侧面推进，往往插入一个突起地带，这原是反攻的好机会，但是中国人“总是要保护后方”，结果没有抓住机会。他们将预备队藏而不用，没有竭尽全力，否则本来是有可能成功的，结果人数上倒是相当了，但是日本的主动性和先进装备很快就改变了平衡。“中国的补给体系是有问题的。”史迪威在私人笔记中这样写道。他还认为“未能利用中国最大的财富——人力——这是最为失策的”。

报告的结论还是他一直保持的看法：“中国的士兵都是很好的材料，可惜被愚蠢的将领们浪费和出卖了。”这还引出了另外一种假设：“假如中国士兵吃得好，有好的武器装备，能得到关心，并且有好的将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10月21日到25日这五天里，中日战争再次出现高潮。日本人不但攻克汉口，而且占领了广州，这是中国跟外界唯一的海上联系通道。这个南方重镇的陷落仿佛瓜熟蒂落，原是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原来指望在海湾那边的香港有英国人在，因此没有对广州进行防御，因为他们不相信日本会在太平山的阴影下轻举妄动，也不相信如果发生了这种事英国不会采取报复行动。但是警觉的日本人从慕尼黑事件中得到了启示。在丘吉尔所谓“不战而败”那天两周后的10月12日，日军在距离香港30英里（约48千米 ）的广东大亚湾登陆。为他们开路的是失职、腐败和一些叛变，因此日军没有遭到认真抵抗便占领了广州。

英国没有做出反应，因为如果他们做出反应而卷入战争的话，他们就无法保证得到美国支持。据约翰逊大使说，中国人感到“非常失望”。在日本登陆大亚湾后，蒋介石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敦促他给予英国在远东“合作性干预”方面必要的鼓励。他阐述自己的论点时并不畏缩。他教导总统说，亚洲的问题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才能解决，而“美国必须扮演领袖角色”。那正是美国的问题。美国既不想做领袖，也不想默认日本对中国的控制，但是，不扮演领袖角色则日本必然会控制中国。

日本原以为拿下汉口和广州后会最终赢得胜利。现在日本已经在中国大陆投入了100万人，他们急于结束战争，因此竭力想迫使中国接受某种解决方式。他们宣布成立日本、中国和“满洲国”组成的反共集团，并基于此建立东亚新秩序。他们还邀请中国政府参加，条件是中国放弃过去的抗日态度并“对其人事进行改组”。日本现在已经控制了中国的港口、铁路、主要城市、华北、山东半岛、长江谷地以及南部海岸，因此日本认为国民党现在只能投降了。为了谈判解决办法，他们竟然成功赢得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成为特使。汪精卫跟其他一些人都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汪精卫部分是因为对蒋介石怀有旧恨，部分是因为他想通过跟日本合作而对蒋介石取而代之，总之，汪精卫认为日本统治时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如果他妥协，那么他不会有好下场。他一如既往，经受了事态发展对他的冲击。什么都没能改变他。他坚信中国将会比日本更加持久，而且从历史上看，他必然会有外国盟友。由于结构松散而且是农业社会，中国即使被隔离也可以在大西部存活下去——至于物资会匮乏到何等程度或者要经受何等痛苦，这都无关紧要。用人力在山中开出的通往缅甸的狭小道路刚刚通行。蒋介石会在敌人无法到达的重庆坚持下去，直到日本最终跟苏联或者西方大国发生冲突。他拒绝日方的任何和谈条件。

由于1938年12月汪精卫的和谈使命失败，局势僵持下来。日本重申其新秩序中包括被占领的中国，并决心“彻底消灭”“仅仅作为地方政权存在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在12月公开重申了保持中国独立的决心。日本除了发动惩罚性攻势外，军事进攻已经停止了，日军无意继续前进了。没有完成的战争就这样停下了，100万日军也在这里留下来了。1940年日本在南京扶持成立了汪精卫傀儡政府，但是只要独立中国仍然存在并在抵抗，占领军就无法撤出。

新秩序是与美国的对抗，违背了中国的完整和机会均等这两个美国四十年来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再次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情形：一个国家从良心上说无法接受这种状况，但是又不愿意用武力反对。华盛顿采取了折中的方式，那就是抗议。它宣布新秩序违背了门户开放原则和《九国公约》。日本对此表示吃惊，说美国“未能认识到由于日本在中国发动的成功军事攻势而在远东造成的新状态”。由于在美国再次有人鼓动实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据一个有经验的记者报道，日本因此“开始感觉到，当日本与中国商讨解决办法的时候，美国将成为它的大敌”。

史迪威并没有等到日本进入汉口。他前往商震在长沙的司令部，长沙是新防线的关键地方。在其后的两个月中，当局势充满变数的时候，他一直待在南方前线，跟随各个单位转移，其中包括军队、医务人员、未及撤出的官员、外国同僚、记者，此外还有战败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流离失所的人。

另外一种大迁移，一种缓慢进行的大变动，正在把自由中国的生产力量向西转移。人们源源不断地将物品、设备还有他们自己经过长途艰难跋涉，从占领区转移到独立区。冒着连续轰炸参与这种迁移的有船只、火车、马车、牲畜和苦力，从广州、南京、徐州以及其他城市向内地迁移。工厂机器、政府文件、大学图书馆馆藏、医院设备、军工厂以及办公室的设备都装箱用扁担挑走，或者装在舢板上逆流而上，由那些纤夫一步一步通过翻山越岭，从没有路的江岸拉过去。这是一种古老的将船只拉过激流的方法，一条船往往需要几百名肌肉发达的苦力，他们弯腰拉着纤绳，慢慢将重物拉到长江三峡那边的自由地区。一整座纺织厂被装入380条舢板，其中三分之一在急流中沉没，然后再被打捞，重新包装后继续赶路。有些工厂设备在路上运了一年多，然后才得以复工。大学教师和学生组织了由粮秣队、警察和驮东西的驮畜组成的行军队伍，步行到西部和西南的新校址。史迪威曾经在汉口和长沙看到了一些这样的行军队伍。“一个苦力肩上挽着一条长管子快步走过。一个拉满零件的马车吱吱呀呀地经过。一个锅炉放在滚轴上拉过。有些机器放在木制滚轴上通过人力拉着走过500英里（约800千米 ）。等他们走得够远的时候，他们就在长江边的石崖上凿出洞穴，这样半年前还在广州运转的军工厂就在这里被复制了。”这场跟共产党的长征相比毫不逊色的大迁移，再次证明了史迪威在那百足虫推动货车时看到的东西——中国那不可征服的劳动力。

史迪威慢慢经由衡阳抵达广西桂林，与此同时，他继续关注中国各个师，跟指挥官回顾事件经过，竭力寻找交通工具，并试图透过混乱和谣言的迷雾了解真相。他发现必须等到2月才有空位乘飞机去重庆，于是设法在汽车中找到一个位子，沿着唯一的一条汽车公路，经过贵州，穿过崇山峻岭，驶向重庆。有天晚上他在一个只有一条街的小镇上停下过夜。他在当地的小客栈吃饭，还请了“许（Hsu）、田（Ti）、朱（Chu）和唐（T'ang）……都是好人”。晚上他住的房间里跑进一只有趣的老鼠，他管它叫“工程师”，因为它非常擅长解决问题。

12月28日，在中国此后七年里的战时首都重庆，史迪威跟蒋介石会

面了。这时他得到允许可以在5月份任职结束前待在北平，因此他在重庆待的时间很短，只是在12月19日到31日这段时间。不过史迪威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得出结论，这是个“糟糕的地方”；在这个有五百年历史的边远城市，要从江边进城必须爬上很陡的街道和台阶，下水道是露天的，冬天则弥漫着大雾。跟蒋介石夫妇的会面只持续了似乎很愉快的十五分钟。史迪威的记录认为：“非常热情。两人看上去都极好。他们都很坦率。给了我一张照片并向我祝福。”有他们签名的照片后来在史迪威北平家里的客厅里占据了显著位置，这也许更多是为了表示对日本人的蔑视，而不是出于对委员长的崇敬。

史迪威在与蒋介石夫妇会面后不到一个月，在有关这个中国领袖的报告中总结了自己的判断：“蒋介石对在他指挥下经常出现的混乱负有直接责任。”史迪威认为，其原因是由于他对潜在对手的猜忌。蒋介石不敢下放权力或者相信自己的下属，试图尽量多地牵制他们。蒋介石“首先考虑的是维持自己对精锐部队和物资的控制，这样他的地位就不会受到威胁了”。

史迪威在私人笔记中还写道：“他（蒋介石　）想让自己的下属都对情况不了解，因为他不信任他们……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不可能很好相处和共谋。”在谈及那些日后让自己深受其苦的因素时，史迪威写道，委员长“从来不把好的枪炮分到各师中去，因为他不想把炮分给他们——各师只有机枪和迫击炮。这种由来已久的不信任使他无法造就一支有效的部队。他总是考虑保存实力，也许是为了在他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使用”。另外，蒋介石从来没有一种可靠的消息来源：“他周围有一些一知半解的人，他们向他提供的一切看法都是扭曲的。他从来不去亲自看看……始终缺乏真正的监督。”

不管史迪威对这位总司令是什么看法，他是把中国作为未来的盟友来看的。他相信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很久以来他就在搜集各个师和指挥官的材料并对之加以判断，以找出将来一致作战时可以利用的部队和指挥官。他通常不大看重中国军队的领导才干，但对某些个人的能力有很好的评价。他还吩咐自己的副官多恩上尉留意发现能干和强有力的指挥官。史迪威相信，如果美国在组织、训练、设备和供给、计划、指导——甚至可能的话——在指挥方面给予大规模帮助，中国人就可以有效地对抗日本。他在头脑中已经开始勾画未来的轮廓了。他特别看重的将军包括顾祝同；他写道，如果美国将来跟中国一样对抗日本，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位很好的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在美国军官和参

谋指挥下作战”。他认为自己最喜欢的商震将军若“在美国参谋中担任顾问必将愉快胜任”。

1938年的最后一天，史迪威乘飞机离开重庆去云南的省会昆明。昆明现在是自由中国的主要空军基地，也是滇缅公路的起点。这天晚上他在宾馆中与陈纳德共进晚餐并长谈至深夜，没有任何征兆预示他们之间后来将出现争端。

由于日军的占领，史迪威在北平的最后几个月过得很不舒服。他会说日语的新副官弗雷得里克·蒙森（Frederick Munsen）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他去正式拜访冈村（Okamura）将军，认为这对武官办公室的正常运作很有必要。史迪威勉强同意了，但是宣称他不穿制服。蒙森又好不容易说服他改变了立场，史迪威再提出不佩剑。在说服史迪威这是礼节上的必需后，他毫不通融地坚决拒绝穿马裤和皮靴，因为这是日本军官的一贯装束。史迪威闷闷不乐地穿着军便服去跟中国的征服者喝茶，并在奈良的宫廷麋鹿这样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上同他们展开了一番争论。

为了私下缓解情绪，他对日本人品性的优劣进行了罗列。史迪威认为他们有六种优点：勤劳、勇敢、持之以恒、有条理、纪律严明、爱国；他们的弱点有二十六种，包括傲慢、玩世不恭、残酷、无所顾忌、野蛮、愚蠢、狡诈、说谎、不择手段、不道德、神经兮兮以及歇斯底里等。在那段时间里，必须迁就日本人的任何外国人大概都会同意史迪威的感受，只是他们未必像他这样善于表达罢了。为了保持正常关系，只能忍受日本人旨在挑衅的傲慢无礼，更糟的是还要忍受各种黑白颠倒、歪曲事实的做法，这无疑是对灵魂的折磨。罗伯特·克瑞基（Robert Craigie）爵士是英国驻东京的大使，就连他也在出访上海期间说“对姑息日本的政策感到厌恶”，而且“由于要对这些混蛋彬彬有礼而感到恶心”，以至于经常有屈辱感，“在情感甚至精神上都出现了混乱”。爵士老是做梦，梦见自己穿着带金色镶边的将军服率领一支登陆部队在东京登陆，后来的一道命令让他欢欣鼓舞——“全力对这些肮脏的杂种实施报复”。

真正折磨克瑞基、史迪威还有其他很多人的，是他们自己国家在面临日本入侵时表现出的消极被动。当暴政大步挺进的时候，民主国家为了换取虚假的安全感，不断施行绥靖政策，这时人们的挫败感非常强。此外，史迪威个人的职业生涯也前景黯淡。准将这个在军事生涯中举足轻重的一颗星离他越来越远。再过一年他就已经五年没有升迁过了。由于已经在陆军服役三十年，他只能被强制退休了。他的朋友哈尼卡特，

还有他同班的九个同学都已经是将军了，其中还包括两个比他年纪小的同学。尽管有朋友和提携他的人为他说话，为他向陆军部写信，尽管由于他们的努力，他的名字已经被成功列入有资格的人的名单上，但是麦克凯布在他鉴定中的诋毁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他新接到的命令是担任一个没有前途的职位，他认为“他们是想把我晾起来”，感觉自己将会跟其他退休的上校一样，黯淡平庸地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1939年5月1日，离开的日子到了。周围的气氛很是让人泄气。远在重庆，由于冬季的大雾散去，日本对这个城市的恐怖轰炸又继续了。美国仍然在向日本出售废钢铁。抗日初期没有任何帮助中国的迹象。在卢沟桥事变近两年后，史迪威原先希望军事抵抗会更加协调有效，但是这并未出现。

在中国的最后一天史迪威一家乘河船由天津去塘沽，此时他们遇见了一个朋友，这就是一个使馆官员的妻子埃德蒙·克拉布夫人。她也准备回国。他们拿着午餐篮准备到甲板上野餐，这时河上漂来一具溺死的男人尸体，他还抓着一个已经淹死的孩子，孩子还系着一条绳子，绳子绑在一块木头上，这是船家用来救生的方法。看来这没能救他的命。仿佛这象征着中国的一切都是令人悲伤和不公正的，在这一刻他们在河上看见死尸简直不可忍受。他们默默无言地收起午餐回到甲板下面去了。

在美国，三天前史迪威的命运由于一个意料之外的发展而完全改变了：马歇尔越过了军衔比他高的34位高级军官脱颖而出，成了代理参谋长，并在9月1日担任正职。由于冲突在即，马歇尔的当务之急是用积极主动、富于实干的人代替那些平庸之辈。他提名晋升准将的头两人之一就是史迪威。

8月3日，史迪威一行经过了三个月经由暹罗、印度支那、马来亚和爪哇之后，在他们乘坐的船进入火努鲁鲁的时候，史迪威接到电报得知了他晋升的消息。他对温妮说：“这让人难以置信。先不要跟人说。我到甲板上转一转，好好消化一下这个消息。”可是在这艘陆军运输船上这个消息已经传开了，人们纷纷涌过来向他表示祝贺。所有的人都很兴奋，只有一家人例外，这家人因为职位比史迪威高，已经抢先占据了最好的舱房。史迪威现在有资格使用这个房间了，但是他无意行使自己的权利。在火努鲁鲁逗留期间他对温妮说：“让他们以为我们会坚持要使用那个房间而感到不自在吧。”

在纷纷而来的贺信中，他所取得的所有成绩和他所宣称拥有的所有品质都得到了承认。“自从二十多年前我领教了你那该死的奶酪玩笑以

来，我就相信你配这个。”舍尔曼·迈尔斯说。很多信都表露出一种惊喜，因为一个明显具有“独立思考力”和“勇于实践”（正如一位步兵少校说的）的军官竟然得以在逆境中脱颖而出。这些信都认为，这个消息恢复了人们对当局的信心，司令部终于顶住压力做出了一项好的任命：“我们知道马歇尔在陆军会妥善行事，看来的确如此。”这些信都由衷感到高兴。一个朋友写道：“这好比把阔边帽直接从屋顶扔出去。”威利·惠普尔写道：“好极了——你早就该得到这个了。我一直这样说。我们1904级的同学也都这样认为。”一位炮兵上校宣称：“从昨天开始将官的平均素质提高了很多。”

埃文斯·卡尔森写道：“我在中国形成的一种看法就是，陆军需要一位像你这样的人做将官……毫无疑问，我会为能在你手下作战而感到自豪。”其他曾长期在中国服役的人都感到高兴，觉得“该死的中国帮”终于得到了相应的承认。尽管军事情报处长期以来对史迪威很是不满，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军情报处的一位军官认为，史迪威的报告使得这个部门“得以了解中国战争”。“多年来没有谁比你更值得成为将军了。”这位崇拜者还说。他知道，“如果在不久的将来爆发了战争——看起来有这种可能”，那么史迪威会在战场上证明这个任命是正确的。

一个月后，战争在欧洲爆发了。

---

[1] 坎戴德（Candide），伏尔泰同名书中人物，此人遭受种种不幸而能保持乐观。——译者注

[2] 列克星敦（Lexington）：马塞诸塞州城镇，1775年4月19日美国独立战争在此爆发；特伦顿（Trenton）：新泽西州城市，华盛顿1776年在此打败雇佣军；瓦利福奇（Valley Forge）：宾夕法尼亚州的村子，1777年到1778年冬季华盛顿部队在此宿营。——译者注

[3] 麦克凯布的前任，如1935年任情报局局长的耐特（H. E. Knight）准将以及1936年的林肯（F. H. Lincoln）上校，都觉得史迪威“极其适合”他的任命，“极端聪明”，“喜爱而且胜任自己的职务”。

[4] 奈尔斯（Nelse），纳尔逊的昵称。——译者注

[5] 勇士“公牛”（Sitting Bull），美国印第安人武士以及部落首领。——译者注

第九章

仓促上阵

1939—1941年

史迪威在1939年9月回国时，美国陆军连同其预备役在世界上的武装力量中排名第十九，在葡萄牙之后，但还在保加利亚之前。在武装国家中如果按人口比例排序，美国排名第四十五位。陆军现役人员为17.4万人，还不到1920年国会法案所许可的和平时期军力的三分之二。有三个整编师，但没有一个能达到满编时的一半数量。其各组成单位分散在各个驻地中，由于缺少供运输的机动车辆，这些部队没有机会进行师级训练。此外，还有六个部分整编的师、两个骑兵师，但是装甲师连一个都没有。没有集团军级、军级或者指挥部级的部队。作为野战部队训练很不够，装备都是1919年的过时装备。由于缺少资金，训练都是每四年举行一次，每次历时两周，其中仅有五天“有限的实战”训练。根据现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报告，由于国会对陆军拨款一再削减，陆军“地位相当于一个三流国家的力量”，战备能力仅有25%。

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陆军是最后使用的，而且使用的可能性很小，陆军只是用来保卫美国本土的，因为美国已经受到海洋的很好保护。军事政策并未考虑在西半球外再派遣远征军。在参加了上次的海外战争后，整个国民都认为“永远不要战争了”。马歇尔的当务之急是让陆军部队满编，并在训练和设备上能够做好从事现代战争的准备。西点军校之父席尔瓦努斯·泰尔（Sylvanus Thayer）将军曾说：“要把好材料造就成为好的士兵，他们必须由称职的人进行训练，要把一群优秀的士兵造就成一支精锐军需要三年时间。”这个任务本身已经够艰巨了，可是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说服国会拨款。



“二战”时美国政府号召民众购买战时债券的海报

史迪威准将奉命指挥得克萨斯萨姆休斯敦堡（Fort Sam Houston）第二师第三旅。在任职前的一个月假期中，他在西点军校就中日战争做了演讲；一个骑兵军官问他，马在中国战争有什么作用，史迪威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史迪威先是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很好吃，如果你饿了的话。”他去华盛顿报告有关中国的情况，这也可以让他有机

会跟他现在已经在军阶上超过的“麦克凯布理论一番了”。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当这位新将军从走廊上大步走过的时候，一个个脑袋都从门口伸了出来；史迪威在跟麦克凯布谈话期间为了方便这些偷听的人，有意没有把门带上；可惜这次谈话没有留下记录。

作为一名将军，他现在有权配备一名副官。这有些问题，因为在史迪威看来副官就像一根文明棍一样，显然是种浪费，是种让史迪威光火的东西。副官是“开门和挂衣服的人”，但是他自己设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选择弗兰克·多恩这个性情投合的人做副官，在中国时多恩已经在他手下工作了四年。多恩192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人们管他叫“粉色”（Pink，又译作“平基”），这是由于他的脸色而非其政治观点。38岁的多恩是个英俊的单身汉，很有修养又多才多艺，是个有才气的爱好艺术的人，他天生就有些不恭敬的态度，同时在知识上又很有好奇心，这使他可以成为让人很有灵感的伙伴。史迪威提及这个问题时颇觉尴尬。他对多恩说：“我了解你对副官的看法，也知道你对将军的看法。我提议你担任这个职务。我将成为一种新的将军，而你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副官。你不必现在回答。好好想一想，然后给我发封电报。”多恩接受了这个职位。

尽管晋升将军后史迪威个人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但是他仍然对美国政策感到恼火和不满。在他看来，华盛顿未能理解远东的发展正在怎样地影响美国，而且太关注欧洲了。跟其他任何认真的外交官一样，他觉得自己的报告并未能影响到决策层，也许甚至没有被读过。 [1] 他认为美国的关切之处应是亚洲，但是面对日本的挺进，美国却表现出相对的沉默。美国这是在忽视亚洲的局势，但是从长远看，亚洲的重要性将超过欧洲。他相信对日作战即将到来，认为对欧洲的关注使得华盛顿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不管是谁，只要不久前在中国亲眼看到日本人，看见他们逮捕、用枪指着或者有意侮辱外国人，他们都会因为无法向华盛顿那些埋头文牍的官员传达这种日本威胁的紧迫性而感到绝望。

史迪威就此跟马歇尔理论，马歇尔向他保证说，他的报告都读过了，对这种局势也有足够了解，尽管或许远远没有采取应对之策，马歇尔还对史迪威说：“乔，你的工作就是去萨姆休斯敦堡并帮助我们。”

史迪威在9月24日到达得克萨斯。作为旅长，他在师里是排在华尔特·克鲁格（Walter　Kruegger）将军之后的指挥官。当时，陆军为了提高速度和机动性，正在利用第二师试验一种削减过的三三制而不是以前的四四制。按照三三制，第二师由三个步兵团组成，人数为1.1万，而按

过去的四四制则有2.2万。由于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战，第二师和第三军的相关单位进行了一个冬天的艰苦训练，他们住在野外，进行行军训练，睡在地上，经常要冒着雨和严寒。在1月进行野战训练时，克鲁格让史迪威负责一支进攻的“敌军”。由于史迪威富于活力，这成了他在演习时经常扮演的角色。美军的训练是针对抵御入侵者的，据一个同事说，现在有了史迪威率军入侵，“很少有令人乏味的时候了”。他的想法、出其不意和意料之外的战术都打破了常规，而马歇尔在1月的一次访问中也见证了这些情况。用多恩的话说：“他（史迪威 ）想赢，并不只是想玩。”

在华盛顿那些计划部门中，尽管没有考虑海外作战，但是陆军部还是拟定了一项在紧急情况下动员50万人的“保护性动员计划”（Protective Mobilization Plan），旨在最终使部队人数达到120万。但是并没有采取行动动员这个国家的工业部门，让它们为这支军队提供数量很大的武器和补给。罗斯福回避了这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担心引起公众不满，再次指责他进行经济“独裁”。他也不愿意全额拨付马歇尔所要的拨款，因为他正在劝说国会修改《中立法案》，担心这样会遭致国会的反对。他认为在欧洲危机日渐加深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废除武器禁运，这样，一旦需要的话，美国就可以援助盟国迅速取胜，这样就可以使美国避免卷入冲突。尽管那些孤立主义者也许并不明白，但是美国政府很清楚：美国的安全最终依赖于英国舰队。英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并非如此。

美国尽可能地想继续保持中立，这是美国已经摆脱旧世界冲突的最后的梦想。然后1939年9月来到了。德国那令人可怖的56个师和1400架飞机摧毁了波兰，这让国会震惊之余终于在11月经过一个月的辩论，废除了武器禁运，但是孤立主义者还是设法保存了现购自运的条款。

美国情绪现在是更倾向于涉入远东而不是欧洲。这部分是由于美国对中国有负罪感，另一方面是由于一种有趣的事实，那就是做一个孤立主义者和做一个反日分子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些老派的言辞激烈如博拉和海勒姆·约翰逊的参议员都是既慷慨激昂地反对战争，又对日本气势汹汹，这似乎并没有让他们遇见什么内在的困难。罗斯福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让国会在1939年7月同意按要求提前半年通知日本，美国准备中止现在的贸易条约，这为施加经济制裁扫清了道路。这个举动是针对日本对在中国的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各种极端的骚扰做法的回应，是表明美国不会撤出，要日本人小心。

孤立主义的领袖人物范登堡（Vandenberg）参议员已经提议废除贸易条约。另外有两名参议员提出议案对日本采取某种形式的武器禁运（《中立法案》并不适用远东）。格鲁大使自东京回到华盛顿进行协商，他对国内这种情绪很是吃惊，认为“对日制裁的压力将会很大……国会可能会要求实施制裁”。到了1940年1月，已经有了五种不同的对日实施贸易制裁的议案等待国会的批准。这说明，自“帕奈”号事件后美国国会没有通过拉德罗决议后两年来，公众舆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国城市的恐怖轰炸以及美国正在向日本出售废铁的助纣为虐的感觉起了作用。美国传教士医生周以德生动地说明了这其中的关联。他说，他在山西行医时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从中国伤员的体内取出。他的听众可以想象，他们那些废旧汽车转变成了日本的炸弹。尽管教会团体总体上反对对日本实施禁运，认为这可能导致战争，但是很多传教士还是对此积极支持，“如果需要可以由海军坚决支持”禁运。民意调查表明，70%的公众都倾向禁运。格鲁大使在东京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演说（又是出于警告的意思）中说，“美国人民”反对日本试图在亚洲建立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以及“轰炸、各种侮辱做法，以及对美国各种权益的侵犯”。

出于急切的战略考虑，罗斯福的策略在远东问题上已经落在了公众舆论之后。尽管陆军部和国务院都极力劝说，罗斯福还是没有对日本实施禁运，担心依靠美国进口石油的日本会转而向南面的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取石油。在南亚的东印度群岛有石油，马来亚有橡胶，加之印度支那的大米，这些都是日本需要的资源，由于欧洲战争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他们的机会来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趁着帝国的扩张，要求进行这种冒险。这对除了苏联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可能是发动战争的理由。这将会危及从香港到新加坡的所有西方领地，包括菲律宾，甚至包括印度。这意味着要在两个大洋发动战争，对此英国舰队力所不及，而美国又没有做好准备。如果可能的话就避免，至少推迟这场战争，这一点至关重要。

美国没有将陆军派驻海外的想法。“简直难以想象我们会再向海外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上校在1940年4月2日的一次演讲中说。他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而是具有国际胸襟的《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的出版人。尽管他警告说盟国仅有50%的胜算，还敦促增加美国的海空力量，但是他认为，“全国进行战争动员并让几百万士兵参战的浮夸计划……对我们的防御毫无必要”。六天后德国入侵挪威和丹麦，这使得静止的“虚伪战争”结束了。

此时美国陆军兵力已达24.1万人，但是只有5个可以进行战斗的整编制的师，尽管他们并没有被完全装备起来。预计的50万人——更不要说120万人，还有部队所必需的武器、设备，尤其是飞机，根本就没有。据陆军部对总统的说法，要生产出足够满足120万兵力的装备，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现在德国已经开始横扫低地国家并开始准备进攻法国。罗斯福要求的新国防拨款是10亿美元，而他要求的飞机生产数目更是让举国震惊，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一年5万架。

5月10日，也就是德国入侵荷兰和比利时的那一天，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军级演习开始了——这次演习在路易斯安那开始，涉及第三集团军的7万士兵。统率入侵的“红”军的史迪威这次赢得了美誉，这使他成了美国战斗步兵将领的佼佼者，并在他赢得第一颗星不到一年又得到了第二颗星。由于即将决定是否采用三三制师，而且由于有机会观察第三集团军演练闪电战术，全军的要员都在观看。这个计划假设“红”军方的一支3万人的军队正在入侵美国，并正在由得克萨斯跨过以萨班河为界的路易斯安那挺进。“红”军正在向“蓝”军的首都亚历山大进军，而“蓝”方的4万军队（防御方配给了更多的人数）正驻防700英里（约1126千米 ）外的本宁堡。“红”军由包括第二师的第九军充当，“红”军提前发起攻击，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只能是史迪威的点子。这反映了他的一种理论，那就是要成功发起进攻，就要“打乱那些计划好的事情”。

奋起进攻的“红”军空军夺取了制空权，这使得“红”军的地面部队迫使“蓝”军后退，夺取了几个关键阵地并继续前进。史迪威的特长是夜间调遣，通过长途奔袭完成包围，这样他就可以袭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根据一篇热情洋溢的报纸报道，他的部队“在经过陆军历史上一次最为辉煌的包围之后”袭击了纳奇托奇斯。从萨班河的出发点开始，他的侦察车就两个一排在凌晨3点冲过了桥，后面是每座桥和岔路口都派有破坏部队，是为了防止“蓝”军有任何占领侧翼阵地的可能。到了天亮的时候，他的先头部队已经长途奔袭70英里（约112千米 ），“仿佛是情节剧中的一系列转捩点一样……史迪威发起了可谓登峰造极的闪电战”。到了夜晚，他的部队的行踪已经消失在“战争的迷雾”中，到处都在问：“第二师到哪里去了？”

随着战事的扩大，史迪威继续施展各种出奇制胜的策略。早晨他常常出现在错误的地方，也就是他在计划中不该出现的地方。有一次让克鲁格将军恼火的是，他夺取了当时由乔纳森·温赖特（Jonathan Wainright）将军指挥的第一骑兵队司令部，温赖特不久就在菲律宾巴丹

遭受惨败。裁判裁决此次行动有效。观察者都印象深刻，因为史迪威咄咄逼人，通常总是取胜，而此时大部分军官似乎头脑中还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跟美国军事演习遥相呼应的是正在荷兰和比利时横冲直撞的德国装甲师，他们在行进中已经揭露出了防御方在路易斯安那演习中显现出来的缺陷。除了侦察很弱，缺乏部队之间的联络并“令人痛心”地缺乏炮火支援外，主裁判还指出，“部队极不情愿从卡车上下来”，而卡车本身也很不愿意离开大路向荒野走。那些离不开公路的卡车只是些坐着的目标而已，而卡车中的步兵是“完全没有作战能力的”。史迪威也对此甚为不满。他指出，在欧洲“已经发展出了一种革命性的进攻方式。侦察航空、侦察车、深水炸弹、重型坦克、机械化步兵、轰炸航空兵、伞兵，这些都息息相关，攻击后就会立即散开，企图使敌人的后方阵地瘫痪。我们对此有足够注意吗？没有”。

困难之处在于，很多军官跟一般公众一样，不像在中国经历了两年战争的史迪威那样对此有紧迫感。正当德国镰刀横扫法国北部并将盟军赶到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一个美国师长还打了个赌，就好像只是有关明天的天气一样随便，说如果法国陷落，英国就连六个星期也坚持不了。

到了6月中旬，法国的陷落已经成了可怕的现实。德国人真的到巴黎了。他们用六周时间所取得的成就，是在1914—1918年间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都未能取得的。这种对比突然揭示了民主国家的弱点。英国在敦克尔刻撤退中使其陆军得以保存，但是所有的重武器都丢弃了。他们缺少步枪和弹药，几乎只能依靠空军了，现在他们只能凭借着英吉利海峡，而温斯顿·丘吉尔此时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演讲：“我们将在海滨与之作战……在街道上……我们决不投降……”



丘吉尔在伦敦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演讲，他的背后是林肯的大画像，1944年

法国的陷落让美国震惊。突然一切都变得可能，人们不再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是不可能受到攻击的了。美国总统私下承认，如果英国战败，那么美国只能“在纳粹的枪口下”生活。军界的看法都不乐观。乔治·斯特朗（George Strong）在麦克凯布主持情报处工作时曾经也是让史迪威诅咒的人物之一，他现在是作战计划部部长，他在6月17日预测说“盟军不久就会失败”。公众在“虚伪战争”时都认为盟国必胜，现在他们的看法正相反；由于美国的防御非常匮乏，他们陷入恐慌之中。罗斯福总统和前总统胡佛都在电台发表讲话，安抚罗斯福所说的那些“叫喊大难临头的人”，并试图化恐惧为有益的目的。胡佛说：“没有必要恐慌，但有必要迅速行动。”

接下去的几个月忙着制订各种防御计划。根据陆军部的计划，陆军人数在1941年10月要达到100万，一年后达到200万，这一切都有赖于在那个大选之年实施在和平时期令人憎恶的、非美国化的义务兵役制度。总统出人意料地任命两名共和党人进入内阁，即前国务卿、现年73岁的史汀生任陆军部长，由诺克斯上校任海军部长。他们两人都是义务兵役制的积极支持者。与此同时，国会匆忙通过了增加陆军人数、增加海军吨位并为此再拨款15亿美元的计划。但是这些都是在修修补补。7

月的时候总统向国会提出了在生产要求方面的“全面防御”计划，该计划是针对一支120万的陆军、相应的空军以及可以在两大洋作战的海军，已使这支部队可以应对任何组合的三军力量，花费是近50亿美元。国会为了国家防御乐于通过任何计划，但是执行这些计划的义务兵役制计划则是例外。这个国家还不想面对这样一种暗示，那就是历史再次提出了发动一场对外战争的议案。整个夏天都在就征兵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为了不让日本利用欧洲的危机，美国决定将太平洋舰队的基地设在夏威夷——舰队已经在4月从圣迭戈迁到这里了。遏制日本已成了美国的当务之急，其重要性仅次于备战本身。这个任务本身有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任何可以有效遏制日本扩张的行动都必然激起日本进行反遏制——简而言之，这会激起本来试图去遏制的侵略行动。这种困难一直是困扰后来发展的问题。

日本政府还不愿意放弃最后一点谨慎态度，到目前为止一直对要求加入轴心国的军方代表采取抵制态度。军方分子认为，如果跟节节胜利的德国结盟，那么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德国将会使苏联保持中立，这就可以让日本无须担心北部，自由自在地往南进行扩张。他们还认为，德日联盟还会阻止美国积极支持中国，这就使得日本可以最后解决这个“事变”。好战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对其同僚说：“我们越是对美国进行有效扼制，就越是可能迅速地解决‘中日争端’。”日本封锁天津的英国和法国租界，对上海的公共租界进行挑衅并施加压力，侵犯美国财产并在长江差点儿炸了另外一艘军舰——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展示民主国家的弱点，并消除日本政府中对加入轴心国所存有的顾虑。

对日本来说，德国战胜法国同样也是个转折点，证明了德国的确代表了未来的潮流。幕后跟德国的谈判开始了，日本外务省现在开始公开跟“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站在了一起，并赞同“将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是日本国家命运的说法。由于欧洲出现了盟国结盟的情况，日本认为必须通过切断中国接受西方物资的最后通道以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三年后，这场“事变”的结局对日本人来说仍然遥遥无期。进一步渗透、轰炸、恐怖主义、做出姿态、跟汉奸勾结——这些都无济于事。他们原来想通过强迫的相互合作来控制中国，但是只要国民政府仍然在进行抵抗，他们就必须继续军事占领。在法国面临崩溃的最后一刻，日本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法国关闭从河内到中国的铁路，并要求允许日本出于检查目的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与此同时，日本在以战争相要挟的情况下，实际上命令英国关闭了香港边界和滇缅公路。通过

那条拥挤而又管理无方的公路运进的物资其实并不多，不过，这条由20万男女老幼几乎徒手在山坡筑成的公路现在是他们跟西方唯一的联系渠道。一个友邦关闭这条公路，当然会改变他们对民主国家的看法，并增强了那些主张跟日本媾和者论点的分量。

而大英帝国和美国本身却无法调动足够的集体力量来对抗这种要求。现在孤身对抗轴心国的英国向美国提出请求，一旦拒绝日本而导致战争，则美国需参与共同作战。美国为了支援敦克尔刻撤退后处于孤立无援和危急之中的英国，几乎已经清空了它的军事库存，其现状已经难以应对战争，再说美国也不想因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被袭击而承诺参与战争。美国无法承诺共同作战。英国只能屈服，于7月12日关闭了滇缅公路，不过附加条件说关闭期为三个月，以期望日本和中国再次做出努力达成和解。

重庆弥漫着一股悲观主义的氛围，但是这还不足以让它跟日本媾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泛亚和反西方的主题，对很多中国人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受到激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拒绝了那些鼓吹这种说法的日本人。汪精卫在南京的傀儡政权未能得到普遍支持，因为很明显这是由日本操纵的，而且日本对乡村使用武力“安抚”，这也无法使人们对“共荣”产生好感。

蒋介石对各类使者的频频示意并不理会。他一直坚信，当西方不可避免地卷入对日战争时他就会得救了，而且他是一个不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即使在民主国家的前途一片黑暗的时候也是如此。另外，正如他的一位国人说的，如果蒋介石跟日本人纠缠在了一起，“那么他最终也会被毁掉”。但是自此以后，蒋介石越来越紧急地请求美国提供援助时却总是伴随着这种暗示，即他可能与日本媾和，因为中国人的斗志已经濒于崩溃，或者因为无法进行持续抵抗。由于大国未能帮助中国或者更加积极地遏制日本，中国对此并不掩饰它的怨恨。他们跟史迪威一样在绝望中提出质疑：美国为什么不能看出阻止日本的最佳时间就是现在？在蒋委员长向华盛顿要贷款、军火、信贷、飞机、制裁或者宣战并提出其他建议的过程中，这种质疑都是贯穿始终的。

罗斯福总统担心，实施禁运会使日本像传言中那样跟轴心国结盟，从而增加英国的危险。然而必须做出一些鼓励中国并警告日本的姿态：7月26日美国宣布对废铁、钢和某些航空燃料实施有限禁运，但是，由于担心日本会袭击荷属东印度群岛，因此禁运并不包括石油。

1940年7月1日，史迪威得到了每个军官都期望得到的任命——指挥

一个师。他被任命为第七师及其基地的指挥官，基地在蒙特雷的奥德营（Camp Ord），离他卡梅尔的家不远。第七师由三个团组成，现在在各个方面都需要训练。奥德营被重新命名为奥德堡（Fort Ord），这个营地正积极准备迎接新兵；一旦义务兵法得以通过，那么预计新入伍者会在10月大量来到。士兵都住在帐篷里，而可供1.5万人使用的兵营、食堂、行政楼以及其他设施都要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建成。

史迪威每天16个小时忙着制订计划、监督、视察、训练士兵、训练军官以及教会那些军官训练士兵。他立刻建立了一所学校，由托马斯·阿姆斯（Thomas Arms）上校负责，训练来自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连级军官。“从今天开始一周后准备开课。”他告诉阿姆斯说。训练内容为每天上午和下午进行战术讲解、示范和演习以及野战问题。史迪威每周有三四天时间是在观看班级和排级学员的训练情况，经常由他自己教没有经验的军官解决进攻问题。他经常仔细而耐心地解释有五个段落组成的野战令，以及命令的固定顺序，这是为了保证他们即使在激战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其中一条。他习惯于从灌木丛后面突然钻出来，并当场提出批评，谁也不知道他会从哪里冒出来。他不停地催促自己手下的高级军官工作，给他们很大的行动自由，但是希望他们在尽职尽责和表现方面能够向自己看齐。阿姆斯说：“如果你不尽力，那么你就待不长。他很冷酷，非常冷酷。”史迪威的领导方式让人兴奋，因为他不是“照搬书本”的，但是他对军官是毫不留情的。有些人感到怨恨，大多数人仰慕并崇拜他。第七师的一位上校说：“你不能不崇拜他。他有种魅力。”

国会在9月制定了义务兵制法案（针对年龄在21岁和35岁之间的男性，其服役不能在西半球之外，且服役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后，第七师85%都是新征募的士兵。坦克、卡车、迫击炮、枪炮、车辆、弹药以及各种士兵装备都很缺乏。士兵用木枪训练，并用点燃TNT炸药代替炮弹。无法进行真正的战斗训练，因为无论是公众还是应征者都没有意识到现实的紧迫性。媒体和父母们都反对让应征者在艰苦条件下进行训练。这种情绪反映在“10月开小差运动”（Over the Hill in October）中，这在服一年兵役的士兵中颇为流行。史迪威的训练计划却容不得士兵产生这种情绪。他举行战斗演习和阅兵，为的是培养士兵对自己所在师的自豪感，而且为了鼓舞士气，他经常亲自带队行军。通过他的训练和战术技巧，他造就的师在1941年的演习中脱颖而出。

他在练兵的时候最开心。他经常悠然自得地坐在应征的士兵中间，跟他们讨论战术问题。他思维敏捷，脸上时不时掠过一丝笑意。这位将

军戴着旧帽子，穿着供步行的靴子和伐木工穿的那种毛衣，几乎跟营地附近的平民没有什么差别，不久他就得到了“乔大叔”的雅号，此外，由于他擅长步行，也被人们称为“飞毛腿乔”。他走遍了奥德堡保留区周围的大小山丘，甚至从他家到总部的12英里（约19千米　）也有一半是步行来的。1940年9月传来了他被提升为少将的消息，在营地迎接他的是准备放13响礼炮的一排大炮、带乐队的一支骑兵仪仗队，还有聚在一起的本师军官。这显然都是多恩搞的，有点儿捣蛋的意思。“他妈的这都是谁搞的？”将军爬出汽车准备接受这种礼遇的时候由于难为情而怒气冲冲地喊道。

他向聚集的士兵致辞时总是非常简短。他说他不喜欢在提升的时候发表长篇演讲，因为他认为“一只猴子爬得越高，你就越能看清它的屁股”。

此时史迪威在对旧金山记者俱乐部发表的不许发表的讲演中说，跟日本开战是必然的。他说，如果再发生“帕奈”号那样的事件，就该狠狠揍他们一顿；还说，这种拖延实际上是把确定开战时间和地点的自由交给了他们。他说，如果让他指挥一支装备精良的中国部队并由两个美国师做先导的话，那么他可以半年内就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因为日本人尽管效率很高，但是他们没有想象力，很刻板，循规蹈矩，面对非常规的战术会不知所措。

当时在中国观察日军作战情况的外国军事观察员对日军的评价普遍很低。史迪威有关日军战术的信息主要来自经常在前线的福尔肯豪森以及其他德国顾问——他们经常告诉史迪威，要确定日本军官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总能看见他们在拿着望远镜观察，查看地图，或者配着剑，只要擅长狙击就肯定把他们弄倒一大批。卡尔森上尉在观察了1937年的淞沪会战后写道，日本的战争机器“显示出是个三流军队”。他形容他们缺少主动性和计谋，经过刻板的训练后事事循规蹈矩，一旦常规不管用，他们便会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使用别的方法。由于他们依靠重装备以及空军和炮兵支持，因此他们的部队“行进时很笨重，而且维持部队花费巨大”。经过进一步观察，他在1938年报告说，日军“攻击力弱，交通工具方面的协调差，空军和陆军方面没有很好地协同行动，武器差，炮火指挥差，而且指挥官缺少想象力和积极性”。但是卡尔森承认了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是不会重犯在这次战争中犯下的大多数错误的。”

史迪威以及卡尔森等人的判断，尽管出于对日本的厌恶，可能有些夸大，但是就日本在中国的表现来说并非妄语，并在后来产生了不幸的

后果。他们反映了西方人的普遍倾向，那就是认为因为日本人喜欢模仿，因此不必害怕他们。美国首席武官本特立·莫特（Bentley Mott）在1937年说："在军事工具或者发明领域从日本可资借鉴的东西很少，在战略或者战争艺术方面可以借鉴的就更少了。"他不免有些自以为是地认为，在这些方面日本仅仅是个模仿者，而且"继续在步西方进程的后尘"。再没有什么比从这种想法中幡然醒悟更加让人痛苦了。

1940年9月，也就是史迪威得到提升的那个月，日本加入了轴心国，用格鲁大使的话说，日本正式加入了"掠夺国"之行列。从这以后，根据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记录，总统及其顾问认为美国"最终会被拖入这场战争"，更加相信必须给英国提供援助，并通过某种方式援助中国。11月，美国很快批准了给中国的5000万元贷款，这距离9月的2500万元贷款还不到两个月。此外美国还准备一旦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结束，就立即跟英国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

美国在这个距离成为交战国还有一年的时候做出了一个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决定。总统跟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Stark）商量后，一致达成了这样的意见：一旦美国被拖入战争，那么基本战略将是在欧洲展开主要战斗，而在太平洋保持防御态势。这种"欧洲至上"的战略反映了这样的认识，那就是欧洲是世界权力的中心，而且他们相信会一直这样。这将决定战争的形式，其中包括史迪威所扮演的角色，并深刻影响与中国的关系。

此外还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陆军除非做好了准备，否则不承诺展开进攻；基于这样的共识，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1年1月召开。4月在新加坡召开了ABDA（美国、英国、荷兰以及澳大利亚）就远东合作的参谋长会议。由于美国没有承诺共同作战，会谈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英国曾多次问道，一旦日本袭击新加坡或者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话，那么美国会怎么做。美国无法回答。他们跟英国人同样认为，如果日本发起攻击，那么攻击对象肯定是跟德国作战的某个欧洲国家。12月，在马歇尔和斯塔克跟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会谈中，"这四个人都认为"，如果美国不参战，就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让美国参战。日本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如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所说的，海军已经得出结论认为"除非摧毁在夏威夷水域的美军舰队，否则我们没有取胜的希望"，因此日本海军在这年冬天开始为袭击珍珠港进行计划演练。

中国在1940年向美国提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请求。他们要求组建一支由50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飞机由服务于中国空军的美国飞行员驾驶，同时还要求为此项目提供大笔贷款。蒋介石认为这是件急迫的事情，并承诺这会有诱人的回报。他说出了其空军顾问陈纳德上校的想法，认为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美国飞机将在日本的海军基地摧毁日本海军，从而“彻底解决”问题。远程轰炸机可以“将战争引向日本本土”；中程轰炸机和战斗机可以通过袭扰日军海上运输线，阻止日本进攻新加坡，防止它控制中国海岸和轰炸英国刚刚重新开放的滇缅公路。蒋介石说，中国的经济和士气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这些飞机不能及时到来，具体来说就是在日本轰炸滇缅公路或者通过占领新加坡而封锁海上运输线之前到来，“那么就太晚了，中国的局势即使还未失去希望，也极其危急了”。

蒋介石看到他一直渴望获得的物资正在提供给英国。他认为，在英国施行绥靖政策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在战斗了，因此当美国开始提供这些援助物资的时候，中国理应得到优先考虑。当陈纳德正沉迷于他那了不起的摧毁日本海军的前景时，蒋介石所感兴趣的是建立一支空军，以及由此增加的各种战斗物资如何巩固他自己的地位。他向约翰逊大使承认说，他对共产党的担心更甚于对日本的担心，他担心共产党会“利用”这种局势。

其实共产党在最近几个月里对入侵者重新发动了攻击。对日作战对他们来说既可以防备国民党，又是他们赢得人民同情的渠道。这是他们需要的东西。由于法国陷落后担心出现失败主义以及蒋介石可能跟日本媾和并必然会对共产党围剿，为了使战争能够持续下去，河北和山西的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日本疯狂报复，开始施行新近制定的“杀光、烧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 [2] ，结果很多省一片凋敝，很多百姓遭到杀戮。

同日本人一样，蒋介石也不欢迎共产党再次展开攻势，并在不久后开始了行动。他特别不喜欢位于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命令他们转到江北，而新四军在转移的过程中，国民党在1941年1月对新四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这让人们想起了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政变。自此以后统一战线，仅是一个门面而已，下面则是相互敌视。

在华盛顿，积极鼓动中国空军计划的是其发起者陈纳德上校，跟他一道的是受命设法在美国满足中国需要的特使宋子文。陈纳德无论从意愿还是从性情来说都是个真正的战斗机驾驶员，是空中追击的狂热追随

者，曾经详尽细致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加之其想象力和勇敢，他对新飞行技巧、机动性以及效力方面均卓有贡献。1940年他已经50岁。他早先是得克萨斯的一名中学老师，1917年在美国参战后开始接受军官训练，先是隶属步兵预备队，但后转到通信军航空部，在战争期间未在海外服役过。1920年加入陆军航空兵后，他试验了自己设计的战术，并在飞行学校和空军战术学校以及题为“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的课本中教授了这种方法。他借助其有关追击航空的价值和重要性以及战斗机护航必要性的教条在空军里虚张声势。因为空军采用了相反的杜赫（Douhet）理论，该理论认为连续波次的轰炸机轰炸对追袭本身就有自卫作用，所以陈纳德并不受欢迎。他由于耳聋不能再飞行，加之他跟所有那些有很强使命感的人一样，一旦自己的意见未受重视，便觉得是在受迫害，因此他在1936年便退休了。他那些曾经在中国飞行过的学生推荐了他，结果次年蒋介石就把他争取过去了。

陈纳德跟史迪威一样结实、瘦削和饱经风霜，他们身材也相似，由于在开放式机舱里受到气流的冲击，陈纳德的脸上布满疤痕。他是个既有高超专业技巧又有些自大的人。他喜欢走极端。1937年他跟蒋介石夫人的“相见是永生难忘的经历”。当她“洋溢着活力和热情轻快地步入房间的时候”，他“完全为之倾倒了”。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他还是15岁的孩子的时候，他的后妈曾经让他有类似的倾倒感觉，并在其后再未找到“另一位让我如此仰慕、敬佩和热爱的伙伴”。他的兴趣并不是针对中国的，而是针对空军的。他在中国走动的时候，无论是去汉口、重庆还是昆明，都是乘飞机，因此对地面情况知之甚少——例如河流、独轮车小道、有围墙的村庄、到处是坟墓的乡村以及“老百姓”的生活。他跟蒋介石的随从们打交道，由于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妨碍，他对这个政权背叛其初衷并堕落成暴政并没有感到有所不安——即便他对此是有所意识的。



《送郎上战场》



《妇女纺织小组》

尽管陈纳德以及在兰州的苏联人做出了很多努力，他在1937年之后的短暂时间里还是未能成功培训出一批中国飞行员，使他们在数量上或者效能上足以达到跟敌人争夺制空权的地步，就像英国皇家空军在英国所做的那样。他最大的贡献便是在占领区设立观察员，通过电台组建了防空预警系统；这个系统非常有效，以至于日军飞机还在基地准备的时候，中国的指挥部便接到了空袭警报。这对城市来说是一种保护，但是

并没有对敌人进行反击。由于中国没有准备从地面上发动进攻（史迪威老是抱怨说中国人“天生”不愿意进攻），陈纳德提议组建的由美国人担任飞行员的中国空军无疑是一种极好的替代。空军就像是贤者之石，仿佛阿拉丁的神灯那样能够让愿望成真。正如陈纳德所设想的，这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种捷径，可以让蒋毫不费力便得到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可以积聚自己手中的战争物资，并让别人有了一把可以打击日本的利剑。跟阿拉丁一样，陈纳德在此过程中也成了一名受欢迎的协作者。





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海报

宋子文向华盛顿提交的所需东西的清单上包括美国地勤人员、训练机、零件、野战设备，各类信贷安排，购买各类军火以及飞机，还有互派军事使团。中国提出的财政援助现在扩大成了要求2亿至3亿美元的英美联合贷款。除了击毁日本海军的B-17重型轰炸机之外，陈纳德的计划还以蒋介石的名义要求提供相应比例的中型轰炸机和战斗机，以造就一支空军力量，这支空军也能够“支持我准备发动的旨在重新夺取广州和汉口的反攻”。陈纳德的计划不切实际，这是一开始就暴露出来的。

此时主要负责向美国盟友提供资金和武器的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对宋子文说，要500架飞机“就像要500颗星星”。美国手头有的飞机连它自己的最低需要都无从满足。根据9月份陆军部的调查说，各类物资都极其匮乏，以至于陆军只能在战场上调动并维持一支5.5万人的部队，而达到这样一点的代价是，别的部队将无法得到训练设备。按照目前的生产速度，在1942年4月前没有希望既装备本国扩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又同时满足英国的需要。即使这个日期分界线也必须在不断增加生产和延长工作时间后才能达到。

然而所有的人——包括总统、摩根索、史汀生、赫尔以及武装部队联席会议——都倾向于向中国提供飞机。这主要不是为中国着想，而是让美国赢得时间进行武装。美国政策的主导目标是不让日本往南部扩张而挑起争端，至少坚持到1942年4月。陈纳德借用所谓的中国空军，利用美国飞行员和物资来完成进攻的计划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据信，在日本的海上运输线上出现空军，会遏制日本向南部发起致命进攻。

这种战略目标是第一位的，但同时也有一点出于自然流露的同情和良心而帮助中国的愿望。斯坦利·霍恩贝克写道，在白宫、国务院、财政部、陆军、海军及其他机构中有一批中国的同情者，他们为了敦促美国对华援助“提出议案，催促，施加影响，拍桌子，进行不懈努力并不断骂娘”。陆军部长史汀生在后来一个场合中说：“我很想竭尽全力向这些在四年时间中一直奋力战斗的可怜人们提供一切东西。”罗斯福的看法则比较不动感情。当时正在进行谈判，此时罗斯福收到了蒋介石的信，信中提出要求得到飞机。“他还愿意战斗吗？”罗斯福这样问道。在得知信的主要意思就是这个的时候，罗斯福叫了起来：“太好了！这正是四年里我一直在说的事情。”有关中国崩溃的威胁也让他印象深刻。他曾经对萨姆纳·威尔斯说：“我真的担心，除非我们赶快行动，否则自由中国的国内局势将日益恶化。”



陈纳德

但是，比战略或者同情都更加诱人的，是美军驾驶B-17轰炸机对日本真正进行轰炸的前景。委员长建议发起空袭，其理论是，一旦遭受空袭，日本人民就会“要求结束侵略”。尽管蒋介石自己对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不大可能相信，他可能觉得这种说法会对美国人有吸引力，而且的确如此。这为美国本能地施加报复提供了一种借口，而内阁成员都感染了这种报复情绪。在日本击沉美国的“帕奈”号军舰后，由于美国不得不对各种挑衅忍气吞声，愤懑的情绪正在增加。中国自己的国家遭受蹂躏、其城市遭受肆意轰炸，而中国却无力报复，这使得美国甚至也无法品尝到由于中国的抵抗而替它报一箭之仇的快感。出人意料的是，在有关轰炸的计划方面，赫尔国务卿被证明是个“热血沸腾、充满活力”的人。他那田纳西山地人的血性被激发了。他对摩根索说：“亨利，我们要做的是立即让500架飞机从阿留申群岛起飞并在日本上空飞一遍……这会教训他们一顿……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让他们给东京扔些炸弹。”对此摩根索只能无言以对。这位财政部长也非常赞同这种想法，认为“这会立刻改变远东的整个局势”。宋子文说服他接受了委员长的论点，即认为这“会对日本民众造成决定性影响”。

宋子文自己对此也热情很高，而当摩根索问他这是否会招致日本对中国进行报复性轰炸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们本来就已经在轰炸……这会给我们以反击的机会。”甚至英国大使洛西恩（Philip Kerr Lothian）勋爵对此也抱有热情。当摩根索告诉他说，美国准备向中国提供一批四引擎轰炸机和机组人员，“旨在用这些轰炸机去轰炸东京和其他大城市”，洛西恩对此表示同意，并说“这会改变一切”。

接着立即开始讨论方式方法问题，但是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慎重态度成为障碍，他认为这种想法“未经推敲”，代表的更多是中国的而非美国的战略。当这些要求转给马歇尔将军的时候，马歇尔认为这个包括重型轰炸机的500架飞机的计划“不切实际”，因为飞机和训练人员都无法得到。他们现在能够为中国搜罗的就是100架P-40战斗机，这属于原本分配给英国的飞机，英国人为了阻止对新加坡发起进攻而暂时没有启用这些飞机。由于这些情况，加上总统和军方领导人的支持，陈纳德计划的核心部分得到了批准。

宋子文和一些从美国政府那里借调的协作人员组建了中国国防物资公司，以进行为雇用这支空军所需的各类购买和融资活动。由于美国总统认为这是在帮助一个处于困境之中的民主国家，因此这个团队得到了各种帮助和照顾。总统的两个最亲密的助手之一的汤姆·考考兰（Tom Corcoran）被解职后开始私自开业从事法律业务，他立即受到宋子文雇用，成了中国国防物资公司顾问和与白宫的联系人。根据总统的建议，负责购买集团的是另一位政府律师威廉·扬曼（William Youngman）——艾森豪威尔刚刚被从联邦电力委员会解职。为了鼓励从陆军和海军的空军中招募100名飞行员，给飞行员的月薪达750美元，而且每击落一架日本飞机还奖励500美元。1941年4月的总统行政令（Executive Order）同意让飞行员解除现役到中国参加雇佣军。尽管有官方支持，但由于各种困难、拖延和缺乏，此事进展甚慢。直到1941年11月，美国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才抵达缅甸开始接受陈纳德的严格训练，此时对遏制日军来说为时已晚，尽管就与日军战斗来说还不晚。

真正打开向中国援助闸门的是1941年3月通过的《租借法案》。从那以后，这种源源不断的援助成了一种投资。为了保护这种投资，只能继续增加援助，结果这成了一种用银子做成的绳索，把美国和国民政府牢牢栓在了一起。没有什么比向穷朋友提供援助更纠缠不清的联盟了。

为了弥补由此给英国租借物资所带来的损失，罗斯福请求国会对“总统认为其防御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政府”都租借给军火和物资。因为这个计划可以通过给其他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供应而让它们去作战，而美国则仍然保持成为非交战国，所以就有望让战火远离美国海岸，因此这个计划对孤立主义者很有吸引力。该计划首先拟提供价值7亿美元的战争物资，并在众议院以317：71的高票通过。美国立即宣布中国有资格接受租借物资。在此之后《租借法案》变成了中美关系的核心和基

础，在中国人看来该法案也成了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方面。他们现在无须请求了，美国现在有义务给他们提供需要的物资。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各种需求接踵而来，只要是部队能用的东西应有尽有——步枪、榴弹炮、迫击炮、机关枪，野战炮、反坦克炮、坦克、弹药、车辆以及为了支付这些东西的贷款。这个问题跟史迪威在冯玉祥那里遇到的问题相似：所需武器的数量和种类都不符合现实需求。他们列出的清单中包括了对中国的桥梁来说太重的13吨坦克以及其他无法使用的武器。

《租借法案》借助中国国防物资公司所促成的生意，要比大多数军事采购计划都有利可图。跟这个公司有关的美国人都发了财，同时这也增加了宋子文的财富。宋子文之前在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国银行总裁的时候就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家产。宋子文时而受到蒋介石的恩宠，时而坐冷板凳，跟他竞争的是他的姐夫孔祥熙。孔祥熙由于受到孔夫人和蒋夫人两姐妹的联手支持现在担任财政部长。尽管宋子文暂时失宠，但是他从来都是有影响的人物。由于宋子文的生意和政治头脑并不比其爱国热情逊色，他为中国国防物资公司搜罗了一批既能干又有关系的人——特别是跟哈里·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和主管援华租借物资的劳其林·居里（Lauchlin Currie）的关系。

美国有点不切实际的目标是“中国军事上的自给自足”。这个目标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如果给中国部队武器、装备并在美国顾问指导下进行改编和训练的话，那么这支部队就可以转而发起进攻并牵制日军，从而使日本无法在其他地方进行冒险。宋子文提交了一个武装30个中国师（中国师的总数约为300个）并提供全副武器的计划。在给这些师提供了大炮和其他武器，并通过美国军官就武器的使用进行培训之后，这30个师将成为特别进攻师——当然这是在委员长和全国军事委员会已经就指定哪些师一事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由于师或者师以上单位属于一个指挥官的私人资本，而且中国政治的全部结构就取决于那些能够处置军事力量的人的关系以及委员长在他们中间可能维持的微妙的平衡，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是极为棘手的问题。为了完成30个师和美国志愿队计划、组织和监督整个《租借法案》的执行情况，美国特意任命了一个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AMMISCA，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为首的是约翰·马格鲁德将军，史迪威担任驻华武官时，马格鲁德既是他的前任又是他的继任者。这个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由一些从前的语言教官担任，它在战时还在战略计划和合作方面起到了联络的作用，并总体上鼓舞了中国政府的士气。

这个计划并非慈善性的，而是为了增加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以使日本无法脱身。尽管其后的情况和条件变化很大，但这仍然是美国援助的目标，而且原先的缺陷也依旧存在：那就是美国的目标并非中国的目标。中国的主要兴趣并不是让日本在中国继续侵略并烧杀恐吓，以使日本无法骚扰美国。国民政府要美国的钱和军火，主要是为了加强它自己的实力。跟只有一个外部敌人的英国不同的是，重庆在背后还有个内部敌人正在逼近。纯粹的占有欲也是一个因素。只要占有了武器，即便是不使用这些武器，仍然可以增加权力的安全感。

1941年10月，当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军官开始工作的时候，这一点立即变得非常明显了。这个使团的炮兵专家乔治·斯莱尼（George Sliny）上校在视察后证实了史迪威在任武官时报告的说法，即对侵略行动进行积极抵抗的意志“在中国军队中并不存在”。他们要求得到战争物资，并非“为了增强对日作战，而是为了让中央政府”在其他国家迫使日本撤出中国后“能够从容地对付叛乱”。他发现，“美国人普遍认为的‘中国的抵抗使日本侵略陷入停顿并取得了辉煌胜利’是一种幻想”。

美国政策——这本质上是增强中国对日本的战斗力——的中心思想便是基于这种幻想，尽管不乏对此发出的警告。佛蒙特州奥斯丁参议院敦促美国大力向中国输送军火，认为这是击败轴心国的捷径。驻重庆的海军武官R·E·舍尔曼（R. E. Schuirmann）上尉读到他这样的说法后禁不住写道，最近一些名人发表的很多诸如此类的言论显示，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具有成为击败日本的积极军事因素的潜力。舍尔曼警告说：“如果那些掌控最高战略的人真的持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这是有致命缺陷的。”

在中国的朋友们和宣传分子的鼓动下，这种幻想一旦得以确立，便难以消除。报刊喜欢发表那些它们认为受到公众喜欢的有关中国的东西，因此它们助长了这种幻觉。有个自由撰稿的记者想证明关闭河内通向中国的铁路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有多大，但是她总是白费力气。每当她写报道指出，尽管铸成滇缅公路的人力上的努力非常辉煌，然而失去河内铁路却是致命的；然而她的稿件在经过编辑之手后，总是变成一首对滇缅公路的赞歌。

一个拥有一支出租车队的交通专家丹尼尔·阿恩斯坦（Daniel Arnstein）动摇了某些幻想。总统的全权代理人哈里·霍普金斯派阿恩斯坦去调查为什么“他妈的一丁点儿东西都没有通过滇缅公路运过去”。根据《租借法案》运送的物资堆积在仰光港口和腊戍这个跟滇缅公路相连的铁路线终点。根据目前的运输速度，要运完堆积的物资需要8个月。

阿恩斯坦发现腐败、低效和无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认为，除非管理的责任从政府之手转到某个称职并有“权力”改变这种情况的人之手，否则这种情况是无从改进的。

这条从昆明到腊戌的长715英里（约1150千米　）宽9英尺（约2.7米）的单行道公路的状况“令人吃惊”。在中国端公路的起点，昆明卡车司机必须经过8个海关，有时在这里需要花上一天才能获准前行。沿途还有其他十几个检查站，各省官员收费后才会放行车辆。在中缅边境的畹町，有250辆卡车为了通过海关要等上24小时到两周的时间。显然，由于不知道加润滑油或者这方面费用过于昂贵，有几百辆车子熄火停在路上。黑市上经常有偷来的备用零件。参与公路事务的有15个官方机构、运输公司以及控制委员会，它们代表着——并将好处上缴给——不同的政府部门。滇缅公路每月应该能运送3万吨物资，但实际上每月只能运送6000吨。

阿恩斯坦在报告中建议采取一种切实有效的办法，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将某一时刻正在通行的车辆数增加到8000辆。他把报告的中文本提交委员长并加了索引。委员长对此很高兴，并邀请阿恩斯坦和他的两个助手特许经营这条公路，并按每辆车缴百分之几的特许费用。阿恩斯坦拒绝了，结果这个权力被重新分配给更多的委员会和控制委员会。尽管上层改变很少，但是《租借法案》派遣的由46名民间机械师组成的美国技术队（American Technical Group）还是疏通了交通：他们沿途设立汽车联营队和维修部，并教中国人怎么加润滑油。

由于德国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整个世界以及这场战争都骤然失去了平衡。这跟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个反常事件一样令人震惊。事态出现这种新的逆转改变了整个局面。德国自愿陷入两线作战，而上次战争时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战败，这同时使得苏联跟民主国家站在了同一阵营。当时还没人意识到这种局面在战略上的优势。与此相反，正如马歇尔、史汀生以及陆军部的智囊团都一致认为的，自负的德国军队会“在最少一个月，最多三个月的时间里”击败苏联。其他地方的前景也同样黯淡。德国已经粉碎了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抵抗，德国的“狼群”潜艇正在袭击大西洋上的英国船只，而隆美尔正在北非发起反攻。这种趋势激励日本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即转向南部，目标是南印度支那。7月24日，在与法国维希政权签订的城下之盟的合法外衣掩护下，日本获准使用位于金兰湾（Camranh）和西贡的八个机场和一个海军基地；这使它可以直接打击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菲律宾。这个协

议还规定日军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地方；美国通过破获日本密码得知，日军试图从这里入侵暹罗。

目前所剩下的最后一种遏制方法——石油禁运——开始了。史汀生认为这种禁运会遏制而不会激怒日本，其理由是尽管日本非常邪恶，但还不至于违反常理而采取跟美国开战这种自杀之举。7月26日，美国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财产，这实质上相当于石油禁运，理由是日本进入印度支那显然表明日本有意“执行武力占领的政策”，而且这是日本“攫取更多领土”的前兆。

与此同时，美国在战略方面又面临一种新机会。过去五年来一直在菲律宾服役的麦克阿瑟将军在7月提议，派遣足够的兵力驻守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无法守住的菲律宾。促成这种改变的是B-17轰炸机。从菲律宾的一个基地起飞的“飞行堡垒”可以进攻日本海军。为了装备这个基地并制造和调遣足够的大型轰炸机过来，现在必须尽力拖延冲突时间，直到最后一刻。陆军和海军坚持拖延。为了寻求基本解决方式，国务卿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Kichisaburo Nomura）之间的一系列会谈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用赫尔的话说，继续谈判主要作为“最后的外交努力”，而不是真的有解决的希望。跟过去一样，主要的障碍就是中国。日本不接受任何不承认它对中国进行殖民控制的解决方式，而美国则不接受任何承认日本对中国殖民控制的解决方式。其实，日美之间已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了。

随着10月的到来，为期一年的预备役训练就要结束。陆军花了一年时间对这些士兵和预备役军官进行训练，但现在陆军可能失去这些人。用每年刚刚接受训练的新兵来造就一支可以随时准备战斗的部队，这是不可能的。尽管总统非常不愿意试探国会的反应，但是马歇尔和史汀生都坚持要延长兵役期限。国会山再次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马歇尔顶住“军国主义”和“战争贩子”的谴责，通过小心慎重但毫不留情地施加压力，终于使议案以203：202一票之多勉强在众议院通过。这样一个极其微弱的胜利表明，对战争是有关美国事务这种想法的反对有多么强烈。

在国会仍在辩论的时候，陆军在1941年夏天举行了全国范围的演习，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四个集团军先后都参加了演习，士兵共计50万。首先参加演习的是西海岸的第四集团军，其中包括史迪威的第七师，现在已经是“加利福尼亚专属”部队了。跟往常一样，他是作为敌人的红方军队的。在第三军其他部队的支持下，第七师从洛杉矶一个基地向北进攻代表“蓝”军、正保卫旧金山的属于第九军的两个师。“加利福尼

亚之战”打了五个星期，从5月底一直贯穿整个6月，在蒙特雷以南120英里（约193千米 ）的赫尔斯特牧场（Hearst Ranch）地区的亨特·莱格特（Hunter Liggett）军事保留地举行。

史迪威通过一个装甲营爬越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山谷发动了闪电战，有50%的把握可能突破并攻占蓝军指挥部，从而打开通往旧金山的道路。他通过在夜间发起进攻达成了突然性，但是兵力上以2：1占据优势的“蓝”军同时对“红”军的两个侧翼发起进攻，并击退了史迪威的进攻。然而，随着演习的进行，史迪威的名望已经确立下来了。他视察了整个前线，以亲自保证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责，能够坚守每一个炮位。他每天晚上只在地上睡三个小时，并且跑得比自己的下属还勤，结果有一位下属说：“我的天哪！这个老头子就像羊群似的无处不在！”在这种战斗精神的激励下，第七师有的士兵扔掉了没有装子弹的步枪，开始赤手空拳地进行搏斗。最后有个连队（即第32步兵团）为了首先到达营地，竟然还有精力步行走完了计划中没有安排的17英里（约27千米 ）路，而史迪威则跟他们一同走完了最后的8英里（约12.8千米 ）。

“蓝”军在6月30日达成停火后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由于“红”军第七师的出色表现，史迪威晋升为第三军军长。这次晋升是马歇尔主导的大调整的一部分，涉及了20位将军，意图是增强高级指挥官的活力，并用年轻一些的将军代替年老的将军。现在即将卸任的第三军军长华尔特·威尔逊（Walter K. Wilson）少将认为，史迪威在美国陆军的47名少将中名列第一。

史迪威对这种赞誉并不满足。他在评论这次演习的时候说：“我们军官那种平和自信的神态让我印象深刻。没有人去操心，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大摇大摆地坐在那里。”他还解释说，这种平和自信“或者是出于无知，或者是由于经历得多了，至于这次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这要由你们来判断”。他命令部队回到野外继续进行四天的演练，以矫正缺陷。8月份在华盛顿的路易斯堡（Fort Lewis）时，他再次率领第三军跟第九军进行对抗演习，旨在测试处置大部队的能力以及高级指挥官解决裁判提出的战术问题时的效能。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都前来观战，而史迪威正是此时见到了史汀生，不过史迪威没有留下对这次会面评论的书面记录。

此时政府只能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这个国家将无法回避战争。以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上将为首的联席委员会在9月给出了正式的意见，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现在的盟国无法击败德国，同时，如果

没有美国积极的军事援助，那么英国和荷兰“很可能不能成功抵抗”日本对马来亚或者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进攻。因此美国“同时面临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必须要组织生产以应对这个问题。委员会重申了先击败德国，同时对日保持强大的防御态势的战略决定。这种防御的要素便是为“中国向日本占领军发动的进攻”提供物质援助。

英国参与了战略的制定，但是中国则没有参与。由于中国泄露情报是出了名的，因此没有让中国参加军事讨论。此外还让蒋介石很恼火的是，也没有邀请中国参加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的由高层参加的大西洋会议。蒋介石在等待了这些外国大国很久后发现，那些交战国——英国，荷兰或者苏联——都没有把他视作盟友，同时也没有邀请他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ABDA（美英荷澳）参谋会议，此外，通过事态的发展他也感觉到，他在美国的战略中也并不占据第一位。为了更好地接近华盛顿，他在《租借法案》刚刚施行的时候就邀请美国派遣有“悠久历史”的政治“顾问”来。罗斯福至少在这方面想尽力让中国满意，因此派遣了最适合担当此任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此人自1920年起就活跃在中国，做过商人、记者、游客和学者，并出版过一些有关蒙古、“满洲”和中国边远省份的著作。雅奈尔上将形容他为“美国在有关中国和满洲问题上的最高权威”，不过这种描述在援助国看来如此，在受援国看来则未必：当中国人要求派遣“顾问”的时候，他们要的是有关美国的顾问，而不是有关中国的。拉铁摩尔在召开大西洋会议期间报告说，中国人在政治上感到孤立，日益担心战后他们不会得到“平等地位和公平对待”。他敦促建立正式联盟对他们表示鼓励，但是不管是他还是别人都无法解决一个根本性的困难：必须要有同等的分量才能取得平等的地位。

拉铁摩尔的这份报告对理解中国的怨恨很有启示意义。中国人注意到，英国和美国在各个方向上都对日本发出了警告——例如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暹罗，甚至还有西伯利亚——但是这并没有包括受到威胁的云南；只要日军对昆明发起进攻，就可能封闭滇缅公路。中方开始感到越来越大的疑虑，怀疑西方国家为了赢得时间可能暗中唆使日本“对我们小打一番，反正我们的承受能力很强”。中方认为，美国之所以竭力改善滇缅公路的交通情况，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本身，而是为了让中国能够继续抗击日本，这样美国和英国就不必对日作战了。“中国人觉得他们已经为了我们打了四年仗了，现在是我们参战并为他们打仗的时候了。”中方憎恶所有各方的公约和承诺——除非是跟他们有关的，并从这些公约和承诺得出结论认为，欧美采取了“欧洲第一”的

战略，而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好兆头。这表明民主国家相信仅在欧洲就能赢得战争，这将使中国在和平谈判时无法占据一席之地，而且本质上是要恢复大英帝国的领土，“已使它能够扩张并重建起边疆地区”。中国人想首先在亚洲赢得战争。这样的话，在盟国还在赢取欧洲战争的时候，他们就有时间增强自己在和平谈判时的地位。

这还是1919年所面临的老问题，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世纪一直面临的问题：在西方主导的时代中华帝国软弱无力。这还有一种痛心的意识，那就是他们文化上的优越感并没有增加他们的力量，以及中国无法调动力量在世界上占据他们应当占据的地位。

拉铁摩尔报告说，如果中国人更有自信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自己赢得他们想在东方赢得的战争。他们不应该老是说他们没有飞机大炮”，还应当开始使用不太常规的方式，集中力量发动游击战。“可是他们没有这种信心。”他们的军政高层不信任人民，不敢放松他们对权力的垄断。他们正在加强其政治机器，这样，一旦占领区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了，他们就可以马上对占领区实施控制。不过他预计说，如果“在东方的胜利主要是大国——而不是中国——赢得的”，那么最终中国将居于不利地位。



大西洋会议，1941年

蒋介石并不这样看。为了让别人听他的，他声音非常尖利地喊叫说，日本正准备进攻昆明，并坚持说昆明对太平洋战事至关重要，但是没有空军将无法守住昆明。此时，美国志愿队的100名飞行员和P-40战斗机刚刚抵达缅甸的一个英国训练基地，根本没有做好战斗准备。蒋介石急切要求英国空军从新加坡赶去支援，并要求美国从菲律宾增派飞机。马格鲁德将军对蒋介石的论点和请求表示同意。在11月2日给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信中蒋介石再次叫道，如果昆明失守，那么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将被断绝，中国军队和人民的士气将“彻底动摇”，而且“在这场漫长的战争可能第一次真正出现抵抗崩溃的危险”。

由于担心在华盛顿举行的赫尔国务卿和日本野村大使的会谈，蒋介石有意夸大了对局势严重性的估计，以便让人产生这样的担心，那就是中国崩溃将使整个亚洲都屈服于日本。他警告说，美国对日本的任何妥协或者放松禁运都会让中国人民觉得他们被美国“彻底出卖”了，结果全体人民将彻底丧失斗志，同时“所有亚洲国家都会失去信心，他们对民主国家的信心也会受到极大动摇，这将揭开世界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因此中国抵抗的崩溃将是“世界无与伦比的大灾难，而我无法知道未来的历史将如何书写这段历史”。

尽管华盛顿从来不知道是不是该认真对待蒋介石的各种喊叫，但是这种前景还是让总统极为担心。接替约翰逊任驻华大使的高思认为，“不应当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无限期地坚持对日本进行抵抗”。

在日本政府焦头烂额的委员会里，11月便是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刻。跟华盛顿的谈判不可能就解决中国问题取得进展，甚至也不可能达成妥协。如果没有新的资源，日本的石油库存无法支撑两年以上。德国在它所在的半球上，在确定其领袖地位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如果日本现在不采取行动控制亚洲，就会被未来的潮流抛弃。如果将战事拖到春天，那么美国就会更好地进行战备。11月5日，日本的枢密院（Privy Council）举行了5个小时的御前会议，决定在华盛顿的谈判将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军方将准备就绪。如果谈判在月底仍然没有结果，日本军方就准备采取行动。

尽管有提议和各种持相反意见的提议，尽管美国和一些日本人仍然试图避免那不可避免的结果，尽管各种警告纷至沓来，“魔法”密码得到了破译，日本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也已明了，但是11月还是一天天地指向了历史上预兆最为明显的那次对美国的奇袭。

---

[1]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参赞威利斯·佩克1936年曾经写道：“（我们有时感觉到）我们提交华盛顿的报告仿佛落入无底洞中。”驻云南领事A·R·林沃尔特也有过类似不满：“特别是在我现在这样的边远岗位上，我们觉得写报告只是出于个人喜好，报告被收到后就被存档，谁也不会再留意报告的内容了。”

[2] 这种方法是包围一个特定地区并摧毁该地区的所有东西，从而使这个地区无法居住。根据日本的记录，在河北一个地区进行的为期两个月的“扫荡”中共有4500人被杀，1.5万间房屋被烧，1.7万人被赶到满洲。

第十章

“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1941年12月—1942年2月

在一个对12月说来有些偏热的阳光明媚的周日上午，史迪威夫妇正在卡梅尔家中招待奥德堡的新任下级军官。通往花园的门敞开着，透过楼上起居室的窗户，波光粼粼的太平洋翻滚着，波浪重重地拍打着岸边。客人们都穿着便服，因为在离岗时不允许穿军装，屋子里到处都是散乱放着的星期日连环漫画。电话铃响了。史迪威夫人接电话时听到一位朋友激动地喊道：“温妮，打开收音机！珍珠港遭到了袭击！”之后她忙着到处找收音机，终于找到了一个，收音机插好电源后大家都围在四周听，他们都惊呆了。他们如梦方醒：就在那里，在窗户那边碧波荡漾的大洋上，战争已经开始了。

当时估计日军会在东南亚发起进攻。没有人想到日本人会如此大胆，跨越3300英里（约5310千米 ）的太平洋对美军舰队发起突袭。攻击的大胆和成功让人畏惧，更让人惊讶。一直被低估的日军突然被赋予令人生畏的能力，并可能随时扑向美国。恐慌开始的几个小时后奥德堡就接到各种谣传的电话，有的说日军舰队已经到达距离蒙特雷10英里（约16千米 ）的地方，有的说旧金山可能受到空袭，有的说在克力夫豪斯（Cliff House）看到了一个潜望镜，又说在洛波斯角（Point Lobos）也看到了一个。

史迪威在约翰·德·维特（John L. De Witt）少将统辖下指挥第四集团军，负责西部防御区的南部，包括直到墨西哥边境的加利福尼亚海岸线。这里是预计敌人会发起进攻的地方。由于珍珠港海军所遭受的损失，这里的防守只能依靠尚未准备就绪的陆军。这个地区有500万人，此外还包括整个国家80%的航空工业，这均在海军舰船炮火射程以内。史迪威相信加利福尼亚不是日本所可以企及的区域，但是由于责任重大，结果至少每天一次他陷入一种“沉重的感觉”。他四周到处都是惊恐和混乱，旧金山的第四军司令部周期性地在电报中透出“惊惶”，这使史迪威感到了自己部队的不足，尤其是在军火方面。



日本偷袭珍珠港

他坐在南部圣波纳迪诺司令部的桌旁，一面几乎把烟嘴咬成两截，一面告诉陆军部说，他的轻武器弹药可以供几个小时战斗之用，但是几乎没有炮弹。当华盛顿那边的军官答应“我们尽力而为”的时候，史迪威咆哮起来：“你尽力！上帝啊，我他妈的怎么办？用橘子打他们？”日军在进攻珍珠港的同一天还进攻了关岛、威克岛、香港、菲律宾和马来亚，并在次日进攻了中途岛。这个消息让加利福尼亚更加恐慌。飞机厂、电台、铁路桥、隧道、大坝、电厂、输水道、水库、油井、医院、造船码头以及港口防御部门都急切要求提供防卫——这些地方都认为自己至关重要。由于太多的单位要求前去进行保卫工作，结果训练只能中止。

史迪威整日在海岸线上奔波巡视，跟市长、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商谈，调查各种谣传，保卫机场，组织警报程序，回答质询，为东部派来的额外部队安排食宿，尽力落实更多的弹药。与此同时，各种恐慌和谣言仍然继续。据报告，12月9日在大概是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的地方发现一支由34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舰队。在经过焦急的几个小时后，史迪威写道：“不实（更加低落）。”所谓敌舰后来证实是蒙特雷的14条快速回岸躲避的渔船。12月10日传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11月派遣到远东防止对新加坡袭击的英国最新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号和战斗驱逐舰“却敌”（Repulse）号，在靠近马来亚海岸的地

方，被日军空袭击沉，从而使英国失去了在这些水域的制海权。（“我的上帝，越来越糟了。”）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根据轴心国盟约所规定的义务，同时也是在日本要求下，对美国宣战。又经历了一场恐慌，这次是来自第四集团军司令部本身，它报告说：“在距离旧金山164海里（约303千米 ）处发现日本主力舰队。所有单位进入警戒状态。”经过了让人焦虑的几个小时后，这个消息也被确认为不实。（“上帝啊！他们会要了我的命的。”）

12月13日，西部防御指挥部报告说对洛杉矶的空袭在即，并准备对全体市民发出警告。史迪威的结论是，“全体警报”所导致的伤亡和恐慌将会跟空袭一样严重，因此准备不相信这份报告。“弹药好一点了……第一二五师计划在24小时内到达……两个营已经做好准备，还有两个在距离海岸175英里（约281千米 ）的地方担当预备队。（还是很低落。）从奥德堡开来6辆坦克（其他的无法开动）……从某处正在派来一个师——十天。派出一架空中侦察机……防空炮来了……登陆被击退……12月14日，开战一周了。威克岛和中途岛守住了……菲律宾师在林加延（Lingayen）把他们击退了……干得不错。实际上大多数受到蔑视的民族（中国人、苏联人、希腊人、菲律宾人）都在为文明做着大好事。”

神经绷得紧紧的，有的人崩溃了。“R想辞职——只是无法忍受罢了。”一个驻守加利福尼亚南部沙漠地带的空军轰炸中队指挥官，担心日军会从航空母舰或者南加利福尼亚的秘密基地上发起伞兵空降突袭，并会把他们全部杀害。到处盛传各种破坏、带发报机的间谍、潜水艇以及秘密机场等耸人听闻的传言，这些都要进行调查。史迪威被告诫要在卫兵的不间断护卫下活动，防止日本特务加害于他。

突然他从这种慌乱中摆脱出去了。12月22日早上6点30分，他被第四集团军的一个电话惊醒——他受命立即奔赴华盛顿“制订有关某远征军的作战计划，（打电话者）暗示由我担任这支部队的指挥”。史迪威被告知要离开一段时间。他的参谋都很兴奋。“他们认为肯定有大动作。”他匆匆处理完工作后回家告别，并跟家人提前过了圣诞节。“谈了很多很多。精神上都很镇定，谢天谢地。”他和多恩第二天上午乘机离开，并在次日即12月24日下午到达华盛顿，他们到达两天后，丘吉尔和他的总参谋人员也来参加一系列所谓的阿卡迪亚会议（ARCADIA Conference）。

史迪威径直去作战计划处，在那里他得到一个有关他的新任命的惊人消息：他被选中指挥美军的第一场战争，这就是“布莱克计划”（Plan

Black），即在法属西非登陆的计划。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是该处副处长、他在利文沃思时的同学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刚刚得到第一颗星（少将）。有一阵子史迪威觉得这时候自己应该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感觉，但是“不知怎么，这并没有让我感到跟过去有什么不同”。是马歇尔选择他来担任这第一号战斗任务的，正如马歇尔后来说的，马歇尔对演习时史迪威对第七师的训练和处置印象很深，认为他是个卓越的战术家，有想象力，机敏，自信，深谙军事史并长于练兵。马歇尔命令由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对各将官所进行的评议证实了马歇尔的看法。在对九位陆军军级指挥官依品行排列时，史迪威名列前茅。

史迪威在陆军军事学院得知，他的目的地将是达喀尔，这是个很早以来就在美军计划中被注意到的地方，被认为是德国穿过窄窄的南大西洋向南美发起进攻的起点。第二天，得知此事还远没有定下来。“谁也不知道我去哪里。今天上午是达喀尔，下午又到了卡萨布兰卡。”阿卡迪亚会议首先做出的决定是确认欧洲第一的战略，计划在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的卡萨布兰卡登陆就是为了占据一个基地，以避免敌人控制地中海并最终夺取在欧洲战区的主动权。卡萨布兰卡战役的代号是“运动员”（GYMNAST）。史迪威发现“整个事态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此后三周阿卡迪亚参谋会议期间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通过在白宫举行的8次有关主要政策的会议以及新近成立的（英国和美国）联合参谋长会议，与会者竭力想在战争目标、指挥组织、作战方案尤其是作战方式等方面达成一致。面对众多赞成和反对意见，“运动员”计划就像浮在水面上的轻木塞子，漂浮不定。

半年前当战争降临莫斯科的时候，据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位观察家说，“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现在华盛顿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史迪威在他第三军主要参谋人员配合下开始拟订作战计划，但是其目标是每个小时都要变的。是卡萨布兰卡还是达喀尔？是冰岛还是加那利群岛？要多少军力？前景如何？支援情况怎样？有什么样的军火？预计敌人会怎样行动？所有这些都不确定，都有争议。提出了备选方案，但是又最终放弃。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自己周围到处是“从转门里冲进冲出的办事员，拿着文件的人追赶另外一些拿着文件的人，一群人聚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你正想说话时其他人都一起向你发难，蜂鸣器嗡嗡作响，电话铃声大作，屋子里人满为患，办事员拼命敲打字机。‘立即给我把这个打出十份。’把秘密文件从保险柜中取出来。’‘见鬼，黄色计划（蓝色计划、绿色计划、橙色计划等）哪里去了？’每个人都狠命吸烟，每个人都让你去找别人去。真该有位大嗓门、凶巴巴并拿着大棍的人出来喊

叫：‘停下来！你们这些疯狂的杂种。安静！你们这些只会模仿的蚂蚁。你们中的一半人要在天黑前离开这个城市，另外一半人坐下，半个小时内不许动。’接着他们就可以把文件都烧掉，又重新开始了”。

史迪威一边就“运动员”计划纠缠不休，一边为远东的局势着急，不知道海军是否还能再投入战斗。他此时已经了解到珍珠港那场灾难的损失情况——美国主力舰有8艘或者一半被炸沉或者无法战斗，177架飞机被毁，伤亡人数为4000，其中死亡人数超过一半。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也同样遭受重创。就在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出几小时后，麦克阿瑟将军的35架重型轰炸机中的一半和战斗机的1/3在地面上遭袭并被摧毁。西方参与对日作战——中国期待已久的高潮点——带来的是惨败，而不是什么激励人的东西。

日本在开战时其海军力量大致相当于美国、英国和荷兰在远东和太平洋海军兵力的总和。日本仍然有10艘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以及约500架一线海军战机，而盟军的全部主力舰为一艘完整的和两艘受轻伤的美国战列舰和3艘美军航空母舰。交战双方在驱逐舰、巡洋舰和潜艇方面力量相当。就陆地上说，日本陆军共有51个师，其中21个在中国关内，13个在“满洲”驻守面对苏联的前线，这样，除了保卫本土的部队外，可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投入作战的还剩下11个师和约700架陆军飞机。

可就是这些部队势如破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异的胜利。关岛和威克岛在12月23日陷落。圣诞节那天，一百年来一直是英国堡垒的香港投降了。跟最初的传闻正相反，日军在菲律宾成功登陆，其20万人的登陆部队正将美菲部队赶往狭窄的巴丹半岛。1月2日，他们占领了马尼拉。日本空降兵开始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泰国被占领，在维希政权的默许下印度支那向日本开放，这使得日军可以长驱直入到达缅甸的东部前线。此外，他们也在马来半岛的中部登陆，占领了那里的英国机场，并穿过丛林向南边的新加坡挺进。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日军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都占有制空权。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在日本战争机器的“高效的邪恶”下，亚洲白种人的声誉已是岌岌可危。

在中国，人们仿佛就要有了救星似的，对珍珠港的消息欢欣鼓舞。韩素音写道：“国民党官员奔走相告，仿佛打了大胜仗。”成群的人在重庆进行庆祝。在内地的城市里，那些祝贺的人以为东京已是一片火海。美军要发动远程空袭的消息变成了500架美国飞机轰炸了东京，不过这种讹传无伤大雅。人们庆祝的原因是中国终于有了盟友了。美国加入了

对日作战，而且可以指望它结束战斗。中国没有别的任务了，只要坚持下去就能最后成为胜利方。一个美国人在看到重庆的欢庆场面后评论说："美国珍珠港事件发生之日便是这里的停战之时。"

蒋介石一听说这个消息，便采取步骤在这个大联盟中扮演大国角色，并确立中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分量。在珍珠港遭遇袭击的那一天，蒋介石召集驻重庆的英美代表开会，并提议亚洲所有轴心国的敌人——包括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和苏联（他当时预计苏联会对日作战）——都应当签订军事公约以相互协助，并应当在重庆建立军事委员会，由美国协调作战。尽管蒋介石让美国提出战略上的"全面计划"，他自己实际上对战略已有明确想法。他提议，包括苏联在内的盟国应将主要力量投入亚洲，并通过从南太平洋、阿拉斯加、西伯利亚沿海地区以及中国海岸发动空中打击，在1942年击败日本。在通过空袭阻断敌人供应线从而将日军孤立在亚洲大陆后，中国军队就可以摧毁日军了。

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提议在重庆建立的军事委员会应当"控制优先权和补给"。这跟战略问题一样让他关注——甚至可能更让他关注，因为他立即准确地察觉到，英国想征用堆积在缅甸的准备运往中国的《租借法案》军火。他想通过让美国人领导战争委员会来避免英国人拿走他的物资。

他的战略不但在可供使用的空军力量方面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跟美国和英国已经取得共识的欧洲优先战略不相符。尽管中国是联合国在1942年元旦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四个主要签字国之一，但是蒋介石并未受邀参加阿卡迪亚会议。（根据一份罗斯福笔迹列举的单子，最初中国是列在美国之后第二位，后面是苏联和英国，罗斯福后来修改了单子，将英国列在第二位，中国列在第四位，其他26个国家则按字母顺序排列。）不过出于礼节，蒋介石在与被任命为远东美英荷澳（ABDA）国家前线最高司令的阿奇巴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会晤后，要求得到战役计划的草案。12月23日这次在重庆举行的中国期待已久的与西方盟国的第一次会晤机会，跟珍珠港事件一样是一场灾难，这使三大盟国中的两个盟国之间的对立表面化和扩大化了。

中国对英国是既害怕又厌恶，因为这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帝国最早侵犯了它的主权，同时还是不平等条约的始作俑者。中国对英国曾经短暂关闭滇缅公路至今耿耿于怀，而英国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其军事能力很不以为然。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奥托·尼迈耶（Otto Niemeyer）爵士在率领英国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后报告说，中国政府无力解决它所面

临的众多问题，它所采取的措施是不恰当和随意的，给它提供贷款亦无济于事，因为面对商品匮乏这个现实问题贷款无法被有效利用。尼迈耶对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蒋介石“未能领悟局势”。英国颇有城府地接受了这样的结论：作为一个帝国，英国不像美国那样希望在战后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一个个据点接连失陷的情势危急的12月，英国首先考虑的是如果可能的话就守住缅甸，把它作为印度前面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一旦失去缅甸，那么它也并无其他想法，只是想在取得最后胜利后重新收复亚洲的帝国领土。

中国对保卫缅甸同样有兴趣，因为这可以保证从仰光运来的租借物资畅通无阻，更别说这还可以让中国掌握堆积在那里的成千万吨物资了。重庆会议的主要意图便是争取囤积的租借物资以及控制基地设在缅甸的、刚刚到来的陈纳德指挥的美国志愿队。中国名义上对这两者都具有所有权，但是穷急之中的英国认为，他们能更好地利用这些东西。

韦维尔将军这位身材结实、缄默而有威严的独眼斗士明确表现了对立，他注定在担当指挥任务时要历经艰难。他跟史迪威生于同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伊普雷（Ypres）失去了一只眼。这次他在中东先是取得胜利但接着遭受挫败，后来他跟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将军对调，到印度担任总司令。由于在阿卡迪亚会议上马歇尔坚持在各个战区均要统一指挥，韦维尔现在竟然令人生疑地要指挥从爪哇到缅甸的长达2000英里（约3218千米 ）的防御前线。英军参谋们怀疑美国人是在耍花招，不想在注定要失败的地方担任指挥，因此抗议说“让英国指挥官为共同降临美军和英军头上的灾难负责是致命的”。丘吉尔愤怒地拒绝接受这种指责，同意让韦维尔担任东南亚的战区指挥官。在日军周密计划的打击下，在这块软弱和不堪一击的地方，韦维尔只能独立应付。

在整个战争期间，指挥权之争跟作战计划所引起的关注几乎一样多。自从在19世纪发明了总参谋这个职位后，对战争的书面安排便占据了重要地位，结果恺撒、成吉思汗或者拿破仑只能对此感到庆幸。专职参谋人员现在认为，战争已经不是大将们的领地，而是有关解答“指挥问题”的事情。由于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专心致力于取得各个战区指挥上的统一，结果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反而成了次要的了。

韦维尔跟蒋介石在重庆会晤，准备讨论——如果不是欢迎的话——中国军队参与保卫缅甸的问题。在珍珠港事件次日蒋介石曾经问英国武

官丹尼斯（Dennys）将军，需要中国军队做些什么。丹尼斯显然对这种表示不以为然，建议中国派一个团，也许以后再派一个师。委员长回答说他在考虑派两个军 [1] ，并根据联合战略总体计划情况最终将兵力增加到8万人。丹尼斯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也许并非没有理由，因为蒋介石就在几周以前还明确表示，这些部队连保卫昆明都是不够的。

当韦维尔抵达重庆的时候，缅甸的危险变得更加明显了。英国的防御显得虚弱不堪，这本质上是因为这个帝国迄今为止只需要显示一下帝国的军威就可以让人俯首听命了。往往是这里或者那里派一艘炮舰，在江边由拿着步枪、穿着时髦的士兵练操时弄出一阵响声，穿猩红制服的士兵装模作样地走动一番，让留胡须的锡克人充当警察，这些已经足以让英国称霸亚洲而不会遇到什么挑战了。欧洲的紧急情况让英国的志得意满未免大打折扣，使得它对日军的蓄意袭击无法应付。然而中国不想看到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因为尽管中国不事张扬，但它并未放弃传统上宣称对缅甸所拥有的主权。一旦越过边界中国部队就可能留在那里，此外还可能跟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对中国人没有好感。韦维尔希望能得到英印军的支援，他自然希望“一个大英帝国的属国应当由帝国部队而非外国部队来进行防御”。此外还有人告诉他，缅甸无法给大量涌入的中国部队提供食物和交通工具。因此韦维尔答应只接受一个中国师，条件是这些军人必须从中方得到补给 [2] 。他的美国伙伴、属于空军的乔治·布雷特（George Brett）将军是派往中国考察可能用于重型轰炸机基地的，布雷特对此也表示同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部队的做法已经让他触目惊心。正如马格鲁德情绪紧张却又尽力轻描淡写地向华盛顿报告的，韦维尔的拒绝让委员长“颇为不快”——实际上蒋介石被激怒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不乏各种侮辱举动，现在又添了一笔。



韦维尔

此外还就仰光的租借物资爆发了争执。码头上的物资堆积如山，仓库里是满满的军火，几百辆汽车排成几排悄无声息地停在那里。与此同时，由于预计日军将会对码头进行轰炸，码头的卸货工人已经开始逃走。中方搬运这些堆积的物资能力有限，根据常识，最符合盟军战略意图的就是立即将这些物资用于仰光的防御，仰光对中国跟对其盟国一样

重要。但是，要让以蒋介石的表哥俞飞鹏将军为首的中国驻缅供应官员将油水这样大的巨量物资拱手让给英国人，良非易事，毕竟英国人守卫这个城市的能力并不让人有信心。中国人贪图物资，但是又没有能力使用这些物资，这让西方人恼火。由于时间紧迫，焦头烂额的英国总督暗示会征用这些物资：150辆卡车和一船的军火被征用，其他堆积的物资则被美军租借物资军官扣下，直到解决了其去向问题为止。当争执之事传到重庆的时候，蒋介石显然刻意对韦维尔的不恭进行报复，先是提议将20挺机枪转给英军以供保卫缅甸之用，之后拒绝见英国大使，并威胁要中止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所有合作。

此事的影响波及了阿卡迪亚会议，结果美国和英国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分歧加深了。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的英国其实并不想因中国操心。美国把中国像白头翁一样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3] ：山东问题，未能兑现的《九国公约》承诺，无力的史汀生原则，向日本出售废铁，跟美国的“特殊”关系，退还庚子赔款，有关战后中国成为强国的理论——所有这些都成为负担的一部分，是负罪感、监护人和幻觉合成一体。美国领导人对蒋介石可能是有意的发作立即做出反应，重新担心蒋介石会退出联盟。美国一直担心中国会跟日本单独媾和，这种担心未免有些杞人忧天的意味。因为中国显然有意在最后站在战胜者一方，但如果跟日本站在一起只能一无所有。不过蒋介石一直叫嚷快要顶不住了，加之担心如果中国崩溃那么日本就会把在中国的那些师腾出来，这让美国一直忧心忡忡。

日本的一系列胜利加剧了这种担心。正如马歇尔将军在给韦维尔的一封电报中焦急地指出的，日本正在发动一场大规模宣传战，想利用由于中国香港和马尼拉陷落而造成的西方声誉上的损失而瓦解中国的抵抗。他敦促说必须增强中国“对英美在远东的共同意图的信心”。除了打败日本，他还必须为这种共同意图下个定义。

主要由于利益方面的不同，盟国未能就抵抗日本达成统一计划，早些时候在新加坡举行的参谋会议上也未能就如何使用现有兵力或者优先防御目标等问题做出决定。重庆会议所达成的一致是，守住“对中国继续抵抗至关重要”的仰光和缅甸是“重中之重”，但是马歇尔所提及的应当增强的信心几乎马上又遭到了削弱。据高思报告说，盟军失利让中国人“深感震惊”，而公开谈及应优先打败希特勒的政策则引起了“愤慨”。陆军部长史汀生对这种动向尤为担心。他认为韦维尔“为人专横有余但圆滑不足，对中国仍然用老式英国做派行事”。史汀生比其他人更加感到对中国

有监护的义务。跟欧洲优先战略相比，他本来倾向于在远东发挥更大的努力，因为他认为不让日军巩固其占领地和避免让中国由于泄气而崩溃是至关重要的。

罗斯福对韦维尔事件深感不安。他担心的是，如果蒋介石政府放弃抵抗，那么整个亚洲都会倒向日本。蒋委员长的士气在华盛顿被视为是最为微妙的一种尺度，任何影响这种士气的事情都是危险的。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艾略特（Elliott）说："如果中国倒下了，你知道日军会腾出多少个师来——并会把这些部队用到哪里？攻取澳大利亚，攻取印度——这都是探囊取物罢了。直接向中东挺进……日军和德军会从两面夹击，并在近东的某个地方会合，完全切断苏联与外界的联系，撕开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告诉丘吉尔说，重新让蒋委员长心情愉快非常重要，并请求丘吉尔命令韦维尔要特意安抚蒋介石。

为了确立蒋介石的正式地位，盟军邀请他担任独立的中国战区的盟军最高司令。但是由于目前尚无向中国派遣盟军的计划，因此这不啻于通知蒋介石说，他现在的作战范围只限于本国。尽管这在形式上也许让人满意，但是现实情况仍然是明摆着的：由于情报安全方面的原因，中国人并未加入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一种补偿，罗斯福更加想在重庆设立某种盟国间的军事委员会。

罗斯福的主导思想是让中国在战后成为一个大国，以取代日本所留下的空白。他并非不了解中国的缺点，因为他曾经向他儿子承认说，中国"仍然处于18世纪"。这个有5亿吃苦耐劳的人民的伟大而古老的国家尽管治理上一直混乱不堪，但其重要性仍然是个政治地理上的事实。罗斯福想让中国将来站在美国一边。丘吉尔在参加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告诉罗斯福说，他坚信美国过高估计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可能做出的贡献，对此总统表示"强烈异议"。罗斯福质问，如果中国的"众多人口像上个世纪日本那样发展并掌握了现代武器的话"，那么会发生什么？丘吉尔回答说，自己是在说现在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目前已经足以对付"。在这场对话中，丘吉尔所说的现实的顽固性和罗斯福所说的未来的阴影在这里相遇了。

正如罗斯福所相信的，如果想让中国起到一个大国的作用，那么就应当像对待大国那样对待它。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在跟《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一番谈话中说，对蒋介石说话不能像对一个"野蛮人首领"那样。接着他问了斯诺一个颇有深意的问题，那就是中

国人是否“喜欢我们，他们那边对我们看法好吗”，他继而谈到了他家庭跟中国的渊源，讲了1933年时他怎样想废除治外法权；尽管当时赫尔表示同意，但是国务院顾问（罗斯福不喜欢、不信任这类人）表示反对。尽管德拉诺家族的财富来自这里，但是罗斯福不赞同外国对中国的渗透。他在1934年的一封信中表达了有史以来制定过但却从未执行过的最完美的政策：他坚信与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继续采取不妥当的立场，毋宁加快中国的危机并“迫使中国人民更好地站立起来”。

除了他外祖父德拉诺和帆船贸易之外，总统有关中国想法的演变是个隐蔽的过程。根据他的一个亲密助手罗森曼（Rosenman）法官的说法：“在白宫，罗斯福有关中国政策的制定过程几乎跟制造原子弹一样，都是大秘密。”战后有陆军史家问马歇尔将军：“总统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他向你解释过吗？”对此他只能说，总统的政策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看待”。这并不仅仅是填补空白的一句口号而已。尽管这并非真正的政策，但是其信念却是真实的。罗斯福认为殖民地帝国的时代已经终结，西方世界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不应再把亚洲人民视为劣等民族。正如他跟副国务卿威尔斯所说的，平等对待中国是防止“在未来岁月中西方和东方之间出现根本分歧”的最好方式。

这便是他跟丘吉尔的分歧所在：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他就任首相并不是为了安排帝国解体的。恢复从前状态是英国在远东的战争目标，但是这并不是罗斯福的目标。罗斯福相信大英帝国已经终结，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争取独立的浪潮，长久而言，会把白种人赶走。丘吉尔来访时，罗斯福在讨论印度问题时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这造成了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严重的分歧。丘吉尔写道：“我反应强烈且发表了长篇大论，结果他再也未谈及此事。”

当最终目标不一致的时候，这必然影响到战略。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是中心问题；对英国来说，核心是新加坡，其背后则是印度。对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缅甸在战略上有两种不同的视角，这种焦点不一致的问题从来没有解决掉。

美军参谋人员跟总统一样认为必须支持中国，并由于这种原因认为守住缅甸至关重要。对于英国人来说，对中国的支持是一种浪费，属于美国那种令人费解的乖张举动，但是他们必须要达成联合战略。丘吉尔同意让罗斯福主要负责“各种需要跟中国交涉的情况”。由于美国的坚持，为了强调缅甸对中国的战略关系，缅甸被从印度战区划出并划入韦维尔的东南亚战区，英军方对这种打乱常规补给渠道的做法深恶痛绝。

马歇尔的对等人物、伦敦的英帝国参谋长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愤愤不平地说：“整个安排异想天开，根本不成熟。”

丘吉尔在向韦维尔解释这种安排时这样写道：“我必须让你了解美国人的看法。在他们很多人的心目中中国跟大不列颠一样高大。”美国参谋长将缅甸置于他的指挥之下，这纯粹是因为他们认为跟中国联系起来并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对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必不可少。不要忘记在这些东西的后面笼罩着亚洲团结的阴影”。他最后说：“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总结自己在美国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中国’。”

1942年1月1日史迪威在日记中记道：“乔治要我去——跟他待了一个多小时。都是有关东方的问题。”马歇尔介绍了英国和中国之间发生的争执，并说他正在寻找一名高级美国官员去重庆维持和睦。可能是在史迪威的建议下，当时提及了陆军高级军官、现任第一集团军司令休·德拉穆（Hugh A.Drum）少将的名字。也许之前马歇尔曾经让史迪威推荐一个人，因为史迪威曾与多恩谈及此事，而多恩推举了德拉穆。多恩当时是这样说的：“蒋委员长是个装模作样的人，我们就把最装模作样的人送给他。”

德拉穆架子很大，是个自以为是的浮夸之人，曾任远征军第一军参谋长，后任潘兴的总参谋长。当再次爆发战争的时候，他想率领下一支美国远征军。德拉穆在上一年夏天的演习中曾经因举止傲慢和说过一些尖刻话而激怒了马歇尔。马歇尔知道让哪些人担任需要实力的指挥职务，并很高兴有办法让野心勃勃的德拉穆得到满足。尽管没有在中国的经历，但是他的军衔对中国人来说算得上是种恭维。已在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负责任的马格鲁德威望不够，另外他已经厌倦，并对中国人感到失望了。对史迪威来说，剩下的唯一选择是明摆着的：“我？不，谢谢你。他们记得我还是一个可以踢来踢去的小不点儿上校。他们看见我徒步走在尘土中，跟苦力交往，坐着运兵车旅行。德拉穆架子够大，而且要经过翻译来交谈，他还可以多些时间考虑，他会慢慢做出决定，并保住他的尊严。无论怎样还是让德拉穆去。”

此时由于计划和对物资方面的担心，“运动员”计划已经陷入深深的混乱。对于西班牙、空中掩护、潜水艇、运输并对“冒着炮火、必然经受的惩罚以及供给方面陷入一个陷阱”整体上是否明智，均有顾虑。史迪威听说自己由于“主动性、思维敏捷和决断性”而被选中，而美国人的第一次进攻必须胜利。“这不错。不过谁愿意做一种标志？”在跟马歇尔以及其他人商谈过之后，他写道：“所有的人都反对……所有的人都认为手段

匮乏，交通没有保障，复杂因素众多，主要事实不清，后果严重。”然而计划仍然继续，因为正如史迪威所看到的，“英国佬想让我们承诺下来”并对罗斯福彻底“实施了催眠术”，结果罗斯福“也迫不及待地想做点事情……‘什么，废话，我们干得了。’这个天真的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卸船不能卸得快些。他说‘对于处于危急之中的人来说，两个星期是很长的时间’。”史迪威轻蔑地称罗斯福“在军事方面是个十足的业余人士”，易于产生“各种怪想法、想象以及各种突然的幼稚想法”，并且“上了英国人的当了”。此外，“海军是他的心头肉，而陆军则是拖油瓶”。

到了1月10日，“运动员”计划“正在变得争议越来越多……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场疯狂的赌博……整个见鬼的东西都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先清理太平洋然后再转向东方”。1月14日，在浪费了三个星期“制订那些我们可以证明是行不通的计划”后，在最后一次阿卡迪亚全体会议上做了最后陈述。此时，由于预计在利比亚可能遭受挫败，英国的态度已经冷了下来，结果同意推迟“运动员”计划。

当天晚上史迪威应邀到陆军部长家里做客。他在那里得知，用史汀生的话说是，“命运之指已经指向了你”，而这个方向是指向中国。当史迪威正醉心于“运动员”计划的时候，德拉穆将军被召往华盛顿，德拉穆以为这是让他通向伟大的召唤，因此带着四五十参谋人员到来。然而德拉穆发现并没有任命他为潘兴的继任者，而是准备派他去中国，而且没有拨任何部队供他指挥，这件事在目标和指令方面的混乱较之“运动员”计划更加严重。

美国战时对华政策开始在跟德拉穆的讨论中显现出来。根据史汀生告诉德拉穆的，这次使命的意图是在早期作战中将中国作为基地，并最终“由中国或者通过中国发动有效的反攻”。其次是让史汀生口中的处境艰难并可能跟日本单独媾和的中国继续作战。史汀生确定了三项主要任务：“完全支配”租借物资，全面指挥美国空军在华的作战活动，并可能在蒋介石的提议下指挥中国部队——蒋介石曾经同意“交出他的一两个军”。

马歇尔的说法则侧重点有所不同。除了将中国作为空军基地维持下去并增强航空志愿队之外，主要的目标是“武装和训练在中国的中国部队”，以使他们更有效地对日作战并限制日军在太平洋的活动。在陆军部看来，这便是《租借法案》的目的所在。由于马歇尔有在中国的经历，因此他对中国士兵潜力的看法跟史迪威的大致相同。他知道中国士兵吃苦耐劳、不怕死，并在对冯玉祥的地盘访问时对他部队的纪律印象很

深。这让他相信，如果有称职的人统领的话，那么就可以铸造一支“不可战胜的”部队。他认为中国连级以上的指挥官都不称职，需要更换或者重新训练。

这项使命对德拉穆将军并无吸引力，他认为它“模糊不清”，跟主要战争努力相去甚远，而且由于马歇尔表示无意往这个战区派遣美军地面部队，因此德拉穆认为对他这样职务高且有作战经验的军官来说是种浪费。在他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蒋介石尽可能威风地就任了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并请求派一位美国高级军官充当他的盟军总参谋长，还说此人“无须精通远东问题。相反，如果略微了解军阀混战时中国军队情况，则此人可能反而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此人将以军阀时期的军队设想当前的国民革命军”。这个有趣的限制可能是针对马格鲁德将军的。

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他希望派来的人态度和蔼，官职显要并在美国国内很有影响，但对中国又不是很了解，从而不至于对中国的要求提出批评——简而言之，他需要德拉穆将军那样的人。但是由于德拉穆对此项任务兴趣不大，因此史汀生已经将他排除在外了。由于“运动员”计划已经推迟了，目标便像指南针的指针一样无可置疑地指向史迪威了。马歇尔跟史迪威一样，想让史迪威担任作战指挥职务，因此马歇尔竭力想避免做出这种牺牲：“乔，你还有二十四小时来想出一位更好的候选人，否则就是你了。”美军第一位战地指挥官职务和史迪威个人的第一个指挥任务都曾经距离他仅一步之遥，因此他有理由指望指挥任何取代“运动员”计划的行动。“天哪，好好想想，否则我们就会陷进去了。”史迪威这样敦促多恩说。不过他自己知道他们已经陷进去了。

在史汀生那座占地20公顷并可以俯视洛克溪公园（Rock Creek Park）的18世纪的房子里，史迪威发现自己是唯一的客人。他们在书房壁炉前谈了一个半小时。陆军部长问他对这次使命感觉如何。“我告诉他派我去哪，我就去哪。”史汀生也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他印象很好。他对中国有很深入的了解，这一个半小时让我对中国军队的勇敢有了切实了解，这是我从前从来未曾了解的。他对中国部队的勇敢有很高的评价。”史迪威告诉他说这次使命能否成功，取决于蒋介石是否会将部分军队交由美国指挥——蒋介石一直以来拒绝这样做。陆军部长向他保证说，蒋介石本人曾经做过这样的提议，而且宋子文也对此做出了承诺。史迪威表示怀疑，不过根据史汀生的记载，史迪威说，如果真能够这样指挥，那么这次使命的可能性将“无可限量，他对之也充满热情”。有些热情显然是属于史汀生自己的，因为对他来说这次

使命代表了“我多年来一直信奉的政策和原则终于得以贯彻”。他所寻找的正是热情，而史迪威对中国的感情鼓励了他。他上床睡觉时感到，“我找到了一位对解决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非常有用的人”。从那一天直到最后，他一直是史迪威最热情和最坚决的支持者。

两天后，史迪威在跟马歇尔进行了一番长谈后确定了这次使命。他听说史汀生最初不想考虑他，因为在一次“运动员”计划的会议上史迪威低着脑袋。“乔治告诉他说，我那是在准备出击呢。”马歇尔问史迪威是否认为这次中国使命有把握取得实质性结果。“是的，如果让我指挥的话。”马歇尔问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说‘如果他（马歇尔）愿意就问问蒋介石吧’。乔治说，写下这个问题。我写下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送交宋子文了。”马歇尔说将把史迪威提升为中将，但是事态发展迅速，“等你到了那里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是澳大利亚的指挥官了”。

似乎在从印度洋到西南太平洋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抵抗。日军现在已经在婆罗洲和西里伯斯（Celebes）登陆。在马来半岛，两支英国师由于无法立足，结果退到了护卫新加坡的海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看来直布罗陀以东最了不起的海军基地马来亚可能守不住了。所谓的马来屏障，是一系列保卫印度洋的陆地和岛屿，它们从缅甸经马来亚、苏门答腊和爪哇一直到澳大利亚。1月15日，缅甸本身这个屏障北部的支点在南部被日军先遣队突破——日军是通过泰国翻山路过去的，这些山路在过去皇朝中是步兵和大象曾经使用过的，但据认为具有现代交通工具和枪炮的部队是无法穿越的。在敌对的缅甸民族主义者的带领下，日军开始向毛淡棉挺进。

突然，一直受到排斥的中国师似乎变得受欢迎了。英国现在要求他们驻守缅甸东部边境地区的掸邦，以便抽调那里的英缅军第一师去防守仰光。丘吉尔参加完阿卡迪亚会议后回到伦敦时面临着选择，这就是用唯一的增援部队增援缅甸还是增援新加坡。他对其参谋长的表态令人惊诧，他说：“就战略目标而言，我认为保证滇缅公路畅通要比保住新加坡更加重要。”失去公路“会非常可惜。这会使我们跟中国人隔离开”。维持与中国人的接触第一次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但增援部队还是去了新加坡，因为已经将其最精锐部队派往中东为英国作战的澳大利亚警告说，放弃新加坡将会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背叛”。

1月19日，史汀生跟宋子文提到了获得委员长承诺，把“一些中国部队特别是那些准备在缅甸作战的部队”交由尚未指明的美国人指挥的问题。蒋介石的答复是肯定的，但是并不是简单明了的。他同意交出中国

驻缅部队的“执行控制权”（宋子文转达此问题时的说法）并确定一名少将，但此人不应是马格鲁德。12月23日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在蒋介石和美国人之间充当了阐释人的角色，他这样做主要是根据是否会让事情顺顺当当而灵活处理的。此人有很强的个性，野心勃勃，作风骄横但颇有才干，在思维和语言方面已经完全西化，不过就其傲慢而言又非常中国化。他瞧不起他所代表的政权，跟那位他想取而代之的领袖，即他的妹夫之间也并无信任可言。史汀生从宋子文这里得知“有关缅甸有一事尚待解决”，但是他并未解释这个充满玄机的暗示。宋子文说无须再发电报过去，因为他同意就够了。他已经设法知道了任命的是谁，并调查了史迪威过去的记录。宋子文完全满意，而且知道蒋介石也会满意的。他认为美国“选择了陆军中的最佳人士担任此职”。蒋介石后来来电表示同意，电报说“热烈欢迎史迪威将军来华就职”。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1月23日告诉史迪威说，看来史迪威就是“此人”。马歇尔问道：“你去吗？”史迪威跟对史汀生的回答是一样的：“派我去哪，我就去哪。”他接受了这个任务，没有再说什么，不过还是在日记中写道“打击来了”，并接着说这仿佛是把一只公羊作为牺牲祭祀。他的参谋人员听说这个消息都“目瞪口呆”。陆军部一位同事评论说，马歇尔原想“巧妙除掉德拉穆，不料结果失去了自己一位最好的军级将官”。

接下来的日子是研究中国案卷，组建参谋队伍，准备提出各种要求并跟宋子文（“诡计多端并狡猾”）以及中国国防物资公司人员（“通常说些有关运输机、大炮和俯冲轰炸机的废话”）进行详细会谈。史迪威跟负责中国租借物资的劳其林·居里以及海军负责人进行会谈。海军此时正准备派遣曾长期驻华的海军上将米尔顿·迈尔斯（Milton Miles），并指示他“想方设法在中国沿海做好准备，以备美国海军在三四年内进行登陆”，同时还要“摸清楚那里的情况”。

在史迪威准备的时候敌人已经在前进了。就在确定他是“此人”的时候，日军在俾斯麦群岛的腊包尔（Rabaul）登陆，三天后又占领了附近的所罗门群岛，这是他们准备切断美国跟澳大利亚联系的第一步。在缅甸他们已经在逼近毛淡棉，按照英国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日军“并不是直接通过公路进来的”，而是一小批一小批穿过丛林过来的。跟在马来半岛一样，他们在这里的机动性和推进速度也令人惊叹。他们轻装上阵，利用自行车或者畜生做交通工具，自己携带供小口径武器使用的弹药，因此他们不受道路的限制。他们穿着运动鞋、短裤和运动衫，并接受过有限供给下的生存训练，因此他们每人可以在背包中携带四天的给养。

英军尽管使用本地人，但是调动时乘坐卡车，携带全部辎重，包括重武器、罐头食品、钢盔、毒气面罩和很重的靴子，结果他们跟在北美密林中布莱多克 [4] 将军率领的英国兵一样处于不利地位。

马歇尔没有信心。他对英军是否能够守住新加坡或者仰光表示怀疑，并承认中国使命是个冒险，他还再次警告说史迪威可能最后被派往澳大利亚。史迪威几乎同样悲观："中国人肯干吗？或者他们会坐着让我们干？英国佬会配合吗？会不会等我们到时仰光已经没了？"

在致马歇尔的有关战略的备忘录中，他认为西南太平洋是个防御性战区，而在中国则要"发挥最大进攻性"，至少派遣一个美国军，并在这里把战火引向日本。他最后接受的指令——也就是他作为中将（"毫无兴奋感"）接受的指令——却并没有包含这种想法。他们任命他为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 [5] 总司令、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总参谋长、租借物资督导人以及任何盟军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他的职责和意图是维持滇缅公路，"指挥分配给他的中国军队"，"协助提高中国部队的战斗力"，并"增强美国为了协助中国政府作战之有效性以使战争能够继续下去"——这里用词审慎，特别指明了协助的意图。史迪威将各种任务列成一个单子，结果发现自己的各种职位、职能有八项之多。

由于预计可能失去仰光，作为弥补，另外两项艰巨的任务已经有了雏形，这就是"驼峰航线"（Hump）和利多公路（Ledo Road）。1月30日日军攻取毛淡棉之后对仰光的威胁增大了。中国人对西方力量的信心动摇了，他们预计会失去仰光这个港口城市，而他们也会陷入孤立，除非能够找到另外一条供应线。罗斯福同样感到担心。他在1月30日的内阁会议中提出了开辟空中运输线和另辟陆上线路的可能性。根据史汀生的记录："他说的陆上线路在现有道路以北，通过海拔不超过6000英尺（约1828米）的山脉。"艾弗莱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大使根据总统的要求跟宋子文商讨此事。宋子文拿出一张用红线表明线路的地图，该路线从波斯湾通过铁路到里海，然后通过船运抵达穿越俄国土耳其斯坦的铁路直到中国边境，从那里再经过约2000英里（约3218千米）的公路运输抵达重庆，总距离达5000英里（约8046千米）。

可以理解，宋子文认为航空线会更为有效。他在1月31日给罗斯福的信中不容置疑地指出："堪称奇迹的是"，有条路线"就近在眼前，很是方便"。这是条"飞越相对平坦区域"的仅700英里（约1126千米）长的航线，连接印度东北阿萨姆邦以北的萨迪亚和中国昆明。他没有提到这两点之间耸立着的喜马拉雅山，这座山使这条航线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危

险的航线。他估计100架DC-3运输机每月可以向中国运送1.2万吨物资。物资的输入港是加尔各答，一条铁路线从那里通向北部的阿萨姆邦。哈里曼在一封说明信中对这个提议表示赞同，不过出于慎重，他提到了那里的高山。提出该请求仅仅九天，对各类仅仅属于后勤问题抱有十足信心的“能干”精神的总统就向蒋介石“明确答应……通过印度向中国的供应线可以通过空中维持”。随之而来的是机场、飞机、地勤人员、燃料以及在世界之巅开辟空中货运线所需的各类保障问题，而这在史迪威离开之前都纳入他的使命范围之内。他认为这是必须的：“事态发展使得所有相关人员都意识到了缅甸的至关重要性。我们必须马上启动这条航线，同时在边远地带建造一条公路。”

从此这条从印度到中国的“边远地带的公路”跟史迪威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说这是史迪威的杰作，也有人谴责这是他做的蠢事。此事最初是由中方在1942年1月提出，那时距离考虑由他完成该使命还有两周，距离他被正式任命还有三周。中方甚至在日军穿过缅甸边界前就预计缅甸南部可能失陷，因此正式请求用租借物资修建一条公路，公路从阿萨姆邦的利多穿过缅甸北部的高山、森林和河流，在中国的龙陵跟滇缅公路连接。这条道路过去从来没有车辆通过，工程甚至比那条航线还要充满艰难。委员长认为这条公路可以在五个月内建成。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军官在对各种问题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后预计，建成这条路要花两年半时间。陆军计划处建议将它列入“紧急军事需要”。因此在史迪威抵达中国或者缅甸之前，所有与援华相关的人员均已批准此项工程，这包括陆军部和总统，宋子文和中国国防物资公司，主管租借物资的劳其林·居里，自然还有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在2月访问印度时亲自获得了印度政府的批准。

史迪威在离开前回到卡梅尔跟家人团聚了四天，这期间他并没有表露过对放弃作战指挥而可能感到的失望。他似乎很高兴能够同日本作战并帮助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他曾在他明白的情况下所了解的。现在他的使命已经跟他所期望的是一致的了：使中国士兵能够有效作战。除了35名军官和5名征募士兵将陪同他一同飞往中国外，陆军部还派遣了400名技术人员和教官乘船前往，以帮助训练中国人如何使用美国装备和战术。

史迪威的下属既包括“中国帮”，也包括第三军的军官。具有中国经历的多恩上校仍然是他的副官和主要助手。曾担任语言教官、其在“帕奈”号舰上的命运曾经引起很多担忧的弗兰克·罗伯茨现在是情报处的中

国负责人，他作为情报官再次加入史迪威的队伍。招募的人员还包括从前的两位语言教官威勒德·怀曼（Willard Wyman）上校和黑登·波特纳（Haydon Boatner）上校，他们曾经在第十五步兵团服役过；此外还包括迪克·扬（Dick Young）上尉，他是个在夏威夷出生的中国人。马克斯维尔·泰勒正急切地想把他的日语派上用场，而史迪威也正急着想要他，但是他的名字最后被马歇尔从名单上划掉，因为马歇尔想派他去欧洲。史迪威借用约翰·培登·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担任他的政治军官——史迪威1938年在汉口跟他认识，他当时是使馆人员。戴维斯出生于四川，父母是传教士。他很有学识，聪明，会讲中文，而且擅长撰写详尽的报告。到蒋介石那里去的这个使团并不是一群一团和气的无知之辈。其余的人主要来自奥德堡的第三军，步兵长官是富兰克林·塞伯特（Franklin Sibert）准将，担任参谋长的是赫恩（Hearn）准将，他绰号“大个子汤姆”，是个动作迟缓的南方高个子，做事稳健但没有什么灵气。

史迪威在离开的前一天遇见了对他这次使命有决定性影响的两个人。他结识的第一个人是距离他很远的陈纳德，他是这个战区的出色战士和鼓动者。马歇尔在跟蒋介石商谈重新把美国航空志愿队纳入美军一事时，曾经答应蒋介石让陈纳德担任驻华空军总司令。但根据随后制订的中缅印战区空军战略计划的指挥结构，陈纳德的飞虎队要纳入筹建中的以中国为基地的空军中。宋子文对这种变动表示同意，不过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往往会在后来造成麻烦，这次的麻烦是他没有事先告诉蒋介石。陈纳德对这种违反承诺的做法大声抗议，不过他真正不满的是在任命为其上司的克莱登·比斯尔（Clayton Lawrence Bissell）上校手下工作，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积怨。所有人都参与了这场争执：史汀生“深表关切”，史迪威被派去解决问题，居里为陈纳德说话，而跟普通军官一样厌恶陈纳德并视他为异类的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将军则“勃然大怒”。尽管阿诺德将军绰号“快乐” [6] ，慈眉善目是出了名的，但是他也会发脾气，有时甚至会扔满满的墨水瓶。作为这个战区的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坚持比斯尔要居于陈纳德之上，阿诺德也颁布了这样的命令。就纪律性而言，这次事件让陈纳德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很多”。

第二个人是罗斯福。在跟陆军部长告别时史迪威提出，如果他能够携带总统的一封私信，这可以增加他在委员长心目中的威望。史汀生安排了会面，解释了会见的意图，这样2月9日史迪威去白宫第一次拜见他的总司令。这次会面持续了二十分钟，但没有像跟史汀生在安静的壁炉边那次会晤那样产生相知之感。考虑到史迪威带着偏见而罗斯福有那种

一个人夸夸其谈的习惯，这种结果也并不意外。在家里史迪威是个普通的共和党人，跟那些憎恨罗斯福的人有同样的想法，立场也一致，在这方面他深受哥哥约翰的影响，而约翰属于这类人中态度极端的一派。如果史迪威的烟嘴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说的“像罗斯福那样往上翘”的话，那这种相似肯定纯属巧合。然而就他们对中国的希望而言，他们的会面还是有共同立场的，如果一方给另一方机会的话。总统可以对真实的中国有更多了解，而史迪威也可以多了解总统的真实目的。



“飞虎队”飞行员标准像

罗斯福谈话时喜欢自己滔滔不绝，这个习惯根深蒂固，以至于经常跟他打交道的人想出了一些特别的办法让总统能够听到他们的话，这包括吃饭时在他嘴巴塞得满满的时候跟他说话，或者让他先说五分钟，然后毫不客气地打断他。据说打电话时史汀生部长曾经没等罗斯福说完话就把电话给挂了。罗斯福这个人脾气好，有直觉，相信实践，工于算计，多变，狡诈，愿意做出让步，他的思路跳跃很快，往往没有连贯

性。他经常会同时有几种思路，动机也常常是含混的。那种指导他的连贯性，用他女儿的话来说，便是“他的未来感”。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说的：“他对民主的未来信心十足。”他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自信——有些人认为他过于自信了——这也许是因为他征服了自己的麻痹症，这让他感到世间再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他经常看上去不很稳重，其实未必，他常常是靠闲谈掩饰想法，正如史迪威是靠沉默来掩饰想法一样。在闲聊自己曾参与中国贸易的祖先的时候，罗斯福竟然悟出了对一个希望了解中国的西方元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正如1935年他在给一位朋友写信时说的：“有些力量是你我都无法了解的，但是至少我知道，他们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几乎是无法理解的。不要让所谓的事实或者数字诱使你相信，西方文明的某种作用能够深入影响中国。”



缝在飞虎队飞行员制服上的血幅，指示军民救护被击落的飞虎队员

史迪威觉得他“热情而令人愉快——但是有点儿浅薄。给人印象不深。他好像把我当成拜访国会议员的一个选民。散漫地谈到他对战争的想法——‘我设想的是一个2.9万英里（约4.6万千米）长的前线’，等等。很多浮夸的东西”。在这“等等”之中包括了总统所说的他预计战争将在1943年结束，“自现在一年后”将会出现转折，将向澳大利亚提供2000架飞机，蒋介石没有把希特勒看成共同敌人，所有的敌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盟友都要同舟共济，还说他不想让蒋夫人来访问。“我已经听够了，因此插话问他是否有话捎给蒋介石。他显然没有话要捎，因此又说了五分钟，竭力想说出什么能震撼世界的话。终于他想出来了——‘告诉

他我们会永远坚持下去，我们打算坚持下去，直到中国收复所有失去的领土。’”

这个不寻常的目标实际上成了美国的政策，尽管也许不能像史迪威那样对之嗤之以鼻。正如一年后在卡萨布兰卡谈及无条件投降时的情况一样，罗斯福宣布的很多不同寻常的决定看上去好像未经思考，实际上，这些决定尽管可能没有事先商讨，但是却反映了他的基本信仰。他对史迪威所阐释的实际上是偏离政策的，虽然没有经过正式报告，但当史迪威尽职尽责地向蒋介石转达这个意思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种承诺。通常一个国家不会试图帮助另外一个国家收复其失地，哪怕是盟国也不会，况且1944年罗斯福还声明说：“我不想让美国背上战后重建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的负担。”

在公众心目中，中国是个受欢迎的盟国。罗斯福在1月6日向国会致辞时曾经提到了美国在战争中已经与之携手的盟国，当他提到“勇敢的中国人民”时，引起了自发的、最为热烈的掌声。总统接着说：“这几亿人在四年半的时间里经受了轰炸和饥饿，面对日本的先进装备和武器，一次又一次地痛击了入侵者。”伴随着勇敢而富于耐心的中国人民的是“痛击”日本人的玄机，对此重庆的战报总是大事渲染的。比如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政府曾经宣布，派遣两个军对进攻香港的日军后方发动袭击。尽管根本没有做出这样的调遣，但是中国12月15日发表的一份战报说，这些部队已经跟敌人交火并给敌人造成了1.5万人的伤亡。同样，带着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想法，蒋介石在1月告诉美国政府说，他准备发动反攻将日本人赶出印度支那。

马格鲁德此时向陆军部报告说，中国人“非常相信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他们对不好的后果视而不见，喜欢“那些令人得意但却是虚构的符号，认为这些东西要比冷冰冰的事实更加真实”。他引证了一些公报作为例子。由于那些记者或者出于善意，或者由于懒惰，对这些天方夜谭未加甄别地进行报道，结果对中国的“胜利”大肆宣扬，造成了误解。

虚假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作为美国的盟友，中国只能声称自己是个民主大国。它不可能承认说，蒋介石的政府真的像后来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历史学家惠特尼·格利斯沃德（Whitney Griswold）在1938年所说的，是个“法西斯独裁国家”，纵使是个邋遢低效的独裁国。即使在中国以外那些不受新闻审查限制的记者也避免报道国民党的弊端，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就是在帮助日本人，此外这还会使这样做的记者无法再回到中国。出于对中国的友谊，他们夸大了中国的武装抵抗。结果这成了一种

根深蒂固的传统：任何“希望中国好”（正如一位记者写的）的记者来到重庆都不可能“不对蒋夫人的美丽、委员长的勇敢和决断、中国军队的威力以及中国人民之崇高感到欣喜”。

当中国在1月要求不受限制地得到5亿美元贷款的时候，高思大使曾经提出了虽不令人愉快但颇有见识的看法，认为无限制贷款可能被中国统治阶层中的“反动、自私自利以及那些我所担心的轻薄多变者”滥用掉。重庆宣称说，这项贷款对支持政府对付那些悲观失望的失败主义势力很有必要。“这仅仅是讹诈罢了。”苏联大使立特维诺夫曾私下对财政部长摩根索说。但是，陆军部和国务院认为，为了激励中国政府并使中国能够继续作战，这笔贷款是有必要的。它具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意义，但是跟财政无关。摩根索对在没有担保或者控制的情况下由他负责提供这笔贷款感到极为不安，因此他提议按月用一种特殊货币直接将钱发放给中国士兵，“因此这些士兵们打仗便有钱，不打就没钱”。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断然拒绝，之后摩根索继续试图让美国能够施加某种控制、监督，或者至少能够争取到使用这笔钱的磋商权。委员长对所有这些建议均表示拒绝。他告诉华盛顿说，这笔贷款是贷给一个向共同敌人作战的盟友的，“因此不应对其使用或者偿付方式要求担保或者在其他方面预先设置条件”。

最后美国接受了这种异乎寻常的说法，因为贷款的真正意图是为了让蒋介石高兴并使他对盟国的事业保持兴趣。正如摩根索自己说的，这样做的动机便是持续担心如果没有大量援助，中国就会靠拢日本或者其他“黄种人”。他被要求在参众两院委员会就这笔未担保贷款进行辩护时承认，这不是一种普通的借贷活动，很可能美国无法再收回这笔钱了，而且他也不否认一位质疑者的指责——这个人说这笔贷款是为了跟日本比着争取中国并向蒋介石展示他自己的利益所在。



宋子文和摩根索签订一笔5亿美元的贷款协议，1945年1月

陆军部长史汀生则表示，这是调动中国军事努力的方法。2月3日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贷款问题作证时引用了史迪威对他说的有关中国士兵潜力的话。据一位听众说，他的这番讲话是他所听到过的“最雄辩、最感人和最让人信服的”。他对委员们谈到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和它“与我们的独特关系、它对我国政府的独特态度以及信心”。他还谈到了日本努力想拖倒蒋介石，而“中国的抵抗就基于他的个性和影响力”，谈到了蒋介石答应让一个美国人担任他的总参谋长，还说史迪威相信他能够发挥他们的战斗力。他说，这笔贷款是抓住机会“在远东进行的一场豪赌……如果美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它就不值得赢得这场战争”。委员会的委员对此印象深刻，结果一个问题都没有问，次日众议院没有经过辩论就以唱票的方式通过了贷款。参议院也同样表示支持，史汀生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的当日就一致通过了这笔贷款。国会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国务院不无敬畏地评论说，美国第一次在“没有担保、没有利息以及没有美国对其花费施加任何控制”的情况下发放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政治

贷款。罗斯福告诉蒋介石说，这证明了“本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由衷的敬意和钦佩”。

与它之前和之后的很多贷款一样，这笔贷款的基础是必须维持蒋介石的权力——不管他有怎样的缺点——以便在中国维持一个对日战线。如果他倒台了，抗战恐怕就要崩溃，随后会发生内战，对此几乎所有的人——不管是蒋介石的支持者还是诋毁者——都表示同意。马格鲁德就是基于这一点解释《租借法案》的。在陆军部长雄辩地在国会发表演讲的当日，他发电报说中国无意发动任何攻势，也“永远不会成为巨大的军事财产”，“但是它的崩溃以及可供我们利用的领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负债”。

史迪威的态度介于马格鲁德冷冰冰的实用主义和罗斯福的乐观主义之间，但是没有卡尔森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史汀生的幻想——了解中国的史迪威准备回到那里去了。

他最后会见的人物之一是哈里·霍普金斯，他是在见完总统后在白宫见到霍普金斯的。史迪威的记录展示了他对霍普金斯看法的变化。他在便携式日记本中写到霍普金斯时说他是“怪怪的小矮个儿”。后来的笔记把这扩展成了“一个奇怪的侏儒般的人物（胃溃疡）……他身穿一件旧的红毛衣和街角店卖的那种鞋子，没有穿吊袜带，已经有八个星期没有理发了”。在次日给妻子温妮的信中霍普金斯又成了“一个和蔼的老农民”。



突然被推入世界问题和新近发现的中国问题之中的霍普金斯急于帮忙，尽管他对此了解的并不是非常精确。“我想你是准备指挥军队。”他说。接着又说，如果蒋介石提出让史迪威指挥“整个中国军队”，他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宣称蒋介石会尽力配合的。他发“蒋”这个音就像“昌”一样。听说罗斯福对此“极感兴趣”，如果有必要的话准备从航空公司的客运飞机中抽调出100架客机。他还提议把巨大的“诺曼底”（Normandie）号作为运输船放在这个战区使用，这激起了史迪威的兴趣。担心运输问题将成为严重问题的史迪威写道：“了不起的东西。”但史迪威刚刚离开白宫便听说，“诺曼底”号由于事故，再加上重大失职，正在纽约的港口燃烧；这样的巧合不能不看成是种兆头。“这是命运吗？”史迪威这样问自己。

他正面临的是种日益崩溃的局面。就在2月9日这一天，日军在毛淡棉稍事停顿后，集结了两个师总计1.8万人的兵力穿过了萨尔温江。他们现在距离锡当江仅有100英里（约160千米　），这是仰光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英国在缅甸南部有一个师的兵力，包括一个旅的英印军和一个旅的英缅军。这两个旅在日军攻击毛淡棉的过程中均遭受重创。他们共同组成了总计7000人的第十七师，并得到一支刚刚到达的印度旅的支援，他们放弃了对萨尔温江的防御并退守到锡当江前的阵地中。撤过萨尔温江本来可以让他们有机会阻滞敌人，但是这样一支力量悬殊又背水的部队所处的是一种典型的不宜作战的境地。

在他们身后穿过50英里（约80千米　）的平原便是仰光，虽然仰光有另外一支印度旅的支援，但是仰光居民已经在恐慌中逃离。印度人占据了仰光人口的一半，他们主要是数目不大的公务员、商人和城市劳工。这些绝望的人在没有足够食物和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开始步行回国。缅甸总共有100万印度人，输入他们是为了填补英国执政官员和缅甸农民之间的阶层，因此他们受到当地人的憎恨。商店和服务设施关闭，食物短缺，政府机构正在撤到缅甸北部的夏都眉苗，据报告难民中已经出现了霍乱。在政府机构解体之后，各种复杂的缅甸敌对势力开始出现，他们反对印度人、英国人或者相互敌视。

英国急切地等待两支还没有出发的中国军队的到来。2月2日，英军指挥官托马斯·赫顿（Thomas　Hutton）中将飞往腊戍会见正准备赶往印度的蒋介石，敦促他赶紧派兵。委员长答应配合。2月5日，韦维尔从2000英里（约3218千米　）外位于爪哇的指挥部飞到仰光，想看看是否

能拯救那里再度吃紧的局面。正从中东赶去增援新加坡的第七装甲旅被转调去援救仰光，因为对新加坡来说再多的部队也已经无济于事。英军现在已经撤出马来半岛并在新加坡集结，那里的部队有四个师。英军此刻士气低落，各种安排混乱不堪。韦维尔报告说：“日本大胆巧妙的战术以及掌握了制空权使英军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他自己从新加坡回来时，在黑暗中的码头上摔倒并伤了背部。

敌人在各条战线上均占据了主动。正如史迪威离开前所得知的，现在美国唯一可以采取的报复措施便是大胆地轰炸东京。在西方这最为屈辱的时刻，这种轰炸可以展示战斗决心和力量。总统建议从外蒙古起飞发动袭击，假如这不至于引起苏联的麻烦的话，但是阿诺德将军正在制订另一项计划。

史迪威及其参谋人员2月11日飞往迈阿密，并在两次起飞均未成功的情况下，2月13日第三次起飞成功离开美国。他有些吃惊地发现搭乘他飞机的还有一位平民女乘客，这就是《生活》杂志派遣的记者克莱尔·布斯·卢斯（Clare Boothe Luce）。这次旅程很不舒适，但是她却表现得很风趣，在那之后不久就发表了向美国公众介绍史迪威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一批中的一篇。乔大叔在飞机第三次试图起飞前写给妻子的信中说：“1942年将会一塌糊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挺过这一年，我们就会让情况好转。”

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和DC-3运输机的这次旅行花了十二天，包括一系列短程航线，经加勒比海到南美，从那里飞往非洲，再往北飞往开罗（“跟北京比——呸！”），然后往东飞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波斯，飞往印度中部的新德里。在2月13日到25日这段时间里，远东前线接二连三地经历了多个灾难。2月15日，由于新加坡的自来水供水中断，终于使这场军心涣散且指挥混乱的战役达到高潮，结果新加坡无条件投降。8万人的部队被关进了日本战俘营，其中一半是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其余是印度人。丘吉尔黯然承认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和最大规模的投降”。“天哪，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史迪威这样问，他在南非听说这个消息时既愤怒又不解。

如果德军突破中东而日军突破印度，那么德日合流的可怕前景将变成现实。缅甸变得至关重要。2月20日，他竭力想把正在从中东赶去保卫祖国澳大利亚的两个正在途中的澳大利亚师转调仰光。他给澳大利亚首相柯廷（John　Curtin）发报说：“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填补这个空隙了。”然而柯廷看到他自己国家的外层防御“已经消失或者正

在消失”，而且澳大利亚在新加坡损失了一个师，而另一个师则卷入了英军在希腊的惨败中，他已经没有理由对英军的作战保持信心，因此拒绝调遣他的部队。

2月23日，驻缅甸的英属印度旅在锡当江前线一败涂地。为了能撤退，他们炸毁了桥梁，结果有一个旅还在桥的另一边。现在日军和仰光之间只剩下一支已经溃败的部队。（史迪威在开罗写道：“世界正在崩溃。”）考虑到日本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锡当江失守的当日就解散了设在爪哇的ABDA（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韦维尔也回到印度，他几乎是在史迪威到达印度的同一天也到了那里。2月26日到28日爆发了爪哇海战，结果以ABDA（美英荷澳）联合海军部队的失败而告终。现在爪哇失守已经不可避免，澳大利亚海岸也完全暴露给敌人了。

“这里人心惶惶，”史迪威为了应付检查官有意在家书中这样轻描淡写，“以后可能会有麻烦。”

---

[1] 一个中国军跟美国军类似但是较小，由三个师组成，每个师名义上的兵力有9000人，但实际数目平均在6000人到7000人之间。

[2] 后来他宣称接受了两个师，但是当时在场的人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3] 典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诗《老船夫》（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老船夫讲到船驶向南极时遭遇风暴并有一只白头翁绕行。风暴结束后白头翁仍然随行，但是老船夫不可思议地射杀了这只鸟。灾祸开始降临船上。为了赎罪，船夫将这只鸟挂在脖颈上，后受到宽恕。——译者注

[4] 布莱多克（Edward Braddock，1695—1755），英国将军，1755年在美国匹兹堡附近被法军和印第安人击败。——译者注

[5] 此时的美国陆军包括参谋人员、技术人员和空军。——译者注

[6] 阿诺德将军的绰号为“Hap”（哈普），这是Happy的简写。——译者注

第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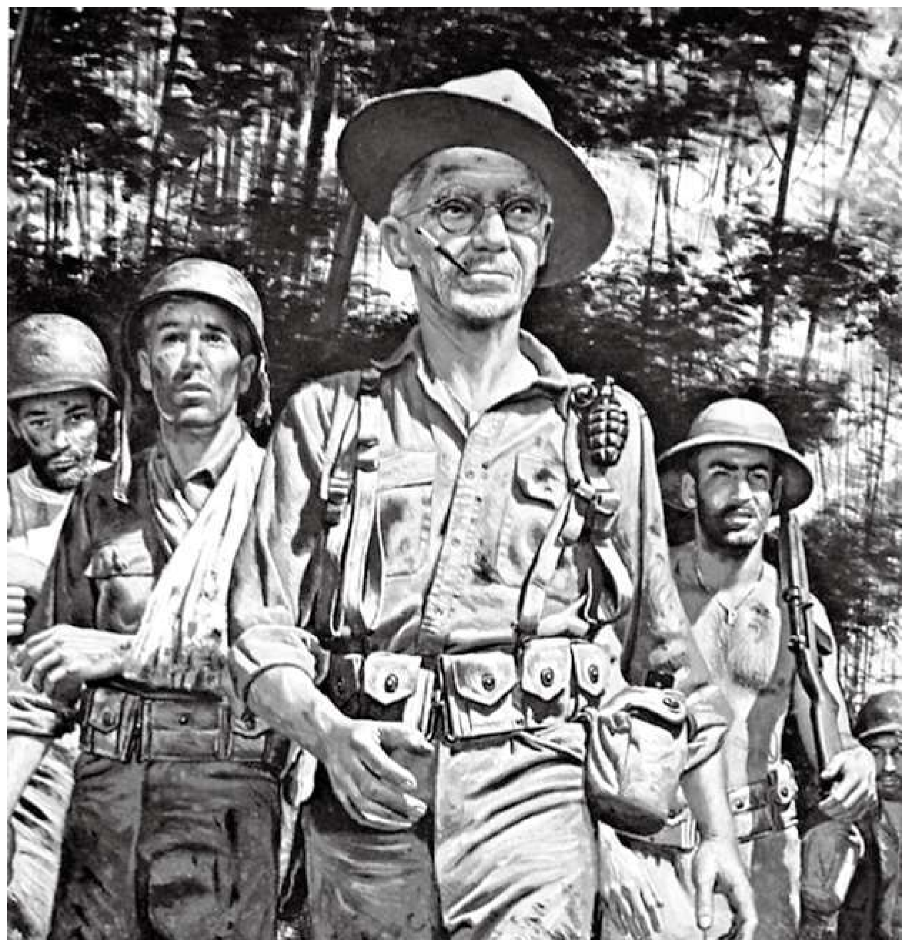
“一顿狠揍”

1942年3月—5月

缅甸是不是能守住以保证进入中国的大门敞开，还是会重蹈新加坡的覆辙，这是现在的关键问题。事态的发展给了史迪威第二次担任作战指挥的机会。虽然这并不是他使命的最初或者主要目的，声称让他统率中国派往缅甸的两个军无非是蒋介石做出的一个友好姿态，但是史迪威还是很想抓住这次机会。他知道，如果由中国人自己做主，他们是不会在缅甸发动必要的进攻的。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担任指挥会不会被批准。

新德里是个于20世纪20年代为显示英国统治者的威风而建造的印度都城，气派、宽敞、浓荫覆盖；在这里史迪威参加了一次总司令部会议；司令部“极大，足够我们整个陆军部用的”。满满一屋子的中将、少将和准将，而前线只有区区三个旅，显得很不相称。他不无道理地怀疑这次聚会是出他的洋相的，因为英国人觉得这很可笑：一个官阶很高的美国将军接受一项使命，可手下却没有部队可供指挥。他开始询问有关缅甸的局势，却发现“除了军需长大家都一无所知”。参谋部似乎没有进攻计划，没有同中国人的协同战略，也没有有关敌人实力或意图的情报。“英国人连一个俘虏都还没抓到。”

史迪威继续往东前往加尔各答，这个从前的都城熙熙攘攘、肮脏不堪，是从印度东海岸去缅甸的起点。他在这里等待2月28日从后来陷落的爪哇飞过来的韦维尔。韦维尔“疲惫、沮丧，简直被打垮了”。在加尔各答旧政府楼阴森的餐厅里他一边吃饭，一边告诉史迪威这三个月来失败的经过。陪同他来的是美国空军少将刘易斯·布里尔顿（Lewis Brereton），他曾在爪哇任职，现在准备指挥驻扎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归史迪威统辖。布里尔顿自视甚高，还拿着一条猎鞭。“他妈的一个空军军官拿一条猎鞭干什么？也许是赶鸟用的？”史迪威对多恩嘀咕说。几个月后史迪威乘坐布里尔顿将军的飞机，跨入机舱时他瞠目结舌：飞机上铺的竟然是一块剪裁得正合适的精美的波斯地毯。



史迪威带领众人步行出缅甸的画作

韦维尔和史迪威相遇的那天，在孟加拉湾那边的缅甸，政府正在撤离仰光。现在必须北迁，因为日本人正在从锡当江推进，可能抵达铁路线并切断它，从而使仰光成为一座与外界割断联系的孤城。英军原来就没有打算对他们驻扎的这个国家进行认真防御，因此也就不可能指望他们能阻止敌人。新加坡陷落三天后艾伦·布鲁克才疲惫不堪地承认："缅甸情况不妙。如果部队不能够比现在打得更好，我们失去帝国只能是活该。"五天之后，锡当桥大溃败加快了事态的发展。印度第十七师仓皇撤出，一个旅几乎完全被歼灭，幸存者也没有了武器，是在桥被炸掉以后渡河过来的。

建立大英帝国原是为了服务英国，而不是反过来。跟从中东仓促撤回到缅甸的那两个旅的情况一样，印度军队所接受的训练原本是为了对德军展开沙漠战，而不是为了在他们本国服役，因为那样他们很可能受

到危险的亚洲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由于英军的作战计划里根本没有考虑到马来亚或者缅甸会遭受陆地进攻，所以也就根本没有对他们进行丛林战训练。这些军队就像在路易斯安那演习时那些“离不开卡车”的美军一样，完全依赖于交通工具和道路，面对日本到处设置路障的战术一筹莫展。缅甸和印度之间没有公路联系，所以不可能通过陆地对他们增援或者提供补给。这种没有公路的情况正合了一些人的意。强大的缅印航运公司想继续垄断加尔各答和仰光之间的贸易，而驻印英军也正想把缅甸作为一个缓冲地。军方认为：“疾病流行、丛林密布的缅甸山区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要发动攻势穿越过去，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

仰光弥漫着浓浓的燃烧橡胶的味道，这是在销毁租借物资存货，包括972辆尚未组装的卡车和5000只轮胎。在锡当战役之后美国驻华代表团人员已经尽可能将物资转移，但是让中国人痛心的是有900多辆卡车和吉普车、1000多挺机枪以及其他武器转给了英军。政府部门开始转向缅甸北部，充当警察和文职人员的印度籍人正在逃离，而缅甸雇员已经开始消融在人群中。取而代之的是纵火抢掠、秘密策反集团和夜里到处转悠的强盗。政府唯一还剩下的就是爆破队，只等总督最后一声令下就准备炸毁码头。

在总督府的最后一个晚上，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Reginald Dorman-Smith）爵士和他残余的工作人员在凄凉的气氛中孤独地进了晚餐。原先有110名仆人，现在还剩下一名厨师和一名管事了。大厦中没有了身材高大的，穿着白色长袍、外罩紫红色和金色背心的印度侍者。过去他们唯一的任务便是像无声的雕塑一般站立着等待吩咐，显示帝国的威风。晚餐后总督及其助手还有其他一两个人在历任总督的画像下打台球。画像中的那些平静而冷漠的眼神让这个助手感到了一些不快。他拿起一个球说：“爵士，您不觉得我们也不该让他们落入小日本之手？”说完便将球朝画像砸去。或者是出于泄气，或者是隐隐感觉他们的统治要结束了，其他人也纷纷仿效，开始用台球击打破碎的画布。“这简直是一场大屠杀。”总督回来时说。他自然是指画像，可是对依靠其威信统治，但现在却威风扫地的大英帝国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缅甸，英国人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虽然在缅甸积极亲日的团体不超过10%，但是这里暗中有种对日本人的敬佩，认为终于有个亚洲民族可以起来对抗西方了。正如缅甸总理吴苏（U　Saw）曾经说过的：“自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之后，我们亚洲人的日子就没有好过。”缅甸的山民如钦族（Chins）、克钦族（Kachins）和克伦族（Karens）人往

往友善而好战，与他们不同的是，南部缅甸人总的说来性情冷淡，不喜欢参与争斗。民族运动在要求缅甸人参政方面得到了一些让步，但是英国人拒绝答应战后让缅甸独立，甚至享有自治权利也不行。显然，如果他们打完日本后要放弃帝国统治，那打日本人也就毫无意义了。

在印度，借助日本所造成的威胁，要求独立的呼声正在达到又一个高潮。罗斯福非常担心民众会对日本人大门敞开，因此尽管丘吉尔在12月曾经对罗斯福的提议大为光火，他还是再次敦促英国对印度人的要求做出一些让步。同时，急于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蒋介石也在2月赶在史迪威到达前访问了印度，试图联合印度人抗日，但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结果。印度国大党非但没有被蒋介石所说服，反而想利用他给英国施加压力。甘地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盟国对待他的态度来看，蒋介石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甘地说："他们永远不可能自愿地平等对待我们印度人。嗨，他们甚至不让你们的国家参加谈判。"蒋介石被刺痛了，因为这个时候他正在为不让中国参加主管军火和物资分配的华盛顿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s Control Board）而忧心忡忡呢。他在经宋子文转给美国总统的信中引用了甘地的话，并接着说："如果我们在艰难的战争时期就得到如此对待，那么在和平会谈时我们的地位又会怎样？"这样的诘问并不太有说服力，因为，尽管美国总统思想上愿意平等对待蒋介石，但是那还没有到让蒋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的地步。

至于印度，蒋介石指示中国驻伦敦大使转告丘吉尔："我个人对印度的军事、政治形势感到震惊。"并说如果事情得不到立刻解决，那么日本进攻印度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他认为要想避免这种结局，只能主动将实权交给印度人。这个建议并没有受到丘吉尔的欢迎。

史迪威一行于3月3日离开加尔各答，以完成去重庆的最后一段行程。他将在重庆建立司令部，向蒋介石汇报，而且还希望能够明确他对中国派驻缅甸的第五军和第六军的指挥问题。第六军是由不满员各师组成的二流部队，正在缓慢南下，但是到3月1日它还没有抵达掸邦；它按计划将要接替准备从那里撤出的缅甸第一师。第五军要强得多，包括一个满员摩托化师再加上炮兵，因此不管中国多么急切地想守住缅甸，蒋介石并不愿意放手这个军。整个2月他都在拖延，直到3月1日他才命令第五军的一个师出发，但是其他两个师仍然按兵不动。

史迪威第一阶段的行程是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他飞过了开阔的、水道纵横的和暗褐色的布拉马普特拉（Brahmaputra）河三角洲和阿萨姆邦郁郁苍苍的山岭，并在飞越缅甸的黑黝黝的山脉后抵达腊戌。在专供

外国人聚会用的传教士建筑波特大楼（Porter　House）里他遇见了蒋介石。蒋由夫人陪同，是专门为缅甸战役发布指示来的。蒋委员长热情地对史迪威表示欢迎，但是跟史迪威的谈话很简短。他跟史迪威上次见到他相比变化不大，外观还是跟抛光的石头一样坚硬、光滑，看不出经历过什么磨难或者忧虑。他强装笑脸，但眼神里流露了真情。他身着笔挺的、扣子扣得很高的咔叽军服，只有在家里他才会换上一套普通的黑色中国长衫，为了掩饰白发，他剃了光头。史迪威默默观察着，像其他独裁者一样，蒋介石喜欢到台上演讲，于是他便走向波特大楼的门廊开始对第五和第六军的指挥官和参谋们发表讲话。他们紧张地肃立着，聚精会神地聆听首长那尖利、短促、时断时续的讲话。

在蒋委员长的随从里史迪威见到了老友商震将军——他是总参谋部对外联络局局长，现负责与中国盟国的军事联系。商震担任这个任务非常合适：他直截了当又性情随和，史迪威跟他交谈不必绕弯子。不过商震并不属于蒋委员长的亲信，实际上他们彼此并无好感，经历也很不相同。商震出身于官宦世家，直到1927年北伐时才加入现政权，但仍然有些超然，比如他对史迪威说蒋委员长“太自私”。商震之所以很有影响，是因为他是高级将领中唯一能够熟练说英语的，其他人都必须使用翻译。蒋介石随行人员中另一位老相识是新闻局副局长董显光——他毕业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负责处理与媒体的关系，起草各种言过其实的公告。史迪威对他没有好感，曾经写道，他“圆滑，虚伪，不断表示我的到来让他多么高兴”。

在停留了一个小时之后史迪威继续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中国。这架历史很久的商业航空公司使用DC-3运输机，驾驶员中只有一名合格的中国驾驶员，其余均为美国人。旅程的第一段是沿着滇缅公路上空飞行，两个小时后到达昆明，在那里史迪威住在陈纳德的驻地。第二天早晨当陈纳德飞来之后，史迪威开始第一次商谈有关陈纳德指挥的问题。“跟他进行了一番长谈后他平静下来。他同意（把美国志愿队）并入（美国空军），并说他愿意服从我指挥。真是如释重负……他没有问题。”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第一个麻烦来自飞行员而不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反对并入。

又经过了两个小时的颠簸飞行，其间“中国乘客都呕吐了”，之后他们一行终于到达重庆。他们走下飞机，踏上2000英尺（约609米　　）长的、位于长江边上的混凝土降落跑道。史迪威“又艰难爬上”365级石阶后才到达安排给他的住宅——这是宋子文建造的西式楼房，原来由拉铁

摩尔住，现在拉铁摩尔已经回美国。重庆位于伸入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一个岬角上，史迪威的屋子在靠嘉陵江一面，一层楼跟街面齐平，其余三层可以俯视江面，就像旧金山的房子一样。有一个屋顶阳台，上面是一些布满尘土的花和一个游泳池，那里景观壮丽，可以看到江上往来频繁的船只。后来这里还配备了戴笠提供的服务人员。戴笠是中国式的、集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和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于一身的人物。

重庆有了一段悲壮的历史：它一年有三个季节遭到无情轰炸，却没有英国皇家空军那样的力量可以保护其公民或者教训敌人。人们所依靠的只是在岩石中挖凿的防空洞和在自由中国边缘地带所设置的烽火台式的接力报警系统。这些年来他们独立支撑着，很有尊严地继续抵抗，但是痛苦和厌倦都在增加。由于战时大量人员涌入，重庆的设施捉襟见肘，跟过去比更加不舒服、不卫生，供给更缺乏——而天气还是一如既往：夏天炎热潮湿，其他季节老是下雨，到处泥泞不堪。遭到炮火袭击的房屋摇摇欲坠，到处漏水。随着人口的增加到处污秽不堪，臭气熏天，老鼠夜间到处乱跑。职员和工人收入很低，营养也很不好，以至于有些美国记者相信“财政部长之下再也找不到肥胖的中国人”。通货膨胀加剧（史迪威曾经写道“苦力动辄要50块”），官员们则吃得很好，大发横财，而政府则毫无节制和计划地发行纸币。国民党困于形势，早就不可能完成其既定目标了，于是他们跟清朝最后那些满族人一样就想着一件事——维持权力——至于各种接踵而来的问题他们早就无能为力了。

由于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很多商人都已经破产，而他们是最具有现代思想和倾向西方的集团，也是政府最强有力的支持者。随着他们的势力日益削弱，国民党极右翼开始成长。由于失去了资本和生产方式，这导致了通货膨胀，工薪阶层也失去了生计，只能靠日渐孳生的黑市投机和贪污受贿过活。由于节节败退，军队不但武器装备缺乏，而且士气低落，指挥软弱无力，这使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苛捐杂税和兵役让乡村贫困凋敝。不断爆发针对地主和官员的武装叛乱。一场灾难性的大饥荒首先出现在河南。不满导致镇压，而镇压又导致更多不满，这助长了对立，很多人开始倾向共产党。政府由于感到不稳定而惶惶不安。重庆和昆明街头拐角处的混凝土机枪掩体不是用来对抗日本人的。1937年到1938年间那场了不起的爱国主义高潮曾经让日本人无计可施，但是现在已经由于人们疲惫、受到压制或者有人投机而消退了。蒋介石的魅力和他超人的政治技巧（史迪威说他是“20世纪最为精明的政治人物”，“不这样他就无法生存下去”），使得国民党能

够继续维持下去；它无视日益扩展的溃烂，用逃避来麻醉自己。



空袭下的重庆

在重庆有些美国人，特别是早期曾对国民党怀有憧憬的那些人，用他们其中一位的话说就是，后来对蒋介石及其政府产生了“强烈的厌恶，甚至是仇恨”。另外一些人，比如高思大使——正如史迪威在拜访他时所发现的——则只是感到“厌倦了”。这位前驻沪总领事曾经因为对抗日本人而出名，他在这个国家做了三十年的领事工作，但并没有变成在某一方面有强烈情绪的亲华人士。他的很多领馆官员会说甚至会读中文，加之他们交游广泛，结果他的领馆对中国事务是最为了解的，但他也常常被华盛顿的决策者和特使们所忽视。他不像职业外交官那样彬彬有礼、和颜悦色，由于他一直做领事而且不讨人喜欢，他未能像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和约瑟夫·格鲁那样挤进白宫。他一本正经，其貌不扬，抽起雪茄来一根接一根。他不能容忍东方人转弯抹角讨好的样子，是个“很难糊弄，思想深刻，直言不讳”的人。他老喜欢说中国“对我们来说价值很小”，但却可能成为“大包袱”。中国人觉得这个西方人难以琢磨，叫他“铁面如来佛”，不喜欢他，正像他一位同僚说的，“因为他态度冷淡，老说不”。

史迪威在重庆遇见的老朋友还有曾经作为《时代》记者陪他回到缅甸的杰克·贝尔登，以及国防部长兼任总参谋长何应钦，对何他曾经正式拜访过。何应钦在革命前在东京讲武堂学习时跟蒋介石同学，后来在黄埔军校跟他一同工作，北伐战争时他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当时他在部队中的绰号是“老奶奶”），后来他们一直在一起。他身材矮小、结实，态度圆滑，一张圆脸老挂着笑容，长着一张小圆嘴巴，还戴着一副圆眼镜。他只效忠蒋介石，认为他作为总参谋长的任务就是通过操纵各个派系、控制供给和资金让部队保持忠诚。尽管他十五年来一直恪尽职守，成效不小，但是按西方的标准看，他没有积累多少可服务于他上级的现代军事知识。必须同他进行会谈，而用多恩的话说，这些会谈不过是不断地“说些模棱两可的话，不住地喝茶”而已，仿佛何应钦用客套、繁文缛节和拖延筑起了一面墙似的。史迪威3月5日见他时觉得他“很让人愉快”，他们是用汉语交谈的。

3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报到，当时有关指挥的问题让他“精神负担很重”。史迪威认为可以通过进攻夺回缅甸，同时还认为发动攻势在达成关键军事目标的同时，还可以让中国人恢复自信，此外这对他失去“运动员”行动的指挥权也是一种补偿。他发现蒋介石的确想让他在缅甸指挥，而且似乎愿意打，这让史迪威如释重负。蒋介石对英军的动机和意图“疑虑极大”，同时也“对英军不断撤退和无所作为感到厌倦”。史迪威告诉蒋介石，“我们跟他（蒋介石　）是一伙的，愿意听从他的安排”。史迪威还对蒋夫人保证说陈纳德不会被冷落。她对陈纳德的地位很担心，还告诉史迪威说陈纳德已经按规定辞职。会谈结束时，蒋介石同意第二天为指挥缅甸作战设立参谋长联席会议，史迪威离开时认为他可以回到缅甸去开战了。“现在我不必每天醒来时感到郁闷，并琢磨怎么能为他妈的自己的存在找点儿理由了……我不清楚自己算是什么，不过商震说我现在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伤兵和娃娃兵

可是后面两天毫无进展，不断跟中国人会谈，可是会谈的结果总是各种形式的可怕“等待”。在等待的时候，史迪威为缅甸的战略和中国行动拟订了计划。如果仰光失守（在他制订计划的3月7日之后一天，日本人进入仰光），他考虑可以让中国第五军和英军一道通过发动强大的反攻把仰光重新夺回。一旦不成功，联军可以退至曼德勒以东的高地，那样可以威胁任何企图北进日军的侧翼，并固守缅甸北部。最重要的是，要“制订出英国人可以接受的计划”，但问题是这些计划只能凭空制订。没有人知道日本有多少军队投向缅甸，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在准备发动进攻，还是已经很虚弱，不可能再发动进攻。这些估计都仅仅是猜测而已。

在中国工作的重点是启动训练30个师的计划，可是到现在训练哪些师还没有确定。史迪威想在保证缅甸安全之后在中国发动攻势，清除汉口的敌人，这“可以让我们处于直接打击日本本土的距离内”。他想通过双重包围夺取汉口，由美国空军对中国地面部队提供支持。他在临行前交给马歇尔的长期战略计划中写道，“当务之急是迅速建立空中支持”。

同样需要优先考虑的还有建立一支有效的地面部队。

要把松散、羸弱的中国军队造就成一支善战的力量，唯一的有利条件便是中国士兵吃苦耐劳。中国军事体系的所有其他因素都是不利的。中国被分成有独立指挥权的12个战区，这是为了使日本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结果这增强了地方势力，军队长久被视作政治砝码，甚至成了战区司令的私人资本。这还使实力最强的各师分散各处，结果即便现在有抵抗日军的意愿，却无法组织一支强大的力量。现在缺少抵抗日军的意愿，因为中国人觉得他们打日本人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现在该轮到别人打了。部分还因为地方势力想保存其军队的实力，而中央政府则想把军队用来对付共产党，最后还由于缺少自信。“中国人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打败日本人。”史迪威这样写道。

中国名义上武装部队的人数接近300万，分成约300个师或其他军事单位。通常的建制是三三制，即三个团组成一个师，三个师组成一个军，三个军组成一个集团军，而且通常三个集团军组成一个战区。各师质量差别很大，其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往往在武器、装备和制服上都是配备最好的。这些部队往往有靴子和绑腿，但是中央政府的供给体系并不能惠及全体，那些普通的中国士兵只能穿着草鞋行军，睡觉时每五个人合用一条毯子。士兵腰带上别着两颗手榴弹，脖子上挂着一条装满大米的蓝色长袋，那是士兵作战时唯一的口粮。招募是通过抓壮丁完成的，这榨干了农村的劳动力。可以通过缴纳100元法币或者定期缴纳大米而不必入伍。去新兵营地的途中，这些壮丁是被绳子捆在一起的。基本训练历时三周。师往往不满员，因为军饷先整个交给指挥官，这样他付给士兵的越少——当然这是有限度的——他获利的也就越大。一个师的总人数并不能代表其武装实力，因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负责帮助运输的苦力。

由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所造成的减员很大，有时一年里可以达到40%甚至更高，因此一支7000人的师每年需要新招募3000人。由于收入低，又不能按时发放，结果军官也有很多开小差的。食物定量是每人每天25盎司（约700克　）大米，此外还有些咸菜或者红辣椒——这些本是为了补充营养的，可是咸菜中的维生素已经被破坏了，而通常发放的两三年的陈大米则无论是维生素还是蛋白质都很少。每个士兵的军饷平均每月为16—18元，其中8—10元要作为伙食费扣掉。由于通货膨胀加剧，士兵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用剩下的钱买豆腐、油脂、青菜或者偶尔买点鱼或肉之类改善伙食。甚至上尉和少校每月145—175元的军饷也难以

保证充分的营养。士兵们每天两次在一个大锅里盛饭吃，留给他们吃饭的时间只有三分钟。他们吃饭时狼吞虎咽，根本没有好好咀嚼，往往强壮的人吃得多，而弱小的变得更加虚弱。部队医院的病人中有60%—70%都患有因饥饿导致的水肿以及其他疾病，而饿死更是常事，特别是那些运输连队的士兵。看病时他们经常说："我不觉得疼，可就是没力气。"往往在视察前夕医院先把重病号藏起来。在部队转移的时候，往往一路上到处都是尸体。

像痢疾之类的传染病、天花以及虱子传播的回归热和斑疹伤寒频繁发作。尽管规定必须为新兵建立除虱站，但是长官们常常省掉这个步骤，因为这需要消耗燃料，要多花时间多消耗粮食，这都是额外开销。出于同样原因，要求耕地种菜的命令也常常被违背，因为指挥官都不愿意花钱种菜，怕万一调防后只能由别的部队坐享其成了。中国最了不起的人之一、中国红十字协会的林可胜（Robert Kho-seng Lim）[1] 博士负责建立的医疗队只能勉强触及表面问题；由于政治上的压力，林博士于1943年离开。多数士兵没有卫生习惯，甚至很多文职或军官也不清楚卫生和疾病之间的关系。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挖茅坑，烧开水需要用燃料，这又是一种浪费。

部队医院人员不足，设备很差。由于缺少道路以及救护车，伤员往往用担架从战场抬出来，如果抬担架者力气不济，那么这些伤员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有的干脆就死在受伤的地方。红十字会医疗队随同各个师奔赴前线，但往往他们先要跟指挥员的无知或者抵触做斗争，因为这些指挥员往往觉得用不着急着救人，正如其中一位说的"中国有的是人"。这种神秘的现象固然让人欣慰，但事实上，尽管人多但还是不能满足军队和农业的需求。也有些指挥官真正关心自己部队的待遇。驻宜昌前线的十八师的一个姓罗的将军发现，在四年里该师的非战斗死亡人数已经相当于他的整个师的人数，于是他认为不能让那些还没有遭遇日本人就死去的士兵的父母"骂我是敌人"。他召来医疗队，慢慢地将他团里的死亡和生病率降低了60%—75%。开始时他并不知道在当地肆虐的回归热是经虱子传播的。史迪威想为那30个师做的就是类似这种的努力，此外还有增加食品，定时发饷以及给予武器和训练。

在重庆等到第三天之后终于传达了指挥计划，结果却表明"只是帮闲，没有实权"。史迪威被置于与其他中国指挥官同等的地位。斗争从那一刻开始了，一直到最后酿成危机。参谋部的计划似乎体现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但是蒋介石说话时就好像史迪威统辖中国远征军是已经得到

认可的。史迪威依据这口头证据行事，不过他头脑中隐隐觉得这不太可靠。

在蒋介石住处为他举办的晚宴上继续进行讨论。蒋介石的住宅位于黄山，这是位于重庆以南10英里（约16千米　　）的郁郁葱葱的高山，可以俯视重庆和两个河谷。客人中除了商震和何应钦之外，还有军械署长俞大维，他有教养、善思考，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此外还有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两位是桂系将军，多年来并不是一直忠于蒋介石的。他们“寡言少语，若有所思”。白崇禧现在是负责训练的副总参谋长；作为一个没有自己军队的将军，他越来越接近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对立是一直有的。客人们都正襟危坐，说话时都压低声音，都想避开穿着靴子的特工人员从红屏风下偷窥。蒋委员长夫妇正式进入，接着是祝酒。史迪威用汉语答谢时重复了罗斯福总统在史迪威临行时的话。

宴会后开始就战役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讨论。史迪威怀着轻蔑听完了对“蒋氏外行战术”的阐释，其精髓是“谨慎”。很明显，蒋介石把第五和第六军看成他的精锐之师，对冒险让这两支部队上阵他顾虑重重，因为他担心英国人会“跑掉”。况且，他说，进行防御需要三个中国师对付一个日本师，而要展开进攻这个比例是5：1，因此，除非他明确知道日军是否有援军，否则他不愿意发起进攻。史迪威提出“让我们在他们集结之前动手”的建议被否决了。要让敌人采取主动，如果“日本人不动，那我们就可以动”。要避免集中兵力，因为这可能使几个师被一举击败，但是，假如只有一个师被消灭的话，那么其余的师还在。要保持纵深配备，这是说各师要分别相距50英里（约80千米　　）纵向排开。这便是蒋介石的原则，跟史迪威的恰恰相反。

蒋介石坚持说他不会接受英军的命令，并说要电告罗斯福，要罗斯福告诉丘吉尔必须由史迪威指挥联军。史迪威提醒他说，重新夺取仰光是出于“我们”的考虑，而“英军需要的不过是印度前面的一堵墙罢了”，但是蒋介石还是不愿意立即行动。他要史迪威回到缅甸，确定英国人的意图，研究当地的地形，并一定要本着纵深配备的精神。

“这算什么指令。一团糟。他们多么讨厌英国佬，而我又多么轻信。”史迪威这样写道，接着还不无眼力地说：“也许日本鬼子会攻击我们，这样我们的难题就都解决了。”在次日进行的进一步交谈中，他承认就中国人的个性和其军事局限性而言，蒋介石“很有道理”。史迪威竭尽全力试图圆滑一些：“我重复了指示，重申了他讲话的要点。”他觉得尽

管中国人有很多局限性，但是就中国人“把军队交给一个他们并不熟悉的老毛子这一点来说，他们还是很了不起的”。蒋介石的确在这次晚餐后的次日电告罗斯福，要求任命史迪威为缅甸联军总司令。夹在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罗斯福回答说此事“极为微妙”，并建议是否可能让史迪威在缅甸北部指挥，而南部由驻守英军负责。

3月11日，也就是史迪威离开的那一天，蒋介石口头向他保证，“今天上午我已经下令由你指挥第五军和第六军”。他还说两军军长杜聿明将军、甘丽初将军以及代理参谋长林蔚将军都受命“完全只接受你的指挥”。史迪威意识到他的指挥是“受到限制的，这些限制可能摆脱，也可能摆脱不了。很可能摆脱不了”。他习惯写下最悲观的情况，不过他跟其他人一样，并不相信情况真会这么悲观。

史迪威回到缅甸的时候，被击溃的印度第十七师已经从仰光撤退到伊洛瓦底江边的卑谬（Prome）。这时中国第五军的先头师即第二〇〇摩托化师已经到达锡当的东吁（Toungoo），大约跟英军的位置相当。

联军的想法——因为这还不确定，算不上是计划——是在仰光以北150英里（约241千米　）下缅的卑谬和东吁守住一道防线。沿水平方向采取联合行动有一些困难，因为缅甸的交通都是沿着三个河谷纵向进行的。这些河流分别是位于西部的伊洛瓦底江和钦敦江，位于中部的锡当和伊洛瓦底江上游，以及位于东部的宽阔的萨尔温江。萨尔温江跟长江一样发源于遥远的西藏高原。古都曼德勒大致位于缅甸中部，在伊洛瓦底江岸边，而且处在一条铁路的岔路口上：向西通往密支那（Myitkyina），向东通往眉苗（Maymyo）和腊戍，在那里又与滇缅公路相通。蒋介石还没有让第五军的另外两个师即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出发，不过史迪威已经得到他的允诺，一旦食物供给安排好就让他们出发，一直到曼德勒。

史迪威将指挥部设在眉苗，这是个山区避暑地和夏都，街道很脏，但是已经撤出的英国政府的官邸里则有草坪和花园。史迪威和他的参谋们住在浸礼会传教士的红砖房子里，房子上爬满了紫色九重葛，院子里还种了玫瑰、桉树和忍冬。

一讲战争史人们就爱讲指挥官如何如何，但是指挥官是要依靠参谋的。史迪威的参谋参差不齐——跟在任何战场中一样，有些能干，有些就不行了。据说，有人谈起一直担任史迪威的参谋长的赫恩将军时说，如果你想干成什么事，那就得找别人。但是忠诚和可靠弥补了他的缺点。曾担任第五军和第六军战术顾问与联络员的作战军官有一位是乔治·

斯莱尼上校，一个英国同事说他是“陆军有史以来最好的炮兵军官”。参加过中国语言培训项目的几个毕业学员派上了大用场，此外还有首席翻译曾士奎上校的帮助。曾士奎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曾在1937年淞沪抗战时由于作战勇敢立下战功，他具有中国人所特有的品质，既有世故和风度，又有很强的个性，后来在史迪威在华期间一直是对他帮助很大的亲密助手。这些参谋人员之前都没有来过缅甸，对当地的食物、道路、货币、交通、政治状况或者他们置身其中的复杂环境中的任何其他因素都不了解。总体说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史迪威的参谋班子就他们面对的任务来说能力非常有限。一位观察家认为，他们反映了“二十年在养尊处优中担任军职和老是坐在乡村俱乐部的影响”。负责为中国人提供运输工具和供给的英军不无道理地认为，美国人根本没有能力驾驭这6个（后来是9个）中国师。史迪威反过来认为英国人无法与中国人共事，“因为他们瞧不起中国人”。

在佛莱格斯塔夫大厦（Flagstaff House）这幢位于山上的巍峨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里，装在银质杯子里的啤酒随时准备待客。这是英军司令部，有1名四星上将、1名中将、5名少将、18名准将和250名参谋官。可是他们所指挥的作战部队则已经缩减很多，原来两个师外加一个装甲旅的兵力现在能作战的还不到1.5万人。他们身着短裤，可是尽管当时的局势岌岌可危，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起草史迪威说的“利文沃思式命令”。

史迪威去佛莱格斯塔夫大厦对总督（史迪威在日记中的记载是多尔曼－史密斯）做了礼节性拜访。史密斯听到一个美国人自称是中国驻缅军队司令很是吃惊。后来他更加迷惑了，因为第五军的杜聿明将军后来也这样介绍自己。当后来多尔曼－史密斯问杜聿明怎么可以两个人担任同一职位时，杜聿明笑着回答说：“哦，阁下，这个美国将军只是自以为是在指挥罢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让美国参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在名义上担任一些指挥职务。只要实权在我们手里，这无伤大雅。”

杜聿明有关当时局势的这番说法反映了中西方之间不断出现的问题：双方有关局势的看法谁的更真实？究竟谁想让谁继续参战？史迪威职位的实质是什么？这些疑问使得他在缅甸的指挥像皮兰德娄（Pirandello）的戏剧一样变得很复杂。

就在他忙于跟中国的将军们建立联系的时候，眉苗又出现了一位新的指挥官，这就是敦刻尔克的英雄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爵士——他是典型的威武的皇家禁卫军军官模样，是一位

伯爵的幼子，他原来准备担任“运动员”行动英国统帅，现在是来接替韦维尔的驻缅英军司令职务，而韦维尔已经转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丘吉尔曾经写道：“如果我们不能派一支军队去，我们至少可以派一个人去”，尽管“我还从来没有派一个将军去完成一件比这更加无望的任务”。韦维尔已经汇报说他对守住缅甸“疑虑很大”。亚历山大在危急时刻从容镇定是出了名的，这最初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尉，后来他在危难时刻将英军撤出敦克尔刻时又再次展示了他的这种素质。据说当时海岸上炮火纷飞，到处人心惶惶，而亚历山大“皮靴铿亮，马裤笔挺”，一边吃早饭一边夸奖果酱好吃。丘吉尔说“他让周围充满了信心”，可是这个时候再对缅甸防御注入信心已经不可能了。

失去了公路或者仰光，即便有增援的武器和部队也无法运送进来。3月9日，也就是仰光陷落的次日，爪哇联军投降，这使得又有1.3万名联军士兵被关进战俘营或被迫服苦役。日本广播已经宣布即将进攻印度。这天正好距离珍珠港事件三个月，是西方与东方关系史中最为屈辱的几个月。各种夸张的宣言和鼓舞人心的大标题模糊了美国公众对现实的认识，但对于战场上的士兵就并非如此了，他们正遭受轰炸，伤亡严重，节节败退。无论对他们的领袖、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事业（尽管对他们大多数来说算不上是他们的事业）来说，他们都已丧失了信心。士兵们为了捍卫家园可以奋战到底，但是在缅甸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了。应该在缅甸背水一战的只有缅甸人，而这些人现在的唯一希望就是交战各方赶快走开。派亚历山大去不过是个空洞的姿态而已。


亚历山大

史迪威对英国佬本来就充满敌意，现在这种情绪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他看到亚历山大个儿头不大，鼻子又大又尖，眼睛突出，留着禁卫军的胡子，眼神在史迪威看来有些居高临下的意思。亚历山大“让我在外面一直等到商震到来……他很吃惊是我——一个他妈的区区美国佬——在指挥中国军队。‘奇怪！’他打量我的神情就好像我是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开始探讨指挥方式的时候，亚历山大“没有表情地盯着我”。史迪威不想被英国人这种冷冰冰的眼神吓着，于是也同样“不客气地瞪他一眼”。与此同时，他发电报给蒋介石，让他派第二十二师和第九

十六师去曼德勒以南130英里（约209千米　）的彬马那（Pyinmana）以支援在东吁正遭受攻击的第二〇〇师。还在等待答复的时候，他就行动起来了，命令林蔚开始调动部队。英国参谋部得知了这个行动后感到“满意，态度友好了”，而亚历山大更是“仿佛换了一个人，笑容可掬，开玩笑说我怎么把他的中国部队给拉走了”。关系缓和了，但是亚历山大的参谋长温特顿（T. J. W. Winterton）少将是个例外，此人傲慢无礼，史迪威管他叫“普拉什巴顿”（Plushbottom），这是穆恩·穆林斯（Moon Mullins）漫画里的角色。他给马歇尔发电报说合作问题已经安排妥当，而且“指挥问题应当不至影响作战”。史迪威认为潘兴坚持各国部队各自为政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史迪威同时还认为应当有统一指挥，而且他非常愿意（即便不是高兴）接受亚历山大的指挥。

战斗使得大家都开始配合起来了。杜聿明“不错，战术扎实，做好了战斗准备”。林蔚和商震都同意应该在东吁打一仗。史迪威“对中国人如此接纳我感到惊讶”——不过后来看来这只是表面现象——并认为“唯一的麻烦来自上面”。

各种缺乏开始显现出来。电台很少，通讯条件很差，缺医少药，疟疾和黑水热已经出现，史迪威的参谋班子不大能应对当前的局面，而日军正持续对一个又一个缅甸城镇狂轰滥炸。敌人平均每天出动260架飞机，而联军只有45架，这包括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中队以及顽强的美国志愿团——美国志愿团尽管长期缺乏燃料、飞机、零件和飞行员，但是战绩非常出色。

眉苗气候凉爽宜人，可是庞大的英军参谋部却毫无计划，陷入混乱之中，对此史迪威的办法跟在华盛顿是一样的：“整个这群人应该坐下来，不说话待两个钟头，好好想想。”可是他们无法有头绪地思考，因为自从仰光陷落后，他们就没有得到过有关他们目标的明确指令：是尽量坚守缅甸其余地方，还是慢慢撤退并同时完成对印度的防御。不过倒是有一个目标得到了高度重视，那就是通过钦邦山区达武山口（Tamu Pass）上长期废弃不用的公路修建一条逃往印度印帕尔（Imphal）的通道。每个人头脑中思考的是5月中旬雨季就要来临，此时小道会泥泞不堪，除非有公路可以逃出去，否则缅甸将成为一个陷阱。为了不至于妨碍道路施工，从霍乱肆虐的曼德勒难民营出来并涌向达武山口的印度人被军方限制在每天500人。



西拉格夫和他的缅甸护士们在一起

弗兰克·梅里尔（Frank Merrill）少校原是日语教官，珍珠港事件后从菲律宾来到缅甸，负责与英军联络；他给史迪威介绍了目前为止缅甸战役的状况："没有计划，没有侦察，没有安全保障，没有情报，没有俘虏。"与此相反的是日军通讯畅通，具有很高的进攻性和机动性。史迪威发现梅里尔是个不可多得的助手，后来梅里尔在缅甸起到了主导作用。他是个机敏又性情温和的战士，身材魁梧高大，眼睛近视，被太阳晒脱皮的鼻子上架着眼镜。他18岁入伍，之后6次参加西点军校的考试，最后西点军校同意破格录取他，尽管他有散光。

另一位此时到眉苗前来效力的是戈登·西格拉夫（Gordon Seagrave）博士。他是个长期在缅甸的美国浸礼会教会的外科医生，是个不墨守成规和不肯妥协的人物，说话直言不讳又兢兢业业，有点儿像史迪威那样言语刻薄、憎恶虚伪。他曾在掸邦建了一座医院，培养了一些缅甸籍护士，现在想让他的医疗队为东吁的中国第五军服务，他喜欢接受美军而非英军的领导。原以为史迪威会把他轰出去，因为史迪威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而且很可能对传教士和缅甸籍护士抱有偏见。让西格拉夫意想不到的是，史迪威将军和医务官罗伯特·威廉斯上校接受了他的提议，甚至还就中国部队的补给问题询问了他的想法和建议。随着战争

进程的加快，他与史迪威尽管交谈不多，但加深了相互了解和彼此的尊重。显然，西格拉夫很快发现，那些善于巴结的人从将军那里甚至“连‘早上好’也得不到”，而且史迪威非常喜欢“人们跟他谈论正事，因为你话才说到一半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且他做决定也极快”。

为了说服蒋介石调派更多的中国师，史迪威在3月17日飞回重庆，在商震的陪同下连续两天跟委员长硬磨。“他（蒋介石 ）提出的每一点都遭到我反驳。坚持不懈地一遍又一遍……筋疲力尽。”商震与何应钦、白崇禧以及总参谋部的另外两位成员进行会晤后报告说，这四人都认为有必要进行战斗，并说要敦促委员长同意，这个结果让史迪威大为吃惊。不断的说服工作甚至让蒋夫人也动摇了，“事实上她让我坚持下去”。受到鼓舞的史迪威放下心来，认为中国人已经接受了他的地位，并说“这简直是奇迹。至少现在我知道，有些军官下狠心还是会表示同意的”。了解了这一点，自加尔各答之后他第一次睡了一晚安稳觉，因为之前他对委员长的军事想法越来越失望。在他59岁生日那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数月来第一次感到“并非大势已去”。在宣布他任命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表示信任“我的队伍”，也就是中国人，并告诉记者说：“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中美军队一起攻入东京的时候。”

他收到了马歇尔发来的生日贺电，上面说“你在中国对于总统、对于史汀生上校以及对我都是莫大的宽慰”。因为让自己最好的军团指挥官去从事一项希望渺茫的使命，马歇尔不断给他发电报表示赞许，为他鼓劲。在接到史迪威报告说蒋介石拒绝接受英军指挥之后，马歇尔放弃了统一指挥的打算，并敦促英国人说，如果他们想让中国人参战的话，就要同意让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两人同时担任指挥。亚历山大能够领会这个意图，并表示同意。罗斯福跟丘吉尔讨论这这个问题，丘吉尔也默许了。

在重庆就如何使用中国部队的问题上蒋介石少许有些让步。史迪威得到允诺第二十二师可以到达彬马那去支援第二〇〇师，甚至在卑谬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援助英军，但条件是必须是在史迪威的指挥下，而且“只能是在情况紧急的时候”。蒋介石坚持要第九十六师留在曼德勒。现在还不明确日本人是否有力量向北发动进攻。蒋介石说，如果过了一个月还没有动静，那也许中国部队可以发起攻击（“他希望进攻是轻而易举的”）。他重申第五军和第六军不能打败仗，“因此我告诉他还是另请高明，因为我无法这样保证”。第二天蒋介石动摇了，说如果英军放弃卑谬，他将把军队全部撤出。“他拿不定主意。老是在变。”还没有等蒋介

石再反悔史迪威就飞回了缅甸，而且一到达腊戍就签署命令调动中国各师。他乘汽车迅速赶到位于漂贝（Pyawbwe）的第五军。日本已经发起攻势，东吁正在遭受进攻。杜聿明很是担心。他同意让第二十二师迅速南下支援第二〇〇师，并从第六军调一个师去支援第二十二师。史迪威赶回眉苗安排部队调动。“在第二十二师出发之前气氛非常紧张。”

那一天，对于卑谬以北约100英里（约160千米　）的位于伊洛瓦底江边的马圭（Magwe）机场来说，是个灾难日。由200架日本飞机发动的空袭让机场的皇家空军和美国志愿团措手不及，未遭损坏的飞机撤到中国的垒允，这是位于腊戍以北离缅甸边境不远的美国志愿团基地。皇家空军又敷衍地打了几仗，结果损失惨重，之后未通知亚历山大将军就退到印度，再未参加作战或侦察任务。通过修理以及拆用受损飞机部件，美国航空队仍然在一段时间里维持了小股空中力量。飞行员们由于不得不老是处于劣势作战而愤愤不平，开始对抗命令，他们很恼火，连相对少量的增援力量也得不到，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有这种支援就可以取得对敌优势。为完成轰炸东京这项极其秘密使命的飞机按计划完成轰炸后要去增援陈纳德的部队，但是这项使命还有四周。史迪威3月23日的日记非常简短：“现在没有什么空中支持了。”

他在那天晚上写给史汀生的信中说，这就是当前局势的关键所在。“进行有效对抗的机会已经丧失殆尽。”说服蒋委员长同意调动他的部队已经消耗了太多时间，这种拖延“使我们本来在缅甸可以有的机会完全丧失”。第五和第六军派遣了，但完全没有后勤支持：其给养、铁路运输以及卡车燃料完全依赖英军提供。“据我的观察，中国军队的参谋们对这次远征根本就没有兴趣，也没有费什么心思。”他不得不亲自找一个医务长。这个部队纪律严明，士气很高，但是委员长的“战略思想真是异想天开”。蒋介石老是放不开曼德勒，认为“守住它的唯一办法便是驻扎在那里”。

史迪威习惯于做最坏的设想，但是准备起来还是竭尽全力的。在3月24日到31日这一周里积极准备调派第二十二师对东吁发动进攻，这是为了打破对防守的第二〇〇师可能形成的包围，同时也是为了巩固卑谬英军的侧翼。光是让第二十二师进入阵地，就花去了四天时间；铁路上是不可思议的漫长等待——史迪威开始怀疑这都是重庆捣的鬼。史迪威两次命令发起攻击，杜聿明将军及其下属不断争辩、分析、找借口、允诺并同意服从命令，但最后第二十二师仍按兵不动。

战线继续朝北部延伸，空袭不断，很多村庄一片火海，不断增多的

难民塞满了公路，牛车一辆接一辆，到处是尘土，人们在炎热的天气中口干舌燥。“火车票贵得吓人。铁路乘务人员正在逃离。彬马那以南根本没有火车。也没有卡车。”当史迪威要求得到150辆卡车的时候，俞飞鹏将军只给他了50辆，这位负责物资供应的胖子在腊戍掌控着700辆卡车，他正利用这些车将军用物资运往中国的私人仓库。史迪威的所有命令都必须先经过杜聿明将军转给林蔚，林蔚再转给另一位联络官侯（Hou）将军 [2] ，由侯将军报最高层批准——侯将军有可以与蒋介石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而上层的答复也必须再经过这些人转达后才能付诸实施。同时，蒋夫人还会通过信件给史迪威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这些信通过所有在重庆和腊戍之间飞行的飞机上都设有的特别信箱发送。之所以还要这个步骤，是因为当时认为日本人可能会破译密码。这些信件中充斥着告诫、劝说以及蒋介石最喜欢的战术意见：“他希望再次向你重申遵循‘纵深战术’原则的必要性。”史迪威有一天收到三封信，每封信都改变主意，最终再次同意调动第二十二师，而史迪威早就下达了命令。“天哪，一个指挥官要是受他牵制，精神负担何其大啊！”

史迪威再加上几个参谋为驻扎在漂贝的第五军设立了总部。他这段时间不断乘车往返于眉苗和彬马那之间颠簸不平和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有时冒着空袭的危险，无休止地对着桌上摊开的地图，跟杜聿明以及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争论发动攻击的种种有利之处。有一次四架敌机低飞过来对他们的小楼进行扫射，梅里尔少校在用布朗式轻机枪射击的同时还听到廖耀湘从卫生间里喊叫：“这些杂种趁着我解下裤子的时候来，等他们再来的时候我就可以下去帮你了。”

在卑谬的英军重新集结为缅甸第一军，军团司令是新来的威廉·斯利姆（William Joseph Slim）中将，他是从中东调过来的，跟亚历山大一样是由上层安排的。他生性好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列兵参战。负责史迪威与英军联络的梅里尔去看他并问他是否想参加反攻的时候，斯利姆问道：“史迪威的目标是什么？”

“仰光。”梅里尔漠无表情地回答道。

“告诉史迪威可以把我算进去。”斯利姆道。

后来，一起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斯利姆对史迪威也更加了解了。斯利姆发现史迪威有时“比一大群驴子还要顽固”，有时候故意很粗暴，但在军事上有个很大的优点：他“时刻留意主动反攻的机会”。斯利姆认为现在在东吁正好有这样的机会，可惜他没有发动反击的条件。为家人担忧的缅甸士兵正纷纷开小差，又没有其他兵力可以弥补，空中掩护已

经没有了，印度师的野战炮和重装备已经在锡当丢失，部队精神涣散，士兵对军官已经没有信心，阵地往往不经战斗就被放弃。乡村的情况正变得险恶。韦维尔的一个副官在视察了情况后感到“无政府状态和威胁正在加重”。土匪以及民族主义领袖昂山的游击队在当地出没。缅甸农民像“穿着裙子、戴着白帽的凶恶的保姆一样”，人人拿着锋利的长刀，虽然这些不过是普通的农具，但是他们的眼神很邪。有些驾驶吉普车的英军士兵将挡风窗打开在路上奔驰，结果被横挂在脖子高度的铁丝割掉了脑袋。

3月26日史迪威听说在卑谬以北120英里（约193千米　）的仁安羌（Yenangyaung）驻扎的英军发生了骚乱；这里有油田，为战役提供各种燃料和石油。更坏的消息还在后头。“英国人毁掉了油田。天哪，我们在为什么打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其实谁都不在乎缅甸。伦敦和华盛顿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别处了。由于缺乏增援和帮助，中缅印战区有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将医疗队设在驻彬马那第五军后方的西格拉夫博士就感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要使自己相信这个任务是重要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美国，也许是为了全世界”。

然而第二十二师仍然未能投入战斗。史迪威跟铁路方面交涉，那里的印度雇员由于担心缅甸人有敌意，正在离开。“让马丁用枪顶住机务人员才使得火车开过去……运送第二十二师的最后一列火车在七点钟开过漂贝。情况似乎好一些了。”然后杜聿明将军“情绪非常低落，大发脾气——一切都不利于进攻。没有办法。上帝啊，他发起脾气来可真可怕”。现在一切都有赖于第二十二师的到来。到凌晨3点有两列火车还在彬马那，到9点钟所有的火车才开出。（“有个杂种让车停止了三个小时。这是谁？”）次日上午各种矛盾的报告接踵而至；接着突然三个团都准备到位了，大炮和坦克都做好了在下午4点开战的准备。

“还是推后一点。这形势好像太好了一点。”中国式的犹豫和借口又回来了。“‘我们怎么打？他们有105毫米的炮，而我们只有75毫米的’”，或者是“‘他们有49辆坦克’”，或者是“‘第九十六师不可能及时赶到’”（因为未能用卡车运送他们），或者是缅甸人会搞破坏或切断铁路线；“‘也许明天吧，要好好想想。’”正在此时，传来消息说英军正在从卑谬撤退，这使中国军队的侧翼没有了掩护。“这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怎么办？我实在对杜聿明没办法。”史迪威决心要摊牌了。他知道蒋介石直接同杜聿明和林蔚联系，在两千英里（约3218千米　）之外对下至团级的部队亲自调遣。他去眉苗找到了林蔚，林在感到史迪威可能强迫第二十二师

发起进攻时突然失踪了。在眉苗让史迪威感到困惑的是蒋介石现在接受了亚历山大。当时亚历山大正以战区总司令的身份到重庆去看他。蒋从来没有解释过这种大逆转的原因是什么，然而因为这涉及统一指挥权的问题，史迪威也就没有浪费时间为此事操心。

史迪威找到林蔚，反复做林的工作，直到林同意签署进攻令，然后史迪威迅速回到漂贝跟杜聿明研究作战计划。第二十二师的廖将军“没有什么立场”，他语速很快地讲了很多，却不知所云，说要等第九十六师。“他们在拖……他们会无所事事地拖下去，除非我可以逼他们上去……好吧，我可以再耐心一段时间。热得像地狱。我们都干透了，精疲力竭。我脑袋仿佛喝醉了似的。”史迪威打电话给眉苗要求英军配合发动进攻，得到了肯定的许诺。“斯利姆真是好样的。也许最后他能行。”但杜聿明又一次找到了按兵不动的理由。正在他还在这样拖延的时候，敌人三面包围了东吁，并从东吁和卑谬之间穿过，直接对中国和英国军队的内侧造成威胁。斯利姆的装甲旅本来已经开始进攻并且夺取了一些阵地，这时为了避免敌人切断后路不得不回头。第二十二师进行了炮击，好像要进攻似的，其实还是没有动。到了3月30日9点30分的时候，史迪威意识到不可能发动进攻了。“他们又在拖了。这群胆小的杂种。”

第二〇〇师顽强支撑了十二天，死亡达1000人，结果自己突围出来并退至第二十二师后面向北60英里（约96千米　）的彬马那。缅甸军已经在撤退，原来说要退至跟彬马那齐平的亚兰谬（Allanmyo），但是士兵们到达那里后并没有止步，在后退时也没有稍微停一下炸掉桥梁以阻止日军的前进，结果他们一直退了80英里（约128千米　）到达油田区前面的马圭。此时，甚至英国士兵也在开小差，他们逃往曼德勒，隐约希望通过中国逃回去。中国和英国军队相互埋怨，都指责对方暴露了自己的侧翼。中国人指责英国人让第二〇〇师忍饥挨饿，而英国人则反驳说戴将军将他的联络官置于后方，结果日军的包围圈把他们切断了。已经成为联军总司令的亚历山大将军在后来的正式报告中称中国人是“寄生虫”，因为“他们指望我去喂他们”。

史迪威现在处于困境之中——他要打仗，可是手下的部队不听他的指挥。“我不能毙了他们，我不能撤他们的职，跟他们谈话又没有用。”在他的推动下，蒋介石同意作战，但是蒋介石的内心并不情愿，尽管这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蒋介石现在正在收回控制权。史迪威考虑了摆在自己面前的选择：“无所事事，静观其变”，“断然去职”，或者“偷偷

溜走，要求使用我们自己的部队作战”。他去重庆去跟蒋介石挑明此事。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有可能变得“一团糟”，他让多恩对所有的情况都记录在案。

要求下级指挥官服从命令的问题并不只是史迪威才遇到的。未接受命令便后退或者未能按照命令攻取或坚守某个阵地，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而且也符合中国传统上对战争的看法，也就是认为战争像下棋一样，是计谋的较量而不是实体上的冲突。一个指挥官自己或者自己的部队战死，这不是勇敢，是愚蠢。由于不愿意让军队冒险参战的情况非常普遍，结果在16世纪制定了连坐法，这是一种集体问责的军法，规定任何军队未经命令擅自撤退，则所有相关指挥官均要被处决。在黄埔军校毕业生首次参战时，蒋介石也借用了这个做法，这样无论是垂直上的各单位内部还是水平上的相关单位之间，都能确保责任的归属。

对坚守阵地的指挥官给予金钱奖励，这种做法也是对整体上责任感缺失的一种弥补。但是，既然文化上未能发展这样的观念，那么在军事实践上也就不会有结果，处决也好，奖励也好都无济于事。因此总体而言，中国的军官们并不认为他们要对战斗的结果负责。传统上军事这个行当并不很受尊重。中国的理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史迪威自己在笔记中曾经指出，中国军官“不属于这个国家有信誉的职位”或传统上对国家负有责任。中国的指挥官不像西方那样，是体制化军队中的一员。结果忠诚往往只针对领袖而言，而不是在一个指挥等级中对上级服从。结果师级将军甚至团级上校都可以直接接受蒋介石而不是其直接上级的命令。“老虎仔”薛岳就曾经对此甚为反感，因为自己的下级常常直接接受委员长的命令而在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调遣或者撤退，结果后来他干脆自己也违抗命令并撤退“到那些电话打不到的地方”。

在卑谬——东吁撤退之后，眉苗的气氛更加恶劣。史迪威的参谋官中的那些美国人自己并没有参战，而且到那时为止美国自己的战绩也谈不上辉煌，但他们对中国人和英国人都嗤之以鼻，而且用其中一位的话来说，随着战事的进展，他们认为“亚洲除非部署美国自己的部队，否则局势已经不可挽回”。史迪威“偷偷溜走，要求使用我们自己的部队”的说法也反映了这种愿望，不过这在中缅印战区并未实现。而眉苗的英军尽管受到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嘲弄，却公开讥笑“史迪威了不起的中国战”。尽管他们自己的帝国风雨飘摇，他们却老喜欢把一切都归罪为美国人不顾种种警告、由于大意而失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失去印度很可能是由此引起的。

“我是个愚人节傻瓜吗？”史迪威在4月1日于重庆评估形势时这样反问自己。麻烦的根本在于蒋介石的干预。要不是蒋介石阻止第二十二师，那么在日本人第一次包围东吁的时候就可以切断包围，可是“他（蒋）已经被曼德勒迷住了，不明白守住曼德勒的唯一办法便是在东吁揍日本人”。史迪威从商震那里得知，是蒋介石本人命令退到彬马那一线的。

跟蒋委员长会晤的时候，史迪威“发了脾气。虚张声势，直说我必须辞职。另一个解决办法是让我独立指挥一支部队。告诉他（蒋介石 ）我无法对这样的指挥官启用第十航空队支援……简单地说就是，军长师长都不服从命令，而我又没有足够的权力强迫他们服从”。

实际上，史迪威还是有点虚张声势，因为正如他在日记里所承认的：“我必须拉长着脸告诉蒋介石说，他的下属不听从他的命令，而实际上极有可能他们恰恰是在执行他的命令。不过说句公道话，要让他们把一两个军交给一个他们并不很信任的洋鬼子，那还是太勉为其难了。”跟很多美国人不同的是，他能够理解中国人那种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绪。

蒋介石夫妇看上去很担心，急于纠正这种情况，在此后的几天里答应尽最大努力使史迪威有实实在在的权力。在蒋夫人建议下，蒋介石同意亲自去腊戌“跟那些孩子们说明我就是老大”。他看上去态度真诚，让人信服，还指定了罗卓英为执行官。罗要比林蔚更有办法对付杜聿明将军。罗卓英是个精力充沛、性格刚强的广东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剿共的时候上来的，曾经参加淞沪抗战和长沙保卫战，在史迪威看来是个说话算数的“不好对付的人”。此外，蒋夫人能够理解西方人的看法，知道他们对中国人那种转弯抹角的做法会有何种反应。她“答应尽全力帮忙，这很不容易”。史迪威认为自己取得了重大胜利。“考虑到他们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历史和经历，蒋介石实在是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姿态了。”



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在眉苗

在重庆被记者纠缠的史迪威指出，现在报纸上“到处胡说八道，为了表明这些不是胡说，我一周之内必须进入仰光。如果日本人把我赶出了缅甸，我会看上去多么像个傻瓜啊”。美国公众这时正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大标题：“中国机动部队在缅击溃日本装甲部队！”史迪威创办的《奥德堡广角》（*Ord Fort Panorama*）在宣布史迪威的使命时用了充满自豪又不免吹嘘的花边标题：“裕仁小心！”

4月5日，他在蒋介石夫妇陪同下回到缅甸。为了欢迎蒋介石夫妇，英军按惯例让缅甸步兵持枪吹奏风笛。蒋介石在眉苗向亚历山大保证说“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军队有绝对支配权”。次日，他又召集中国指挥官当着史迪威的面说，他们必须无条件听从史迪威的指挥，而且说“我完全有权力对中国远征军中的任何军官做出提升、撤职以及惩处。（天哪。）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里程碑”。史迪威跟蒋介石夫妇微笑着手挽手地合影供报纸发表。蒋介石还答应用古篆文刻成的说明持有者官衔的印章正式表明他的权威。文件盖上这种红印章表明了效力。没有印章，史迪威的命令只不过是建议而已。当印章一周后送来的时候已经跟先前许诺的有了显著的不同。印章的铭文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援缅军总司令”，而且没有附上表明他有奖惩权的信件。第三十八师的军官在战

后说，不管委员长在眉苗是怎么说的，印章中的“参谋”表明史迪威是“顾问”而非指挥官，因此他们也只能这样看待他。

然而在史迪威看来，蒋介石已经接受了必须进攻的观点，而且罗卓英和杜聿明也“对此完全赞同”。史迪威很受鼓舞，尤其是蒋夫人在离别时送他一罐果酱，还附了一封充满柔情的信，说罐子里的东西代表了人生的甘苦，并向他保证“我们都站在你后面……我们在前线的那一头……等着你的是一个男子汉的工作，而你就是个男子汉——而且我还要说——你是怎样的男子汉啊！”蒋夫人跟西方人可是不讲含蓄的。

当时也去到眉苗的卢斯夫人采访了史迪威，两个月后她的文章发表在以史迪威照片做封面的《生活》杂志上。她问会晤是否成功。根据她的说法，史迪威是这样回答的：“是啊，是啊，是啊。委员长对包括他自己将军的所有人都直言不讳了。还有亚历山大。还有我。蒋夫人也一字不漏地做了翻译。毫不含糊。是啊，每个人都亲耳听到了他怎么说的。”史迪威说记者们可以往回报道说局势已经完全控制。当问他“这会保持下去吗”时，他却回答：“不。不会保持下去。不可能保持下去。”但这赢得了时间，而“时间，时间，时间”——这才是他战斗的目的。“缅甸多坚守一个小时，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美国士兵便可以多赢得一个小时。”



卢斯夫人在眉苗采访史迪威

酸醋乔成了一位公众人物。这本是记者报道的好材料，而对此记者们也真是不遗余力，把他形象地刻画成为一个样板，一个倔犟的、夸夸其谈的本色大兵，顽固、坚韧、硬实、踏实、会开玩笑、会讲中文、受

士兵爱戴的严以律己的人，没有架子又带着迷人的微笑，一个美国的“中国式戈登”以及一个“乔大叔”。

尽管日本人继续沿伊洛瓦底江往曼德勒进军，同时仍然按部就班地对各个村镇狂轰滥炸，但史迪威在重庆的这段时间里，地面的军事状况并无大的改变。“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又调进了两个师和两个坦克团，而盟军由于侦察能力很差，对此并未察觉。日军的计划是沿着三个山谷分三个纵队前进，赶在5月中旬雨季到来之前围歼腊戍和钦敦江之间的盟军。依据史迪威以攻为守的理论，他认为仍然可以从彬马那一线发动反击击退敌人，并使得盟军可以在缅甸中部巩固阵地。为了守住曼德勒，蒋介石又新派了第三十八师，其师长是机敏而富于活力的孙立人将军。孙跟马歇尔将军一样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他后来证明自己是个出色的战略家，战斗时头脑冷静，善于主动出击，是缅甸战场上出色的中国指挥官。他英语流利，这既有利于作战又使他声名远扬。其他师老遇到的麻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足够的称职的翻译。

在炎热的中午，茅屋和竹楼村落不断因轰炸而燃烧。4月3日，轰炸逼近了曼德勒。400人被炸死，火车站和医院被炸毁，街道大片被烧，电话线埋在灰烬、遍地瓦砾和横七竖八的人畜尸体下面，还有很多尸体炸飞后落在18世纪王宫石墙下的护城河中。史迪威4月8日前来与孙立人会晤时寺塔林立的曼德勒还有地方在燃烧。由于警察、公务员以及大多数居民已经逃离，英国当局难以恢复公共服务和收集死尸。到处臭气熏天。肿胀的尸体泡在泛绿的死水中，四周的水已经染成粉红色。街上的狗和猪在腐烂的尸体周围拱来拱去，乌鸦也啄出了死人的眼珠。饱餐了各种死尸后鸟类仿佛醉了一般在尸体中走来走去。蒋介石夫妇也和史迪威同日到达曼德勒。蒋介石借看到的恐怖情形批评英国并表达了对西方的愤慨和失望。自珍珠港之后，这种失望情绪在中国不断增加。蒋介石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在我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我从来没有看到哪里像缅甸战区这样令人可悲地毫无准备、混乱和糟糕。”



史迪威和孙立人



中国军队于萨尔温江畔作战

史迪威自以为得到了新的授权，再次巡视了各个师部，想让第五军集中攻打彬马那，并让左边的第六军去萨尔温江前线的垒固地区遏制日军推进。事情都不顺利。日本人继续前进，并神出鬼没地迅速钳断联军的阵地。空袭仍在继续，命令和服务体系正在加速解体，而蒋委员长的信件还是源源不断。在中国部队是否可以增援英军以及何时、何地增援的问题上，他曾经三次更改主意，结果不得不重新部署军队，而运输体系本来就很紧张。蒋介石还有一封信命令要把所有阵亡的中国军人的尸体用松木棺材运回中国，这样就可以让他们跟祖先安葬在一起。

在彬马那，史迪威见了第二〇〇师的部队，这是“看上去很不错的一群士兵”。当时在日军的轰炸下大地在震撼，而噼里啪啦燃烧的房屋则冒出滚滚浓烟，仿佛打开的一张巨伞要更加渲染他们是在怎样的黑暗中战斗。由于没有空中侦察，无法得知敌军前进的情况。“天哪，我就像个瞎子。”他曾这样告诉多恩。美国空军志愿队拒绝低空飞行，认为那是死亡陷阱，而让英国皇家空军紧急派遣两架侦察机的要求又毫无结果。驻印美国第十航空队有8架轰炸机，另外还有17架正在路上。但是他们并未满足史迪威要求对其支援，因为据3月24日去见了史迪威的布里尔顿说，他的炮手没有受过射击训练，航空队只有在5月1日才能投入战斗。

尽管布里尔顿应该在史迪威统辖之下，但是他本人更喜欢认为自己是在接受韦维尔的指挥，而且他也接受了德里流行的看法，那就是缅甸大势已去。

史迪威盼望雨季能早点儿到来，并希望能够支撑到那时候，这样大雨能够阻止日本人前进的步伐。在巡查时他常常去看望西格拉夫及其护士们；他们不辞辛劳救治伤员，汗如雨下，浑身沾满血迹。有时西格拉夫抬起头来发现史迪威正在默默注视他，于是他们彼此苦笑一下。西格拉夫曾道："对认真做本职工作的人，他总是有时间的。"史迪威的美国参谋中有些人已经不再努力，开始变得消沉和紧张，并批评说史迪威仍然顽固地要打，而英国人和中国人都已经没有了信心，其实这些参谋对自己和同事也没有了信心。

突然，就像用隐形墨水写下的东西突然显现出来一样，向北挺进的三路日军的最东面的一支出现了。情报部门的罗伯茨上校综合分析了第六军与敌军小分队接触的零散报告，他意识到这些小分队是为进击腊戍的日军探路的，而进攻腊戍将会切断滇缅公路。他向史迪威做了紧急汇报后，史迪威前去察看第六军在前线的驻守情况，结果失望至极。部队未经命令擅自转入防御阵地，指挥员也很松懈，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将军掉以轻心，对情况不了解，也不能控制下辖各师的将军，结果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面对一股比他弱小的敌人便放弃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阵地。另外，他也未能执行要他重新夺回一个阵地的命令。这里的山庄仍然是风景不俗，一派祥和，松柏遍地。"咳，你知道吗，这些松树是为花生米的那些棺材用的" [3] ，史迪威对多恩说。花生米原是蒋介石在秘密电文中的代码，后来经常用作蒋委员长的名字。回到指挥部后史迪威给罗卓英下令训斥甘丽初将军，把陈勉吾撤职并收复失地，但他并不能保证这些命令会被执行。实际上除了第一个命令，其余的都未被执行。



“飞虎队”战斗机在云南上空

三天后，在伊洛瓦底江一线日军绕过缅一师并突破了防线，直奔仁安羌的油田而去。斯利姆将军的部队已经斗志全消，无法进行有效抵抗，结果4月15日他下令炸毁油田。被亚历山大紧急召往眉苗的史迪威看到了“灾难和消沉”。亚历山大向他坦白说，他的士兵“见了日本人就怕”。忧心忡忡的亚历山大“现在叫我乔了”。

正在这时，史迪威收到蒋介石的一封来信，命令他给每四个士兵发一个西瓜。在史迪威做战区指挥的过程中，再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他恼火的了。当时正是联军最黑暗的时候，缅甸已经危在旦夕——史迪威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蒋介石的干涉——这时候来个西瓜令，这使他对蒋介石的蔑视无以复加。因为后来此事被公开，蒋委员长的愤怒也可想而知。这件事对双方都有深远影响。

按照原先委员长同意的安排，孙立人的第三十八师已经北调至伊洛瓦底江一线加强与英军的联系，现在被用来阻止日军，争取时间让缅一师逃脱。在仁安羌的三天浴血奋战中，中国第三十八师和英军装甲旅一道坚守阵地并不断反攻。这是整个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战斗，展示了史迪威常说的只要指挥果断，就能显示中国军队原有的素质。中国军队的战斗使得缅一师得以逃脱——尽管失去了大部分车辆、榴弹炮、野战炮和

高射炮以及20%的伤亡——另外也无意中救了更东面的印十七师，因为假如日军击溃了缅一师的话接着它就会攻击印十七师。

战斗结束后是一片恐怖，日军的野蛮跟在中国的做法并无二致。日本人把印度囚犯捆在竹楼里然后放火，或者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把他们活活烧死。让缅甸的西方人惊恐的是，被俘的英国军官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一些人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当活靶子练习刺刀。在这之前，所有到亚洲的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得到跟本地人不同的待遇。

在参加战斗之前，史迪威在4月15日给马歇尔发了一封措辞悲观的电报说明当时的形势。他说，自己相信英军很早就已经打算放弃缅甸。他确信印度的部队足以解救缅甸，而且“如果他们当真的话部队早就开进来了”。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是，亚历山大之所以不愿意让部队参战，是因为伦敦指示他只要象征性抵抗然后撤出缅甸。这种看法不仅是史迪威参谋中的美国人，而且很多其他美国人都相信。卢斯夫人在跟亚历山大谈话后于4月10日写给史迪威的信中说：“恰尔德 [4] ·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无意守住他来到的这个黑塔——如果这证明代价很大的话。”（他还说了一句“极有价值”的话：“我真希望乔别走。没了他，要我指挥中国人可很难。”）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上校是个好战的原作战部副部长，罗斯福派他去印度担任总统特使，他也获得了同样的印象。在他的报告中他说，英国人情愿放弃缅甸而不愿意受恩于中国人，或者为了守住缅甸而对缅甸的民族主义分子做出让步。反正他们想在和谈时重新得到缅甸，而且不想就其未来政府形势做出任何承诺。

其实对任何人来说，缅甸的重要性都是排在最后的。当4月的第一周一支由6艘航空母舰组成的舰队抵达孟加拉湾的时候，韦维尔对加尔各答非常担心，要布里尔顿派8架轰炸机对日军正在集结船只的仰光和安达曼群岛进行轰炸，尽管轰炸效果并不好。这发生在他拒绝支援缅甸还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因此让史迪威非常愤怒，而更恼火的是蒋介石，因为蒋曾经得到保证说第十航空队属于史迪威指挥。蒋介石认为，布里尔顿的空袭说明只要有必要，美国随时都会为了英国而牺牲中国人的利益。蒋介石跟西方人的接触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深了他对西方的反感。他宣扬说，这样将中国战区的兵力挪用别处，如果联军再遭失利，中国就“可能突然完全仇视外国” [5] 并退出战争。

然而，当面临在东西方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马歇尔是从来都不含糊的。正如韦维尔所担心的，从日军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于4月9日轰炸锡兰，此时马歇尔同意派第十航空队去保卫印度。这是对英国同意在

英国集结兵力准备跨海峡进攻欧洲作战的代价。以马歇尔为首的美国人希望英国出兵，英国人不太愿意，最后同意了，但条件是美国要防御中东和印度。马歇尔的参谋们提醒他说，他的决定会“对中国局势和史迪威的作战产生不好的影响”。不过实际上中国的利益是第二位的。为了让自己下得了台，马歇尔告诉委员长和史迪威说对加尔各答和印度东海岸的威胁“关乎印度的存亡，也严重影响我们将来帮助中国的能力”。

史迪威得不到空中支持，对这种精神鼓励也只能将就了。马歇尔告诉他说：“我向你保证，从世界的大格局来说，你所做出的努力的重要性是明确无疑的。”可惜他的话并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由于飞机数量少，马歇尔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觉得我们要挨揍了。”史迪威4月16日在给妻子的信中说。生平第一次担任作战指挥便吃了败仗，这样的前景让他怒火中烧，急切地想复仇雪耻。他已经在计划怎样反攻夺回缅甸了。不论英国人怎么看待缅甸，在他的头脑中缅甸仍然是通往中国的重要走廊，将来要在中国进行对日决战。战斗将由他指挥的中国人进行，但他希望到时候有美国士兵加入。

在灾难即将临近时他制订了重返缅甸的作战计划。这需要把中国部队转移到印度并在美国人指导下进行训练和装备，使之成为反攻特遣队。史迪威从来没有对公众宣布过“我将要回来”，但是这个决心仿佛是刻在铁板上的，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要战胜现在正在使他吃败仗的敌人，而且还要证明，只要有合适的指挥官，中国军队本身是可以担当此任务并拯救他们自己的。4月16日，他让一名参谋将计划带往重庆送交蒋介石批准。

作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史迪威建议说，由于通过缅北到中国陆上的供应线和空中航线可能被日本空军切断，因此中国军队如果得不到武器，就必须到有武器的地方去。他提议在印度整编并训练两个军，每个军由三个师组成，团级以及团级以下指挥官由中国人担任，更高的指挥官和参谋先由美国人担任，直到中国人有能力担当此职为止。他谈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部队怎样到达印度？他极为大胆地提出，在“尽可能得到美国航空运输公司的帮助下”，可以从密支那把军队经孟拱和新平洋（Shingbwiyang）（这些后来被人熟知的地名当时让人恐惧）穿过缅北，经过利多公路运到阿萨姆邦的铁路起点站。他得到通知说有25架运输机已经组装完毕，有的正在前往阿萨姆邦准备开始行动。他希望中国军队的转移能够在5月15日开始，也就是在雨季开始的时候。因为他知

道这是最糟糕的时间，只能假设他选了一个尽可能早的日期，因为蒋介石是没有能力在这一天就开始行动的。

史迪威确定该计划的目标是“夺回缅甸”，主力军为在印度训练的中国军队，此外由中国驻云南各师发动辅助进攻。他从来没有改变这个计划。蒋介石两周后“总体上”同意了，条件是如果印度发生暴动，中国军队不得用于支持英军镇压印度人。美国陆军部也批准了这个计划，因为这符合美国借助本地部队在亚洲大陆作战的想法。

史迪威仍心存侥幸，以为缅北一线尚可守住。他想通过卡车和火车调集第二〇〇师填补中国军队和英军之间出现的一个空隙，不过后来证明这是徒劳的，正在此时，指挥部传来了有关对东京发动杜立特尔空袭的消息——这次极其冒险的行动原来指望能为陈纳德的空军增加16架B-25轰炸机的。这16架飞机无一幸存。由于这些飞机被迫在比原计划要远的距离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因而均耗尽燃料，坠毁在中国的日军占领区或者接近占领区的地方。日军对中国人救助了美国飞行员的地区展开了惩罚性扫荡，并派遣53个大队破坏了那些可能用于再对日本本土轰炸的中国机场。尽管这分散了敌人的一些兵力，但是杜立特尔的初衷原是为了鼓舞美国人民的士气并改善生产停滞不前的状况，让笼罩在悲观中的联军看到胜利的希望。这个目的达到了，但代价是很多中国人家破人亡，蒋介石也愈加不满。出于保密的考虑，直到行动开始前一周才向蒋介石通报这次将在他的地域展开的行动。他极力反对，担心敌人的行动会摧毁浙江的一些机场。然而他被告知这次行动已经准备到了无法取消的阶段了。这次事件使他更加确信，中国并没有被看成是个平等的盟国，更别说一个大国了。在缅甸的官兵们愈加孤立无援了，他们不必再朝天上看飞机是属于谁的了，因为飞机肯定是日军的。

4月20日开始了致命一击：日本人奔袭腊戌的部队突破了东翼防线，击溃了第五十五师。“灾难降临垒固。第五十五师被完全击溃……甘丽初吓坏了……天哪。这可能会把我们完全掐死的。”通过中部前线的一个间隙日军包抄了第九十六师的一翼。“这里好像也面临崩溃。上帝啊。让塞伯特去看个究竟……电话线全被切断。英军会不顾我们逃跑吗？是的。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

史迪威接着几天千方百计想堵住缺口，重新集结，统一计划，并试图按计划重新部署混乱的军队，但是溃败已经势不可挡。没有几支中国军队是在他们应该在的阵地上，而且因为没有卡车，也无法将士兵运到这些阵地上。“大约在4月18日腊戌有6.5万加仑（约24万升　）的汽油和

850辆卡车。”史迪威顺便提了一句。可是这些卡车正忙着将物资运往中国，无暇顾及中国士兵。火车被阻截或者抛锚了，指挥官联系不到，军纪已经涣散。联络官带来了“不服从和找不到人的消息”。（史迪威这里旁白了一句：“困境中的士兵们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好像看我怎么办，‘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垮掉？’”）

杜聿明和甘丽初将军担心丢掉自己的兵力，他们阻止部队前进，甚至命令后退，有一次一个师级指挥官想战斗也不行。为了收复日军先头纵队夺取的一个叫东枝（Taunggyi）的关键地方，史迪威亲率一个中国连冒着猛烈的炮火反击，并要求坚守阵地直到援军到达。接着根据罗卓英的建议，史迪威提出，如果在5点前占领东枝，就将有5万卢比的奖赏。结果，东枝很快就攻下了，比桂东还提前了一个小时。奖赏的方法看来生效了，史迪威也试图使用惩戒，但是失败了。第五十五师全部逃往山区，史迪威要求处决师长陈勉吾或交由军事法庭审判。但他的要求未被接受。说到第五十五师，史迪威有些心寒地对贝尔登说：“一点痕迹都没有了。这是我看到的最糟的事。昨晚上我还有一个师，可是今天全都消失了。”

史迪威在一个阶段小结中总结道：“这是个不可救药的局面，我不得不竭力看清这一切。蒋介石使得我无所事事，我最好现在就老实承认。”蒋介石的腊戍之行只不过是场闹剧；“完全糊弄了我，我真蠢……我当时以为他是真诚的……”史迪威无法统领高级指挥官，除了孙立人等人外，其余的人都完全接受了蒋委员长的信条，认为对日防御时我军和敌军的兵力比例要3：1，进攻则要5：1。史迪威不无羡慕地想到八路军，并对参谋人员说他希望能“把共产党弄到这里来打仗”。

中国军队囤积物资准备应付更大的危机，这也妨碍了战斗。由于中国战时一向有物资匮乏的问题，因此囤积在文化上似乎也具有了必然性。在重庆的蒋介石曾亲自一个一个调动第五军的九辆坦克分散行动，因此这些坦克无法集中发挥其力量。在东吁，亚历山大问杜聿明，他前一天还看到的那些经过伪装并很好地放置于炮位的野战炮到哪里去了。杜说已经把它们撤到安全地带去了。

“你的意思是它们不会参加战斗了？”

“完全正确。”

“那它们有什么用？”

“将军，第五军是我们最好的部队，因为它是唯一有野战炮的部队，

所以我不能冒险使用这些炮。如果失去了这些炮，第五军就不再是最好的了。”

日本进攻腊戍的部队绕过联军东翼，这使得任何企图继续作战的希望都已落空。日军利用车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绕过了东枝，并已经沿公路向北面腊戍的方向走了很远。试图集中第六军的努力全部失败。要求腊戍的中国物资处提供150辆卡车，结果他们只给了22辆。在中线的第五军受到猛烈进攻，而更西面日军正在挺进钦敦江，试图插在联军和印度之间。两面都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4月25日晚上，史迪威和亚历山大在曼德勒以南25英里（约40千米）的皎施（Kyaukse）与罗卓英和杜聿明进行了会谈。史迪威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的那种军帽，穿了政府发的咔叽制服，跟那些爱炫耀的人相反的是，他没有带肩章和勋章。西格拉夫看了一眼，觉得史迪威“非常疲惫”。罗卓英看上去“肥胖又闷闷不乐”，而杜聿明则“捉摸不定，很郁闷”。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全部撤退。一旦承认了这一点，现在就变成了在被围捕之前迅速撤退的问题了。在东线，已经不完整的第六军、驻东枝的第二〇〇师以及刚刚沿滇缅公路新近进入的两个中国师可以退到中国境内。亚历山大和史迪威的主要问题是将英缅军和中国第三十八师、第二十二师以及第九十六师通过曼德勒撤出，然后到达伊洛瓦底江西岸，之后英军可以撤至印度，而中国军队通过密支那北上。坦克以及大量部队可以过江的唯一地方便是曼德勒的阿瓦（Ava）铁路公路桥。部队全部通过后，桥将被炸毁。英国早在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炸桥的准备。

史迪威一边看着亚历山大口述总撤退命令，一面记起一个中国人曾经说过要“吃苦”了。唯一一点让人安慰的是还没有命令投降，这跟新加坡和爪哇还有所不同。让失败的气氛更加浓重的是四架敌机在会场上空吼叫着。正当军官们四处躲藏的时候，一个重500磅（约226千克）的炸弹落在不到100码（约91米）的地方，爆炸声震耳欲聋。空袭过程中亚历山大仍然下指挥命令，还毫不在乎地笔直地站在花园里。史迪威也不甘示弱，倚在走廊栏杆上，嘴上含着琥珀色的烟嘴，像罗斯福那样斜叼着。

指挥部被转移到曼德勒以北50英里（约80千米）的瑞冒（Shwebo），而日本的飞机也跟着到了那里。参谋人员不但感到这场军事灾难在加深，个人的危险也在增加。有些人自己承认“吓坏了”，另外一些人呆住了，不知道干什么好。铁路是最大的问题。史迪威决心要

让运兵列车南下将第二十二师撤出，可是中国的那些机构或者已经涣散，或者已经无法工作。由于从程序上说他的参谋都无权对中国部队下达指令，史迪威亲自回到曼德勒鼓动他们行动起来。他从桥上回来的时候，退却的部队已经形成滚滚人流，而桥下还有人用渡船过河。到瑞冒的路上塞满了卡车、弹药车以及难民装满东西的推车。大撤退的人群就这样在尘土、热浪和恐惧的氛围中进行着。曾经趾高气扬的锡克人现在包着破头巾，一个个蓬头垢面。中国士兵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怀着恐惧行进着，在这里他们无法脱下军装逃到乡下去。地上是穿着黄僧袍的和尚的尸体，中国士兵认为他们是日本奸细从而杀了他们。日本零式战斗机从上空飞过，并不住地用机枪朝下面的公路上扫射。坐在汽车里的中国的将军们以及考虑到有“当地人”在场的英国军官都在竭力撑住面子，可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家已是颜面尽失，这无论是对亚洲还是对全世界都是如此。“最糟糕的是，”多恩写道，“在我们自己看来也是如此。”

到4月29日，日军包围圈收紧了：在东边，日本人攻下了腊戌，截断了滇缅公路，而在西面，他们攻下了钦敦江边的望濑（Monywa），这里距离瑞冒仅60英里（约96千米　　），已经危及英军退到印度的路线。现在英军必须赶在日军之前到达钦敦江上的加列瓦（Kalewa）渡口。原来准备在撤退的道路上储备粮食和水的工作现在必须缩短。炸毁阿瓦桥定在4月30日子夜。史迪威原来准备把指挥部移到密支那，以便尽可能保持跟中国人的联系，可是腊戌陷落后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日本人可以翻越山脉到达密支那。他打算让他参谋人员中的大部分乘飞机到印度，而他要和罗卓英将军一起到腊戌前线的莱温（Loiwing）去。他5月1日发报要一架飞机把他接走。由于罐头食品必须节约下来以供将来不时之需，顶着酷暑的参谋官们现在只能吃米饭，他们怨声载道。他们对中国人屡次不遵守承诺和不执行命令感到愤怒，并认为“老板应该在形势好转的时候叫中国人滚蛋”。面临炎热、失败和恐惧，再加上对联军的不满和普遍有被遗弃的感觉，他们的表现也就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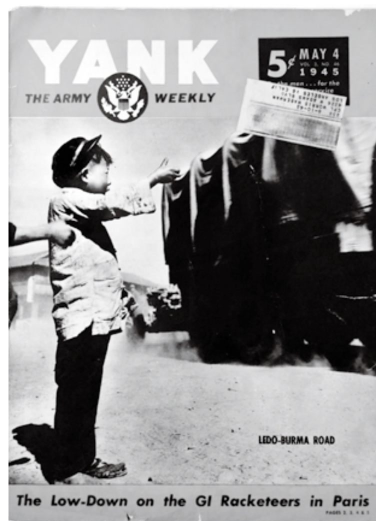
4月29日，史迪威接到蒋介石回复，表示原则上同意在印度练兵的计划。史迪威现在全身心都倾注在这件事上，就好像老水手望着北极星一般。“上帝啊，只要我们能把这10万中国人弄到印度，我们就能成。”他马上致电马歇尔要求他保证提供支持和物资，否则这个计划就只能依靠英军支持，“而这将是致命的”。当周围的其他人都在一门心思想早点儿离开缅甸的时候，史迪威却坐在一个破烂的布风扇下，对合众社记者达雷尔·贝里根（Darrell Berrigan）介绍自己打算回来重新打开通往中国道路的战略。史迪威说，中国将成为一个联军可以借以打击日本的

跳板。马歇尔将电报转给总统，由于即将失去缅甸，总统再次非常担心中国会退出战争。罗斯福在4月28日宣布："将想方设法为蒋介石委员长的部队提供飞机以及军用物资。"为了让蒋介石放心，似乎也为了让自己相信，罗斯福还重申，将来"一个未被征服的中国不但在东亚，而且也要在全世界为维持和平和繁荣起到重要作用"。

5月1日史迪威醒来后发现，总司令罗卓英将军已经逃往密支那机场去了。罗将军拿着枪征用了一辆有17节车厢的机车，在走了25英里（约40千米）之后，这辆未编入行车计划的列车跟另一辆车撞到了一起，结果铁路中断了两天。"不幸的是他没被撞死。"罗将军的逃跑甚至激怒了塞伯特这个唯一还在坚持的人，而其他人早就感到不满了。"天哪，乔，我们回家吧。"塞伯特恳求道。莱温已经封锁了，但是史迪威觉得仍然有义务竭尽全力保证中国军队出逃的路线上储藏好大米。塞伯特争辩说史迪威的位置应该是在德里的指挥部里。"不，"史迪威回答道，"我会为你解释为什么的。"西方人节节败退，这包括美军在菲律宾被打败，这使得西方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他有责任照顾好他统率下的中国军队，哪怕这种统率只是名义上的。"如果我现在逃跑，那将是又一个失败，又一个投降。那我以后就不可能再指挥中国军队了。"



"二战"时期在中印公路上行驶的美军卡车



中印公路，载于《美国人》（*Yank*）,1945年

史迪威坐下来开始列出一份名单确定哪些参谋将去德里，哪些将跟他留下。亚历山大这时“很担忧地”走进来。这是他们在缅甸的最后一次会面。次日亚历山大下达了英军最后的撤退命令，然后他乘车经一条107英里（约172千米）的小道到达钦敦江——这条路步行要六天。他们赶在日军之前到达钦敦江，但是不得不丢掉了坦克、大炮和很多车辆。已经跟那边的印度人就交通工具和食品事宜做了安排。在5月12日到20日之间共有1.2万人分散抵达印度，剩下的1.35万则在此前四个月的战斗中死亡、受伤或者失踪。亚历山大在5月20日停止行使指挥权的告别仪式上说：“当然我们会夺回缅甸，它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此后不久他回到伦敦，接着继续指挥“运动员”战役并在突尼斯立下战功。他再也没有回到缅甸。

亚历山大和罗卓英走了，史迪威留下来了。一次，他跟几个人正在玩金多美游戏（gin-rummy），遇到空袭大家都散开了。等他们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还在桌旁“神情安详地玩单人纸牌”。现在日军已经攻下并穿过曼德勒，炮火声已经可以听到。“这真是个了不起的五一节啊，”史迪威对贝尔登说，“所有的东西都倒了，所有的人都倒了。”

就在这一天傍晚，卡拉布·海恩斯（Caleb Haynes）上校和罗伯特·斯考特（Robert Scott）上校开着一架美国运输机赶到。他们是十天前刚刚运作的阿萨姆邦—缅甸—中国空运队指挥和执行官。这些运输机是没有武装的道格拉斯C-47（DC-3）型。飞行员都讨厌这份差事和这条路

线，管这种飞机叫“信天翁”，因为这种鸟会往回飞看看自己起飞的地方。海恩斯和斯考特接到哈普·阿诺德将军的指令，让他们“速将瑞冒附近的史迪威以及参谋撤离。特急”。

史迪威指挥部设在一个种茶叶的人家。他们被带进的时候，史迪威还戴着那顶旧帽子在桌子上写着什么东西。斯考特是个英雄人物，后来参加陈纳德的歼击队并打下几十架日本飞机。他到来时颇为戏剧性地、尽管未必很周全地说：“先生，阿诺德将军要我们来救你们出去。”过去几天的紧张情况已经使史迪威憔悴不堪，他透过无框眼镜看看这些“飞行员”，然后拒绝接受这个优待。两个飞行员瞠目结舌。他们告诉他说，他们已经在距离瑞冒不到20英里（约32千米　　）的地方看到了敌人的部队。史迪威还是不为所动。从溃败一开始，他唯一的想法便是跟中国军队一起出去。这是他作为指挥官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动摇。他表示欢迎飞机带出他的参谋，但是他自己打算去密支那，不管是通过火车、卡车、吉普车还是其他任何方式都行，他想到达那里跟中国人取得联系。

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决定这样做，他拒绝时常常不做解释，这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就像他不戴肩章一样。作为一名三星上将，他没有义务对两个空军上校去解释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对那些傲慢和没有共同语言的陌生人坦露内心感受。对于这两位飞行员来说，这个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破帽子的老人在离敌人不到20英里（约32千米　）时还在写东西，而且拒绝空军的援助，并要通过陆路走出去，这对他们不啻是一种侮辱。后来经过斯考特添油加醋那么一宣扬，这事就成了后来崇拜陈纳德的人的把柄，说“步行乔”不理解空军力量。

史迪威让指挥部其他人乘飞机走，并指示罗伯茨“给我找个地方供训练中国人之用。你知道我需要什么”。他跟其他参谋人员向北转移了60英里（约96千米　　），到达了温托（Wuntho），试图绕过被阻断的铁路。现在，每个美国人都在考虑自己逃生的可能性。他们的车辆已经过热并不断抛锚，但还是尽力沿着车辙通过干燥凄凉的乡村。他们超过装满中国军队的卡车，中国士兵们都像蜜蜂一样往车子上爬。在温托，运输官保罗·琼斯（Paul　Jones）亲自走过去用铁棒撬动走不动的车子，琼斯自1934年在圣迭戈史迪威手下作为预备队受训之后就一直对史迪威忠心耿耿。史迪威过去跟一位第五军指挥官“谈论供给”，可是此人对此既无计划也无兴趣。蒋介石的三份不完整的电报也于事无补。罗卓英被找到了，但他问史迪威可否在晚上8点去看他。到了约定时间，史迪威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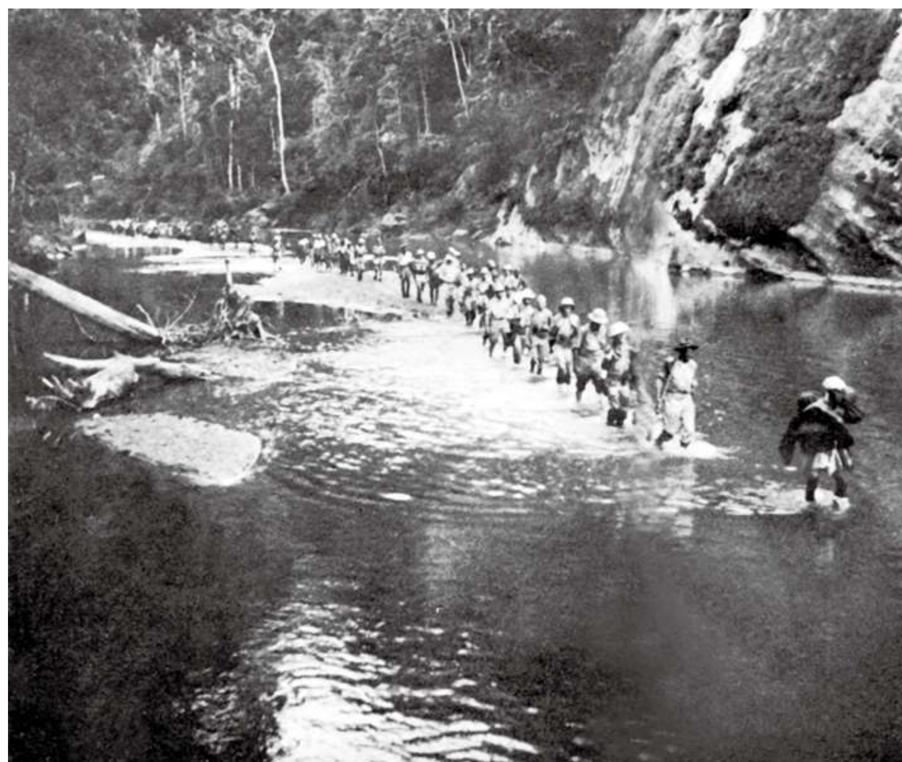
看到罗卓英的房子里已经漆黑一片，空无一人。史迪威意识到他正在做的努力可能是多余的了。“显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他认为离开的时间到了——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坐火车去密支那，如果不行就穿过西部去印度。“中国部队控制极弱。相信崩溃在即。”他给马歇尔发电报这样说，同时还报告了他的计划。

他现在有些破破烂烂的车子和大约100人，其中有18名美国军官和6名美国士兵，西格拉夫医疗队的两个医生和19名缅甸籍护士，16名中国卫兵，一个包括7名成员的英国贵格会（Quaker）急救队，9名印度籍、马来西亚籍和缅甸籍的厨师和搬运工，7名走散的英国军官和难民，彬马那农业大学校长、会讲山民土语的美国传教士凯斯（Case）先生，还有杰克·贝尔登先生（英国命令全部记者撤出，但他没有离去），还有一些掉队的人。美国军官包括有梅里尔、塞伯特、斯莱尼、麦克凯布（Thomas McCabe）、怀曼、费里斯（Ferris），医务官威廉斯，两个助手多恩和扬，预备役军官保罗·琼斯和弗里德·埃尔德里奇（Fred Eldridge）。埃尔德里奇原是报道警务新闻的记者，曾在奥德堡任公共关系官员，在这里他也担任这个任务。

被派去侦察的琼斯汇报说铁路堵塞，毫无办法。史迪威打算继续往北沿着铁路的方向再走一天，然后往西走，不是往达武山口，而是沿一条更北的路线，以尽可能在日军前面穿过钦敦江。这群人计划先沿着公路走，公路没有了就沿小路走到钦敦江的支流乌尤江（Uyu），然后乘木筏顺流抵达两江交汇处。在霍马林（Homalin）穿过钦敦江之后，他们会继续翻山抵达印度的英帕尔。曾有人告诫史迪威说这条路路途艰难，很少有人走，而史迪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选择走这条路——可以避开难民和逃跑的中国部队的人流。最担心的是缺少食物，这也是难民跟敌人一样危险的原因。从伊洛瓦底江西逃离的除了难民，还有三个中国师。有100万印度人已经逃离或者正在逃离缅甸，其中很多在路上已经筋疲力尽或者已经饿死。成千上万的人还在朝山上涌去，史迪威后来沿这条路回来时看到了其中有些人的白骨。两个英国准将带着12个人也在逃跑之列，他们拼命想说服史迪威跟他们走一条更加直接的道路，史迪威拒绝了。几周后他得知他们遭到日军伏击，好几个人被打死。

5月4日到5日的行进受到各种干扰：发动机烧坏、轮胎漏气和报告附近有敌情。每一次耽搁都让史迪威很恼火。雨季即将来临，史迪威曾经盼望雨季，但现在这成了威胁，于是迫使他们要加快速度。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西格拉夫听到有人悄悄地说要“给护士一些钱让她们离开，

免得她们拖后腿”。史迪威听说此事后“立即叫他们住嘴”。“大家都失去信心了，”贝尔登这样写道，“失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卓英将军再次出现，他由于未能到达密支那，只能沮丧地加入到一群中国难民的队伍逃离。在英都（Indaw）最后一次想乘上火车的努力又失败了。城里已经完全陷入混乱，士兵在抢劫，平民奄奄一息。几个英国军官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大英帝国在此统治的结束。坐在车里的中国士兵用枪托击打试图爬上来的其他士兵的手。史迪威后来说，在英都所看到的混乱是他在远东所看到的最糟糕的局面。他警告同行的人说他们可能要奋力过去：“继续走。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停下。”



在向导身后，史迪威带领众人水蹚过河

在英都他们离开了铁路线，转向未知的丛林。除了一台发报机外，跟外界的通讯已经中断，他们正陷入隔绝。史迪威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有一次以为路上走来的一群士兵是日本人，结果吓了一跳。“天哪，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经过各种耽搁后（“上帝啊，要是我能让他们再往前一点点就好了”），到晚上这支队伍终于到齐了。西格拉夫带领护士们唱着“基督战士向前进”。听到她们纯真、细弱的声音大家都静下来

了，诅咒和埋怨停止了，正准备爬上一辆吉普车的史迪威也站住不动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朝西进入长满大树的黝黑的森林中。大象在林中吼叫。过一条河时卡车陷到了河里，一群中国人像"'红格朗奇'[6] 一样径直从我们中间走过去"。史迪威急于继续赶路，命令放弃陷进去的汽车。他夜里11点开始露营，"我想我们仍然赶在雨季前面了"。

5月6日早晨集合的时候史迪威发现了15位新来者，是一群英军突击队员，都胡子拉碴，肮脏不堪，由戴维森-哈斯顿（Davidson-Huston）上校带队。史迪威朝他们吼道："你们从哪里来的？有口粮吗？"他们摇摇头。他恼火地瞪了他们一会儿，同意他们留下了。他们中间有个有用的人，这就是巴顿（Barton）少校。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丛林中，并在缅甸待过很多年。现在他们的人数是114人了。走了一天之后公路没有了，除了装运供给的吉普车外所有的车辆都必须放弃，包括装无线电的车以及重达200磅（约90千克 ）的电台本身。开始发出最后的电报。担任报务员的中士开始专心发报，敲几下，焦急地听着，然后再敲。给驻扎在印度的布里尔顿的电报说了他们走的路线，并告诉布里尔顿方面"我们粮食已经不多，后面也没有指望"。要布里尔顿方面送粮食、挑夫和药品在霍马林接应他们，此外史迪威还要中士通知印度政府，数以万计的难民和中国士兵正沿着各种小道走向印度，最北可达胡康山谷，急需在小道上储存大米并派驻警察和医生，"否则死亡人数会达到数千……更多的人在赶来。已经没有任何控制。可能出现大灾难"。史迪威他们应当在三天内到达乌尤江。"这是我们最后的讯息。"史迪威通过重庆转给陆军部的电文并没有提及这极端糟糕的处境，因为反正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有武器、食物、地图，现正在英都以西50英里（约80千米 ）步行。无须担心。中国军队大致也沿此路去印度……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这是我们最后的消息。再见。史迪威。"发完电报后，发报机被用斧头打碎，密码本和各种文件也都被烧掉。

那天晚上他们的运气来了：他们遇见了一支马帮。两个满脸凶相、粗俗不堪的中国人赶着20头小骡子，从"北部山区"卸完货后正赶往印度，史迪威猜测他们是往中国走私鸦片的。史迪威雇用了他们的骡子，此外还通过跟当地的头人协商，雇用了60名挑夫（当地人都是"好人"）。

天亮后史迪威站在一辆卡车上对大家训话，说明了行进的计划并定下了规矩。所有的食品都要集中在一起，每个人除了武器和弹药外，所

有自己带不了的个人物品都要扔掉。前面还有约140英里（约225千米）路程，途中还要渡过一条河流和翻过一道山脉。山的海拔达7000英尺。他们必须每天走14英里（约22千米　）；达不到这个进度他们的粮食就会不够，而且可能遭遇大雨。他警告说他们只有靠纪律才能够活下去。任何不想接受他指挥的人现在就可以走开，可以得到一个星期的口粮。他四处看看，没有人走。最后他说：“等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你们很多人会恨透我，不过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都会走出去。”

他走在队列前面，采用的是每分钟105步的标准部队速度。卡斯纳将军的阴魂大概还陪伴着他，不过他现在是唯一参加很久以前第十五步兵团急行军的老兵了。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很多美国人由于炎热走在后面或者掉队。缅甸雨季到来前的5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史迪威对这种虚弱和“他妈的不像样的体质”非常恼火。他每小时允许休息五分钟，但其他时候不减慢速度，也不停下。到了一条河的时候他照旧大步跨进，“顽固地瞧着手表每分钟保持105步”。他稳步蹚水而过，而其他人也排成一列纵队跟在他后面。疟疾和痢疾开始袭击这些行进者，人们变得虚弱，步伐也慢下来了。史迪威不得不把休息时间延长到十分钟，尽管他知道每增加一小时，他们的危险就会增加一些。两个军官中暑倒下，结果不得不把他们驮在本来已经超负荷的骡子身上。有一次宿营时威廉斯上校的药箱被偷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蚂蚁、荆棘、破裂的口袋、挑夫逃跑、一头四处骚扰的大象、昆虫、水蛭、腿上的疮、水疱、传染病以及烈日——这些都侵扰着行进的队伍，大家的善意和友情也在一点点被销蚀。有人发现一个军官将带有床垫和所有衣物的铺盖卷塞到了挑夫的担子上。史迪威没有直接点他的名，但当着大家的面严厉批评了他，说他多占了地方，而这些地方本可以装下一个病人。史迪威的声音由于愤怒而颤抖，他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有个听着的人不无敬畏地说：“天哪，连他的军帽看上去都好像是怒不可遏。”

梅里尔由于中暑，加上心脏不好，结果昏倒在一条河里，这样只能把他放在气垫上拖过河，后来由人抬着走。他有两个小时不省人事。另外还有些人也步履蹒跚，逐渐掉队。威廉斯为病号求情要求暂停一下。史迪威回答道：“这个队伍不能停。见鬼，威廉斯，你和我都受得了，我们俩比他们任何人年纪都要大，他们为什么就受不了？”他通过嘴上不断鞭策并以身作则敦促他们继续走下去。他一直为这100多人的口粮担心，后来决定将口粮定量减半，并指定多恩做司务长主管伙食，防止舞弊。他自己坚持领饭时排在最后一位。为防止日本人的伏击，他要求晚上由男人轮流站岗，白天则组成一个先遣队。

按照他的要求，在三天内到达乌尤江。提前赶到的信使已经安排好了木筏子。马帮由一名美国军官和一组中国卫兵护送，继续往前经陆地过去。西格拉夫的护士“总是乐意帮忙”——她们用树叶为木筏编织了顶棚，防止太阳照射，还为梅里尔以及其他病人编了医用的草垫。在撑着筏子，顺流漂向钦敦江的时候，很多人心头都对他们的目的地怀有莫名的恐惧。“这会是在萨马拉相遇 [7] 吗？”保罗·琼斯问道。由于速度“慢得要命”，史迪威让他们整夜撑船。第二天下了阵雨，这是不祥之兆。飞来一架轰炸机，从河流上游飞过，转了个圈子又飞回去了。每个人都感到恐惧，接着他们看到了皇家空军的红蓝标记，于是大家都欢呼并疯狂招手。轰炸机低飞了三圈后打开了炸弹仓，并在岸边投下了粮食袋。半赤裸的黝黑的山民从丛林中冲出来抢走了第一批空降物资。乘木筏的人们愤怒地喊叫，但只能接收剩下的东西了。空投的东西中有一袋医疗用品，这样威廉斯就可以给病人开奎宁了。他们突然发觉外界正在关注他们的困境，于是他们又有了希望，认为会有人在霍马林准备救助他们。在木筏上史迪威给贝尔登讲了他准备夺回缅甸的计划：如果美国提供飞机和物资……如果英军能够重组……如果中国人能够配合……贝尔登说：“我们先要设法出去。”他们又撑了一夜的筏子。木筏碰到礁石解体了，而史迪威“一整夜都感到累极了”。

从乌尤江走到霍马林后他们大失所望：没有人等他们，没有食物，没有留言。这使得史迪威的领导变得困难起来，开始有人嘀嘀咕咕表示不满和指责，有些人开始盘算怎样才能使自己存活下去。次日准备渡过钦敦江，可能会遇到敌人，于是史迪威命令检查武器。在钦敦江没有遇到敌人，他们乘独木舟和货船安全渡江。

帮助搬运东西的掸邦人和卡钦人现在换成了皮肤很黑、头发零乱的那加（Nagas）人和唐库尔（Tangkhuls）人——他们跟易洛魁（Iroquois）人一样在头中间留下一绺头发，但其他地方剃得光光的，刺了孔的耳朵上夹着弹匣、香烟或者花朵。他们性格开朗友善，喝米酒，可以用木制的背篓背五十磅（约22千克）重的东西。5月14日，当他们正往上爬一座3000英尺（约914米）的山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让他们几乎绝望。但是那天他们碰到了在霍马林未能遇到的救助人员：一名叫夏普（Sharp）的英军地区官员带着活猪，让他们吃了顿烤肉，而且宣布他后面还有马匹、食物、医生、威士忌、香烟以及400名挑夫。史迪威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写了一笔：“终于放心了。”夏普将带着他们去英帕尔。原来有关他正在等史迪威他们的信放在了皇家空军空投的粮袋里了，但正好丢掉了。史迪威问他，一共有四条山路，他怎么

知道他们会选择走哪条路。夏普答道："我给德里打电话，问你是什么样的人。德里说你非常聪明。这条路是根据常识可以选择的唯一道路，所以我想你会走这条路。"他还叫史迪威放心，其他的小道上都储备了物资，但同时带来一个坏消息：菲律宾的科雷吉多尔（Corregidor）投降了。

接着继续爬了五天，为了赶在雨季之前，每天的行程提高到15至16英里（约24至25千米 ），下坡时达到17英里（约27千米 ）或者更多。已经开始下了一些雨，小路变得很滑，不断有人摔倒。他们一边蹒跚前进一边骂着粗话，有时只能从路旁边的山上慢慢爬。西格拉夫的腿被感染了，最后变得十分虚弱，除了"裹在我的毯子里祈祷少受罪早点死"外毫无办法。不过他们现在有了食物，病号也可以骑在马上了，但有个得了疟疾的重病号无法骑马，只能由挑夫轮流用轿子抬着走。那些"懦夫"和"女人气"的男人现在好了些，顽强的护士们唱着基督教赞歌和美国流行歌曲。"这是怎样的景象啊……中国士兵，缅甸女孩，美国人和英国佬——他们一起在小溪里清洗、刮胡子和泡脚。"一个披着大红毯子的当地头人送给史迪威一头山羊，前来欢迎他们的那加人还用米酒和鸡招待他们。

5月20日队伍到了英帕尔。凭着细致周密的计划和不留情面的纪律，史迪威一个没少地把他那一队人带出来了——他们是唯一没有死人而到达印度的队伍，不管是就部队还是平民而言。很多在他的指挥下走出来的人都恨他恨得要命，但这114个人都知道，是他让他们活了下来。据一位记者说，史迪威出来后"像上帝一样震怒，像恶魔一样诅咒"。他体重减少了20磅（约9千克 ）。他本来身材就消瘦，现在已经不能再瘦了。他的手在颤抖，皮肤由于黄疸而变得蜡黄，眼眶深陷。多恩减轻了32磅（约14千克 ）。霍尔库姆（Holcombe）上校是属于一路上多数时候都生病的人之一，他"像甘地一样骨瘦如柴"。中国军队音信全无。

史迪威看到了乔治·马歇尔发给他的"问候"，马歇尔表示了"陆军部长、总统和整个陆军部"对他的敬佩。他则只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已经全盘落空，记下的评语非常简短："为什么？"作为一名受了奇耻大辱的战士，史迪威需要为自己开脱。在他后来写给陆军部有关缅甸战役的报告（由多恩起草，史迪威增加了一些内容）里对英军和中国军队的无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结果上面命令所有报告的备份都要销毁——然而这种命令往往是不能完全执行的。他报告的含义是，英军的表现只有一种解

释：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守住缅甸，而且为了削弱中国故意逃跑。历史真相和人们所认为的真相相比，往往后者更重要。



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正与孙立人将军交谈中

史迪威在其他地方总结的失败原因包括技术落后，这表现在空军、坦克、炮火、机枪、阵地迫击炮、弹药以及运输等方面。当地人民的敌对，日本的积极进攻以及“蒋介石愚蠢、胆怯的指挥和干涉，英军在铁路管理上一团糟，交通糟透，英国的失败主义态度，战术上易受攻击”等。列举的众多原因并未提及敌方因素，因为日军在缅甸战斗中所面临的各种现实困难并不少，战术上的困难也只会更多。根本的差异是在意图上，比如进攻者经过主动计划和准备，而防守者既无计划也没有准备，目标也不坚定。

史迪威逃出的时候，日军已经沿滇缅公路攻入中国。日军在大败刚刚调进缅甸的中国第二十九师后于5月8日占领畹町，并在中国撤退部队刚刚炸掉桥梁不久抵达了萨尔温江的峡谷。中国驻缅军大为震惊，在美国志愿团的大力支持下进行战斗，以阻止日军进入。位于南部山区的日军风头已过，加之从南部阻断中国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日军在这里停下了。



中华民国将领孙立人，摄于中国远征军时期。

华盛顿对已经陷入隔绝的中国的态度极为担心。在史迪威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马歇尔于5月9日给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发了措辞严厉的指示，要求所有在华服役的军官“对中国前途要保持镇静和乐观”；无论计划还是谈话均不得“暗示局势已经无可挽回”；各种调动要周密安排，“以免被看成美国正在撤出”。

中国驻缅军的命运各不相同。孙立人将第三十八师带出，虽然历经艰辛，但部队状态很好，他们走的路线比史迪威的偏南，于5月25日到30日到达印度。第五军的第二〇〇师杀开一条血路，并与第六军残部一同到达云南。第五军的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艰难地北撤，但由于蒋介石命令多变，他们不断改变行走方向，有时不得不走回头路。他们遭遇雨季后困在西北部的深山老林中，靠着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的空投粮食才得以存活。第二十二师的幸存者在7月和8月经由利多到达印度，而第九十六师残部在忍受了超乎想象的困苦后翻山越岭，经过赫茨堡回到中国。

中国有关缅甸战役后期的公报的风格一如既往，之后再经过了驻重庆记者和美国编辑的添油加醋的描述。根据重庆的公报，5月10日到11日，日本在云南的一个联队被“全歼”，另一队“也被歼”。中国驻缅军已经“收复”眉苗，并“正从东西两面逼近旨在收复曼德勒”，因此入侵部队已经被“断后”。美联社记者发回报道说日本入侵部队已经遭受“惨败”，而他的合众社同行更是绘声绘色，说日军正从中国“溃退”，“已经瓦解……仓皇逃跑”。美国报社的编辑们以为所有中国军队都在接受史迪威的指挥，他们怀着爱国热情在发表这些稿件时加上了这样的标题：“史迪

威击溃入侵日军”。而5月11日的标题是："史迪威中国军包围日军，入侵者全线撤退。'乔大叔'关死中国后门切断日军退路。战报！！!"那一天史迪威正在乌尤江的木筏上呢。

史迪威及其一行从英帕尔这个避暑胜地乘卡车到达阿萨姆邦的火车站，然后经过无边无际的黝亮的茶树林，乘火车到达丁詹（Dinjan）和廷苏基亚（Tinsukia），这里设有空中运输队（Air Transport Command）的机场。韦维尔和亚历山大、第十航空队的布里尔顿和比斯尔以及他在新德里的参谋都来看他。5月24日，史迪威乘坐布里尔顿铺着波斯地毯的飞机飞抵德里，他已经声名远播。在从机场到帝国宾馆（他发现这个宾馆的地址是很简短的"舒适"）的路上他后面跟着一大群记者，于是他同意召开记者会。在一个小时的提问时间里他强调说，最具破坏性的是日军的空中优势，并对这场战役做了历史性的总结："我认为我们被狠揍了一顿。我们被赶出缅甸，这是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查找原因，并回去重新夺取缅甸。"

这番话的分量毫无疑问非常之重。《旧金山纪闻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后来回忆说，史迪威的诚实像"疾风"吹跑了陆军公关们的浮华辞藻。《纽约时报》在头条社论中说，尽管丘吉尔和罗斯福擅长辞令，"但他们都可以从史迪威将军这里学到不少东西"，至于其他职位较低的官员，他们也可以注意"他的用词和原则"。史迪威这段话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以后每当他成为新闻人物的时候都会被引用。他打算做一件简单的事情：把真相告诉公众。

---

[1] 林可胜（1897—1969）：生理学家，在"二战"时参加红十字会。——译者注

[2] 侯将军疑为侯腾，参谋团参谋处副处长，时任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译者注

[3] 军队习惯用代码代指人或项目，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史迪威用了那么多绰号，尽管这无法进一步阐释这些绰号的意思。

[4] 恰尔德（Childe），是卢斯为哈罗德·亚历山大加上的名字，当取自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主人公。——译者注

[5] 这是美国海军武官詹姆斯·麦克休（James McHugh）的话。麦克休与蒋介石夫妇私交甚好，经常代为传达他们的想法。

[6] 红格朗奇（Red Grange），即哈罗德·格朗奇（Harold Grange，1903—1991），美国橄榄球手。——编者注

[7] 指无法避免地跟死神相会。萨马拉（Samarra）在伊拉克。一位青年在市场上撞见死神，想躲得远远的，便骑马飞驰到萨马拉。有人问死神此事，死神颇为诧异，说"我跟他计划是要在萨马拉相见的呀"。——译者注

第十二章

受助者

1942年6月—10月

缅甸陷落后，中国完全处于被包围之中，美国人因此担心处于隔绝中的中国的抵抗意志不会支撑太久。中国明确要求得到实质性援助的鼓励。但问题是怎么送过去。日军占领密支那迫使航线北移，空运线路更加危险和困难。而且美国优先考虑的是欧洲，对亚洲的战略仍然不明朗。目前可以预想的就是必须让中国继续战斗，从而可以把中国作为对日本海上运输线发动空中进攻的基地，并最终使之成为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美国陆军部当时一个计划的题目就是“让中国继续作战”，实际上这意味着给中国提供足够的物资，从而使之保持作战能力，而这实际上意味着收复缅甸。

史迪威在到达德里的时候已经有了收复的计划，就等着形诸纸墨了。他的缅甸经历无可置疑地告诉他，必须使用美国部队。他在5月25日发给陆军部的电报中说：“我坚信中国在战略上的至关重要性，故而认为不往此战区派遣美国战斗部队是个严重错误。”然而史迪威无法说服正全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马歇尔分出一部分力量过来。马歇尔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把第十航空队再次交由史迪威指挥。由于中缅印战区的前景非常黯淡，这更加促使史迪威下决心要在印度完成训练中国特遣队的计划。

史迪威得到的支持很少。很多在中缅印战区服役的美国人受到失败氛围的影响，而且都觉得这是个重要性很低的战区。德里的参谋们一个又一个提出辞职，有些人称病，有些人则想转到更有前途的差事。“天哪，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谁把战争放在第一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吗？”史迪威自己由于注射了有缺陷的黄热病血清而得了黄疸病，不过，尽管他觉得自己“虚弱不堪”并在此后数周里反复卧床养病，但强烈的责任感还是让他对那些知难而退的人毫不客气。史迪威无法理解一个士兵为什么可以不把完成任务放在首位。在中缅印战区工作过的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曾这样写道：“他对真正的军人职业怀有崇高

的想法，对于真正的军人是什么也非常理想化的。”



一位农民在眺望一架即将在昆明机场降落的美国C-46运输机

史迪威会晤了韦维尔，韦维尔“含糊”答应“会回到缅甸”，然后史迪威启程去重庆。由于天气原因他在昆明停留了五天，于6月3日到达重庆。在此后的七个月中他曾经七次往返于他的两个总部之间。德里和重庆的距离为2100英里（约3379千米 ），其中德里到阿萨姆邦机场为1100英里（约1770千米 ），翻越驼峰到昆明为550英里（约885千米 ），从昆明到重庆为450英里（约724千米 ）。其中驼峰一段要飞越1.5万英尺（4572米 ）的高山，这个飞行高度是正常飞行高度的两倍，有时剧烈的气流可以把飞机颠散架。在1.7万到2万英尺（5181米到6096米 ）的高度飞行必须使用氧气。速度较慢的老式运输机设计时未能考虑这种情况，因此没有相应的导航设备或者抵抗日本追击飞机的火力。这次史迪威乘坐的是时速250英里（约402千米 ）的B-25轰炸机，这种飞

机“不太舒服，但速度极快。比运输机强多了”。

考虑到缅甸的惨败，史迪威觉得蒋介石夫妇的接待不同寻常的热情。他们邀他去黄山的蒋家宅邸过周末，不过他因病重没有接受。尽管蒋介石表面上很热情，其实他已经完全对盟友失望了，尤其是英国，由于还有史迪威所掌控的租借物资，他现在还不能过于表现出对美国的失望。在中国人看来，尽管蒋介石竭尽全力试图减少损失，但是在史迪威的指挥下，这场战役不但失去了缅甸，而且也损失了摩托化第五军及其炮兵部队。正如一位中国军事史家所说的，这就是“倒霉的进攻战略”的结局。这个结果更增加了蒋介石对进攻的不信任。中国有句古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1] 当面临失败的时候，不战而降也是善之善者。当蒋介石将他所认为的两个军的精锐部队交由一个外国人去指挥的时候，他可从来没有想到会毁掉这两个军。他这样做原是为了取悦美国，从而使中国可以得到更多的租借物资，其实并没有当真。史迪威的指挥是有名无实的。

但中国很有理由感到失望。中国原来对盟国的援助抱有极大希望，没想到现在处境更加艰险：滇缅公路丢掉了；日军开始进攻云南；由于杜立特尔所发动的空袭，日军重新对浙江发动攻势。中国人担心这种攻势可能殃及长沙，甚至重庆。尽管盟国在军事上屡遭失败，但也并没有把中国作为盟国而平等看待。让中国人愤慨的是《大西洋宪章》有反殖民地原则，而《太平洋宪章》却没有类似原则。他们对老是强调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感到厌恶，觉得自己因此受到了冷落。这并非凭空猜测。丘吉尔这年6月第二次去华盛顿参加盟国会谈，而中国则被排除在外。更让中国不满的是继续不让中国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中国直接要求加入联席参谋长会议，但在6月13日被拒绝，理由是为了保密，而加入参谋长会议本可以让中国自动成为军火分配委员会的成员。

结果这让中国当局看透了这场战争，越来越缺少主动性了。在缅甸陷落后，重庆的茶馆里流行的是一种“让盟军去打”的态度。以夷制夷自古就是中国治国方略的重要原则，现在这条原则不但可行，而且合理。根据住在中国的一个外国人的说法，中国的舆论认为，中国在经历了五年抗战后不但有理由消极下来，“而且中国有权利在作战时尽可能多地得到盟军的帮助”。政府现在战时的主要心思便是如何行使这种权利。中国长久以来试图摆脱外国人并独立自主，但是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中国的问题太严重了。国民党既然越来越无法应付自己的问题，因此便竭尽全力在依靠外国人的同时尽量得到更多的东西。

蒋介石立即告急。他在5月25日警告美国，除非中国人明确得到盟国的帮助，否则“中国对盟国的信心将彻底动摇”，而这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抵抗会完全崩溃”。日军在浙江的挺进增加了他警告的分量。蒋夫人在5月23日写给租借物资管理局局长劳其林·居里的信中说，士气“从来没有如此低落过”，并说委员长“第一次”感到悲观了。随后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蒋介石要求总统派哈里·霍普金斯代替罗斯福到中国来，因为局势“之危急是我本人所未曾经历过的”。其他的信件则警告：失败主义者正在抬头，他们正准备推翻蒋介石并与日本和谈。罗斯福在这之前已经非常担心。他于5月5日要求阿诺德将军“想方设法”为中国运送物资，因为“不管困难多么大，保持道路畅通至关重要”。高思大使尽管对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的威胁并不当真，但也相信中国“虽不宣布媾和，但实际上中止敌对行动”——中国长期采用这种消极方式并非不可能。

这恰好违背了派遣史迪威去的初衷。《租借法案》在本质上是为了调动盟国人力对付共同敌人，而史迪威的使命就是为了保证租借物资确实用到了这个方面。现在他的障碍是这个受助者用户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采取了消极态度。蒋介石在勉强作战，目的只是让给他的援助物资不致中断。他仅仅凭着发出各种警告是不可能得到足够物资的。要使美国答应提供必需的物资，蒋介石就必须保证能够取得战果。史迪威在这件事上有决定权。蒋介石认为，作为他的总参谋长，史迪威的责任就是保证他能够得到想要的一切。

史迪威却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担当一个供需官的角色，也不认为自己这个“参谋”只是为了达成中国的意图的工具。他把自己看成一个战士，其使命和意图就是打败敌人，为此他需要一支部队。不管是不是要由美国部队打头阵，这支战斗部队的主体必须是中国人。为了提高战斗力，现有中国军队或者任何其他用于战斗的队伍都必须经过改造。如果他是个顾问，那么他会像他之前的很多人那样试图进行根本性改变。不管是货币、司法、海关税收、政治体制或者是农业，这些领域的顾问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锐意改革。任何在1942年那样的状况下派到中国工作的人都不可能不强烈地感到改革的急迫；除非他属于那类中国通，认为中国“就是那样”，改革是徒劳的。

史迪威可不是冷眼作壁上观的人——他有信仰，是个实干家。正如马克斯韦尔·泰勒当年在北京所看到的，他看到不对的东西就想改正。一个中国本土的观察家说：“每个美国人对中国都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法。”史迪威的方法便是改革部队，这是出于对中国、对战争以及史迪威

本人的考虑。史迪威看到“散布中国全境”的300多个师平均只有满编的60%，而指挥官拿到的是满编的军饷，“军官大发其财，士兵死于营养不良、疟疾、痢疾和霍乱，病号被抛弃。弹药和武器被拿去卖掉。各个‘前线’上与敌人的私通已经公开化……运输工具被用来走私，而运送部队则没有车”。蒋介石“从来不视察自己的部队”，却老是谈论卡车、飞机和枪炮，这“只能暴露了他完全不知道训练、补充、指挥、医疗和后勤保障等的必要性”。史迪威知道需要改革的力度极大，很可能最后弄巧成拙，不过他认为，有租借物资作为报偿，他还是可以提出改革这种要求的，至少可以把训练30个师作为改革的第一步。

还在德里的时候，他就已经就军事弊端和需要写了材料。他到达重庆的当天是向蒋介石汇报最近战况，去时他带了这个材料。虽然他病了，但他急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因此还是强迫自己起了床。正如他在给史汀生的信中说的，他希望通过告诉蒋介石驻缅军的表现而使他“害怕并进而同意对部队重组”。“中国的好几个高级军官应该被枪毙。”这其中他指出了第六军军长甘丽初，此外还有两个师长和一个团长。

尽管蒋介石每天都从重庆向驻缅军发布命令，但是对军队现状、战场上的表现以及其他情况很少有第一手的了解。在他周围那种充满狡诈的气氛里，没有人会告诉他现状正在恶化，而且情况越糟就越不可能告诉他。这不仅由于别人都怕他或对他唯唯诺诺，而且因为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态度是喜欢顾全面子。中国有句俗话，大意是：“隐恶扬善可以维持社会和睦与个人尊严。”正由于这个原因，蒋介石处于史迪威所说的“无知和愚蠢的自满”之中，要使他相信需要军事改革也就变得更加困难。

这次他向蒋介石夫妇报告了战役的“全部真相”，“还指名道姓……这无异于在一个老太太的肚子上踢了一脚”。可是“正因为别人都不敢把这些告诉他，所以我才更有必要告诉他”。直接向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中国人，指出他领导下的种种弊端，这并不是帮他改进的最好方式，但正在敦促对敌作战的史迪威觉得他别无选择。接着他提出了他的军事改编计划，这个计划首先需要缩编部队并集中使用现有武器和装备。1928年到1930年，正是军队遣散的问题让蒋介石的改革努力付之东流，而现在仍然还是这个老问题。自那以后，他竭力通过采取不提供补给或者不补充兵力设备的方法来逐渐消灭各省的非嫡系部队，但收效不大。史迪威现在提出：“把一些师合并，使其达到满员并将现有武器充分配置到这些师中……少量可靠、装备精良、有充分支持的师的价值要胜过现有普通师的两倍……而且效率更高，更便于提供供给和调遣。”尽管现在中国资源

匮乏，但仍然足够造就一支“有用的（现在并非如此）”的队伍对日军进行有效抵抗，直至盟军发动攻势改变力量对比，并赢得胜利。



“飞虎队”队员与中国军官共享可口可乐的画作，1943年

他还提出要根据素质彻底筛选军官，提拔有能力的人并“坚决清除高级指挥官中的无能之辈”，并说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那么“无论提供多少物资支援，部队必然会继续走下坡路”。最后他指出了一个敏感问题，认为蒋介石必须选出一个他信任的人担任前线总司令，“给他一般性指令，并让他不受任何人牵制地调配部队”。史迪威把这份计划交给蒋介石夫人，她很快地看了一眼然后说：“噢，那些德国顾问就是这样向他建议的！” [2]

蒋介石对这份备忘录未予答复。十天后，他们再次商谈原先答应过的派遣部队去印度接受训练的问题，这时蒋介石又把话题转到了物资问题上。“还是那堆老问题——飞机、坦克、大炮等将赢得战争。我有点儿火了，告诉他唯一的办法便是彻底改编地面武装。”这时蒋夫人插话说，蒋委员长必须考虑到“某些势力”。

史迪威对1929年蒋介石遇到的军队遣散问题早有自己的见解，深知蒋介石在中国的军事体系中面对各种复杂的私人势力的牵制，其实身不

由己。对各战区司令统辖下的军队，蒋介石其实并不能很自由地进行调遣；他能够完全控制的只不过是中央政府统辖下的10个军。史迪威曾以“花生米独裁者的困难”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分析那些使蒋介石无法自由行动的诸多因素：蒋介石让太多的部下集省主席的行政职能和军事最高负责人的军事权力于一身。“现在他觉得这些人的势力太大，一年来一直想削弱他们，但是没有成功……威胁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花生米（蒋介石　）想削弱薛岳。如果他撤出薛岳的部队，薛就会叫起来：‘我无法负责我辖区的安全了。’薛甚至可以商量让日本做出反应。薛可以要求下属施加压力，不久中央政府的各级官员都会听到各种不满的声音。他们接着会告诉花生米反对太强烈，硬着干可能生变。因此花生米只得作罢并维持现状。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他不敢采取激进的行动。”

然而，一支精悍、高效、“有用的”部队显然符合当局的利益，因此史迪威无法相信，“有美国为他撑腰”，蒋介石还会错过“他人生中难得的好机会”。即使撇开军队的战斗力不说，从中国的福祉来说，也必须减少由于拉壮丁而造成的农民劳力的流失。但是这时蒋介石展示了一个对于受助者来说最不可思议的表现——虽经点拨却仍然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或者在美国人看来的他的切身利益。失望的史迪威认为，只有某种政府外的力量才能够帮助中国：“或者敌人的行动使之崩溃”，或者——这里他的词句异常犀利——“可以形成某些革命性想法并立即付诸实施”。

蒋介石对史迪威建议的抵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他认为史迪威能帮他从美国弄到的东西的多少按比例变化的。为了继续得到美国援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美国陆军部此时拟订了一个计划，那就是利用积压在印度无法运出的4.5万吨的中国租借物资发动战役，重新夺回滇缅公路。［另有14.9万吨物资拥堵在纽波特纽斯（Newport News）码头，最后被美国重新收回。］蒋介石对重新发动陆上攻势兴趣不大。他要求美国提高通过驼峰的空中运输能力，这出于两个目的：可以继续让战争物资为他所用，还有就是维持并为陈纳德的空军提供燃料；陈纳德保证说他的空军会完成打击日军的任务。

空运队仅有不到25架飞机，远少于罗斯福所承诺的100架。由于普遍缺少飞机和飞行人员，军火控制委员会没有满足中国所坚持的增加运输机数量的要求。此外也没有满足中国对战争物资的要求——尽管中国已经被封锁，且要求得到的物资却仍然数量巨大。问题在于同样要求优先考虑的“波利洛”[3] 计划和苏联人，但宋子文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史迪

威。他发报说，“由于你没有发来电报表示支持”，陆军部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反应“甚为缓慢”。他敦促史迪威要意识到他在美国所拥有的“神奇的影响力”，该影响力可以上达总统、国务卿和总参谋长，而且“他们会支持任何来自你的要求”。这里面充满了恭维，但是宋子文最后那句话是中国人所深信不疑的。由于中国人对欧洲战争毫无兴趣，他们坚信美国物资的数量是无限的，他们现在的物资短缺完全是由于史迪威没有提出请求。

经过宋子文的点拨，蒋介石开始比较考虑史迪威的要求了，这种转变体现在蒋介石逐渐同意了在印度练兵的计划。在6月24日的会谈中，蒋夫人帮助史迪威向蒋介石逐条申明了理由，最后史迪威大部分条件都得到了满足。由于史迪威拒绝让杜聿明担任总司令，最终达成了这样的意见：如果史迪威接受罗卓英作为负责军政和军纪的副司令长官，那么史迪威本人可以指挥和控制训练。蒋介石甚至同意空运5万名士兵过去。这是谈判中常有的那种“突然的态度转变”。其诱饵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为了给中国提供物资武装中国军队准备反攻，每月要从驼峰运送5000吨物资，并提供500架战斗机。

让人头痛的通过驼峰航线的物资运量问题成了中国战区的关键问题。自4月以来，由于在雨季中断运输以及为难民空投救济物资，运输机每月仅能往返两次，结果运到中国的物资平均每月还不到100吨。尽管做出了各种承诺，但是飞行人员和设备都很缺乏，飞机无法及时维修，阿萨姆邦的机场简陋不堪，无法满足需要，而天气又变化无常。美国现在在海外有7个航空队，在美国本土有4个，这些力量都需要物资。用阿拉斯加一位指挥官的话说：“我什么都要！”他的话很有代表性。驼峰航线的需求最大，供应的设备先要从美国经过1.2万英里（约19312千米　）运到印度西部港口，再通过铁路经1500英里（约2414千米　）运到加尔各答，然后再经过阿萨姆邦——孟加拉窄轨铁路运到机场。

这条铁路原是为了运输阿萨姆邦出产的茶叶的，速度慢得让人发疯。在从加尔各答到利多的路程中有三种轨距，其中有一段还要借助驳船通过一条没有桥梁的布拉马普特拉（Brahmaputra）河。英国管理的习惯和节奏是适应非紧急时期的。1942年夏天，由于印度国大党发起罢工和不合作运动，工人经常不能持续工作。通过阿萨姆邦——孟加拉铁路的运量常常无法达到预期水平，而刻板的铁路管理人员甚至对能干又有礼貌的“矮墩子”、负责中缅印战区后勤的威勒（Raymond A. Wheeler）将军的命令也敢于违抗。这个问题妨碍了物资供应，一直持

续了将近两年，直到1944年2月达成协议，由美国铁路营对该线路实行军事化运营。

在驼峰的中国那一头，运送给陈纳德志愿队的燃料和零件在到达昆明后，还必须经数百英里的公路运输和水运才能到达各个空军基地，这段运输可能需要长达8个星期的时间。空运队每向中国运送1加仑（约3.7升　）燃料，自己就要耗去1加仑燃料，而要陈纳德向日军投下1吨炸弹，必须要为之提供18吨物资。一架货机可以运大约4到5吨物资，在最好条件下每天可以完成一个来回。但在某一时刻，可以正常运行的飞机很少能达到总数的60%—70%，而且天气和其他故障也会减少飞行次数。在三年中损失了468架飞机，平均每个月13架。有时候，飞行人员可以跳伞并由美国战略情报局派往缅甸的特工所组织的卡钦营救队带出，还有些死在丛林中，或者被日军俘虏，有的挂在树上，其尸体很久以后被发现时已经被蚂蚁吃掉了。



正飞越驼峰的运输机



美军的寇蒂斯C-46运输机



C-54 “空中霸王”

由于长期缺少空军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陈纳德恨不得用掉所有的援助物资。他时常发怒，这跟中缅印战区的史迪威或者几乎任何其他人都

差不多。他写道，他的士兵在忙着修飞机，拆卸报废飞机的零件，或者过滤发动机的油以供二次使用，这时候看到美国参谋部的军官们“提着公文包不可一世地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走来走去，这让我们都怒火中烧”。飞越驼峰时，有些宝贵的舱位被乘客所占用，而这本来可以带上美国志愿队所急需的燃料、轮胎、火花塞、汽化器、工具、外套、香烟、肥皂或者任何别的东西。1942年7月4日，陈纳德的队伍正式编入美国空军后改称驻华空军特遣队，由陈纳德任队长，并成为第十航空队的组成部分；第十航空队是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唯一空中力量。陈纳德被提升为准将，但是他极其厌恶的比斯尔已经比他早一天提升为准将，并被任命为该战区空军司令。蒋介石认为，故意不用他推举的人担当此职不啻于“当头一棒”［根据麦克休（James McHugh）的说法］，表明中国得不到急需的空军力量，但是真实情况是阿诺德将军不喜欢陈纳德。中国开始四处活动想撤换比斯尔并提升陈纳德，最终达到了第一个目的，但是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



陈纳德将军在部署作战计划

尽管陈纳德是个红人，但他跟蒋介石之间也有麻烦，这跟史迪威的

情况颇为类似。蒋介石夫人有一次告诉陈纳德，他将来应该直接跟委员长联系，无须通过她。他回答说，如果没有她作为中间人，那么那些怀有私心的人就会说服委员长“发布不可接受的命令”。他对这种前景感到十分担心，结果最后蒋夫人只得同意一切照旧。陈纳德负责训练的中国飞行员，也跟史迪威的那些中国军官一样有问题。陈纳德在1942年5月对蒋夫人抱怨说，局势“每况愈下，现在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最差劲的飞行员被调去担当教官，而这些人“没有能力”从事教学或者维持纪律。他们不理会美国人的建议并“憎恨美国人的影响”。陈纳德在他过去四年中一直无法纠正这种局面，但又无法担保让这些飞行员在美国受训。他不得不向陆军部报告说“中国极度缺乏各种飞行训练方式”。如果想继续下去，他就必须“全权负责”训练学校和人员。后来陈纳德在大谈史迪威个人的缺陷怎样造成了跟委员长的冲突的时候，他对自己遇到的问题只字未提。

物资缺乏更让陈纳德恼火，因为他信心十足地认为，如果有足够的物资，仅凭他的空军就可以通过阻断日军的南海物资运输线而打败日军。通过单一手段解决问题很有诱惑力。陈纳德曾经写道：“我们总是应当审视那些最佳手段，而忘掉可行性之类的问题，否则我们很快就会深受其害。我们应当看到可能性，并为之振奋。”他自己就因为这些令人钦佩的原则而大为振奋。他在那年夏天写给史迪威的信中说，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上需要切断日军海上运输线，让中国地面部队对日占区发起进攻，消灭日军在缅甸和印度支那的空军力量，解除日军对印度的威胁，保卫通往中国的驼峰航线，“并打一场成功的反攻以激励所有盟国”。如果能有500架战斗机、100架运输机并让陈纳德“全权指挥”，那么陈纳德就可以达到这些目标。

在蒋介石夫妇看来，这个论点让人信服。如果有500架战斗机、100架运输机并让陈纳德“全权指挥”就能赢得战争，那就无须改造部队，也就不必危及蒋介石岌岌可危的权力体系中各派系、人员和战区司令之间的微妙平衡了。空军用不着中国费什么劲，而且看上去也很容易。蒋夫人在回复陈纳德的一份战况周报时写道：“如果我们每天歼灭15架日军飞机，不久敌人的飞机就会被打光的。”蒋介石夫妇现在所专注的就是设法让美国提供有500架飞机的空军力量，并通过驼峰航线提供物资装备，使空军可以作战并维持下去。

蒋介石对不能满足承诺越来越不满。根据“哈普罗”（HALPRO）计划，本来准备从中国出动B-24轰炸机轰炸日本。蒋介石对此计划很感兴

趣。但根据史迪威的建议，该计划被取消，而飞机也留在了埃及，原因是浙江的机场已经被毁而且空运队的物资运输不足，这使得计划不可能完成。由于其他方面的需要，原来承诺给空运队的100架运输机被减少到75架，后又被减至57架。史迪威不得不通知蒋委员长，在目前情况下空运队的运输量甚至不能达到预计每月5000吨的十分之一。跟古代的国王一样，蒋介石迁怒于带来坏消息的人，更让他恼火的是，宋子文报告说史迪威并不是很出力地向美国申明中国的要求。

在委员长看来，作为总参谋长的史迪威无疑是渎职。他认为，一个外国人无法从自己本国获得必需的东西，这是影响力不够的结果。至于说这些物资必须长途跋涉经过轮船、铁路和飞机运输才能抵达中国，这不关他的事。他对运输保障所涉及的具体事务不感兴趣，相关知识也十分有限。如果史迪威办不到，这意味着或者他影响力不够，或者他没有全心全意地为中国考虑。蒋夫人对前一种情况有办法弥补，对后一种情况也可以加以诱导。她对史迪威说："我们要看着你成为一名四星上将。"恼火的史迪威在日记中抱恨道："让他们见鬼去吧。"他对参谋人员说，他认为这不过是蒋委员长为了让他顺从地支持所有中国要求而给他的贿赂罢了。事实的确如此。

6月底，由于供应问题导致了"三项要求"的危机。导火索是德军隆美尔在6月21日夺取图布鲁克（Tobruk）将英军赶回到埃及，这使得德军可能通过中东突破的威胁再次显现。危急关头，布里尔顿第十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连同空运队的运输机以及飞行人员全部调往埃及，另有一支准备飞往中国的B-24重型轰炸机也停在喀土穆转给英军使用。又是史迪威去向委员长转达的这个消息，他所看到的反应也是预料之中的，而且史迪威自己也有同感。"我们所有承诺均未能兑现，还轻松地告诉他说，坚持下去，老伙计。"



宋美龄

蒋介石夫妇利用这个机会大发雷霆。蒋夫人怒气冲冲地说，每次英国人吃败仗就要把中国的物资拿走，“这样的话中国还有什么必要继续打下去”。蒋介石声称中国受到“轻视”，并要求美英就是否把中国“看成是盟军战区的一部分”做出“明确的回答”。他马上话锋一转，谈到了他真正感兴趣的东西：租借物资。他说，运抵中国的物资还不到罗斯福所承诺的10%，这不啻于“违抗”美国总统的命令。“作为我的总参谋长，你有责任保证我们得到这些承诺给我们的物资。”见面结束时，蒋夫人以最后通

牒的口吻说："委员长希望在盟国是否认为本战区有必要并会给予支持的问题上做出是或者否的答复。"

史迪威甚表同情，因为他想让这个战区得到更多支持的愿望跟他们一样强烈。但是他们将责任推到他的头上就让他恼火，"我针锋相对，告诉他们我是怎么请求的"。他认为这种发作是蒋介石夫妇精心安排的，因为他们相信表示"强烈不满"可以让他们处于主动。这是很可能的。尽管表面上很客气，有各种礼遇、会晤来表示友情以及其他关系，但是中国人本质上把西方人视作对手，不管打什么交道都是要占上风的。此外，蒋介石夫妇不满的深层原因还在于，他们不能像英国人那样支配本国的租借物资。这种区别对待是基于一种常识，那就是如果由着中国自由支配这些物资的话，那么其中有很大部分将不会被用来对付日本。不过，这样显然对中国是有歧视的。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丢面子的事，也是他讨厌美国特派来的支配租借物资的史迪威的深层原因。

三天后正式拟定了要求限期答复的包括"三项要求"的最后通牒。这些要求包括：

1. 美国派遣三个师在8月到9月间抵达印度，以恢复中国通往缅甸的交通线。

2. 自8月开始中国战区应有500架战机投入作战，并维持这种实力。

3. 自8月开始空运队每月保持5000吨物资的运输量。

蒋介石夫妇说，如果这些"最低要求"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只能"解散"中国战区，他们也会"调整"立场，并可能需要做出"其他安排"。

史迪威很乐意转达这些要求，因为除了飞机数量和时间限制外，这些要求跟他自己向马歇尔提出的要求相去不远，但是蒋夫人随后提出，他提交要求时应附上自己的意见，对此史迪威拒绝了。他告诉她说，他不可能对针对自己政府的最后通牒表示赞许。蒋夫人"火了……开始对我大喊大叫"，叫来了她的秘书，"并对我说的一切做了记录。显然气急败坏了。她长袖善舞，可是玩偶却没能受她摆布"。史迪威利用这个机会指出了他的双重身份。虽然他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但是在自己政府的问题上不能对他发号施令。他还解释了自己别的身份：他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是美国政府驻盟军战争委员会以及援华租借物资的代表，此外，他还是"一个发誓效忠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国陆军军官……如果她不能理解这一点，那么她比我想象的还要笨"。

他还向蒋夫人解释了每个月通过驼峰运送5000吨物资需要怎样的运

输保障：304架飞机，275名飞行机组人员，地面上要有3400名地勤人员，航线两端各需要五个机场，每个机场都要能接应50架运输机。“她这才开始有点明白了。”他最后告诉她说，他认为委员长“需要的是一名战士而不是一个橡皮图章或者一个传声筒”。这里，史迪威显然言有所指，因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为了让人相信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并非虚张声势，同时也由于单独媾和是中国让“三项要求”成为最后通牒的唯一资本，重庆方面开始散布谣言，说一个日本特使和南京方面的代表已经过来商谈和平事宜了。史迪威对此不予理会，因为他相信中国可以从美国得到更多东西，“可是跟日本讲和中国会一无所获”。史迪威跟高思大使交谈后高思也表示同意，并告诉华盛顿说这种威胁只是“虚张声势”，不过确实需要援助。据会晤过周恩来的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周恩来认为完全没有单独媾和的危险；相反，“抵抗正在变成一种好生意，因为这样更容易得到援助”。他说，因为可以利用美国的紧张情绪，国民党官员正为自己的外交手腕扬扬得意呢——他们跟上海的日本人接触，“以便引起华盛顿的恐慌”。

美国经不起再在可能失去中国这个作战基地的问题上冒险行事。对“三项要求”的答复取决于可用资源的数量，而这又取决于跟英国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产生的冲突和讨价还价。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总统便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安抚的信，答应近期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在处置两架运输机的问题上蒋介石被史迪威惹火了，蒋介石开始活动要剥夺史迪威对租借物资的控制权。这虽然是偶发事件，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对罗斯福说，史迪威对美国和中国政府的双重责任使得他在租借物资的问题上出现利益冲突，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总统的回复由马歇尔起草，总统深知租借物资是史迪威唯一的筹码，在回复中总统断然拒绝分离史迪威的职责，并明确史迪威的首要责任是针对美国的。“让史迪威将军在各种职责上均服从你的调遣是不现实的。”罗斯福还指出，不管由谁接替史迪威的职位，都会拥有同样的职责和权力。

这封信违反了中国人交往中的主要原则，那就是要顾及一个人的颜面，不要直接给予否定。由于白宫和陆军部似乎缺少一个了解中国习俗的文书，宋子文便填补了这个空缺。为了能安安稳稳过日子，他在把信转交给蒋委员长之前在含义和用词上均做了改动。同时，由于马歇尔给史迪威送了一份副本供他参考，因此史迪威觉得这是对自己地位的肯定，而蒋介石的想法则正相反。之后几周里他们之间纠葛不断，彼此的

不满加深了，直到真相显现。可以想象，蒋介石读到原来的文本后他觉得受到了侮辱，并再次提出抗议要求解散中国战区。为此，宋子文被专门召到白宫，并被当面告知史迪威的地位没有改变。宋子文跟蒋介石其他部长和官员一样不想充当坏消息的使者，因此他仍旧相机改动函件内容。两年后，由于又多次遇到这种篡改信件的情况，总统下令自己与蒋委员长之间的所有通信均由驻重庆的高级美军军官负责传递。

在还没有收到有关对“三项要求”的答复之前，史迪威就继续施加压力要求在印度练兵，也就是训练30个中国师和反攻缅甸计划。史迪威跟委员长的关系表面上仍然很客气，但不时受到冷落。跟军政部会晤后总是能让他看到合作的希望。中国人是不喜欢说“不”的。史迪威老是觉得即将取得进展了。他注意到有流言，可能是宋子文处散布的，大意是说他断送了驻缅军第五军和第六军发起的进攻，然后他自己“逃跑”了。但总有一些中国朋友希望他的改革计划能够成功，并不断鼓励他。曾士奎在缅甸战役时任首席翻译，现在他继续担任联络官。他曾经找史迪威谈话，“并认为我可以调动足够的影响力来对局面施加重要影响”。

这几个月史迪威的日子并不好过。史迪威得了黄疸之后又“肚子痛”，后诊断为腹部有寄生虫。他曾经在36小时里服用了8种药物，而且令他吃惊的是，过后居然“好多了”！6月，他母亲逝世的消息让他很难过，另外他眼睛的状况也让他很担心；他的眼睛多年来就一直不好，几乎完全依靠一只眼睛在看东西。重庆的空袭和炎热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因此他想念卡梅尔和家人。他曾经接到马歇尔和史汀生的信向他保证说，如果仍然无法赢得委员长的积极配合，那就准备把他派往更能发挥他作用的战区去。

也有一些让人振奋的事情。经过漫长的谈判，尽管印度政府极不情愿，最终韦维尔答应将蓝姆伽（Ramgarh）划给史迪威，作为训练中国部队的基地。这里原来关着2万名意大利战俘，位于加尔各答以西200英里（约321千米 ）的地方。英国人担心大群武装的中国人可能会对印度人的反叛产生影响，此外，他们也并不想利用中国人夺回缅甸。然而已经有第三十八师和第二十二师的8000名中国士兵到达印度，而且美国不准备向中缅印战区派遣自己的步兵，因此极力推动史迪威的练兵计划，并终于获得了准许。根据协议，英国人为中国军队提供食宿和军饷，其费用通过反向的《租借法案》解决，而美国人则负责提供装备和训练。训练最初有8000人。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后，蒋介石在6月24日答应增派的部队在10月份开始空运到达。

要改革部队则困难重重。中国军队系统分成两派，分别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领导下的军队官僚和掌握主要实权的黄埔系。何应钦的党部跟既有组织体系关系密切，这就是为什么正如史迪威所注意到的，一个像杜聿明那样的将军可以“那么独立”。何应钦对使用中央政府军的任何行为都坚决反对，因此可以预料，他对可能需要改革或者采取行动的任何计划都会反对和抵制。

黄埔系的领袖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的元老陈诚和胡宗南将军，他们比较倾向于改革。陈诚是湖北省长兼司令长官。史迪威在1938年曾经认为陈诚是将军中“势力最强大和最有意思的”，而且蒋介石现在有意让陈出任总司令，或者可能的话取代何应钦。陈诚跟蒋介石关系密切，在蒋介石的儿子们还没有准备好之前是临时接班人，因此也是受到蒋介石重用的人。考虑不被蒋介石重用的人是没有用的。甚至有人认为陈诚自己就想接替蒋介石的位置。他跟蒋介石外表相像，都剃着光头，留着小胡子，说话声音尖利，甚至有传言说他们是同父兄弟。尽管如此，他在统一战线时期曾经跟周恩来和共产党共事过。当时他们在军队的师级建制上建立政治部，并用共产党的办法发动群众抵抗日本。

另一位黄埔系的领袖胡宗南也是委员长的心腹，并在西安的司令部指挥防范共产党。他统率的部队有40万人，是中国数量最大装备也最好的军队。他跟同属黄埔系的另一个人物戴笠关系密切。

此外，还要考虑众多其他一些忠诚度不一、关系错综复杂的人。张发奎属于南方派系，曾经是北伐军铁军的指挥官，尽管他“捞了钱后已经贪图安逸”，但仍然是有影响力的人。包括陈诚，至少还有7个战区的司令，他们都集政治和军事职位于一身。其中还有位传说一向争强好斗的湖南省的“老虎仔”薛岳，是“军队中唯一的硬汉”。当蒋介石发出指示对他进行干预的时候，他“大喊大叫要求离职”。其他7个不属于核心位置的人都是半封建军阀，如山西的阎锡山和几乎自治的云南省主席龙云。龙云个子矮小，通过鸦片聚敛了大量财富，发行自己的货币并拥有自己的部队。他跟蒋介石的关系紧张。有次遇到政治危机，需要他去重庆，他一直要等蒋夫人来到云南府充当人质后才肯出发。

这7个人还包括浙江省司令顾祝同，在对日作战时他“躲在50多英里（约80千米　）的后方，从来不敢往前”。史迪威在北平时的助手、现为武官的包瑞德上校亲自视察了前线，并回来报告说衢县的情况“糟透了”。衢县有个重型轰炸机机场，蒋介石之所以极力反对杜立特尔轰炸，就是担心会失去这个机场。现在这个机场已经由于那次行动被毁了。根

据包瑞德的报告，蒋介石又开始在重庆指挥作战，“战果辉煌一如既往……花生米让两个军藏在山里，企图在日军通过的时候从侧面袭击。日本人封住了出口继续前进……部队装备极其简陋。没有医疗设施。没有运输工具。很多人病倒了。大多数入伍者都是被强迫、绑着送来的。强行征兵令人震惊。抓住的都是些没有钱或者没有势力的可怜人……这个小傻瓜为什么意识不到他唯一的希望就在于30个师计划，在于另外造就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

对这个令人恼火的问题的回答是逐渐显现的。很久之后史迪威才不得不承认，其实蒋介石并不想要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这样一支部队对他带来的威胁要比好处更大；蒋介石担心这30个训练有素的师可能由一个新的领袖或者集团管辖，这将会动摇或者威胁到他的控制权，而且史迪威提议要清除那些无能指挥官，这将会除去那些忠诚于蒋、对蒋感恩戴德的人；蒋介石感兴趣的并不是一支能打日本人的队伍，而只是一支能够让他在中国维持下去的部队，为此蒋认为只要比共产党有更多的部队、大炮和坦克就行了。

史迪威继续努力。推动他的是一个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的信念以及这样的看法，那就是美国援助给了他巨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使得他可以要求对部队进行改革，并能够克服政治上的障碍。他的设想是这支部队最终被压缩成约100个满员师。其中最核心的是头30个师，他们将在昆明附近完成训练和装备；他们将成为Y军，也就是对缅甸发起两线进攻中的东线。（在美国的作战计划中，这个战役被称作X—Y计划，其中X代表从印度进攻的部队。）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并不是对整师进行训练；他只负责训练干部，再由这些干部负责训练部下。中国军政部对“总框架”表示同意，但老是不肯确认开始训练的具体日期。

为了鼓动委员长，史迪威在一份新的备忘录中强调了这样做的理由。他敦促说，中国不能把设想建立在自己并不拥有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强大的空军或者大规模炮兵——而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力量，即“以步枪、机枪和迫击炮武装得还不错的大量士兵”。在现有师数量减少50%并使其编制满员的情况下，每个单位都可以正常配备这些武器，此外，还可以改善炮兵支持。史迪威最后说，“我意识到并且重视在推进改革指挥方式时所面临的种种反对意见”，但他并没有就此提出具体建议。





历久弥坚的蒋孔联盟

蒋介石对这份备忘录置之不理，其态度跟对待史迪威在过去一个月提交的其他五份备忘录是一样的。史迪威要求见蒋介石，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仍然没有答复。史迪威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我陷入一生中最无聊的谋划之中，竭力想指导和影响一个顽固、无知、充满偏见和自大的暴君。除了我，谁都不跟他说真话，因此他觉得我的话难以置信。”他给史汀生解释说，他试图通过告诉他“完全的真相而逐渐赢得他的信任”，而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期望罢了。他继续给史汀生写道：“我试图找出这个人的一些优点，应该考虑到他的环境和经历……他没有受到像样的教育……他没有朋友，只有一群仆人，这些人在他面前无一例外地感到不自在。”他唯一真正的朋友便是他妻子。“实际上她很怕他，一旦他发火她便退缩了。她认为自己的职责便是努力使中国强大。”如果她担任委员长的话，“进展就会比现在快五倍”。

史迪威的总目标是竭力发动一场没有人喜欢的战役——收复缅甸。他向蒋介石提议发动这场战役时是把它当作蒋介石向华盛顿提出最后通牒的一个下来的台阶。如果“他表示愿意合作”，委员长就会得到美国物资，而一旦中国做出承诺，则美国就必须为战役提供相应规模的供给和支持。华盛顿必须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参与。史迪威仍然希望至少能有一个美国师参加，并认为，如果中国人和美国人准备开战的时候，“英国人不大可能不采取行动收复自己的领土”。

基于这种考虑，7月19日，他以原先两线进攻的构想为基础，进一步向蒋介石提交了四点军事计划。这个计划要求中方有“20个精锐师”参加。这个计划的诱人之处是，可以重新使仰光成为海运物资集结地。史迪威估计，这可以使陆军部再次以每月3万吨的数量连续提供六个月的物资。在发动陆上进攻的同时，该计划还要求英国海军重新控制孟加拉湾，重新夺回安达曼群岛，并在仰光登陆。

就在劳克林·居里代替哈里·霍普金斯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史迪威得知美国不会派遣部队参战了：“运输量太大了。”尽管这是“三项要求”之一，然而居里在与蒋委员长进行初步会谈之后却“意气风发”，并“认为他已经协调停当了”。居里身材不高，但自尊心不小，罗斯福在1940年春首次把他作为私人代表派往重庆，之后一直在华盛顿负责援华物资工作。不久，史迪威在日记里开始称他为“居里梳子”和“伶俐居里”。居里不主张在提供租借物资的同时还要求采取怎样的行动作为条件。“考虑到中国需要依赖我们继续提供援助，可以预计不会遇到不合作的困难。”居里这样告诉马歇尔。这是个典型的判断失误。他低估了中国

为了自己的目的反过来利用那些企图利用她的人。

跟居里会谈时委员长表达了对史迪威的不满，再次试图撤换他，至少不要让他控制租借物资。史迪威在他任命的整个过程中，只要他在物资问题上通融一些，对委员长的要求表示支持，或者不要对物资的用途太在意，那么他要搞好跟蒋介石的关系原本不难。事情再容易不过了。蒋介石不久发现史迪威在这方面是不会通融的，自那以后，他就几乎没有停止过要求替换史迪威的努力。当居里转达了蒋介石不满的实质之后，史迪威在书面回答中说，自己必须把局势的真实情况告诉蒋介石，因为他认为蒋需要了解真实情况。“我无法在其他基础上继续工作。”

8月1日，蒋介石接受了史迪威给他的“台阶”，同意了缅甸战役计划，但提出两点很刁钻的条件：英国在陆上和海上全面参战，以及空军提供相应的有效支持。他指出，战役首先取决于英国政府的意图。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刚刚对此进行了评估。他在7月31日的报告中指出，首先英国就没有非常积极地防守缅甸，出于同样原因，现在他们“在可以预料的将来也没有想重新夺回缅甸的意思”。因为蒋介石也是这样怀疑的，所以他为发动战役提出这样的条件也就是一种保险。蒋介石甚至把计划20个师中的15个师选定了。因此发动战役的现在取决于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了。

美国给中国提供的援助，不管其军事意图如何，最后实际上还是给了政府，而不是用于战争。多恩上校在8月4日写给陆军部的信中说：“在我们重新夺取缅甸之前，有关援助中国的议论和计划都毫无意义。但是对中国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必须附加条件，那就是他们要有行动。”否则的话，“现政权只会囤积物资以备战后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他几乎偶然地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他们估计会发生某种动乱或者革命。实际上，按照驻华盛顿的宋子文的意见，现政权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就会没事干的。他应该知道……”

中国的国内问题至关重要，而且这在当时可以明显感觉到。史迪威还记得曾经在1938年跟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友好的氛围中谈过话，不过他对共产党的直接了解很少。他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号称有50万人，而且共产党的势力还在北方扩展。据某些报道说，山东只有一个地区还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史迪威这次回到中国后跟共产党的唯一接触是间接的，那是还在重庆的周恩来在6月份跟约翰·戴维斯说的话。当时周恩来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蒋委员长同意，他会率领共产党部队发起进攻夺回缅甸，而且，“我会服从史迪威将军的指挥！”尽管史迪威记下

了这句话，但他对共产党关注甚少，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处于台面上的蒋介石的那些问题上。

尽管在国内史迪威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但是他跟重庆的很多其他美国人一样心有不安，因为他受命去支持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容的盟友。在炎热的夏夜，他多次在写东西时谈论这些问题。他说美国“被迫与一个在很多方面跟我们的敌人德国相像的政府结盟，这是一党专制政府统治下的一群法西斯”。这部分可以归因于那些“愚蠢、天真和虚假的宣传”，说中国人民在蒋介石的英勇领导下进行了六年的顽强战斗。这里有“对纳粹的同情。同样的政府，同样的见解，同样的强盗做法”；不同之处只在于不够有力，也不够有效。蒋介石“从来没有为了中国的进步采取过什么措施或者做过什么实事”。跟希特勒一样，他认为自己“永远正确”，而且凭借“直觉”管理国家。“你怎么可能推动这样一个家伙？你怎么能接受他的观点？”

史迪威预计到战后国民党会跟“赤党”进行内战，因此他这样反躬自问：“我们怎样可以帮助中国人民？停止这些愚蠢的宣传……哪里在英勇抵抗？哪里在发动了不起的游击战？哪里有改革，或者对这些问题有基本的理解？”

史迪威认为蒋介石“跟清朝人一样强烈地以中国为中心，也就是瞧不起其他人”。蒋介石老是害怕被别人看成是亲美的，也害怕承认他对美国的依赖，他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做了更深入的思考，因为这与他的处境是很有关系的。蒋介石曾经用了很多外国人，这包括他的长期政治顾问端纳（W. H. Donald），他的卫士长、德国人华尔特·斯登奈斯（Walther Stennes），他的财政顾问阿瑟·扬（Arthur Young）以及他的飞机驾驶员劳埃尔·勒诺阿德（Royal Lenoard）；然而他在心底里是害怕外国人的。他憎恶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帝国主义者，并觉得跟史迪威打交道是有辱身份的。

由于麻烦不断增加，蒋介石开始变得越来越专制，越来越难以接近，甘于成为孤家寡人。并不是只有史迪威难以见他一面，有些官员要等上好几周才能见到他，而且常常只能通过蒋夫人才能向他反映问题——这让他们很恼火。他通过史迪威所说的“吓唬和给好处”的方法让对手们互相牵制，这使他显得强大和不可缺少，但是其实他并不懂得管理国家。虽然他阅历丰富，但是他心胸狭窄，所受的教育也很有限。他最严重的障碍在于缺乏能干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从来不让真正有才干的人担任要职，以免他们变得太强大。因为他衡量下属的标准是忠诚度而不

是能力，所以他周围都是一些平庸之辈。他的连襟、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是政府负责人，而且长期担任财政部长。据英格兰银行驻华代表西里尔·罗杰斯（Cyril Rogers）说，孔的“头脑只相当于一个12岁的小孩。如果我把跟他有关银行业务的谈话录下来并放给你们听的话，那没有人再会把他的政府当回事了”。然而孔祥熙在个人理财方面很是出色，而当时在重庆流行广泛的小道消息很多都是有关他家的。据说这些传言“90%都不是真的，但有10%比传言的还要糟”。孔家和宋家以及他们的兄弟、外甥和侄子们组成了宫廷小集团，为首者是孔祥熙夫人，孔夫人又掌控了自己的妹妹蒋介石夫人，而通过蒋夫人又可以通达蒋介石。蒋夫人对委员长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她自己把这归咎于她未能为他生孩子。

名义上政府权力在立法院、司法院和行政院，但真正行使权力的是蒋介石任主席的国民党。其派系中最强大的是陈家的右翼CC系；他们是蒋介石第一个恩人陈其美的侄子，他们领导的集团在1932年建立了国民党的蓝衣社，相当于德国纳粹的冲锋队。弟弟陈立夫在1927年北伐时曾经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现在是党的领袖之一。党的基层组织在各个村、地区和军队中都存在，其指定的代表可以参加每隔三四年才举行一次的国民代表大会。自1935年就没有再选举过党代表，而且所有的进步团体都是没有选举权和发言权的。在国民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执委会行使管理权，其常务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会，并可以做出决定。虽然蒋介石经常面临党的压力，但他实际上可以对常委会颐指气使。

蒋介石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儒家的。1927年他很轻松地赢得了北伐战争，之后又成功地居于高位达十五年，这似乎显示天命已经传到了他身上。由于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除了时不时地会大发脾气之外，通常态度镇定，态度圆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所有下属——这也包括他的参谋总长史迪威——的第一要求便是服从。共产党不服从他并蔑视他的权威，这在他看来比日本人更加可恶。他的其他敌人——如不满的知识分子和各省的领袖——是无法联合在一起的。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受到广泛支持，是唯一敢于对抗蒋介石的人，但他跟他父亲一样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李宗仁可能成为南部联盟的领袖，对蒋介石是个威胁。国民党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地统一中国。蒋介石意识到过去留下了很多对他不够忠诚的区域，因此他无法信任所有的军队。他已经错过了进行社会变革的机会。由于失去了沿海城市具有维新思想的阶层和商业阶层，他现在只能更加依赖于右翼，而且不敢采取改革措施以避免激怒他们。他治国现在只是为了生存，因此能回避的就回避了。正如史迪威所写的，作为一个没有退路的体系的领袖，他真是“进退维谷”了。

美国公众对现实状况一无所知，他们被中国的朋友、爱国人士和宗教团体的积极宣传所蒙蔽了。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如远东司司长迈克斯维尔·汉密尔顿（Maxwell Hamilton）及其前任斯坦利·赫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后来他改任政治顾问）仍然坚持他们最初的立场。汉密尔顿在1942年2月的一份申明政策的文件中写道，现代中国代表了“一个伟大领袖领导下的一场人民大众运动。美国应当对此支持”。蒋介石的“决心、顽强和总体上的宽阔视野也许构成了中国作为战争盟友最为重要的因素”。大约就在这前后，高思大使在报告中提及有关蒋介石是积极指导中国抗击日本的伟大领袖的说法时说，“人们在直面无情的事实时，只能将之斥为无稽之谈”。

美国总统看不到除了支持蒋介石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担心打败日本后会出现真空，但又被反复告知只有蒋介石才可以使中国保持统一，因此总统只能让蒋介石自由支配得到的援助物资。那些中国的友人或者出于真诚，或者出于为了使中国能够得到更多的援助，他们不断警告总统说，一旦减少支持就会造成重庆政府的崩溃。洛克菲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和美国医药援华局（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局长唐纳德·凡·斯莱克（Donald Van Slyke）博士就是有这种恐慌情绪的一个代表。他告诉总统中国的士气“正在迅速消解”，“失败主义者正在抬头”，而且蒋介石“失去权力以及中日达成妥协的危险正在增大”。他还附上了他的消息来源，那是“八个驻中国西部的有责任感的美国人”。高思在他的报告里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那就是有些省的将军，如龙云，可能与日军媾和并让日军进入；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政府“可能立即崩溃”或者撤到那些无法对之进行援助的陕西省或甘肃省去。高思接下来的预言后来得到了验证，他说：“当然了，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蒋介石会很乐意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没有得到美国援助。”

从罗斯福的性格来说，他不希望对租借物资的用途进行控制，不过在史迪威的敦促下陆军部还是倾向于这样做。罗斯福不喜欢讨价还价，认为向一个濒临绝境的盟友提出各种条件有点儿太小气了。8月份他收到陆军部报告，建议次年春季发动缅甸反攻，并提供租借物资，条件是中国参加反攻并根据史迪威的建议对部队进行改革。居里在8月初回国后也对史迪威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他的态度温和多了。他对总统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提供援助时还提出某种条件或限制。”他还报告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个人纠葛，并把这归咎于史迪威对蒋介石干预缅甸战役不加掩饰地表示了不满，以及蒋介石对史迪威不服从他命令的

不满。他大刀阔斧地提出把史迪威、高思和宋子文全部换掉。（由于这个建议未被采用，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他又提出以后要把总统和蒋介石之间的所有通信的副本都提供给史迪威。）

根据居里的解释，罗斯福认为中国这些烦人的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至少是可以解决的。他给居里写信时以这种他惯有的乐观主义情绪写道："我只能认为目前局面的主要问题还是有关人的个性，跟战略计划、中英关系或者印度局面均无关系。"他同意考虑某些改变，"直到我们找到合适的人"。史迪威个性张扬，头角峥嵘，显然这是一个可以下手的地方，但是罗斯福对此进行试探时马上遭到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反对。他们都坚持认为，无论是反攻缅甸还是让中国在军事上有所作为，史迪威都是必不可少的。

9月份盟军统帅同意了缅甸战役。该战役仅限于北部，目的是让滇缅公路再次跟阿萨姆邦的利多公路连接。史迪威提出的夺取仰光并由海军配合的全面反攻，即盟军所谓的安纳吉姆（ANAKIM）计划被搁置了。由于北非战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苏联的需要，他们认为该计划在物资上无法保障。英国人自始至终为安纳吉姆计划倾注了大量精力，但为逃避这个计划花费的精力更多；他们后来在缅甸海岸线上一个叫若开（Arakan）的地方发动了一场小战役，重新夺回了实兑（Akyab），目的是为了建立战斗机基地，以便将来发动进攻。他们同意参加缅北战役，但是没有多少热情，因为他们不像美国那样急于想给中国输送援助物资。英国人在对局势进行的一份"重新评估"中认为，中国人即使没有进一步援助，也还可以支撑一年。

但是美国同意在对蒋介石提出的"三项要求"进行一些修改后满足这些要求，不过不打算派美国师团过去。罗斯福在10月份告诉蒋介石说，自1943年开始，将派遣100架运输机每月通过驼峰输送5000吨物资，此外还给中国提供265架战斗机。罗斯福没有向蒋介石提出什么条件，不过他敦促说，军队重组"对达成我们的共同目标至为重要"。

在给出最后答复前，罗斯福再次建议马歇尔"调回史迪威并让威勒将军代理职责"。他让居里充当他的使者。马歇尔后来回忆道，"一个侏儒般的小个子"走进了他的办公室，翘起一条腿，然后说总统想撤换史迪威。马歇尔问："他确实想撤换，是吗？"居里回答说是的。

"他派你来告诉我？"马歇尔问道。居里说的确如此。

"你在中国待了多久？"马歇尔问道。

“三个星期，先生。”居里回答道。总参谋长一言不发，于是居里离开了。

罗斯福仍然没有放弃。他直接给马歇尔写信问：“史迪威在中国怎么样了？显然他跟委员长的关系已经太复杂，我觉得他在其他战场会更有用些。”马歇尔和史汀生解释说无法找到比史迪威更好的人去替换他。马歇尔写道，完成反攻缅甸的人必须是个美国人和能够带兵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促进重庆的和睦局面”的和事佬或者物资供应官。

马歇尔的话切中了主题，史迪威在中国的整个任职和后来的名气都跟这个主题有关。“重庆的和睦”会缓和所有的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只需要一个态度谦和、不那么苛刻的人就行了；这个人不会提那些让蒋委员长感到威胁的问题，不会告诉他那些他不爱听的实话，也不要求他做那些他不爱做的事。史迪威自己也发现了这些问题，因此在蒋介石不断推脱而他不断设法对付的时候，他在8月份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觉得这种打仗的方法真太糟糕了，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敷衍塞责的家伙。如果我还是个滑头的话，事情可能就会有些进展了。”一个圆滑的人的确可以促成重庆的和睦，但是史迪威使命的意图并不是和睦。

---

[1] 此句见《孙子兵法·谋攻篇 》。

[2] 20世纪20年代曾任德国国防军司令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在任中国军事顾问期间，曾经于1934年向蒋介石提交过一份计划。在这份计划中，他强调要注重质量而不是规模，并建议训练和装备20个师（后增加到60个师），同时整肃军官队伍他认为一。个主要弊端是根据背景选拔军官，而未能考虑其素质、既往记录、能力或者领导才干。

[3] 波利洛(BOLERO），这是在英国集结准备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

第十三章

“花生米跟我上了一条船”

1942年8月—1943年1月

有个地方是史迪威可以控制并可以训练中国士兵以备重返缅甸的，那就是蓝姆伽。还在溃败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手制订在这里建立特遣队的计划，并声称他将在这里使用的训练方法会使中国部队具有无与伦比的战斗力。印度政府不断反对，后来终于同意了（“这些杂种还是会把计划毁掉的”），这样蓝姆伽计划在8月正式启动，第一批受训的就是那些从缅甸逃往印度的约9000名在缅甸参加过战斗的幸存者。他们中有很多人还在医院。第二十二师由于蒋介石的命令犹豫不定而耽搁了，结果未能在雨季前撤离，那些幸存者零散地走出缅甸时非常可怜，衣服褴褛，已经饿得半死，步枪已经损坏或者锈蚀，很多人由于得了疟疾、痢疾或者身上生了那加疮而虚弱不堪。那加疮是由于水蛭叮咬或水蛭头残留在肉里所造成的感染，常常是致命的。病号在蓝姆伽医院接受治疗，医护人员最初是西格拉夫的医疗队，后来由一所美国驻军医院的人员补充。这些中国人接种了霍乱、伤寒和天花疫苗，现在一天三餐［结果第一个月平均每人体重增加了21磅（约19斤　　　）］，配备了新军服、帽盔、靴子、背包、步枪、刺刀、卡车、大炮以及大量的美式装备，因此他们很快焕然一新。

史迪威8月在印度待了三个星期，10月份，当其余的中国师团终于开始被空运到印度的时候，他再次过来。尽管当初允诺将身体状况良好的士兵运送过来，但是在此后两年中，出于体重不够或者疾病等原因，驻华美国医疗官淘汰了40%的士兵。有时候一批人状况特别差，有一个月淘汰率达到来员人数的89%。有时候淘汰的人数甚至超过了空运过来的人数。中国人对美国人的这种浪费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便将这些淘汰的人添加到Y军了。空运到印度时这些瘦弱的士兵往往35—40个人一起挤在一架货机里，有些本用于空投的飞机连门都没有。兴致勃勃的罗卓英说道：“让50个人光着进去。只有3个小时！”这些中国指挥官认为，反正士兵会领到新军装，现在给他们也是浪费。这些人从昆明飞出时除了短裤和为了预防呕吐用的纸袋外，什么都没有。有好几个人被冻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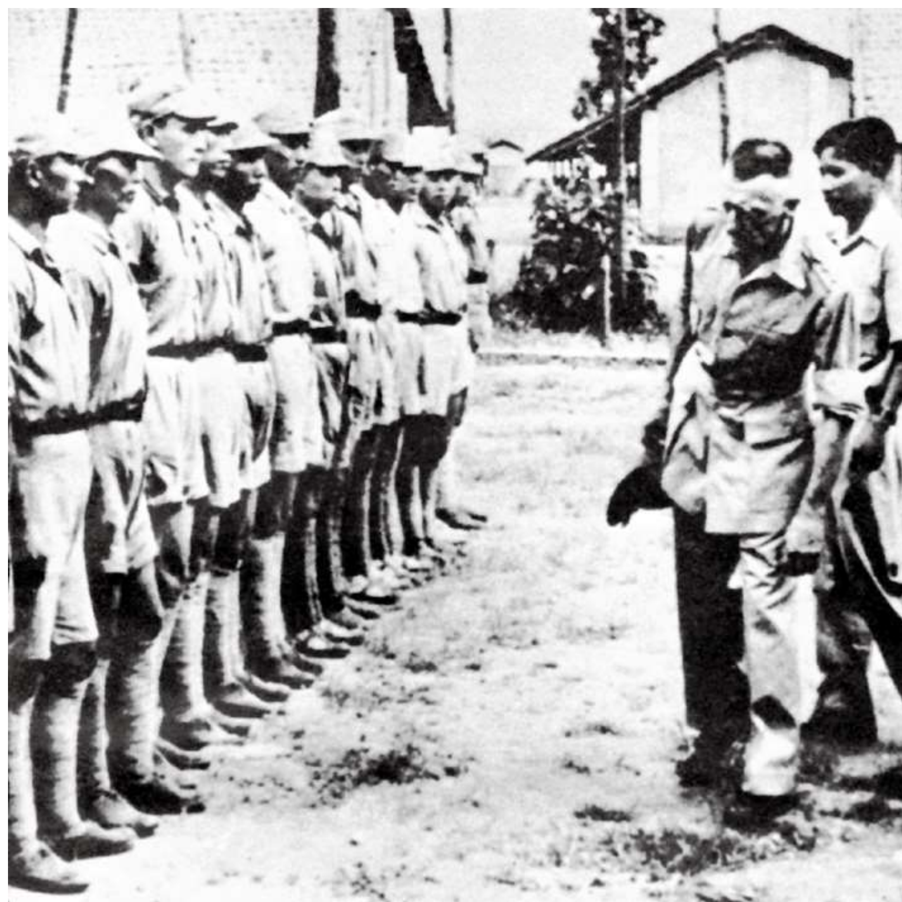
了。在蓝姆伽的参谋人员要求在飞机上提供棉大衣以供运送士兵反复使用，但是中国方面认为这没有必要。士兵下飞机时往往都冻僵了，并感到晕机，但在印度的阳光里晒上一个钟头后往往他们能很快恢复。



蓝姆伽练兵

史迪威开始规定每天运送400人，这个数目在10月份达到，在11月被超过了。当时一天16架次的飞机运来了650人，结果在慢吞吞的阿萨姆邦——孟加拉铁路造成了常见的积压。铁路方面发现无法按照从驼峰空运的数量通过铁路把士兵运往加尔各答。到12月底已有3.2万名士兵在蓝姆伽受训。史迪威的目标是组建一支由两个整编师外加三个炮兵团和其他附属部队组成的军队，这些部队将在1943年2月开始反攻缅甸时投入战斗。他还希望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充，并为训练中国30个师计划培训出1500名中国教官。在之后的两年里，共有5.3万人参加了蓝姆伽的训练。

跟英国人使用白人军官指挥本地人部队的做法不同的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顾问，史迪威计划建立美国联络官队伍，或者由单个军官以顾问身份与各级中国指挥官一道工作。根据他在缅甸的经验，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部队驻扎在指定的位置，并可以投入战斗或者按照命令进入指定阵地。他的办法是对小单位部队进行强化训练，因为他相信，如果两个排的士兵都分别受到良好训练的话，那么把这两个排放在一起的话他们也会知道怎么做的。从在蓝姆伽拍摄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一名瘦削的、穿着短裤、上衣领口敞开并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硬沿军帽的人在一列列趴下的中国士兵中间走动，并耐心趴倒在每个士兵的旁边示范或者纠正该怎么用步枪瞄准。他亲自教士兵有多种意图。一名美国上士看到史迪威趴在尘土中教士兵练习使用步枪感到惊诧不已，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史迪威这不仅仅是在教中国的士兵，而且是在给那些美国人示范应该怎么教。



蓝姆伽训练

由于有语言障碍，同时又缺乏翻译，训练主要是通过示范进行的。由于中国人善于模仿，这种方法非常有效。“谢天谢地。我们不会讲中国话，也没有足够的翻译，”斯莱尼将军说，“我们示范他们模仿。他们是世界上最擅长模仿的人，学得快极了。”那些过去连机器都没有见过的农民，现在一个星期就学会了怎么使用榴弹炮和机枪，并很高兴地学会了怎么使用军用电话和发报机。后来参战后有些人得到了勋章，这是中国士兵第一次得到勋章。史迪威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英国佬津津有味地看着我们。他们看到上校也可以派上用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新鲜事。”

曾在奥德堡军校负责作战训练的麦克凯布担任训练中心主任。原为汉语教官和第十五步兵营老兵的波特纳上校成了指挥部的参谋长。“指挥部”字面上理解为指挥总部，这里用来代指中国驻印军。曾为奥德堡军校制订训练计划并后来为国民警卫队制订训练计划的阿姆斯上校，也被从美国召来加入参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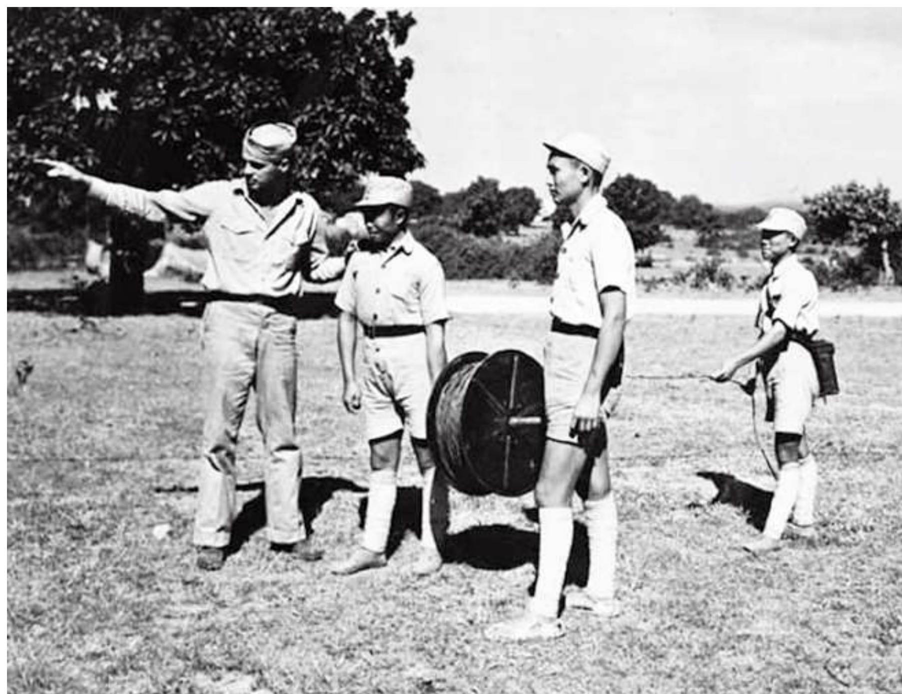
在蓝姆伽的中国军官接受战术和作战技术训练，而士兵则学习使用步枪、机枪、迫击炮、火箭发射器、反坦克炮以及其他供完成特殊战斗任务使用的设备。掌握了这些武器之后，他们还要参加为期八天的丛林战训练课程。为期六周的炮兵训练课程教授在丛林条件下如何使用驮载炮、榴弹炮和迫击炮。作战军官和非战斗人员还要学习野战条件下的卫生和医疗救护，而30个师的上校和将军也被空运到蓝姆伽接受为期六周的参谋和指挥训练课程，这些课程是以利文沃思的战斗课程为基础的。士气高昂，特别是新建炮兵连队。史迪威的主要精力是想把炮兵和步兵的比例从现在的一个连对九个连提高到1：3。中国士兵们得知他们在火力上已经跟日本人相当以后很受鼓舞，开始热情高涨地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转变。

蓝姆伽可不是什么融洽的家长制大家庭：这里文化冲突激烈，争吵不断，特别是跟中国军官。他们对受到那些从来没有到过战场的美国人的批评很是不满，坚持认为因为在战场上是由自己下命令，所以不能容忍在训练时自己的权威受到损害。这些美国人却认为，头脑中灌满了防御意识的中国军官会妨碍进攻训练，因此往往会绕过他们。更具有破坏性的是，美国人试图绕开中国军事体制中有机会让军官中饱私囊的做法，在这里，不是把军饷先一总发给指挥官，而是公开点名直接发给个人。军饷和如何配置增补队伍的问题成了史迪威跟罗卓英将军之间各种久拖不决的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罗卓英没想到，自己不但名义上处于第二位，而且实际上也处于第二位。“他（罗卓英　）又想玩绕过我的把

戏——我又是参谋长了。”史迪威不想再次犯同样的错误，这次坚持要明确他的权力。在跟军政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他坚持有权力枪毙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上校以及以下级别的军官，并可以对上校以上的军官撤职。由于罗卓英将军拒绝接受美国对他管理权的干涉——据说他凭借权力在蓝姆伽月入10万卢比——最后他离开了指挥部。



飞往蓝姆伽的运兵机


蓝姆伽练兵


蓝姆伽训练营，史迪威视察汽车学校，左一似为多恩

史迪威严令美国人不许虐待中国士兵，但是中国士兵并不领情，这让美国人很不满。有时中国士兵情绪激动时多次拔出枪来。美国人也被

指示不得干涉有关军纪方面的事务。有的士兵由于用手榴弹炸鱼便被随意枪毙，或者由于丢掉了毯子便挨上125大板，直打得皮开肉绽，他们对此常常感到痛心或者愤怒。在参谋会议上，波特纳向中国指挥官提交了有关在抵达蓝姆伽路上死亡的中国士兵的数目，让他震惊的是，这些报告被扔进了废纸篓里，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照原先人数详细报告需要物品的清单。



蓝姆伽训练营，罗卓英为士兵授勋

瘦削英俊、说话很慢且略带口吃的孙立人将军和矮小敦实、戴着眼镜、口才甚好的廖耀湘将军仍然分别带领他们原来负责的第三十八师和第二十二师。廖耀湘现在看来要比在缅甸时表现得好，尽管他不像孙立人那样有冲劲和个性；孙立人顽固、自信，敢于顶撞任何人，包括史迪威。史迪威忙于到他们那里商讨作战计划，参观摩托化学校和军乐队、医院以及射击场，史迪威首次感到满意，因为自己是在真正地练兵。

史迪威曾在8月23日和10月25日两次在纪念孙中山的仪式上，站在中国国旗下用中文给部队训话，这让战士们印象深刻，因为他是在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且是在讲他们自己的历史故事。他在讲话时适时地加入一些成语，例如讲到报效国家时便会提到宋朝抵抗蒙古人的大将岳飞，或者为了报仇雪耻而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他告诉士兵们说，自己是代表蒋介石的，他们要英勇作战，否则他将无法向让他担当此职的蒋

介石交代。他提醒他们应当为祖国而战，并向他们允诺他们不必担心武器和装备的问题，因为他本人可以担保他们的装备不会比日本人的差。



蓝姆伽训练营，罗卓英和史迪威巡视士兵列队

“我现在没有时间生气了。”史迪威在家信里说。他还说自己的身体好些了，体重也增加了。“如果我长出一点新牙，眼睛再好一些，再把头发染一染，我一点都不像一个70多岁的人。”尽管加尔各答的一个医生诊断认为他的一只眼睛有轻度白内障，但他的视力仍然很好，可以辨别出细节。在看电影时他看到路易斯·斯通（Lewis Stone）扮演一名军官，“挺着肚子。他们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在新德里他要参加会议和接触“有害的文案工作”，这时他被指挥部里不管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的那种“气派和宏伟的做派压得透不过气来”。据说，德里的各种军帽上的徽章闪闪发光，以至于可以引导飞机在大雾时安全降落。史迪威发现自己陷入了这个战区的管理和人事纠纷之中，因为他负责战区里的美国部队。妒忌，辞职，“带有偏见的授勋，酒会”，参与驼峰航线走私，各种偷窃和丑闻——这些东西只有华盛顿派个检察官来才能够查清楚。参谋人员由于无所事事而感到厌倦，每天9点到中午上班，抱怨牺牲了他们的军事生涯，很多人还批评史迪威醉心于完成一项无望的使命，认为史迪威只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想加强自己的指挥权。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不好。美国供应署署长的威勒“让人高

兴”，而且战区报纸《中缅印战区通报》也在未受阻碍地发挥作用。史迪威对这份在他的战区内创办的报纸的唯一指示是：“如果你能确定属实，就把它印出来。”由弗里德·埃尔德里奇主编的这份报纸是美国在国外办的第一份军报，而且由于经常无所顾虑地抨击时弊，也是办得最富有活力的。

史迪威在8月30日写的家信中说：“我现在在社交界的成功已经无以复加，应邀跟总督共进午餐。简直高兴得不知所措。”这个总督是林利思戈（Linlithgow）勋爵。他是个身高6英尺6英寸（约197厘米　）的苏格兰人，威风凛凛，很气派地住在辉煌的总督府里，这座总督府是大英帝国在建筑上的化身。总督府和政府大楼是由发红的沙岩建成的庞大建筑群，仿佛受到罗马风格影响的埃及建筑，都矗立在高出地面的坚实基础上，要通过引道上去。前面的拉加帕特（Rajpath）街是一条巨大的绿树成荫的大道，两边没有建筑物，好像是光秃秃的香榭丽舍大街，这条大道从印度门一头一直通向这里。在宫殿内部，在圆形有穹顶的正式接待厅里，猩红色天鹅绒幕布下面笼罩着两个御座。接待室非常气派，有18英尺（约5米　）的窗子和发亮的东方地毯。天花板上有莫卧儿的王公们的华丽装饰，宴会厅的一张桌子可以坐下108个人，阳台上可以俯视整个花园，里面有经过剪裁的草木和各种喷泉。整个建筑的运作需要300名穿着白袍、步履轻盈的印度仆人。就跟法老或者凡尔赛的太阳王所建造的标志性建筑一样，这些统治者建造这些高大建筑原是为了展示他们的永恒和辉煌，并毫无疑问地宣告说，其建筑者认为他们在印度将永远待下去。

史迪威带着蓝姆伽的照片到重庆给蒋介石看，效果很好。经过几个星期的拖延之后，还需要空运去的几个师也立即被批准派遣。蒋介石通过照片可以看到训练和火炮的情况，显然感到很满意。“他怎么还能不满意呢，这个小犟驴？”史迪威还有点哭笑不得地指出：“在不断受到阻挠和敷衍之后”，最后得到前进的信号让自己感到无限安慰，“结果你几乎要对那个不愿意被帮助的人感恩戴德了”。他毫无疑问地认为，蒋介石“除非极其愚蠢，否则他应该是希望让这件事情继续下去的”。

1942年10月1日，重庆正准备接待一位非常重要的美国客人，这就是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他是自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之后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威尔基在国际关系中倡导“一个世界”理论，因此，尽管跟罗斯福在国内政策上见解不同，但在对外政策上却是一致的。作为罗斯福的出色对手，威尔基现在正以特使

身份进行一次为期四十九天的环球旅行。根据蒋介石发表的声明看，他被中国人视为自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1897年到中国之后来访的“最高级别”的美国人。中国对威尔基如此感兴趣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理由，那就是预计他会成为下届总统。他身材高大，感情充沛，富于感染力，由于竞选活动很成功，现在正如日中天，很有影响力。中国人想在他身上花一番功夫，主要目的是想加强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而眼前的目的就是要美国投入更大的空军力量。蒋介石认为这意味着用陈纳德替换史迪威，而达到这个目的便是妥善调动各种影响力，而这正是中国人擅长的。

在操纵外国人方面，下至大妈奴仆上至蒋介石夫妇，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他们最拿手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信十足，技巧上也无法超越。他们手段娴熟，不屈不挠，态度圆滑，往往能够达到目的。日本人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技术来制服西方，但中国人从来没有试图超越西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本来就比西方优越。尽管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很多，但是其实他们仍然顽固相信夷人是可以被操纵的。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英国的熊将军在到达伦敦时对同僚说：“让我见见英国官员，我就会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威尔基和宋美龄，身后是蒋介石

威尔基的访问极好地展示了中国人是怎样操纵美国公众舆论的。“他会给憋死的。”史迪威这样写道。威尔基的日程上将会有无休止的宴席、招待会、检阅、饭局、参观学校、工厂、女童子军和军工厂等。他将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下榻于中国宾馆，而非美国大使馆，这让高思不以为

然，甚至有些恼火。这样的安排可以保证威尔基的所见所闻都是中国人想让他知道的东西，正如史迪威所写的，这样威尔基就可以“免受美国人的污染。目的是让他筋疲力尽并通过大吃大喝让他麻木，在他的各种感官都变得迟钝之后，就可以对他灌输‘正确’的见解了”。

为了撑面子，重庆的警察把穷人所居住的棚子全部拆掉，那些特别凄惨的乞丐被赶出城外，此外还下令，在访问期间那些最破烂、最寒碜的店铺不得营业。街上挂满了彩旗，墙壁上刷满了标语；在从机场到市区的11英里（约17千米）的路边有学生夹道欢迎，他们一边摇旗一边呐喊。此外还要求普通民众从警察那里购买纸质的中国和美国国旗。威尔基不会看不出他看到的只是组织的排场而已，不过作为一个宽厚大度的人他又为此感动，说，这种“人民和情感上所表现的朴素的力量让人难忘，这也是中国最大的财富”。他行程就在这种基于粗略印象上的善意气氛中进行着。

在他参观的整个过程中，有两个中国人是始终不离左右的——那就是能言善辩的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董显光和朱绍良，朱绍良将军是蒋介石的亲信和西北第八战区总司令。尽管朱绍良将军不会说英语，但是他其他方面的素质弥补了这种不足。根据威尔基的说法，朱绍良是“我所见过的最让人亲切的人”，这无疑是选派朱的原因。威尔基无论是发表完讲话、参加完会谈还是刚刚结束宴席时，“总可以看到他笑容可掬地望着我”，这种笑容让威尔基感到中国是个“热情好客的国度，到处都是美国的朋友”。

威尔基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马上相信别人告诉他或者带他看的东西。然后他又通过10份报纸的连载和一本叫《一个世界》（*One World*）的书把他的印象传达给美国公众。这本书立即成为畅销书，发行量极大，在前四天里的订单就达20万本，在八个星期里售出了100万本。中国人真是做了一项非常好的投资。

中国还在周围是西式建筑的大操场上为他举行了部队检阅。要人们都盛装参加，卫兵和警察都戴着白手套，士兵以完整的队列，迈着经过改造的德国方步通过，他们的装备极好，都头戴钢盔，手拿武器，后面跟着坦克、战车和拿着小旗子的骑兵队。这是一支供人检阅的部队。这位贵客还看了成都军校几千名士官所进行的“令人兴奋的”演习。他们手持步枪举过头，游泳通过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冒着榴弹炮火爬上山并剪断铁丝网通过。他没有看到用绳子捆绑的壮丁，训练三周就发配前线的士兵，或者送到蓝姆伽充数的那些骨瘦如柴的病人。因此他报告说：“中

国的部队是团结的；其领袖是训练有素的能干的将军；其部队骁勇善战，知道为何而战，也知道怎样作战。”民众积极踊跃，士气高昂，“甚至大户人家的孩子也以列兵身份参军”——这种说法显然得归功于富于想象力的董显光。

史迪威闷闷不乐地看着威尔基浸泡在各种宣传之中，这些宣传使得军队的改革不太有必要了。国防部为威尔基在中国军人俱乐部举行了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鸡尾酒会，酒会上何应钦将军提议去靠近西安的黄河转弯处看看“前线”——那也是史迪威二十年前修路的地方。有好几个这种代表日战区边界的象征性前线，客人经常在陪护下被带到这里。史迪威将军面对一屋子中国高官大声说道：“当然，威尔基必须要去。他可不能错过这个地方。这是中国最大的市场。这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一起从事贸易、互通有无的地方。”除非有意，史迪威很少鲁莽无礼，他说这样的话无非是对各种虚伪的门面感到不耐烦：“噢，算了吧。”

威尔基自以为是自己提出的参观前线之事，在消除了“委员长对他安全的担忧”之后顺利成行。他们一行通过火车和手摇四轮小车去黄河，史迪威曾经跟冯玉祥的部队步行走过这条路。前线就是黄河，最宽处达1200码（约1097米），而威尔基也由于“不像想象的那样有人身危险”而有点失望。然而“通过望远镜盯着日本人的枪筒”还是让人满意的。陪他去的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上尉给威尔基指出这里并非让人参观的地方，这让威尔基很满意。蒋纬国回到火车的餐车时手里拿满了礼物，有日本骑兵用的大刀，也有上好的法国葡萄酒。他说这些都是战利品，突击队夜间渡过黄河，回来时往往就带着各种东西，包括“俘虏和军事地图”。不过并没有把俘虏给威尔基看。

驻华记者经常参观这些“冷战场”，在这里他们往往可以看到成堆的日本大炮、头盔以及其他装备。为了验证这些东西是不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以供参观之用，据说一名记者曾经把自己姓名的头字母刻在头盔上，并在几个月后另一次参观时再次看到了它。

除了不可忽视的通货膨胀和它所造成的各种破坏之外，威尔基对蒋介石治下的各种缺陷沉默不语，这也是为了盟国的大业和对中国习惯性的理想化的结果。对于各种让人不安的使人想到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痕迹，他委婉地称之为发展的“训政”阶段所必需的“中央控制”。如果有教师、编辑或者大学校长告诉他有腐败、压迫或跟敌人私通的情况时，忠心耿耿的董显光就会向他保证——然后他再向美国民众保证——那些对抗这些邪恶势力的正义力量总是能够得到蒋介石的“坚定不移的支持”。

穿着长衫的蒋介石镇静而矜持，看上去像个学者，在威尔基看来，蒋介石“比传闻中的还要了不起”，而蒋夫人对这位可能的美国下届总统不断施展各种魅力，无疑加强了这种印象。威尔基尽管年事已高但热情犹存，他受到了影响并想出了继续这种相识的妥善方法。他建议她对美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样还可以达成另外一个意图，那就是让他更加相信“让我的国人了解亚洲问题至关重要”。“有头脑，富于说服力和道德感……机智而有魅力，慷慨而善于理解，态度优雅容貌美丽，强烈的信仰……蒋夫人将成为完美的使者……我们将会对她洗耳恭听”——这个预言不久证明是正确的。威尔基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十分兴奋，在最后跟蒋夫人见面时不断告诉她“明天”就跟他乘同一架飞机去，他保证罗斯福总统会给她所有想要的飞机。

蒋介石对英语懂得很少。根据在中国长大并曾参加这些会晤的大使馆的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的说法，体格健壮、胸膛宽大、头发蓬乱的威尔基在蒋介石眼里不过是那种身上发出生牛肉味的外国人，以至于客人走后蒋介石立刻吩咐打开窗户“让外国人的气味散掉”。

史迪威尽管不想试图影响谁，不过他现在觉得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刚刚回来的戴维斯从华盛顿带来了令人沮丧的报告。“这个战区完蛋了。没有援助来了……居里看来想掐我的脖子。中缅印没有希望。‘主要战略努力是在别的方面。’总参谋长说不会派地面部队。”同时他接到警告说：“蒋介石正在计划玩弄诡计并在指挥上搞花招。”史迪威试图在威尔基见蒋介石之前让他了解一些基本事实，但是威尔基已经累得昏昏欲睡，看上去没有听进去对他说的话。史迪威次日又跟他谈了话。“一无所获。他什么也没有问。完全被蒋介石夫妇糊弄住了。建议我也敷衍敷衍。胡说八道。”次日史迪威又写道，威尔基“要么筋疲力尽了，要么就是对我无所谓。几乎什么也没说，也没有问什么。态度很明显”。



史迪威与陈纳德

与此相反，根据蒋介石夫妇的建议，威尔基对陈纳德却很照顾，结果陈纳德有机会向他解释怎样以中国为基地发展空军来击败日本人的计划。陈纳德的结论跟蒋介石夫妇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支持这个计划，必须让他代替史迪威成为战区指挥。只要史迪威还在控制，那么通过驼峰航线运送的物资大部分将被分配给中国步兵部队，以备发动烦琐的陆地攻击，而蒋介石对此毫无兴趣，陈纳德更是充满蔑视。他们的兴趣是一致的。作为盟国，蒋介石必须积极作战，他现在想通过空军满足这个条件，这样他只要提供机场就完了。陈纳德因为跟美国军界闹翻了，愤愤不平，正试图通过让飞虎队独自赢得战争证明他的空战计划并彻底复仇。两人出于各自的考虑，这些都需要美国空军参战。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中国空军要比美国空军更有用，但正如陈纳德所发现的，现在还缺少这种气势。

现在他的飞行员已经很有名气。他自己往往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至于认为日军5月份从缅甸进攻云南的时候正是飞虎队阻止了日军跨过萨尔温江。他的飞行员接受了迅速灵活的战术训练，并屡次在与日军空战时取得优势，而陈纳德把这等同于阻止了日军的地面部队。另外，他们遏制了日本在华东城市进行的恐怖轰炸，再加上地上放了很多逼真的假飞机，这使得重庆免于一年四季连在冬季也受到无情轰炸。他

们的威力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广为传播，结果陈纳德成了中国人心目中最知名、最受人敬慕的英雄。

空军成为制胜武器是再自然不过了。很少有人停下来考虑一下，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飞机也离不开机场。有一次在视察的时候史迪威对工程部军官亨利·拜罗德（Henry Byroade）大为不满地喊道："你造这个机场要干什么？"

"噢，陈纳德说他需要这个机场。"

"他打算怎么保护它？"

这是问题的实质。陈纳德及其信徒们眼睛只盯着"最佳方式"，认为中国部队自会做好防御的，而他们对中国军队知之甚少。这些飞行员由于其职业的缘故往往忘记了地面，并跟曾派去解救史迪威的斯考特上校一样相信"上帝是我的副驾驶"。斯考特的看法代表了飞行员对中国的看法，他曾经写道："西安在昆明以北。"这条信息的实用性就跟说波士顿在墨西哥城以北一样微小。

由于坚持进行乏味的陆地训练，在陈纳德及其狂热的追随者看来，史迪威成了一个只知道苦干的、早已落伍的老顽固，正为空军的胜利制造障碍。不管用什么方法排除他——利用政治影响力也好，通过关系也好，或是调动宣传也好——都是合情合理的。威尔基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通达总统的途径。

按照程序，陈纳德未经史迪威允许不能直接去见威尔基。让陈纳德吃惊的是，尽管史迪威知道他有不良的意图，但还是准许了。史迪威说他可以随便告诉威尔基任何事情，甚至可以陪同威尔基去重庆郊外的白石驿机场——在那里，陈纳德正站在一排排机头画着鲨鱼的P-40战斗机旁，煞是威风。史迪威让他们两个在陈纳德的办公室单独谈了两个小时。威尔基离开时带了一封日期为1942年10月8日的转交给总统的信，这是这场战争中最不同寻常的文件之一。

在这封信中陈纳德宣称，只要有105架新式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和12架重型轰炸机并及时补充，他就可以"击溃日本……可能在六个月以内，最多不超过一年"[1]。他告诉总统说，这是他作为一名职业空军飞行员的"专业意见"。这个军事任务"十分简单"，障碍只有一个。陈纳德对自己的想法倒不是吞吞吐吐，而是开诚布公：他要求成为"美国驻华全权指挥官"。如果这一点达到了，他带给罗斯福的不光是军事胜利。他像一个政治家一样，说自己"相信……不仅能够打败日本，而且能够使

中国人永远成为美国的朋友”，而且“我可以促进友谊使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成为美国最重要和最融洽的贸易市场”。陈纳德并没有详细解释怎么完成承诺，也许这是他的精明之处，却转而考虑他的军事战略。其基本依据是“可以在中国击败日军”，而且他可以击败飞机产量有限的日本空军，方法是“让它跟我在我选定的地方作战”。在这样牵制了日本空军之后，美国在西南太平洋的部队就可以“随意”前进，同时“我保证会摧毁日本的主要工业中心”。

为了让他完成这个计划，必须建立并保护从印度通过驼峰的空中运输线，但并不是用现在的方法（他显然是指史迪威），因为这种方法“完全未能真正理解空军的用途，甚至缺乏基本的军事战略”。与此相反，如果陈纳德得到“完全授权”，他会像西皮奥·阿弗里卡纳斯（Scipio Africanus）通过攻打迦太基（即攻打日本本土）来保卫罗马那样保护驼峰航线，或者像格兰特将军那样通过切断李的交通线而击败南方。整个计划很“简单”——这个词在整个信中重复了四次——另外也很简单的还有：他宣称“对成功毫无疑虑”以及如果得到实权，“我会击溃日本”。前提是“我完全有主动出击的自由”，并可以自由地与蒋委员长直接接触。他信中唯一提到中国陆军的地方是，大致说他的计划将“使中国地面部队成功作战”。

这封信是一个军事上的救世主的自我宣告。这就是为什么陈纳德强烈希望得到最高指挥权，因为否则他就无从完成救世主的使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对挡住他路的史迪威的不满会变成一种恶毒的仇恨。从军事上说陈纳德的提议有种“简单的”逻辑，假如战争中没有其他因素也许是可行的。由于他忽视了各种现实情况，正如后来马歇尔说的，他的看法只是“胡说八道，不只是蹩脚战略，纯系胡说八道”。但对罗斯福来说事情就不是这样明了了。这样的信本来可以被斥为狂言妄语，但却因为来自一个表现出众的勇敢战士而有了分量。陈纳德老是津津乐道他自己，这跟麦克阿瑟将军的自信颇为相像，在到处是悲观和混乱的情况下这样的情绪倒是很难得的。陈纳德之所以值得注意，倒并不是因为总统相信他能够“打败日本”，而是只要他能够完成他承诺的一小部分，那么对他给予支持就是值得的。

在陈纳德的信发出之后，蒋委员长进一步通过他的美国亲信、海军武官麦克休上校施加压力召回史迪威。麦克休原是语言教官，曾经编过一本中文教材。在30年代曾是蒋介石当时的顾问端纳的密友和一起打高尔夫球的伙伴，当时每星期要在蒋介石家吃三四次午餐。由于熟知“宫廷

秘密”，他成了约翰逊大使的耳目，这让当时同为武官的史迪威上校很不痛快，因为史迪威看到麦克休老是有各种内部消息，并总是跟大使嘀嘀咕咕。

蒋介石夫妇邀请麦克休来吃午饭，并向他强调了用陈纳德替换史迪威对盟军大业的好处。麦克休完全赞同这种建议，在给海军部长诺克斯的报告中说，史迪威执意要夺回缅甸，完全是出于他吃了败仗后的个人野心，这浪费了军事力量，使得无法根据陈纳德的计划配置空军力量。“如果史迪威和比斯尔将军及其庞大的参谋班子被撤除”，特别是如果“把指挥权交给陈纳德的话”，那么蒋介石必将受到鼓舞，而“该战区的战事也必将大为改进”。蒋委员长希望由陈纳德全权负责。比斯尔也好，布里尔顿也好，或者史迪威的空军参谋也好，他们都不懂基本的空中战略，而史迪威本人“甚至不能想象空中打击对日本造成的破坏程度”。

海军部长诺克斯将报告转给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又给马歇尔看了，马歇尔勃然大怒，特别是听说麦克休曾经在德里把他的想法给韦维尔也说过了。马歇尔认为这种干涉对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战争努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并愤怒地指示海军不要让当时正在回国途中的麦克休再去中国任职。同时这个文件的副本也送交美国总统，据说总统“非常感兴趣地”看了文件。

由于罗斯福已经打算叫史迪威离开，他开始考虑陈纳德所施加的压力以及集中空军力量的想法。但是他遭到了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的反对，因为他们都认为必须重新收复缅甸，这不是反对使用空军，而恰恰是为了支持空军。为满足中国的陆军和空军的需要，必须要有一条可靠的供给线。正如史迪威当时给史汀生的信中说的，史迪威错误地认为空中运输队“只能运送重要物资的一小部分”。虽然陆军部不是那么悲观，但在评估陈纳德的计划和麦克休的报告时指出了关键一点，那就是，即使空中运输队增强到可以运送必需物资的话，但是只要日本人还占领缅北，这条路线本身以及终点阿萨姆邦都是易受进攻的。为了保护空中运输线就必须进军缅甸。为了向中国地面部队输送战斗物资，必须要有陆上线路补充空中运输线。作战部表示，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通过战斗夺回缅甸”。

对后勤保障和空军的陆地支持毫无兴趣的蒋介石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看法。陈纳德及其众多支持者也一样。

陈纳德想得到最高指挥权的想法不可能被美国陆军部认真考虑。他被军事部门看成一个异类，更加糟糕的是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那就是走“外线”直接诉诸总统，并仍然动员其信徒继续游说。但是犯有救世主综合征的人从来不承认有办不到的事，因此陈纳德在他的公共关系助手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的狂热支持下仍然相信指挥权应该是自己的。由于相信政治影响力必然可以成就一切的蒋介石夫妇也在不断努力，加之哈里·霍普金斯也听从艾尔索普的话，于是这件事就继续紧锣密鼓地进行并逐渐取得了成效。

马歇尔和史汀生在分别同宋子文会晤时明确重申了对史迪威的支持，宋子文准备10月10日离开美国回重庆。马歇尔和史汀生明确表示援助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希望展开军事行动。正如史汀生所说的，给中国提供援助，依赖于重新打开地面运输线，打开地面运输线依赖于军事行动。由于只能承认英国人和中国人不能很好相处，因此这又依赖于美国代表要成为“能打仗的军事领袖”，而不只是圆滑和讲究外交辞令的人。他要求宋子文告诉蒋介石，“更需要的是辣椒而不是糖浆”。

马歇尔私下告诉了史迪威，居里和麦克休正在活动将他撤换，并向他保证了自己对他的支持，同时也建议他“要比常人应该有更多的耐性和宽容，而这种素质正是你个性中所缺乏的”。

重庆的冬天到了，带来了雨水、雾气和烂泥，不过这至少比过去几个月极为闷热的天气要好受。何应钦处在比较通融的时期里。在史迪威提醒他中国若想继续得到租借物资，就必须在训练30个中国师上表现出行动后，何应钦表示会“解决所有问题”。“天哪，这是可能的吗？”史迪威对此难以置信。每一次许诺都让他相信他是在取得进展。

为了准备缅甸地面作战，战略情报局派了一个由前财政部人员卡尔·艾夫勒（Carl F. Eifler）上校带队的特遣小组，主要目的就是不让日本人使用密支那机场。特遣小组通过破坏铁轨、桥梁、机车和河上运油船来减少对空军基地的燃料运输。史迪威对他临别的话是：“艾夫勒，除非我听到缅甸那边发出了轰隆巨响，否则我不想再见到你！”

对于有能力和主动性的助手，史迪威是很乐意赋予权威的。曾负责整个战区庞大的后勤问题的威勒将军回忆说：“他从来不告诉我该做什么，他只告诉我他想要什么。”有些心怀不满的人时不时地想调到机会更大的战区去，但那些“一向可靠的人”留下来了：副官比尔·贝尔金（Bill Bergin）以及他总部参谋班子的“骨干”、代替多恩（多恩现在被任命为炮兵军官）的高级助手卡尔·阿诺德（Carl Arnold），作战部军官鲍威尔（Powell），医务官威廉斯，梅里尔，还有保罗·琼斯。史迪威已经让当时是中校的儿子小乔来到情报部任职（他11月到达），此外还召来他的

女婿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Ernest Easterbrook）上校，伊斯特布鲁克后来跟阿姆斯上校一道加入蓝姆伽的参谋班子。史迪威从德里带来了琼斯，因为他想有个老朋友在身边可以谈谈自己的家人，而琼斯又是个不可多得的人。“保罗到任何地方都能胜任——不管是搞铁路运输，负责物资仓储，驱使苦力干活还是修卡车。我希望能有100个像他那样的人。”对于那些“背叛我们的人”，史迪威在多恩的帮助下设计了挂在双十字架上的叛徒勋章。“平基不高兴了——跟很多人发脾气……他对那些虚伪和摆架子的人都充满了厌恶。”

10月14日，在接到美国对“三项要求”的答复之后，蒋介石准备参与对缅甸的进攻。他给史迪威看了中国的进攻计划（实际上就是史迪威自己的计划），而他坚持要投入15到20个中国师参战的先决条件，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派遣足够的海军舰只和航空母舰在孟加拉湾拥有海空优势，并在仰光进行两栖登陆。现在的问题是让英国人参与。为此，史迪威10月15日赶赴印度。为了让两个都很别扭的盟国一道参加行动，史迪威采用了他所说的“扯袖子”的方法。“见鬼，我现在成了个跑腿的了，”他解释说，“我跑到重庆去扯蒋介石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准备沿萨尔温江下去，因为英国人准备从南部进攻缅甸……如果英国人独自这么干了，中国人可就没面子了。然后我又到印度去扯阿尔奇的袖子，”并告诉他说，“委员长准备沿萨尔温江而下，你们最好也动起来。如果中国人有胆量打而你们英国人不行，到时候你们白种人的负担 [2] 可就够你们受的了。”

英国人已经开始因为蓝姆伽中国部队不断增加而开始制造麻烦了。虽然韦维尔同意增加中国部队，但是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向伦敦汇报了此事。史迪威又火了。“他们一心想把事情搞砸。给乔治 [3] 发了一封急电请求帮助。”如果英国人阻止中国人进入蓝姆伽，蒋介石会把这看成是侮辱并可能会“退出整个计划”。史迪威意识到，英国这样做的动机是出于“长远的政策考虑：害怕中印合作”。长远政策——对英国来说是指大英帝国，对中国人来说是国民政府的生存——主宰了两个盟友在战争中的行为方式。他们所担心的并不仅仅是赢得战争，而是在赢得战争的同时还能够增进或者至少维护既有利益。当时的美国还没有接受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就是政治的继续的看法。当时战争仍被视为一种非常态，应该尽快结束以使社会可以正常继续。

在德里，韦维尔找了很多麻烦，明确表示正在往蓝姆伽的两个中国师是不受欢迎的：铁路已经很拥挤，每天最多可以运送200名士兵，卡

车和畜力车不够，占用了驻印军的资源。“他们不想让中国人参加缅甸反攻。就是这样。”韦维尔想知道还有多少中国士兵要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天哪！我告诉他们是为了帮助我们盟国夺回缅甸。”

英国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几个月后，中国新闻部在1943年7月出版的地图中已经把缅北像从前那样划入了中国版图。

跟韦维尔会晤的第三天，史迪威发现事情突然出现了变化。“他们会在利多给我们一个地方。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供给……一切都顺顺当当了，很明显乔治施加了压力。”韦维尔总体上同意了以重新夺回包括仰光的缅甸全部为作战计划基础的“安纳吉姆”计划。给史迪威指定的、可以让蓝姆伽的中国部队推进的地方是缅北的胡康河谷，因为英国人相信史迪威不可能从那里通过。目的是夺取密支那及其机场以及与云南部队会合。成立了联合计划部，由梅里尔代表史迪威参加。根据计算，运送中国部队从蓝姆伽到利多，再到缅北并维持他们在战场上的需要，这需要800辆卡车，并需要在350英里（约563千米　）的运输线上每天运送200吨的补给。英国方面提供500辆卡车此外还有运送炮的畜力，此外，他们还很有先见之明地建议考虑空运。当时共有100万印度人参与机场建设。此外，还进一步达成协议，即美国负责修建一条从利多通过胡康河谷的道路为战役提供补给，道路随着战争的进展最后与滇缅公路连接。

利多公路是另一个美国“援华”政策的计划中英国人所不喜欢的东西。他们为了维护船运公司的垄断地位，情愿前沿地带没有道路，特别是他们不想让中国人接近印度。他们名义上同意了修建道路，这是因为华盛顿坚持这样做，另外，公开拒绝会大大激怒中国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暗中反对或者阻挠这个计划。虽然英国工程师曾经修建过一条几乎同样困难的穿过达武山口的路，他们还是声称无法修建利多小道。不能修建，因为这是浪费人力物力，是糟蹋现有资源。他们同意发动仰光战役，是希望这样不必再修一条公路，但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夺取新加坡而非仰光，所以攻打仰光的承诺并不坚定。

“让两个民族联合起来揍日本人可不是容易的。”史迪威在家信中说。不过在他看来，事情有了进展。他发现英国佬中有些“好家伙”，而且在跟林利思戈勋爵一道进餐时，勋爵不断问他战后中国人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史迪威对勋爵的看法是：“他自己是花了些心思的。”《中缅印战区简报》总编埃尔德里奇在给史迪威家人的信中说，乔大叔“还在像个蟋蟀一样四处蹦跶……到处管闲事”，并违反了所有着装规定。他原先最不愿意穿短裤，但“现在他赴晚宴都穿短裤”，尽管太阳落山就不许穿

了。他那顶老式军帽在热带透气且实用，但是他系帽子用的是根鞋带而不是皮带。

蒋介石的态度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现在愿意合作了。在11月3日的会议上他同意在云南投入15个师，将他现有的炮兵配备给他们，并会在次年2月15日前准备就绪。当史迪威说如果这些部队是些精兵强将的话，那么15个师应该够了，这时蒋介石在蒋夫人的示意下，立即表示同意让他挑选这些师并指定指挥官。正如后来史迪威回味过来的，这样的话自己再打败仗就说不过去了——当然，假如这个建议被付诸实施的话，但是实际上这个建议并没有实施。蒋介石同意由史迪威统率蓝姆伽的部队，并可以随时撤换罗卓英。此外，蒋介石重申必须有海上和空中的控制权，“否则他不会行动”。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就太好了。我们取得了最大进展。”出人意料的是，促成这种变化的是已经到达重庆并参加了会晤的宋子文。宋子文的地位取决于他能够弄到多少租借物资。在跟史汀生和马歇尔会谈之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跟史迪威合作要比跟他对着干好。他来时给史迪威带了一块手表和一个打火机作为礼物，并显然让蒋介石相信，同意军事行动要比抵制它更可能使他从美国得到更多物资。宋子文现在代替即将赴美的蒋夫人成为一个积极的盟友和与蒋介石联系的中间人。这时史迪威的笔记里那个不好听的绰号不见了，看来他对宋子文的帮助是真心感激的。跟中国军政部的会晤开始有效果了。“嗯，现在有进展了。真的接受了进攻计划。真正在调配部队，减少师的数量，让部队满编，增加武器，配备炮兵……有人传说我现在在这里说话算数了——从他们对我的态度上可以明显看出来。”

在史迪威的坚持下，宋子文甚至让他得到了这种承诺，保证第一次缅甸作战时的供应处处长俞飞鹏和原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不得跟Y军发生联系——至少当时看起来如此。但是就杜聿明来说，中国人内部的各种关系要比承诺更强，结果就在史迪威以为已经摆脱他的时候，他又以另一种身份出现了。

关于供应和运送组成Y军的30个改编师的计划，这是在中国军政部作战处参谋人员和专门从德里赶来的威勒将军商讨后拟定的。仓储和交通控制、医疗、信号和工程服务以及从蚊帐到榴弹炮的各种设备都在议程上。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作战处的美国参谋们已经详细计算了要使各师满编在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具体要求，以及分别需要配给多少租借物资。据计算，为了Y军的初期作战需要，在2月15日之前的三个月里必须

经驼峰航线运送4300吨物资。因为这挤占了供给陈纳德的燃料的舱位，他提出了激烈抗议。史迪威此时主要把他视为一个不守纪律的爱虚荣的人而非主要对手。在上一次抗议时史迪威曾经提到"陈纳德嗷嗷叫。他让人难受。仍然对比斯尔不满。告诉他闭嘴并服从命令"。但事情并没有完。由于Y军的需要，加之史迪威计算中国地面部队将会持续需要每月3500吨的物资，这很快使事态陷入危机。

史迪威已经盘算次年再训练30个中国师，最后再训练30个师，最终是将中国军队改编成100个满编师。他还计划在夺取缅甸后对汉口发起进攻，之后再进攻徐州——那是1927年他任职时去过的地方，从这里可以对日本发起空中打击。史迪威不但不轻视空军，相反在给宋子文的备忘录中敦促说"为此次战役要大力加强空军，同时也利用空军对日本发起密集、不间断的轰炸"。

中国军队对缅甸战役的支持正在增加。据宋子文说，他们觉得史迪威是唯一仍然对中国军队抱有信心的人。在很多人围坐一桌的全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向史迪威问了一些严肃和实在的问题："我们是真正在做事。"军械处在待命，各师得到了加强，炮兵的配备容易了，美军供应署也听从建议了。军械局局长俞大维"完全支持我们"。李宗仁"表示敬重、非常友好……这些家伙现在都支持夺回缅甸"。史迪威在11月19日写道："我们正在前进"——这里话有些过了；"如果我们能在韦维尔下面烧一把火……"

两天后这火苗便闪烁不定了。"印度那边消息不妙。英国佬想进行有限的进攻。他们的目标非常可笑——若开山区，钦山，加列瓦。"他们的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James Somerville）爵士以及皇家空军都在推脱。"总而言之，他们想在缅甸北部修建工事并在秋天来到后再认真考虑进攻。"再次出现这种游疑不定的态度反映了北非战场的进展难以逆料；盟军部队在11月8日登陆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混乱，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战事将会延长，而且排除了在1943年底前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在太平洋，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在防守瓜达尔卡纳岛的战斗中被击沉，结果太平洋舰队只剩下最后一艘航空母舰。在大西洋的舰船损失也很大，尤其是在摩尔曼斯克附近，在一支由40艘船组成的舰队中一次有13艘船被击沉。在各条战线都需要支持的时候，战略和目标难以达成一致的中缅印战区并不是盟军乐于投入资源的一个地方。

马歇尔在给史迪威的一封信中说明了这种情况，信恰巧是在感恩节收到的。史迪威对来信做了如下总结："对于我们的'战争'，我们慷慨地

分配到了：1.我们已经得到的租借物资；2.训练人员；3.一些机械设备，数目不详；4.‘运输线效率将日益提高’。天哪。这就是我们发动进攻所得到的支持。我不知道他们会给非洲提供什么。我就用这种前景去安慰中国人吗？”那天晚上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花生米和我同在一个木筏子上，我们只有一个三明治，而救援船正在驶离我们。”

他给陆军部的回复怒气冲冲，尽管信不是写给马歇尔的，但显然是针对他的。信中说，如果这就是他实际上得到的支持的话，那么以后大可不必口头上表示怎样的支持。马歇尔写了回信：“我收到了你骂人的信，并对你有这种反应表示理解。”

在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一周年之际，韦维尔建议“取消”缅北战役。这场战役休眠了，尽管完全死亡是一个月后。韦维尔做出这个举动时史迪威恰好收到了马歇尔的信，信中表示，已经决定增加美国对此战役的援助，其基础是重新开通缅甸的陆上交通，以更好地从中国发挥空中力量。在艾森豪威尔的北非战役之后史迪威的需要将得到优先考虑，为表明这种意图的严肃性，还计划提供6000名美国工程部部队用于筑路等任务。

史迪威赶到印度。英军总部“非常悲观，处处设置障碍”。韦维尔咕哝地说了各种困难：“所有的事情都很难……在雨季无法给孩子们提供供给。日本在内线有公路网……对中国的Y军疑虑很大。想等到1943年11月再认真考虑。”目前韦维尔以将原先的7个师计划削减成3个师，并无法承诺提供更多的部队攻击实兑并在钦敦江组织一条战线。

这一次，华盛顿对伦敦施加的压力没有起到作用。史迪威的原情报官、当时在陆军部供职的罗伯茨上校告诉史迪威说：“他们想方设法不想让中国部队在缅甸作战。”英国人坚持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控制孟加拉湾并支持仰光登陆。因为这是蒋介石参战的条件，所以不满足这个条件肯定会使他退出的。史迪威回去时感到重庆的准备工作已经冷下来了。何应钦又开始使用故意拖延的战术并以没有时间为借口。在讨论的过程中史迪威收到他的一封长信，“告诉我摔破了一些箱子，还摔破了一瓶子碘酒！然后向我们解释希望我们在处理时遵循怎样的程序”，史迪威愤怒了。这个人一人身兼史汀生和马歇尔的职务，可“现在因为印度弄洒了一瓶碘酒而小题大做”。这种琐细的命令跟在缅甸溃败时蒋介石要求给部队提供西瓜如出一辙。失望至极的史迪威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民必然有极大的凝聚力，这才能使他们忍受他们所谓领袖们的严重渎职和乱政。”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才不断努力，直到他任职结束。



战地记者们搭乘乔大叔的“战车”，左二史迪威，左三《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埃金森，右二（坐地上者）《时代》的白修德

12月28日，蒋介石通知罗斯福说自己原先提出的在孟加拉湾保持海上和空中优势的条件未能满足。罗斯福强调了重开陆上供给线的必要性，并说他（罗斯福）将马上与丘吉尔磋商此事 [4] ，敦促蒋介石在此之前先不要否定此事。忧心忡忡的马歇尔发电报给史迪威说，要“想方设法”使进攻可以开始，但是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史迪威不断给宋子文发送备忘录，提出了种种理由，包括中国自身的利益、未来的战略，以及撤销计划可能对未来援助的影响等。他竭尽全力提示说，假如中国不能发动进攻，他本国政府就有理由问：“既然中国目前的现状是这样，考虑到其现在的人员、组织和政策，美国还值得在中国战区投入更多的努力和资源吗？”史迪威所处地位的软弱之处在于他没有权力假设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1月8日，蒋介石正式拒绝发起进攻。他无须等待罗斯福跟丘吉尔商量之后再决定。事情已经明摆着他们无法满足他的条件，而对他来说，除非盟军认真对待这场战役，否则他不愿意勉强参战，尽管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他告诉罗斯福说，“如果海军无法控制缅甸海域”，这场战役最好推迟到秋天。如果中国再在缅甸失败，这对中国将是一场灾难，因此“在现在情况下我的唯一的选择便是谨慎小心”。他又提出了他一直想要的东西——根据陈纳德的论点，甚至是照搬陈纳德的原话——要加强美国空中力量，指出“空战的巨大潜力”，以及回报“远远超过投入”的前

景。

史迪威把这一天说成是“黑色星期五”。他对此深恶痛绝，但并不轻言放弃。在经过了这么多拖延和挫折之后，他怀疑是否能在原定日期发起进攻。他意识到蒋介石已经跟陈纳德站在了一起，但显然认为自己有陆军部的支持，再加上史汀生会写信热情相助，自己的地位将会加强。由于已经跟宋子文成为盟友，加上中国军队内部的鼓励，甚至“花生米”也并非不可控制的。他认为中国人为了能持续得到美国援助，就会竭力取得美国好感，而他可以借机推动他的军队改革和训练30个中国师计划。他认为仍然可能给蒋介石发一个最后通牒，并起草了一份，“如果乔治同意拟从华盛顿发出”——对总统并未提及。他继续施加压力加强X军（蓝姆伽）以及Y军。曾士奎来了，“还是老一套：‘为了四万万人坚持到底’”。

1月16日，史迪威意外地被邀请参加授勋仪式，他因去年4月的东枝战役中在战火中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史迪威在指挥部的门口遇见了多恩，这时他发现参谋官都表情肃穆地在院子里列队站立着。贝尔金上校走上前跟他握手并说：“请站在那里，先生。”

“这是干什么，要处决我？”史迪威仿佛要遭难一样喃喃说道。

贝尔金开始朗读嘉奖令，说史迪威“出现在前线中国师的阵地上，以身作则”激励这支部队再接再厉终于夺取东枝，此外还提到了他在前线的其他表现。“谁弄了这些废话来？”史迪威低声说，有些不知所措。小乔上前一步，尖声说“站着别动”，并给他别上了奖章。《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埃金森（Brooks Atkinson）以及《时代》的白修德报道此次仪式时语调略显热情，这是媒体对史迪威所惯有的，此外，《纽约时报》还发表了“给乔大叔授勋”的社论。受勋者却不为所动。在写给妻子温妮的信中他说：“整个儿都是废话，因为一点儿小事而大加渲染，完全是小题大做。这让人难为情，好在时间仍在继续，这些东西很快就会被遗忘。”

---

[1] 陈纳德准备用一支由147架战斗机组成的空军在六个月内打败日本，但实际上又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击败日本，而且不包括陆军和海军，仅空军就动用了9支部队从印度、中国、太平洋和阿拉斯加参战，还有一支海军航空兵参战，到1945年海军航空兵有90艘航母和14847架战斗机，最后还是投了两颗原子弹，才打败了日本。在1945年8月初，仅对日本的一次袭击就动用了801架B-29轰炸机。

[2] 白种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出自吉卜林的诗，指白种人照顾其殖民地其他人种的所谓义务。——译者注

[3] 指英国国王乔治六世（1895—1952），1936—1952年在位。——编者注

[4] 指计划在1月14—23日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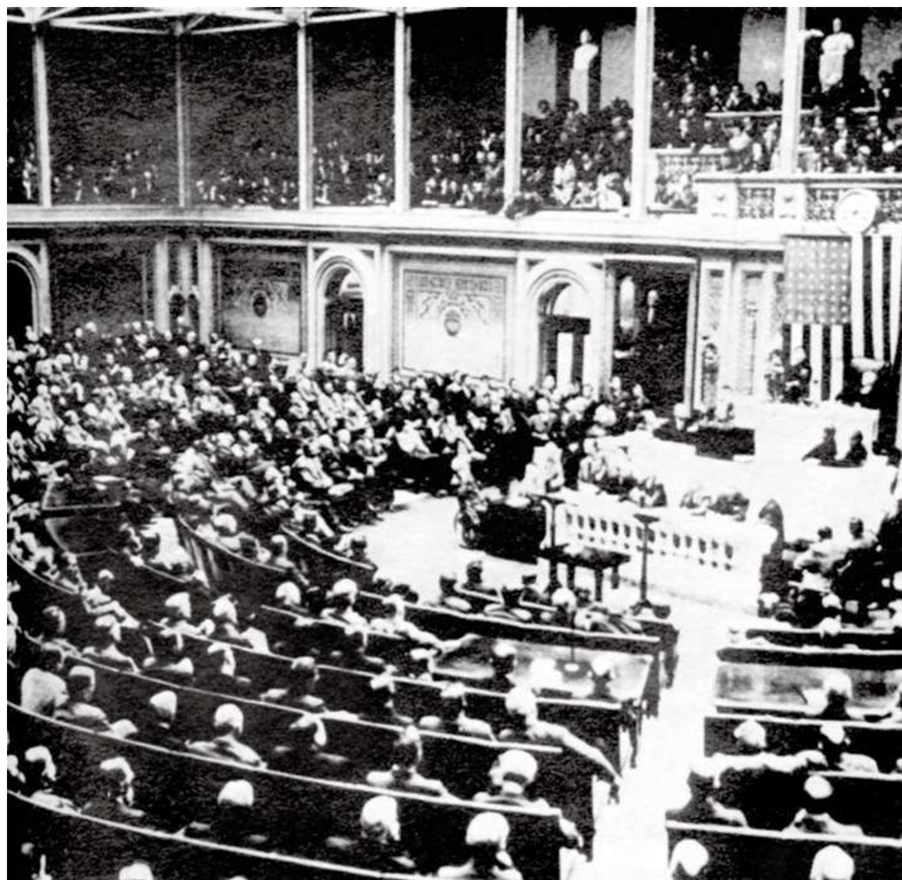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总统的政策

1943年1月—5月

1942年11月，蒋夫人来到美国后，白宫转交给她的礼物中包括了新泽西东奥林奇（East Orange）凯塞琳·奎因太太（Mrs. Cathleen Quinn）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张3美元的支票和从报纸上剪下的一张照片，是1937年日本空袭上海后那个坐在铁轨上大哭的孩子的照片。写信者请求总统把支票给蒋夫人：“这是我三个女儿的钱，是为了中国某地坐在铁轨上的那个小家伙的。”

蒋夫人的漫长访问一直持续到1943年5月，她的公开露面引起了公众巨大的钦佩和好感，这是自林德伯格成功飞越大西洋之后所没有过的。正如威尔基所预计的，美国人“还从来没有对谁”这样倾听过。2月18日她在国会演讲时简直把听众迷住了。有个议员说：“他妈的，我还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情。蒋夫人快要让我流泪了。”身着迷人的中国青色旗袍的蒋夫人身材娇小、苗条，她镇定自若，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声音优美而用词优雅，她让整个国会感到仿佛“是面对着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据《生活》杂志一个被迷住了或是深受教益的记者说，议员们都被她的“优雅、魅力和智慧”“抓住了……惊诧不已……完全倾倒了”。在议员们长达四分钟起立欢呼之后她开始讲话，其主旨是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更重要，美国应该帮助她的国人进行战斗，而不要在太平洋花费太多努力。她还说，在经过了五年半的抵抗之后，中国人已经相信“光荣地冒险要比屈辱地失败”更好。说到这里全场掌声雷动。自然，公众并不知晓蒋介石刚刚决定不在缅甸光荣地冒险。



宋美龄在美国众议院演讲

此时的社论强调了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友谊，并欣喜地指出，“在现在的困难时刻以及将来可能更加艰苦的未来”，这种关系是靠得住的。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Halifax）勋爵不无忧虑地向伦敦汇报说，国会有可能在公众情绪的裹挟下对中国做出一些他所说的“难以兑现”的承诺。他指的是归还所有中国领土的承诺。

蒋夫人从10岁到19岁在美国接受教育，思维方式和语言已经完全西化，她向普通美国人传达的是中国跟美国的相似之处而非不同之处。她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向两万人发表演讲，同场演讲的还包括威尔基；在好莱坞对3万人演讲，在全国募集资金的旅行中在芝加哥和旧金山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此外，还通过各大广播网发表广播演讲。她每天从美国公众收到几百封信，有一次乘火车经过中西部的一个小站时还收到站长妻子亲自做的一盒饼干。这位站长在凌晨3点接到通知说蒋夫人乘坐的火车将在8点通过这里。站长叫醒了妻子并告诉她这个消息，而他妻子为

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就做了她最拿手的饼干。蒋夫人触发了人们心中想表达善意的愿望，并让人们觉得她就是这种普遍愿望的代表。正如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所说的："她想要的也是地球家园中所有家庭想要的。"

然而，私下场合里情况却有所不同。她要来访问的消息让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成员很不安，他们担心她会蛊惑美国总统，从而改变首先击败德国的战略。她马上开始了这种努力，首先从哈里·霍普金斯开始，蒋夫人在11月27日乘坐陆军部的美国飞机到达时是他前往迎接的。她患有一种周期性的皮肤病，因此提出到美国入院治疗。在董显光以及孔家一个外甥和外甥女的陪同下，霍普金斯开车把他们送到纽约的哈克尼斯馆，那里整个12层都供她使用。在跟霍普金斯的谈话中她对欧洲或者太平洋的战争没有兴趣，"她的兴趣完全在中国本土"。她显然"不喜欢史迪威，但对陈纳德敬佩之至"。她告诉霍普金斯说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并犯了悲剧性错误：他迫使蒋介石将一些最精锐的部队投入缅甸作战，后来全部失去"。她追求的第二个目标是承认中国为四个大国之一，她大谈对和平谈判和战后世界的看法，敦促美国立即行动，主动启动"四个大国"就战后事务进行谈判。

罗斯福夫人到医院里看望了他，她觉得蒋夫人显得那么"娇小脆弱"，以至于"我想帮助她、照顾她，就像她是我自己的女儿似的"。蒋夫人在1月初带着两个护士和两位孔家人搬进白宫。其外甥女经常穿男装，以至于罗斯福管她叫"我的小子"。蒋夫人自己带来了丝质床单，每天都换，如果她中午午睡的话还要一天换两次。她大多数时候在套房中吃饭，尽管所有房间中都装有电铃和电话，但是叫人时还是喜欢拍手，这让白宫的服务人员很恼火。她住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时，秘密特工队接到她外甥女电话说，要在她外出时清理她的套房到电梯的走廊以及电梯到出口等地方；但发出通知后她往往又会改变主意，要等好几个小时才出来，或者不出来了。特工队负责人请求她在安排时确定一些，她随即要求换掉负责人。两名年轻的孔家人本来根本没有什么特权，但行事时跟她一样傲慢无礼。

作为统治阶层的宋家人和一位专制者的配偶，蒋夫人很有些皇室风范。有一次，她很不客气地问多恩上校，为什么他和他的同事称她为Madam而不是Madame，因为众所周知前者在美国是指妓院老鸨。多恩灵机一动回答说，英国女王通常被称为"Madam"，美国军官这样称呼她是想表达一种皇家的尊贵。"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一个人的表情会变化那么

快。”她的脸一下子从埋怨转为阳光灿烂，在多恩办事的其他时间里她都表现得优雅尊贵，仿佛真是皇后。

得知她如此富有魅力后，美国总统安排与她的第一次会面没有按常规让客人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而是在他面前摆上一张牌桌并在对面放了一把椅子。他对自己女儿说，他不想让他的客人“太靠近”。随着交往的深入，他发现蒋夫人有“钢铁一般”的决心，这跟他妻子说的那个温柔甜蜜的人并不一致。有一天晚餐时谈到了约翰·刘易斯（John L. Lewis）号召的一次矿工罢工，总统问蒋夫人，她的政府在战时遇到这种情况会怎样做。蒋夫人伸出一个手指在喉咙上划过去，这让总统仰头大笑并对桌子那头的妻子说：“埃莉诺，你看到那个了吗？”

蒋夫人又跟总统谈到了跟霍普金斯谈过的那些话题，并在谈及史迪威和陈纳德的时候把史迪威与蒋委员长的紧张关系归结为之前的西瓜事件。按照她的说法，史迪威在接到这个命令时“公然表示蔑视”，据她说这影响了他们后来的关系。

她邀请总统跟她去中国，她对政府中每个准备“诱惑”（用罗斯福的话说）的高官都发出了这种邀请。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海军上将李海（William Daniel Leahy）应邀去她在白宫的住处，但是他之后“始终不知道这次邀请的用意何在”。史汀生说她是位“有吸引力和让人愉悦的小妇人”，曾经“评价说我的手长得漂亮”，但他对应邀访问她的副参谋长麦克洛伊说，“要对她所说的一切都严加留意”。她向所有拜访她的人恳求为空军运输队派遣更多的飞机，经不起她的坚持，罗斯福命令立即将还没有完成测试的柯蒂斯——赖特（Curtiss-Wright）公司的C-46飞机送去。飞机投入使用后，驼峰的恶劣条件加剧了飞机的结构性缺陷，结果很多飞行员因此死去，这使得本来就很低落的士气更低了。

罗斯福尊重蒋夫人，因为她是中国政府的实权人物，但是并不信任她，而且她待得时间越长，魅力也变得越少。她的圆滑不能跟她的魅力相比。在总统为她举行的一个有172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她让他回答美国怎么才能够向中国提供物资的问题。当总统回答说上帝能让我们多么快地把物资运给中国我们就会多快时，她竟然提示说“自助者天助”。罗斯福脸一下子红了，但究竟是由于难为情还是由于愤怒就不知道了。

在2月底，白宫的大管家给摩根索的私人秘书打电话，因为蒋夫人请求财政部指示海关税务人员免税放行一批刚刚到纽约的运给她的英国香烟。后来发现香烟还在船上，结果蒋夫人方面的电话仍然整日不断，

直到财政部被逼无奈只好指示专人“从船上把货取下并空运过来”。跟西瓜事件一样，英国香烟虽然事小但意味深长。蒋夫人的所作所为无法让人把她跟一位正在把自己的国家引向民主的未来的领袖联系在一起。“总统……急于想让她离开美国。”摩根索对他的参谋说。罗斯福之所以这样，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不快，倒不如说是他越来越担心蒋夫人私下的做事态度可能传播出去，从而破坏她的公众形象——这也会破坏他的政策。

罗斯福除了执意要使中国成为战后的四个大国之一，他还希望目前能使中国继续参战并在未来能够跟美国步调一致。他认为，没有任何别的国家会像中国那样可能成为战后麻烦的来源。据对此最有可能了解的萨姆纳·威尔斯说，罗斯福拟定的使中国未来更加稳定的四项原则是：第一，中国应该与苏联达成协议，以免苏联在战后进行干涉；第二，中国应该收回被日本以及其他列强抢占的领土，包括香港；第三，应当支持国民党政府成为唯一能够统一中国的政府；第四，美国的远东政策应该基于中美之间紧密的工作关系的基础上。

罗斯福通过谈判废除了美国跟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特权和租界，同时也敦促英国这样做了（尽管没有归还香港），从而在使中国成为与他国平等大国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美国的这些做法在1942年10月10日的中国国庆日宣布，后来又在1943年1月11日跟英国一道正式分别签订条约，从而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里对中国主权的践踏。蒋介石欢呼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里程碑”并使独立中国“成为和英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

罗斯福的四项原则以及他的中国政策的成功有赖于一个前提，那就是国民党政府是个可以持续存在的政府，但这已经是个问题了。到了1943年，任何一个有见地的观察家都看得出来国民党在战后难以避免地会在国内受到重大挑战，而结果如何谁也说不定。然而，为了顾及大国的概念，美国还是对国民党非常尊重，这意味着美国是在自欺欺人的幻觉下执行这项政策的。华盛顿得到的情报是没有问题的。驻外机构的报告内容翔实。大多数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官员和记者都一致认为国民党无能、腐败、压制、不能代表人民、内部虚弱不堪且难以为继。乔治·艾奇逊（George Atcheson）是在中国具有二十年经历的外交官，他在1943年5月以代办的身份到达重庆之后报告说“几乎各方面都在急剧恶化”，而经济衰退“可能最终导致崩溃”。中国领导人“束手无策”，通过考虑战后问题来逃避现实。他的报告并没有跟其他众多文档一样石沉大海，文

件送到了白宫李海上将的办公室。为了拨开蒋夫人风风光光的访问所造成的迷雾，赛珍珠在给罗斯福夫人的信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她说蒋介石政府和宋家人为一丘之貉，均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她还写道："这种局面独特而有趣。当然这无法继续下去。我担心战后人民会立即爆发，或者至少在人民恢复到有能力这样做的时候。"另一个可以直接接近总统的人居里曾经收到过白修德就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而为《时代》所写的亲历文章的未经删节的版本。他的报告说赈灾"愚蠢和无效"，地方官员对挨饿的农民仍然横征暴敛，重庆对此"安之若素"，因为据说官方已经免除了各种税收，最后作者坚信，河南农民的忠诚"已经由于其政府的抢夺而荡然无存"。

首都的决策者和现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各种徒劳的努力反而加深了这道鸿沟。华盛顿1943年的中国政策并不是根据当时的信息确定的，而是由那些思维方式已经在漫长的一生中早已固定的人制定的。形成政策的不是艾奇逊的报告，不是赛珍珠的信，而是1912年的国会决议——该决议欢迎中国走入民主的行列并热烈祝贺其人民"成功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此外，形成政策的还有此后三十年中所形成的想法和形象。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这种信息必须要跟这种历史积累斗争，并且还要能够成功得到国家元首的关注并能够得到他的理解。如果有见地的建议得以到达国家元首那里，这个建议仍然可能不被采纳，因为这可能给想当然的既定政策造成不便。这是所有障碍中最大的。要克服一种被接受的想法的惯性，要重新检验各种前提——这是一个充满困惑的过程，所需要的勇气往往不是政府通常能够拥有的。美国国务院就中国问题并没有从自己特使的报告中得出需要重新考察中国的结论。总统不想正视这个他致力于帮助的政权的缺点，因为他专心致志想让中国成为维护世界稳定的第四根支柱。如果没有人能代替蒋介石使中国统一，那么，尽管他有弱点仍然要支持它。

除了史迪威还有别人也认为，要使中国政府变得强大并有活力，就需要有"革命性想法"。由于中国的被动和恶化以及对盟国而言失去了战斗潜力，史迪威这类人往往都焦虑地想找到改进的办法。据艾奇逊报告说，外国贷款已经无济于事，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夺回宜昌以及通往湖北和湖南的腹地，那么棉花以及各种农产品的源源而来可以满足食物和衣物需求的50%——这是中国经济部长翁文灏告诉他的，翁是中国官员中最出色和最受尊重的人之一。艾奇逊不知道盟国是否能够帮助中国发动"坚决的行动来夺取……诸如汉口、宜昌等地方"。他觉得"必须要有所作为"。像翁文灏之类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迫切感到必须"有所作

为”，但是他们跟晚清的维新人士一样，遇到了一个无法采取行动的政府，因为政府过于虚弱并害怕改革。

此时美国公众所听到并信奉的是诸如威尔基报告所传达的中国的形象。记者受到限制，因为他们要经过美国陆军部授权，必须签订协议同意把所写的东西都交上去审查——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都可能会使之失去授权。部分由于新闻审查，但更多是由于自愿选择沉默，到1943年为止媒体有关这个英勇而广受喜爱的盟友的报道都是不真实的。也许过去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如此误解过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

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议程包括了恢复安纳吉姆计划以全面夺回缅甸，包括通过两栖登陆夺取仰光的问题。现在的主动权取决于盟国了，美国的陆海军负责人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Ernest Joseph King）都坚决支持安纳吉姆计划，因为这可以帮助在中国建立有效的基地，是对日本工业和海上运输线展开空中打击的先决条件。重新开通连接中国的道路还提供了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日本在其帝国的主要落脚点将转入防御地位——当然这个前提是中国军队可以得到装备并能够奋起作战。在美国人看来，这比让美国人在潮湿的西南太平洋岛屿的丛林中进行缓慢、艰难、零碎和代价高昂的战事要可取。日本人在这些岛屿的反攻非常激烈，而美国，正如马歇尔说的，“经不起再来个巴丹战役了”。在中国的日军转入防御之后我们可以“减少我们在太平洋的危险并可以展开对德作战”。对此马歇尔不惜使用讹诈。他在卡萨布兰卡对英国人说，除非发动安纳吉姆战役，否则“太平洋随时都可能出现一种局势迫使美国收回所有对欧洲战区的承诺”。

英国厌恶这场战役的理由并未改变。他们也可以使用讹诈。他们说夺取仰光的登陆舰必然会减少英国跨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的份额。海军上将金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像一把利斧，马歇尔跟他比起来都算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了——他提出可以由美军从太平洋为仰光登陆提供舰只。这样各方达成一致，安纳吉姆战役必须在一个战斗季节中完成，也就是在11月到次年5月之间，计划在1943年11月15日开战，且最终决策在7月前做出。

为了让蒋介石同意参战，并弥补未邀请中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这个让主张中国为四个大国之一概念的人难为情的事实，盟国派遣了一个高级代表团跟蒋介石商议此事。代表团包括空军的阿诺德将军、美国供应署署长布里恩·萨默维尔（Brehon Burke Somervell）将军，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英方代表约翰·迪尔（John Dill）爵士。

这个代表团的背后实际上是空战和陆战的问题。由于受到蒋介石和陈纳德的影响，罗斯福已经对安纳吉姆计划疑虑很大，倾向于认为空战是打击敌人的最快捷和成本最低的方式。他提议让阿诺德去中国，阿诺德是个主张空战的人，急于“尽早轰炸日本”。萨默维尔代表了陆军部的看法，认为驼峰航线所运送的货物不可能与地面供应线相提并论，为了与另一种意见抗衡，马歇尔同时也派遣他去了中国。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借此了解了中缅印战区的现实情况和脱离现实之处。在德里，阿诺德觉得韦维尔的作战计划根本就不是什么计划，而只是“写得不错的几段文字，说明为什么这个计划无法完成”。2月4日到达中国之后他发现，陈纳德对他作战的后勤保障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而蒋介石更是如此。阿诺德在史迪威的陪同下参加了一系列在蒋介石山上的住所（他的向导称之为“花生米的贝希特斯加登 [1] ”）的会议，并发现蒋委员长“听不进道理”。无论是阿诺德答应为驼峰航线提供137架运输机以便使每月的运输量达到5000吨，还是答应还会提供一批B-24轰炸机来，蒋介石对此都不为所动。蒋介石并不像史迪威所设想的那样急于博得美国好感，反而又提出了三个新要求：给陈纳德以独立指挥权；至11月底前每月从驼峰运送1万吨物资；并为中国提供500架战斗机。

提出这些要求的原因之一是需要陈纳德的航空特遣队代替中国空军保卫重庆。根据高思的报告，在美国训练的中国空军士官“并没有实战经验”，“显然对战争是无济于事”。苏联人在兰州的培训也同样徒劳无功。苏联人发现，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提供的飞机或者使用不当，或者坠毁了，而且其他物资也很少能用于抗击日本。据他们说：“物资消失了，并没有为此说明。”由于训练计划失败了，《租借法案》提供的飞机大多被毁，同时又不屑于让外国人来负责空军事务，因此，如果日军春季回来继续轰炸重庆，中国空军只能束手无策。



卡萨布兰卡会议，1943年1月

当谈及必须建设和维护机场以及提供燃料的问题时，阿诺德发现，蒋介石和陈纳德“只是挥挥手就打发了这些问题。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想了解后勤保障问题”。对于委员长来说，任何对现实困难的解释都是“借口，借口”，他要求立即达到每月空运5000吨的目标，“办法总是有的，必须要做到”。他再次提出了最后通牒：“告诉你们总统，除非满足我这个要求，否则我没法打这场战争，他也不要指望我们的部队参加这个战役。”

阿诺德后来对史迪威说：“我才不会把这个见鬼的消息带给总统呢。”阿诺德没有理睬最后通牒，继续会谈，承诺增加运输量，但仅此而已。他让机敏的迪尔去“试探”委员长到底会不会参加11月的战役。蒋介石说他会参加，但是，如果每月不能运送1万吨物资，以及无法提供500架飞机的话，他无法保证能打胜。史迪威对此仍不满意，问如果海军只

能提供有限支持时蒋介石会不会参战。“他（蒋介石　　　）勃然大怒，说：‘我不是说过我要参加了吗？’他通过宋子文说我公开使他下不了台。让他见鬼去吧，我就是要叫他当众答应。”蒋介石在2月7日给罗斯福的信中重申了自己的承诺，也重申了之前提出的三个新要求，并说“中国部队准备坚决完成既定任务”。11月战役的参战各方在2月9日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确认了这次战役。这次会议中国方面的与会者是何应钦和宋子文，英国方面是迪尔和韦维尔，美国方面是阿诺德、萨默维尔、比斯尔以及史迪威。“一致同意了。”韦维尔这样总结说。现在要做的只在于雨季一旦结束就“尽最大努力”准备战斗。

史迪威很高兴，因为这些来访者可以亲自看看“中国政府的操作方式”和这些他要与之打交道的人——他是指蒋介石和何应钦。阿诺德走时对他说：“你真应该得到一个桂冠”，并在后来的信中说：“亲爱的乔：你要做的工作真是混账……什么时候需要帮助只要说一声。”

结果是陈纳德先吱声了：由于驼峰上的运输实际限制很大，他的作战仍然很受限制。这时从驼峰每月运送约3000吨物资，其中大部分被史迪威用作训练和装备Y军以备发动缅甸战役，只有一小部分给了空军。陈纳德对此大为不满，为了促进事态发展，还授意报刊发表文章，此外，这种不满还通过艾尔索普这个私人途径到达了霍普金斯在白宫的办公室。艾尔索普是个具有煽动性见解的人。他是罗斯福的亲戚，是华盛顿知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他本人相信飞机是终极武器，1941年曾担任陈纳德的公共关系助手并对陈纳德推崇备至。几个月后他在香港被日军逮捕并遣送回美国。之后，通过霍普金斯的关系，他被任命为《租借法案》的驻重庆代表并于1942年12月去中国。罗斯福当时曾写信给艾尔索普说希望跟他一起去看看陈纳德，并提出另一个办法是陈纳德到华盛顿来。总统似乎更相信私人使者而不是官员的报告，而艾尔索普作为私人使者是很合适的。他能书善写，擅于鼓动和说服，虽然对局势一知半解，但显得很有主见和见地。据霍普金斯的传记作者说，艾尔索普的大量来信“毫无疑问地影响了”霍普金斯。



阿诺德

艾尔索普的报告耸人听闻。他还没有到达中国就根据和回国的飞行员的谈话告诉霍普金斯说，美国空军在中国的处境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国家性的丑闻……让总统、军队和整个国家蒙羞”。不到两个月，艾尔索普就要求被召回亲自汇报。到了重庆后他去看史迪威，这次会面后史迪威就开始在日记中称他为“Alslop” [2] 。不到两个月，艾尔索普带着中缅印战区的解决方案回到美国，给霍普金斯提交了一份21页充满激情又富于说服力的报告。报告的核心是，发动缅甸战役是在发动“辉煌的、危险的、结果难料的”地面战斗，忽视了“在空中可以轻易取

得的辉煌战绩”。

艾尔索普的解决办法就是撤掉史迪威，这个人“不了解并严重低估”空军力量，其用陆军解决的方法“对我们来说结局很可能是一种灾难”，史迪威是个“傲慢、狭隘和老派的墨守成规的步兵”。他说，史迪威对中国人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他完全错误地认为，史迪威的训练计划是为了“让美国人代替中国人担任战场指挥”。不过艾尔索普有一点说对了，那就是戴笠的特务们将史迪威那些轻蔑的语言汇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得出结论说，因为史迪威在压制空军的作战能力，而且很明显，只要马歇尔还是总参谋长，史迪威就要继续控制物资，那么就得把史迪威调离。

事态发展为反对地面进攻提供了支持。英军试图夺回缅甸西海岸的实兑，但是被日军击退，并在之后遭受了一系列挫败，这大大影响了士气。这个结果使得安纳吉姆计划前景黯淡。在丘吉尔看来，反攻缅甸无异于“一根毛一根毛地吞食一头豪猪”。罗斯福也开始同意他的看法，并向马歇尔建议也许应当放弃安纳吉姆计划，因为这跟准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相冲突。这样就有更多理由将战斗的负担转给陈纳德，那么为了能使他有效地战斗，就要给他足够的支持。罗斯福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因为这是在中国战区显示美国战斗积极性的最容易、最直接的办法，这对于美国承诺将主要的战斗力量用于对德作战也是个弥补。不管怎样，罗斯福喜欢给那些有强烈想法的人机会并看看结果怎样。他决定不理睬阿诺德对陈纳德不大热情，并准备否决陆军部给中国提供物资要求有补偿条件的做法，不过他没有坚持调离史迪威或者取消史迪威对租借物资的控制权。

罗斯福的决定跟其他很多复杂的战时决策一样是个折中的办法。3月8日，他要求为陈纳德另行建立一支空军队伍，它独立于比斯尔管辖的第十航空队，但仍在史迪威的控制范围内。罗斯福向蒋介石表示将使战斗机的数量达到500架，并将无条件每月提供1万吨物资。然而在美国陆军部的坚持下，罗斯福又提醒蒋介石通过空运无法满足物资运输需要，必须开通地面运输线。罗斯福向马歇尔明确表示，虽然他“仍然对缅甸战役抱有希望”，但他想在1943年把重点放在陈纳德的空军作战上。机场的建设和改进将“竭尽全力”，陈纳德所得物资的份额要“真正满足他的战斗需要”，在每调拨4000吨物资中至少分给他1500吨，如果调拨超过4000吨就给他2500吨。陈纳德要在“史迪威许可”的条件下对其作战和战术有“完全控制权”，这显然是不可能同时满足的条件。

促使总统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政策而非战略。他专注的并不是想在空战和陆战之间做出什么历史性选择，而是致力于想把中国看成大国的想法。支持陈纳德正是中国的首脑想要的，而史迪威坚持要改革中国军队的想法却破坏了这种大国形象。罗斯福基本上对“增强中国部队的战斗力”的使命不感兴趣，因为他也跟那些习惯于中国胜利战报的美国人一样，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特别是史迪威所推行的军队改建是违背蒋介石意愿的。在这方面总统的直觉是对的，尽管他提出的理由未必正确。从根本上说，军队改革不可能违背其统治者的意愿；要改革它就必须先改革它所置身其中的社会。更让罗斯福不安的是，作为同样的统治者，他对“花生米”之类的称呼感到反感。他觉得蒋介石也应该得到跟自己一样的尊严，也许考虑到蒋的困难境地，他甚至需要更多的尊严。

在写给马歇尔的一封著名的信中，罗斯福解释了为什么要否决陆军部的决定。他引用了史迪威的一封要求对蒋介石要语气更加严厉、要求他有更多承诺的信，并认为这种方式“大错特错”。蒋委员长是国家元首和总司令，“人们不能对他厉声说话或者要求有更多承诺，正如不能这样对摩洛哥的苏丹一样”。蒋介石是通过个人奋斗才“成了四万万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在中国造成了我们花了一两百年才促成的变化”。

这封信的辞藻原不是为了公开发表的，因此它显然代表了美国的幻想。尽管像史迪威说的，中国人民有忍受乱政的“巨大凝聚力”，而且文化的统一性要远比美国的久远和强大，但罗斯福认为国民党经过十五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便达到了像美国一样的国民凝聚力，这只能是一种幻想，而且是有害的。这使得美国的政策的基础岌岌可危。



美国航空志愿队（飞虎队）标志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标志

对蒋介石的军事表现所产生的类似幻想也让史迪威一直恼怒不已。中国部队在允许的范围内确实在奋力保卫国家，但是每天有关在萨尔温江前线“奋起反攻”并“重创敌人”的战报，按照史迪威的估计，90%都是假的；然而这些战绩在美国却广为传播。史迪威在写给马歇尔的信中说：“这当然让我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如果中国部队很有战斗力而且领导有方，那么还要我来这里干什么？”他仍然认为，只要给他充分权力要求中国为取得按《租借法案》提供的武器做出让步，那么他就可以要求对部队进行改革。他认为这是关键所在，并不遗余力地说明这一点。他毫不怀疑，有美国的物资和经验，再通过他这样受过军事训练的出色专业人士的指导，那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结果。他也有幻想。

在给总统的复信里，马歇尔基本上解释了史迪威为什么想改革并要求提供地面力量。他解释了空中力量对地面的依赖，因此史迪威提高中国部队战斗力的训练计划是必要的。“一旦我们的空军打击了日本人，他们就会向我们反扑”，而保护机场的任务就落到了中国军队的身上了。“这是最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必须现在就着手准备。”他指出，设在浙江的原来准备用于轰炸东京的基地已经被日军地面部队所摧毁，现在仍未修复。为了加强对日军的空中打击，开辟一条通过缅甸的陆上供给线是必需的，而这也有赖于中国的地面部队。他还强调指出：“我们要充分调动中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潜力，就必须改变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的状况。任何代表美国利益派驻到这个战区的代表的首要目标便是矫正这种情况。”

马歇尔的最后一句话涉及了政策领域，而他的说法并不是总统的政策。罗斯福并不想违背中国领袖的意愿而坚持要求调动中国军队。他反对对提供物资要求附加条件，因为他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承诺都是不会被实现的。他倾向于同意蒋介石对陈纳德计划的明显支持，尤其是

他也相信日本的商业运输线是其薄弱环节。至于防护机场，陈纳德曾经说飞机可以帮助中国军队防护机场，至于所需的飞机数量他给出的数目并不一致，有50架、100架和150架不等。

根据总统命令，3月11日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建立，陈纳德也被晋升为少将。尽管意见被否决了，美国陆军部也很快行动起来。由于担心陈纳德的晋升会减少史迪威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影响力，作战处提议授予史迪威一枚最高荣誉军团勋章 [3] ，目的是“想方设法让中国相信史迪威将军完全受到美国信任”，而且“我们”认为他是有关中国事务的“主要裁夺者”。马歇尔3月16日同意了对史迪威将军的授勋，但此事又就此打住了（尽管不是永久的），因为罗斯福更想让蒋介石成为接受这种勋章的第一个外国人，而如果史迪威同时接受同样的勋章，蒋介石对勋章就不会那么看重了。

马歇尔通过一定途径向史迪威转达了罗斯福对史迪威未能像对待摩洛哥的苏丹（为了便于发报他改苏丹为“部族首领”）那样对待蒋介石所隐含的不满。之后史迪威的日记中时不时地使用了“部族首领”这个词。

自从在12月那个黑色星期五蒋介石取消了缅甸战役之后，史迪威一直致力于组织、训练和装备Y军，准备在来年11月重新发起进攻。这个计划包含两个部分：使各师满编以及训练军官。史迪威看中的陈诚被任命为Y军的总司令，选定了中国参谋官和美国教官，确定了30个师，在昆明建立训练学校的具体事宜已经安排好，并得到了云南省长龙云的同意，学校就定在4月1日开学。训练计划进展缓慢、困难重重，但是蓝姆伽证明了事在人为。驻蓝姆伽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已经先行进入缅甸北部，在筑路队前面担任警戒。约翰·戴维斯在3月预计说史迪威“可能真能干出一件似乎不可能的事情——让中国人重新对日本人发起进攻”。

现实条件并不理想。为30个师选定的11个军均不满编，总共缺少18.5万人。他们的武器数只有正常装备的50%，而且其中有一半由于缺少关键部件而无法使用。按照史迪威跟中国军政部商讨的日程应该提供补充人员，但尽管军政部屡屡保证，却始终未能兑现；有时候补充兵源在刺刀威逼下零星来到，但这些人情况很糟，往往需要五到六周的特别安排，在此阶段他们一日三餐，第一周主要是睡觉和短途散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接受训练。在去征兵站的途中这些被征者没有吃的东西——他们为了活命只能拿着枪到村子里抢，这让村民们更加愤怒，生活也更加痛苦。由于预计到会有减员，往往会额外征兵。史迪威曾经写道：“何应钦预计补充兵力有三分之一会死去或者在路上逃跑，而他对这

种局面安之若素。”在1943年中国军队的被征士兵中有44%由于死亡或者逃跑而损失掉，换句话说在总数为167万的部队中共失去75万名士兵——这是“对中国领袖们的无情控诉”。

尽管困难重重，还是时不时有让人振奋的地方。史迪威在3月23日写道：“一切顺利。已经下令让补充兵力报到。所有征兵将在4月底开始，估计在5月底能够加入队伍……3月24日。蜜月在继续。多恩接见了坦克部队的士兵，一切都跟我们预想的一样……百分之百地同意……白崇禧昨天来到，主动提出帮助。他现在想看看蓝姆伽了。何应钦演讲中提到了蓝姆伽，说好极了！”在给史汀生的信中史迪威写道，他正得到中国军械和交通部门的“大力协助”，“医疗设施是迄今为止中国军队中最好的”。



艰难行进

组建昆明训练中心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对450名军官进行步兵训练，对300名军官进行炮兵训练，并对150人进行通信科和医疗训练。多恩上校任参谋长，阿姆斯上校（不久晋级为将军）任训练计划主任，包瑞德上校任中心的执行官，而自缅甸战役开始就一直担任史迪威联络官的曾士奎则是中国方面的执行官。训练中心有各种建筑、射击场、教员以及各种设备，但是学员数目一直不够，因为中国军方未能提供足够的人来。炮兵科开学时只有87名军官而不是300名——整个1943年，炮兵科的人数只能达到预定人数的25%，而步兵科的人数只能达到预定人数的

60%。参加训练的人很多人不是军官的料，但也有很多热情很高，学得也很快。一个美国教官说："他们学得很快。这真是一段奇妙的经历。我从来没有看到美国学员也能够这样学。"

开学不久，23名翻译就举行了罢课；这些军官学员由于通货膨胀深受其苦。曾士奎上校给一个美国朋友展示了这些事情在中国是怎么对付的。他把弹药发给一个排的学员，让他们防守翻译官的营地，并指示他们一旦有人离开营地就开枪，去吃饭也不行。翻译们次日捎话说他们愿意谈判，然后曾士奎让全副武装的卫兵把他们带到他的办公室，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支上了膛的手枪和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并让每个人在声明上签字确认他们对薪饷表示满意，否则"我就打死你们"。这些翻译回去工作之后，曾士奎跟那个美国人解释说，在淞沪会战中，自己曾经不得不枪毙了9名军官，因为"他们严重夸大了战术和后勤状况，以至于我无从决策"。后来替补他们的人"都能尽职工作"。他并不为这些措施而得意，但是认为在中国军队当前的情况下这是唯一奏效的。

幕后的斗争仍在继续。史迪威认为陈诚将军是在真正配合，但是军政部在拖他后腿。"何应钦意识到如果陈诚成功了，他将一举成名，而何应钦自己将被人忘掉。因此何应钦对训练不顺利表现得很平静，也许他自己就在积极破坏呢。"此外，何应钦还担心把中央军屯兵云南会引起龙云的反感。史迪威写道，"云南的鸦片贸易仍然很盛"，而"我们出现在这里将会影响这种大规模的走私勾当"。龙云筹集资金的办法五花八门。有一次，他命令这个地区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两轮车必须装上橡胶轮胎，然后他打开仓库出售他在滇缅公路通行期间罚没的走私橡胶轮胎。那以后他又通过法令对所有有橡胶轮胎的车子征税。

在缅甸另一边的利多，筑路工作艰难地缓慢推进，要克服的困难包括地形和像驼峰那样剧烈的天气变化。到处是高山、峡谷和急流，由于树木和藤类密布，无法在陆地上进行准确测量，而年降雨量可达150英寸（381厘米 ），雨季有时的降雨强度可达每24小时14英寸（约35厘米 ）；泥潭、水蛭和疟疾是时时刻刻面临的危险。过去一年试图通过伊朗、阿富汗和西藏另行开辟通往中国的道路，但是勘探表明都不现实，这样唯一的选择便是胡康山谷了。日本人没有占领缅甸最西北角，但经常有传言或者有人发出警报说看到了日本人。威勒将军作为一名工程师，不同意修建这条公路，不过他还是为每一英里道路设计了13个涵洞，以便于大雨积水时可以溢洪。包括一个旅的黑人部队的美国工程兵跟英国提供的印度劳工一道开始修路。最终参与修路的共有8万人，其

中5万人是美国人，其余的是中国人和印度人。这条小道到预计将要展开战斗的新平洋共计103英里（约165千米　　），威勒希望能在6月前完工。天气好的时候，每天能铺设3/4英里（约1.2千米　）的单车路面，包括让车道。1943年2月28日，先头部队在距离利多43英里（约69千米　）的地方穿过了边境线并竖起了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欢迎来缅甸！这里通向东京！"曾在蓝姆伽陪护中国军队的西格拉夫博士和他的医疗队，现在又沿着难民走过的小道往回走，每个水坑或者斜坡下面都有一堆堆骷髅，骨头上还剩有一些衣服碎片，有平民的衣服也有军服，既有英国人的，也有印度人和缅甸人的，这些残骸遗物都见证了一年前那场可怕的大逃亡。

由于遇到各种麻烦，穿过国境线后工程进度慢了下来。5月11日雨季到来时，只从边境线延伸了4英里（约6.4千米　），而雨季的到来更增加了难度。

从2月到4月的时间里，史迪威一直在奔波之中，从昆明到利多，再到阿萨姆邦的查布瓦（空中运输队的总部），再去蓝姆伽、德里，再回到重庆，不断地视察，会晤，听各种抱怨，确定该优先做的事情，跟盟友商谈并敦促他们行动。他到查布瓦事先没有声张，想亲自去看看检验报告说地面食堂情况非常糟糕是否属实；这是空中运输队又一桩让人头痛的事。用餐条件之糟糕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丑闻，但高级军官因为可以到别处吃饭而对此不管不顾。在跟列兵一道排队并坐在肮脏的板凳上一起吃完"泔水"后，史迪威宣布说："好的，孩子们，让他们来尝尝吧。"顿时，食堂里士兵们开始用食物和铝盘四处乱扔，桌子也被推翻。史迪威然后叫来指挥官说"这就是你的食堂"，并告诉他不管什么时候，史迪威下次再来到这里视察的时候，如果这儿的情况还不像样，这名指挥官就会被撤职送回去。

回到重庆又是"文件和郁闷"，还去蒋介石宅邸吃了饭："只是家常便饭，也没有繁文缛节，可是气氛，嗨！面对高高在上者谁也不敢说话或者发表意见……从他们僵硬的姿势和紧张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每个人都汗流浃背。"3月19日是史迪威的60岁生日，他"挨过了这可怕的一天"，没给家人写信。

无论何时何地，史迪威总是喜欢随手写下字条和备忘录，记录下寻求解决办法时不断思索的过程。"攻下一个港口让美军在华南登陆？跟华南中国军队连成一体。邀请红军加入……我在中国的使命结束了吗？"

"蒋介石是个瞎子……解决办法——重开这条道路？做什么用？如果

让蒋介石处理物资，这意味着为国民党囤积物资罢了。”

“蒋介石并不自由：各战区指挥官，政治影响，红军问题。不愿意（不能）重组。”

他对自己的处境也有评价：“无从操纵。”有些笔记是有关他读过的书的：华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mann）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拉铁摩尔的书，以及其他一系列有关中国的书。一篇5页的有关中国局势的论文，一篇关于“印度问题”的论文，还有一些笔记是有关东方，租借物资，苏联士兵，道家清净无为的教义，跟英国关系太近的危险，以及美苏成为战后大国的问题。

自3月起，日本人再次沿长江对华中的主要产粮地湖北、湖南发动进攻。其军事意图并不确定，但似乎是为了夺取宜昌；宜昌是通向重庆的天然屏障——三峡开始的地方。何应钦坚持认为此次行动是为了夺取重庆，并挫败盟军进攻缅甸的计划。他想把Y军调去防守重庆，而史迪威认为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因为日本人对云南出现的这支部队感到日益不安。4月19日，史迪威“跟委员长举行的会谈糟透了……讥讽和抱怨……讲到反攻以及‘士气低落’。看他（蒋介石）的举动好像是吓坏了”。后来何应钦还是从Y军中抽调出了两个军和7万人的后备队，这使得训练计划再次耽搁。更大的损失是调走了陈诚，蒋介石命令这个湖北的战区司令回到本省抵抗日军对湖北的进攻。

4月份，来了后来史迪威所说的“华盛顿的著名召唤”。蒋介石在“陈纳德的帮助下突然灵机一动”，这次召唤就是这灵机一动的直接后果。陈纳德得到独立后并没有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总统允许他可以优先得到物资，但是在具体实施上并没有做明确指示，结果他并没有优先得到供给。史迪威仍然控制着经驼峰空运的物资，因为他正在致力于让Y军准备参加各方已经同意的缅甸战役，他仍然把3/8的物资给空军，剩余的5/8则用于地面部队和其他用途。这包括给中国小型武器军工厂的物资以及成吨的纸币；由于中国缺乏造纸厂和原料，这些纸币在海外印好后空运进来，以满足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对纸币的巨大需求。

蒋介石被日本人的进攻吓坏了，认为第十四航空队必须发起一次大的攻势，因此他要求罗斯福把陈纳德召回华盛顿，这样总统就可以绕过史迪威直接跟他商量。罗斯福很乐意这么做，因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但马歇尔想让史迪威也回国跟总统解释情况。马歇尔立即警告说，一个盟国干涉美国的指挥体系可能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建议，可以同时召回史迪威来解决这个难题，这样他们两位将军就可以都参加5月

即将召开的跟丘吉尔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议。因此史迪威和陈纳德一道于4月23日离开中国，并于4月28日到达华盛顿。媒体对任何有关中国的事情都必然欣喜万分，而这也推及到了回来的乔大叔身上。在《纽约时报》的社论中他成了在重庆广受人爱的使者：“包括蒋委员长人人都喜欢他。”

跟专程到华盛顿来看他的妻子温妮团聚之后，史迪威首先拜访了马歇尔和史汀生。他们告诉他次日要去白宫，在那里他需要向总统解释为什么不该发动蒋介石和陈纳德所提出的大规模空战。陈纳德带回华盛顿的计划要求发动一次为时半年的战斗，夺回日本的制空权，同时对江河和沿海的船队展开轰炸，并逐渐扩展到中国南海，到年底轰炸日本本土。为了满足这次计划，他需要在5月和6月得到所有的空运物资，从7月到9月每月要4700吨，之后每月要7000多吨。

美国陆军部反对这个计划，认为不够成熟，因为除非有缅甸陆上攻势的配合，这个计划将会激起日本人摧毁中国境内的所有机场，此外还会进攻阿萨姆邦基地。当时蒋介石向罗斯福“个人担保”说，如果敌人要进攻空军基地，那么这种行动会“被现有的中国地面部队阻止”。

史迪威特意准备了一个备忘录，记下了要跟总统说的东西。除了重申了马歇尔给总统的信里所说的为什么要重新攻取缅甸并提供中国部队战斗力之外，他还着重讲了亚洲战场的巨大空间，并坚持要有“总战略计划”，这样可以将中国未来的战斗跟西南太平洋的战役连成一体。他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希望，那就是美国陆军会在中国参战。备忘录还解释了为什么不应该发动空中打击，并预计，如果日军像在浙江那样对空军基地发起一系列进攻，那么中国部队跟那时一样也不可能阻止他们。这就是他训练60个中国师计划的必要性，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需要开辟一条通过缅甸的陆上供给线。这些论点中肯有力，可是在真正说明的时候却被搞糟了。

次日，也就是4月30日在白宫的时候，史迪威无法把自己的论点有力地向罗斯福表达出来；相反，根据马歇尔的说法，他弯腰驼背，头低着“咕哝地说了些中国不抵抗之类的话”。罗斯福看他这种神态，借机说他是不是生病了，并问马歇尔一个病号是不是应该解职养病。马歇尔回答说，这个“病号”的体质比白宫里任何两个人加在一起都要好；然而马歇尔很不高兴，感到失望。史迪威后来说他意识到自己让马歇尔失望了。

当时妨碍史迪威的是这种感觉，那就是如果要为自己的计划辩解，

那么他就是在自我吹嘘。从史迪威的性格来说他不想这样。当时在《名人录》中有关他的介绍词条只有短短6行说明（而艾森豪威尔有15行，巴顿有33行，麦克阿瑟有55行）。对他来说，反攻缅甸和提高中国部队的战斗力都是触及他感情深处的东西，结果这让他缄口不言了，特别是在他看来，这两件事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跟克黛莉亚 [4] 一样，他不想说那些无须解释的东西。他对总统有些敌视，同时意识到总统对他也有些不友好，这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罗斯福显然倾向于满足蒋委员长的愿望，同时对蒋介石和陈纳德有些华而不实的看法，显然在想方设法试验一下空军，这些都让史迪威变得哑口无言。要敷衍他瞧不起的见解，他没那么世故也没有能力，而他又偏偏很容易瞧不起人。他本可以向罗斯福解释，蒋介石的“个人保证”不过是中国人的应景话罢了，但是他没有解释。他用笔表达得很好的东西却无法口头说明：建立一支有效的地面力量意义深远，这远比“缺乏基础的空战”对中国更有利——“没有根基的空战在我看来毫无价值”。

那天晚上他和温妮以及麦克劳埃（John Jay McCloy）夫妇应邀去陆军部长史汀生家里晚餐的时候，他很轻松地把情况向史汀生说明了。谈到上一次大战的时候，这三个人发现他们差不多同一时间都在朗格勒。为了竭力使史迪威的论点，也就是陆军部的意见得到接受，史汀生特意给罗斯福打电话说“我对史迪威钦佩之至”。他试图尽可能地打消总统对史迪威的顾虑，添油加醋地说上次大战“我和他在郎格勒是同学”，打完电话后又写了封信给罗斯福，回忆当时他为什么要选择史迪威去中国：“我们有意派他执行这场战争中最艰难的任务……过去几天里他已经让我相信，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唯一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的。”

这也无济于事，因为罗斯福在5月2日已经通知马歇尔，他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延空战计划。日本人沿着长江进攻，再次激起了此前屡次出现的对中国将要崩溃的担心，而蒋介石的确感到了恐慌，更加剧了担心。罗斯福跟霍普金斯及其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蒋介石已经岌岌可危，他的整个政府有可能崩溃。”他决心无条件地竭尽全力帮助蒋介石，因此尽管他完全信赖马歇尔，他决定否决自己军事顾问的意见。他告诉马歇尔说“他自己必须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他同意必须保证Y军的需要并会“就此与蒋介石交涉”，但是陈纳德必须得到优先考虑。他同意修改过的安纳吉姆计划，该计划只在缅北，不包括攻克仰光的目的，但这跟空战相比也只能居于次要地位。

马歇尔把总统的这项计划告诉了史迪威，对此史迪威的结论是，这

个决定是基于“对蒋介石的个性、意图、权威和能力的错误理解”之上的。他私下认为蒋夫人“完全蒙蔽了罗斯福”。蒋介石的政府是“孤家寡人的玩意儿。国民党只是他的工具。蒋夫人是他的门面。愚蠢的美国舆论是他的杠杆。我们都被他骗了”。

安纳吉姆计划的命运以及远东的未来战略仍然有待于在即将举行的代号为“三叉戟”（TRIDENT）的正式会议上确定。这是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战略会议，同时也是中缅印战区作战指挥官首次参加的会议。韦维尔、史迪威和陈纳德都是受人关注的焦点，不过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有关欧洲战区的。需要在英国人所倾向的地中海行动方案和美国人所建议的横跨英吉利海峡作战方案之间做出选择。作为谈判的筹码，美国时不时地威胁说要用“太平洋战”代替欧洲战役。在远东问题上，丘吉尔一如既往首先考虑的是政治目的，并坦率承认希望“绕过”缅甸，赞成采取行动最终夺取新加坡，因为“只有夺取新加坡才可以恢复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声望”。这并不是美国的目标。罗斯福和美国军方尽管在手段上看法不一，但都认为作战目标应当是能够使中国成为对日作战的基地。

英美两国在这个战略问题上出现了根本分歧：美国出于政治和战略上的双重需要，希望帮助中国；英国不想这样做。把中国设想为战后四大国之一对英国并无吸引力。他们并不想看到战争结束后由中国占据日本的强国地位。那样的话，英国的国旗就不会长久飘扬在香港的上空。他们也不像罗斯福那样认为中国没有侵略或者帝国主义野心。中国凭借西藏可以威胁印度和外蒙古，此外还有缅甸北部——尽管没有公开承认。正如为筹备三叉戟会议访问美国的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对罗斯福说的，自己“不喜欢看到中国人在太平洋跑来跑去的”。另外，艾登还预计中国在战后会发生革命，对此英国非常平静，因为这会使中国分裂和虚弱。

在三叉戟会议上面对美国提出的解除对中国的封锁问题，韦维尔及其参谋还是很悲观。他们不想把资源用于安纳吉姆计划和开辟通往中国的陆上线路，相反，他们跟罗斯福一道反对美国陆军部计划，倾向于投入更大的力量来支持驼峰航线和空运。以海军上将金为首的海军则跟马歇尔站在一起。根据金的一位助手说，如果金发起脾气的话，“他甚至敢跟罗斯福大干一场”。金强烈感到，如果有军需品和设备的话，中国人是可以用来抵抗日本人的，因此他倾向于重新夺取缅甸，并且用他的话说“不断努力通过海上到达中国”。由于持这种观点，他“对史迪威一直信任有加”。

罗斯福支持陈纳德的战略，这让马歇尔很恼火。在同总统打交道时他竭力公事公办，罗斯福开玩笑时他也不笑，在其他人笑的时候只有他板着脸坐着。他有意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们所同意的事情都是正式的陆军部意见，不是可以“挥挥烟嘴”就可以推翻的。实际上，马歇尔本来就是个一本正经的人，据说史迪威是唯一管他叫乔治的军官；而当他发怒的时候更是冷若冰霜。他在中国问题上的恼怒甚至殃及了霍普金斯，尽管在其他事情上他们两个都是相互尊重的。到了开三叉戟会议的时候，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很大，已经发展到见面不讲话的地步了。马歇尔后来说，他跟霍普金斯之间唯一一次严重的争执就是因为陈纳德而起的。马歇尔认为陈纳德不能独立担当指挥，因为正如他跟罗斯福说过的，虽然陈纳德“可能是个战术奇才”，但是他对后勤保障一窍不通，而且他“很多年来一直受雇于中国政府，因此受到蒋介石很深的影响”。他瞧不起陈纳德玩弄花招，并曾当着他的面说不信任他。战后马歇尔对军事史学家谈起陈纳德时，“就会对他拍案申述一番”。他非常讨厌艾尔索普，知道是他说服宋子文退出缅甸战役，因此马歇尔对他有些非常刻薄的话也就毫不奇怪了。由于总统的两个最重要的顾问——政治顾问霍普金斯和军事顾问马歇尔——之间在中国问题上分歧太大，根本无法对此讨论，结果总统也就只能自行决定了。



霍普金斯

史迪威在家里只待了短短的五天（“在卡梅尔待一个小时胜过在中国一年”），然后在5月14日回到华盛顿开始讨论安纳吉姆计划。长桌旁那些威风凛凛的英国军官们的调子就是“不行，不行，不行”。英国代表为首的是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这个皮肤很黑的矮个子不招人喜欢，他讨厌美国人，美国人也讨厌他。他正是那种可以刺激到史迪威的人。史迪威曾经津津有味地写自己“跟布鲁克打得难解难分，让金高兴得不得了”，不过两个人的顶撞只是在一些具体事情上，而非总体战略上。当会议转移至白宫，面对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时候，史迪威的辩才又不见了。马歇尔为此非常不快。史汀生听完史迪威的报告后泄气地写道：“史迪威噤若寒蝉，显然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史迪威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很难说出自己想说的东西。”

即使他像西塞罗那样雄辩也无济于事，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反对将主要力量投入安纳吉姆计划所指的缅甸战场。金上将坚持认为该计划是不可避免的。丘吉尔说他不想仅仅为了安抚中国人而干“傻”事。这时史迪威倒是站出来，说英国和美国都曾保证今年发动缅甸战役。有一次正式会谈之后的讨论中，对蒋介石个性饶有兴趣的总统问史迪威和陈纳德，蒋介石是怎样的人。史迪威的回答是：“他摇摆不定，是个诡计多端、说话不算数的靠不住的恶棍。”而陈纳德则赞扬说：“总统先生，我认为蒋委员长是当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他从来没有违背过对我的承诺。”

会议在争执中又进行了一周，此时中国人坐不住了。蒋夫人在会议期间仍然住在白宫，这让罗斯福颇为不快。她拜访了她够得着的职位最高的官员麦克劳埃，坚持要求美国方面完全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她说他毕竟是中国战区的总司令。现在刚回到华盛顿的宋子文在三叉戟会议上陈述中国的观点时也说了同样的看法。他还明确表示，除非攻下仰光，否则蒋介石不会参加缅甸战役，还说除非全力解救中国，否则中国只能跟日本单独媾和。罗斯福在会议上说，他认为这并非耸人听闻，并说盟国“不应陷入要为中国的崩溃负责任的地步”。

对于应当采取何种军事行动争论很激烈，最后，受到英国军方支持的罗斯福的意见占了上风；罗斯福赞成把主要力量用于加强驼峰运输。最后安纳吉姆计划被搁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这个计划仅仅停留在纸上，以后的每次会议都会被重新提及，又重新搁置。陆军部坚持认为仅靠驼峰航线不可能运送更多的物资，除非重新夺回密支那，这样可以缩短飞行距离，况且本来也必须要有通往中国的陆上运输线。这样一来，

夺取缅北的战役得以幸存，并专门有了个代号——“鲁莽汉”（SAUCY）。陆军部同意，为了准备这次战役，自7月起每月通过驼峰运送7000吨物资，并在9月份达到1万吨。总统曾经明确指示自7月1日起陈纳德将首先得到每月物资中的4700吨，而剩下的2000吨将用于“包括地面部队在内的所有其他用途”，其余300吨仍给空军。

所谓用于“所有其他用途”的2000吨，意味着在满足“其他用途”的需要后给Y军的实际上只有每月500吨。史迪威的结论是：“他们实际上让我无法准备Y军，可是同时还要将Y军用于缅甸北部的作战……”然而在三叉戟会议后以及任何其他时间，他都不曾要求过解职。尽管所有的方式都被拒绝，所有的论点都对他不利，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信仰，那就是他将成功收复缅甸。正如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所写的，史迪威的战区的要求是排在最后的；尽管除了艾森豪威尔和尼米兹（Chester William Nimitz）之外的任何指挥官都认为自己是最受冷落、待遇最差、最受蒙骗的，但是“最有权这么想的莫过于史迪威了”。他要对付印度指挥部的失败主义情绪和中国的消极抵抗；他自己的总司令以及自己所受命服务的司令要求将他撤回；他要求派遣美国部队和要求授予他权威以对提供的物资提出条件的主张均被拒绝，连自己的物资也被转给了空军。他常常把他到重庆的使命描述为“铲除粪堆”。然而，或者是出于责任感或者是为了证明什么，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从来没有流露出自己不想再去中国的意思。

他被人称为“中国的麦克阿瑟”，在华盛顿时经常受到媒体的采访和官员的咨询。他会晤的人包括赫尔、霍恩贝克、居里、战略情报局的多诺万（Donovan）上校，并在国会山跟参议员拉·佛莱特（La Follette）、康纳利（Connally）、道格拉斯（Douglas）等人进行了两场“非常满意”的会晤。他利用这个机会竭力让美国人知道中国问题的真相。经过戴维斯的安排，《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尤金·迈耶（Eugene Meyer）邀请他和6到8个有名的记者共同进餐；吃完饭后又来了20来个客人听他讲话。当面临想听他说话的听众时，史迪威总是很健谈；史迪威毫不客气地直率地说出了他所面对的局势，之后他又请戴维斯谈了政治方面的问题。从此之后，媒体对中国的理想化描述开始出现裂痕了。之后史迪威还数次将戴维斯派回美国，让媒体了解发展的情况。

在华盛顿时，另一个很想听他的意见的人就是丘吉尔。他曾邀请史迪威到英国大使馆谈话，按丘吉尔的话是为了“了解一下”。史迪威在三叉戟会议上曾经谈及的一点是韦维尔的失败主义和印度部队的消极情

绪，对此陆军部长史汀生曾坦率地提醒丘吉尔注意。史迪威在见丘吉尔之前，史汀生曾经指点他怎么才能“让自己的话有分量以及怎样才能不怕他”。会谈时，史迪威觉得丘吉尔是在认真听他说话，结果这次他说得很好，而且他的见地给丘吉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他惊讶的是，对于英国人在印度办事不力这一点丘吉尔完全同意，而且实际上已经决定替换韦维尔以及他的高级指挥官。这就是丘吉尔“仰慕并喜爱史迪威将军”的开始。

在中国，随着日本在4月和5月的进攻，政府开始出现恐慌。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抓起茶壶向带来坏消息的人砸去。史迪威从自己在中国的参谋那里得知，“宜昌情况危急”并命令赫恩“做最坏的打算”，同时还要比斯尔从印度派遣40架追击机帮助第十四航空队进行防御，此外还要他准备派遣中型轰炸机中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战报都是持续激战，据说日军数次“被中国的反攻击溃”并“损失惨重”，被“包围”以及“歼灭”。日军最终于6月在没有遭到追击的情况下撤出了这次显然是为征集粮草和控制河道运输所做的一次训练式的攻击。中国人把这个结局称作中国的重大胜利，美国记者也心甘情愿地同意了这种说法。

史迪威通过伦敦和开罗返回中国，中途停下来拜访了北非的相识指挥官，据他对记者说这是为了“研究他们的战术”。在经历了驼峰航线之后“穿越大西洋真是小菜一碟。你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在飞行”。在伦敦他拜访了一些高层人士（这是马歇尔为了增加他的威望指示安排的），高潮是为他举办的一次午宴，英国副首相艾德礼还致欢迎辞，史迪威也致了答谢辞。虽然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实在让一个乡巴佬受宠若惊”，但是也许他对过去一个月来的作为并非漠不关心的。他在伦敦逗留的两天的日记里有句意味深长的话：“看来早该让另一个我退休了。”

---

[1] 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德国著名的疗养胜地，位于巴伐利亚州。——译者注

[2] 埃尔索普原名Alsop，史迪威有意称他Alslop，slop有“脏东西、排泄物”之意。——译者注

[3] 军团勋章（Legion of Merit），这种勋章由乔治·华盛顿首先创立，在1942年重新设立。这种勋章的最高级专门授予国家元首或者高级军界人士，是美国可以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勋章。

[4] 克黛莉亚(Cordelia)，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李尔王的女儿。——译者注

第十五章

史迪威必须走

1943年6月—10月

要为整个中国以及中国的空军和地面部队提供供给，是这场战争，也许也是所有战争后勤保障方面的最大挑战。如果地形以及天气等自然障碍很大的话，那么，由于勉强共同作战方之间相互敌视和低落的士气所造成的人为困难也并不比这小，而夏季的季雨又加重了困苦。在这种情况下，要根据三叉戟会议的指示将驼峰的运输量增加到每月1万吨是很难的。

有一次，史迪威在视察之后忧心忡忡地写道："C-46问题很多。汽化器结冰了。我们在驼峰上失去了6架飞机，孩子们的士气越来越低。"机组人员都不服管教，往往有一个发动机停转就跳伞，或者天上有点云就拒绝起飞。飞行员相信"中国人"根本不是在打仗，而且黑市正在等待运给地面部队的货物，因此，尽管他们愿意冒任何危险为第十四航空队提供补给，他们却不愿意为了填满那些私人仓库而送命。对日本战机的防卫能力很弱，因为日本人把飞机藏在洞里并盖上泥草，这样，不但无法通过空中摄影，甚至也不能通过克钦侦察员发现掩藏飞机的地点。战略情报局所属部队在1943年共营救了125名机组人员，但是这只不过占被击落人员的三分之一，其余的或者死去，或者被俘。不过随着增援的到来，给航空运输队派去了一名新的指挥官，加之三叉戟会议之后，士气得到了鼓舞，C-46的缺陷不断被消除，士气和飞行条件也得以改善，这样运输量从5月的3000吨增至7月的5500吨，再到9月的8000吨，最后，雨季结束后，在11月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3万吨。

不过，取得这些成果是以牺牲公路建设为代价的，因为很多推土机、卡车、平路机、铲子和人员都被调去扩建阿萨姆邦机场了。在雨季提供给那些仍然留下筑路的人员的供给，也由于道路泥泞而受阻。车辆无法通过；大象和那加地区的挑夫又无法运送足够的食物、燃料和设备；塌方往往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让一天的工作付之东流；由于地面塌陷，有些推土机掉到河里；人、机器、帐篷和地面——所有这些都浸

透了水；吃的东西很不像样，疟疾长期流行。这时缅甸甚至出现了一种让人猝不及防的新型疾病：丛林斑疹伤寒。这种病会引起皮肤损伤、高热、内出血、错乱、昏迷并常常导致死亡。

在航空运输队扩大的同时，利多公路在5月到8月只延伸了3英里（约4.8千米 ）。在这个战区里，这条路跟史迪威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因为他坚持收复缅甸北部，而人们通常觉得他是在犯傻。英国人总是说这条路不可能修成，因为在缅甸从来没有横穿山脉的路；老天爷的安排是所有的公路都是顺着河谷南北向的。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也未必只能是这样。很少人认为这条公路能够弥补它消耗的资源、人力和经历的痛苦。据斯利姆将军说，只有史迪威认为公路“可以修成，而且相对于它所消耗的资源是值得的”，不过就斯利姆将军来说，他宁愿把修路的人力、物力用于发动一场全面的进攻，把自仰光以北的缅甸全部夺回来。这样，给中国的供给将会远远超过这条公路的运量。这一点是明确无疑的，而史迪威也比斯利姆更希望如此。斯利姆很清楚，唯一的困难在于他的上司从一开始就坚决拒绝发起这样的全面进攻。史迪威选择修建利多公路并不是因为他喜欢修路，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首先缅北战役的全部供给要靠这条公路，并且最终中国战区的供给也要靠这条公路。他也许可以跟汉尼拔说：“我需要找出一条路，或者修一条。”

到了8月份，各种困难已经表明，兼顾利多公路和驼峰航线可能会使两方面都难以为继，并无法为扩大中国的空战运送足够的燃料。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向中国每运送一吨货物就需要消耗一吨燃料，因此，在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的作战计划者认为，目前的局势需要铺设一条输油管道。这条管道从加尔各答到昆明有1800英里（约2896千米 ），中间要穿过大山和峡谷，要越过激流和河床，这条管道在很多地方架设在木头支架和没有用钢制成的悬桥上，是世界上在最恶劣的条件下架设的最长的输油管道，因此建设者把它命名为“梦想”也就不奇怪了。跟利多道路一样，输油管也必须跟在进攻部队的后面铺设，因此，除非进攻取得成功，否则输油管和公路都无法到达中国。

隐藏在中缅印战区所面临的各种现实困难深处的，是缺少共同的作战和能够激起热情的目标。对于在中国的普通美国人来说，买不到他们经常喝的啤酒和陆军消费合作供应社供应的物资（空中运输队的飞机已经腾不出地方来运输这些东西），周围的肮脏和污垢让他们患上腹泻和各种肠道病并被虫子叮咬，这让他们厌恶；他们无法适应中国生活的极端困苦，也无法理解长期物质匮乏造成的贪污盛行。所有这些并不能像

那些浪漫主义者所以为的让他们通过接触而意识到四海皆兄弟的道理。与此相反，他们开始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贪心、效率低下、靠不住、该死、爱偷东西、不可救药，都是些磨磨蹭蹭的家伙。在供应站附近，这种敌视基本上又普遍出现了。而普通中国人觉得美国人都是些冥顽不化的败家子，粗俗野蛮，瞧不起人，很容易学坏。据美国大使馆报告说，中国的“上流阶层”对于美国军人在放假时的胡作非为以及第十四航空队那种“粗俗”的态度和“吊儿郎当，不修边幅”的样子感到“震惊”。

租借物资提供了无数让他们相互反感的机会。从药品到半吨重的卡车，没有一件东西不会出现在昆明的黑市上。甚至第十四航空队也报告说，“中国人私藏汽油并把账记到我们的飞机上”。根据记录，一架飞机一天之内加了8次燃料，总计700加仑（约2649升　），可是它统共才飞了4个小时，这种作弊方式没有美国人的默许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中缅印战区的氛围里，美国人也很快学会了怎样分赃。走私物品包括黄金、磺胺类药物、外币、香烟、口香糖和陆军消费合作供应社的物资，走私涉及美国空军、陆军、红十字会和平民，到1944年底其总额估计达400万美元。美国陆军刑事调查局曾一度同时受理300个案件，其中最有名的是第十四航空队的“妓院事件”。其主要意图是从华南的魅力之都桂林和通过驼峰航线从印度运进女孩子，昆明同时也是个走私中心，事情披露后，史迪威只能正式对之采取行动。“军官嫖妓。用我们的飞机拉妓女。派人把陈纳德找来。他知道此事……汽油团伙有了更多消息。”此事引起战区总监的调查，由于涉及陈纳德，实际情况比已经知道的复杂得多，此事加重了战区总监对陈纳德的反感。陈纳德在中国的各种赚钱勾当是阿诺德将军不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修筑机场

后方的印度也令人恼火，其原因既在于英国帝国主义者，也在于懒散的“东方佬”——美国人这样叫印度人。美国人习惯于把印度的英国人跟英王乔治三世联系在一起，并把印度人在1942年的起义跟美国人在列克星敦、康科德、邦克山的反英斗争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最初对印度人的同情很快转化为不耐烦和蔑视。许许多多的印度人显然安于被奴

役。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有活力，喜欢笑和从容。美国人虽然继续抨击帝国主义，但对当地人的态度很快就跟英国人没有区别了。据说中缅印战区的缩写CBI是代表“印度那些昏头昏脑的杂种”（Confused Bastards in India），这样说并非没有原由。中缅印战区的美国人的袖子上都戴着一个盾牌形状的中缅印战区的徽章，上面是印度的星星和中国的太阳围绕着美国的星条。这是为了把美国人和英国人分开来，表明美国人到亚洲是作为盟友来打击日本人的，不是为了帮英国人收复帝国领土的。但是徽章的这三部分标志无法融为一体。喝彩声和晋升的机会转到了别的战区，中缅印战区确实是个让人不快的地方，存在着不满、丑闻、挫折和各种复杂的敌意，本身充满了不协调。

没有租借物资这个砝码的史迪威现在还得征得蒋介石同意，发动不包括进攻仰光的缅甸战役。也许是作为安慰或者是作为贿赂，史迪威还得到一个光荣任务，那就是根据罗斯福的提议，为蒋介石和何应钦颁发荣誉军团勋章；而史迪威认为何应钦要为中国军队的软弱无能负最大责任，并为了撤换何应钦而一直不遗余力。“这真使我恶心。”他在写给妻子温妮的信中说。［作为一种补偿，还给他的朋友商震、红十字会的罗伯特·利姆（Robert K. S. Lim）医生，以及普遍受到尊敬的军械局局长俞大维也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

史迪威的反感并非只是个人的。他觉得，美国使自己处于“不得不支持这个腐朽政权的地位”是彻底错误的；这个政权跟美国在德国正在与之作战的那个政权惊人地相似——正如史迪威所认为的，“两个政权都是一党制，由盖世太保所支撑（在中国是戴笠的特务组织），而且其领袖都是受到很少教育的神经质”。他常常试图使自己理解这种情况。他记录了跟自己的朋友和顾问蒋梦麟的一次长谈。蒋梦麟是中国学界的领袖人物，他提醒史迪威说欧洲的政治教育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而中国只有五十年，而且这是引进的文化，不是本土的。他说，尽管蒋介石所受教育不多，“但是眼下也没有很好的人选”。这并不奇怪。史迪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历表明，国民党之所以统治得那么糟糕，是因为在中国还没有形成有别于家庭责任的公民职责观念，而曾经行使民政职责的满清官僚体系已被摧毁。

但是史迪威个人所经受的挫折是最大的。罗斯福支持陈纳德显然减少了他的影响力，并促使蒋介石可以更坚决地不积极出击或者改革。“我被轻视、阻挠、敷衍应付、欺骗……”史迪威失去了耐心。

三周来，他一直在等待蒋介石的回复，这时他发现，何应钦身为国

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却对三叉戟会议的决议毫不知情——没有人告诉过他。更让史迪威恼怒的是，何应钦正试图把Y军的军火调往湖北。尽管承诺最晚在3月1日指派好Y军的各个师，但是事情仍然一拖再拖。除非这些部队已经到位，否则陈诚拒绝到任。在未到达的部队中，原来曾保证“绝对”在5月20日前补足的各师，到了6月仍然没有到；到了7月才来了区区1200人。蓝姆伽训练营的补充兵力也面临同样问题。原来答应3月份运送4500人，但是到了7月还一个也没有到。重炮班原来答应给200人，可是经中国医生体检后只剩下65人，美国医生又淘汰了30多人，到达蓝姆伽的只有35人。后来，由于面临开战的压力，12—14岁的孩子也被送来充数。由于为卡车发生争执，史迪威跟何应钦进行了会晤，之后史迪威几乎要放弃自己不断坚持的东西了：“会谈后我再次陷入低谷。看来根本没法做任何事。”

他认为，何应钦不断抵制派兵去蓝姆伽受训，是因为那里的训练方法跟他本人的管理方式形成鲜明对照，从而让他丢脸。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蓝姆伽营地直接给士兵发军饷并且提高了伙食和医疗标准，蓝姆伽其实起到了颠覆性的影响。就Y军来说，史迪威觉得中国人想方设法不想准备作战。“这就是事情的关键——他们不想作战。”这的确是个关键。中国人不喜欢通过决定性战斗解决问题。事例之一就是1937年淞沪抗战，他们之所以奋起抗战，那不是出于军事意图，而是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中国人在Y军问题上对史迪威做出了种种承诺并非真想信守这些承诺，而是为了获得物资。中国人答应某事往往是为了应付别人，并不是真打算做。史迪威对此是知道的，但是他仍然相信自己得到的承诺——对没有信守的承诺他很恼火地记录下来——因为他内心仍然觉得承诺就必须信守。

也有一些中国人希望改革军队。在昆明训练学校的很多军官都勤奋好学。被任命为昆明军校训练处主任的白崇禧很乐意地成为视察学校的第一个来自首都的高级军官，蒋介石或者军政部的其他官员都没有来过。白崇禧察看了每一门课程的教学情况，要求看看做战条例，他给军官们训话时讲起了美国的训练方法，并准备在广西省府桂林开设学校，训练第二批的30个中国师。他的热情并非没有私心，因为这可以加强他率领的桂系部队的实力。蒋介石所担心的正是这种情况。史迪威总是乐意接受鼓励，白崇禧的支持成了“重大胜利”，而白“也许是中国最好的人”。

然而他迫切希望得到“真正授权”，将60个中国师加强训练为有战斗

能力的中国部队；否则的话，租借物资就无法用于原先的意图上，即武装中国人以打击日本人。此时他得出结论，仅凭他作为蒋介石参谋长的身份，如果没有对中国部队的具体指挥权，那么他仍然无法达到他的目的，也无法完成他原先的使命。他给自己设想了一个“作战总参谋长”的职位，他相信，如果美国以租借物资相要挟的话，自己是可以得到这个职位的。这个计划首先出现在他1943年6月的笔记中，一年后，基于这个想法的提议决定了他的命运。按照史迪威的设想，美国要求蒋介石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同时命令军政部要执行他的各项决定。如果蒋介石拒绝，美国应当“停止给中国的一切援助……他（蒋介石　　）不可能拒绝。如果他们不管他，那就是要他的命。这里5亿美元还是有分量的”。

他在此时给马歇尔的电文中建议将此计划付诸实施。这些电文中对于美国没有用租借物资提出要求感到不满：“我们的政策是错误的。我们对东方政治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总统拒绝在援助时增加附加条件，史迪威认为总统要为无法改革中国部队负责。因为史迪威增加附加条件的要求未能满足，他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附加条件的效力。不过很显然，哪怕蒋介石接到最后通牒的话，他也会找到某种办法避免对部队展开他所害怕的改革。内心里史迪威也知道租借物资并非魔杖，无法根本改变中国的制度：在他随意写的一篇有关中国政府各种渎职行为的文章中他写道：“要改革这个体制，就必须打碎它。”

马歇尔屡次来电就给蒋介石授勋章的事催促史迪威。根据史迪威的记载，马歇尔说：“你他妈的要配合。罗斯福想要明确的日期！”史迪威提出的反对意见很天真，他认为蒋介石不配授予这种勋章。蒋介石似乎也不想从史迪威手中接受勋章，因此他提议通过一个使者把勋章给他，而史迪威觉得信使授勋是对美国能够给予一个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的侮辱。在这种气氛里，授勋仪式在7月7日进行，为此还拍摄了影片使之流传千古。两位主角都面无表情。史迪威用汉语为他的“高尚而激奋人心的贡献”向这位“自由捍卫者”致嘉奖辞，然后手伸得远远地把勋章别上。蒋介石眼睛看着远处，蒋夫人很友好地看着这一切，她穿着无袖的印花上衣本来很精神，可是她任何时候都要穿着那双打着蝴蝶结的凉鞋。“花生米迟到了半个钟头……不管在哪里，靠近他的人都变得非常拘谨……我抓住他的大衣别上，而他吓了一跳，好像我要刺杀他似的。”

在五天后的7月12日，蒋介石同意参加缅甸战役，这次是签名的书面同意。跟往常一样，史迪威用笔记下了为了达到这个结果而遭遇的各种阻挠、欺骗和“各种别扭”。“天哪，我都快撑不住了。”他已经不想回

忆英美两国在缅甸战役上有过多少次周旋。他立即赶赴印度，在那里用了六个星期准备战役。他对重庆已经腻味透了，迫不及待地想率领蓝姆伽的部队参战。据说陈诚由于患溃疡没能回来，但不能肯定这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不愿意或是因为中国政治的内在矛盾，还很难说。尽管Y军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史迪威觉得他已经无能为力了。训练计划可以在多恩统率下继续下去，但是要继续派遣师团和后备队来，史迪威觉得自己的手段已经全部用完了。

到了1943年的仲夏，史迪威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不想要他这个美国人来增加中国部队的战斗力。史迪威现在意识到，蒋介石之所以对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有不可思议的抵触，原因在于他害怕“让一个可能的对手统率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效部队是危险的”。史迪威在7月23日给马歇尔的信中承认了这个原因，后来他还在笔记中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过去他经受的各种令他困惑的阻挠，他认为都是因为蒋介石“担心会对他的权威带来威胁，同时也因为他相信空中力量是决定性的，没有必要在地面部队上花费时间。否则的话，他不可能面对自己的部队处于这种糟糕的境况下的危险中还处之泰然”。另外可能还有一种解释，即“他真的以为自己的部队非常优秀，只要有武器就能战无不克。很难想像还有比他更笨的军人……”。实际上蒋介石与其说笨，倒不如说他不了解情况，因为他只喜欢听好的消息，不愿听坏消息。正如蒋梦麟说的：“他并不知道真实情况。他下达的书面命令数以千计，像雪片一样乱飞，所有的人都说‘是，是’，而他根本不知道命令到底执行没有。”他仿佛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英国海军的轰炸下既不谈判也不投降，因此广州人在当地的一首歌谣中唱道：“他不打，他不和，他不守。他不死，他不降，他不逃。”

这时，为了消除战区内的不满和分割状态，中缅印战区的指挥权做了大调整，划成了几个部分。整个夏季在三叉戟会议到下一次的魁北克会议期间，英美两国对让中国继续参战的重要性认识不同，这妨碍了中缅印战区的战略计划的制订。韦维尔升任总督，他的驻印总司令职位被原英军驻北非第八军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所取代，但是奥金莱克及其参谋们对印度的情况像韦维尔一样悲观。根本原因在于英国人已经不相信印度军队有为帝国而战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想在缅北的荒野中冒险发动大的攻势，目的仅仅是为了协助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在战争中“基本上无用”，也不想支持其未来的稳定。在伦敦的参谋讨论会议上，美国作战计划官员争辩说，如果不能通过缅甸开辟到中国的供给线，就可能造成中国的崩溃，中国一旦崩溃，盟军就会失去进攻的

基地。约翰·怀南特（John Winant）大使对戴维斯说“首相很乐意看到中国崩溃”。丘吉尔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看法，一直认为日本可以通过外围击溃，这样中国可以排除在战略考虑之外。



史迪威为蒋介石佩戴美国最高荣誉军团勋章

罗斯福则一如既往地想让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秩序中的第四块基石，并为了推进这种想法在6月提议这年晚些时候他与蒋介石会晤一次。他对于“我们在中国的整体表现”非常不满。蒋介石和陈纳德仍然抱怨对他们的许诺没有兑现，而总统把这归咎于个性问题。在7月15日跟霍普金斯、李海、马歇尔以及萨默维尔等人举行的会议上，总统指出“史迪威显然憎恶中国人”，说史迪威的电报充满了嘲讽，而中国方面和蒋介石无疑都知道史迪威的这种感觉，并说“显然委员长不喜欢史迪威”。马歇尔承认史迪威不够慎重，但是他把史迪威对中国官场的感觉跟“他对中国人民的尊重”相区别，并继续认为史迪威是不可缺少的。

丘吉尔提议在现有的印度战区外另外建立一个东南亚战区（Southeast Asia Command），这似乎带来了一点解决问题的希望。因为美国的原则是不为恢复英帝国领土作战，所以在这个地区没有驻军，

也没有派兵的打算，因此东南亚战区的指挥官只能是由英国人担任。在魁北克会议上，最终同意由英俊、潇洒、迷人的中将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伯爵担任东南亚盟军指挥官。43岁的蒙巴顿是国王的表弟，具有永久上尉军衔，曾作为联合作战总指挥对法国迪埃普发动过一次不成功的袭击。

史迪威被任命为东南亚盟军副指挥官，同时保留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和蒋介石的总参谋长的职位。因此他同时对三个指挥部负责：通过蒙巴顿向英美联军总参谋部负责，通过马歇尔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另外还向蒋介石负责。此外，他还担任蓝姆伽部队的作战指挥，这支部队出于其军事意图的考虑被命名为北部战区部队（Northern Combat Area Command），这使得一切更加混乱。这些战区在地理上、作战指挥上和国籍上相互交叉重叠，错综复杂，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人能把它理出个头绪来。蒙巴顿甚至马歇尔都有些搞糊涂了，丘吉尔承认自己无法理解。史迪威这个主要受害者看重的是实际任务，而非名义上的指挥结构图，他这样轻描淡写地谈到自己的命运："一个中国难题，由韦维尔、奥克（Auk）、蒙巴顿、花生米、亚历山大（空军运输队指挥）以及我相互交叉，难辨你我。"

正如戴维斯为史迪威所分析的，英国建立东南亚战区的用意是想夺回它在东南亚的属地，如果英国想完全恢复其第一流大国的地位，它就别无选择。美国出现在印度和缅甸让他们不舒服，但是因为他们必须接受这种局面，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先组成联盟再主导之……以便使我们跟他们的政策和行动保持一致"。戴维斯认为这就是蒙巴顿的任务，蒙巴顿也许有丘吉尔的密令，让他"限制自己的好战热忱"。

戴维斯接着指出，英国无论怎样参与美国援助中国的行动，都是违背英国自身利益的，而美国人也知道，无论美国怎样帮助英国恢复其殖民统治和建立白人至上的行动，都是对美国的政策和感情以及未来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不利的。一个国务院官员在看过这个报告后在边上写道："我极为高兴，我们军队中有人可以写出这样的报告。可是前景是多么让人气馁啊！"

在魁北克会议上，计划人员决定把中国作为将来对日本发动远程轰炸的基地。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投下了阴影：那就是决定通过中太平洋攻进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这些岛屿距离日本本土还有2500英里（约4023千米），同时从太平洋基地发动远程轰炸的可行性在空军的眼里还很渺茫。再往前的是距离日本1450英里（约2333千米）的马里亚纳

群岛的塞班岛，但这里距离日本还是很远，而且对设计活动半径为1500英里（约2414千米　）的B-29轰炸机的性能也还不是很了解。在魁北克会议上，美国人坚持认为中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并未能说服英国。过去争论的事情又争了一遍。除了有关缅北战役外，此次会议并未制定跟这个新设的指挥部相配的战略。计划击败日本的日期是四年后的1947年，或者最乐观的估计是在1944年击败德国一年后。

跟三叉戟会议相比，有关中缅印战区的这次会议只多了一项内容，那就是史迪威一直期盼的，派遣美国战斗部队，不过这只是一支准备派到缅北的3000人的突击队，代号为格拉哈德（GALAHAD）。其样板是当时并不很成功的温格特（Orde　Wingate）的突击队。温格特是个出色的发动非常规战的天才，丘吉尔特意把他带到了魁北克。奥德·温格特准将在阿比西尼亚和巴勒斯坦服役时富于创新，曾经提出了远途穿插（Long Range Penatration，缩写为LRP）战术——这种战术的基础是在敌占区建立分散的小而稳固的据点，突击队员从这些据点在敌后扩散并切断其交通线。他的计划跟陈纳德那种小代价击毁敌人的方式同样有吸引力。原先准备在春季发动的战役取消之后，温格特的队伍已经经过训练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因此还是获准去缅甸作战；这并没有什么战略目标，也许只是为了显示英军并非按兵不动。此次行动被生动地报道，但是其战果则没有见诸报端。在3000人中有800人死亡或者失踪，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战术是有效的，并计划在下次战役中再次采用这种战术配合。

马歇尔对远途穿插很感兴趣，觉得这种战术可能缩短战役时间，因此同意为之增加一支美国部队。他希望减少美国在亚洲的作战并尽快结束战斗。他认为长期战争会对社会体制带来危险。由于温格特突击队的伤员结局都不好，都成了日军的俘虏，马歇尔和阿诺德设想完全由空中为远途穿插提供供给、撤出和增援。尽管加拉哈德小分队在史迪威的统辖之下，但是马歇尔同意由温格特直接指挥。

史迪威的反应可想而知。“好不容易弄来一批美国兵，可是上帝啊，我们却被告诉说他们由温格特统率！我们不懂怎么摆布他们，可是那个爱出风头的家伙懂！他仅仅到卡塔逛了一圈，把我们的人已经破坏的铁路又破坏了一遍，在伊洛瓦底江东面被包围，逃回来时损失了40%。除此之外，什么事也没干成。现在他倒成了专家。这样的事就是耶稣遇到也要泄气的。”马歇尔安慰他，提醒他：“如果我们还要一起打仗，就都得受些委屈。主要考虑到这对日本人的影响。”之前马歇尔还给史迪威写

信敦促他跟英国人好好合作；作战处处长汉迪（Thomas T. Handy）将军在一份备忘录里建议说，英军奏《哈里路亚》时，史迪威无须一同参加合唱，但是他至少应当站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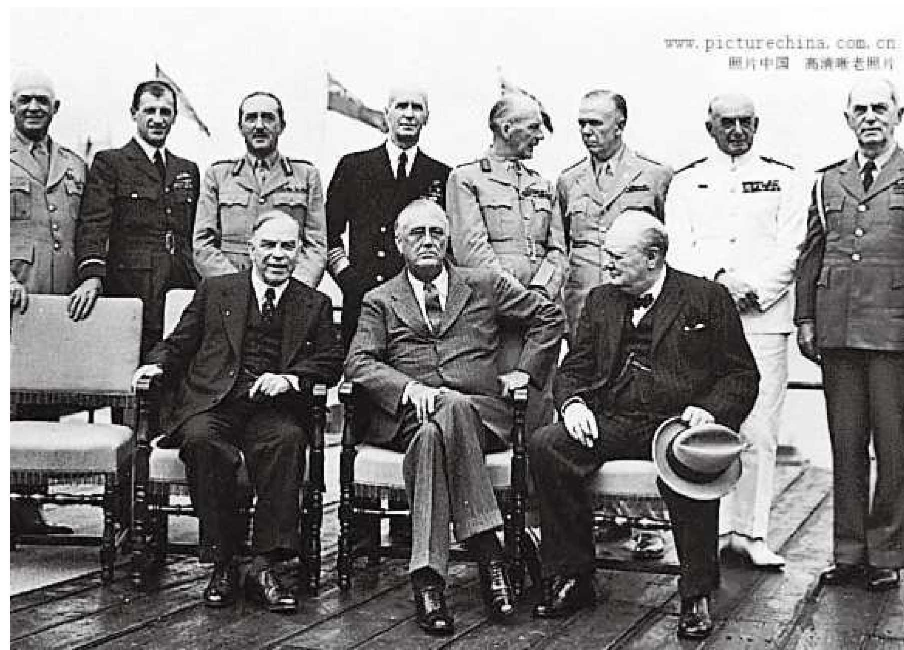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种种别人的不满：陈纳德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高，对此史迪威在日记中嘲讽地提到过："他喊着要提供帮助。'日本人会把我们赶出中国的！'真是可笑。半年前他还准备把日本人赶出去。"陈纳德请求第十航空队增援，因为他对日本商船发动的攻击引起了日本人对其空军基地的猛烈进攻。因为陈纳德一直宣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他的战士把日机从空中赶走，史迪威则不想把这些本来用于保护驼峰航线的飞机调去保护他。

在魁北克会议的休息室里，无处不在的宋子文戴着黑帽子和黑边眼镜，拿着手杖，竭力想知道会议做出了什么有关中国的决议。这时美国人已经破译了日本人的密码，他们发现日本人也已经破译了中国人的密码。本来中国的安全体系就有漏洞，现在更加糟糕，这时让中国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显然是鲁莽的。英国人坚决反对向宋子文通报会议决定，但是又没有办法把原因告诉他，因为如果日本人知道了不能向宋通报的原因，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密码也已经被破译。从来都态度强硬的马歇尔决定亲自出马。马歇尔叫来宋子文，让他举手发誓保密，然后告诉了他魁北克会议所达成的决议以及中国的密码已经被破译的消息，最后告诉他，如果他违反誓言通过电报发出这个消息的话，陆军部就会知道此事，那样的话他就完蛋了。宋子文只能回重庆口头汇报此事。

在召开魁北克会议的同时，美国报刊上对中国军队的无能及其后果开始第一次有了真实的报道：如果美国人民指望中国人在最终击败日本人的过程中起主要或者决定性作用，那么这将是"灾难性的"。《纽约时报》的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只能通过他自己报纸以外的途径告诉公众（通过8月的《读者文摘》）说"对中国有太多的想入非非"——这是他文章的标题。他写道："传教士、战争救援行动、能干的大使和电影都欺骗了我们。"中国"按照我们的理解不是在赢得，而是在输掉战争"。它的最大贡献在于牵制了15到22个日本师，但是"依照我们的理解，它自己并没有真正的部队"，而且它的战报"几乎一文不值"。鲍德温利用陆军部的联系，叙述了中国军队在医疗、训练、设备和主张防御等方面的种种弊端，口吻与史迪威如出一辙，但是鲍德温却得出不同的结论。他写道，不管是通过驼峰航线还是公路，都不可能为在中国发动大战役提供足够的物资，而且，如果没有大规模两栖登陆，也不可

能夺回主要港口。鲍德温的结论值得注意，因为它反映了陆军部的新想法；他的结论就是必须在海上打败日本人，而在中国大陆只能在东北打败日军，因为在那里可以利用苏联军队。

史迪威只能对自己的使命有信心，他仍然认为中国的力量对抗击日本是不可或缺的。他自己拟订的远途击败日本的计划，包括首先对广东沿海发起陆上进攻，先头部队是3个美国师，他们在重新打开缅甸通道后从印度进入中国。配合这次行动的是麦克阿瑟率军由菲律宾和台湾对同一点发起进攻，由在中国的空军对敌人海上航线发起攻击。最后阶段是对上海发动陆上进攻，同时对日本本土发动远程轰炸。他认为，这个计划可以把魁北克会议上制定的时间表缩短一到两年。关键要由美国军队打头阵，此外，史迪威认为应该由美国人指挥中美联军。史迪威的参谋官常常敦促他像其他战区指挥官一样四处活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像麦克阿瑟和陈纳德一样利用媒体的力量，但是他拒绝了。“我不想再给乔治·马歇尔施加任何压力。他正在指挥着世界各地的战争。要让他来决定谁应该得到什么。”



魁北克会议

不过，在8月份有5个参议员在对盟国访问时来到中国，此时史迪威还是尽力使他们拨云见日了解真相。他不断对他们说，如果国民党政府

的真相被人所知的话，那么美国人民的幻想就会破灭，这时重庆就会因为担心失去美国援助而奋起战斗。他陪着这些参议员去昆明和重庆，并“尽力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为他们洗脑，但是蒋夫人又会施展魅力的，我不知道最后谁赢了”。他认为“他们了解的足以让他们心存疑虑”，并在离开时“他们的自信动摇了”。这些参议员回到美国后报告说，英国人正利用租借物资维护其帝国利益，但在国务院的劝阻下未能公开批评中国。当洛奇（Lodge）参议员在全国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大胆说出“有关中国的各种正面宣传”可以停止的时候，国务院的霍恩贝克将他的话归类为“贬低中国”。

华盛顿所流传的一些言谈的确是在贬低中国。通过勉强的合作，美国人发现了现实中国跟所宣扬的中国相去甚远。陆军部的战略计划部体现了这种新的意识，在制定击败日本的整体战略时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的作用。太平洋的局势正在发展，而为了利用中国的潜力所花费的努力可能得不偿失。为了使中国能够保持继续对日作战，在1943年仅中缅印战区的空军和服务人员就增长了5倍，达到9.55万人。尽管这与太平洋战区的70万人和欧洲战区的140万人相比还是很少的，但是这里毕竟是传统上反对派遣军队的地方——亚洲大陆。10月份作战处在一个题为“我亚洲战略方针重估”的报告里，提出了一种新的论点：给中国提供的援助只要能维持它不退出战争即可；要限制轰炸机进攻基地；只训练30个中国师；绕过缅甸，多余的服务部队调出中缅印战区并用到其他战区。这个激进的建议跟英国的立场相仿，最后并未采用，但是认为中国在战略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的话——可以没有的想法却产生了。

史迪威8月底从印度回到重庆时，他突然成了一种独特的斗争的对象，斗争历时两月，这些诡秘行动的动机却难以知道。起因跟他有关共产党的提议有关。史迪威同国民党北方第二十二军团军团长邓宝珊将军、戴维斯以及大使馆的谢伟思（John　Service）商讨跟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原八路军）合作的可能性之后，他提出了北方国共联合军事行动计划，目的是引开敌人，以阻止敌人重新沿长江进攻或者再度威胁长沙。他怀疑敌人正在准备采取这个行动，以干扰Y军的集结。作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史迪威建议采取主动，这会让日本人摸不着头脑，而不要让他们“来对我们发动这样一场佯攻从而使我们陷入被动”。他“完全根据军事考虑”制订了详尽的作战计划，为了增加说服力还敦促说，共产党如果愿意在蒋委员长指挥下对日抗战，这也是对他们的一次考验。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不会理睬这个提议的。”

史迪威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恩来或者其他共产党人，而且除了戴维斯之外，史迪威也不许他的参谋人员跟他们接触。当多恩提出建议同共产党接触的时候他说：“别让我听到你试图这样做，我们在这里是跟政府一道的。”半年前，周恩来曾再次邀请美国观察员去华北实地考察未来战争的具体情况，但是这个建议并未被考虑。

夏天时，重庆和延安重新开始和谈，蒋介石提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是他们放弃在北方建立的政府，并使他们的部队接受中央政府的控制。这遭到了拒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部分人当时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趁着现在跟共产党摊牌，因为苏联在对德作战，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有传言说蒋介石准备在9月份向共产党发起进攻。史迪威怀疑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参加缅甸战役。他听到报告说，国民党部队正在向北方调动，他要求马歇尔指示，如果发生内战，美国军队怎么办。他自己建议采取完全不介入的政策。大使馆也因为这种报告而震惊。美国在外交上开始施加压力要求和谈，开始走向一条漫长而痛苦的道路。危机暂时过去了。蒋介石在9月13日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声明中，否认准备对共产党动武，并重申这是需要用政治手段解决的政治问题。

在做出这项声明的当日，史迪威意外地接到蒋夫人的邀请，请他到她家里见她和她姐姐孔夫人。这次会晤是姐妹通过以后多次会晤从而同史迪威结成联盟的开始，有阴谋意味地令人困惑。艾拉和梅（宋霭龄和宋美龄）告诉史迪威说，她们对军队的战备情况之糟感到震惊，并希望试图改变中国的消极状态。她们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何应钦是主要障碍，甚至提出要换掉他。这可悲地证明了，蒋介石可以信任的范围多么有限或者其人才多么稀缺，因为姐妹俩提议取代何应钦的正是蒋夫人本人。她们敦促史迪威继续施加压力，同时答应为他的事帮助做蒋介石的工作。“我们订立了攻守同盟。”史迪威这样写道。尽管他不能肯定对方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不过不管这真实原因是什么，他相信他的新盟友的提议不是随便说说的。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这样打仗是不是很混账？”



谢伟思

这姐妹俩告诉史迪威说，现在正在展开一场换掉他的攻势（她们把这归咎于何应钦），反对他的理由是：他曾经叫俞飞鹏“那个土匪”；他在备忘录上的签名是“美国中将史迪威”而不是“委员长的总参谋长史迪威”；以及“我‘傲慢’并敌视中国人……并说过中国人没用，瞧不起他们”。这些指责的理由有些是真的，因此指责看上去像是真的。史迪威在日记里，无疑还在一些闲谈中，对俞飞鹏之流的称呼即使不是“流氓”，也是“土匪”。无疑有很多中国军事官僚都是他瞧不起的，尽管很多中国人也瞧不起这些人。正如高思报告所说的，他们这些人最有名的是“乱政和腐败”。史迪威的缺点在于他不够委婉。他受到委派前来完成的使命，以及他一直竭尽全力试图完成的使命，恰恰是帮助对象竭力抵制的。史迪威本来脾气就不好，再遭受这样的抵制，结果可想而知。

史迪威想象这姐妹俩这样做是因为宋子文。他认为，宋子文经马歇尔的指点可能告诉她们，“她们最好支持我并与我合作”。事实恰恰相反。艾拉和梅的做法跟她们兄弟的做法正相反；宋子文在华盛顿开始活动要求召回史迪威，为此跟他当初支持史迪威一样花了不少力气。他宣称，蒙巴顿的任命使得史迪威的职位没有必要了，因此他在9月15日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新的中缅印战区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史迪威的职位由一个中国人担任，负责航空运输队，同时统辖中国战区的所有部队，不管属于哪个国家。此外，宋子文再次要求让中国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需控制委员会。他的动机主要是想控制租借物资。只要他能够让美国援助供中国使用，他就会很有影响力。然而史迪威坚持要发动缅甸攻势，这消耗了物资，同时也削弱了宋子文的地位；因此史迪威必须走。

姐妹俩对宋子文的反攻反映了宋家内部的激烈斗争，其本质是为了争权夺利。宋子文最后的野心是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的领袖。他提出了明治天皇为日本所做出的选择——采用现代西方的技术并适应自己国家的需要——作为中国未来的明治天皇，他想建立自己的权力基地，赶走他的妹夫，清除异己势力并建立一个能够使自己国家现代化的政府。由于局势、众多问题以及对西方的失望，蒋介石越来越转向过去，开始欣赏儒家价值观和义和团的精神。不过，宫廷内的对立更多是有关地位而非意识形态的。宋霭龄和宋美龄为了自己丈夫的地位，同时也是为了她们自己的地位而应对他们兄弟的挑战——这跟以前朝代中杀死嗣子、毒死侄子的统治家族残酷的内部纷争并无二致。

由于史迪威具有控制租借物资的权力，这使他在一段时间里成了这种斗争的焦点——至于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史迪威走后宋子文将有更大的支配租借物资的权力；也许宋子文想帮助蒋介石除掉眼中钉，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影响力，并在权力的阶梯上更上一层，更接近自己的目标。这是宋美龄、宋霭龄姐妹俩想竭力阻止的。

宋子文在当时作为说客真是孜孜不倦，丝毫不难为情。他想方设法利用各种能够接近总统的渠道，这包括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阿基巴德·麦克莱士（Archibald MacLeish）以及无数其他人；这些人为他的口才所折服，于是把他的有关局势岌岌可危的信件转交给总统。宋子文跟他家人一样都喜欢享受皇室特权，曾在7月份要求白宫最优先考虑飞往英国并多带7个人和500磅（约453斤）的行李（对此的答复没有记录在案）。9月份，宋子文要求召回史迪威；美国总统本人也曾经多次这样要求过，这次他将此事推给马歇尔并附上一句话："亲爱的乔治，你愿意跟宋博士谈谈此事吗？罗斯福。"

这些屡次试图撤掉史迪威的活动，不管是来自白宫、重庆以及那些附和陈纳德的人，还是来自现在的宋子文，都让马歇尔恼火，因为他觉得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针对自己的。他选择史迪威担当这个工作，去从事一项未给予充分支持的使命，他觉得自己对此是要负责的；这浪费了他尊为美国最有才能的战地指挥官的才华。尽管他并不是令人感到亲切的人，但他喜欢史迪威，给史迪威写了一些对其来说很难得的私信，这些信里隐隐有种玩笑的口吻，这是他的其他信件所没有的。他告诉宋子文没有改变指挥体系的打算。宋子文并不气馁，而是准备回国通过另一种途径达到目的。宋子文跟同僚说，他曾经得到美国总统的允诺（很可能是从霍普金斯那里得到的保证），说如果蒋委员长正式提出要求的

话，那么史迪威就会被撤换。

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现在考虑，是不是真得考虑撤回史迪威并让他担任（正如史汀生后来在写给史迪威信中所说的）“某种不太为难的任务”。马歇尔想让他指挥美国陆军第四军，这是珍珠港事件时他曾经服役的部队。现在这支部队在阿拉斯加，其中史迪威自己待过的第七师将被指派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为了取代史迪威，马歇尔打算牺牲掉不可多得的萨默维尔，他当时正在去中国的路上，他是奉命去解决问题的。但是马歇尔的这个打算没有实行，也许因为中国的问题已经根深蒂固。阿萨姆邦的交通线还是拥塞得很厉害，因此航空运输队受到妨碍，同时陈纳德对敌人的打击也令人失望。罗斯福现在对陈纳德的兴趣转到在中国配置远程轰炸机上面去了，但是这个计划也跟这个战区的所有其他努力一样遇到各种拖延和障碍。“事事都不对。”美国总统曾经恼火地向马歇尔抱怨说。这种抱怨在中缅印战区是经常听到的。

每次中国同意加强中国师的人员配备，史迪威总是深受鼓舞。9月1日他写道：“胜利”；这天他接到了准备在桂林作为Z军训练的第二批部队的30个中国师的名单。他以为事情终于取得了进展，同时也受到宋霭龄和宋美龄的鼓励，因为她们好像真的想有所作为；结果他又一次给蒋介石呈交了一份包括八点意见的军队改革计划，对计划的签名是“委员长的联席总参谋长”。为了真正消除委员长的担心，他还表明，这两批各30个师的部队经过整编和训练后，将“保证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并将使中国“在战后有办法保证稳定”。他不指望对此能有答复，而事实上也没有回复。蒋夫人这时警告他说，他现在跟委员长之间有了麻烦，起因是史迪威有关共产党的建议，之后他离开了一周去视察他的部队，并去会晤刚刚抵达印度的蒙巴顿。



宋氏家族全家福



宋庆龄与史迪威

遵照马歇尔的指令，史迪威想尽力随和一些，而这跟蒙巴顿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以魅力著称的蒙巴顿的任务本来就是为了能让这个士气低落的战区重新振作起来。他令人振奋地把一只从废墟中飞起的凤凰作为

这个战区的标志，为了有个欢快的开局，他还随行带了一些英国皇家海军女服务队员，此外，还说服马歇尔派遣了50个美国陆军女兵队员——尽管史迪威是禁止妇女到这个战区的。蒙巴顿渴望成功，但是他在印度所遇到的悲观和惰性恐怕就是最达观的“坎戴德”也束手无策。他这个新战区的参谋官和作战军官对缅甸作战毫无信心，认为计划与Y军会合纯粹是史迪威的幻想。即将退役的陆军总司令欧文将军对蒙巴顿说，他接手的这个战区毫无希望，陆军和空军的士气极低，以至于要恢复战斗力必须休整两年。由于蒙巴顿的军衔不高，这个战区的陆、海、空三军指挥官［皮尔斯（Richard Peirse）空军中将、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和吉法德（George Giffard）陆军上将］都越级向伦敦汇报。史迪威觉得蒙巴顿是个“好人”，说他“精力充沛，想方设法取得进展”，而且是个“不拘礼节的人”。史迪威对后来成为蒙巴顿的美方总参谋长的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说：“这家伙不错。我觉得他行事公平，是想做事的人。”不过他最后还是谨慎地提醒了一下：“好好注意他，魏德迈，要盯住他。”

尽管史迪威在年龄和军衔上都比蒙巴顿高，但是史迪威对在其手下做事并无怨言。他从来都是这样的，这类事情从来不会让他烦心，可能在内心里他并无得到最高指挥权的雄心大志，甚至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也不配。史迪威经常通过一些小名堂贬低自己：比如经常不佩戴勋章或者表示军阶的徽章，在食堂里或者理发馆总是依次排队，他甚至不会利用职位获取正常的优待，他在缅甸前线的住处，在斯利姆将军看来“没有必要地过于原始”。一个朋友曾经偶尔听到他作为四星少将亲自打电话预订卧铺，他没有给出自己的姓名，并顺从地接受了一个上铺。他属于这样的人，虽然机敏过人、能力超群，但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对自己评价并不高，甚至比大多数其他人还要低。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显得脾气古怪的原因。不过史迪威在跟家人和自己信赖的人一起时，基本上还是乐观欢快的。

在蓝姆伽的部队准备再次进入缅甸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兆头。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要求史迪威撤换波特纳将军——波特纳是史迪威的副官，现任先遣队指挥，孙立人要求用一个中国人替换他。这引起了争吵。几个星期以来孙立人一直说波特纳低估了日军在胡康山谷的力量，命令中国巡逻队径直往前，其结果必将是灾难性的。虽然孙立人自己是中国指挥官中比较积极进取的，但是他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受到损失，进而相应地削弱他的地位；也有可能是蒋介石不想遭受损失，在孙立人后面指使他设法保存这个蓝姆伽最有价值的师，准备用于战后目

的。总之，蒋介石支持孙立人撤换波特纳的主张。后来事实证明，波特纳对这个山谷的日军力量的估计是有严重错误，但是史迪威认为，孙立人的举动只不过是中国人不愿意进攻的另一个证明而已。史迪威希望能有个会讲中国话的军官（波特纳就是这样的）来指挥，而且觉得不能放弃像波特纳这样的对他忠心耿耿的军官——这军官没有离开他去机会更多的欧洲战场。史迪威做出的决定在各方面均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拒绝撤换波特纳，理由是他的职责还包括指挥为这次进攻提供支持的美国部队，此外也没有堪当此任的中国人。孙立人和蒋介石只能作罢，但是这件事显然不能增进他们和史迪威之间的感情。

再次陷入重庆的各种阴谋诡计之中，让史迪威的情绪低落；他一想起四处奔波、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就感到厌恶。他在10月15日写给温妮的信中说："如果后面几个月事情仍然没有改善，我真想到其他地方去带一个师、一个团甚至是一个班，只要精神上的消耗不要那么大就行。"他真想跑到胡康山谷去作战。他向史汀生汇报说，中国方面答应使Y军做好准备的承诺都没有兑现，报告的结尾是真心实意的："我等待进攻都开始不耐烦了。要是能离开这里跟部队一道去参加实地战斗，这可真是个完美的终结。"

史迪威10月15日回到重庆，发觉自己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他到达才几个小时就吃惊地听说蒋委员长明确要求撤换他，理由是他已经"失去了部队的信任"。这个意思是由充当蒋介石翻译的宋子文向刚刚到达重庆参加会晤的萨默维尔传达的。宋子文告诉萨默维尔说，罗斯福已经同意撤换史迪威，而且宋子文在经过德里时还告诉蒙巴顿说，让史迪威担任盟军副指挥将会造成"灾难性的、不可挽回的影响"。宋子文一直与孙立人保持联系，孙立人事件无疑提供了一个借口。萨默维尔把蒋介石要求的事跟史迪威说了，在史迪威看来这已成定局："这就是20个月来挣扎的结果。"



史迪威与蒙巴顿

史迪威知道，蒋介石对自己产生敌对情绪是对史迪威促使他战斗和实行改革感到恼火。早些时候，史迪威在总结他所遭遇的挫折时曾经写道："我把实情告诉他了。我让他注意到了各种弊端。我就他部队的状况警告过他。我向他展示了怎样才能够改善这些情况。他无视这一切，对部队的可悲状况视而不见，这种状况是对蒋介石、军政部以及他的总参谋部的严厉的指责。"这正是史迪威的罪过所在。他不断提及政府的弊端，让蒋介石没了面子，特别是这些事是属于他自己负责的军事事务。史迪威的存在本身便成了一种"严厉的指责"。

宋霭龄和宋美龄姐妹俩立即开始反击。接着举行了一些紧急会议。

何应钦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人意料地开始为史迪威出谋划策。原因是何应钦的对手、处于军中前沿的陈诚成了宋子文的同盟者。因为陈诚也是史迪威看好的人，并一直是他认为可以取代何应钦的人选，宋子文的这种谋划真是让西方人摸不着头脑。

危机当日，蒙巴顿正好到达重庆，却发现他熟谙（尽管并不愉快）中国关系的副官正要被抽走。他初来这个战区，正需要有人协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感到了慌乱，于是径直去跟史迪威说："如果你还想保住职务，我可以为你争取。"史迪威对蒙巴顿这样做的原因很清楚。"他很恼火，因为必须再跟一个新的人共事。所以想让我再等等，帮助他应付住局面。"史迪威相信自己已经完了，并怀疑蒙巴顿是否有能力撤销这个决议；因此蒙巴顿到达时，他在门口向后退了一下，对蒙巴顿说："不要让人看到你跟我握手，这对你不好。"但是蒙巴顿信心十足，从容不迫。在去见蒋介石之前，他告诉萨默维尔说，如果撤换统率了中国部队近两年之久的史迪威的话，他将无法继续按计划调动中国部队。不管蒋介石怎样不情愿参加这次战役，自己的部队被正式拒绝参战还是很丢人的事。

现在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产生了效果。萨默维尔竭力劝说，宋美龄和宋霭龄也使用了各种方式，并提出了一些显然很有力的理由。到了晚上，他们告诉史迪威可以收回成命，条件是史迪威要去面见蒋介石并告诉他，自己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中国好，如果自己犯了错误，那也是误会所致，并非故意，并说现在愿意全面合作。他们很有说服力地辩解说，如果能够传达这个意思的话，那么史迪威的地位将比过去更加稳固，他正在"福星高照"。为了避免被撤职，尽管史迪威内心很恼怒，但他还是觉得只能忍住自己照做。他"把戏演了"，看到蒋介石也在"竭力和解"；显然，内部的权力斗争再加上蒙巴顿的干预已经使蒋介石左右为难。他们终于达成谅解，结果这次危机在爆发后24小时内就得到了解决。表面上看史迪威的地位加强了，但是也许蒋介石内心深处并不这么认为。史迪威写道，这次事件的结果无疑让"花生米很丢脸"。

蒋介石正式向萨默维尔提出召回史迪威的要求之后又不得不收回，这是整个奇怪事件中最为奇怪的地方。显然他听了宋子文的话，但宋子文未能考虑蒙巴顿的反应或者自己的姐妹们所能够调动的影响的力度。作为惩罚，宋子文奉命到祖坟守墓并在近一年时间里退出了官场。对于史迪威来说，这是一段"恶心的经历"，使他回想起来"感到不是味道"，同时对前景也"感到黯淡"。这件事让他不可能再对委员长有什么宽容的

想法（只是后来他才知道宋子文所扮演的角色），并使他想到了一条没有发出响声就发起攻击的响尾蛇。

蒙巴顿现在可以接着开展他同蒋委员长夫妇的官方关系了。他送给蒋夫人一个用钻石镶嵌出她姓名首字母的卡地亚化妆盒，在向蒋介石介绍时，说自己担任这样的高位年纪太轻，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可以“仰仗委员长的丰富经历得到帮助和建议”。他向罗斯福汇报说，这种方式“让蒋介石很受用”，后来他对蒋夫人也如法炮制，结果同样成功。他们也向他和他妻子回赠了雕刻精美的玉制中国印章，结果他离开时觉得自己交了两个好朋友，而“他们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现在还存在的“唯一困难”就是中国的交通线和空运问题，而且“只要我们能把供给安排妥当”，那么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罗斯福回答说，他“感到很兴奋，两年来，我首次对中国和缅甸战场上的人事问题有了信心，而这大部分是由于你个人的原因”。

蒙巴顿依靠一点儿圆滑、一个卡地亚化妆盒以及殷勤的为人——终于与重庆确立了和谐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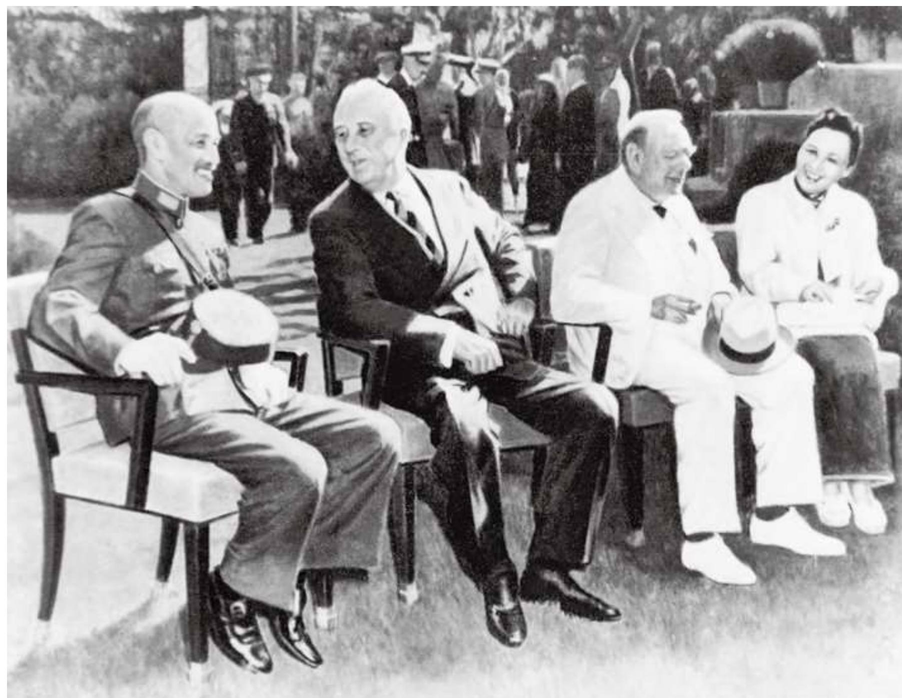
第十六章

中国在开罗的一刻

1943年11月—12月

有一段时间史迪威好像真的同重庆相处和睦。委员长开始变得出奇地和蔼可亲，在有关缅甸战役的会晤中也由衷地配合。萨默维尔带着一份令人振奋的报告回到华盛顿，蒙巴顿也非常满意地回到印度；史迪威觉得他们被中国人彬彬有礼的态度糊弄了：“他以为他们会事事照办。”中国军政部官员现在答应史迪威的要求时不但毫无保留，而且恭敬有加。宋美龄和宋霭龄答应会设法推行他所有的提议，此外还向他表示，可能让商震取代何应钦，这个可能性令人振奋。“宋美龄现在叫我乔大叔了”——在战区里人们一般都这样称呼他（而“酸醋乔”主要是媒体使用的）。宋家姐妹希望他能在即将在开罗举行的盟国会议上为中国说话，这是中国作为正式会员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她们希望他“能够向大国阐述中国的立场”。

这是关键所在。中国认为，开罗会议除了能够让他们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外，同时也是一个确立其地位的好机会；他们需要史迪威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在打败日本中的军事作用，从而可以对他们的要求表示支持。据宋霭龄说，蒋介石准备表现得“非常友好”，的确，史迪威在11月6日跟他会晤时他的确如此。这次会晤是“和解日！是爱的盛宴日！”，而且“这响尾蛇跟地狱一样和蔼可亲”。蒋在会晤一开始就答应，史迪威很久之前就向他提出的5万名补充兵源（但是需要史迪威提供运输所需的汽油），并同意给这批部队口粮，甚至答应给他们额外的配给。史迪威还需要什么吗？不需要了？“那好，我正式要求你在开罗替中国讲讲情况。”宋霭龄后来说，蒋介石感到“欢快”，跟史迪威的会晤“不仅满意而且欣喜”，认为“这是我们之间最让人满意的”会晤。



开罗会议，蒋介石夫妇与罗斯福、丘吉尔

这些欢喜的内在原因是，10月最后一周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上，正式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尽管苏联人竭力反对，但是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成了《四国宣言》的缔约国之一，该条约保证战后采取共同行动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终于承认蒋介石跟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都是平等的，而蒋出席开罗会议就是公开表明他的地位。蒋介石的善意也转到了史迪威身上，因为他需要史迪威为中国担起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介绍军事计划和供给的重任——这个任务是中国参谋所不能胜任的。

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于11月7日到达重庆；他对史迪威的命运起到了很大作用。他的任务是安排蒋介石跟其他国家元首的会晤，这是自7月以来就一直在商讨的。因为苏联并不是对日交战方，因此不可能有四国会晤。希望苏联参战是个关键问题，尽管并没有公开议论。赫尔利的使命之一就是确定中国对此事的态度。蒋介石表示愿意跟苏联合作，但是出于尊严方面的考虑，蒋要求罗斯福会晤斯大林之前先会晤他。因此最后的安排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跟蒋介石磋商之后再去跟斯大林会晤，地点就在离苏联边界不远的德黑兰。

赫尔利是个活泼风趣的俄克拉何马人，生于农场，学习法律起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外服役，并展示了善于操纵的才华，在胡佛当政时是陆军部长。他高大英俊，仪表堂堂，留着拱起的胡须。他自视甚高，以至于包瑞德上校在重庆迎接他时说了一句尽管不甚恭敬却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将军，我看你除了谢斯起义 [1] 战斗勋章以外，所有的战斗勋章都有了。”罗斯福选择赫尔利做他的外交特使可能有各种原因。总统的一项任命往往希望达到数个目标，而此时考虑到下一年的大选，赫尔利这个“温和的共和党人”可能会有用。在史迪威看来，他就似“一阵清风，像个真正的美国人”。赫尔利刚从德里来，他告诉史迪威说，蒙巴顿想弄掉你。因为蒙巴顿打的是帝国牌，不想冒险，想要的只是“某种能贴上胜利标签的东西”。赫尔利对史迪威的努力赞赏有加，说史迪威在美国被视为“中国的救星”。他满口甜言蜜语，说他“跟我（史迪威　）站在一起”。史迪威承认自己也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这种态度极为意外，也极为少有”。

史迪威这时对罗斯福总统很是不满，觉得他把机会都浪费了，而本来可以利用这些机会跟蒋介石讨价还价，以提高中国部队的战斗力。当总统向蒋介石通告，准备在中国部署远程B-29轰炸机计划时，史迪威说：“罗斯福又拆了我的台，结果我没法用这个做筹码了。”在11月9日的日记里，他甚至称呼总统为“橡胶腿”，这是对有残疾的总统的可怕嘲弄，不过这种叫法后来在日记里总共也就出现了一两次。

第三十八师的一些部队这时已经走完了利多公路，正在向位于胡康山谷边缘的新平洋挺进。史迪威这次行动没有被正式授权，参谋长联席会议未必一定会给予支持，也未必会承诺什么，因此史迪威这支重返缅甸的先遣队并不是很热切的。他试图以此对盟国发出明确的暗示。利多部队一旦开始攻打缅甸，就会受到众多支持，这时英军和中国军队就会出于羞愧而加入战斗。直接目的是占据一条可以空中补给的简易机场。之后通过空投物资，再加上车队和挑夫，先遣队就可以掩护继续往前修路，直到达塔隆河，这里是主要进攻开始的地方，计划在12月1日展开。整个计划包括三个阶段的进攻，通过胡康山谷经孟拱谷地到达密支那。配合进攻的英军，不过还不能肯定；他们将在英帕尔更南端穿过钦敦江攻打英都。进入胡康山谷的前期计划是基于错误的情报制订的；根据这个情报认为，在第一阶段行军途中除了小股的缅甸新兵外，不会遇到敌人阻拦。实际上，在这里的丛林作战的士兵都是在新加坡参战的老兵，他们为了进攻印度已经越过塔隆河建立了桥头堡。

在重庆，委员长原先承诺派遣5万名补充兵源，可是次日史迪威跟

何应钦会晤时变成了2.5万名经过训练的士兵，余下的是新兵。“谈着谈着，2.5万名又变成了2万名，之后由于逼迫他说明这包括哪些部队，什么时候可以到位，这2万名又变成了18个旅，其满编兵力是1.4万人。”史迪威曾寄予厚望、时称“能人”的陈诚现在跟宋子文一道失宠，肯定不可能再去指挥Y军了。取代他的是第一战区司令、人称“常胜将军”的卫立煌。史迪威在任驻华武官时留下的记录里，称卫立煌是中国最能干的战区级司令，性格积极进取，但是他现在有些疑虑了。要穿过萨尔温江进入缅甸，“Y军需要一个有冲劲的人，而我怀疑他是不是这样的人”。

在史迪威前往开罗的前一天晚上，多恩对这30个中国师能否发挥效力的估计很悲观。问题到处都是，关键是找不到或者根本没有可以打交道的负责任的代表。多恩意识到，无法把部队改造得比其政府更好，于是绝望中他开了个玩笑：“唯一的办法就是推倒整个中国政府，从头再来。”此外，考虑到中国政府老是想利用Y军，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由美国人对训练、指挥和调遣行使绝对控制权，而对重庆“除了让它了解情况”无须考虑其意见。这个结论跟史迪威试图让自己被任命为拥有绝对权威的“战地总参谋长”是一致的。多恩的这个建议是经他同那些“认真思考”的中国军官商讨之后提出来的；这些军官对事态的发展十分忧虑，认为除非在高层出现“决定性的改革”，否则很难对军队进行有效的改编。他们说除了重庆之外，蒋介石对别处的控制并不稳固；云南几乎是独立的，贵州在过去六个月里一直在反叛，四川也差点儿暴乱，政府军同地方军打了三天之后，最后政府同意免税之后事情才得以平息。他们认为中央政府“战后不到半年就会被推翻”。

11月13日，如履薄冰的统治者蒋介石接受了史迪威拟就的准备在开罗会议上做的报告。报告分成两个部分，表明了蒋介石想做的事情和他希望盟友做的事情。在第一部分里他表示将致力于把90个中国师训练成具有战斗力的部队，训练工作共分三批进行，每批30个师。第一批30个师准备在1944年1月1日前投入战斗，第二批30个师将在打通通向印度的利多公路后于1944年8月前装备好，而第三批30个师将在1945年1月前准备就绪。史迪威的报告还承诺说，中国“会按既定计划参加反攻缅甸”，从利多和云南发起联合出击。在打开缅甸后，“将发动攻势夺取广东——香港地区，并开通海上交通线”。报告列举的蒋介石的期望是，希望盟军借助海陆空力量为了在1944年初重新开通缅甸到中国的运输线而给予“最大的”努力；美国对90个师进行装备；为维持第十四航空队、中国空军和航空运输队，保证每月运送物资1万吨；未来将以中国为基地

配置远程轰炸机；最后是史迪威梦寐以求的，那就是夺取广东后，美军的10个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将进行登陆，前往华中和华北作战，由美国人负责指挥参加此次战役的中美联军。

这个计划表达了最乐观的情况。尽管史迪威已经了解中国部队在作战效率上，在现实、政治和观念方面的局限性，他怎样看重这个计划仍很难说。自然，他认为自己是这支中美联军的当然指挥官。尽管他对蒋介石的意图仍然充满不信任，但是他觉得自己现在的地位已经加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并非不可能。蒋介石接受了将来由美国人指挥的计划，史迪威记录此事时跟过去一样充满了信心："胜利！"

当他们分别赶往开罗的时候，他跟花生米的关系是"从未有过的和睦"。

开会的地点是开罗位于沙漠边缘、看得到金字塔的漂亮的总统宾馆。这是迄今最大规模的会议，"人们曾经听说过的英美军官都到了"，一个对此油然生畏的与会者说；此外，还有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以及伴随他们来的霍普金斯、安东尼·艾登、诸位大使以及文职参谋人员。史迪威的记录说"都争着上厕所"。有关亚洲战争的战略意图是决定将在中国花费多少，以使中国和太平洋一道成为进攻日本的跳板。蒋介石和史迪威表面上的和解让美国人又恢复了一种设想，那就是，一旦物资可以运达，就使用经过训练并指挥有方的中国军队。蒋介石显得很合作，这在马歇尔和他的参谋人员看来表明了蒋介石最后终于愿意加入对日作战了。

与此同时，也有些舆论倾向于在太平洋作战，他们认为中国的能力有限，要依靠他们是异想天开。中国作为配置B-29轰炸机的基地仍然至关重要，但是设想的中国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完全不抵为了试图调动这种人力所经历的痛苦。随着不断收复一些岛屿，同时航空母舰也在增加，这些都取代了中国大陆的优势，并可能使战斗在距离和时间上都缩短。据认为，太平洋战略还包括最终使用苏联空军基地并让苏联在中国东北发动地面攻势。

这次会议也有政治意图。罗斯福竭力要使这次会议在中国人看来是场胜利。他试图着手解决中苏关系问题和国共分歧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破坏战后秩序。他还在考虑未来殖民地的前途问题，而且如何分配日本所占领的领土也已经提到了议程上。尽管罗斯福强烈的反殖民地信念在丘吉尔那里遇到了阻力，但是他期望与蒋介石和斯大林会晤，并自信通过友好的个人关系能够把事情解决好。之前莫斯科《四国宣言》宣

称，战后几亿中国人将站在美国一面，罗斯福认为在莫斯科第二次外长会议基础上的开罗会议是个“伟大胜利”。

至于目前，他认为在中国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一个关键：“让中国继续参战以拖住日本兵力。”在德黑兰，他告诉斯大林说这是“我们的伟大目标”。长期以来由于一直担心中国会崩溃，掩盖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竭尽全力参战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如果中国最后作为盟国一员取得胜利的话，那么根据莫斯科会议上的提议，它将收复台湾以及其他日本占领地。

罗斯福现在对蒋介石也不像过去那样有信心了。他曾对萨姆纳·威尔斯说，在过去一年中他跟蒋介石经历了“无数困难”，这些困难似乎更接近史迪威而非陈纳德的说法，他认为蒋介石是“高度情绪化的”。他动情地谈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低效”，并说他“无法忍受当局对广大中国人民的深重痛苦无动于衷”。然而，不管委员长的军事见解多么“局限”，不管“他的部队打得多么糟糕”——这可是罗斯福第一次承认的——他仍是唯一可以使中国在战后保持统一的人。罗斯福对自己的儿子说：“尽管他们有很多缺陷，我们还是只能依靠蒋家。”

史迪威由约翰·戴维斯和梅里尔上校陪同，于11月20日到达开罗。那天在距离这里以东7000英里（约11265千米 ）的地方，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吉尔伯特群岛登陆，这最终使得没有必要依靠中国了。如果人能够透过时间的地平线看得更远的话，那么开罗的讨论就会更简短一些了；然而人既然没有这种能力，与会者只能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按计划开会。美国人都充满好奇想见到蒋介石。出于安全原因，他抵达机场的时间没有宣布，罗斯福或者丘吉尔也没有去接他，这让委员长的自尊心有些受挫。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是他看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东方人”，蒋跟他所了解的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不同。一直持不友好态度的艾伦·布鲁克则认为蒋长着一张像黄鼠狼的“精明狡诈的脸”，这位领袖“对战争大局毫无把握，只想到讨价还价”。让丘吉尔印象深刻的是蒋介石的“镇静、缄默和富于效率的个性”，但又对美国人过于关注中国问题感到恼火。罗斯福“不久跟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会晤”，并坚持要蒋介石参加首日会谈，结果这使得英国和美国无法在会议前磋商。最后，丘吉尔所认为的“冗长、复杂和琐细的”中国事务“在开罗会议上占了首要而非最后的地位”。

中国的目的是趁机得到军火和收复过去的领土，此外，还想得到日

本以东的小笠原群岛。盟国已经同意归还东北和台湾，并写入《开罗宣言》，现在只需征得斯大林同意就可以了。罗斯福与蒋介石夫妇的会谈还涉及一些微妙的问题，如大连以及其他前苏联占领地问题、香港以及与英国的关系问题，以及共产党问题等，但是没有留下相关会议记录。自9月差点儿与共产党发生冲突以来，美国顾问们就一直想化解中国的内战。有些人想当然地接受了这样的理论，那就是，暂时消除分歧就可以让不共戴天的对手达成和解，因此他们建议美国将来提供贷款要以中国国内的和解为条件。

有关军事方面的讨论持续了三天，结果，缅甸战役最后的前途比一开始更黯淡。所拟订的海军和两栖作战行动计划是蒋介石所坚持的，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分散日军力量，使之不会对陆地攻势做出强烈反应；这个计划要求必须夺取距离缅甸海岸线不远的安德曼群岛。这个行动的代号是“海盗”（BUCCANEER）。建议英国发动的陆地攻势要求在钦敦江建立桥头堡，并在英都通向密支那的铁路线上进行空降兵登陆，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具体目标。为了保证蒙巴顿认为这个战区所必需的胜利，计划配给大量部队和登陆船只。

史迪威对两种战役的评价都是“落空”。它们无法达成任何目标。参加两个行动的部队不曾向任何地方进发或取得任何成果，他们只是显示一下活动，满足蒋介石对海军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敌人。蒋介石只知道有这个行动，但并未被告知孟加拉湾行动的真正目的。除了没有目的之外，“海盗”行动计划的主要缺陷还在于，英国的将领们，尤其是丘吉尔，不想发动这场战役，原因同在欧洲第二战场的争论交织到了一起。丘吉尔也不想发动“霸王”（OVERLORD）计划，即跨英吉利海峡进攻；他希望外围通过地中海对柔软的欧洲下腹部发起进攻。他想把“海盗”计划中的登陆舰只用于对罗德岛发起进攻，目的是让土耳其参战。丘吉尔为了避免自己不喜欢的行动方案，总是能够随时提出另一个方案。马歇尔强烈不赞成罗德岛建议，因为“这会耗尽我们的物资”，并会分散力量，削弱美国所集中关注的“霸王”计划。美国将领们决心发动“海盗”行动，这可以兑现对蒋介石的承诺，从而使中国军队从云南进入缅甸，否则史迪威的战役将无法打开中国的后门。蒋介石赞同史迪威的计划，这让马歇尔和金上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为这表明了一种态度上的改变，绝不应该挫伤这种态度。



开罗会议，后排左一商震，左四史迪威、左五阿诺德，右二蒙巴顿

尽管马歇尔这样提议，但是中国的表现让他失望。蒋介石贪得无厌，反复无常，虽然蒋夫人竭力弥补；她认为官方译员未能“充分传达蒋介石想要表达的意思”，对他说的每句话以及别人同他说的每句话都重新翻译一遍。蒋介石坚持在发动缅甸战役的同时，不管其他方面的供给问题有多么严重，驼峰航线的运输仍然要保持在每月1万吨，并要求增加运输机数量来保证这一点。马歇尔认为派遣到驼峰航线的运输机已经妨碍了欧洲的战事，因此他怒气冲冲地对蒋介石说，这些都是美国的飞机、人员和物资，中国如果想得到更多的物资，只能通过战斗重新开通滇缅公路，并说不会再增加运输机数量：“对此不要再有任何误解。”

在11月23日的会议上，正当史迪威准备为中国做报告时，他接到蒋介石的话说不要他做了，并说蒋介石会亲自过来，接着又是好几次通知，一会儿是还是他做，一会儿是蒋介石做。同时，艾伦·布鲁克主持的英美有关缅甸战役的会谈变得气氛很紧张。“布鲁克发了脾气，金也勃然大怒。金几乎爬过桌子想冲向布鲁克。天哪，他气疯了。我真希望金能揍他一顿。”

下午，蒋介石和他的参谋们到了。“表现糟透了。他们什么问题也提不出。布鲁克语含侮辱。我帮他们解了围。”面对三国元首，英国人问中国有关缅甸部队的问题，他们却答不出，最后史迪威替他们回答了。蒋

夫人是众多穿军服的人中唯一的女性；她穿着印有黄色菊花的贴身黑色缎子旗袍，头发上用黑色纱系着结，脚穿露着脚趾的高跟鞋；她竭力表现得举止优雅，开叉旗袍的缝隙中露出修长的腿，竭力吸引别人的注意。具有典型英国人作风的布鲁克认为，对外国人都要给点颜色，如果不是白人，那么还要踩上一脚；他竭力要让中国人更难堪，因此他要求中国人谈谈对之前发给他们的作战计划的看法。根据他的说法，这之后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中国人“开始兴奋地交头接耳”，之后一名代表宣布：“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中国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环境和语言都是陌生的，再加上到处都是戴着绶带和军徽的军官，他们想在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

这次会议不愉快地结束了，这时布鲁克讥讽地对马歇尔说：“这纯粹是浪费时间。”之后他在记录此事时说：“由于马歇尔和美国的看法，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令人压抑的插曲。”

史迪威那天晚上整晚帮助中国人拟定了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同时因为蒋夫人和马歇尔有一个午餐会晤，他还要向蒋夫人介绍情况。他为她写了一些要点，供她在讨论派遣美国军队到中国的问题时使用。在参加下午的会议之前，蒋介石就参不参加会议又两度改变主意；最后他参加了会议，但是要求史迪威替他介绍他的看法。很自然他对东南亚战役的短期目标感到不满，因此对是否投入Y军摇摆不定，同时又坚持要求增加空运物资。

面对这个僵局，罗斯福派来了富于魅力的蒙巴顿向蒋介石解释现实情况，并得到他派军队穿过萨尔温江的承诺；史迪威写道：“一个令人高兴的进展；省得我费劲了。”通过蒋夫人的翻译，蒙巴顿竭尽全力让蒋介石相信，不可能再提供额外的飞机了。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坚持要535架运输机。他对蒙巴顿说：“总统对我是绝不会拒绝的。我要什么他都会给的。”最后蒙巴顿说，即使能够找到这么多的飞机，也无法既满足蒋介石对驼峰航线的要求，又满足雨季前对曼德勒发动空中打击。此时，蒋介石和他夫人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最后直到蒙巴顿皱起眉头表示疑问时，蒋夫人才说：“不管你信不信，他并不了解什么雨季。”

这有力证明了史迪威同蒋介石打交道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在东南亚，雨季是生活和战争中的关键因素。可蒋介石是中国的统治者，是中国人的统治者。中国没有雨季，所以他不懂雨季。

在11月25日，即感恩节的下午，史迪威陪同马歇尔去见罗斯福，以便解释为什么需要往中国派遣美国部队并由美国人担任指挥。他首先考

虑的是“作战总参谋”的职务，也正是这一点后来导致了危机。这个想法首先出现在他为这次会晤所准备的笔记中，题目是“问罗斯福”。他把作战总参谋的职责分成五个部分：兵力，执行权，美国部队，中美部队指挥权以及保留对X军的指挥权并增加一个军团。他在笔记中写道：“不管花生米会同意哪些事情，如果不改变中国的最高指挥权，那么将前功尽弃。”他计划告诉总统，必须有个新的国防部长来取代何应钦或对他的部门“进行彻底改组”，或者像多恩上一次所发出的呼吁那样，由“美国完全接管并控制第一批30个师”。史迪威在这行字下面加了着重号。

这一次他真正努力解释他所理解的当务之急。他觉得总统“不怎么在意”地听他说。罗斯福打断了史迪威的话，开始讲起安达曼群岛，至于史迪威要求派遣美国部队，他打算派一支海军陆战队去重庆，而这样做的原因据他说是“海军陆战队名气大。他们在中国到处都去过，去过北平、上海还有别的地方。陆军只去过天津”。这种莫名其妙的解释几乎跟蒋介石不了解雨季一样，也许说明了跟国家元首都会遇到某种特别的沟通问题。也许总统只是想婉转拒绝往中国派遣美国部队罢了。不过，尽管并没有给出具体日期，他还是同意装备90个中国师的计划，这与其说是想改革中国部队，倒不如说是想送给蒋介石一点儿礼物，让他不虚此行。史迪威认为这是在开罗所得到的“确定的”承诺之一。中国人尽管并没有提供过90个满编师，但多年来把这也看成承诺不断催促。

罗斯福对未来的确有些肯定的想法。史迪威记录了总统对战后印度支那的计划：三名委任官，分别是英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不再交给法国！”而就史迪威自己的提议而言，他在笔记上写道（下面划了着重线）：“注意，罗斯福不感兴趣。”

在跟罗斯福总统会面时，总统还说，蒋介石在同他私下会晤后现在接受了缅甸战役计划并同意派遣Y军。那天晚上9点，史迪威接到霍普金斯的电话，让他赶回住地；到那里后他听说两个小时以前蒋介石又收回成命。“上帝啊。他又发作了。”

次日上午，一群将军拜访了蒋介石，其中包括蒙巴顿、史迪威、阿诺德、萨默维尔、威勒、斯特拉梅耶（George Edward Stratemeyer，中缅印战区新任空军司令）以及陈纳德。“约翰·刘（John Liu）脸都吓青了，因为我们迟到了三分钟。商震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盯着门外。这些孩子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总是吓得六神无主。”蒋介石又开始大谈他要求空运每月1万吨物资的想法，但是经过来客们的说服，他又同意了参加缅甸战役——至少他们以为他同意了。次日动身回国前，他又改变

了主意，要史迪威留下来继续抗争，坚持要求对曼德勒进行空降袭击，并坚持要把物资运量增加到1万吨。与此同时，罗斯福、丘吉尔以及那些欧洲代表启程去德黑兰，而史迪威在这里等他们回来并做出最终决定。“我们怎么办？”他很是疑惑，觉得蒋委员会让执行者处境艰难。他还写道：“路易斯·蒙巴顿对花生米烦透了。谁会不烦？”

这种评价是公允的，也得到了蒙巴顿日记的证实。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这次会议是罗斯福、丘吉尔以及联席参谋们首次跟蒋介石打交道，而“他们都快被他搞疯了”。蒋介石完全有理由有同样的感觉，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想让他参加战役，但是这两国并未就这次战役达成明确的决议，甚至没有达成一致看法。蒋介石一直坚持，除非英国人参加两栖登陆，否则他就不会参加缅甸战役，而且过去的经历表明，中国人不大相信西方国家的承诺。他的疑虑是有道理的，因为丘吉尔认为，罗斯福总统不顾他的反对，答应了在孟加拉湾的两栖登陆作战，丘吉尔在他自己的会议记录中注明他并不认为这对他有约束力。

马歇尔在开罗跟史迪威私下交谈时告诉他，9月时他曾经打算让史迪威放弃中国去统辖第四军；他问史迪威可能会做出什么决定。史迪威没有记下他是怎么回答的，只是加了一句自己的评语：“只能由我来铲粪。”他受到了批评，因为他在指挥部里谈及蒋介石时用语刻薄，而他的参谋官马上就把这些说法传遍了中国。史迪威答应改过，不过正如马歇尔后来说的，两个星期后他又故态复萌了。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史迪威在埃及一股劲儿地观光游览了。他飞到耶路撒冷，并沿着尼罗河去了埃及古城底比斯的遗址，参观了拉穆塞斯王朝图坦卡蒙等法老的陵墓和卡尔纳克神庙，并记录下了自己看到的有趣的景象，对此他在日记中的记录要比对会议更加详细。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我对古迹很着迷，这里恰恰到处都是。我可以花几个月在这里晃悠……若不是这个愚蠢的会议，我很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看到这些东西的。”平心而论，这样看事情的轻重顺序倒不是没有道理的。



德黑兰会议三巨头

在德黑兰会议上有两项进展最后确立了开罗会议的结果。这就是斯大林坚持尽快发动“霸王”计划外加“铁砧”行动（在法国南部协同登陆）；他还重复了早些时候于10月在莫斯科曾经向哈里曼和赫尔所表述过的，那就是一旦打败德国，苏联就参加对日作战。尽管丘吉尔竭力想对罗德岛和土耳其进攻，但是最后还是得到美苏支持的“霸王”行动占了上风。这立即给了丘吉尔一个借口，取消“海盗”行动，并将其登陆舰艇用于对法国南部登陆。他坚决拒绝发动上述两场进攻，尤其是在他看来，既然苏联答应参加对日作战，那么就没有必要在中国发动大的战役了，甚至无须花力气支持中国了。发动“海盗”计划是一种浪费。他坚持说苏联参战的前景让一切都改变了。

这个承诺对罗斯福影响也很大。尽管这个承诺他在开罗会议之前就已经知道，但在首脑会议上经过斯大林亲自说一遍显然就很有分量了。考虑到跟中国人令人失望的会晤，这就出现了由苏联取代中国成为战时和战后伙伴的可能性。刚刚对蒋介石感到失望的罗斯福欣喜地发现，斯大林是他战后规划中一个更强的角色。他曾经对布立特大使说：“如果我把他想要的东西都给他而并不要求回报，那么他身处高位必然感到责任重大，也许不会到处兼并，而是会跟我协作建设一个民主和平的世

界。”他认为，只要在诸如“霸王”行动计划这样的问题上跟斯大林进行全面而愉快的合作，同时满足他想利用大连这样的不冻港之类的合理要求，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让苏联心甘情愿地加入到他所策划的联合国组织中。在这次历史会议的和睦氛围中，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斯大林是“可以接近的”，可以为了共同目标在战后合作。11月30日，在丘吉尔的生日晚宴上，当答谢祝酒时罗斯福说：“我们在德黑兰证明，我们民族的不同理想是可以和谐并存的。”在这种所谓的和谐中，中国的问题变得不那么紧急了。

不经意间，斯大林使得中国的地位更加降低。当罗斯福告诉斯大林有关缅甸战役以及Y军的作用时，斯大林说中国部队战斗力弱是由于“领导无方”。他对拟议中的有关归还中国领土并在未来让朝鲜独立的宣言并无异议，只是评论说，“应该让中国具有他们迄今未能展示的战斗力”。

12月1日，公开了由英国、中国和美国签署的《开罗宣言》，表明国际上正式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达到了罗斯福的政治目标，而这时他正在开始对此产生疑虑。这个宣言答应归还“所有被日本侵占的中国土地”，并承诺签字国会坚持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现在无论是在正式文件上还是在自身利益上都不可能跟日本单独媾和了，因此它要退出战争的威胁的分量也减少了。但是台上的演员对于感知他们自身所促使的变化往往有些迟钝，因此除了那些已经认识到中国的这个唯一的威胁手段的人以外，很多人对这种威胁手段已经没有效力了这一点并不明白。

罗斯福等人回到开罗后，“海盗”计划成了激烈争执的焦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反对放弃这个行动。他们不认为这会分散“霸王”行动，不认为“铁砧”计划需要用那里的登陆舰只，并坚持认为不满足这个条件，蒋介石就会撤走Y军，这会使缅甸战役失败。如果没有这场战役，马歇尔和金都担心日本会更加猛烈地对抗在太平洋上的进攻。李海上将还在担心“蒋介石可能会退出战争”。罗斯福认为自己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蒋介石离开开罗时尽管自己并没有承诺参战，但是他确认会发动两栖行动。丘吉尔仍然断然拒绝。他争辩说“海盗”行动的物资可以用到更好的地方。而对此蒙巴顿表示支持，他夸张地说“海盗”行动需要5万人。在向东南亚司令部问及各个选择方案时，回答是，如果没有驻缅军，则不可能打通通往中国的道路。争论持续了三天。据李海上将说，英国人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议上这样，对美国的建议表示“坚决反对”。

这时，一个不好的事件帮了英国人的忙。波特纳将军通过电报报告

说，胡康山谷的中国第三十八师的先头部队意外遇到日本的阻击后开始原地防御，无论怎么命令都拒绝前进。这份发给史迪威的电报却错误地交给了东南亚司令部的魏德迈，因此这些英国同行马上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得意扬扬地借机发挥，说尽管这是史迪威统辖的部队，但是中国人还是不愿意打仗。几个小时后，这个消息就在整个会场传播开了，英国人想以此证明史迪威试图跟Y军会合纯属异想天开。胡康山谷所发生的真实情况是，波特纳依据自己的老经验，认为中国人的情报总是有20%的夸张，因此，尽管中国军官要求派遣炮兵而他予以拒绝，但自己又拒绝到前线核实情况。

12月5日，罗斯福向丘吉尔妥协了，答复得很简短："'海盗'结束了。"于是历时两周的开罗——德黑兰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两周里，中国开始不那么重要了。一开始罗斯福决心让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取得辉煌成功，最后他让蒋介石让位给斯大林。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舞伴。他上面给出的简短答复代表着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尽管人们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总统并没有意识到他做了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他也没有这样做的习惯。总的来说，他大致知道自己的方向，但是在过程中，他的决定是凭经验做出的。据他的朋友艾弗里尔·哈里曼说，他在某个既定日期同敌人作战的方式就是"当天早晨权衡桌上的报告"。在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罗斯福做出的决定跟他一开始就选择优先考虑欧洲是一致的。从战略上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海盗"行动从本质上说只是一种姿态而已。

开罗会议的结果跟预计的有所不同。刚刚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接着对蒋介石的承诺就被违背了，仿佛他只能是个摩洛哥的苏丹一样。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接触，中国更加不相信西方了，而西方对蒋介石的信心也直线下降。

罗斯福通过电报告诉蒋介石出现了变故，并问他是愿意在没有两栖登陆的情况下继续参战，还是再等一年，等到雨季结束后，盟军可以发动大规模海上作战时再进行；同时他还允诺尽最大努力通过驼峰航线运送物资。虽然并没有让史迪威传递这个消息，但是罗斯福和马歇尔都意识到，这种情况可能再次让史迪威没有好日子过。两手空空地回到重庆，将使他处境更加艰难。马歇尔提出调他去别的战区，这样他可以指挥美国部队，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史迪威拒绝了马歇尔的援助。他从来就没有怎么看重"海盗"计划，因此取消它对他并无影响，只是这可能妨碍Y军。蒋介石本来就十分不情愿，再有一个借口也许不会对他有

太大改变。此外，史迪威认为，归根结底中国人必须自己参战打开自己的运输线。尽管他并没有把这记录下来，但是从他走出缅甸那一天起，他就从来没有改变反攻缅甸的决心。

在离开开罗前，他想通过总统知道，有关“海盗”计划的决定是否意味着政策的改变，以及在新形势下他应该怎样跟蒋介石打交道。他在戴维斯的陪同下，再次到总统住处跟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会晤。他未加评论地记下了整个谈话，谈话无比生动地再现了罗斯福。

“哎，乔，你怎么看这个坏消息？”总统一开始这样问，接着他谈到美国与中国的友谊，传教士，广东的德拉诺家族，控制中国的通货膨胀的计划，计划让香港成为一个自由港，“不过还是先升起中国国旗，然后第二天蒋介石就会做出高姿态让它成为一个自由港。就要这样处理！大连也如法炮制！”计划对印度支那和朝鲜进行二十五年左右的托管，“直到让它们能够自立起来。就像菲律宾的情况一样。我曾经直截了当问蒋介石，他是不是想要印度支那，他回答说：‘丝毫不想！’——就这样的，‘丝毫不想！’”还有其他各种话题，最后谈到了他跟孔祥熙有过一次长谈，是有关为发展中国运输业贷款5000万美元的事。尽管有好几次史迪威和戴维斯想把话题转向当前的政策，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指导。

总统暗示了他自己新近产生的疑虑。他问道：“你们认为蒋介石还能撑多久？”史迪威回答说情况很严重，如果日军再来一次像去年夏天那样的攻势，就可能压垮他。罗斯福回答说：“那好，我们是否得另外找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来继续下去。”史迪威提议说，这样的人“很可能也在找我们”，但是这个问题到此为止。离开时他对罗斯福的看法毫无改善：“这个人是个轻浮的傻瓜……前景毫无希望。”这真是历史的无情的捉弄，虽然这两个人都急切地想跟中国建立有效关系，然而他们之间却彼此厌恶，完全互不谅解。不过，霍普金斯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他们之间在信息上的巨大差距，并时不时地把戴维斯的报告转交给总统。

蒋介石得意地带着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承认回国，并跟别人说，他已经得到了盟国在孟加拉湾发起攻击的保证。然而他刚刚回国便接到了宣布取消这个行动的电报。他受到了侮辱，马上提高要价进行报复。他向美国要求借款10亿美元，理由是现在要让他动员自己的国民继续抗战已经变得“极为困难”，而且中国军队和经济的虚弱已经“无法”使中国再坚持半年，更不用说一年了，并说中国战区的崩溃将“对全球战争造成严重影响”。他还要求把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增加至少一倍，

同时为了能够发动有效的战斗，将驼峰上物资运输的数量增加到每月2万吨。

史迪威回到重庆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建议蒋夫人不要再采用讹诈的形式，并警告她说“我们国家的人已经对此腻味了”。但是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他召来了高思大使，向他表明现在支持中国的币制何等迫切，而蒋夫人则愤愤不平，说为了维持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开销有多大。高思不为所动，这也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很久以来就希望让他被召回，就像他想调走史迪威一样。高思向华盛顿建议说，贷款无济于事，因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形势“正急剧恶化”，因此为了避免出现崩溃，“必须尽早采取军事手段，恢复滇缅公路并开通对中国的陆上运输线”。

蒋介石对继续参战几乎明码标价的做法让华盛顿日益失望。摩根索出于跟高思同样的原因，也反对提供贷款。他告诉总统说，这是因为中国无法使用这笔贷款，因此无法遏制通货膨胀。中国对1942年的贷款使用得非常失败，此外他们在美国还有4.6亿美元的无质押资金。他们拒绝把汇率水平调整到更加现实的水平上，而是坚持把汇率人为维持在20：1的水平上，是现实水平（在1943年11月达到120：1）的6倍；这招致跟中国有往来的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日益不满。据高思说，中国官员借机“通过我们的战争开支积累了大量美元”。财政部已经了解到有86.7万美元的中国政府资金被转移给了蒋夫人的外甥和她的另一个亲信吴博士手中。

在一份“直言不讳”的备忘录里，摩根索建议美国拒绝向蒋介石提供10亿美元贷款，同时详细解释说，中国需要的是食物、商品、机器和军火，所需数量巨大，只能通过陆地或者海上运达。他建议说，为了开辟这些通道，中国也应该共同战斗。使他感到意外也使赫尔国务卿感到困扰的是，总统提议将这份备忘录原封不动地转给蒋介石，而且真的送交了，只是在备忘录中增加了一些安抚性的表示友好的话。

在重庆，尽管盟国背弃了承诺，但是史迪威还是努力催促蒋介石攻打缅甸。经过两场冗长的会谈，蒋介石仍然坚持认为，日本在缅甸有8个师而不是5个师，认为东南亚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不妥，认为尽管盟军集结了部队和空中力量，但是现在想赢得战斗要比1942年时更加渺茫，说最好进行防御等待日军进攻，还说他不能再冒失败的危险，因为这将会对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的影响。史迪威逐条进行了反驳，但是没有什么效果。“他（蒋介石　）简直是疯了……甚至宁可忍受隔绝，也不愿冒失败的危险。”宋美龄和宋霭龄由于担忧都发急了，以致夜不能寐。“宋美

龄跟花生米一同祈祷。告诉我，除了杀掉他以外她已经用尽所有办法。”不过，蒋介石同意让利多的部队按计划作战，并用书面形式授予史迪威不受约束地拥有完全指挥权，并“完全有权力枪毙任何军官”。蒋介石说，这是史迪威的部队，除了小心不要为英军谋取利益之外，史迪威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使用它。蒋夫人建议史迪威问蒋介石对罗斯福总统敦促之事的答复，对此蒋介石说，除非盟军通过攻打安达曼群岛、仰光或者毛淡棉而切断日军的后方，否则他拒绝使用Y军参加缅甸战役。

蒋介石提出的10亿美元贷款的要求被拒绝后，变本加厉地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国应该按照官方汇率支付在成都地区为B-29轰炸机建造机场的费用，这个轰炸计划是在开罗制定的。假如美国觉得它无法这样做，那么中国政府很遗憾，“无法满足驻华美军的需要……也不可能再在物资和财政上给予支持，包括军用设施的建设”。原定于1944年1月15日开工的机场建设就此耽搁下来了。

史迪威写道：“天哪。用5000万建造机场，再赚上5000万！”在华盛顿，摩根索勃然大怒，他叫道：“他们只是一群该死的骗子！我不会再去国会要一分钱！”他提议，“让他们尽管跳长江好了”，我们自己通过黑市价格出钱修建机场；他愿意每天把“价值100万美元的金条送给萨默维尔将军”。平静下来后，他跟自己的顾问讨论了解决办法，他们告诉他说用20：1的官方兑汇价格来建造机场太昂贵了，这样估计的价格是8亿美元。显然，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富国要在中国打仗，钱也是不够用的。

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要求美国用6倍于实际费用的标准出钱去打败中国领土的占领者，这是一种神经错乱的、令人感到义愤的、没有良心的做法。但是源自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良心与儒教里的是不同的。也许中国过去所累积的对西方的幻灭以及从西方受到的歧视，现在都算到了蒋介石的支付要求中了。他本来就是排外的，开罗会议的结果无疑加强了这种情绪，另外，他对把租借物资更多给予英国和苏联也极为不满。

像所有因钱而起的争执一样，美国与蒋介石的这次争吵也很让人不快。摩根索说：“也许我们不需要他们，上帝啊——”他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他问萨默维尔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简直气疯了。难道我必须忍受这种东西，呕吐后再吃下去，或者你有路子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掉？”在跟马歇尔和史汀生会晤之后，萨默维尔报告说陆军“非常不满”，甚至曾经热心支持中国的陆军部长也准备“来硬的”。史汀生在那天的日记中不无道理地写道：“现在我们已经离胜利不远，并不担心中国退

出战争了。”

萨默维尔跟摩根索1月20日会晤后说，陆军准备停止修建机场，并准备“从另外一个方向接近日本”。他还提出了一个更加让人吃惊的想法：“美国可以通过停止援助而搞垮蒋介石”，或者如果愿意的话，“花1亿美元收买他的一个对手”；有很多这样的对手。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建议不要再提供租借物资，或者把部分租借物资送给地方将领们，“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撤出中国，或者待在中国什么也不干，继续以缓慢的速度行事”。

可以说从这次会议之后，美国尽管仍然支持蒋介石政府，但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然而还必须继续支持，美国也没有试图尝试其他选择。跟当政者打交道是最容易的，而外交政策的惰性也抵制了试图改变或者冒险的方式。华盛顿政府内所有的人都认为，美国不能也不会接受中国提出的官方汇率，但是国务院很不愿意削弱蒋介石的地位，罗斯福也不想放弃他。最后提出了折中的40：1的汇率，此外，还邀请孔祥熙赴美继续讨论。中国人继续要求要么是10亿美元的贷款，要么按20：1的汇率。孔祥熙启程前跟高思大使会晤时谈到了中国可能崩溃，并说日本提出了“一些很不错的建议”。

到了2月份，美军在太平洋的推进已经使可能抵达中国港口的时间提前了几个月，这使得更有必要修建机场以帮助进攻。因此军界此前所持的不借助中国的看法也就不复存在了，索要钱财的斗争继续下去了。将近一年后，孔祥熙博士在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上，仍然微笑着坚持20：1的汇率。



孔祥熙

与此同时，通过各种临时性财务折中方案，中国老百姓建成了一些机场，从而使B-29得以起飞。四川从各县征集了45万人。每个县要按定额提供男女民工和童工，同时还要准备工具和九十天的口粮。他们步行过来，用独轮车运来自己要用的东西。最后在没有卡车、挖土机和混凝土的情况下造好了9个机场，其中4个有9000英尺（约2743米 ）的跑道。几千年来辛苦积累的供种植水稻用的上层土壤被用肩挑的柳筐清除掉，而下层土壤则由男人们来回拉着石滚子压平。源源不断的独轮车流运来了采自河底的鹅卵石，并铺成了石质地基。上面铺一层层混有泥浆的土层，有时中间夹有碎石，这是妇女和孩子们成天坐在地上敲打而成的。然后再把表层浮土运回并重新压实。各村的人都由拿着小旗子的本村的监工负责，这些人又由工程师指挥，他们中除了14个美国人外均为中国人。第一批B-29轰炸机在两个月后降落，机场在三个月里全部造好。

在提议孔祥熙赴美之前，作为对蒋介石要价的回应，美国提出每月花费2500万美元，具体条件由高思大使和史迪威将军商议而定。当为史迪威安排了这个难办得要命的任务的时候，史迪威已经不在重庆，也不打算很快回来。他在12月20日奔赴缅甸前线，这是蒋介石书面确认他对蓝姆伽部队指挥权的次日；该部队现称新一军。史迪威在日记中对此并不是很有把握，提出了这个疑问："我们能成功吗？"他干脆躲到缅甸"天堂般的无战事"中去了。

[1] 谢斯起义，1786—1788年由谢斯领导的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农民起义。——译者注

第十七章

回程

1943年12月—1944年7月

一个指挥部的将军以及战区司令无须到前线师一级担任指挥，更不用说在团一级或者旅一级上了。然而重返缅甸的史迪威又采用了这种非常规的方式；这并不只是因为他对上层感到厌倦或者纯粹是想打仗，而是有很实际的目的，那就是由他亲自指挥可以敦促中国人投入战斗，才可能使战役取得胜利。

尽管有人批评他老是不在总部，并有诸如他是“美国陆军的最佳三星连级指挥官”或者“缅甸排级战”的怪话，但他在从1943年12月底到1944年7月的七个月里仍然主要待在丛林中，只是有一两次很快地飞往德里和重庆。他跟潘兴的原则是一样的。潘兴将军是1913年菲律宾一个省的总督，可是战斗中他代行一个战死的上尉的职务并亲自带领全连进攻莫罗要塞，有人因此提议授予他国会荣誉勋章。潘兴在给陆军部的一封信中拒绝了这种荣誉，理由非常简单：“我去前线那个地方是因为我有必要在那里。”

史迪威在一开始所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打开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以便最终跟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国军队会师，并在此过程中证明他一向坚持的观点，那就是中国的士兵一旦得到适当的武器、训练和统率，是可以成为世界一流部队的。蒋介石向他保证过，属于北部战区的中国军队就是“他的”部队，他可以不受任何牵制地指挥这支部队。尽管他现在对中国人所做的任何承诺都深表怀疑，但是他认为蒋介石至少并没有想挫败远征军的意图。他没有权力让他前面的Y军或者他后面的英军按计划参战，这些只能由更高层施加压力。无论怎样，面对重庆和德里的无穷无尽的推诿，他觉得再继续纠缠已经没有太多意义；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通过直接展开军事行动来推进事态发展。他的目的是在雨季前攻取密支那。



滇黔线上著名的“二十四拐”

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批准的代号为“首都”（CAPITAL）的计划，为了避免日军妨碍史迪威的行进，Y军将穿过萨尔温江从东面跟敌人交火，而英军第四集团军则穿过钦敦江同西部的日军各师作战，从而最终钳掉缅北。与此同时，他的部队就像苹果去心器一样，将作为公路的先

头部队从缅甸北部插入。

他为战役制订的计划简单明了："我们必须通过老鼠洞钻过去，并且一边走一边打洞。"所谓的老鼠洞就是连绵不绝的三道山谷：第一道是最后终结于坚布关（Jambu Pass）的胡康山谷；之后是通往主要的南北铁路干线的孟拱山谷；第三道是铁路另一边的宽阔的伊洛瓦底山谷，这是缅甸的中央走廊。密支那是最北部的日军驻扎地和空军基地，有铁路和河流经过，位于孟拱山谷以南40英里（约64千米），这里往南有条路跟通往中国的老滇缅公路连接。分配给北部战区的通道是浓密的丛林，只能通过长满植物的小道穿行，有时一个小时只能走1英里（约1.6千米），而旁边就是由于大雨冲刷而切割出的走向各不相同的山脊。在这样的地方作战，其困难恐怕是世罕其匹的。

北部战区部队所面对的敌人是有名的日军第十八师团，他们是曾经参加过第一次缅甸战役的老兵，并曾经攻占过新加坡，是日军中最英勇善战和训练有素的部队之一。该师团的师团长为田中新一中将，是个戴着印度遮阳帽，看上去很和蔼的胖子。此人才具卓著，擅长调动其资源并知道怎样充分利用现有兵力。日军此时在缅甸共有5个师，在后来的两个月里增加到了8个师，此外还有4个泰国师、勤务部队以及一些对他们用处不大的跟日本人勾结的印度和缅甸部队。

联军在部队总数上超过了日军（不过也许在作战部队上未必如此）：史迪威指挥了3个师，每个师有1.2万人，包括在蓝姆伽整编的第二十二师和第三十八师，此外，还有从何应钦那里争取过来并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点一点运过来的第三十师。第三十师有一个团在利多作为后备部队，还有一个团在蓝姆伽受训（"我们不可能得到第三个团了"）。北部战区部队一开始的人数约在3万到3.5万之间。

英军有6个师（5个印度师和1个西非师），编成第四军和第十五军两个军，外加温格特被称为钦迪突击队的三个旅，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团和辅助性部队。他们主要的基地在靠近缅甸边界的印度曼尼普尔邦的英帕尔，在利多以南200英里（约321千米）。英印军的各师通常由三分之二的印度人和尼泊尔人以及三分之一的英国人组成，一般各团或者旅是由种族上一致的人构成的。所有的高级军官以及部分初级军官都由英国人担任，而士兵则都是印度人。1944年1月，在史迪威进入缅甸后不久，第十五军曾在若开山区对一个日本师发起进攻，试图沿海岸线往南向实兑的港口和机场挺进。由于已经取消了"海盗"和进攻缅甸南部的计划，因此发动这次战役本来并非急需的，目的只是让东南亚战区的部

队肯定得到胜利——然而后来证明要取得这场胜利很难。

驻扎在缅甸另一端的云南的是Y军的11个师，他们仍然按兵不动。

联军不团结，目标不一致，但是除此以外在人数和设备上占有优势，而且现在有制空权，这不仅是在战斗力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对地面部队补给、增援、撤出和加强机动性方面。这是发动战役的前提因素。现在北部战区各部队都分散在不同的小道上，已经越过了新修道路，正如一位军官说的，他们“只能靠天吃饭”——飞机空投食品。此外，还可以在敌人战线的后方实施空降部队或者在紧急时候通过空投调遣部队。在缅甸北部对空军的使用方式以及调遣部队的方式后来用在了法国和凸地战役 [1] 中。

史迪威使用了日本人在1942年所使用的夹击的方式，此外还结合了底端包抄的方式；在1940年到1941年的谋划中史迪威已经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他的计划是先在正面进行佯攻，同时从侧翼穿过丛林发起真正的进攻，再派遣一支包抄的部队翻山进攻敌后的某个据点，旨在切断道路以断敌后路。因此，随着北部战区部队的挺进，敌人第十八师将被分割包围并歼灭。但是，由于各种严重的、未能预料的障碍，实际上往往难以达到规划的目标，特别是中国人都是孙子的门徒，主张“穷寇勿追”。他们主张实施U形的包围，并有意留出一个出口，避免日军被包围后进行殊死搏斗。结果往往是史迪威原计划一举结束战役，但是敌人一再逃脱，虽然他们丢掉了一些土地，但是又会接着继续战斗。这样一来，时间越来越紧迫，因为必须想方设法在雨季到来之前结束战役。

尽管有蓝姆伽的训练和新的装备，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让中国部队消除对日军时的自卑感；他们觉得不可能打败日本人——这种因素使得指挥官不能够充分发挥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了证明他们能够战胜敌人，史迪威竭力保证他们在每一场战斗中都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如果要消灭日军一个连，他就派一个中国团去执行任务。为了让他们打仗他什么办法都用：吓唬他们，夸奖他们，让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哄骗，贿赂，鼓励并催促，给他们奖章，给连队嘉奖，让报纸登照片以及其他公关手段，并通过自己的出现不断施加压力，使得战役能够继续下去。按照斯利姆将军的看法，在很多时候这是“唯一能够给他的部队以推动力的东西”。

他在情报方面依靠战略情报局下属的第一〇一特遣队组织的克钦游击队。这些人友好，总是面带笑容，勇敢，对日本人极为仇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怎样使用电台，找到敌人的位置，引导北部战区部队，炸毁火车和桥梁，并清除孤立的日本哨兵。此外，了解有关史迪威自己部队

的情况也至关重要，这方面他依靠美国联络官；这些人以“顾问”的名义被派到中国各团中，有时也派到一些营里。他们有自己的电台，每天通过密码向他报告战斗和前进的情况，往往这些报告跟他从中国指挥官那里收到的报告大相径庭。尽管这些美国人没有指挥权，并被告知在意见不同的情况下要尊重中方的决定，他们还是可以通过转交或者否决物资请求而施加影响。至少在这个方面史迪威可以要求中国对得到的物资做出一些让步。这种顾问制度促成了持久的友谊，但是也制造了中美之间的不和；不过，总体上说，就维持战斗秩序或者灌输战斗精神等方面来说，这种方式并不像原来所希望的那样有效。

12月21日，当史迪威到达胡康山谷的时候，原计划从塔隆河一线展开进攻的北方战区部队的攻势已经比计划晚了一个月。同样，计划发起进攻的日军部队也在试探着寻找进攻的位置。日军占领了尤邦加，这是通往渡口的要地，也是利多公路计划穿过塔隆河的地方。孙立人将军第三十八师的三个营突然遭到这里敌人的袭击，之后他们开始修筑工事防守并被敌人分别包围；空运补给不足，而这支部队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试图解救他们，但未能成功。孙立人和波特纳将军就供给和炮火支援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正在从开罗回国的蒋介石本来就喜欢把东西囤积起来，他警告说在塔隆河畔部署的部队不要超过一个团，“因为我们总共只有六个团；如果使用两个团，一旦被敌人歼灭，那么我们就只剩下四个团了”。

史迪威把第一阶段战役的指挥部设在了新平洋，这个地方在他到达一个星期之后就通了公路，这样就可以通过卡车和吉普车运送物资了。他跟孙立人和团级指挥官一道制订了对尤邦加的大规模进攻计划，配备了炮火掩护和侧翼进攻，还对部队训话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进攻，必须胜利。随先遣部队一道去的西格拉夫说：“不管史迪威去哪里，总会产生一些变化。”进攻从12月24日开始。史迪威在6点30分就上去了，他沿着小道步行两个小时到达指挥所，并整天都待在那里观察。炮火在进攻部队前30码（约27米　　）的地方展开，然后整整有五分钟可怕的犹豫不决的时间，接着是中国步兵部队的号声和步兵前进的声音。要清除丛林中的小股敌人，穿过布满地雷和隐蔽有机枪狙击手的火力并占领河流，非常困难。史迪威戴着头盔，对那些正寻找指挥部的隐蔽机枪狙击手的火力毫不在意，但是这让孙立人和他的军官很不自在，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史迪威被打中的话，他们是要对此负责的。

尽管史迪威觉得中国的进攻太谨慎，但是这种进攻没有停止。孙立

人“发誓说他们要为老先生（史迪威）大干一场，而有我在士兵们也都很振奋”。日本人从散兵坑和掩体里顽强抵抗；一名单独作战的日军机枪手被打死了，另一个人就会从丛林中冲出来继续使用这挺机枪打。夺取尤邦加并清除所有的小股敌人花了一个星期。到了12月底，第三十八师有315人阵亡，429人受伤，但是第一次在缅甸战胜了敌人。作为对美国训练的一种检验，这个结果至关重要：这向中国人表明，他们的确是可以打败日本人的。第二十二师的一个连在获得第一次胜利后，把日本人的头挂在竹竿上游行，结果把美国联络官吓坏了，要求辞职。日军从战斗的质量、设备和空降物资等情况来看，也认识到他们遇到了一个新的敌手。



美国服装和武器装备起来的中国士兵和军官

史迪威出现在前线并住在离普通士兵不远的地方，这给中国的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避开指挥部里的种种琐事以及下属军官给他的文件、信件和到处追逐他的殿后部队的信使，他经常不在新平洋和此后的随军前进的总指挥部，而是经常待在丛林空地中他自己设的指挥部里。他跟自己的助手迪克·扬住在竹楼里，有时住在帐篷里，下面有供睡觉用的掩体，一个行李箱就是办公桌，两把柳条椅子是唯一显示他官阶的奢侈物。他在这里睡在小床上或者拴在两棵树之间的吊床上，在一个钢盔里盛水剃须、洗脸，站着排队打饭并与士兵一同吃饭盒里的C级补

给。在基地营地里时，史迪威的饭是由原来斯多克俱乐部（Stork Club）的厨师于勒·雷诺德（Jules Raynaud，人们都叫他古斯）做的；古斯总是抱怨说他的上司的饭量就“像鸟”一样少：他晚饭往往只吃一两片古斯烤的葡萄干面包，再加上黄油、果酱和一杯咖啡。古斯到处搜寻蔬菜，以免总是吃那该死的罐头猪肉，做好之后他一直站在那里，直到上司把这些东西都吃下后才走开。史迪威的家人一直是史迪威生活的主要支柱，现在他家人的代表是在北方战区部队担任情报人员的儿子小乔，在中国部队中担任联络官的两个女婿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上校和埃利斯·考科斯少校。

行军时，每当史迪威看到有些中国士兵抽树叶卷成起的烟卷，他便会把自己的香烟递给他们，并设法空运些香烟过来。正如一位中国军官说的，他“特别注意那些处在底层的人”，而且当士兵看见他的时候，他们就会聚拢在“我们的长官”周围想跟他交谈。最能影响士气的就是他坚持要把伤员送回野战医院救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会送到利多的第二十总医院。他千方百计地施加压力，最后终于为医院建设了一个机场，并对医院的负责人埃西多·拉夫丁（Isidor Ravdin）上校总是有求必应；他原是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由于史迪威推荐，他成了第一个晋升为准将的医疗后备役军官。有一次，拉夫丁抱怨说医院里没有电扇，但是伤寒病房急需，史迪威便发电报给他驻在德里的副手丹·萨尔坦（Dan Sultan）将军，通知他“搞150台吊扇，160台台扇以及11台空调……你我都知道哪里可以弄到这么多东西”。为了供利多的医院之用，美国参谋们住的帝国饭店的电扇也被拆去了。史迪威往往会在星期天上午飞到医院探望上周受伤的战士。他命令不许对任何出院的中国士兵进行搜身，结果不断发生丢失药品、毯子、睡衣和各种设备的事情，不过下这道命令时已经预计到了这种情况，因为史迪威还特地下命令说，如果丢了东西的话，拉夫丁可以不必为此负责。

在担架队、野战医院到第二十总医院等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军队中伤员的死亡率从原来的极高比率下降到了3.5%。中国士兵常说，他们并不害怕在战场上被打死，而是害怕受伤后被留在战场上等死；而对那些无法亲自走出战场的人来说，这往往就是他们的命运。士兵们现在觉得他们在北部战区是受到照顾的，这让他们感到了一种新的自豪感和信心。此外，也由于他们意识到了会有飞机不断补充弹药，因此他们也不像在第一次缅甸战役那样因担心弹药不足而不敢射击了。



史迪威看望伤兵

这些士兵都很年轻，有的只有15岁。他们的体格或许并不强健，但是作为跋涉6000英里（约9656千米 ）走完长征的那些共产党的同胞，他们是世界上任何军队中最擅长步行的人。他们并不缺乏良好士兵的素质，如勇气、耐力、主动性以及为国家着想；根据温格特的观察，他们最突出的特性便是性情快活。“在欧洲人陷入悲观绝望的情况下，这些中国人的脸上却总是能够绽出天真的笑容。”他们对规定的时间毫无概念，因此任何基于精确时间的计划都是没有成功希望的。而未能顾及脸面的任何计划也同样不可能成功。由于他们在国内的部队中习惯了缺少补给、交通工具或者可以称之为医疗组织的东西，他们习惯于到处拣拾东西为生，经常会将任何散置的东西顺手牵羊。

史迪威在黎明的时候经常会花两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走上3—5英里（约4.8—8千米 ）去团级指挥哨所；后面跟着的是他的助手、卫兵以及两三个比较能吃苦的记者。路上他会察看并记住这些小道以及村庄的地形特征，然后晚上就在烛光下草绘出军情图，还会在空白处记下对部队每一步调动和交战情况的评论。在指挥哨所他会观察并提出建议，而不是直接指挥。日本人知道了他在前线出没的情况，因此在仰光广播说他们打算活捉他，结果这使得史迪威去视察的指挥哨的中国指挥官都

备感紧张。如果这位总司令在他们附近被击毙，或者中了日本巡逻兵的埋伏被抓住的话，他们担心自己会被处决。史迪威利用这种担心，一旦有指挥官拖延或者推迟军事行动，他就会在这些指挥官的哨所附近晃荡，并拒绝离开，直到他们下达了行动命令为止。

给中国高级军官灌输积极进取的精神依然困难重重。经过斯莱尼将军的训练并在有才干和精力充沛的中国军官的带领下，炮兵都很有活力而且很可靠。但是，尽管有蓝姆伽的种种努力，仍然避免不了像第三十八师一位姓陈的少校营长那样的人；在史迪威进入胡康峡谷前的那个月里他未能进入预定阵地，在四个星期里没有进行任何进攻性巡逻，没有为一支特别巡逻队发放补给，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这段时期为他空投的3.1万份配给和28吨弹药到哪里去了。

由于补给问题而不断产生摩擦。一方面，中国人提出的补给要求往往是一个部队所需要的或者可以使用的量的两倍；另一方面，有时空投补给的飞行员在遇到恶劣天气时会过于谨慎，部队有时会濒临挨饿的境地。史迪威采取的解决办法是让飞行人员接替地面人员，在泥泞中仅凭罐头猪肉和热水过上几天。据保罗·琼斯回忆说：“当这些空投人员知道了下边是什么滋味的时候，他们就每天都往这飞了，甚至有时乌云就挂在树梢上，在你以为没有人能飞来的时候。”

与此同时，重庆或者德里不断有代表紧急的“Z-Z-Z-Z”电报纷纷送交史迪威的指挥部，“大声叫嚷着让我赶往这两个地方就这事或者那事做出决定”。他在德里的副官是陆军少将萨尔坦。马歇尔1943年派去帮助史迪威的这位将军是个才华出众而且靠得住的人；按照他上司的评价，“丹·萨尔坦是这个战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人”。然而军事渠道的特点就是事无巨细均要达至最高层；因此，假如处于最高层的人在性情上没有出色的行政长官的气质，事情便会有些龃龉。这类问题在民政体系中屡见不鲜。陆军部长史汀生曾抱怨说，罗斯福是“我曾经与之共事过的行政官员中最差劲的”。史迪威无法回避的问题涉及在军队中最为关切的事情，即自己在指挥链中的位置问题。他12月31日连夜赶往德里去处理这个问题。

作为北部战区的执行长官，他在东南亚战区中担任临时性的军级指挥官，而根据另外一种安排，他又是盟军最高副司令。这种局面跟《美女与贵族》 [2] 中的大法官的情况颇为相像；他陷入了向自己的监护人求婚的困境中，不知道自己是可以准许自己结婚，还是不经自己的许可就可以结婚，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否可以因为自己蔑视自己的法庭而

传唤自己？但是对内在的荒谬之处的些许认识，对缓解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的问题并无帮助。所谓的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想让史迪威跟斯利姆一道任职；斯利姆指挥的是东南亚战区陆军司令乔治·吉法德将军属下的第十四集团军，其中包括两个英国军。史迪威瞧不起吉法德，称他是缅甸的何应钦，而且在美国人中的传闻是，之所以让他担当此职位，是因为“他是保证不会发起战斗的那种人”。史迪威相信吉法德会想方设法阻止自己积极进取，因此坚决拒绝受他辖制。史迪威指出，自己作为盟军最高副司令，级别在吉法德之上，另外，作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他没有接到总统授权许可他听吉法德的命令。他在自己担当的各种职务（在战区组织图中，他占据了级别各异的不少于五个方框）中灵活转换，据斯利姆说，其做法可以成为“灵活进攻防御战的范本”。蒙巴顿越是跟他理论，他抵制得越厉害；斯利姆认为他展示了“最彻底暴露其弱点的冥顽不化”。

事情出现了僵局，最后，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宣称：“我准备接受斯利姆将军的实际控制，直到我到达加迈为止。”这就是说到达孟拱山谷的中段，大约是到达密支那距离一半的地方。史迪威对斯利姆的作战意图有信心，认为这种安排不会使他受到牵制。斯利姆职位较低则无关紧要，史迪威说：“我愿意在一名下士带领下作战，只要他让我打仗。”

斯利姆认为史迪威其实是“两个人”。单独跟他聊天时他是一个人，而面对一群听众时，他又会采取那种“酸醋乔”的态度，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勇气是很少有人可以与之相比的，而他的决心由于通常是集中在非常局限的事情上，因此其力量惊人……他无疑是东南亚战区中最富于个性的人——我喜欢他。”的确，史迪威在面对某类听众时会拿腔作势。他跟朋友们在一起时轻松自如，毫不做作；在家里他喜欢开玩笑，但是对于那些出于某种原因他不太信任的人——不管是由于差异感、自卑感、不耐烦还是蔑视——他无疑会变得粗鲁、尖刻，有时表现粗俗，甚至会有意采取粗野的态度，旨在表现他的不满。在第二次缅甸战役时，他这种态度明显表现在对后方部队上；他和衣而睡，遭受炮火攻击，毯子有蛆虫，掩体里还有蝎子，之后他去德里参加那些人满为患的会议。对那些埋头案牍的将军和上校，他的感觉很像他喜欢的莎士比亚剧作中霍茨波所说的一段话；在战斗后“满怀怒火、疲倦不堪”，对总部来的花花公子大发雷霆。

马歇尔认为史迪威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由于史迪威对那些“无所事事”的英国人和中国人不加掩饰的蔑视态度，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紧

张。尽管史迪威有充足的理由感到不耐烦，但马歇尔认为，史迪威的个性问题妨碍了蒙巴顿试图改善与他关系的努力。史迪威显然不像马歇尔那样对自己的情感具有铁一般的控制，但是他不满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英国人和中国人在第一次缅甸战争时都表现怯懦，而且他们之后都想方设法在缅甸不采取行动。他跟那些在他看来是实干者以及敢于作战的英国人和中国人相处从来都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他为什么想统率似乎既有实干精神又善于作战的共产党，也是为什么他崇拜在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展开顽强抵抗的苏联人。他在苏联红军建军二十六周年纪念日时发去了贺电，还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

马歇尔听说史迪威愿意服从斯利姆调遣的事之后，给蒙巴顿写信说："如果你能透过表面现象，你就会发现他只是想不受耽搁地做成一些事情……他对任何富于进取性的提议和行动都充满了干劲、勇气、无限的天真和想象力。他的头脑几乎比我们任何一位将军都要机敏，他所经受的训练和理解力也异常高超。他的缺点是无法忍受保守主义和动作迟缓——但是在现在这种危急时刻，这也是很好的一点。"

史迪威跟自己的下属参谋长们匆匆进行了会晤，其中包括他指定指挥格拉哈德部队的梅里尔上校，然后在24小时之内又返回新平洋。此行的收获之一是，由于取消了缅甸的大规模作战计划，在经过顽强争取后史迪威又使得格拉哈德重新归他指挥。温格特听说此事后愤愤不平地议论说："你可以告诉史迪威将军，他尽可以带走他手下的美国人。"但是，军事行动需要那些哪怕最不能相容的盟友坐在一起协商作战计划，因此温格特1月3日赶往新平洋去进行商谈。温格特的一名军官伯纳德·弗格森（Bernard Fergusson）准将对会谈做了记录；费格森与会时战战兢兢，因为知道两个主角"都可能变得凶巴巴的，谁都不想让步"。

温格特时年40岁，长相英俊，留着胡须，体格强健，锐利的蓝眼睛上是两道浓眉，无论长相、举止还是爱好都像一名先知，跟60岁的史迪威形成鲜明对照：史迪威瘦削，钢架眼镜后的眼神充满探究，具有一个美国东部的农场主那种精明、怀疑和猜测的神情。弗格森认为两人都有先知的一些特征，"有远见，不宽容，精力充沛，极具勇气"，但这是把史迪威浪漫化了。虽然他身上显然不缺少后面三种素质，但他并非先知，而是个实际的人，其主导原则便是"干下去"。他为了完成某种使命的无与伦比的进取精神和发自内心的专注是非常罕见的。温格特既是个实干家也是个勇猛的斗士；他讨厌英印军队中的普通英国军官们，而这些军官也非常讨厌他——这在史迪威看来却完全是对他的正面评价。会

面进行得很愉快。温格特同意不久后会派来美军，并打算在英都周围部署他的远途穿插部队，以把敌人的注意力从北部战区转移开。

史迪威盼望美军的到来能振奋中国人的士气，中国人又开始在胡康山谷拖延了。他在1月2日记道：“孙立人不肯动。在空中支援、弹药和炮火方面提出荒谬的要求。”中国士兵还是很不错，“软弱的是那些上层军官……如果我有一两个美国师就好了！”他对补充兵力深感忧虑，而经常步行去前线指挥所和观察哨也让他精疲力竭。有一次他来回步行了18英里（约28千米　），还有一次走完3英里（约4千米　）用了三个半小时，“每一步都磕磕碰碰，不断诅咒”；另一次他们那一队人突然遭受日军的密集炮击，其中一枚炸弹就在距离他不到10码（约9米　）的地方爆炸了；日本人经常对小路进行炮击，希望能碰上一支骡子运输队或者一支部队。他很为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渡河行动的一个团感到自豪，说这支部队“毫不含糊，纪律严明，没有用手榴弹炸鱼……干得漂亮”。他们的指挥官傅中校“认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像这样一次真正的对敌包围——那可少见”。可是孙立人莫名其妙的犹豫“现在将让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

整个1月份都消耗在清除达鲁平原的敌人；这是位于胡康谷地以南并与之平行的谷地，清除这里的敌人是为了保证在发起主攻后不会在后方还遗留有敌人。一种令人生疑的不情愿的模式越来越明显。被派去执行达鲁平原任务的陈少校那支磨磨蹭蹭的部队甚至没有走出平原边缘，而他的师长孙立人则“动作迟缓而郁闷”。史迪威跟他争辩，向他申明此次行动的重要性和失败的后果，并警告他不要给日本人时间。几天后他发现第三十八师的另一个营没有占领预定阵地，于是跟团长“大发雷霆”，“告诉他一定要回去调查是谁在违抗命令”。当这种事情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史迪威怀疑孙立人一定从蒋介石那里收到了电报，要他降低速度以避免损失，这又重复了第一次缅甸战役那种致命的情形。他直截了当地警告孙立人说，如果他作为总指挥的命令未能得到执行，那么他将辞职并把这种情况向华盛顿汇报，并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这是指终止美国援助。

第二十二师情况好些。一个姓李的营长很高兴，“说我（史迪威　）给他带来了好运……而第六十五师的傅中校说如果有供给愿意去任何地方”。可是五天后第六十五师却“可悲地萎靡了”，而傅也被解除职务。每次战斗命令都经过一番内部斗争。最终第六十五师又行动起来了。罗斯维尔·布朗（Rothwell　Brown）上校指挥的由60辆轻型坦克组成的坦克

营，“在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干得很不错”；这是唯一一支由美国人直接指挥的部队。1月28日，第六十五师扫清了一小处日军据点，日军共有250人死亡；两天后，“六十五师到达达鲁！”——这为主攻扫清了道路。

蒙巴顿非但没有加入战斗，反而是在退出。1月8日，东南亚战区制订了一个叫作“公理”（AXIOM）的修正过的作战计划，建议停止修路，并停止史迪威重新拿下缅甸北部的行动；由于蒋介石拒绝投入Y军，因此蒙巴顿认为在雨季前不可能重新打开缅甸北部。相应地，蒙巴顿提出一个经由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海路反攻战略；这个战略还不同寻常地将香港包含在东南亚战区的边界内。史迪威对此的评价是：“路易斯想对整个计划耍赖。”他给马歇尔发了一封电报，要他敦促蒋介石进入缅甸作战，这样英国人就没有什么借口了，同时他还派了自己的参谋约翰·克利夫兰（John Cleveland）上校去重庆完成同样的使命。克利夫兰带回来的是不好的消息：委员长仍然坚持，他出师前英军必须进行登陆并在缅甸南部发动大的攻势。史迪威写道：“我们身处绝境。”

蒋介石撤回了Y军，加之在金钱方面提出了过分要求，使得华盛顿加强了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他实际上希望靠在缅甸打仗挣钱。因为这次战役原本是为了解除对中国的包围，而且美国装备Y军原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既然蒋介石不愿意帮助解救自己，那么最明显的办法便是放弃这种努力了。然而美国不愿意这样做，因为美国的战略中需要中国，而且美国一直担心中国会崩溃。罗斯福语含愠怒，几乎像史迪威期盼的那样，要求要么钓鱼（全力以赴）要么就停止饵料（放弃不干）了。罗斯福在1月14日发报给蒋介石说：“如果不能调动Y军，那么看来我们目前要停止向其提供急需物资……并减少在印度储备物资的库存。”蒋介石相信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并没有被吓住，仍然按兵不动。



魏德迈（左二）与蒙巴顿（左三）等在一起

史迪威不想身处绝境。蒙巴顿派魏德迈率领一个由英国人和美国人组成的代表团（人数不少于17人，其中有3名将军）去伦敦和华盛顿，以说服总参谋部接受“公理”作战计划，史迪威听说此事后也准备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去华盛顿“挫败这些英国佬”。他选派了波特纳和戴维斯二人前往。在这个战区中蒙巴顿召集了一个高级战略会议，以讨论他的新计划，但是这必须等到史迪威攻克达鲁平原之后。史迪威1月31日前往德里参加会议；不管他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有多么不好，至少这让他在二十九天来第一次有了洗澡的机会。他儿子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他几乎在澡盆中睡着了。”

现在东南亚战区参谋人员中魏德迈带头鼓吹的“公理”计划的海路战略，是那些反对史迪威陆地战略的人的共同努力，试图取消在缅甸那危险、艰苦和完全令人不快的环境中作战的计划。他们共同的论点是，史迪威正在为一个在当前的战斗季节中没有可能成功的行动浪费盟军的精力和资源；而且，即便这个行动获得成功，通过这里向中国输送的物资也不会很多，不足以抵消为此付出的代价。总是具有前瞻性的丘吉尔很好地表达了英国的利益所在。他强烈反对在缅北作战，认为找不出比这

里更糟的打日本人的地方了。在那里“误入歧路或者卷入其中”，即便是在缅甸南部，“也会使我们无法在远东的胜利中得到应得的份额”——这意味着帝国之路存在于通过新加坡到香港的地方，他希望在去和平谈判桌之前先稳稳掌握这些地方。虽然缅甸是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是从那里无法到达别的地方，除非是到中国，而从英国的观点看中国不是个理想的地方。英国人试图在中国人通过陆路到达香港前就从海路先到达香港。“我喜欢蒙巴顿的新计划。”丘吉尔最后高兴地说。

陈纳德那些总是十分活跃的亲信们也都反对北部战区计划，因为他们想得到发动这次行动的物资，不过他们同时也想得到输油管道——但是不发动这次战役又怎能得到管道，这可真是个军事之谜。永远不知疲倦的艾尔索普在写给霍普金斯的一封封信中郑重宣布：“我向你提出严正警告”，史迪威强迫部队在一条“没有路线、没有食物的山野之地”行军是在“傲慢地走向灾难”。艾尔索普既然认为自己是蒋介石的代言人，于是他弹起了蒋介石的调子，认为史迪威将被打败，这样的话，日本“会把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彻底切断，中国的抵抗将会自然崩溃，而我们也就将永远失去中国这个基地”。他在1月又写道：“史迪威是想过过打仗的瘾。”他希望“让已经死去的缅甸战役起死回生……我认为他成功的机会并不比飞向月球要高”。

他还认为，可能在物资上取代陈纳德优先地位的极远途B-29轰炸机计划“是纸上谈兵，非常危险”，而将成都选作基地则是对史迪威的错误让步；“史迪威将军不断重复的说法是，日本人只要想，他们随时都可以夺取华东的空军基地”。他敦促说改进现状的最简便的办法便是“让知道怎么跟所有人打交道的魏德迈将军担任最高指挥官”，而且魏德迈还年富力强。

跟陈纳德不同的是，魏德迈受到陆军部的赏识，结果46岁的魏德迈成了史迪威的新对手。他是总参谋部的门面，1930—1932年曾经在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服役。在利文沃思以优异成绩毕业后，1936—1938年他又在纳粹政府的德国陆军学院学习总参谋课程。据观察者说，他进修回来后“便有了最优秀的德国总参谋人员所特有的那种戴单片眼镜时所有的风度”。他身材高大魁梧，圆滑，有才干，而且雄心勃勃。他在陆军部计划部任职表现出色，现在在东南亚战区的任职也毫不逊色。在升迁过程中他并不讳言自己的优点，后来他在一本书中描写了自己的辉煌生涯，这书以他自己的名字为书名，而且还有个感叹号。“那个年轻人自我感觉挺好。”史迪威曾经淡淡地说过一两回。他感到还没有必要给他起上

一个尖刻的绰号，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史迪威可是不会缺乏灵感的。

根据1月31日在会议上的阐述，“公理”计划打算不让英国进入缅甸，并将保存其力量直到下一个旱季来到，也就是1944年的冬天到1945年，以备在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发起进攻。据估计，到那时登陆船只就可以从欧洲战场上腾出来了，因此下一阶段将是向中国沿海挺进。东南亚战区宣称无法及时攻下密支那，因此无法赶在雨季到来之前修好道路，也无法在1946年前让道路重新跟昆明连通，而这对支持向中国海岸线发动太平洋攻势来说已经太晚了。他们争辩说应当放弃攻取密支那的目标，而史迪威也只要到孟拱谷地即可；他在那里可以加强空中运输线的安全，同时，为了发动战役和修路而积累的物资可以用来扩大驼峰航线的运力。

尽管阐释计划时有各类地图和计划文件，但是史迪威觉得这些只是“花哨的图表、虚假的数字和险恶的用心”。他在会议上也这么直言不讳。他说，如果英军和Y军像最初计划那样提供帮助的话，那么通过陆路要比海路可以更快抵达中国。本可以立即达成的事为什么还要等6个月？缅甸战役的困难是我们已经了解的，但是对于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困难我们还要从头了解。他不相信可以指望盟军在1944年打败德国，并认为确定长期作战目标应当依据现有资源，而不是那些还没有到手的资源。在中缅印战区击败日军的办法是建立强大的陆军并把日军赶向大海。魏德迈站起来解释说，这有赖于建立并维持与中国内地的交通线，而“我们的技术专家告诉我们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至少需要两年”。[3]　据报道说，史迪威对魏德迈的回答是酸醋性大发。对所有那些所谓的不可能办到的事，他的回答是尖刻地提请他们注意，克莱武 [4] 是带了123个士兵就征服了印度的。因为光是东南亚战区的参谋人员就有这个数目的10倍之多，所以并不奇怪他们听说史迪威这话之后是一片沉寂。

决定最终由华盛顿和伦敦做出。波特纳和戴维斯立即启程去美国，比魏德迈代表团提前了五天，结果蒙巴顿大为不满，认为史迪威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去美国是对自己这个总司令的不忠。到达后这两个代表团才发现，他们去游说纯属多此一举：“公理”计划在华盛顿毫无机会。罗斯福对这个计划毫无兴趣，认为该计划是迂回的，而且有新殖民主义色彩，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没有兴趣。现在的太平洋战略的目标是夺取吕宋（菲律宾）——台湾——广州这个三角区，而就在德里会议召开的当天（1月31日），由于在马绍耳群岛的夸贾林（Kwajalein）登陆（由

史迪威训练的第七师担任这个任务），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现在美国的意图是，攻击日本应当是由美国人做的事。特别是海军想把英国排除在外，这部分是因为在利益上有分歧，但主要还是因为有了新式航空母舰的海军不想受到又旧又慢的英国战舰的拖累。史迪威的进攻很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青睐，因为消除密支那的威胁被认为是对超远程（VLR）轰炸至关重要的，而在吕宋——台湾——广州三角区的战役中又需要这个轰炸计划的帮助。波特纳发现自己可以直接上达总统了。

“年轻人，给我讲讲缅甸的情况。”富于魅力的罗斯福热情地说。波特纳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精致的彩色地形图，颜色从喜马拉雅的深红色到伊洛瓦底平原的淡绿；他把这张地图摊在总统座椅旁边的地板上，不久就跪在地板上，一边讲解一边开始用手指指点点了。有两三次罗斯福的军事助手帕·沃森（Pa Watson）都走进来想把他赶走，以便让总统能够遵守日程安排，但是罗斯福挥挥手让他走开，还说：“这对我可是一生中难得的机会。”看到他有这般热情，波特纳壮着胆子催促他“对丘吉尔施加压力，这样他就可以对英印军施压，让他们帮助而不是妨碍史迪威将军”。

罗斯福表示同意：“好的，你替我给他发封电报。”波特纳很是惊讶，但还是心甘情愿照办了；他口述电文，而总统则用一支铅笔在一本笔记本上将他的提议记下来。正当波特纳准备离开的时候，总统说：“给我说说你对法属印度支那未来的看法。”然后罗斯福没有停顿就开始讲起了他自己的看法。跟过去常有的情况一样，罗斯福的说法因听众不同而有所不同。他这次说：“我已经告诉蒋介石，让他准备战争结束后接收这个地方。法国人由于失职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权力。”

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润色之后，这封电报发给了丘吉尔。电报陈述了在现在这个季节夺取密支那的紧迫之处，提到了如果英国人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史迪威有信心夺取这个地方，此外，还“急切”希望“你们会尽最大努力立即在缅甸北部恢复进攻计划”。丘吉尔不为所动。因此在魏德迈陈述“公理”计划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正式拒绝了这个计划。

要不是敌人帮忙，本来即将出现的一个障碍会使得史迪威又处于危险之中。跟珍珠港事件一样，日本人“帮助”他们的对手解决了困难。3月7日，他们对英帕尔平原发起了他们早就计划好的进攻，这迫使英军进行战斗，并在后来越过了边界。这样一来英军又回到了缅甸。由于激起日军的进攻，史迪威成功地使其盟军加入到了战斗的行列，尽管跟计划是有所不同的。尽管英国是迫不得已的，但是这成了决定性的战斗，

而最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蒙巴顿在战后成了缅甸蒙巴顿伯爵。

在这些事件正在发生的时候，史迪威正在竭力想诱捕日军驻扎在孟关（Mainkwan）的第十八师团的大部分；孟关是日军在胡康山谷中部的主要基地。史迪威计划让第六十五团在达鲁平原对敌人右侧发起突击，而美国突击队则在左侧的荒野小道中出现在孟关以南的瓦劳本（Walawbum）；他们在这里将阻断日军撤退的主要道路。5个中国团和一个坦克部队将平行通过胡康山谷中部向孟关挺进。道路和输油管铺设紧跟其后稳步推进。曾设计过密苏里大坝的路易斯·皮可（Lewis Pick）将军是个富于活力的指挥官和道路的总设计师，那里的人们都管他叫“能人”；他2月5日去见史迪威，许诺在20日前将石子路面铺至新指挥部所在的泰帕（Taihpa），并在3天内建成一个供运输之用的机场。3天后机场建成，“崭新，4600英尺（约1402米 ），平整，冒着炮火在14个小时中建成的”。

史迪威在2月1日写道：“现在只是天气的问题了。如果上帝给我们几天不下雨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前进了。”在其后的四天里有两天都大雨如注，在接着的一周里雨又下起来了。到目前为止1月下了十二天的雨，2月将会有十八天，3月有十天，4月也有十天，而这还是“干”季。这一年北部缅甸的雨量竟然达到罕见的175毫米。

第六十六团按计划的一次调动未能成功；这个团被发现“大大偏离路线”，其位置无法确定了。联络官都给搞迷糊了，巡逻兵四处寻找了两天却一无所获（“我坐着简直要发疯了”）。第三天，史迪威拽着师长廖耀湘，跟助手、卫兵以及一两个美国和中国军官亲自去找这支丢失的部队。他们可能是在距离敌人很近的情况下凭借罗盘前进，走过山脊和高达10英尺（约3米 ）的草丛——在这里能见度为零，很可能遭到伏击——结果他们在天黑时找到了第六十六团。史迪威听了指挥官的解释，但是认为不可接受，命令解除他的职务，并向接替他的人交代该怎样抵达目的地，然后去一个掩体里去睡觉了。第二天回去的路“艰苦异常”，让他筋疲力尽。在一个陡坡上他对麦克凯布上校说：“如果背着行李我就会从小道上滚下去的。”据麦克凯布说，这是他第一次听上司承认自己遇到了麻烦了。当这些人步履蹒跚地走进第二十二师师部时，他们只有在别人帮助下才得以取下行李。如果第六十六团能够抵达预定位置的话，本可以阻断日军的退路，但是结果日军跑掉了。

2月19日的时候，在现在已是准将的梅里尔的率领下，美国突击队已经进入胡康山谷。这支队伍的正式称呼是暂编第五三〇七团，一个士

兵厌恶地说，这“听上去像是洛杉矶的街道牌名”。北部战区的记者则把到达胡康山谷的部队形象地称作“梅里尔劫掠者”。作为美国在这个战区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地面战斗部队（这是美国对英军钦迪突击队的回应；在丘吉尔的坚持下，对这支部队的战绩进行了大肆渲染），这些“劫掠者”受到报刊的极大关注，其程度恐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支类似规模的部队。结果，他们最终的结局也就显得特别惨烈，以至于最后国会对此进行了听证。

为了让从利多运送的士兵适应环境，他们在那加山脊上走了130英里（约209千米 ），这违背了一个多年在缅甸的人的建议；他提议最好保存体力。一个同事称梅里尔是“天生的领袖”，他从不会让自己的部队置身于他自己不愿意经受的危险中；梅里尔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格拉哈德并非像期望的那样，属于那种体力强健而大胆冒险的志愿者部队。为了得到具有丛林经验的士兵，这三个旅共计1000人的部队均选自南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部队。一群来自新喀里多尼亚的士兵中很多人都得了疟疾。另一支部队抽自特立尼达的第三十三步兵师，这被视为一只垃圾箱，专门安置那些无法适应或者智商不够的士兵；正如他们的一位军官说的，这些人志愿加入格拉哈德的目的只在于“这些士兵是要想方设法离开特立尼达”。征收志愿人员参加一次长达三月并可能跟敌人直接接触的危险行动，吸引了很多勇敢和富于进取精神的人，其中包括在太平洋参加过战斗的老兵，但也召来了一些性格粗暴和长期心怀不满的人。根据一份医疗报告说：“我们希望的是精锐部队。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很多长期患病的人……还有很多人有心理问题。”在印度的三个月的训练时期里，他们表现得行为粗野，不守纪律，而且对英国提供的住宿和给养嗤之以鼻，不过他们逐渐培养了自豪感、勇猛精神和对他们的第一任指挥官查尔斯·亨特（Charles Hunter）上校的忠诚；亨特现在仍在在梅里尔手下工作。他们乘火车去利多的时候，有个军官惊恐地发现其中有些士兵从窗户里朝地里的“印度佬”和他们的牛射击。

在两年的战争中这是史迪威第一次看到美国作战部队。根据一个士兵的回忆，史迪威对他们的讲话“简单而平静”，说现在有两种非常能够激励人的进展：中国人出现了进取精神，再就是人人期盼的他们的到来——也就是“能顶事”的顽强的美国部队。

在史迪威所住的竹楼里，参谋们聚在梅里尔周围讨论怎样起草一份书面命令。“哦，让这些见鬼去吧，”史迪威插话说，“到外面来，弗兰克，我们可以把这事定下。”他们蹲在一棵树下查看一张地图。史迪威指

着孟关以南大约10英里（约16千米 ）的瓦劳本说：“我想让你在3月3日到达那里。”当年潘兴接受法国指令攻打圣米耶尔时，曾经把两厚本的作战指令缩减成了14页；与此类似的是，史迪威也喜欢阐述目标和主要的方式，但并不想刻板规定每一英里的进程。有一次孙立人要求他给出指令，他回答说：“很简单。继续走。”作为军队的著名战术家之一，他显然研究过并清楚记住了地貌和地理特征，因此完全知道该怎么前进。阿姆斯将军说：“当他告诉你在缅甸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可以相信这是正确的。这正是一名战士想知道的。”



史迪威在战斗区

雨水和各种挫折继续使得向孟关的挺进非常艰难。战斗机飞到前面去轰炸道路和桥梁，以阻断日军的调动，但是在丛林地区空中支援起不到多大效力，因为飞行员无法看清目标。若开山区传来消息说，一个英国师遭到日军有力突袭，结果司令部被攻占，阵地也被围困。这次袭击是日本试图转移视线，使得盟军无法注意到他们准备进攻英帕尔前线的情况。尽管英军在若开山区部队的数量跟日军相比是3：1，他们还是慌忙从英帕尔空运了一个师过去支援。空军运输队的飞机被征用作为运兵工具，这让史迪威很是愤怒，尽管当初曾经达成默契，在紧急情况下蒙巴顿有权要求空军运输队帮助运送部队。

更加糟糕的是雨水。雨水使得丛林生活变得比其他时候更加难以忍受，而飞机也无法向道路前面的部队提供补给。除非道路路面用石子铺设，否则雨水将使得这条小道泥泞不堪，甚至吉普车也会陷进去，而卡车带来的物资仅仅够维持筑路者生存的。战斗部队不但依赖空中提供吃的，也需要飞机运出伤员。夜间下雨的时候，没有睡着的史迪威一边听着雨声一边诅咒；“每一滴雨都像打在我身上。”一天早晨，史迪威在住处外边望着铅一样的天空，对保罗·琼斯说：“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接着是马达的声音，飞机飞来了。

格拉哈德花了八天时间在丛林中步行了60英里（约96千米　），终于到达了给他们空投物资的地方。他们按期夺取了瓦劳本的道路，但是次日遇到猛烈反攻。在第三十八师一个团的配合下，他们进行了五天的激烈战斗；这是中国和美国军队首次并肩作战。由于各种耽搁和混乱，加之中国一个团行进时过于谨慎，结果日军主力得以逃跑，不过还是有1500人被打死，这个地区也落入盟军之手。在瓦劳本缴获的战利品中还包括一些本属租借物资的吉普车和卡车，这是日本人在仰光夺取的。史迪威在郁闷中不无得意地提到，敌人的广播称胡康之战尽管规模不大，但是“可能是亚洲战斗中最为激烈的”。他对日本人的厌恶是刻骨铭心的。当一名四周都是盘问者的惊恐的俘虏想跟他握手的时候，他猛地把手抽开并咆哮道：“不跟你握，肮脏的杂种。”

在若开山区，由于空运英军师的支援，结果盟军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并扭转了局势。斯利姆将军对这个结果“欢欣鼓舞”，专门飞来跟史迪威会晤，商量在北部战区部队进军的南部地区空投温格特突击队。他们的目标是阻断日本交通线，从而组织对北部战区侧翼的进攻，同时也阻止对密支那驻守部队的增援。一个旅从利多步行了250英里（约402千米　）到达英都；另外两个旅通过250架运兵飞机和滑翔机，在3月5日到11日运送到了预先准备好的降落地区；这些飞机和滑翔机属于菲利普·科克伦（Philip　Cochrane）上校统辖下的美国空军突击队。尽管遇到了坠毁以及其他事故，但是在六天中通过650架次的运输共运送了9000人和1300头骡子。温格特在谈及任务完成情况时说：“我们所有的纵队都已经插入敌人的心脏之中。”这种说法未免让有些讲求体面的英国军官感到不快。“我们将奋力对抗，重新夺回我们缅北的领土。让我们……冲上前去，把剑刺向敌人的肋间……这将是历史铭记的时刻。”

在这之前，不管蒋委员长对孙立人的私下命令是怎样的，蒋倒没有向史迪威提什么建议；现在他突然清醒了。蒋显然对若开所发生的事情

心存疑虑，或者对调派向中国运送物资的驼峰航线的飞机解救英军感到不满，因此他3月6日发报给史迪威说，除非英军在若开山区继续前进，“否则我们的部队将停在现在的位置上，这样可以避免被敌人各个歼灭”。跟原先的情报处一样，他要求史迪威事先报告他的作战计划。“噢，耶稣啊，现在又开始了。”史迪威不满地说。不过他无意遵从蒋介石的命令。

哪怕是深陷丛林之中，史迪威仍然无法摆脱政治。马歇尔的一封电报说他感到遗憾，因为由于派波特纳去华盛顿以及征用驼峰航线的运输机，史迪威和蒙巴顿之间又出现了“不和与猜忌”，并命令史迪威重新缓和关系。史迪威觉得自己是受到冤枉的一方，不过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免去了他的麻烦，因为马歇尔亲自来到了胡康山谷。史迪威降格成了一名战地指挥官，不管在司令部看来这多么可悲，但是这对记者颇具吸引力，而相比之下蒙巴顿则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之间出现不和的原因之一就是，史迪威向报界的说明给人的印象是，他是唯一在东南亚战区作战的人。这场公关战其实在亚洲最为激烈。蒙巴顿的访问除了为了引起注意，还为了调整在公告和记者报道中他与史迪威两人相对的声望，并“调和”他战区中英军和美军的宣传工作——这对大英帝国来说是件极端重要和敏感的事情。

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事史像英国这样充满了各种高尚的辞藻。不管是退却还是前进，不管是输还是赢，无论是铸成大错还是勇猛善战，不管是致命的愚蠢还是坚韧不拔，最后这些都会笼罩在尊严中并染上荣耀的色调。每一次交战都是勇猛的，每一次战斗都是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在使用各种修饰语时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每一场战役的将军或者一群将军都被吹捧为战争中最为杰出的。每个人都很了不起：战士们英勇顽强，指挥官沉着冷静，战斗场面辉煌。不管出现怎样的溃败，始终保持了冷静。错误、失败、愚蠢或者别的导致灾难的原因都神秘地消失了。他们仔细地、带着自豪感地描写各种灾难，并将这些灾难升华成为美的东西。官方历史中详尽记载了每一步，但是细节适足以让事情模糊而已。新加坡为什么陷落以及锡当发生了什么事情，仍然一片迷雾。其他国家也想这样做，但是从来没有像英国人那样能够保持自尊。英国几个世纪以来能够统领世界，靠的并不是它的力量而是它自我想象的力量。在1944年的时候英国还不知道它已经不可能重新得到这个世界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别的国家能够继承它的地位）。

丘吉尔对东南亚战区的宣传情况极为关注，负责宣传工作的竟然是

空军上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菲利普·朱伯特（Philip Joubert de la Ferte）爵士。至于蒙巴顿，“从来没有什么人胡说什么他会韬光养晦的”，据他的一位公关人员说。他对所有事关宣传的事务都有极大兴趣，尤其是那些事关他自己宣传的事情。过多的不当宣传会让他感到难堪，但是宣传太少又让他不高兴。对进出司令部的所有公关电文他都要审阅，对其中的很多电文还要重新拟定。视察部队时，他喜欢让人觉得他有“自然流露的活力”。他到达前就会有书面命令详细规定各种程序，比如，他训话时士兵坐在地上时要背对阳光，这样他们就可以不迎着太阳看到他。他会开着吉普车赶到，敏捷地下车，然后麻利地跳上一个事先摆放好的包装箱上，再发表一番“绝对第一流而且显然是即兴的讲话——简洁、直接而且真正催人奋进，士兵们都很爱听”。

3月6日他在16架战斗机护送下到泰帕来检阅北部战区部队。据史迪威说，他用掉的航空汽油“足够打上一个礼拜的仗了……我们用来打仗的只有4架战斗机”。这位盟军最高总司令穿着笔挺的、一尘不染的棕褐色热带军服，上面有三道参战绶带，6英寸（约15厘米　）的金质肩章上布满了星星、皇冠、交叉的剑、官杖以及皇室姓名缩写，这位在胡康山谷的总司令跟在美菲 [5] 一样精神。“老火鸡脖子”——这是史迪威对自己的称呼——穿着大兵的短裤和没有勋章或者军阶的作战衬衣跟他打招呼。史迪威在战斗地区时都去掉勋章和军衔，因为他喜欢跟士兵谈话时不被他们认出，而且这种情况的确经常出现。有次他开着吉普车，戴着中国士兵戴的那种像猎人一样的宽帽沿的帽子，膝盖上横放着一支冲锋枪；经过一群“劫掠者”时，一个对所有坐车子的人都没好气的士兵叫道：“上帝啊，一个该死的打野鸭的人。”一个属于筑路队工程兵的美国大兵更富同情心一些。他说：“看看那可怜的老头。有些征兵委员会的人是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的。”后来多恩告诉史迪威他不该去掉军衔，因为在那个该死的地方士兵们看到总指挥可以提高士气，而且他们也会因此激动一番，给家人写信也有了内容；史迪威想了想，后来就又开始戴上勋章和军衔了。

他跟最高盟军司令在个人方面而非战略上，达成了和睦并相处“融洽”——他给温妮的信中这样说。他“忍辱”承认了错误，并对未通知蒙巴顿就向华盛顿派遣使团一事表示歉意。因为他的想法得以采纳，所以他这样做起来并无困难，而最高盟军司令也很是满意。

按照蒙巴顿的看法，史迪威具有“满腔热忱”想与敌人战斗，但是对全球战略却没有了解——而这是谋划者不得不经受的痛苦，并且无法让

史迪威对管理方面的事情产生丝毫兴趣。他向迪尔汇报说，“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战士”，但是“只有三位一体的人”可以同时位于德里、重庆和缅甸。因为蒙巴顿想维持一种能够顺利运转的团队，他觉得史迪威的尖刻言论和不加掩饰的批评对盟国的事业是破坏性的和有害的。他希望史迪威能退出东南亚战区，让他的指挥仅限于中国，而让魏德迈或者萨尔坦接替他在德里的职务。

蒙巴顿在别人陪同下参观了战场，在那里他对尸体的腐臭味甚感不快，并说海战要干净得多。尽管他们表面上保持了亲密的盟友关系，但是这个战区的所有人都能感到，这两位指挥官在风格、手段、意图以及国家利益方面有根本的分歧。一天后，蒙巴顿视察时不小心将一个竹片刺入眼中，结果不得不在第二十总医院接受手术，这时在美国大兵中流传的说法是乔大叔“打了这个英国佬的眼睛”。

这时，正当最高司令毫无斗志的时候，日军开始了一种其致命后果堪比珍珠港事件的冒险行动，即对英帕尔和阿萨姆邦——孟加拉铁路发起进攻。

由于日本在1942年的征服狂潮中比预计更早地攻下缅甸，日本战地将军、缅甸区指挥以及东京的帝国司令部就是否进攻印度产生了分歧——哪怕是打到曼尼普尔和阿萨姆邦，以清除盟军可能的反攻基地。史迪威步行逃出的那条路让人生畏，没有道路可循，到处是崇山峻岭，疾病丛生；英国人一直将这视作印度的屏障，而对很多日本人来说来未尝不是如此——只是方向相反罢了。反对发起攻势的人争辩说，不可能率领大规模军队穿过那加山，盟军也不可能从这里发起反攻。日本打算按兵不动，并加固已经获得的地方。但是到了1943年，云南和蓝姆伽的部队集结，似乎为未来战役进行侦察的温格特部队的渗透以及阿萨姆邦空军基地的日益活跃，都显示盟军了有进攻意图，结果使得倾向于攻打英帕尔的意见占了上风。

计划在1943年夏天开始，对此给予有力推动的是日本驻缅军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此人身材粗壮，长着个尖脑袋，眼神凶猛，嘴唇很厚；他激烈地挺过去了部队供给这个大难题，由于其参谋官对他的脾气感到害怕，结果他们尽管有疑虑，也只能作罢。牟田口打算让士兵们在一个月内抵达指定目标，这期间他们要带上足够的大米，此外还有能够搜寻到的食物以及在前面路线上预先存放的食物。一个月后他们应该能够夺取英国在英帕尔的储存物资。按计划他们会继续向科希马（Kohima）前进，并及时占领跨越铁路线的迪马普尔（Dimapur），争

取在雨季到来前建立坚固的阵地。为了支持这次战役，日军将道路延伸到了钦敦江边的霍马林，而此时在指挥部的争论仍然没有平息。直到1月19日的时候，盟军北部战区部队似乎马上就可能夺取达鲁平原，这预示着日本将失去缅甸北部，此时才下令执行英帕尔进攻计划。

尽管英国已经知道日军正在准备进攻，空中侦察不断发现敌人有调动迹象，看到了通向霍马林的公路，同时还发现在乌尤江上集中了一些木筏，然而他们对此并无防备。不到一个星期，牟田口的纵队就穿过了钦敦江，又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已经翻过山到达了乌克鲁尔（Ukhrul）的郊区，这里距离英帕尔只有35英里（约56千米　）；在第三个星期的3月29日，他们切断了英帕尔通往科希马的铁路，这使得英帕尔除了空中联系以外，其他的交通均被切断。东京电台对这次入侵大吹大擂，声称即将征服印度，而“万岁！”之声则在日本帝国响彻四方。实际上，这次战役按计划没有打算越过曼尼普尔，不过指挥官们希望能够乘胜追击。



史迪威与中国两位师长：孙立人（左一）、廖耀湘（右一）

东南亚战区面临真正的大灾难。如果在经过两年的准备，并已经取得制空权后，英国第十四集团军现在从英帕尔撤出，从而将这个边疆省留给敌人的话，这对印度士气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阿萨姆邦将与加尔各答分离，这样是否还能让人们重新恢复意志——即便是没有军事手段——收复这个阵地，就很成问题了。为了奋起防御，斯利姆将军要求立即撤回调去增援若开山区的部队，这意味着要再次求助于空军运输队。一直对中国感到紧张的罗斯福曾经告诉蒙巴顿，今后不要要求调遣那里的飞机了，但是事情紧急，于是3月14日出院的蒙巴顿再次下令调用飞机。

萨尔坦向他提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什么日军三个师能够穿越山脉，而且有足够的力量威胁英帕尔，而英军参谋们两年来一直宣

称，通过同样的地带派遣部队攻打缅甸是不可能的？蒙巴顿的说法是东南亚战区经常说到的资源、后勤等问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意志。在军事上也跟其他人事一样，意志是成就事情的关键。有些情况对意志会产生限制或者使之无效，但是在进攻或者防御中有意志至关重要，没有意志是致命的。在印度防御的意志非常坚决，撤退是不允许的，因此英军也以这种精神作战。在完成了若开部队的调遣之后，空军运输队飞机又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服务于英帕尔前线，通过空运保证英帕尔以及被围困的科希马驻军能够生存下去。他们跟皇家空军一道为15.3万人运送了补给，并将伤员和非战斗人员运出。

对于史迪威来说，第一个月进攻的前景非常可怕。如果英军撤退，而日军切断了阿萨姆邦——孟加拉铁路，那么北部战区将会孤立地陷入缅甸，他的所有努力和希望都将化为乌有，毫无希望，剩下的只有屈辱；他们别无退路，只能再次逃出，经由驼峰退回中国。“这将会毁掉一切。”他第一次听说日军进攻的消息后这样写道。加之那天晚上又下了雨，他悲哀地简短总结说：“上帝对我发怒了。”他发电报给马歇尔说现在他需要帮助了，必须要蒋委员长投入Y军参战。

现在急需在萨尔温江开辟第二战场，而这时蒙巴顿也像1942年时危急之中突然醒悟的韦维尔一样，突然请求他一向鄙视的中国军队的支持。他请求罗斯福和丘吉尔以个人名义“紧急”向蒋介石求助。罗斯福随即发出电报，蒋介石答复时坚持认为，中国已经太虚弱，加之经济凋敝，已经无力发起大的攻势；共产党有在北部崛起的趋势，而日军正准备在黄河以北发动攻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在云南发起进攻。因为蒋介石已经有45万人正用于围困共产党，再加上中国的运输困难，云南的部队实际上跟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基本上不相干。罗斯福在地图室中已经看到了用别针标出的阵地情况，因此蒋介石的答复让他很生气。他看到萨尔温江面对着中国部队的日军只有一个师团，因此准备给出尖锐的答复。

史迪威继续前进，准备再次试图往南包围日军第十八师团。他现在的目标是越过坚布本地区并在沙杜祖（Shaduzup）打击日军，同时派出另外一支部队绕到他们后面，切断他们去卡迈的退路；卡迈是孟拱山谷日军的主要阵地。格拉哈德和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被派去执行这个任务，这需要85英里（约136千米　）的行军；而史迪威则给中国部队施加压力，让他们向敌人正面阵地的路线前进。“同上：上去督战是值得的。至少出现了一种巧合，那就是每次我督战的时候他们就会奋发一下。”

第六十六师在3月19日攻下了坚布本，这天正好是史迪威61岁生日。在丛林中堪称奇迹的是，下属们竟然准备了一个大巧克力蛋糕，上面用奶油写着“乔大叔生日快乐”，蛋糕放在大树下面临时拼成的桌子上。史迪威穿着一件旧毛衣，用一把大砍刀切开蛋糕，并分给从他面前鱼贯而过的军官和士兵。这两年里他的面容已经改变很大。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看上去结实健康，而现在则衰老憔悴，嘴巴和眼睛旁边布满皱纹，头发中间也有了一块白发。他患有肝病，但是因为想按时实现目标，他拒绝住院治疗。马歇尔的一封生日贺电向他肯定说：“你所做的工作很可能对这场战争和中国的未来都有历史性作用。”而他在重庆的同事也发电报说：“你指挥下的每个人都钦佩你、爱戴你并忠诚于你。”《中缅印战区简报》发表了一篇对这个中缅印战区很有争议的指挥官的分析文章，文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某一天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一种肮脏的记忆的时候，人们仍然会讲起史迪威在亚洲的故事；这是个史诗般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不事张扬的人提着剑深入魔窟，杀死了灾难之龙。”

这些灾难之龙现在已经聚集在他的周围了。他在3月23日写道：“日本鬼子到了乌克鲁尔。上帝啊。”斯利姆请求他“把Y军调派过来”，就好像他一旦请求他们就会顺从地派来Y军似的。情报部门还报告，在格拉哈德前进的道路上有1000名日军（“我的神经又经受了一次震动”）。这很像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那些日子里的“那种一直就有的沉重感觉”。他竭力想保持耐心，“巨大的代价便是压抑的怒火和高血压……有时候我仿佛要裂成一千块碎片……我总免不了担心，根本没法止住自己”。但是当其他人也开始为英帕尔战役担心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日本人到了我们的背后，那我们也是在他们的背后。”

戴维斯从华盛顿返回了。他报告说“公理”计划被废掉了，但是他认为就对付蒋委员长而言，“罗斯福已经尽到了最大努力”。史迪威决心要自己试一试。“如果我也无法说服花生米，那么这个季节的战斗就完蛋了。”他3月27日飞到重庆跟委员长会晤；即便他没有得到Y军，他至少也得到了允诺，可以得到两个师支援北部战区部队，并最后挺进密支那。这个承诺一个月后兑现：第十四师和第五十师在破纪录的八天时间里被空运到阿萨姆邦。他们在那里配备了新的武器和装备，并被空运到胡康山谷的部队集结待运地区。3月30日，史迪威回到前线时心脏一直有毛病的梅里尔已经非常虚弱，结果史迪威不顾他的反对，强行命令他到利多医院接受治疗。现在的天气每六天就有五天下雨，更糟糕的是，日本人似乎就要突破英帕尔和科希马之间的地带，并推进到公路和铁路

线。

史迪威现在处境艰难。他在后方未能保障的情况下不能前进。他必须确定英国人是否能够守住，并决定通过一种具有冒险性的计谋来试探一下当时的情况。他请蒙巴顿和斯利姆4月3日在阿萨姆邦的空军基地之一的乔哈特（Jorhat）跟他会晤，会晤中他试探性地提出把当时有两个团为预备团的第三十八师撤出，以帮助斯利姆阻止日军的进攻。也正是在4月3日这一天，开始从中国空运第十四师和第五十师了。即便如此，放弃富于战斗力的第三十八师即使不会中止他的整个战役的话，也会减慢战役的进程，而且夺取密支那的希望将会破灭；不过他是不是真指望英军会接受中国人的帮助，这还是个疑问。他对派印度师驻守印度西北部啧有烦言，因此他这样做也许是想迫使这些部队有所动作。假如斯利姆接受了史迪威的提议，根据当时的情况看，史迪威只能兑现承诺，因为如果日本人在他后面突破的话，他的战役反正也会就此终结的。

据斯利姆说，尽管史迪威“显然感到恼火和失望，但是他没有进行任何批评和指责”，而据斯利姆自己颇为堂皇的说法，由于他意识到前进对史迪威来说是很好的机会，因此他大义凛然，拒绝了中方的帮助。实际上，叫中国人帮助防守印度的英军阵地，这跟把这些阵地丢给日本人的危害是同样大的。尽管在史迪威看来斯利姆显得“紧张而担忧”，但是斯利姆自信他能够阻止日军，并保证北部战区的交通线不会中断十天以上。他说英帕尔之战将是决定性的，并保证英国不会输。

史迪威感到如释重负，他回到沙杜祖的指挥部，召集主要中美军官参加会议并命令“全速向卡迈前进”。卡迈过去30英里（约48千米 ）便是沿着开阔的伊洛瓦底河谷边缘并通过孟拱和密支那的铁路。为了避免北部战区部队占据铁路，日军受命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孟拱。3月23日，经过艰苦行军并与日军发生了几次遭遇战后，格拉哈德的两个营的部队终于出现在卡迈以北20英里（约32千米 ）的英坎加唐（Inkangahtawng），在企图断敌后路时，他们遭遇反击并撤回到山里。他们占领了一个叫恩庞加（Nphum Ga）的山峰并经历了十一天的顽强包围。进攻的日军后方受到了前进的中国部队和格拉哈德第三营的威胁，这样日军才于4月8自动撤退。这一次又未能完成对日军的包围。

在南边，钦迪突击队的战斗有效阻止了对史迪威侧翼的进攻。3月24日，温格特的飞机撞到山上，温格特阵亡。此前不久他跟斯利姆有一次会晤，临走时他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你是东南亚高级军官中唯一不希望我死掉的人！”他的死使得远程穿插（LRP）的效力大为降低。斯利姆

曾写道："他建立了这支部队，给它灵感，捍卫它，给它信心。这是他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无尽能量的结晶。它别无依靠了。"这个旅的指挥官之一威廉·朗泰涅（William Lentaigne）准将受命接替温格特，并在后来与史迪威发生严重争执；考虑到北部战区部队正在分散进攻英帕尔日军的兵力，钦迪游击队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支持史迪威并接受他的指挥。斯利姆和史迪威的联络官乔治·德莫特里亚迪（George Demetriadi）上校认为："如果没有北部战区部队的话，日本人就会在英帕尔得手了。"

在继续进攻卡迈的过程中，孙立人和廖耀湘毫无疑问都在消极对付，史迪威现在已经肯定这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史迪威要求进攻的命令屡次未能执行，而坦克部队的中国军官告诉布朗上校说，除非蒋介石认为有安全保障并同意，否则廖耀湘不会发起进攻。史迪威就此对质时，廖耀湘承认蒋介石直接跟他保持联系，但是蒋介石命令他服从史迪威，"即便是在我（史迪威 ）错了的时候"。然而廖耀湘仍然在拖延，史迪威因此相信蒋介石在关注英帕尔的局势，命令廖和孙谨慎行事。

由于史迪威总是待在下面，在各个总部中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混乱和不满。重庆、昆明和德里之间的往来函电极为频繁。萨尔坦告诉史迪威说，他的副官都不能采取明智的步骤，因此请求在阿萨姆邦召开一次会议，要史迪威在会上谈谈他的意图，以使"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然而史迪威却在孟关召集了会议。他听着不停的雨声，计算着日期，无法离开，担心他一走，部队就会放松一天的压力。不管对盟军对敌人还是对任何其他战区来说，史迪威的处境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作战指挥官能够执行他的命令。服从命令最终靠的是对惩处的恐惧，而孙立人和廖耀湘都很清楚，最终能够惩处他们的是蒋介石，而不是史迪威。

由于对缅甸战役的报道，Y军的消极做法在重庆引起了负面评论，很多中国人也感到不自在，他们对蒋介石的解释感到不满，但是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罗斯福再次催促他；罗斯福曾经不满于史迪威未能对蒋介石使用那种对摩洛哥苏丹说话的语气，但是他现在的语调越来越接近史迪威了，这或许也是由于陆军部的影响。他在4月3日的电报中说："我无法想象你经过美国装备的Y军无法进攻实力已经消耗的日本第五十六师。在我看来现在已经该……毫不迟疑地前进了……你们在萨尔温对面的是日本一个实力已经大为损耗的师团……我们在过去一年中为Y军提供装备和训练正是为了能够利用这样的机会。如果不能将这支部队用于我们共同的事业中，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花大力气为你们空运物

资并提供教官……我真希望你们能够采取行动。”这封电报措辞严厉，但是没有多少威慑力；电文中没有说“否则”就会怎样。据蒋介石夫人说，蒋介石对这种语气很是生气，打算对电报不作回复；这是他对待这种让他没面子的电报的方法。

此时，美国的忍耐终于到了提出对援助对等交换的时候了；不过正像很多历史性时刻一样，是谁决定使用这种权威，这并不明了。罗斯福当时正在佐治亚温泉（Warm Springs）。史迪威与马歇尔联系，得到允诺说除非Y军行动起来，否则《租借法案》将终结。史迪威在给他驻重庆的总参谋长赫恩将军的电报中指示说：“我完全同意乔治的意见。蒋介石曾经有过各种许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如果他还不打的话，我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浪费哪怕一吨的物资。我建议，向中国任何组织运送的物资均转向支持空军作战。”为了避免再次引起关乎蒋介石面子的问题，之后的谈判是在下面的工作层面上，即在赫恩和何应钦之间展开的。何应钦被告知，除非Y军采取行动，否则本月的驼峰物资将全部转给第十四航空队。蒋介石很受震动，只能采取行动，不过他避免了他个人做出让步的举动。赫恩提出上述条件不到两天后，何应钦在4月14日命令Y军穿过萨尔温江的命令上加盖了官印。他特意通知马歇尔说，这个决定“完全是中国主动做出的，未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

“要是他三个月前这样，就该感激不尽了。”美国Y军总参谋长多恩写道。他向史迪威汇报说Y军各师仍然没有满编，但是军官们已经渴望能够完成这次使命。卫立煌的总参谋长萧毅肃非常能干，完全支持作战，而负责供给的卢泽将军则是“满腔热忱。如果他说会提供卡车的话，那么卡车总是提前一天就到了”。甚至何应钦也关注战备了。然而进攻很快就患上了无所不在的拖延毛病。史迪威给多恩的电报说：“上帝啊上帝，看来又开始了。如果你要自杀，一定要提前三天告诉我。”

史迪威现在开始向密支那进行最后冲刺。由于已经有各种耽搁和拖延，而且好几次试图消灭日军第十八师团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加之孙立人和廖耀湘有意拖延，现在剩下的机会只是孤注一掷而已。到了4月21日，他已经决定依靠一支由格拉哈德和中国人组成的突击队，通过秘密快速穿透夺取密支那简易机场，这样就可以通过空运运进增援部队和重武器，从而夺取这个城市。克钦人警告说除非是在旱季，否则驮畜无法穿越陡峭的古蒙（Kumon）山脉，但是史迪威决心要进行一次冒险。除了第二十二师的炮兵连之外，选拔进行这次行军的中国人都不是孙立人和廖耀湘的士兵，而是第三十师的一个团和刚来的第五十师的一个

团。即便如此史迪威还是认为，如果没有美国人打前阵的话，他并不能保证这些人能发挥主动性，因此他觉得必须把已经饱受打击的格拉哈德残部再次派上去。

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决定，因为这些美国人由于行军和战斗已经筋疲力尽，有的生病，有的头昏眼花；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榨干，理所当然地应该撤出去休息。这支部队有超过一半的人已被撤出，主要是由于疾病；原先的3000人中现在还剩下了1400人。尽管他们感到深深的痛苦和恼怒，但这是史迪威唯一能够支配并听从他调遣的部队。亨特上校虽然开始对史迪威感到憎恨，但是他接受过西点军校服从命令的熏陶，而梅里尔也准备重新担任总指挥。格拉哈德的90天使命到5月7日就到期了，但不管是不是90天，史迪威认为战役需要他们，而且他们的军官也认为他们是可以打仗的。

这些士兵则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在三次长途跋涉中已经走了将近300英里（约482千米　），这期间他们踉踉跄跄，不断滑倒，在密林中艰难前进，骡子不断摔倒，要等空运物资，吃冷冷的应急口粮，睡在湿地上，忍受饥渴和发热。更为严重的是，每一步都使他们更加深入敌对区，这也增加了他们恐惧的程度。根据查尔斯·奥格本（Charles Ogburn）中尉的说法，最糟糕的“不是别的，正是危险感”。更加有损士气的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受到赏识，而且他们认为史迪威对中国人的奖赏和认可太过分了，对此也心怀不满。即便是有这种种困难，只要担任指挥的将官能够亲自给予鼓励，或者给他们嘉奖、晋升、奖章，或者就像史迪威给中国人那样的认可的话，很多郁闷本来是不难消除的。史迪威在瓦劳本之战后对连队表示了祝贺，但是他跟潘兴一样，对给自己同胞授勋看得比较淡。无论他还是梅里尔都是以身作则的人，史迪威认为美国人无须“拍拍背或者握握手”（这是他后来非常恼怒地说的）才能去作战。

这些格拉哈德幸存者在经过恩庞加的流血和伤亡之后，接到的命令不是回印度，而是继续翻越一座6000英尺（约1828米　）的山隘并穿过比之前更加艰难的地区，他们听到这个命令都惊呆了。他们无法相信“我们的营长、我们自己的连队长，还有我们团和营里的外科医生都异想天开地认为，我们大多数人还可以继续干下去……”。他们觉得自己像轻骑兵一样，是被人派上去送死的，原因只是有人犯了错误，或者只是由于史迪威已经下决心要让中国人载入史册，“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使牺牲这个战区的一个美国步兵连队也在所不惜”。

史迪威告诉梅里尔说，他知道他是在勉为其难，但是别无选择。他授权梅里尔一旦夺取密支那简易机场，就可以撤回“劫掠者”，“只要按计划达成目标，无须等候进一步下达命令”。这个由1400名美国人、4000名中国人和600名卡钦族突击队员组成的特遣队在4月28日出发。与此同时，仿佛无形的枷锁放松了，孙立人和廖耀湘也开始再次向卡迈进发。也许他们在英军4月20日解了科希马之围后受到鼓舞，蒋介石看来准许他们前进了。

现在浓云密布，大雨如注，小道变成急流。史迪威心急似焚。他组织派遣特遣队去袭击密支那是保密的，没有告诉蒙巴顿，因为担心如果失败，东南亚战区会幸灾乐祸。之前无论何时，他在跟斯利姆谈论此事的时候，他都要斯利姆不要告诉任何其他人。史迪威战役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意图是夺取密支那，这在这个战区并非秘密——实际上罗斯福在2月25日给丘吉尔的信中已经明确说了——但是蒙巴顿的参谋官们都让他确信，不可能夺取密支那，即使夺取了也守不住，或者即使守住了也不值得，因此蒙巴顿相信，史迪威最多能够在雨季的孟拱山谷中寻求一个落脚点罢了。4月时东南亚战区仍然没有想过，如果收复英帕尔的话就继续攻克缅北，而是打算向海岸方向进攻，如果不能攻取苏门答腊，就向仰光发动攻势。参谋长联席会议催促完成有关原定的缅北作战计划，对此蒙巴顿在4月14日的答复是，在原定日期攻克这个地区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个更晚的日期也是“不周全的，不应当尝试此事”。



史迪威与美国指挥官在一起

4月14日，根据海上战略，开始把东南亚战区司令部转移到德里以南1500英里（约2414千米　）的锡兰的康提（Kandy）。锡兰是印度洋的一个舰队基地，更加靠近马来亚和苏门答腊，但是比德里距离缅甸的陆上战役更加遥远了。



Y军军长卫立煌与美军顾问一起

随后，美国也在战略中迈出了关键一步。5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重申准备在菲律宾、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海岸登陆；正如金上将毫不迟疑地写道的，这最后一个目标是为了提供补给并“利用中国人力，使之成为打败亚洲大陆日军的最终陆地力量”。过去两年的经验表明，诱导中国人完成美国的作战计划并非易事，老观念依然影响很大。海军也很热心。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上将认为，如果敌人实力下降到一定程度的话，可以绕过菲律宾从而缩短战线；但是正如他在写给金的信中所说的，他只是提及这种可能性就招致麦克阿瑟大发雷霆，并大谈特谈其“神圣使命——救赎1700万人民——灵魂上的血等等”。尼米兹和金认为应当由史迪威指定一个中国海岸最好的登陆点作为跟中国部队的会合点，因此应该及早跟他商量有关最终利用中国部队作战的事宜。

陆军更多考虑的是把中国作为重型轰炸机的基地，而非利用中国人打仗。史迪威得到通知说，现在优先考虑的是对他战区的空中力量提供补给，目的是为了配合11月对菲律宾的攻击和2月对台湾的进攻。出于这种考虑，参谋长联席会议5月3日就他的使命给出了新的指令：密支那是他的首要目标，这跟东南亚战区无关，而他整个使命的新目标便是打

通去中国的陆上交通，并在中国展开战斗，旨在有效地支持太平洋战争。

实际上，尽管没有明说，但是这已经表明英美在亚洲的努力已经悄悄分开了。谁都没有明说。美军在东南亚战区的参谋人员跟他们的英国同事一起迁到康提，并跟往常一样继续工作。但是，直接通过太平洋的穿插，以及史迪威为了对穿插提供穿过缅甸向中国进攻的先头部队的支持现在已经是既定方针；这将无视大英帝国试图在边缘作战的企图。

按照计划，当密支那特遣队估计在48小时内即将达到目标的时候，他们要发出信号告知运兵飞机。当这支部队以每天爬行4—5英里（约6—8千米　）的速度在山上艰难行进的时候，史迪威正在继续沿孟拱前进并焦急地等待信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现在出现了好几天的晴天，但是他现在又受到拖延术的阻碍了。尽管日益疲惫（“赶到指挥所里，筋疲力尽……喘不过气来，腿没有劲……当我踉踉跄跄走进去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个老人了”），他还是强迫自己去指挥所通过让他们丢脸的办法敦促他们战斗。“告诉他们战斗，否则我就直愣愣站在小道前面。这样他们开始移动，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战斗伤亡让人担忧。“第二十二师已经有57名连级军官死去。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再催促他们……耶稣啊，我感到毫无办法。”

密支那特遣队在缓慢前进。他们翻山越岭，有时候要手脚并用，或者在泥泞的山坡上凿出脚印才行，与此同时，驮东西的驴子一半已经累死或者掉进山崖了。在途中，他们包围了一个日本人占领的村庄，并在激烈战斗后夺取了村庄。三个战斗队指挥官之一的金尼森（Kinnison）上校以及其他几名战士死于螨伤寒。两个已经用完补给的战斗队停在预先准备好的空地上，等待空投物资。亨特上校的队伍继续前进，并在5月14日发出了48小时内抵达的信号。在孟拱山谷中焦急等待的史迪威迎来了奥尔德（Old）将军，他是第十航空队负责运兵的指挥官。5月15日，24小时信号收到了。5月16日，亨特上校的队伍在一个距离密支那机场2英里之内的地方宿营，这是作为发动突然袭击的一个跳板。当时，他们担心途中与日本巡逻队的遭遇战可能已经惊动了日本驻军，但是卡钦侦察兵发现并没有出现戒备情况，而且机场的防守并不严。其实，当时守卫密支那的日军作战士兵不超过700人。

5月17日上午10点的时候，第五十师的一五〇团对机场发起进攻，而格拉哈德第一营则受命攻击伊洛瓦底河一个渡口。由于袭击达成了突然性，因而很快攻击并包围了简易机场。10点50分，史迪威从位于特遣

队指挥部的梅里尔那里接到预先的信号“进入圈内”，意思是“进入机场”。亨特上校想在最后发出信号前，先保证自己稳固占领了这个地方。收到“进入圈内”的信号后，奥尔德将军便驾驶一架侦察机在机场上空侦察，但是他回来说什么也看不到。“我们只能束手无策地等待。”史迪威写道。这一天他在自己的便携式笔记本上不断记下了自己焦虑不安的心情。等待持续了四个小时。3点30分收到了电报说“威尼斯商人！”，意思是“运输机可以降落”。史迪威在日记中只是写下“太棒了！”然后下令开始运送炮和增援部队；“第一批在4点结束……告诉他们整夜都继续运……英国佬会气死了！”

的确如此。东南亚第一个重要的日军阵地是由史迪威的特遣队攻克的，而英军甚至未能攻下实兑。对盟军最高司令来说，这是极为难堪的事。蒙巴顿一觉醒来，得知他下辖的一支部队已经到了密支那，而他甚至不知道派遣过这样的部队；不过，考虑到5月4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他的未知未觉只能归因于他的视线投向了其他的方向。蒙巴顿对未被告知此事很是愤慨，更让他不舒服的是丘吉尔严词质询；丘吉尔问为什么“美国人施展武艺就把我们的部队降落在密支那”。公关部门对这个意外不知所措，但是经过了一天半内部的紧张工作后终于拟就了一封贺信，是以蒙巴顿的名义写给史迪威的。这份材料说：“由于你的果敢指挥，加之美中军队的勇气和耐性，你对敌人实施了完全的突袭并攻占了密支那机场，从而取得了一次辉煌的成功。”跨越古蒙山脉被认为是“将载入军事史册的战例”，此外，还特意让钦迪突击队“去切断密支那与南部地区的日军交通线”，从而使得他们也能够分享这种荣誉。像魏德迈之类的世界级战略家也专程飞往泥泞不堪的林中空地，来分享这个他们宣称是不可能的时刻。

这是史迪威经历了两年无数挫折后的第一次胜利，仿佛是甘霖之于一个干渴的人，然而胜利并不彻底。立即出现了各种失误，并面临情况逆转的危险。北部战区的每个人都期望占领机场会方便援军到来，并会很快占领密支那城区。史迪威决定要把这个荣誉归于中国人；一五〇团的两个营在5月17日下午开始向城区进发，然而他们黄昏时遭到日本狙击手的袭击，结果他们陷入混乱并由于失误开始相互开火，而且他们顽固地继续互相残杀，直到被撤出。此外，美军也出现了重大失误；第十航空队指挥部运送的第一批物资是高射炮连，而不是梅里尔和亨特之前要求运送的步兵和食物。

史迪威（还带了多达12名的记者）次日早晨到达机场，此时尚未意

识到这些错误的严重后果，而期望仍然很高。专门飞来接受指挥的梅里尔迎接了史迪威。在记者的簇拥下，史迪威欢笑地跟他拥抱。可是这一天过得很糟糕。一五〇团的第二次袭击跟前一次一样陷入混乱。原来支撑梅里尔“劫掠者”行军的是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一旦占领机场就会将他们空运到利多，然而现在要求他们继续进行一场战斗。亨特匆忙召集了两个落后的战斗队，他们的空运物资有的找不到了，有的偏离了空投地点。很多人已经几天没有吃饭，很多人由于那加疮而步履蹒跚，还有些得了痢疾的人把裤子衬底去掉，这样他们战斗时就可以不受到妨碍；用梅里尔的话说他们“看上去可怜兮兮的，但是仍然很了不起”。梅里尔自己5月19日再次犯了心脏病，结果只能被运出去。

日本人从北部、东部和西部的其他驻军和哨所紧急输送援军。尽管钦迪游击队在南部阻断了他们，但是不到一周他们在密支那的援军就达3000人，而不到两周就达到了5000人。他们跟在太平洋岛屿上一样进行了自杀性防御。由于未能立即攻占密支那，结果雨季到来，各种麻烦、争吵和失误使得局势十分危急。“上帝啊，密支那怎么了？”史迪威心急如焚地这样问自己。为了向孙立人和廖耀湘继续施加压力以清除山谷从而保持道路畅通，他仍然跟北部战区部队待在一起。“下雨——如果我们无法降落飞机我们就无法运送部队……这是那种让人担心的日子，你简直都不想活了。”6月几乎不间断的都是这样的日子。即使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时候，运输机仍然设法往密支那运来士兵和供给，用在前线工作的西格拉夫的话说，他们似乎“凭着嗅觉找到了战场的路”。但是情报处严重低估了驻守日军的数目，结果，尽管有新的团增援，中国部队仍然无法战胜已经巩固防守的敌人。史迪威在一次访问后不得不承认：“格拉哈德完了！”

这些“劫掠者”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上层没有信守诺言，因此满怀怨恨，毫无斗志，对战区指挥官充满不信任和仇恨；他们已经是个被毁掉的队伍，所想的东西没有别的，只是想离开密支那，离开缅甸。病人在以每天75—100人的速度被撤出，标准是连续三天发热达102华氏度（约38.8摄氏度 ），但是这个连队的框架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盟军指挥官，史迪威觉得他不能撤出美国人，而把中国人和英国人留下继续战斗。这个时期史迪威与朗泰涅也一直争执不断，因为跟格拉哈德一样筋疲力尽只剩下残部的钦迪游击队也坚持要退出，有一次甚至放弃了一个史迪威认为至关重要的阵地。由于他拒绝让他们撤退，因此他也就不能对美国人区别对待。格拉哈德最后一批人受命阻止敌人的一次反攻，结果他们在战火中睡着了，而他们的指挥官麦克季（McGee）在指挥战斗

中曾经三次昏倒。当史迪威前来调查的时候，一个士兵后来后悔地说："他就在我步枪的瞄准器中。我本可以按一下，那谁也不会知道结果了这个狗娘养的并不是日本人。"

史迪威三次尝试过使用三名美国指挥官接替梅里尔。大部分时候是由波特纳将军负责。6月食物和供应到了最低点，因为日本迫击炮对机场的轰炸中断了运输机的飞行。有时候手上只有一天的补给。在6月初的危急时刻，日本人似乎要重新夺回机场了。史迪威叫来了指挥第三十师和五十师的胡素将军和潘裕昆将军，告诉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后退一步"。现在再失去密支将是不可忍受的。他不想再让中国人出现更多的伤亡，因此命令两个筑路工兵营上，因为根据利文沃思的原则，在紧急情况下战斗工兵可以作为步兵预备队使用。尽管这些人名义上是战斗工兵，但是这些筑路者在接受基本训练后连枪都没有摸过，因此开始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有两个接替格拉哈德的队伍刚从美国到达印度，这些士兵未经训练便被送往密支那，结果也不顶事。波特纳报告说："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怕极了日本人。"他们不按军官的命令行事，拒绝进攻，并且一交火就跑。

在中缅印战区独立支撑的史迪威看来，美国兵似乎是可靠的战斗力量。"波特纳的可怕来信。"他在日记中写道。接下来的话是他日记中最充满痛楚的："美国兵害怕。真不敢相信。"为了保持让美国人出现在战场，同时也由于他意识到中国士兵的直接战斗伤亡要远远高于美国人，他现在命令所有痊愈并可以执行战斗任务的格拉哈德队员全部重返前线。这是致命一击。据奥格本说，对五三〇七部队的所有人来说，他的名字"仿佛是针对公牛的红旗"，而在奥格本自己看来史迪威似乎"冷酷无情，没有丝毫人性"。这在格拉哈德看来并不过分，考虑到史迪威的真正品性，这只能看成是中缅印战区的另一个悲剧。第二十总医院的拉夫丁虽然对史迪威命令把那些撤出来的格拉哈德队员重新送上战场的做法不赞同，但是认为史迪威作为一名指挥官，"对自己士兵的考虑要超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名指挥将官"。在格拉哈德令人痛苦的事情过后不到四个月，史迪威又成了士兵报纸《美国佬》（*Yank* ）中"士兵最爱戴的人"，因为他在他的战区中取消了不许士兵养宠物的禁令（"不让士兵养宠物有违本性"），还禁止餐馆和咖啡馆挂"只许军官入内"的牌子，此外，还禁止军官跟应征女兵谈恋爱，这样就可以让士兵也得到机会。可惜他的经历平平常常，因此没能成为一名巴顿式的人物。

由于日军发动了新一轮很有威胁的进攻，中国的局势又在恶化。蒋

介石仍然坚信陈纳德的所谓空军可以替他赢得胜利并能够保卫空军基地的说法，因此他在6月3日“立即”把史迪威召到重庆，要求给第十四航空队更多的飞机、供给和燃料。史迪威不得不面对日渐加深的危险，他匆匆赶往陪都并在6月4日和5日待了两天，然后尽快回到缅甸那些无尽的“麻烦，麻烦，麻烦”中去了。阿姆斯将军被从昆明召来，在前线后面为工兵和格拉哈德的补充兵力组织基本训练。他们每天三班倒，每班八小时，分别是训练、战斗和睡觉，这样他们有了气色，变得坚强了。他们仍然继续占据着密支那，但是“对神经的折磨仍然在继续。我们是不是太贪心了？他们能战胜我们吗？会有突袭吗？反攻？我们的人能顶住吗？伤亡是否太重？说实话我几乎已经对此感到烦了……”

正是在这种烦恼不断的时候，蒙巴顿提到了诺尔·考沃德（Noel Coward）事件；尽管此事无关全球战略，但显然具有严重后果。考沃德当时正在在缅甸前线巡演，而蒙巴顿出于善意，想让美军一道欣赏演出。当时请求将这位音乐家以及他的表演队运到利多前线，但是史迪威拒绝了；这可能只是史迪威对此抱有偏见，或者因为史迪威认为，考沃德的才能不会受到中国和美国大兵的欣赏——不管怎样，这让蒙巴顿很没有面子。他向威勒将军抱怨说“我感觉仿佛被人打了一个耳光”，并在给史迪威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威勒建议史迪威写封信表示歉意，因此康提和沙杜祖之间为此事有了频繁的函电往来。最后考沃德终于去了利多。据说他的第一次演出反应“非常平淡”，在第二十总医院的第二场演出“本来就是为了显示对他表示欣赏的意思”。史迪威发报给萨尔坦说：“如果又有弹钢琴的上路了，你知道该怎么对付钢琴的。”

最后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事：Y军在5月11日开战，他们一步一步翻越1万英尺（3048米　）的萨尔温江的高山峡谷，并向老滇缅公路上被日军占领的龙陵进攻。这条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山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战场。这次战役既展现了中国人非凡的毅力，同时也夹杂了中国部队的各种弊端以及过于谨慎。士兵的干劲和无限的顺从及忍耐，很多军官的勇敢——这些都被上层所传递的惰性和不情愿所损耗。所有的不情愿、拖延和被动都体现在无穷尽的补充问题上。原先承诺在1944年春天前增派9.5万人；到了5月增派了2.3万人，后来补充兵员的工作就停止了。当中国远征军（这是Y军后来的称呼）参战的时候，这个部队比满编部队少了11.5万人，而在战役期间的损耗是每月5000人以上。

多恩写信给史迪威说：“他们终于干起来了。”中国远征军在经过长期拖延之后，在美国联络官和医疗队的陪同下，终于乘竹筏和橡皮艇穿

越了奔腾的萨尔温江。这条江可以渡江的两个地方水深60英尺（约18米），到处都是旋涡。萧毅肃说，中国在占领这个地方的一千年间从来未能让军队从这两个地方过江。由于出其不意，部队越过了峡谷并爬上了很冷的乌云缭绕的山峰，而日本人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到来。“部队甚至出现了热情。”多恩写信说。总指挥卫立煌将军“捶了桌子，而萧毅肃则对指挥官大喊大叫……他在尽最大努力”。但是即使卫立煌和萧毅肃也“无法激励这些人中的某些差劲的人”。他报告第一天有3.2万人过了江，此外还有几千头驮东西的马、牛、骡子以及苦力也在倾盆大雨中走上令人恐惧的陡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大群乐呵呵的人。”不管他经过哪里，“这群人就开始喊‘顶好’‘哈啰’‘Okay’以及其他在中国远征军中流行的美国化的叫法”。他们在这种条件下仍然保持快活，并且在如此艰难的山路上依然坚持不停地行军，这样的部队“只要有好的将领和装备，必然无往而不胜”。

然而结果令人气馁。中国人6月10日攻克了龙陵，但是一周后又被日军赶走；敌人所发动的顽强反攻比密支那的更加成功。中国集结部队准备再次进攻。占领龙陵对开辟从缅甸到中国的通道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在密支那攻克之后史迪威的部队就可以进来了。尽管中国远征军跟日军的数量是10：1，但是过了两个月后才重新夺取了龙陵。

蒋介石对密支那的攻势印象深刻，因此放松了对驻缅军的辖治。孙立人突然奋发前进，率军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战斗，在6月16日夺取了卡迈。史迪威第一次这样写道：“睡了午觉……我需要睡觉……我们正在成功，持续而缓慢地。”十天后，在史迪威的拼命敦促下，钦迪突击队第七十七旅残部在南部同时发起进攻，结果孟拱被攻占，这再次爆发了相互争功的公关战。

最终，北部战区部队占据了位于伊洛瓦谷地门户处的铁路。日军第十八师团伤亡达50%，最后只剩下受到重创的3000人，加上其他师团补充的2000人，他们成功地退到了曼德勒。除了孟拱和密支那之间的一小段之外，缅北直到伊洛瓦底江的地方都被收复，而利多公路则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往前延伸。还需要消除北部战区和中国远征军之间的最后的一段空隙，这取决于进攻的态势是否能够保持下去。

密支那的消耗战逐渐削弱了日军的防御，最终盟军控制的地方增加了。到4月底时，科希马已经解了围，而英帕尔和迪马普尔路之间的交通也已经恢复，这意味着日军在印度边境上的冒险失败了——尽管战斗仍然在继续。牟田口中将的部队落在了丛林小道末端上，没有补给，而

大雨仍然倾盆而下。他们在因饥饿和疾病死去时仍然继续战斗。到了6月底，在雨水浸泡和散乱中，敌人的疯狂进攻瓦解了。当7月中旬下令退却的时候，日军包括伤病人员的伤亡率达到85%—90%，原先15.5万人中死亡的达6.5万人。1942年难民正是沿着这些道路撤退时倒毙的，现在这些人的尸体上又覆盖了他们征服者的腐败尸体。在阴影笼罩下的缅甸高地上，战争之潮忽涨忽落，仿佛对人事毫无知觉。

在中国，日军的进攻很强劲：过去曾经三次顶住了进攻的长沙在6月18日未经战斗就被放弃；美国第一批空军基地所在的衡阳处于围困之中。华盛顿感到了恐慌。7月2日，史迪威接到“乔治（英王 ）的电报”，电报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建议。史迪威的新任务就要开始了。

---

[1] 凸地战役，1944年12月德军向比利时一个突出地带发起的进攻，后被击退。——译者注

[2] 《美女与贵族》（*Iolanthe* ，1882），英国歌剧，剧作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S. Gilbert）和作曲家阿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创作。——译者注

[3] 第一批通过滇缅公路全程的车队在1945年1月28日进入中国，这距离魏德迈做出这番预测的时间正好一年还差三天。

[4] 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将军、政治家，曾带领英军征服印度，创建了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由于要追究其贪污和抢劫罪行，他于1774年自杀身亡。——译者注

[5] 莫菲(Mayfair），伦敦富人住宅区，在海德公园以东。——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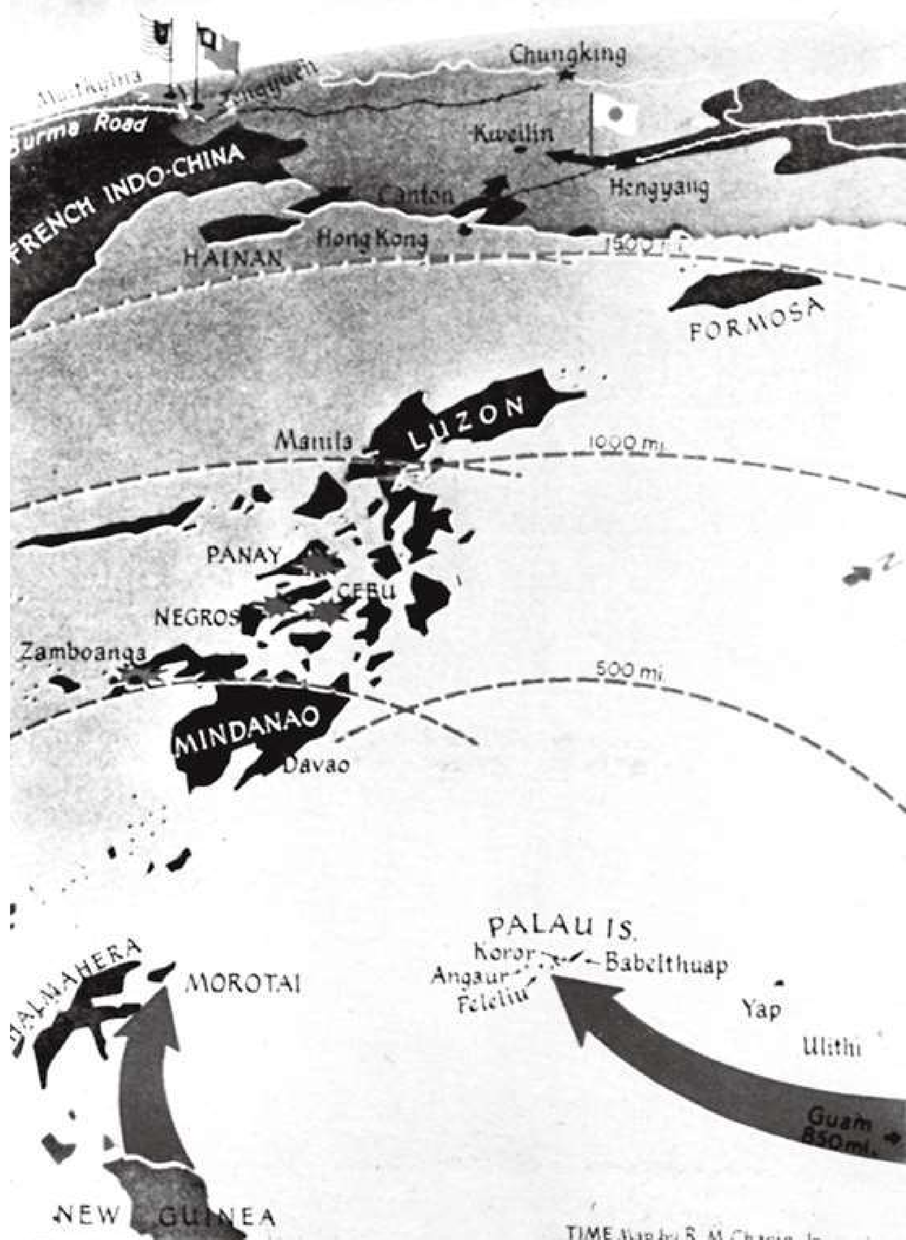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整个亚洲的命运岌岌可危”

1944年6月—9月

史迪威在缅甸的几个月中，中国国内由于经济上的瘫痪、日本的再次进攻以及日益增加的不团结和不满情绪，局势极度恶化。由于对当局不满，去年12月在蒋介石于开罗参加会议的时候，一群青年军官阴谋政变，不是要除掉蒋介石，而是要除去何应钦、戴笠、孔祥熙、陈氏兄弟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腐败无能的军政要员。政变在发动前就被戴笠的特务所发现，这次少壮派政变据说涉及了200—600名军官，并有16名将军被处决。蒋介石的视野被局限在自己所信任的几个人的狭小圈子里，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孔祥熙和何应钦，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这些政变者所表达的不满。

从1月到6月，在昆明、桂林、西安和兰州，这里的美国驻华官员报告说到处都显示出衰败和不和的迹象。他们感到担心的是，中国的士气日渐低落。官员史无前例地腐化，部队无能，政府只是在慢性自杀，中国当局认为只有积极准备对共产党发动进攻才使他们苟延残喘。由于受到长期战争和占领的压力，统一的纽带断裂了，而军阀分裂的局面又出现了。两广的分裂再次出现，两位早期的国民党元老余汉谋和张发奎本来就摇摆不定。据说四川和云南的地方派系准备一旦重庆的政府崩溃，就跟两广的政府结盟。在鱼米之乡的湖南，第九战区司令薛岳的司令部开始公开表达不满情绪。成都各派公开叫嚣要根据民主原则改组中央政府。据领事的一份报告说，云南谴责政府是“一个完全失去民众支持的集团”。报告说，在北方，那些过去曾经骚动的军阀又开始蠢蠢欲动，其中包括“模范督军”阎锡山——史迪威曾经在1921年为他修了第一条公路。



《地平线：中国》，摘自《时代》杂志，1944年9月

驻华人员的报告一致表示悲观。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以不到生产成本三分之一的价格强行购买商品，结果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广西每8个矿就有7个关闭，而重庆每18个铸铁厂就有14个倒闭。政府没有做出

任何努力去组建一个可行的运输体系以保证供给，或者去调节税收：由于腐败无能，现在交给中央政府的税收只占到征收款的不到三分之一。强制兵役仍然是农民的沉重负担；果树和牲畜被没收，而强制缴纳粮食使得无穷无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税收又增添了一种。一些走散的士兵由于饥饿或病重无法跟上自己的部队，但是又离家太远得不到接济，他们只能在路边弯着腰，在无言的痛苦中拿着碗乞讨。那些被强制征募来修建机场的劳工在武装卫兵的监督下劳动。他们很少得到报酬，而且只有家在附近的人才有人给他们送来吃的，很多人都是来自裁军以前各省的部队；他们吃的东西很少，很多人因此饿死。由于经济上病入膏肓，官员们通过各种无法想象的手段巧取豪夺，中饱私囊。一个美国上尉在重庆待了半年以后这样说："我真想休假一年，离开部队，在这个国家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

外国记者也有同感，他们不断地跟审查机构发生争执。4月份的时候他们共同向蒋介石表示抗议，声称中国新闻检查机构只许他们发表对中国理想化的报道，而不许他们发出任何对政府暗含批评，披露"中国经济形势严重性"，或者通过任何方式对"中国部队的指挥、状况或者使用"提出质疑的报道；因此除非放松这种政策，否则他们无法像一个有责任感的记者那样工作。蒋介石的答复是，只要这些报道不是对中国抗日进行诋毁的，那就可以给予充分考虑。

在重庆，尽管有官方的镇压，但是不满情绪还是日益表面化。前四川省主席、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一本大胆抗议政府独裁的小册子。宋庆龄一直是自己家人的政治对手，现在更是公开提出批评，甚至连那些官方许可的报纸也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在昆明，这种呼声也很高；墙壁上出现了反对口号，而学生则举着标语、拿着请愿书进行游行和示威。在此过程中，蒋介石的无动于衷让人困惑。他在中央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未能采取任何改革措施；根据高思大使6月8日的报告，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大使警告说，自此以后政治动乱浪潮只能波涛汹涌了。

在此情况下，日本人发动的代号为"越后"的攻势继续给中国的局势造成危害。此时的战争已经对日本不利了。它的西方敌人正在通过太平洋毫不留情地挺进。这个攻击珍珠港并占领了从奉天到新加坡之间大量土地的傲慢帝国，正在遭遇他们这种人无法避免的命运。日本已经贪多勿得，不过，尽管其边缘正在崩溃，但是它并不打算放弃中国。"越后"行动的目标就是借助连通从天津到广州的交通线，通过清除美国的空

军基地来加强日本在大陆的地位。间接地说，这也是日军试图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最后努力。

在4月开始的第一阶段攻势是从黄河向迄今日本尚未占领的京汉铁路的一段间隙发起进攻。根据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情报说，尽管在河南的34个师包括了中国军队中一些所谓的精锐部队，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计划或者有能力阻止日军的前进”。他们面对敌人便四处逃散，结果河南陷入混乱，这些散兵游勇四处到人家里抢劫，甚至连做饭的锅子都不放过；夺取了武器的农民也变成了强盗，就像1927年时的红枪会一样。在这种崩溃的状况下，邻近的山西省的共产党部队开始渗透。美国大使馆派驻西安的一位观察员说，当地老百姓认为，一旦赶走日本人，那么共产党就会控制此地，还说：“如果他们的预言是正确的，那么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越后”进攻的第二阶段是从汉口向第十四航空队在华东的一系列空军基地发起进攻；这次6月开始的进攻似乎完全可能重复他们之前取得的成功。中国的总参谋部并没有就机场和联系这些机场的中心城市防御拟就任何计划。当生产稻谷的湖南省省会长沙在6月18日陷落的时候，之前由于河南的浩劫而对政府的失职表示不满的言论传到了南方。除了军事方面外，国内的前景也令人不安：粮食储备减少，贸易中断，大量难民涌入非占领区，自由中国的面积缩小导致征募和税收增加。美国的一份报告总结说这意味着人心涣散，中央政府被削弱，相应增强了各省派系势力，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将继续下去。简单地说，中央政府还能够支撑多久？报告的作者谢伟思认为，政府还能够支撑一段时间，但是它会越来越虚弱，长远看来，它迟早会崩溃。

谢伟思属于那一群在中国出生的使馆人员，埃里克·塞沃瑞德曾说：“这是我在驻外美国使团的年轻外交官中所看到的最有能力的一批人。他们在中国是消息最为灵通的。”跟其他两位二等秘书雷蒙·拉顿（Raymond Ludden）和约翰·爱默森（John Emmerson）一道，谢伟思最近被任命为史迪威驻重庆总部的政治顾问，这让美国大使很不高兴。

日本进攻华南所造成的危机导致了陈纳德——史迪威纠纷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阶段，这也引起陈纳德及其追随者在战后仍然对史迪威耿耿于怀，大肆攻击。当时在人们心目中，陈纳德空军的有效性要比其历史地位高得多，而且当时是各种态度和决定的关键因素。

由于第十四航空队对日军供应线进行了持续的和破坏性的进攻，航空队妨碍了日军进攻，但是没有能够阻止他们。由于显然无法仅凭飞行

员就阻止敌人向空军基地发动进攻，因此陈纳德反复缠着史迪威，要求提供更多的飞机、供应和燃料，甚至要求得到供地面部队防御用的武器。他宣称自己的物资“根本不够用”，并坚持要求得到1万吨物资。史迪威认为这种鼓噪是为了“逃避无法兑现承诺的后果”。陈纳德曾经向蒋介石承诺，如果第十四航空队能够得到有效支持，那么它就能够阻止日本人的前进；然而它现在发现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陈纳德“是在寻找退路，办法是再多给一些支持，他就能够阻止日军，但是我们是不可能再给他支持了”。向他提供额外的物资只能挪用原来拨给B-29轰炸机的物资，而史迪威认为由于地面过于虚弱，提供额外的物资也只能白白浪费掉。正如他在“三叉戟”会议上说的，为虚弱不堪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保护是没有价值的。

正是由于此次争执，史迪威在6月4日被委员长从缅甸叫过去。由于蒋介石施加了极大压力，最后史迪威同意在陆军部批准的情况下，可以从B-29那里挪用1500吨物资，这样就可以使陈纳德的物资达到1万吨。马歇尔拒绝了。他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为陈纳德发动空中战斗所提供的巨大支持是不值得的；由于驼峰航线占用了大量的运输机，欧洲的胜利因此被延迟，这让马歇尔很恼火。史汀生曾经抱怨说：“它把我们的运输机掏空了。”6月6日，也就是在马歇尔回复史迪威的前一天，盟军攻下了罗马，同时在诺曼底登陆。马歇尔认为，如果中国战区当时那些运输机被用于欧洲战场的话，那么在意大利和法国的进展就会更加迅速。

另外，当时的军事思想非常倾向于对敌人的工业设施进行远距离战略轰炸。马歇尔在拒绝把远距离轰炸机的物资挪给陈纳德的电报中说，绝不能妨碍通过B-29对日本发动袭击。他宣称，长远看来，这比把物资转给陈纳德对中国的帮助更大。他还专门针对蒋介石说，欧洲的经验证明了“纯粹的空中抵抗”对于地面进攻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正如在罗马斗兽场中皇帝把拇指朝下指一样，马歇尔的回答表明，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拒绝了陈纳德的要求。这种拒绝方式的缺陷是，陈纳德及其支持者并不知道事情的原委，结果他们一致迁怒于史迪威。史迪威自然对此明白无误。他给马歇尔回复说：“指令明白。正是我所期望的。”史迪威似乎对华东的命运无动于衷，这主要是因为，他相信日本人最终会由于供给问题而自行停下；此外，这时再拯救敌人进攻路线上的第一批机场已经为时太晚。他的计划是，在他成功地重新开通滇缅公路之后，把Y师和北部战区部队调入中国西南部，然后跟Z师和他仍然期望得到的一支美国陆军一道，通过集结一支25万人的军队，他将开辟一条

通到沿海的道路，并夺取一个港口。

要通过美国媒体的善意编造继续掩饰中国的状况，已经不可能了。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文章开始出现，甚至亨利·卢斯的出版物也试图解释这种糟糕局势，承认中国的弊端和低效，同时把这些归咎于美国未能尽到责任打破对中国的封锁。《生活》杂志在5月1日发表了白修德的一篇文笔犀利的文章，文章把国民党描述为“融合了塔莫尼厅 [1] 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最坏的特征的腐败政治集团”，并宣称，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持续恶化”，这使得未来跟共产党内战的结局变得难以预料。略显怪异的结论（很可能是出自美国编辑之手）则是，美国有“义务”支持这个反民主并且正在节节失利的政府，而且“现在支持的规模和力度要远远超过过去两年”。

一些人对这是否可以解决问题持怀疑态度；比如美国军事情报部的格雷厄姆·佩克（Graham Peck）认为，美国的无条件援助只会激励国民党更加具有依赖性而不是自强，因此这种援助可能只是“延长死亡之吻”而已。

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努力摆脱其统治的弊端，但是每一次改革或者革命的努力总是蜕变为压迫和腐败，就仿佛在魔力的影响下王子又被变回一只蟾蜍一样。中国的乱政与其说是由于专制，倒不如说是由于无效的统治。如果说权力会造成腐败，那么权力式微就会造成更多的腐败，因为这需要不断的政治交易、贿赂以及不妥协。1944年6月，三十年来一直在观察这种过程的高思大使疲惫地意识到了美国试图促成这些变化的局限性。他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我只能承认，我想不出我们还能再做些什么。”

无所作为的建议不是美国精神所欢迎的。据信美国可能发挥作用的是推动、说服或者强迫中国将其全部现有军事力量都用于对日，并且为了达成此目的，应当弥合与共产党的分歧，这种分歧现在使国民党无从发挥其战斗力。高思大使受命于6月15日向蒋介石表明了这种看法。他奉命敦促蒋介石跟共产党达成协议，这样就可以结束对共产党的防范，并使双方都可以将军事力量投入对日作战。至于中国最近请求增加援助或者在战争结束后继续实施《租借法案》，高思告诉蒋介石说，由于美国在欧洲的义务，目前无法增加援助。高思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

蒋介石有依赖性，但是并不顺从。他和他的同伙们不相信美国会冒险撤销对他的支持。然而，美国国务院在5月向美国军官散发的一份政策建议的文件中表明，美国“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支持国民党政

府”。如果授权高思向蒋介石转达这种意思的话，这种令人吃惊的突然萌生的独立态度本来可能会产生影响的，但是没有迹象表明高思得到过这种授权。宋家的游说和关系，教会团体以及救援中国组织的影响，此外还有中国国防物资公司（这是后来为中国游说的核心）的分支机构以及政府内部的惰性，都倾向于维系这种联系。就像美国国务院5月的政策建议那样，美国偶尔在中国的网中挣扎了一番，但是并没有挣脱掉。

1944年，美国对重庆的被动日益不耐烦，因此在军事上开始关注共产党的战斗潜力。据报告，在山东、河北、山西和苏北，共产党正在积极对敌进行游击战，但是由于派驻重庆的外国人不许访问隔离线以北的地区，因此对此并无直接证据。他们稳固驻扎于华北一个对最后打败日军至关重要的地方。除了东北之外，这是日军和日本工业在中国大陆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且一旦苏联在远东参战，这也是跟苏联作战区域相邻的地方。

自1937年以来，经过“长征”后余下的共产党部队到达延安，并在相当于日本国土大小的地方建立统治。在过去的七年中，据估计，共产党控制下的领土从3.5万平方英里（约9万平方千米 ）增加到了15.5万平方英里（约40万平方千米 ），人口从150万增加到了5400万，而武装力量则从10万人增加到了47.5万人。在苏北、湖北、广州周围以及海南岛的日军占领区均有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他们往往渗透进日军推进后未能进行适当驻防的敌后区。他们带来有效的政治和军事组织结构，提出减轻赋税并废除参与傀儡政权的地主的地租，结果这使共产党获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农民由于不再受到盘剥和拉壮丁之苦，他们第一次觉得他们缴纳税赋是有所得的。随着共产党根据地的扩大，跟中央政府相比而言他们的地位加强了，信心也增加了，国民党在河南遭到溃败后其虚弱已经完全暴露，这更使共产党信心倍增。

美国既想避免由于内战而使中国分裂，也想让共产党配合对日作战。内战不但会摧毁任何保持稳定中国（这是未来和平的基础）的希望，而且可能导致美苏冲突。出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看来必须让敌对双方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共产党和国民党表面上都支持建立联合政府的想法，并在1943年开始就政治解决进行谈判；这很可能不是真的相信联合政府，而是谁都不想看上去把打内战作为自己的政策。美国对联合政府的希望是基于一种普遍的想法，那就是认为共产党的目标并不是想统治整个中国，而是希望跟重庆达成政治解决办法，从而可以一致对日。



毛泽东与外国记者合影，前排右二爱泼斯坦，左二白修德

美国持有这种看法的另外一个动机是，共产党更加富于活力，因此可能赢得内战。美国的战争目标并不想让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来统治中国，因此，看来有必要在苏联上场之前先建立联合政府。对此更加担心的是蒋介石。据报道，他正在撤出河南的部队以加强对共产党的封锁，并想赶在盟军仍然忙于欧战、苏联还未能向远东进发或者美军在中国登陆前对共产党发起进攻。

外国媒体以及美国政府几个月来一直要求重庆政府允许他们访问共产党地区。1943年11月，在向媒体承诺后紧接着的是半年的推诿，直到由三名记者组成的代表团 [2] （代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出版物）最终得以在5月成行。华盛顿试图派遣军事观察团，这个请求得到有礼貌的批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照办。

1943年6月，戴维斯在给史迪威的一份报告中首先提议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戴维斯指出了这个地方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以及此地与未来苏联进入的关系，并指出，唯一曾经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美国观察员是1938年访问过的卡尔森上尉。戴维斯和总参谋部的廷伯曼将军（原为第十五步兵团的，现隶属中缅印战区驻重庆总部）向马歇尔说明了派遣观察员的重要性，而戴维斯1944年1月的第二份报告送交了白宫的霍普金斯。2月，罗斯福正式请求蒋介石允许军事观察员“立即”前往山西和

陕西，同时他委婉地没有把这些地方称作共产党的。蒋介石很有风度地同意“促成”使团成行，同时他强调，他们自然只能访问那些处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的地方。

由于有了他的许可，中缅印战区开始组织这个参观活动，与此同时，也并不在乎所施加的限制，因为限制使得参观毫无意义。为了保证观察员可以不受中央政府的摆布，史迪威特意寻找那些懂中文并了解中国的人参加。他任命包瑞德上校为团长，谢伟思担任他的政治助手。据说包瑞德是美国驻华人员中唯一可以用中文给中国人讲笑话的人。

史迪威自己对此事也很感兴趣，这自然是因为他期望跟他所认为的一支富于活力和主动性的部队结合。共产党让他想起了虽然规模有限但还是让人吃惊的平型关大捷；跟其他人一样，从此以后他就对富有成效并勇于进取的游击战印象深刻。共产党军队的总参谋长叶剑英及其同僚在1938年曾经给史迪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外，史迪威一直没有忘记缅甸失败后周恩来捎给他的话：“我愿意跟史迪威将军干，我愿意服从他。”当他跟国民党军事体系斗争并面临种种挫折的时候，这句话在他头脑中的意义被夸大了。他甚至一度试图用共产党部队补充亟待补充的Y军，准备采取每100人的一个连补充20名共产党士兵的方法。多恩在就此时与Y军总参谋长萧毅肃商量后放弃了这种想法；萧说有了20%，不出两周整个连队就都会变成共产党。此时史迪威知道只要蒋介石在，就永远不可能对部队进行改革并使之具有战斗力，而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更迫切地想与远方那些未曾谋面的共产党地区的战士进行接触。至于眼下所需要的则是第一手资料。

军事观察团的代号为迪克西（代表反叛方，取自歌曲《他们说的有关迪克西的事是真的吗》），他们准备3月出发，但是蒋介石继续拖延。罗斯福总统在4月再次请求，但仍然没有成功，这样这件事就转到了另一名特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副总统的手中了。

如果说华莱士的使团有目的的话，那就是为了说服蒋介石跟共产党谈判。其政府的一个特点是，越重要的问题它越倾向于不交由那些熟谙此类问题的人解决。对中国甚为担忧的罗斯福总统四处寻找解决办法，很想有所作为却又无从下手，因此再次采用了派私人特使的办法。在罗斯福这样的人看来，只要他能亲自出马，那么他就能解决问题；退而求其次，有人替他去也很不错，而副总统自然是最佳人选了。

实际上，选择华莱士去更多的是有关国内政治而不是中国。正在寻求第四届连任的罗斯福知道，7月份的民主党大会代表们会对四处树敌

的华莱士心存顾虑。总统很想避免导致民主党内部分裂的争斗。他牢记了伍德罗·威尔逊的教训，想加强国会对他的支持，这就可以最终创建联合国；他认为建立联合国是未来的重任。他正想踢开华莱士，这样他就可以找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竞选伙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本能反应是让华莱士不要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因此就有了派华莱士去中国的使命。中缅印战区得知华莱士要来的时候，他们请求授权让华莱士“坚持”要求蒋介石批准让军事观察团视察共产党地区。事后证明，这是华莱士在中国的八天访问的唯一成就。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结果便是再次建议撤换史迪威。



华莱士抵达重庆

蒋介石在6月21日到24日与华莱士所做的四次长谈中，驳斥了共产党是“农民民主派”这种流行的看法，并认为他们肯定想夺取中国的政权，而且实际上“比苏联共产党更加像共产党”。当谈到允许军事观察团访问延安的时候，他先是拒绝了，但是令人惊奇的是第二天他又同意了，也许希望从罗斯福那里也能得到相应的好处。蒋介石早就想摆脱史迪威和高思这两位他不抱有幻想同时又掌控他与美国的联系通道的人；但是由于他在摆脱史迪威一事上一直未能成功，所以他这次没有直接要

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而是要总统派遣一位私人特使来，这样他就可以无须经过国务院或者陆军部而直接跟白宫联系了。重新得宠的宋子文担当翻译；他生动讲述了史迪威未能满足第十四航空队的需要，并说他“不相信史迪威将军的判断”。尽管华莱士并不同意蒋委员长的看法，但是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正如他后来说的：“我被陷入危急的这个人的呐喊深深打动了。”

陈纳德极力加强了华莱士的这种印象。陈纳德在重庆欢迎他，还把艾尔索普中士派去做他的“空军助手”。之后，他们又在昆明接待了华莱士。陈纳德和艾尔索普还不知道自己得意的时候已经结束了，还坚信只要他们能摆脱史迪威，在中国发动空战就会占上风。宋子文成了他们的富有说服力的盟友；自从他上次的企图失败之后，他想挤掉史迪威的兴致更高了。有了他们的活动，华莱士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认为史迪威必须走。尽管他想让陈纳德接替他，但是有人向他建议说，魏德迈是个更加现实的候选人。高思在被问及时也表示，委员长已经无法跟史迪威有效合作了。

高思的意见当然是对的。其实，即便没有陈纳德和宋子文所提出的那些令人生疑的理由，史迪威也应该被撤回，因为他的使命是调动中国抗战，但是蒋介石不情愿让这种力量调动起来。这种“我们不行”跟第十五步兵团的“能干”口号是背道而驰的——这无论是史迪威还是马歇尔或者是他们的大多数同胞都是不愿承认的。

在后来艾尔索普宣称是由他起草的电文中，华莱士强烈建议美国总统接受蒋介石的请求，“派遣私人代表作为你跟他之间的联络人员”。此外，或者说作为上面的替换方案，他建议由一位可以赢得蒋介石信任、级别更高的诸如魏德迈那样的将军担任史迪威的职位；蒋介石曾经“直率”地说史迪威将军不能得到他的信任。电报接着转达了中国对所有来访美国人都要说的话，那就是“只要有合适的人做这件事，那么是可以引导委员长进行政府改革的”。电报说蒋介石渴望得到援助，“甚至是指导”，而且“如果用明智的方式向他提及的话，他甚至会同意进行相对激进的变革”。

华莱士没有费神去征求这个他建议撤换掉的战区司令的看法，而史迪威也没有费神去向他表明自己的看法。他正在忙于守住密支那并攻取孟拱的激战中，因此拒绝离开缅甸。他派戴维斯和琼斯代表他，并邀请华莱士到孟拱山谷跟他会面，但是华莱士没有接受这个邀请。

就华莱士有关史迪威的提议而言，马歇尔自然会对之加以阻截；马

歇尔很清楚这些提议源自何处，并对史汀生说这都是艾尔索普“经常放的毒”。而且那些游说华莱士的人并不了解的是，正当他们想把史迪威挤出中国的时候，英国正在施加更大的压力，想把史迪威从东南亚战区赶回到中国去。

在回去后写的另一份报告中，华莱士敦促美国对委员长尽可能施加各种影响，迫使他采取进步政策，以获得民众支持，并为中国的抗战注入新的活力。

这样的呼吁是发自中国的报告中不断出现的。在美国势力比较强大的昆明，中国的自由派要求总领事威廉·朗顿（William Langdon）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以扩大其政治基础；他们说，如果不这样的话，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适足以加强一个反动的政府而已。透过朗顿不偏不倚的官方报告可以听到他们那绝望的声音：蒋介石及其小集团“无法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也没有进行战后重建的“合理计划”。蒋介石本人的能力和视野都很有限，中国的未来“在他的领导下一片黑暗”。朗顿的结论跟史迪威的一样激进，认为不改变上层的话什么也帮不了中国。他写道：“只有蒋介石的死亡或者成功的革命才可能扭转当前的局势。”

只要美国的政策仍然无法摆脱当政者，那么朗顿对形势的表述就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正如一名外交官后来作证时说的，当“我们跟一个正在失去权力的政府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该怎么办？这是个关键。高思无望地耸耸肩说：“我想不出什么办法……”对此难道还有什么办法吗？谢伟思在提交华莱士的一份文件中认为，解决办法就在于扩大美国的选择余地，不但要支持中国的自由分子，而且不要无条件地支持中国这个在任何自由选举中都会被80%的选民抛弃的政府。他认为，如果美国的政策没有替代方案，那么这种政策就是“被动的、短视的权宜之计”。



物资与公路

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关心的不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赢得战争。他们解决中国危机的提议跟华莱士提出的恰恰相反：不是中止而是加强史迪威在中国的权威——简单地说就是让他指挥中国军队。

“越后”行动的成功是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这不是因为美军即将失去华东的空军基地。6月15日，美军进攻可以直接对日本进行轰炸的马里亚纳的塞班岛，此时的战略重心明确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在经过三周的激战后美军占领了这个岛屿，并开始为B-29轰炸机修建机场。这降低了利用中国作为空军基地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由于日军“越后”行动的成功以及中国军队面临进攻的被动表现，这引起了一种担忧，那就是，即使日本本土被征服，那么日本军队仍然可能立足中国大陆继续战斗，这可能使战争延迟数年才能最后将日军击败。这样苏联参战将更显重要，并将使苏联在东北有更多的机会，而这并不是一种让人高兴的前景。更让华盛顿不高兴的是，可能在欧洲胜利后还要把美国士兵运到亚洲，这会引起美国公众的不满。史迪威要求派遣美国师的一个依据便是日本可能延长战争；他争辩说，如果绕过中国，那么中国大陆的日军将不会投降，而中国人自身将无力对付他们。

参谋长联席会议解决中国软弱无力的办法便是让史迪威代替美军出面。因此出台了这样一种计划，那就是让他负责指挥中国军队，授权他激励中国军队并指挥其作战。此外，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满足英国人要把他从东南亚战区撤到中国的请求。英国的请求现在已经上升为正式要求了。马歇尔在6月访问伦敦的时候，英国的艾伦·布鲁克爵士告诉他说，必须撤销史迪威作为蒙巴顿副手的职务，因为他跟英军的三军将领都无法相处。其他原因还包括他对待钦迪突击队的态度和自由发表憎恶英国佬的言论 [3] 。马歇尔勃然大怒地说："布鲁克，你们在印度有三位总司令，他们谁都不肯打仗。我们有个肯打仗的人，可是你却想把他调走。这算什么鬼事？"虽然布鲁克对这种消极态度也很恼火，但是他指出，在蒙巴顿要求下这三名总司令都在被撤出，这使得马歇尔无话可说。

由于中国的局势需要人，而英国不想要人，这就有了共同解决办法，而马歇尔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个想法最初是史迪威在开罗时曾经跟马歇尔谈过的，是个具有协调权力的"战区总参谋长"。为了跟增加的指挥权相称，马歇尔提议把史迪威提升为四星上将。6月30日，陆军部起草了一份很有说服力的声明，阐述了晋升和设立这个新的指挥职务的原因，指出史迪威"在缅甸造就了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部队"，为此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其中包括其盟友的冷淡，而密支那进攻"是在历史上堪称辉煌的战役"。

到这时为止，中国已经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在对日作战方面缺乏兴趣。为什么陆军部认为可以改变蒋介石的既有意图并能设法让他有出色表现呢？答案之一便是美国军方的自信。在中缅印战区尽管有各种困苦，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利多公路，驼峰航线，输油管，以及重返缅甸北部这种"不可能"的任务。难道委员长还会变得更加顽固吗？似乎只要向蒋介石施加足够的压力，美国人想叫他做什么，他就能做什么。此外，由于驼峰航线运力大增，即将开通的输油管和滇缅公路将会更多地将现在运力大增的阿萨姆邦——孟加拉铁路的物资运到中国，目前在后勤方面的手段大为加强了。而且他们认为就蒋介石目前的状况而言，他抵制美国压力的能力已经大大减少了。不管怎么样，相对史迪威晋升的另外一种做法便是把他撤出并向他的对立者妥协，而马歇尔长期以来一直坚决拒绝这样做。他在7月1日向史迪威提出此事时并未提及晋升的事，以避免让这影响他的决定。

马歇尔问史迪威，一旦攻取了密支那，史迪威是否认为值得将其主

要努力转向对中国本土部队的“整顿和实质性的指导”？他委婉地告诉史迪威，英国正在要求“调整指挥关系”。他承认史迪威已经经历了够多的麻烦事，这些事“对你所造成的烦扰我认为是现代任何一位指挥官都未曾经历过的”。他很清楚自己并不是在提供什么奖励，因此他最后说：“不要让今天的潮湿和困难最后促成一次爆发。”

史迪威的回答并不是简单的“派我去哪我就去哪”。假如他对个人挑战委员长跃跃欲试的话，那么这种想法也被他奉命去挽救的这种艰难局势的现实压倒了。他用最悲观、最明白无误的语言向马歇尔表达了这种意思：

> ……如果总统向他（蒋介石）发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强调我们在中国的投入以及对中国的兴趣，同时指出由于忽视军队从而使中国陷入的严重困境，并坚持重病需要猛药医，那么委员长可能被迫给我一份指挥工作。我认为中国军队会接受我的。何应钦必须让出总参谋长的位子，或者让他保留头衔，但要交出实权。如果没有对军队的绝对权威，我是不敢尝试这个工作的。即使拥有绝对权威，由于目前军队已经元气大伤，我认为要补救也只有一线希望，这就是从山西发动反攻……共产党也应当参与山西反攻，但是，除非委员长跟他们达成协议，否则他们是不会参加反攻的。两年前他们提出跟我一道战斗。他们也许现在会听我的……除了这种尝试外，我看不出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局势……总而言之，尚有一线希望可以在中国抢救出一些东西，但是必须雷厉风行，而且委员长也必须赋予一位指挥官以全部权力……胜算肯定不大，但是眼下我看不出有其他办法。

这肯定算不上是欣然接受，但是马歇尔没有给他什么回旋余地。在24小时之内他就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向总统提交了他的提议，建议晋升史迪威，任命他指挥中国军队，同时还有准备向蒋介石通告此事的电文；电文采纳了史迪威的很多建议，甚至原文引用了他的一些说法。为了使罗斯福没有拒绝的余地，他在提议的最前面措辞严厉地总结了“三叉戟”会议以来的结果，很不客气地提请这位总司令（蒋介石　）注意，为了向陈纳德提供补给而在运输方面所花费的巨大努力，被证明“是个滥指挥而且很可能完全无用的举动”，与此同时，史迪威的预言一直是正确的——他预言第十四航空队的有效攻击只能激起日军对空军基地的反扑，而且对这些基地来说，必要的防御只能通过加强地面部队的战斗力

才行。

对罗斯福来说，这个提议意味着他要在如何对待委员长的观点上来个大转变，但是在开罗会议之后他做出这种转变来得容易了。他被中国的问题弄迷糊了，而且被马歇尔逼得没有了退路，因此他完全接受了这个提议。他是个实用主义者，现在他愿意试一试史迪威，正像他当初试陈纳德一样。无从知道他是否认为蒋介石会同意这种做法。委员长老是叫嚷自己太虚弱，也许这意味着蒋现在无法再拒绝了；不管怎样，罗斯福已经意识到，在军事上不能对蒋介石抱有什么希望了。他几天前曾经对孔祥熙说："我现在想搞清楚的是，中国军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进行战斗，因为日本人似乎想把他们往哪里赶，就能把他们往哪里赶。"因为他和总参谋部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史迪威了。作为美国在战时在中国所做出的努力的一个高潮，让一个美国指挥官统率中国军队的提议表明了美国对自己的影响力深信不疑，同时也部分说明了这是孤注一掷。

史迪威想要的那封"措辞严厉的电文"是陆军部起草的原稿，并未经任何改动便由总统签了名。这封电报于7月6日送交了委员长：

> ……我认为目前的局势需要授权一个人协调盟国在中国的军事资源，包括共产党部队。
>
> 我认为我完全能够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感受，然而……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任何其他人有能力、力量和决心来消除现在正危及中国和我们抗日总体计划的灾难。我正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将史迪威调出缅甸并直接由你指挥，让他统辖全部中美部队，并赋予他全部的责任和权威去协调和指挥为阻止日军前进而必须展开的战役。我感到中国情况极其危急，若不立即采用猛烈和适当的疗法，那么我们的共同事业将面临严重挫折。
>
> ……我向你保证，我无意在有关中国事务方面对你发号施令；然而，整个亚洲的命运岌岌可危，同时美国在那个地区所做的巨大努力也可能付之东流。因此，我有理由对此事深表关注。
>
> 请记住，意大利、法国和太平洋的战斗已经明确表明，仅靠空军无法阻止一个顽固的敌人。

总统的电文没有试图照顾委员长的感情，也没有避免使用让中国人反感的直来直去的字眼。这悍然违背了蒋介石那些尽人皆知的政策：要

求对一个他曾经多次设法撵走的美国人赋予在中国政体中行事的权力；这抛弃了蒋介石以及陈纳德所迷信的空军制胜论，而罗斯福去年还曾竭力对此予以支持；此外，还明确建议将蒋介石所惧怕的内部敌人共产党纳入美国援助的范围内。这份电报语气粗暴，内容上侵犯了主权；这否定了罗斯福将中国视为大国的想法，相反却接受了史迪威的看法，即认为蒋介石无力处理他的国家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这等于暗中同意了管他叫“花生米”。

有了宋子文的先例，由于担心在传送电文过程中口气会被软化，罗斯福的电报由重庆的高级军官菲利斯将军亲自交给蒋介石，并由谢伟思充当他的翻译。这个在最后的冲突中颇为重要的程序是总统在5月份要求施行的，当时注意到蒋介石对罗斯福敦促Y军采取行动的电报的回复跟原文不符。

马歇尔现在已经告诉史迪威有关他的晋升以及总统电报的内容，此外还严肃告诫他不要再触怒委员长。

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电报的感受如何，现在已经无从考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史迪威未曾有过失误，也未曾冒犯过他，即使史迪威有天使那样的说服力、圣人那样的脾气、日本艺伎那样的魅力，蒋介石仍然不会把自己的部队交给史迪威指挥，这正如他不会把部队交给毛泽东一样。宋子文给霍普金斯发报说：“今天华盛顿又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陆军部想把史迪威将军强加给他（蒋介石）……我个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此事而言，委员长不会也不可能妥协。” [4]

然而，考虑到还要依靠美国援助，蒋介石只能谨慎行事。他的答复很温和，甚至是恭恭敬敬的，除了对此事紧迫性的看法不同外就仿佛是同意了。他建议“应有一个预备阶段，以使史迪威将军可以毫无妨碍地完全指挥中国军队”。他再次要求派遣一名中间人，赋予他“全权”并“可以调整我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关系”。正如宋子文向高思所坦率地解释的，这意味着授权某人指挥史迪威。蒋介石仅有一处暗示了他的不快，即这有关传递电报的方式。他建议说将来总统如果有电报给他，可以交由孔祥熙博士转交。

罗斯福赞同派私人特使的想法，但是马歇尔却坚决不同意。正在讨论此事的时候，蒋介石开始提出限制条件了。7月23日他提出了三个条件：共产党除非接受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否则不能由史迪威指挥；史迪威相对蒋介石在地位方面的限制必须明确；租借物资必须“完全由中国政府掌控”。后来与孔祥熙在华盛顿会谈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限制，即蒋介

石似乎认为，史迪威的指挥权只限于那些实际对日作战的部队，而不包括后备队。

考虑到史迪威所经历的那些困难，现在必须问问他自己，他是否相信这种地位有可能让他行使真正的指挥权。答案部分存在于军官的操典中，因为他对此很熟悉，除非竭尽全力完成一项使命，否则不能认为不可能完成使命。跟其他人一样，他认为中国的局势之糟令人震惊，蒋介石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了。史迪威对加强各师并改革军队已经不抱希望，但仍然希望能够达成某种默契让他担任总指挥，并拥有协调所有部队的权力，而这在中国是未曾出现的事。他认为这种指挥还是有价值的，因为这至少要比现状好。他知道如果处于这种地位，他的命令会被阻截、打折扣或者受到消极抵制，但是他相信，只要能够截断重庆到战场的指挥渠道，那么他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白崇禧曾经对他说："只有切断了连到重庆的电话线，我们才可能在战场上有真正的指挥权。"

在衡阳，薛岳的部队在第十四航空队的顽强支持下，在整个7月间顶住了日军的进攻，但是中央政府没有派兵救援，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进攻以吸引敌人。仍然在缅甸的史迪威授权向薛岳的部队运去了一批武器，结果这招致中央政府驻桂林代表的抗议，说这些武器可能落入"匪徒"之手。自此以后，尽管陈纳德以及史迪威在重庆的副官赫恩将军不断请求，史迪威还是拒绝再运送物资。史迪威在给赫恩将军的答复中说，决定权在委员长手里，他两年来一直坚持要把所有东西都给陈纳德。如果在6月份接受了1.2万吨的陈纳德现在意识到他不能阻止日军的话，他就应当如实告诉委员长，"由他做出适当提议"。

由于蒋介石对薛岳是否忠诚很不放心，因此他没有做出什么提议，而薛岳也没有向中央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因为据驻桂林的美国参谋说，"他说他们是不会同意的"。据说薛岳现在正在与张发奎、李济深（原名李济琛 ）等人联系，准备一旦与重庆割断联系，他们就自己成立一个自治政府。衡阳在8月8日陷落。难民又开始往西逃难了，他们拿着铺盖卷，独轮车拉着婴儿、锅子和老人，还有成群的人爬在最后一班列车上。由于第十四航空队的进攻使日军的交通线受到重创，因此日军休整了一个月以运送足够的物资，接着又开始向一系列机场中的下一个目标进发；这里距离桂林仅有100英里（约160千米 ）。

极度恐慌的陈纳德同意将1000吨拨给自己的武器弹药转给薛岳，但并不经由中央政府之手。他跟其他人一样明白，委员长并不支持这个保

卫华东空军基地的人。他非常实在地向赫恩承认说："我不想把这些东西交给军政部，因为那样这些东西极有可能永远到不了薛岳那里。"陈纳德这次不同寻常的承认使他的一种论点站不住脚了：他一直认为，由于未能提供足够的军火，史迪威要为华东的灾难负责。但是一个大胆的政论家才不管能不能站得住脚呢。在亢奋的艾尔索普的配合下，只要有机会，陈纳德还是会老调重弹，把他那公开的借口说给蒋介石听。

史迪威竭力想帮助他们。一年来他努力装备Y军并准备装备一支有30个师的地面部队，现在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并经由罗斯福的催促，为了优先保卫陈纳德的空军，这支部队已经实亡了。当陈纳德的许诺落空时，现在史迪威不想为了掩饰陈纳德和蒋介石的错误而继续提供武器；他希望能让这个错误昭然若揭。尽管薛岳是个真正的战士，但是史迪威并不认为现在帮助他还有什么效果。既然薛岳未能守住长沙，那就没有理由认为他能够守住衡阳，特别是在蒋介石的总体指挥下。史迪威认为蒋介石的指挥是以政治为推动力的，在军事上看是拙劣的，他对之毫无信心；他决心美国的军火必须用于打日本人，而且要在美国足以施加某种控制的时候。他拒绝了陈纳德提出的将1000吨物资转拨给薛岳的要求。直到委员长亲自提出上述提议，史迪威才粗声粗气地对赫恩说，"让他们自作自受吧"。

7月30日，史迪威离开缅甸前往康提，后来看这是他永远离开缅甸了。在有关他在中国的指挥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的时候，在东南亚战区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去伦敦期间，他要代行其职责。谁都想不到史迪威会接受让他担任盟军最高副司令（他自然地称之为"可怜的盟军最高副司令"）的正式邀请；他宣布真的打算接受这个位子的时候，在康提引起的情绪就仿佛正在等待亚拉里克 [5] 的罗马一样。史迪威知道蒙巴顿去伦敦的目的之一就是撤换他的副手职务，但是这并没有让他过分担心。"在某个时间里所有的好人都想把盖子盖上，但是结果都没有成功——至少现在如此。"他去"康提孩子们"中走动的用意无非是休息一下，因为他在重庆是无法休息的。从日本俘虏那里他知道密支那防御已经接近尾声，残余的守军每天只能吃半碗米饭，因此他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了。

在机场迎接他的是蒙巴顿那辆插着盟军旗帜的黑色凯迪拉克。他看到后说："给我一辆吉普车。"他翘着一条腿，在很多人看来，这样表示蔑视未免显得没有器量。他自己开车经过山路去康提，前面是拉着他行李的凯迪拉克。他在蒙巴顿的住地跟他会合并一同吃告别午餐。他后来说："我不能再跟路易一起吃饭了。我真的喜欢上了那些朗姆鸡尾

酒。”两天后的8月3日下午3点45分，经过78天的围攻，终于拿下了密支那。史迪威第二天早晨写道：“终于结束了。感谢上帝。今天上午真可谓是无忧无虑了。至少有五分钟是这样。”

在所有有关此事的评论中最有趣的是布鲁克在伦敦说的话：“很明显，既然现在史迪威把我们领到了密支那，我们只能继续在缅甸进行战斗了。”

在经历了缅甸北部的生活后，史迪威觉得锡兰就仿佛天堂一样。康提海拔2000英尺（约609米 ），再过去海拔7000英尺（约2133米 ）的地方就是避暑胜地纽拉艾里亚（Newara Eliya）；这里空气清爽，让他想起了黄石国家公园。这里到处是瀑布，视野开阔，有柏树，有一个湖，还有漫山遍野的百合花。史迪威不想住在那里——那仿佛是个白色的宫殿，掩映在百合的池塘中，有芙蓉树和白孔雀踱步的兰花园子和一个九洞高尔夫球场；史迪威选择住在了美国军官小楼中。除了身体方面的舒适之外，他并不觉得自己新的指挥职位让他感到愉快。东南亚战区总部人员有3000人，其中包括30人的乐队和为凯迪拉克开道的摩托车队。军官俱乐部有舒适的皮面椅子，一个不错的图书馆里有英文报纸，还有无处不在的赤脚的仆人随时伺候。在从前担任文职的一个英国人看来，这里的军官“文雅，时髦，很气派”，不过就是他也觉得“康提总部有点不对头……我老是想打瞌睡”。

每天下午，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要参加一个正式着装的会议，报告各战区的形势。在由于攻取英帕尔和密支那而把英国拖入缅甸之前，会议主题主要是有关全球战略，这意味着是考虑明年会在其他什么地方开战的问题。现在会议主要是有关扩大缅甸战役并向南面的曼德勒挺进的事情。由于担心供给线会越来越长，蒙巴顿认为无法打到曼德勒以南地区，因此建议对仰光发起两栖登陆（恢复“海盗”计划）；这样可以向北延伸，跟中部的其他部队连接起来。蒙巴顿此次去伦敦就是为了获得必要的登陆船只和其他设备。丘吉尔现在愿意忘却苏门答腊，并将他总是高涨的热情投回到仰光，把这当作“英国的最高目标”——攻取新加坡——的序曲。

史迪威对参谋计划没有兴趣。后勤应该是别人考虑的事情。每当谈及一场战役或者战斗的时候，他就会很快抛出一份没有图表或者附录的战术计划；他的理论是“毕竟我们都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在康提他应当没完没了地主持各种会议，他对此毫不掩饰自己的厌烦。他在日记中提及这些会议时说“可怕”，“沉闷”，“难过”，“比平常的废话更多”或者“一

无所有”。“我对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一向感到不舒服。”然而想到他自己成了英国殖民地（缅甸）的军事总督，他不免有恶作剧的冲动，喜欢思量着发布些命令——比如“让卡钦人自由，等等”。

8月7日正式宣布他晋升为四星上将，由梅里尔把第四星别到他的衣服上。史汀生写道：“我从来没有颁布一项比这更让我感到满意的命令。”北部战区一个团在贺信中说，除了《伊里亚特》之外，还没有什么“能够跟你们在这个战区所取得的、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辉煌成绩”相提并论的东西。

7月份，当中国的局势看上去“极其严峻”的时候，史迪威写道，如果这种危机“适足以除掉花生米而又不危及大局的话，那么还是值得的”。在衡阳陷落后的短暂时间里似乎曾经有一个机会。8月9日，李济深派了一名特使去见桂林的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说，他打算在广东和福建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同时公开要求蒋介石辞职。他宣称掌握有6—8个师的部队，并希望跟美国谈判，配合美军在中国海岸登陆。林沃尔特认为应当认真考虑这个信息，因为如果李济深的力量能够得到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支持的话，如果中央政府最后崩溃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和盟国的事业来说，这未必是件坏事”。

史迪威在被通告了此事后评论道：“犯罪万岁！”不过，由于他熟知南部的分裂势力一向运气不佳，因此他告诫自己不要对此抱有大的希望或者对此贸然加以鼓励。他派廷伯曼去桂林进行调查，并指示他不得进行任何冒险：“我们的政策是不干涉中国内政……听取任何提议，但是不要做出任何承诺，也不要表达任何意见。只要说你会把任何建议都转告的。”同样对此十分谨慎的高思认为，李济深的问询只是想试探一下美国是否会支持这种举动。他建议要置身其外。

所有人都在考虑的问题是，对李济深的支持有多么广泛，以及当地的共产党是否会跟他联合。据驻昆明的领事朗登说，虽然这代表了“真正的激烈反抗”，但是其反抗缺乏凝聚力、领导力和足够的军事力量，因此他认为这不会“对委员长改变其政府的意愿产生明显的影响”。他认为，由不属于共产党的地方各省军阀和民主团体所进行的反抗不可能成功，而且即便成功了这些人将很快处于“克伦斯基” [6] 境地，并会很快被共产党推翻。廷伯曼的结论也大致相同。他发现共产党并没有参与其中，白崇禧也没有参与；白依然效忠于中央政府，已经把家人从桂林转移到西部，“光是家财就装了好几车皮”。他认为李济深的举动“甚小，我们现在除了静观其变之外别无他法”。高思在报告中也同意这种估计。南方燃

起的火焰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机会。

正在此时公布了第一批自抗战以来访问共产党地区的外国人的报道。这些报道充满热情。这些记者倾向于持友好态度，因为他们对在重庆工作时所遭受的挫折甚为不满：独断的审查制度，无穷无尽的允诺和推诿，还有那中国人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恶习——说话者和听者都知道是一派胡言，但是仍然要一本正经。他们从中国国民党那边的烟雾中被解救出来后很想寻找一个新世界，也确实找到了。他们先是被人们的体质吸引了：他们“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要吃得好，更加结实也更加精神”。他们改造了过去陕北的荒地，进行精耕细作或者饲养牲畜。通过垦荒，这些共产党士兵丰衣足食，无须再依靠农民。这在当地人看来是对他们最为有利的因素，而所有的记者都强调了这一点。

通过组织手工劳动和开办作坊，共产党在工业方面的成绩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延安通过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成了其人民“耐力和决心的重要象征”。这些记者都带来了用当地粗布定制的大衣和外套，后来发现他们的裁缝是最高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这些7月23日抵达延安的军事观察团成员穿着肥大的八路军制服照了相，而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些战士“是本记者在中国所有地方所看见的士兵中吃穿最好的”。游击战的铁证便是几百名日军俘虏。谁都没有见过国民党宣称抓住的俘虏，除非是像缴获的钢盔那样总是同样的一些东西。这些参观者很明显地感到，共产党部队就像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一样，会在战争中成为“有价值的盟友”，对其适当利用将会加快胜利的到来。斯泰因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说，任何盟军指挥官“都会以指挥这些能吃苦耐劳，并吃得很好的士兵为荣”。

尽管这些报道在重庆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有些被整篇毙掉了，但是语调中所透出的热情是无法抹去的。这些记者为他们的读者把这些共产党领导人人性化了，讲述毛泽东怎样一边做工一边读书；讲了共产党西北局负责人高岗的父亲是个贫穷的农民，就因为交不起驴头税被陕西的军阀打死了；讲了一个“卓越的”叫王震的旅长曾经是京汉铁路上的一个锅炉工。他们还谈到了医生、学生、大学教师以及从前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他们都在“斗志昂扬地为国”工作，并“坚信这种做法是对的”。当第二批记者秋天到来的时候，他们到处看到了丰收景象，水果遍地，有梨子、葡萄、南瓜、西红柿、荞麦、小米、棉花和烟草。布鲁克斯·埃金森饶有兴味地描述了当地的戏剧表演，并为延安的10辆卡车全量供应汽油，结果《纽约时报》起了个友好的标题：“延安，中国的幻境之城”。

记者只是报道他们的见闻，用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都是真的。



朱德、包瑞德、毛泽东



“迪克西”代表们身穿延安制造的棉服合影

谢伟思汇报迪克西使命时也是印象深刻。他发现那里的人民都士气高昂，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并在称职的领袖率领下从事富有意义的工程。苦力也能读报纸，征募者无人押送地自觉入伍，没有宪兵，没有官僚，没有“重庆那些华而不实的做法”，也没有了那种失败主义情绪。他们有些得意和对事业的自以为是，但是没有压抑的感觉。有自信、自尊，并强调与普通百姓的联系，而由于事业的冲动与人民息息相关，因此“这种冲动是难以扼杀的”。

迪克西行动共有9个成员，分别代表空军、医疗队、通信兵和步兵等，并在一个月后派遣了第二支观察团；派观察团视察是有意图的：衡量共产党的潜力，看是否可以在军事上跟共产党合作以共同对日。观察团还受命衡量“援助共产党最有效的方式，旨在使他们在对日作战中更具价值”。这意味着美国要对他们提供援助和建立关系，而这恰恰是蒋介石所担心的，这也正是他为什么竭力阻止这种访问的原因。

毛泽东也在考虑美国的援助。他清楚表明，他希望美国在中国登陆。他说，假如美国人无法登陆，那是中国的不幸。“国民党将继续统治——尽管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统治。”

包瑞德和谢伟思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叶剑英以及朱德的谈话表明，共产党的论点是，国民党已经是在“垂死挣扎”，而共产党已经建立了有效的政府，并打算与美国进行有效合作；他们接受“盟军”的指挥，而不是接受“腐败的”国民党的指挥。他们没有提到在史迪威的指挥下打仗，也没有提出向他转达这种提议；实际上包瑞德上校的印象是，“他们似乎并不对史迪威将军有什么兴趣”。

他们谈到了联合而不是革命。他们此时的既定目标是，重回统一战线并在国民会议有代表权，解除封锁，在他们的地盘上自由管理自己的政府，而且即便不是共同对日，也是一致对日。这种想法并不像蒋介石所要求的那样包含了效忠中央政府或接受其权威的意思。



纳尔逊（左二）和赫尔利（右二）来到重庆，左一为何应钦

1944年的共产党并不显得可怕，相反，他们跟那些尚未成功的挑战者一样，显得颇有吸引力。他们穿着皱巴巴的粗布衣服，谈吐朴实，吃苦耐劳，生活简单，真诚而富有活力，因此跟国民党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他们的主要魅力所在。由于中央政府不能积极作战，尤其是在“越后”行动之后，因此美国人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必须与共产党合作。作为战士他们还是有用的。正如多恩将军后来作证时说的，他们“在体格上是更好的士兵。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士气要比国民党的士兵高”。他们的领袖总体上更加能干，不那么腐化，基本上比国民党的领袖更加强大。

蒋介石非常明白，如果史迪威或者任何其他美国人被授予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的话，那么作为委员长，他将无从控制给共产党的援助的多少或者美国与之合作的程度。对此，他无须其他理由去决定自己的态度。8月9日，华盛顿提出让赫尔利将军担任调停人，并急切催促就史迪威任命一事“采取立即行动”，“否则可能就会为时太晚”。蒋介石还是在推脱。尽管他乐意接受赫尔利，他回答说指挥问题需要做出全面准备和“深思熟虑”。

选择赫尔利最终是不幸的；尽管选择他是偶尔决定的，但是当时对此决定还是很有信心的。马歇尔对此要负责任。他一直反对在美国总统和蒋委员长之间派特使的想法，但是当他听说霍普金斯正在准备采取行动时，他迅速行动，想先发制人。霍普金斯将会受到宋子文和陈纳德体

系的影响。当史汀生提到他正想“为帕特·赫尔利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的时候，马歇尔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被史迪威接受，并能够化解由于史迪威“极端冒失”而造成的紧张关系。他在同一天试探了赫尔利，几个小时之内这个急切的被任命者已经到了国务院，在那里他告诉副国务卿斯特汀纽斯（Edward Stettinius, Jr.）说马歇尔准备派他去中国，而他也愿意成为一名外交官。虽然斯特汀纽斯向他泼了冷水，但是赫尔利坚持他应该将请求转给赫尔国务卿。与此同时，选赫尔利担任调停人，在史汀生看来这是“非常幸运的”。“赫尔利忠诚、聪明、精力极其充沛……待人和善又有外交手腕”，而且“不管是马歇尔或是我看来，他都是我们能想到的可以扭转可怜的史迪威所遭遇的人身攻击、诋毁和僵局这种形势的唯一人选”。史迪威在被马歇尔问及此事时同意了这个人选，其理论是“要拌好菜既要醋也要油”。

罗斯福也对此表示满意。有一次摩根索对私人特使的效用表示怀疑，他的回答是：“我之所以不用情报部门，原因仅仅在于我了解我的人。”罗斯福相信赫尔利能够准确地完成这个使命，但是让马歇尔吃惊的是，罗斯福打电话问是否能让唐纳德·奈尔逊（Donald Nelson）也一道去；他是上届军备生产局局长，以前是澳大利亚罗布克人。当时奈尔逊和其继任者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之间爆发的激烈争执正把政府弄得乌烟瘴气。马歇尔问为什么要奈尔逊也去中国，罗斯福平静地回答说，他想把他弄到国外去；正如马歇尔后来说的，他对这个提议甚是同情。他同意了，条件是奈尔逊不能干预政策或者战略方面的事务，其任务只限于卖刮脸刀片。出于公告的需要，这句话被翻译为“考察中国经济”。

奈尔逊的任命代表了一种政治任命原则的起源。摩根索此时跟助手哈里·戴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谈及此人时说：“你要在华盛顿待上三年才能知道你是否是个老出岔子的人。”怀特回答说：“如果你是的话，你就会得到升迁。”

8月23日，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中就蒋介石的三个条件进行了答复，其语气较第一封电报更加专横。跟往常一样，由陆军部起草的这封电报将蒋介石视为要素的三个条件说成是“细节问题”。这是罗斯福和马歇尔在跟孔祥熙讨论后得出的印象。无疑，孔祥熙也遵循中国交往的亲善原则把这些条件弱化了。

就有关共产党的第一个条件，总统表示：“我认为不应对史迪威将军统辖部队的范围进行限制……当敌人可能正在使我们陷入灾难的时候，

拒绝任何愿意杀日本人的援助都显得有乖常理。”视日本人为大敌的罗斯福和他的政府以为中国也是这么看的。他们从来没有切实感觉到，委员长是（而且的确一直如此）把共产党视为更大的危险，并据此做出决定的。霍普金斯也显示了对中国的这种不了解；在与戴维斯谈话时，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戴维斯认为史迪威会对提议授予他的指挥权“表示怀疑”，或者表示这种指挥权的行使“会处处受到牵掣”。霍普金斯以为史迪威将会享有“很大权力”，因为白宫在后面支持他。

有关指挥关系的第二个条件，罗斯福认为这应当是“国家元首跟战地指挥官之间的关系”，给史迪威的头衔应当意味着“他地位仅次于你并统辖中国的武装力量”。

就租借物资问题，罗斯福通知蒋介石说，华盛顿正在进行新的安排，以“解除史迪威的责任”，此事会在稍晚告诉委员长。与此同时，罗斯福还严厉地提醒蒋介石：“优柔寡断并试图做出完美的安排将会产生致命的后果。”他敦促蒋介石“尽快采取必要措施让史迪威将军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辖中国军队……再有拖延则难以避免军事上的灾难，这无论对中国还是盟军尽早击溃日军的计划都是悲剧性的”。

如果说蒋介石对这种急迫感到不以为然的话，那是因为他不像华盛顿那样怀疑他自己是否能够支撑下去，或者担心自己会崩溃。他一门心思想挺过这场战争，不管华东失去了多少地方，如果有必要即便是在西部的最后几个省份也能够生存下去，直到盟军可以打败日军，那时他也将成为胜利方。尽管日军“越后”行动造成的局势十分危急，他也许不无高兴地看到，战役是指向不顺从他的南方部队的，中央政府的部队并未参与交火。

正如高思的报告中所说的，还有一个事实是，蒋介石越来越与外界和外部舆论隔离，“除了自己谁都不信”，因此对其国家及人民的处境每况愈下的情况并不了解。实际上，鉴于他并不显得惊惶失措，因此有报告说他正在寄希望于跟日本人做出某种安排，但是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他的军队的情况并没有让他过分担心，这部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士兵忍饥挨饿，部分是因为他所期望的只是继续由美国武装自己的部队，并使之比共产党的部队更加强大。他把实力等同于武器，却忽视了组织、动力、领导和基本的营养。此外，他还相信了陈纳德的说法，认为仅靠空军就能赢得战争。他并不热衷于美军登陆以及联合军事行动。他讨厌让外国人过分介入的想法，正如他之前的北京朝廷也不喜欢外国人一样。蒋介石相信无须自己再做努力就可以赢得战争，因此如果

他还有政策可言的话，那么他的政策就是他能够保住自己的权力，而日本则可以由盟军在中国以外予以击败。就外敌而言，他的揣测十分精明，而且后来证明是正确的。

美国人的到来未必受欢迎，这在华盛顿看来难以理解，不过在中国的一些美国人是能够理解的。谢伟思在6月为华莱士准备的情况说明中表明，一旦认识到这个政权只是在勉强对日作战，“我们还应当进一步意识到，这个政权可能会试图避免让中国成为对日本陆军展开大规模战役的战场”。没有迹象表明陆军部或者白宫接受了这种想法。史迪威自然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很可能在他的头脑中，亲自掌控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和自信占了上风。

华盛顿正在考虑的有关《租借法案》的安排显示，可能会在重庆成立一个中美委员会或相关机构来衡量各种要求，而这些要求一旦得到华盛顿的批准，那么这些物资将径直送至前线部队；等到这些事情安排好了之后才会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当时希望是将史迪威职责中最有争议的那部分剔除，特别是考虑到公路开通后运输量将会增加。这种新的安排也会使中国的地位跟其他大国相当。马歇尔在一封给史迪威的电报中谈及此事时认为，未来的援助将会提供给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中国部队——如果共产党愿意跟国民党一道打日本的话。解决缅甸跟中国的指挥关系问题的最终方案决定分拆中缅印战区，对此史迪威不情愿地同意了。

9月4日，史迪威迎接了抵达新德里的赫尔利和奈尔逊。他们表现出的要“敲桌子”的意图让史迪威印象深刻。赫尔利和奈尔逊都是身材高大魁梧的人，不过他们在谈吐方面更加出色。他们是美国方式的化身。赫尔利说：“首先我们会告诉委员长该干什么，然后我们会向他解释美国打算怎么做。”奈尔逊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他说，他们打算向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中国必须是个统一的国家（可能意味着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第二，中国必须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军队，以显示他自己愿意帮助盟军打败日本。奈尔逊说，如果蒋介石拒绝合作，他们就会“建议总统抛弃中国并将我们的基地移到苏联去”。如果蒋介石不同意合作，那么他就别指望美国会在战后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并将日本的经济基础转到中国。史迪威不可能不感觉到，他之前要求接受援助就要有相应表现的想法终于获得支持了。

史迪威9月6日到达重庆，受命次日早晨9点30分与蒋介石会晤，而赫尔利和奈尔逊的会谈则定在11点。“为什么把我安排在他们前面？表示好意吧。”听蒋介石谈话，仿佛指挥权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似的，就像

1942年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一样。史迪威说，“蒋介石告诉我说到目前为止，我的工作100%是军事方面的；而现在作为中国军队的司令，我的工作60%是军事方面的，还有40%是政治方面的。如果我们要用共产党，那么他们就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权威。他会时不时地给我出出主意……他对我完全信任。开玩笑说我曾经说中国的指挥官都不行……现在终于有一个行的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

[1] 塔莫尼厅T。ammany Hall），1789年在纽约市塔莫尼厅组建的民主党一个党派。——译者注

[2] 这三个人是代表《纽约先驱报》、合众社和伦敦《泰晤士报》的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代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常简称The Minitor）、美联社和伦敦《新闻纪事报》的古恩特·斯泰因（Guenther Stein），以及代表《纽约时报》《时代》《生活》《联合劳动新闻》以及悉尼《先驱早报》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其他成员还有代表美国天主教出版物的沙那汉（Shanahan）神父，以及中国新闻部的雇员莫里斯·福陶（Maurice Votaw）“——其他记者指责他是国民党傀儡”，他名义上是代表《巴尔的摩太阳报》参团的。由于记者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9月第二个代表团得以成行，成员包括布鲁克斯·埃金森，白修德以及《新闻周刊》的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ld Isaacs）。

[3] 1944年11月，由于有报道说史迪威曾经说印度军队很消极，其军官昏昏欲睡，一位保守党议员雷吉纳德·帕布里克（Reginald Purbrick）请求下院宣布，史迪威在任何有英军驻扎的地方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二战”结束好几年后，亚历山大将军在与波特纳将军交谈时曾说：“可爱的老乔——有时候他可太会捣蛋了。”

[4] 这封电报现存副本没有标明日期，可能是危机出现后的某时发出的，不过基本原则应该是一致的。

[5] 亚拉里克（Alaric，约370—410），西哥特国王，公元401年攻入意大利，公元410年8月攻陷罗马城。回军北上的途中病死。——译者注

[6] 克伦斯基（Kerensky，1881—1970），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二任总理。十月革命时化装逃出冬宫。——译者注

第十九章

“能干”的限度

1944年9月—11月

现在史迪威问这个问题还为时太早，因为蒋介石现在只是口头答应，而且对蒋提出的三个条件现在还无一满足。当赫尔利9月8日开始谈判的时候，一个新的争端出现了。委员长要求中国在密支那的部队继续向南面的八莫进攻，以把日军从龙陵引开。史迪威对此表示反对，因为那里的部队需要休息，而Y军自5月投入战斗以来就没有补充过兵力，如果现在使之满编的话是可以攻下龙陵的。不管怎样，史迪威估计，日军无须从龙陵撤出兵力就可以抵挡住对八莫的进攻。严格地说，史迪威的拒绝是合乎道理的，因为蒋介石没有权力对蒙巴顿战区的部队下达作战指令。但是因为忽视了委员长的判断，这使得史迪威又招致蒋介石新的怨恨，不久之后这导致了严重后果。

就共产党而言，蒋介石重申了他的条件，那就是必须把他们纳入自己统辖下的中国部队，然后史迪威才有权力指挥他们。作为国家元首，他只能这样要求，但是这个条件难以满足。英国政府此时询问其驻华大使贺拉斯·塞默（Horace　Seymour）爵士是否可以设法让中国的两个政党达成妥协，塞默认为这不会有结果。他指出，国民党已经失去信用，其军事指挥“幼稚无能”，因而中国士兵很高的作战价值完全被浪费了。共产党明白这一点，同时也意识到了他们的强势地位，因此不会对中央政府做重大让步。如果贺拉斯爵士已经明白了这一点的话，那么蒋介石也不可能对此完全没有察觉。他仅靠这个条件就足以让史迪威的任命泡汤。

谈及《租借法案》时，宋子文明确指出委员长必须对此完全掌控。根据史迪威的记载，赫尔利“告诉他加上加重号写下‘不同意’的字样……这就是委员长想要的：完全的自由支配权。现在我们要摊牌了”。由于史迪威在缅甸北部的成功，现在这个支配权油水更大了。由于攻取了密支那，现在空军运输队可以不必担心日军飞机而走一条更加偏南的路线，因此缩短了驼峰航线的路程，同时也降低了飞机飞行的高度。其结果令

人吃惊：运送的物资在6月达到1.8万吨，在7月达到2.5万吨，在8月达到2.9万吨，在9月几乎达到3万吨，10月达到3.5万吨，而11月则达到3.9万吨。实际上，攻下密支那之后驼峰已经无“峰”可言了。等到1945年1月滇缅道路重新开通的时候，空军运输队每月的运输量已经超过了陆路运输量，这让史迪威在内部的对立者得意扬扬，认为他一直以来坚持修路，现在证明这多么愚蠢，多么过时。但是他们并未想见到降低驼峰航线飞行高度而造成的结果；而降低这个高度的正是在陆地上作战的地面部队。

此时，蒋介石已经无法再不认识到自己部队的虚弱。有报告说，新征募的士兵由于疾病和饥饿正在重庆市区的成群地死去。蒋介石不相信，于是派他儿子去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个情况。根据几个小时后就传遍全城的说法，蒋介石又亲自去查看，发现情况确实像报告的那么糟，墙角里还有两个死去的士兵。他勃然大怒，用手杖打了征兵部负责人的脸，并下令逮捕他。蒋介石任命了新人担任此职位，但是整个体制并无变化。8月，在昆明的大街上共收殓了138名死去的士兵。据说，蒋介石终于准备采取措施加强军队，正如两年前史迪威建议他做的那样。

面对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蒋介石急于想掌控对战争物资的支配权，特别是要使物资不要落入共产党之手。在9月12日与赫尔利的下一次会谈中，据说蒋介石“很不通融”，坚持要控制租借物资，而且据说正是由于租借物资，史迪威比他“在中国的实权更大”。根据美国的建议，租借物资将由一个驻重庆的美国委员会负责，其中包括一位中国代表，但是委员长仍然觉得不保险。高思大使清楚地看清并表明了蒋介石的问题：由于中国沿海的战争正在逼近，“我们现在似乎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为了对日作战，是否需要向共产党提供美国的武器和装备”。由于对此只能违背蒋介石的意愿，高思指出，这个决定可能会导致蒋介石的垮台。

史迪威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直率地表明了他在共产党问题上的立场。“要使用第十八集团军（共产党）。对此不应有误解。可以派遣他们去那些与中央军没有冲突的地方，但是在整个危机中，他们必须被接受为整个队伍的一部分。”

在歇斯底里的美国反共年代里，曾有人指责说，这是一个阴谋分子设计利用共产党推翻蒋介石。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赫尔利后来也参与了这种歇斯底里并对之推波助澜，但此时他理所当然地支持史迪威的提议，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史迪威对马歇尔也讲得很明白：“如果由蒋介石

和委员会控制物资，你知道谁会得到物资，你也知道谁不会得到物资。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把军火提供给愿意打仗的共产党。”史迪威真正感兴趣的实际上是“愿意打仗”。

9月13日史迪威接待了两位共产党特使，他们向他带来了朱德和毛泽东的问候。他没有记录下他们讨论了什么，只是史迪威向马歇尔汇报说：“他们跟我交流后表示愿意由我指挥打仗，但是不愿意接受蒋介石指派的中国指挥官。”根据史迪威的日记，他告诉来访者说他会去延安，然后他们高兴地告别了。

共产党在延安跟谢伟思讨论时比史迪威更加强调了中央政府的必然反对，并在谈及承认其权威时很是慎重。他们显然不指望能够立即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在讨论时极为谨慎。周恩来说，任何“积极合作”的举动都会受到国民党的强烈反对和顽固抵制。当问他延安军队是否愿意接受一位美国指挥官的时候，他说“如果中央政府同意”，那就可以，不过此事要等到美国输送给中国的军队和物资已经达到相当数量，并可以明确计划对日进行反攻的时候。他认为就目前而言，可以先稳步、小心地迈向“有限的合作”。谢伟思的报告表明，这种合作的具体形式可能是先提供给共产党“极其匮乏”的基本军事物资，并训练他们使用这些装备，并随着战事的发展达到“真正的战术合作”。

一个人无须在意识形态上“亲”共才会推动美国与延安当局进行接触、提供援助或者进行战术合作。这自然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是中央政府的缺陷和华北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在东北和华北的日本关东军仿佛是个庞然大物，可以预料其抵抗必然是持久的，因此，如何对付他们是一直困扰美国参谋人员的问题。发挥延安的军事潜力原是迪克西使命的公开意图，这种想法并未受到美国政府内的共产党组织或者特务的影响。当史迪威也发出类似倡议，更奇怪的是当陈纳德也发出这种倡议的时候，他们并无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情急之中的陈纳德认为有必要在9月份给总统写信，信的内容他是不会对其保护人蒋介石说的；他在信中说现在必须支持“重庆进行彻底重组，之后是重庆和延安的真正统一”，而且“对此要给予超过任何其他军事或政治目标的优先考虑”。陈纳德所谓的“真正统一”，跟他要击败日本的大话一样，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陈纳德是亲共的。

支持与延安建立关系的声音的出现，与1944年的背景有关。那些并不把美国援助延安视为军事上的权宜之计的人指望此举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他们相信这对中国更有好处。他们并不认为取代国民党政权的是

刻板的共产主义制度，这是因为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种否定的判断是基于一种三段论，即认为“真正的”共产党是众所周知的坏东西，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似乎是好的，因此他们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党。正如罗斯福总统和卡尔森上尉此时的书信往来一样，他们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称中国共产党为“所谓的共产党”[1]。在官方信函中这已经成了常用词句。史迪威对他们的称呼正像他早期对国民党的称呼一样，是“赤党”［在1911年也间或称之为“义军”（Rebs）］，表明他们是革命者。对曾被称为邦克山英雄的史迪威来说，革命本质上并非不符合美国观念。中国早就需要革命了，而对很多认同有这种需要的美国人来说，共产党就仿佛是当代的太平军。他们被认为是进步分子中一些富于活力的类型，或者用当时的用语说是“农民改革者”（史迪威有一次称之为“农业自由主义者”），但他们未必如美国想的那样简单。

毛泽东及其集团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农民主导运动的胜利，同时不太显露地保留了列宁有关党的作用以及夺权的教条。他们的目标是通过采取那些对农民有意义的措施去赢得农民的主体，而不是采取马克思所确立的针对西方工业社会的那些措施。实际上，无论是建党、建军、争取根据地还是进行中国重建的时候，农业改革都是他们所关注的事情。在1944年的形势下，他们未来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态度未必已经确定。如果建立了与美国的联系，那么中国共产党会走何种道路，正如所有错过的机会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是未知的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比现在更糟。

史迪威对其指挥任务的设想包含了原先他改革中国军队的计划。这种想法体现在了由他草拟的蒋介石要给他的一项指令中，这项指令任命他为中华民国陆空战斗司令。指令授权他立即着手准备对日军反攻，并改编和调遣中国军队，包括启用新单位，解散旧单位，部队间人事调遣或者将一个指挥官或者地方军队派往他处，所有这些“均不受指挥官或者省以及战区界限的限制”。除了这里可能暗含一些余地之外，这份草案并没有提及共产党。指令还进一步授权他“立即施行改善军官和士兵生活的计划……以使他们在生活上至少跟后方人民相当”。

因为不可能指望委员长签署这样一道包括承认中国军队生活困顿的指令，其中，也许这代表了史迪威所能采取的最强硬立场。他认为自己的政府是支持自己的，有了这种支持，他甚至可能相信这个指令是可以强加给蒋的。赫尔利自然没有异议，因此将提议的任命以及委任状一同

交给了蒋介石。在随后通常会出现的等待中，史迪威跟何应钦就Y军的补充问题继续讨价还价，现在Y军的有效战斗力仅为1.4万人。他设法得到了补充1万兵员的承诺，条件是提供一些加拿大制布朗轻机枪。“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在河南丢掉了30万大军，可是我历经千辛万苦才得到1万人来补充战斗伤亡人员。”

在华东，第二个美国空军基地陷落；现在日军正往南方的桂林进攻，有各种迹象表明这个城市将会很快失陷。由于疲惫和组织混乱，华东守军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不幸的沙皇部队一样，受到缺乏计划和补给的影响。部队的武器都是过时的，有时不是每个人都能分到步枪，或者有步枪但没有足够的弹药。尽管通常来说机枪够用，但是炮很少，炮弹也不够，或者有时一个师有足够的野战炮，但是这些炮被分到不同地方供单独使用。由于野战指挥官和重庆的龃龉，总参谋部没有确定的战略并且极不称职，此外，委员长的犹豫不定和对南方指挥官的不信任，造成了物资和援军不是太零碎就是来得太晚——所有这些都妨碍了协调作战。蒋介石自以为桂林以北70英里（约112千米　）山区的防御线可以守上三个月，可是日军三天就到了这个关口。薛岳和桂林战区指挥官张发奎试图在一个地方集中优势兵力，但是不行，因为委员长有个致命的偏好，那就是使用一支部队的同时把另外一支部队留下备用，这样就不必担心同时失去这两支部队了。此时，这支势单力薄、骨瘦嶙峋、衣衫褴褛的部队只能顶着烈日翻山越岭，守住这些没有希望守住的阵地，然后在敌人的炮火中死去。

正当日军攻入广西的时候，华北的16个国民党军却按兵不动，封锁共产党。当中央政府派遣第九十三军到桂林进行救援的时候，对此地不熟悉的这支部队与其说是去战斗，毋宁说是去抢劫。据采访此次战役的白修德说，第九十三军军长“不知道自己的侧翼在哪里，不知道战线上跟下一个部队的距离，不知道敌人占领了哪些村庄”，而且未发一枪便放弃了让他去守卫的阵地。农村那些失去家园的难民阻塞了道路，同时为日本人工作的奸细则四处放火，散布恐慌情绪。

9月14日，史迪威飞往桂林去跟张发奎会谈，以决定大量的美国空军设施的命运。张发奎告诉他，委员长的命令跟他的判断不同，要求带着仅存的几个可靠师退到桂林城并从里面守城；史迪威认为这个决定将使这个地方成为“另外一个陷阱”。张发奎说他可以把桂林守上两个月，但是除了不可靠的第九十三军之外，他没有可以保卫机场的部队。在跟陈纳德商量之后，史迪威艰难地下令撤出所有的美国人和设备并拆除所

有跑道，仅留下一条跑道可以最后为围困的桂林驻军提供枪炮和军火。他走了之后，空军运输队的货机就开始运出储藏的炸弹、汽油、备件、卡车以及修理设备——这些东西都是以很高的代价通过驼峰航线一吨一吨运过来的。他们留下了550桶汽油，这是为了让拆除小分队用来放火烧毁这些设施的。蒋介石1943年向罗斯福“亲自保证”他的部队有能力守住这些空军基地，这就是他承诺的价值。



《窒息的重庆》，摘自《时代》杂志，1944年12月11日

两个月后的11月底，一支美国战略情报局部队发现有些军火藏在了距离桂林以东200英里（约921千米 ）的贵州境内的土山（Tushan）里。在二十多个每个长达200英尺（约60米 ）的军火库中储藏了五万吨的武器弹药，其中包括50门新的野战炮以及炮弹，这些东西都是几年来中央政府为了应付华东危机而储存的。此时，桂林和柳州已经沦陷，日本已经在贵州四处搜索，而重庆已经在颤抖——可是这些军火还藏在那里准备应付紧急情况呢！

史迪威在桂林还没有待上二十四小时就受命回去跟委员长会谈。日军的迅猛推进把蒋介石吓坏了，他下达了相当于最后通牒的指令：要么驻缅师在一周内向八莫进攻以解除对龙陵中国部队的压力，要么他就把Y军撤回萨尔温江以保护昆明。他担心，如果在龙陵失利则日本可能进而攻打昆明，而由于昆明处于同重庆差不多的内部区域中，因此进攻昆明总是让蒋介石惊恐万分。他的最后通牒实际上意味着终止在缅北的战役，而此时距离战役成功已经为时不远，因为夺下此地就可以重开通往中国的公路。

史迪威怒气冲冲地写道：“这个疯狂的杂种。利多公路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已经给忘掉了。现在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唯一尚未控制的就是龙陵，而他想放弃这个地方并让这整个工程都报废——包括我们过去两年半中为了帮助中国而投入的人力、钱、物资、时间和汗水。不可思议。他那个榆木脑袋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还是那些歪理和愚蠢的战术、战略想法。他真是不可救药了。”正在此时，Y军成功攻下了腾冲；这是个有城墙的城市，控制着通往缅甸的一条小路；由于何应钦答应补充1万人，攻克龙陵看来还是有希望的。

史迪威立即将委员长的意图向马歇尔报告，说蒋介石给“吓坏了”，尽管他竭力反对但是无法对蒋介石产生影响，因为蒋“不可理喻……我现在确信华东的灾难在他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认为日本在那个地方不会再骚扰他，并且设想他会躲在萨尔温江战线的后面安安稳稳地等着美国来结束战斗”。这便是蒋介石和史迪威战争理论中的文化冲突的根本所在。在史迪威完成其使命的整个时期里，蒋介石的主导原则一直是囤积物资并等待以夷制夷。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对于提供物资并认为应当采取行动以主宰命运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是没有道理的。这种分歧没有相交点。

史迪威决心跟宋子文“坦率地”谈一谈，希望他能够说服委员长。宋子文接受过西式教育并熟悉西方的思维方式，是担任中间人的理想人

选，不过他为人圆滑，有时难以捉摸。他的坦率和友好对西方人来说很有效：赫尔利为他倾倒，奈尔逊也不断向他承诺。由于宋霭龄和宋美龄姐妹现在不在这里了，宋子文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几个月来一直有谣传说由于蒋介石拒绝从家里赶走一个姨太太，于是宋美龄于7月1日同宋霭龄一起去巴西访问去了。委员长举行了告别晚会，席间他公开否认有不忠行为。蒋夫人在9月份到达美国的时候，有关他们婚姻出现裂痕的谣言甚嚣尘上，结果中国大使馆只能出面辟谣。她在国外待了一年多，直到1945年9月才回国。

史迪威跟宋子文的坦率交谈不但没能弥合分歧，反而使分歧变得更加显著。对此他们两个都感到吃惊。根据史迪威事先所做的笔记，史迪威打算告诉宋子文，委员长必须下决心“做些史无前例的事情”——这就是任命一个全权总指挥——而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史迪威就会建议美国政府“彻底撤出中国和印度并将美军基地设在别的地方”。他准备要求由陈诚和白崇禧分别接替何应钦的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职务。当他讲了这些情况并陈述了他起草的指令中所谈及的条件的时候，宋子文“对我们所设想的作战指挥官和蒋介石的想法之间的分歧感到吃惊”。当宋子文接着讲了委员长对这个职位的理解的时候，史迪威怒气冲冲地总结说，这“基本上又是个傀儡”。

史迪威告诉宋子文说他没有争取也不想要“这个倒霉的工作”，但是，如果要他担任这个职务，这就必须是个有充分权力的职位，否则他不会接受它。如果他接受了这个职位，“委员长就不能指手画脚”。他说，他四十四年来一直希望有机会指挥美国部队，而且如果他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的话，他的愿望可能早就实现了。

跟所有身处困境中的人一样，史迪威内心也很矛盾。的确，他放弃了第一份在海外指挥美军作战部队的职位后来到了中国，但是当初交给他执行的“运动员”计划有些苛刻的条件，这显然让他做出决定变得比较容易。另外一个事实是，尽管常识告诉他自己并不想要眼下这个糟糕的工作，但是同时他又很想要担任这个职务，而且在竭力争取它。他对中国有很强的责任感。在跟白崇禧就桂林的形势进行讨论后，他拟就了一份比蒋介石的“陷阱”战术更好的防御计划。为了不让桂林的剩余部队被包围，他的计划要求把这些部队用于机动战，给他们布置特定的阵地和目标。假如这计划不成功的话，这些部队也不会全部损失掉，而是可以撤退并跟史迪威准备在贵州集结的部队会合，最终向沿海挺进。这个计划于9月18日交给了委员长。

正如史迪威向马歇尔报告的，蒋介石威胁退到萨尔温江之后，这最后引燃了“鞭炮”。马歇尔是在参加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时收到这封电报的。在那里丘吉尔和罗斯福正为未来怎样对待德国而陷入激烈争执，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战略和计划方面也是旧的争执还未解决，又产生了新的异议。然而，不管这些争吵有多么激烈，但至少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中国却是让人极为失望和困惑的一个地方；对在那里采取何种政策，任何政治家或者指挥官都没有连贯或者一致的想法。

罗斯福已经是在他第十二年的任期中，他的任期经历了从大萧条到战争的时期；在过去三年中，罗斯福每天至少花十六个小时应付危机并做出各种决定。他已经太疲惫，无法尝试激进的新想法或者做出新的努力。从军事上说美国在中国已经失算了，现在那里除了是个可以拖住敌人的战区外，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魁北克会议上确立的战略目标是让中国人继续战斗，仅此而已。没有往中缅印战区派兵的计划，马歇尔在这一点上是肯定的。未来在缅甸的战斗将尽可能交由英国展开，这样美国就不会卷入重新夺回这些殖民地的战斗中了——至少意图是这样的。

现在华东日渐崩溃，而蒋介石又拒绝——或者威胁拒绝——协助打破对自己的封锁。在9月16日有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的会议上马歇尔介绍了史迪威电报的要点。他显然已经准备了答复的电文，因为根据会议记录，他在激动之余还非常克制，要求总统向蒋介石发出一份“照会”，指出他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全部后果。这份最后成了导火索的电报是由马歇尔在魁北克的参谋人员起草的，在这份六百字的电报最后有马歇尔的批复：“我建议你将电文发至委员长。”最后是罗斯福那笔画很长的签名。

“二战”的外交政策是在大规模盟国会议上确立的，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军方，军事人员担任工作人员，而文职方面除了两位元首之外人数很少。这里到处是排场和制服，每个人似乎都比穿文职服装时的权威增加了一倍。衬胸和笔挺的制服掩饰了人性的弱点。就这份建议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的内容来看，是由军方在主导外交政策，但是当时并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史迪威在陆军部的同僚们跟他一样感到愤怒，并准备采取强硬的语气——这并非没有一点儿白种人的优越感；是否会将这样的照会发给欧洲政府的某位首脑，这很值得怀疑。罗斯福也许已经不再关心蒋介石的尊严了，也许他只是没有太注意就签了名，但是后果都是一样的。

电报所采用的语气仿佛是老师对一个屡教不改的学生的语气。电报

重复了史迪威曾经想让那个“榆木脑袋”理解的一些道理：Y军除非得到增援、支持并去打通滇缅公路，否则这支部队的勇猛和牺牲都将付诸东流；撤退到萨尔温江之后正是敌人想竭力达成的；如果蒋介石半途而废，“我们将没有机会打通跟中国的陆上通道，而且这会马上危及驼峰航线。对此你要准备接受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电报还说：

> 最近几个月我反复敦促你采取断然措施，以避免中国和你自己正在面临的灾难。现在，在你还没有让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国部队总指挥的时候，我们面临失去华东一个关键地区的危险，这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的部队从太平洋推进的速度很快。但是，除非你现在采取断然步骤，否则……就挽回你多年战斗的成果和我们为了帮助你而做出的努力来说……这种推进对中国已经太晚了……
>
> 我相信，要阻止日军达成其在中国的目标的话，你现在必须立即对萨尔温江部队进行增援并敦促其进攻，同时立即让史迪威将军不受限制地指挥你所有的部队。我要求你采取的步骤将会加强我们的决心，同时也会加强美国为了维持并增加对你的援助而做出继续努力……我们都感到，如果再有迟疑，那么你以及我们试图拯救中国的努力都将落空。

这些话都很有道理，问题在于它未能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发一封电报给一位国家元首说他不配统治，这毫无意义，除非威胁停止对他的支持。但是，因为不打算停止支持，这只是一份没有威胁作用的最后通牒，最终发电报的人只能退缩。

毫不奇怪，受命送达这封电报的史迪威认为，这表明华盛顿已经采取了断然态度。在他看来，“罗斯福睁开眼了……最后他终于实话实说，而且每句话都火药味十足……赤裸裸的火药味”。作为驻重庆的高级官员，他有义务亲自送交这封总统给委员长的电报。如果他想避免由于送交这封电报而触怒他需要得到其认可并要与其合作的国家元首的话，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推脱一下并让赫尔利去送电报。但是，有总统签名的这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明显表示了蔑视，这也消除了他的各种顾虑。此外，这封电报是发给他而不是给赫尔利的，也没有附带别的指令，或者有缓和其冲击力的意思。当蒋介石宣布从龙陵撤出的时候，由于蒋的不作为，使得史迪威的工作和使命两年半来无法完成。这些因挫折而积累起来的愤怒和轻蔑，此时都爆发出来了。当史迪威读到总统的电报要求由他“不受限制”地统率所有中国军队的时候，他抓住这个机会要直接击

打花生米的心脏。

他命人把电报译成中文，并拿着电报径直去了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当时正在同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商讨史迪威指挥权的有关问题。进入会议室前他叫出了赫尔利并向他出示了电文。对外交有直觉的赫尔利建议对电文进行弱化，由他逐句口头上解释给蒋介石听。这正是过去宋子文、蒋介石夫人和其他送递信件的人一直在做的，但史迪威亲自递交信件正是试图避免这种情况。史迪威拒绝了，并自己把电报拿进去。他后来幸灾乐祸地写道："把这包辣椒粉递给花生米，然后长舒一口气坐下。这叉子直接插进了这个坏蛋的太阳穴，并穿透了他。"蒋介石面无表情地读完了中文译文，看着史迪威，然后说："我明白了。"静坐了一会，他晃动一条腿，然后结束了会议。"什么！没有摔茶壶？没有，只是一片寂静。我马上出来回家了。过江时景象很壮观：重庆到处灯火辉煌。"

后来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畅快心情，风格类似"大屎"那首诗。这首诗早该让它埋没了，但是根据不为贤者讳的原则还是照录如下：

我早就等待复仇——
终于有了机会，
我盯着花生米的眼睛，
并踢了他的屁股。
鱼叉已经备好，
猎物出现，时机绝佳，
我差点儿把手柄都插进去，
让叉子彻底插进他身体。
小杂种颤抖了一下，
已经没法言语。
他脸色发青并开始颤动
还竭力挣扎不要尖叫。
尽管我们饱经纷争，
尽管我受尽磨难，

最后终于轮到我出手
并让花生米吃了苦头。
我知道自己还要受苦，
并要经受磨难，
可是我欢欣鼓舞，
因为撕了花生米的脸面。

毫无疑问，这封电报让蒋介石大感震惊。据说他在会后极其愤怒，而且很快他就意识到其含义。他知道自己无法接受这样表述的美国要求，否则这将为他自己的被抛弃创造条件。如果美国最后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下将史迪威强加给他，那么他们在共产党的问题上也可能采取类似做法。并不是只有高思才看得出来，这可能导致国民党的崩溃。他必须直面这个问题。根据宋子文向他提出的现实建议，蒋介石认为美国不会抛弃他，而他也打算对此试探一下。9月18日的电报给了他所期待的借口。据宋子文说，由于这封电报，他撤销了让史迪威指挥的承诺。

蒋介石和宋子文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表述这种撤销，从而可以显得这并非是在指责总统；因为担心失去租借物资，他们不能触怒总统。正当宋子文着手此事的时候，不可琢磨的蒋介石不动声色地接受了史迪威拟就的桂林防御方案。白崇禧被派去监督这个计划的执行。白在9月20日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史迪威，同时还提到了一个进展，那就是第九十三军军长被处决了——正如史迪威借伏尔泰之口说的，这是为了“以儆效尤”。

史迪威此时已经知道蒋介石发了火，但无论是他还是赫尔利（尽管他事后做过解释）当时都没有觉得蒋已经做了决定。桂林的战事似乎令人振奋，而史迪威也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得到加强，因为他认为华盛顿已经越过了一个障碍。为了就他的任命打破僵局，他9月23日又提出了一整套新建议，准备亲赴延安，跟共产党商量接受中央政府权威并由他在军事上指挥的事宜。根据这些提议，共产党部队将部署在黄河以北，不与国民党部队接触。史迪威建议只为5个师配备美国武器和装备。“这会把树上的柿子摇下来了！”赫尔利很有信心地叫道，然后就去把文件送交委员长了。

结果他大为震惊。蒋介石不但拒绝让史迪威指挥，而且正式要求美国调回史迪威将军。

蒋介石在追求一个目标时跟史迪威一样坚忍不拔。他已经下决心要弄走一个人，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和他的政府的谴责。如果说他是史迪威的恶魔的话，那么史迪威就是他的鞭挞者。他们过去和未来的关系都起了作用。最根本的是陈纳德和史迪威争执中的原则问题：一个要美国空军帮助中国作战，另一个想让中国人为自己而战。如果蒋介石在权力上或者思维方式上能够接受史迪威的军队改革方案的话，那么他部队的战斗力可能足以抵抗日本1944年的进攻，甚至可能在与共产党的最后冲突中战胜共产党。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也许委员长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并不对此感到遗憾。他所关心的是消除他无法容忍的压力来源。

蒋介石现在敢于冒险，因为赫尔利和奈尔逊的存在让他相信，美国会继续支持他。中国人很喜欢赫尔利，认为他为人随和，为蒋介石提供了一条无须借助史迪威和高思表达他观点与愿望的通道。此外，奈尔逊还为美国支持中国战后经济重建拟就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同时还承诺蒋介石（或者通过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经过翻译的谈话以及听众的想当然使蒋介石产生了这种印象）让蒋控制租借物资。这是事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

在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的这一天，赫尔利与蒋介石进行了两次长谈，竭力阻止他做出这个决定，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自己使命的失败。但是蒋介石一旦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就会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就像他在西安事变中被扣住时所表现的一样。解决的办法是把责任全部归于史迪威。史迪威亲自递交总统的电报，他实际上已把蒋介石看成了自己的下属——据蒋介石说。委员长说，史迪威拒绝接受让其进攻的命令，如果他让史迪威指挥自己的部队的话，史迪威就会进行叛乱。蒋介石在通过一个备忘录阐述原因时指责史迪威“无意与我合作，实际上他以为自己的任命是为了指挥我”，他“无法应付这个新任命所包含的广泛而复杂的任务”，并认为他的任命会对美中军事合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备忘录还向总统保证，蒋介石还是愿意任命一个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并做出其他一些有助于使关系“和睦”的重要改变。史迪威对此的评语是：“这东西是宋子文写的。”

自此以后，在又持续了三周的谈判中，唯一确知结局的人便是蒋介石。他处于弱势，但是意志坚决，而美国尽管占有各种优势，却没有坚定的意图。对于当局者来说，形势并没有那么明了。想做大使的赫尔利现在倾向于宋子文和蒋介石的论点，认为史迪威送交电报的方式是错误

的，并在9月25日向罗斯福据实报告。宋子文还说，他和委员长都认为史迪威自己起草了这份傲慢无礼的电报，根据他们的说法，史迪威先向华盛顿建议接着设法以总统之名发来了电报。对这种说法赫尔利只是默默听着。这简直把史迪威看成是无所不能的人，而史迪威本人倒是希望自己是有这样能力的。

由于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评价甚低，因此，尽管蒋已经正式要求将他撤回，但是史迪威仍然在谋求指挥中国军队。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张扬自己，而是为了对付敌人。在这场针对一个强大敌人的战争中，他最关心的仍然是打败日本。他急切想获得任命，这样他就可以像早就计划好的那样对沿海方向的敌人发起反攻。他知道这已经不可能，但是跟往常一样，他在头脑中从不认为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9月26日史迪威向马歇尔明确表明，蒋介石无意继续努力作战，而且“任何敦促他这样做的人要么会受到冷遇，要么会被清除”。但是他仍然继续敦促蒋介石。过去蒋介石曾经多次进退不定，因此有理由认为他又会如此。正如史迪威所了解到的，蒋介石还没有向国家军事委员会或者何应钦通告要求撤回史迪威一事，这说明他仍然留有回旋余地，在等待华盛顿的反应。他们显然在焦虑不安中等待着，宋子文“神情高度紧张和慌乱”便是明证。

9月28日，史迪威提出了林蔚建议的一个妥协方案。林对要求撤回史迪威的事并不了解，但是认为如果放弃让共产党参与，那么委员长会同意让史迪威指挥。史迪威向何应钦提议，提出暂时不考虑共产党的作用，并致力于组织和准备北部战区以及Y军和Z军，以期“在半年内发起进攻”。他完全清楚这正是委员长所无法容忍的催促，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这样提议，否则怎么击败中国大陆的日军？

在华盛顿，委员长再次要求召回史迪威正好击中了美国立场的软肋。这便是马歇尔促使总统采取了罗斯福自己并不真正倾向的立场。罗斯福之所以被动地同意了这种立场，部分是因为他在开罗会议后对蒋介石感到失望，并对他一直以来拒绝调遣Y军感到愤怒，部分也是因为史迪威证明了自己是有作为的人，最后还因为他别无他法。战时最让人头疼的莫过于盟友的桀骜不驯。但是，他现在不想在明确违反一个国家元首的意愿的情况下把一位美国指挥官强加于人。这跟他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并恢复中国主权地位是不相容的。由于蒋介石表示仍然愿意接受任命另一位美国人，总统情愿就史迪威问题做出让步。马歇尔对此坚决反对，但是就在争执此事的时候，在一次晚宴上霍普金斯在非正式情况下向孔祥熙转达了总统的态度，而孔祥熙在10月1日立即把此事电告宋子

文。

不管霍普金斯是否真的说过此话，孔祥熙在电报中推断说，因为事关中国主权，因此总统打算同意召回史迪威的请求。一旦他与马歇尔商量并解决了继任者的问题，他就会对委员长做出答复。这正是蒋介石和宋子文所期待和需要的。委员长立即堵住了自己的退路，向中央执委会常委会报告了自己打算撤走史迪威之事。执委会常委会通常周一下午开会，由于会议议题严格保密，因此通常三到七天后其内容才会流传出来，但是10月2日的议题当天便传给了高思，这显然是有意所为，意在让他向华盛顿汇报并堵住所有退路。

据说情绪激动的蒋介石捶着桌子坚持说，史迪威将军“必须走”，而所有的租借物资必须要由他来分配。他说，如果要任命美国指挥官的话，那么指挥官只能接触委员长指派给他的中国军队。尽管蒋对废除治外法权和排除法案表示感激，但是美国人正在其他方面侵犯中国的主权。“这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如果我们同意了，我们只能变成傀儡；那样的话我们还不如到汪精卫那里去。”他重申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他抱怨说史迪威违抗命令，拒绝向八莫进攻，他还说史迪威吹嘘说如果能去延安他就能让红军合作，但是“除非共产党服从我（蒋介石　）的命令”，否则永远不会允许史迪威去延安。委员长还告诉与会人员不必担心美国会撤出援助：“没有他们我们也能够坚持下去……我们仍然可以在四个省份站稳脚跟。”

尽管下面议论纷纷，但是常委会中只有一个委员大胆做了回应。他说，史迪威是他们所能找到的“了解中国和人民生活”的最佳人选，而一个新人可能会更糟，“因为美国人通常考虑不太周全，他们可能想很快做成事情，可能会更加粗暴”。这也许是对史迪威不同凡响的致敬。

史迪威一了解到蒋介石对常委会的讲话以及霍普金斯所透露的事情（宋子文特意向赫尔利讲了此事）后，他便意识到争执已经濒临终结，尽管仍然在等待美国的正式答复。当天他给曾经在他手下干过的中国高级将领写信告别，同时写信给妻子，让她准备“接受我被踢到垃圾堆上”的事实。在他看来，总统的妥协是个决定因素：“如果这个老软骨头对此妥协的话——显然他已经妥协了，那么花生米从此以后将无法控制了。”

似乎为了进一步肯定史迪威已经大势已去，参加完魁北克会议的梅里尔当晚向他总结时说，会议上对中国战区没有什么兴趣了。他报告了尼米兹上将等人的话，他们说在中国海岸需要建立基地，这纯粹是为了

掩护“我们真正的行动”（即将对菲律宾的进攻）；所有有关对日作战的计划都没有安排中国作战，除非是牵制中国大陆的日军；没有“让大量美国部队陷入中国大陆的战斗中”的意图；而且最具终结意味的是，作战处处长的汉迪将军承认说，目前“史迪威的使命主要是政治上的，并不指望让中国部队进行什么真正的战斗”。承认这一点便是史迪威使命的真正的结束，现在仅仅是采取什么方式召回的问题罢了。

这出戏还没有演完。这场指挥危机的始作俑者马歇尔拒绝召回史迪威，这既有关他的政策，同时也因为这涉及对史迪威的维护。他针对蒋介石的指责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回复”，但是这次罗斯福拒绝发出。

正如史迪威自己所认为的，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的战争努力。他屡次向马歇尔重申，如果这一次蒋介石得逞，那么就不要指望中国还会再作战，而美国今后在中国的努力也就白费了。如果委员长成功地撤换了史迪威，同时又保住了美国的援助和支持，那么他必然会顽固到底了。因为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美国只能跟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吉还是凶。这都不错，但是史迪威指挥问题就侵犯主权而言，的确是个不好的例证，是没有根据的。

美国几乎已经决定终止对华支持。更多是出于普遍不满而非长远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放弃驼峰航线，并且根据史汀生的记录，联席会议还打算从目前起终止“对中国的任何援助”。然而，他们又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这将大大影响中国人的士气，并会给日本很多话柄，说美国负担不起了。这个决定让人愤懑，因为通过驼峰航线向陈纳德提供补给的长期努力落空了，而且正如史汀生写道的，这可能“会使主要战区的战事再延长一个冬天”。从法国的瑟堡（Cherbourg）到荷兰的阿恩赫姆（Arnhem） [3] 的前线上，盟军先头部队都由于缺少空中运输机而放慢了前进的步伐。史汀生对此尤其感到愤愤不平。虽然给陈纳德的“物资装备要比他要求的多一倍”，但是他并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而“整个中缅印战区唯一证明成功的人物”史迪威却成了一个牺牲品。

罗斯福的答复日期为10月5日，这个人们期待已久的给蒋介石的答复并未完全同意召回的请求。马歇尔成功地提出了一种折中方案，根据该方案，史迪威将被解除作为蒋介石总参谋长和租借物资负责人的职务，但是将仍然指挥缅甸和云南的中国部队。电报还通知委员长说，不打算再任命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因为自从最初提出这种建议以来中国地面形势已经急剧恶化，美国政府已经“不应该担此重任”了。对蒋介石来说，这当然算不上什么损失。电报语气仍然很严厉，但是并没有他担

心的内容——停止援助物资。与此相反，蒋介石被告知将继续通过驼峰运送物资，因为这些物资“对保证贵政府的稳定至关重要”。美国对面子问题也同样关注。

由于在关键点上已经松了口，因此律师出身的史汀生觉得“很可能”蒋介石不会接受这种妥协安排——的确如此。蒋介石借口主权问题再次写信给总统，要求把史迪威从中国撤回。“只要我是中国的国家元首和最高司令，我觉得自己有权力对我已经不再信任的军官撤职，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此外还附上了一篇阐述情况的长文，旨在消除自己对当时军事局面的责任，而把责任推给史迪威。

在委员长看来现实是相反的，所有事情都是颠倒的，其说法就仿佛是《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红皇后所说的。他刚刚采取了史迪威的桂林防御方案，现在竟然莫名其妙地说“我不但不相信史迪威将军，而且对他的军事判断也缺少信心”。根本问题便是缅甸战役。蒋介石不但不认为这场战役对中国有所裨益，反而指责这“消耗了中国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后备部队”（他没有指出是谁提供了训练和装备），并“极大地降低了进入物资的数量”（这与事实正好相反），结果这使得中国无法抵御日本的进攻。因此史迪威将军要为华东失利负“严重责任”。一反三年来不断叫嚷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蒋介石这次不同意“局势已经恶化到美国总统所说的样子”，同时他也“不能预见任何会使中国根本瘫痪的灾难”——不过，继续援助当然是必需的。

委员长要求召回的解释在10月11日被转交给赫尔利；赫尔利同意了，基本原因是蒋介石和史迪威“根本不能相容”，而这都是真实合理的。赫尔利进而向总统建议说：“如果你在这场争执中继续支持史迪威，你将会失去蒋介石，而且很可能还会同时失去中国。”可能失掉蒋介石，这在美国似乎是个无法接受的提议；不过这无关大局，因为赫尔利的所作所为对事情的结局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其他事件参与者并不这样认为。

立即发现其谬误之处的史迪威给马歇尔发报说：“这并非在把我赶走与失去蒋介石甚至可能失掉中国之间的选择”，而是“如果现在允许蒋介石制定规则就会失去中国潜在的战斗努力”。他在最后一刻又提出了一种妥协，即为了照顾蒋介石的面子成立中美委员会，让他在其中任职以保证命令能够得到执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此时史迪威仍然在努力；他是个绝对不肯放弃的人。10月14日，他去了桂林以南的柳州跟张发奎和白崇禧商讨反攻计划。

10月6日到15日马歇尔在法国，他回华盛顿后立即去白宫，准备继续为史迪威力争，但是已经没有用了。罗斯福相信蒋介石已经无法容忍史迪威，因此“直接肯定地”下令毫不迟疑地把他调出中国。不管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只要美国还打算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那么罗斯福只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政府上层是否在寻找另外一种方式——去支持国民党？过去的意见一直认为只有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因此决策者接受了这一点，并一直担心中国会重新陷入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现在有一种新的声音认为，虽然蒋介石要依靠我们，但是我们未必一定要依靠他。正如戴维斯在他一份报告中所说的：“我们不应该无限期支持一个政治上已经破产的政府。”但是美国这个一度年轻、勇敢的共和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维持现状的政权，倾向于跟现有政权打交道——哪怕这个政权已经破产。任何其他做法都令人为难并充满风险；就中国而言将会导致共产党掌权，这是唯一有足够活力和组织性从而足以构成一种现实挑战的集团。让美国转而支持延安是不现实的。比较可能的选择是努力使两个政党联合起来，这正是美国已经在政策上推行的。



魏德迈来到重庆，中间者为何应钦

“斧头已经落下来了。”史迪威在10月19日已经获悉此事，马歇尔事先给他发了电报。随后是总统的正式答复，通知委员长已经下令“立即把史迪威将军从这个战区召回”。这封电报在各种电报中语气最为冷淡；电报提醒蒋介石，发动缅甸战役的决定并非由史迪威做出，而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并经过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同意的，当时是出于为中国提供物资的需要。电报还针锋相对地提请蒋注意，这次战役已使驼峰航线降低了飞行的高度，并在9月29日在密支那启用了输油管线。由于史迪威的召回不得不做出一些变动，因此宣布解散中缅印战区并将其分成两个战区，即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萨尔坦将军将接替史迪威在前一个战区的职务，而魏德迈将军将接替史迪威成为委员长的总参谋长并指挥美国驻华部队。 [4] 电报希望能继续在蓝姆伽的训练，“否则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将不可避免地、迅速地被销蚀”，同时Y军也要继续在缅甸作战。

指挥权的危机结束了，史迪威的使命也随之结束了。围绕霍普金斯泄密、赫尔利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史迪威送交电报的方式的争执，基本上都是无伤大雅的；这些并非原因，只是契机而已。召回是一种看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看法认为，由于中国的依赖和被动性，因此可以把美国的解决方案强加给中国。马歇尔的责任在于首先开始了这种尝试，罗斯福的责任在于对此进行了授权，而史迪威的责任在于对此表示同意并予以推动。在更深的层次上说，表面上看是两个人的不相容，根本上则是两种意图的不相容。

史迪威在接到召回通知后，在重庆只待了48小时。他离开时匆忙而隐秘，这都是因为马歇尔将军的命令；马歇尔有理由担心史迪威口无遮拦，因此急于想在宣布消息和记者扑向他之前就把他从这个战区撤出并召回华盛顿。由于当时那届相互攻讦的总统竞选已经达到高潮，马歇尔希望史迪威不要随意发表言论，以免对再度对史迪威委以重任制造困难。

史迪威急切地想表达他对此事的看法，这从他的日记里那些充满痛苦的说法中看得出来：“要对解职发表声明吗？”“允许我发表一个声明吗？”他叫来了白修德和埃金森，秘密告诉他们事情发生的经过，并敦促他们记录情况作为史料。对于记者来说，这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报道，但是报道无法在重庆写成。原计划在一个月内离开中国的埃金森决定立即回国并敦促发表这一报道——不久这引发了轩然大波。

也正是此时，史迪威命令谢伟思回到华盛顿；这次返回是命运攸关的，用意是跟共产党建立关系，对此他在延安提出的报告中有中肯的说

明。包瑞德上校不久前写信给史迪威说：“他们想打日本人，而且他们的部队也能打仗……并且他们愿意跟着你打仗。”尽管史迪威本人跟这个并无关系，但是他一直想着仍然在中国大陆的那24个日本师，并认为应当组织共产党对日军展开某种军事行动。显然，他这样想的时候对国民党并无任何好感。他通过谢伟思的上司高思大使完成了对谢伟思的任命，而高思对史迪威的司令部不断挖走他最好的人员一直耿耿于怀。高思对其动机完全了解，因此他对国务院说，“我们的某些陆军军官——也许包括史迪威——倾向于直接给共产党部队提供援助”，而这便是派遣谢伟思去华盛顿的原因。他的返回华盛顿的使命后来招致美国驻华外交官悲剧性和毁灭性的责难。

在临行前的最后几小时史迪威开始写告别信，其中包括一封写得很体面的给陈纳德的信，信中谈到他对陈纳德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并承认中国人对他备感敬重；此外他还写信给延安的朱德，表示自己“极度失望”，无法“跟你和你所造就的优秀部队一道”对日作战。唯一接到史迪威一封并非正式告别信的英国人是奥金莱克将军；信中说自己视他为“朋友”，同时希望他也能这么看。他专门向孙中山夫人告别，夫人哭了，并说她希望能亲自去美国并把真实情况告诉总统。他正式跟高思大使告别，结果得知大使的任命也要结束了。由于有各种特使绕过他——赫尔利和奈尔逊属于其中被当作救命稻草的特使，高斯没有影响力，因此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他知道白宫不理睬他的意见，并对一项无望的使命感到厌倦，因此他下决心在总统任期结束后辞职。

还剩下最后一个告别。委员长的一名使者前来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中国可以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史迪威的拒绝是意料之中的[5]，但是他必须硬着头皮接受要他去喝茶的邀请。在宋子文陪伴下的蒋介石很客气，他表示对此深感遗憾，说这仅仅是因为性格差异，他希望史迪威继续成为中国的朋友。他请史迪威提出建议和批评，特别是有关柳州的局势，结果吃惊地发现史迪威曾经亲自去过那里。这位客人言简意赅。他请求委员长只要记住他的动机是为了中国好，然后喊了战时口号“最后的胜利！”便离开了。

10月21日，在这个寒冷的阴天，他爬上了自己的飞机，陪伴他的是贝尔金将军。他坚持说只要自己的上司走，他就不会留下；此外还有赫尔利的助手麦克纳里（McNally）上校；他在这个战区已经服务了两年，想法也跟贝尔金一样。赫尔利也感到不快，他承认自己“把事情弄糟了”，史迪威对此表示同意。史迪威认为自己遭到了“蒋氏集团的流放”，

同时又被赫尔利“打出了中国”。由于史迪威被召回是秘而不宣的，只有赫尔利和宋子文到机场为他送行。埃金森随机一道离开，最后一刻何应钦也赶到了；他下了车并向史迪威敬礼。史迪威对他还礼，环视四周后问：“我们还等什么？”接着就起飞了。他只剩下三天的时间去昆明、Y军在保山的总部、密支那以及蓝姆伽逗留，以便私下向旧时的伙伴们告别。没有允许他向那些在他指挥下重回缅甸的部队、筑路者和飞行人员发表告别讲话，这“让人难过”。他10月24日到达德里，两天后，即在为美国在战争中最难以达成的目标做了32个月的努力后，他记下了从事这项使命的最后一次日记：“被铲除了——中缅印战区最后一天。”

对于那些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美国人和很多中国人来说（尽管对这个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第十四航空队并非如此），史迪威将军的召回是一种终结，明白显示了一种巨大的努力宣告结束。曾经确实做出了努力，但是正如一些人感到的，这种努力白费了。如果曾经鼓动并指导这种努力的人走了，而且是在没有任何仪式和承认的情况下被撤出的，那么在很多人看来继续留下只能是徒劳无益的。这种感觉体现在了多恩在萨尔温江前线写给贝尔金的一封信中。多恩解释说他无法离开，因为他觉得在战役没有结束的时候背弃他统辖下的中国和美国军队是不对的，但是他又写道：“我想的越多越觉得未来没有希望。所有的东西本来都‘期以来日’，可是现在看来都落空了……即使在经常出现的那种乱糟糟的情况下，我也一直相信我们会在这里有所作为。现在我不相信了……”

在华盛顿，由于竞选已经到了最后一周，因此对史迪威的归来感到极为紧张。史汀生写道：“我预计将会后患无穷。史迪威的成功使他深得美国人民的好感。”在罗斯福看来，这次总统竞选“是历史上最为肮脏的”，因此召回一位广受爱戴的英雄很可能招致人们指责这里有阴谋。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已经颇得冷战风气之先，在最后的演讲中宣称共产党已经把持了新政。尽管罗斯福一派的人都感到击败杜威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媒体预计结果将会很接近，而罗斯福则希望尽可能得到压倒性的胜利。对史迪威的召回消息尚未公开宣布，同时还采取了特别措施以防媒体接触到他。

布鲁克斯·埃金森写就了报道并在史迪威之前离开德里。他到开罗的时候，跑道上的一名宪兵要求检查他公文包中所有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巧的是埃金森的稿子放在了口袋里。他在突尼斯耽搁下来，于是他把稿子交给具有优先通行权的谢伟思，并要他直接将稿件交给《纽约时

报》，而他则尽量搭乘下一班飞机回去。谢伟思将稿件平安送到，但是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没有准许发表这条消息。《纽约时报》为了发表此稿斗争了三天，就在此时埃金森到了；他回避了报道来源的问题。此事交由总统裁夺；总统认为由于事情基本属实，《纽约时报》有权发表。在史迪威还没有回到美国的时候，《纽约时报》10月31日就已经将此事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了。

文章宣称，史迪威将军被召回表明了“一个垂死的反民主政府的政治胜利”，并迫使美国对“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受信任的”政府至少给予消极的支持。文章形容蒋介石“头脑混乱，并对中国的迅速瓦解感到恐慌”。它对任命另一位美国人作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嗤之以鼻，认为这不啻于“表明我们认同一个不开化、冷酷和独裁的政府……（这个政府）已经无法代表我们的忠实盟友——中国人民”。文章还认为，史迪威是“中国”戈登 [6] 之后最能干的作战指挥官，他“私下无法对委员长产生敬重之情”，但是即便他不是这样，任何外交天才都无法克服委员长“根本上的不情愿”而能让他冒险将部队用于对日作战。

由于埃金森打开了缺口，情绪突然爆发了。高思的辞职已经泄露给了媒体，而且由于这似乎跟史迪威的辞职有关，使得事情更加轰动。中缅印战区的每个记者或者原先在这个战区采访过的记者都开始写那些多年来未获准发表的东西。新闻报道、评论、专栏文章以及电台评论员都参与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约瑟夫·哈希（Joseph C. Harsch）所谓的“一个大幻想的破灭……已经推迟了太久，是该抖出中国这些丑事的时候了”。当问到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即为什么没有向公众告知这种情况的时候，曾在重庆和缅甸工作过的美联社的托伯恩·维安特（Thoburm Wiant）说，这是因为华盛顿一直指望着能够收拾残局，但是史迪威的召回表明这是不可能的。委员长的热情支持者周以德博士指出，任何有尊严的国家元首都不会接受那些别人要求要他做的事情。“史迪威并没有错……我们本来就不该采取这种不可行的立场，现在也只能放弃这种立场。”

罗斯福不得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此发表评论，对此他非常坦然。这都是性格不相容的缘故。蒋介石和史迪威将军“有些争执——哦，很有段时间了——有一天这些争执终于结束了”。这不涉及政治，甚至是中国的政治；不（总统对一个又一个问题都如此回答），无关战略，无关政策，无关租借物资或者驼峰航线运力，无关赫尔利和奈尔逊，无关高思的辞职，“所谓的共产党”也与此无关。这“只是性格问题”。《纽约

时报》的一篇社论就史迪威和高思批驳了所谓性格的说法："假使他们只是缺少圆滑的话，很难想象如果有更加圆滑的代表的话，就能克服妨碍中国作战努力的那种混乱和腐败现象。"

在媒体的吵嚷声中，11月2日星期四，史迪威在距离大选还有五天的时候到了棕榈滩（Palm Beach），次日他就依据保密规定被送往华盛顿，那阵势就仿佛他是从敌人那边叛逃来的鲁道夫·赫斯 [7] 。他的战时使命既缺乏荣耀又不被欣赏，而他自己国家对他的接待也大致相同。没有与史汀生所说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分派给任何美国人的最为艰巨的任务"相匹配的欢迎仪式。史迪威是他的上司们感到为难的人物，是他们退避的显著标志。由于急于想把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白宫和陆军部只能设法让他不露面。据说由于担心引起媒体的注意，马歇尔和史汀生都没有去迎接他；实际上知道他到达时间的史汀生就在史迪威到达半小时前在同一机场乘飞机度周末去了。迎接史迪威的是他的夫人和马歇尔的助手弗兰克·麦卡锡（Frank McCarthy）上校；麦卡锡上校得到的指令是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把史迪威接下飞机并离开机场。他被护送到马歇尔住处街对面迈耶堡（Fort Meyer）的客人住地，在那里迎接他的是汉迪将军和负责陆军公关的塞勒斯（Alexander Day Surles）将军，他们告诫他不要发表讲话。

马歇尔在天黑后过来看望史迪威。眼下他只是提出让史迪威负责陆军地面部队在本土的训练，并不肯定地答应以后再在欧洲或者太平洋给他找什么事做，但是提不出比这更好的了。史迪威不能不意识到："其实没有什么工作给我。"现在作为一名四星上将，他提出带一个师；马歇尔笑了，并告诉他先休息一个月。史迪威明白了，他们想让他不要碍事，不要出声，等到大选结束后再说。

这就是他回家的情形。对他可能发表什么言论的担心似乎过分了。史迪威打算遵从不让他开口的命令，特别是他并不希望在战事正酣的时候被晾起来。但是长期以来他一贯不怕得罪人，这可能影响了马歇尔，结果他从本宁堡以来就努力保护史迪威不受这种性格的牵累，并竭力避免他由于这种性格而有任何不妥当。在史迪威从首都回到加利福尼亚家乡的整个过程中，宪兵和保护性措施一直伴随着他，甚至到了家里他仍然保持缄默。到处都有拿着笔记本和麦克风的记者随时准备让他说些什么，而他自己也确实如骨鲠在喉，因此他发报给塞勒斯将军，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取消禁令。得到的答复仅仅是一个官僚的惯用托词而已："你说得越少，你的地位就会越强。"让他闭口的理由——假如曾经还成立的话

——现在已经不成立了，但是没有人想让史迪威就此事说个明白，就像上次那样，说所发生的事情是“被狠狠揍了一顿”，只不过这次是指对美国的努力而言罢了。



被召回国后，史迪威在家中接待媒体

从个人来说他得到了安慰，尽管这样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因为回到卡梅尔的家里，跟所爱的家人团聚，并在海滨自由自在地遛狗，这些都让他高兴。他不得不丢弃别人对他的欣赏，但是这种欣赏却从战区源源而来。第一支攻入密支那的第五十师师长潘玉坎将军写道，当这个消息传来时“我们都很失落”。负责筑路的皮可将军写道：“我还从来没有过像你这样让我无法割舍的长官。”这个战区的宪兵司令哈里·库伯（Harry Cooper）上校要求派遣时“你到那里我就跟到哪里”。在他们写给他的信中，中国人觉得史迪威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中国，而美国人则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个人：“这就是为了乔大叔做事。”中缅印战区报在一首题为“致敬”的十四行诗中表达了这种失落感。这首诗预言，在未来的日子中——

……人们看见
一个瘦长的魅影走在
利多公路上——他军帽歪戴——
开着吉普车轰鸣着赶往莫拱
……我们会说
“看见了吗？他其实并没有走。”

曾跟史迪威一道作战的中国人对他成就的评价跟蒋介石大相径庭。指挥萨尔温江Y军的常胜将军卫立煌回忆说，他曾经由于剿共有功而得到四个县税赋的奖励，他因此对多恩说：“对于像史迪威将军这样的人，他们当然应该给他至少十个县！”最好的评判来自他缅甸战役时的战友曾士奎将军，他写道：“在至少三年的时间里你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史迪威一直认为，他所说的有关中国的虚假宣传是自己的大敌，因此在深感挫折的时候他会问自己：“当美国公众得知真相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官方政策继续沿着既有轨道进行。赫尔利当然被任命为大使，接替了高思的职位，因为赫尔利正好在中国，因为他想要这个位子，因为他对那位国家元首恭敬有加——尽管在中国的职业军人都认为这个人有一半是虚伪，并请求“派谁都别派赫尔利”。同样圆滑并受人欢迎的魏德迈担任了蒋介石的总参谋长的职位。



B-29轰炸机下的鞍山

史迪威离开重庆那天，菲律宾的莱特湾海战正好开始，这标志着战斗方向开始指向中国。但是除了不得不继续支撑重庆并使中国不要退出战争外，美国军界对中国的兴趣已经消退了。11月中旬，日军从沿海地区向内地以及从江西省向南同时发起两路攻势，并在柳州江合，结果桂林陷落几天后柳州也陷落了。不久之后，由于严寒和战线过长，敌人前进的步伐停在了贵州冰冻的山路上。自4月以来共有8个省陷落，其中包括50万士兵、1亿人口以及最后的海岸线。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信誉遭受重创。蒋介石依然支撑着，反正有美国的支持；正如一位中国人说的：“要统治太虚弱，但是推翻它又太强大。”四年后为蒋介石立传并颇多谀词的熊式一（S. I. Hsiung）曾暗示说，很多伟人如果有先见早点儿死，那他就会更伟大，比如拿破仑在滑铁卢战争之前，威尔逊在凡尔赛

之战以前，以及“蒋介石在召回史迪威将军之前”。

---

[1] 1944年11月15日，罗斯福写信感谢卡尔森转给他周恩来写的一封有关军事观察团的信件。他在信中说：“我在希望并祈祷能够跟所谓的共产党解决问题。”

[2] 奈尔逊大受奉承。蒋介石请他再到中国去参加国家经济重建。他接受此任将是“历史性的事件”，会给中国带来巨大希望。“如果你不来，那么看来中国将会没有希望……我把你看成是一个中国公民，并希望你能够担当中国经济重建的全部重任……我会无条件地把中国的经济大权都交给你。”

[3] 这两个地方在“二战”时均发生过激战。——译者注

[4] 史迪威作为东南亚战区副总司令的职位被威勒将军接替。

[5] 中国政府在1944年3月第一次提出给史迪威授予这种勋章。史迪威告诉陆军部说，为了保证他完全能自由行事，他拒绝接受中国或者英国的勋章，而且如果他无法“平和地”达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就将援引陆军部的一项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凡是参与租借物资分配的人都不许接受外国勋章。陆军部据此对他最终拒绝青天白日勋章做了解释。

[6]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英国军官，曾参与抢劫焚掠圆明园，1863年接替美国白齐文统领“常胜军”，配合李鸿章攻打太平军。——译者注

[7] 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德国纳粹首领，1941年单独驾飞机逃到瑞士。——译者注

第二十章

“我们必须撤出——就现在”

1945—1946年

由于机敏的史迪威的运气，他最终得以如愿地在战场上结束这场战争。不过，在他回来的头几个月里，好像他注定要在案牍中干到战争结束。1月23日他被任命为美国国内陆军地面部队司令，负责训练。在海外战事正酣的时候，这份工作对他没有吸引力。“我会先尽量忍受，然后爆发。”他在给温妮的信中写道。马歇尔没有确切表明会让他在太平洋地区担任什么指挥任务，同时史迪威认为总统没有接见他是个不祥之兆。

陆军地面部队的总部设在华盛顿，但是史迪威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个营地之间走动，以视察训练情况并解决回国士兵问题。跟其他视察的将军不同的是，他不去看营房，而是像在蓝姆伽一样立即查看训练和射击操练。在视察的间隙他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证据便是有警察开道把他从奥尔巴尼一直带到华盛顿，飞机就地等着他。有各种讲演，会议，听证；在一次公开晚宴上大家对他报以热烈的鼓掌。他还曾经应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演讲，跟“想让他谈谈”的副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谈话，此外，根据后来的司法部长文森（Vinson）法官提供的说法：“美国人民把我视为一种典范。天哪！”

当利多公路终于推进到中国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时，他对这种荣誉感到悲喜交集。Y军和缅甸部队在1月会合。后面紧跟着的道路穿越过来在八莫跟老滇缅公路连接，并在1月25日通车。负责筑路的皮可将军向接替史迪威在缅甸的指挥任务的萨尔坦将军表示说：“我成立了一支车队。我请求你准许车队开往中国。”当第一批卡车经过24天艰难跋涉从阿萨姆邦到达昆明的时候，近千名欣喜异常的民众挥动着彩色横幅，上面用中国字写着：“欢迎第一支车队通过史迪威公路。”庆祝时史迪威的画像跟蒋介石和罗斯福的一道被人们举着。蒋委员长宣告说：“我们冲破了对中国的封锁。请允许我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名字命名这条公路，以纪念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在他指挥下盟军与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和筑路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我想知道是谁让他这样说的？”主角史迪威

这样想。

印缅战区美军总部正式发文同意了这个命名。此时陆军电台播送了史迪威自己的声明。他感谢所有的战士——步兵、工兵、医务人员、空勤人员、卡车司机以及劳工，是“他们为之奋斗并最终建成”了这条道路。他对自己的作用不置一词，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萨尔坦的一封私人来信要比这种种官方荣誉都更好地概括了实情；他在信中说，开通到中国的道路的是“你顽强的意志”。

不管史迪威对总统对待他的态度怎么心怀不满，他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均无表露，哪怕是意味深长的微笑或者皱皱眉头都没有。一位朋友说：“幕布是严严实实地拉上了。”他内心里却在痛苦地思索，这体现在他就自己指挥时的情况和中国的问题所进行的反省以及就此所做的笔记。他在陆军部长史汀生家里的晚餐上做出了无可回避的结论，对此，根据他所做的记录是：“在中国除非除掉蒋介石，否则毫无办法。”反面也同样无可回避：其他的选择是什么？因为对此并无现实的答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共产党正在奋力改变，因此史迪威认为，作为中国的“农民自由主义者”，共产党也许会为美国提供一种支点。在另一番谈话中莫斯（Wayne Morse）参议员发现他对共产党和对蒋介石“同样持批评态度”。他说中国正在陷入“长期内战，对此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只能等着中国走出混乱。史迪威在笔记中写道，只要蒋介石还在掌权，那就不会在统一，甚至是在可行的联合方面有任何进步。由于支持反动的重庆政府，美国在中国遭受重创并跟旧有的殖民体系联系到了一起。“除非我们立场坚定，否则我们将与法国、英国、荷兰和重庆归入一类。”

史迪威主要的精力用于为僚属们正在编纂的他指挥地区的大规模记录《中缅印战区史》（*History of the CBI Theater*）编辑和撰稿。这些包括战斗报告、政治工作报告、各分支机构专述以及综述的报告在内的资料，整理完成后装满了一只箱子，并在3月7日提交陆军部。当他帮着在五角大楼的过道里搬运这只箱子的时候，有人问他里面装的是什么，他回答说：“给汉迪将军的一封信。”这份材料最后一章在对中心论点的总结中指出，由于在支持中国的同时并未对租借物资要求在作战方面做出承诺，美国是在执行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在一种徒劳的输血中耗尽了公共资金”。就他自己的作战指挥而言，史迪威的结论是，由于无权“指挥”自己的部队，他的指挥被削弱，结果他无从制定战略或者直接战术。在批评自己的国家和职业时，他认为美国的军事教育是有缺陷的，由于

对外国的做法和特点缺少认识，我们的士兵“只知道按美国方式行事，但是一旦这行不通便会变得困惑并失去耐心”。他认为，如果美国想在未来各国军队中立于前列，那么美国的教育体系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

报告公然对抗美国政策，在最后谴责了蒋介石政府，不赞同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支持，并预言这个政府将会倒台。在总参谋部的授意下，这个报告的内容缩减到了700页以内，以便于处理和保管。但是即便如此，史迪威还是被告知，如果他想让这份报告发表的话，就必须剔除那些对蒋介石和英国的无情批评。他拒绝了，这也就意味着报告肯定无法发表。

史迪威的见解还是值得听取的。“在当时的中国，也许是永远，再也不会有美国人能处在更好的位置观察蒋介石优点和缺点了。”A·T·斯提尔（A·T·Steel）写道。此人从1932年到1950年是《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以及其他报纸的驻华记者。

还有其他人的建议也同样未被采纳。出于对政策的不满，大使馆的政治官员在2月发出了一份史无前例的联合电报，电报是赫尔利不在时由艾奇逊以代办身份签名的。他们警告说，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正在使蒋不愿意做出任何妥协；与此同时，正如他们当中有人曾经对北方地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参观后所见证的那样，共产党正在增加实力，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困境便日益临近了，那就是美国一旦在中国登陆将不得不做出决定，是选择接受还是拒绝跟共产党合作。魏德迈的指挥部所拟订的计划准备将美国伞兵部队空投在共产党地区——报告既天真又傲慢地认为——以“组织、领导并指挥”共产党游击队对日抗战。然而，除非蒋介石已经确定了共产党参与政府的条件，否则无法做出任何可行的安排。使馆官员争辩说，迫使蒋介石和谈的唯一方式是命令他，而不是请求他。他们还建议说，不管蒋介石同意与否，现在都应该做出是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定，并将决定如实告诉蒋介石。电报由副国务卿格鲁在表示赞许后于3月2日转呈白宫，这跟史迪威提交报告给五角大楼是在同一个星期。

驻外人员趁赫尔利在华盛顿的时候提交此报告并非偶然，因为他们的提议在效果和意图上都是对大使的不信任投票。赫尔利受命支持并承认政府，避免其崩溃，并敦促国共部队立即联合起来。他试图居间斡旋使两党能够达成某种协议。他一开始志得意满，志在必得，但是尽管他天生精明，还是很快发现这是他力所不及的。国民党的曲意逢迎让他得意，但由于对中国背景缺乏了解，同时又对问题的深度没有概念，结果

他听信了蒋介石周围人的说法，并接受了他们的保证，以为凡事皆有可能。然而，尽管有会谈和休战，有提议以及对方的回应，在联合政府方面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他的政府一直想促成此事。华盛顿越来越感到迫切。中国正处于内战边缘，无法填充未来日本战败后所留下的空白。此外人们还担心，如果这种分裂无法弥合，那么苏联可能跟共产党就控制东北达成某种协议。

种种挫折和困难让赫尔利恼火。他开始出现一些暴躁的举止，发怒骂人，中断了使馆所有的常规事务并疏远了其他工作人员，几乎到了相互之间完全不信任的程度。赫尔利认为谢伟思、拉顿以及其他敦促采取更独立于国民党，并更多考虑共产党的现实政策的人是在破坏他的努力。他相信有针对他的阴谋存在，因此跟中国人展开复杂谈判时只有一名上士充当书记员，并不征求自己同事的意见便向华盛顿报告。他的同事们则深信他的报告之偏颇和误导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这导致他们未经作为使馆负责人的赫尔利过目便提交了自己的报告，最后在2月以联合电报的形式发给了华盛顿政府。

总统维护赫尔利并反对其同僚的意见，认定除非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美国不能支援共产党。这个决定同样是取决于主权问题，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召回了史迪威。美国政策在立场上仍然确定无疑地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争斗中拒绝跟当权政府的对立集团单独交涉或者对之提供援助。这个立场尽管正确，但是不现实。中央政府的主权只是一种表象，正如其民主不过是一种幻象一样。共产党其实并不像赫尔利向周恩来所申明的那样，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党派，与其他党派的唯一区别是它是武装的；它实际上是个独立体，有国家的各种特征——政治组织，领土控制以及自己的军队。共产党目前声称他们只是国家的一个因素，并愿意在某种条件下商谈统一问题，这使人混淆了这个问题，但是并不能改变事实。他们充满活力，正在成长，而国民党则正被侵蚀。

华盛顿对此并非一无所知。斯特汀纽斯国务卿（他于1944年11月接替了生病的赫尔）在1945年告诉总统说，蒋介石之所以抵制联合政府，是因为这意味着国民党主宰的结束并为“更加雄壮、更加受欢迎……并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开辟了扩张其影响的新天地，最终共产党可能控制国民政府。然而，如果未能跟共产党达成协议，这又会招致“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危险”。

委员长并没有这样的担心，美国对他的一贯支持让他感觉自己很强大。对美国来说，这种支持事与愿违，让蒋介石变得更加顽固，而不是

让他倾向于退让。他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同时也误解了自己的现状，因为正像史迪威经常抱怨的，没有人告诉他实情——也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何应钦对共产党实力的“可笑”估计显示了他“完全无视事实”，对一位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来说，这表明了“只要这类人仍然在发挥重要影响，想在中国实现统一的努力就是无望的”。

美国政府本性上对新事物充满戒备，无法调动足够的决心减少对蒋介石的支持，不敢面对他倒台的危险。在做出支持赫尔利的决定后，出于对大使地位的考虑，那些有异议的外交官都改任他职。共产党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政策并不会有利于他们。他们开始有了猜忌，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又产生了敌意。不过，透过表象不远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在根本上的排外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敌视。对美国来说，他们把共产党看成“抢夺财产的人”，因此对他们存有近乎本能的恐惧，这显然是形成政策的一个因素。不管罗斯福是否也有这种想法，他无疑明白这种恐惧情绪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危险性。也许现在超越其他所有因素的决定性原因是他已经无法承受蒋介石的崩溃，尽管他本人已经不抱多大幻想来指望蒋介石政府领导下的中国能够扮演他计划中的大国角色。

毛泽东复电接受蒋介石邀请，赴重庆“商讨和平建国大计”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在蒋介石不知情也未必同意的情况下就向苏联出让中国的某些利益，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议》是一场艰难的谈判，是在没有中国人参加的情况下试图说服苏联对日作战。对斯大林所做出的让步除了波兰问题外，还包括苏联继承老沙皇在大连的特权以及中国的中东铁路。相应地，苏联将承认中国在东北拥有“完全主权”，并愿意同被承认的政府元首蒋介石缔结友好条约并结盟。后来让雅尔塔会议成为争端导火索的并不是这些让步，而是邀请苏联再次现身东北。



毛泽东和赫尔利



蒋介石与毛泽东

之所以有这种需要，是因为中国政府管理的真空。一种被认为不争的事实是，需要由苏联地面部队来击败东北的关东军。这是个公认的事实，对此总统只能听取军方的意见。此时还没有试爆原子弹，欧洲战争尚未获胜，而根据军事情报部门对日本延续战争能力的错误估计，对日战争在击败德国后还会持续18个月。尽管也有人对此表示不同意，但是战略家们流行的看法是必须攻入日本本土，因此美军的伤亡可能多达100万。此外，还担心几乎是一支独立部队的日本关东军可能跟中国大陆的日军汇合并继续抵抗；也许正如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迪恩（Deane）将军所预计的，他们会“建立一个新的日本国”。

罗斯福在雅尔塔的让步是出于考虑美国人的生命。他只能给出一些东西，否则正如斯大林所坦言的，如果苏联什么也得不到，它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如果中国人在军事方面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让苏联人参战的必要性就会小一些。假如史迪威创建90个有战斗力的师

的计划得以完成，那么也就不会有雅尔塔会议了。

1945年2月10日，史迪威被授予了迟来的荣誉军团勋章，表彰他“意志专一和无尽的热忱”，同时还被授予卓越服务勋章橡树叶勋章（Oak Leaf cluster of the DSM），以表彰在开辟史迪威公路时他的具有“极端重要性和复杂性”的功绩。陆军部长史汀生为他佩戴勋章的时候，说自己从来没有像给史迪威授奖这样感到高兴。对于错过了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战斗的史迪威来说，这两枚勋章还谈不上补偿。他憎恶华盛顿，在他看来那里“跟重庆一样是一堆大粪”。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除非能让我做什么带劲的事，否则我就会照我告诉过你的事做（要求带一个团）并让陆军部受到羞辱。”

史迪威心中还希望最终率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吕宋——台湾——华南这个三角地带在战略计划中仍然是重要的。2月7日，他注意到合众社的一篇推测性的文章认为，指挥进军中国的总司令是他自己、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而且优先顺序也是如此。史迪威从来不是满足于等待天上掉馅饼的人。当尼米兹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史迪威去拜访了他；不管他们是否谈及此事，根据史迪威的记录，会晤“很热烈”。3月8日，他陪同一群军人去白宫，结果没有发现总统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对他造成妨碍的迹象。“罗斯福在会见后跟我攀谈，谈到了缺少士兵以及对日进攻的严重性。说他很高兴利多公路以我命名。他看上去很糟，但是不像雅尔塔的照片上那样糟。”出去时史迪威甚至向自己的副官表达了稍许赞许，似乎在疲倦地迈向终结的时候，他短暂地感到了罗斯福的一丝魅力。再过一个月稍多一点儿，即4月12日，总统去世了。罗斯福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最持久的支持者，而且不管他有怎样的幻想，他也是最坚定地把中国的未来放在美国一边的人；他去世得太早，结果没有来得及知道——除非他有一点点预感——他付出努力的结果。

重回中国在史迪威看来并非不可能。梅里尔从战区回来时报告说人们都想念他，说“在我的事上站在蒋介石一边的还不到10个人”，还说孙立人提议中国军官请求罗斯福让他回去。据报告说，魏德迈和他的同僚“现在的说法是，由于我们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即使他们来也无法纠正了”。然而，当日军似乎即将进攻昆明的时候，委员长和魏德迈的办法便是要求把缅甸最初的第二十二师和第三十八师调出，而史迪威曾经跟这两个师一道训练和作战。第二十二师和另外一个在蓝姆伽训练的师被空运回中国以应付危机，结果发现无此必要。由于美国加强了空袭，同时也出于保护粤汉铁路和防备美军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日军没有在华南

再次发动攻势。

正像史迪威之前曾经谋划过的，魏德迈准备让中国师对广州海岸发动攻势，而他可以支配的资源要远远超过当时史迪威可以得到的。驼峰航线的运输量在1945年1月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6吨，同时还辅以史迪威通过发动战役开通的公路和输油管的运输量。委员长同意发动战役，但是，尽管跟重庆达成了和睦，军队的表现却跟史迪威在时一样捉摸不定。魏德迈擅长搞好与委员长的关系并能够轻松应对各种礼节，这赢得了蒋介石的配合，但是他给马歇尔的报告有点似曾相识。“要是中国人能合作就好了！”他这样哀叹道。委员长及其亲信“无能又糊涂”，最高司令部的“政治阴谋和自高自大”荒谬可笑，指挥官“无法发布指令”，中国的后勤保障“可怕地低效”。

摆脱了这些烦恼的史迪威密切注意着争夺太平洋指挥权而发生的斗争。史迪威在陆军部的一位朋友在一次长谈后“说指挥权最后将归结于我。当局无法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然而麦克阿瑟却像横亘的喜马拉雅山一般无法回避。麦克阿瑟认为自己是指挥整个太平洋战争的不二选择，但是目前的指挥权是根据地理位置由他和尼米兹分开指挥的。4月份当焦点聚在日本的时候，指挥权重新调整，由麦克阿瑟担任太平洋美国陆军总司令，而尼米兹则平起平坐地担任太平洋地区整个海军的总司令。

4月1日开始攻入台湾和日本南端之间的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冲绳岛，为了争夺这个岛屿，展开了所有岛屿战中最为激烈、代价最大、防守最为顽固的战斗。占领这个距离日本中心350英里（约563千米　　）的岛屿，可以使B-29轰炸机对日本工业和通往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发动更猛烈的袭击，这是从马里亚纳的关岛和塞班岛发起进攻所无法比拟的。由于日本人的战舰已经处于下风，他们拿出了最后一种致命武器——神风敢死队驾驶的自杀飞机。日复一日，这些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呼啸着向集结起来支援这次进攻的美国战舰俯冲过去，造成了令人恐惧的破坏。在岛屿的岸上日军守军集结了他们所能够调动的所有炮火，以与美国第十集团军的大炮、飞机和燃烧弹抗衡，这使得岛上到处泥泞不堪，一片废墟，但是无法摆脱进攻者。由于日军无法进行增援，结果已经没有悬念了。

5月8日，欧战胜利。就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而言，跟那些认为轰炸、封锁和包围就足以让其投降的人相比，提议直接攻打日本本土的人占了上风。拟采用的进攻计划分两个阶段。首先是进攻日本本岛最南端

的九州，日期定在1945年11月1日，四个月后开始进攻本州。代号“奥林匹克”（OLYMPIC）的第一阶段由包括12个师的第六集团军完成，代号为“王冠”（CORONET）的第二阶段总攻由第八和第十集团军完成，总计25个师。从欧洲调来的第一集团军将作为预备队。麦克阿瑟负责指挥岛上作战，而尼米兹则负责海战和两栖登陆阶段。



《下一个目标：日本》，美国战争债券海报

苏联参战并牵制住中国大陆的日军，是麦克阿瑟认为的发起进攻的先决条件，不过在后来的冷战年代中，狂热掩盖了这个情况。对进攻难度的评估反映在官方估计中：尽管陆军部中有些人的看法更加乐观一些，但是官方认为，即使在欧战胜利后，打败日本仍然需要十五个月之久。

攻克冲绳使得不再需要利用中国沿海。估计在华东和华南的日军可能会撤出去防守长江谷地或者增援日本本土岛屿，这样就可以不受抵抗地进入华南港口。没有制订在中国强行登陆的计划。史迪威在华期间地平线上闪烁不定、期盼多时的高潮退去了。之后在6月，日本开始撤出1944年进攻中占领的华东地区。日军在撤出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其他城市前先是进行焚烧和破坏，然后撤到沿海和北方。中国军队未经战斗便进入了这些历经浩劫的地方。

史迪威在西点军校时就认识麦克阿瑟，他们当时只差一个年级。如果有什么机会的话，他认为机会将来自麦克格雷格那里，因此史迪威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就到源头去看看。马歇尔给他了方便。他专门安排了一个代表团去太平洋前线视察，以确定军级指挥官在陆军地面部队的作用方面的需求。在5月10日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中，马歇尔“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说我可以去并自己安排……道格拉斯显然已经控制不住了，陆军部害怕他。所以我准备自己去看看。跟多恩、贝尔金和琼斯谈了此事。他们都赞成我去”。由于没有正式命令，为了预防万一，多恩和贝尔金是作为史迪威参谋团队的核心成员参加的。他5月21日离开，在巡视途中岛屿后于5月25日到达马尼拉。麦克阿瑟亲切接待了他，接待方式也很合乎其个性：麦克阿瑟发表了一番演讲，说想让一个朋友替自己说说话。他鼓励史迪威到各处看看，见见大家，跟第六和第八集团军的指挥官克鲁格和埃其尔贝尔格（Dwight David Eichelberger）谈谈话，提些建议并给他出出主意。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在此期间史迪威还访问了冲绳。史迪威在奥德堡时带过的第七师也隶属于第十集团军在冲绳作战。到处都是日本人曾经占据过的山洞、地窟和坟墓，现在他们已经被火焰喷射器赶出来了。“这些可怜的冲绳人甚至连祖先都被炸成碎片。”美军士兵由于遭遇不间断射击，有时竟然连续几天站在2英尺（约60厘米 ）深的泥泞中。双方都在死亡和痛苦中奋战。最终这个60英里（约96千米 ）长的小岛上的伤亡情况是：美军1.2万人死亡，3.6万人受伤；日军超过10万人死

亡，并有8000人被俘。

6月18日，也就是史迪威准备离开的前一天，麦克阿瑟问他愿不愿意做他的总参谋长。“我告诉他不，说我认为自己是位作战指挥官。”麦克阿瑟问，尽管他是四星上将，他愿不愿意带一个集团军。史迪威回答说只要能跟部队在一起，哪怕一个师也行。“哦，哦，”麦克阿瑟说，“如果你愿意带一个集团军，那么我当然最希望由你来带了。”他谈及他和尼米兹一直在争夺的第十集团军，尼米兹当时仍然在指挥冲绳战役。第十集团军的指挥官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Simon Bolivar Buckner）将军是偏向尼米兹的。麦克阿瑟说，要是他能把第十集团军从海军那里弄过来的话，如果马歇尔同意，他希望能由史迪威来指挥它。史迪威第二天启程回去。在他到达第一站关岛时得知巴克纳将军已经在冲绳被弹片击中身亡。他给麦克阿瑟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在哪里能联系到自己，然后继续往东去。到达火奴鲁鲁时他接到了期盼的电报：“指挥第十集团军。即回关岛。”

6月23日，史迪威接过了第十集团军的指挥权，准备率先对日本发动总攻。十天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制订计划，以防备日本突然崩溃或者投降。在新墨西哥，“曼哈顿工程”几乎做好了试验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结果怎样不得而知，而战地指挥官也并不知道有此项计划。冲绳战役已经到了扫尾阶段。将岛屿发展成为一个基地并让第十集团军休整和备战的任务依然存在。史迪威发现这是个压力甚大的24小时工作，由于缺乏协调和主动性，工作受到妨碍。“我只能要么是个刻薄鬼，要么就面临灾难。”他后来说，自己所得到的最大赞扬便是，当他开着吉普车经过，一些第七师的战士从掩体里往外看到他时欣喜地喊道：“嘿伙计，乔回来了！”

他的笔记中写满了有关进攻的各种计划和想法，其中包括增加战术航空的运用；同时，他显然同一位老同事说好，希望由地面部队控制战术航空兵，“如果能协调妥当”，则可以保证有比过去更好的团队合作，取得更有价值的结果。7月6日，就在史迪威等人制订上述计划的时候，他们的对手陈纳德将军愤然辞去了第十四航空队的指挥职务。他受到了马歇尔和阿诺德的排斥；他们在重组的过程中把斯特拉梅耶任命为驻华空军总司令，位居陈纳德之上。陈纳德有着奋力作战的经历，但是这不足以消除他诉诸军队以外的渠道和压力的做法而在其上司那里引起的不信任。在一封由艾尔索普（此人的过分活跃也是促使陈辞职的部分原因）为他起草的冗长的辞职信中，陈纳德“带着愤懑”结束了其军事生

涯，并将在中国的所有失误归咎于史迪威。



陈纳德离开中国

6月16日，原子弹秘密在新墨西哥州成功试爆。从7月17日到8月2日，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上会晤了斯大林；他们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面临“迅速而彻底的毁灭”。日本军界统治者拒绝了最后

通牒，不过文官政府已经开始通过苏联商谈和平，并得到了天皇的许可。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诫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说，准备应对日本可能投降已成“当务之急”。应对投降的行动计划代号为“黑名单”（BLACKLIST），8月3日该计划送交史迪威；计划要求第十集团军占领朝鲜。他写道：“马尼拉对此表示乐观。”与此同时，进攻计划仍在继续。他得知英军也将参与“王冠”行动，其中包括一个加拿大师、一个澳大利亚师以及一个印度师。“他们要受我指挥。天哪！”这一安排已经得到英国国防部批准。“他们说这些部队知道在哪里他们应该跟我站在一起……蒙巴顿为了此次战役不得不让出一些部队！生活真是有趣。”

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原子弹。8月7日，苏联参战。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投向长崎。“真是革命性的。人类文明快速走向自杀。我现在只能承认日本佬可能投降。苏联加上原子弹应该够了。”原子弹所产生的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是，给日本迅速投降提供了一种保住面子的理由，结果事态的发展比预计的更快。经过就天皇的地位展开的激烈争执，最终美国同意保留天皇，之后日本于8月14日投降。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史迪威像在1918年时那样记上了一笔。尽管这意味着率领美军作战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跟所有人一样如释重负。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想进攻日本本土。史迪威首先想到的是刚刚18岁的小儿子。“我很感激我们不必把本也弄进来了，因此我对怎么处置那个该死的天皇并不在乎……谢天谢地！我们活下来了。我们家没有人伤亡，算是很幸运的人家。”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

他当下的前途让人失望。由于“道格——尼米兹之争”，第十集团军最终被拆开，就像所罗门判案时那个婴儿似的。除了个别团被分派调遣外，这个集团军基本上未能参加占领。史迪威从麦克阿瑟那里还了解到另一个麻烦的问题：蒋介石曾经向华盛顿求证一个传言，即史迪威将军将统率美军在中国海岸登陆；杜鲁门答复说，史迪威将军不会在中国海岸登陆。麦克阿瑟宣称，他认为，如果问华盛顿是否把朝鲜也包括在中国海岸之内的话，那么答复毫无疑问将是确定的。他不想冒耽搁占领军调动工作的风险。他答应如果可以安排妥当的话，以后将把第十集团军派驻日本。史迪威很愤怒：“看来他们又一次卡住了我的脖子”——为了照顾蒋介石。



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了

前去访问的记者发来了中国大陆的消息。“中国一片混乱。美国面临卷入旋涡的危险。共产党正跟苏联人联系。”如何安排好在中国本土的100多万日军以及“满洲”几乎同样数目的日军的投降，这是个大问题。由于没有预料到这么快就面临重新接管从广州到北京等大城市的艰巨任务，更别说曾被日本统治了十五年的东北和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因此中央政府并没有相应的计划、组织和资源。交通问题一直是中国最大的阻碍，现在交通更是支离破碎，90%的铁路无法运行，机车和内河运输都遭到破坏，而公路则跟过去一样糟。为了最终控制这个国家，最急切的问题是要由国民政府军赶在共产党之前回到华北和东北。美国空军和海军帮助将国民党部队运到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和其他地方。在华北，由于共产党部队也赶往同样一些港口和城市，冲突变得不可避免。美国在这场竞争中帮助一方而不帮助另一方，这很可能使自己卷入内战，并肯定招致未得到帮助一方的仇视。史迪威只能看到一种解决方式。他在8月19日坚定地写道：“我们必须撤出——就现在。”

史迪威很高兴地得知自己将参与接受敌人的正式投降，这即便不是因为他在缅甸的战功，也至少是因为在琉球的贡献。他还准备参加计划9月2日在东京湾举行的日本正式投降仪式。他跟其他军官在仪式前两天

抵达战败国日本，在参观横滨那些被彻底炸毁烧毁的街区时他有些幸灾乐祸，并直直盯着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獠牙杂种”；现在这些人都住在废木板和破铁皮搭成的简易棚子里，并在肮脏的地里种洋葱。他在20世纪30年代看到日本对中国施加的暴行以及侮辱外国人时所感受的未消之恨都了结了。“我们对日本遭到的破坏幸灾乐祸，感觉很痛快。”

根据史迪威所看到的在“密苏里”号上的受降仪式跟教科书上描写的有所不同。他作为受降代表团中的美国陆军高级军官登上战列舰，第一个走上后甲板，然后所有人各就各位开始等待。日方共有11位代表，文职官员为首的是重光葵外相，军方为首的是梅津美治郎大将；史迪威他们也爬上甲板就位；“我们在瞪着他们看的时候，这些冷酷又可憎的面孔上透出无限屈辱”；史迪威他们静静地立正站立，目视前方。“谁都没有说话。我们只是看着他们……整整十几分钟。可能这对他们相当于十年。”麦克阿瑟是整个盟军的指定代表；他从舰长舱出来，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开始讲话；他的手和脚都明显在颤动：“克鲁格说这不是因为紧张，可是看上去抖得太厉害了。”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是麦克阿瑟签字；麦克阿瑟旁边站着的是温赖特和珀西瓦（Authur Percival）将军；这两位曾经分别在巴丹和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之后一直待在日军战俘营。史迪威对珀西瓦的评论一开始就是：“我所见过的最虚弱的小妞，哪怕是在英国军队里也未见过。”然后又阐释了一番——其实这种苛刻并无必要。当他有了某种偏见的时候，他的酸醋性真是让人招架不住。

在代表美国的尼米兹率领下，盟军代表依次签了字。除了这位美国海军上将和中国代表以外，在史迪威看来，其他盟国代表都是“一群乌合之众”：那个英国人是个“肥胖的红团子”；那个澳大利亚人仿佛是“一桶杂碎”；那个加拿大人仿佛是“一个又老又糟的舞男”；法国代表“穿着整齐”，但是两个助手很丑陋；丹麦代表是个肥秃子；而新西兰代表看上去很业余。“在日本佬看来这些人多么滑稽可笑啊，他们并非人类的最佳代表。”

9月7日，他亲自主持了琉球的受降仪式。日方代表为两名将军和一名海军上将。先让日军代表经历了十分钟痛苦的立正等待，史迪威才露面，大家的目光才重新聚焦。美国大兵喊道：“干得好，乔，让他们等着。让他们一直等着，乔！”乐队开始奏将军进行曲，史迪威在桌旁坐下，签署受降文件，然后通过一名第二代美籍日裔上士发布指令，让三名日本代表签字，随着由100架海军战斗机和60架B-29轰炸机组成的庞

大机群飞过，仪式宣布结束。“真是些冷酷无情的事。”他的战争结束了。

后来他听说第十集团军将不参与占领，而是要在10月15日回美国，此时他再次试图回中国看看。在第二次去日本视察的时候，史迪威于9月26日给马歇尔发报，要求去北平探望老朋友。在一周的等待中，斯特拉梅耶试探了蒋介石对此的反应。显然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影响力或意图感到担心，因此他回答说，由于共产党和日军部队都在北平，局势“很混乱”，因此在国民党军队进驻之前（投降六周后他们还未到达北平），史迪威将军的来访可能会被共产党所利用。他答应“一旦国家局势安定下来”，就会正式邀请史迪威访问中国。不幸的是，局势并没有朝稳定的方向发展。史迪威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恭维：“我在亚洲大陆上不受欢迎……也许蒋介石认为我会发动一场革命……如果可以，我想做的倒正是这个。”史迪威没有来的情况下，中国发生了革命。而史迪威后来也再没有到过中国。

1945年10月18日史迪威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生命只剩下一年差一个星期。按照通常情况，他应该在1945年3月64岁时退休。由于第十集团军被解散，他临时受命到华盛顿任战争装备委员会（War Equipment Board）会长，结果引起了他这番评论：“我显然更适合做些其他的事情。我完全愿意滚开。”《陆军时报》（*Army Times*）的说法更加恰当；该报把他选为和平谈判的军方代表，认为他“在这场战争中所经历的前线战斗比任何高级军官都要多”。另一场世界性的和平会议没有开成，而史迪威的华盛顿使命幸运地只持续了几个星期。在1月份的时候他高兴地受命担任第六集团军司令，负责西部防御，总部在旧金山的普来西多（Presidio），这里距离他在卡梅尔的家只有几小时路程。

在史迪威离开华盛顿之前，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卷入又爆发了另一场争执，其激烈程度跟他被召回时的那场争吵不相上下。11月25日，赫尔利辞去了驻华大使职务；他公开指责“我们的国务院总体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在竭力支持共产党，特别是在中国”。这种指责引起了震动。日本投降后，美国继续援助中国，这是通过维持魏德迈的指挥同时继续将租借法案延长半年进行的，直到日军被遣返，中国内战的威胁被消除为止。在各种性质的美国机构的敦促下，重庆和延安的谈判仍然在继续，但是他们的军队已经对峙并发生零星交火了。毛泽东同他的主要将领周恩来和朱德已经多次抗议美国用飞机和战舰将蒋介石的部队运到华北，同时也反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国民党到来之前替它驻防一些城市，并抗

议美国继续向重庆提供军火。美国提供这种援助的理由是考虑到有大批武装的日军还待在中国这种危险因素。对于正在试图加强对华北的控制并想掌控东北的共产党来说，这不啻是一种干涉。援助激发了他们的仇视并削弱了美国作为斡旋者的影响，因为美国在斡旋中似乎偏向一方。

在各个方面都显现出美国卷入内战的危险，而有些爆炸性事件更是一触即发。一队美军在靠近大连对面的战略性港口烟台的时候，共产党警告他们不要靠岸，因为八路军已经控制了这个港口和地区。指挥这支舰队的美军上将和海军陆战队将军核实后发现情况的确如此；当地秩序井然，且没有日军或者战俘，因此他们明智地报告说“军事上没有理由让美军此刻登陆”，然后就撤回了部队。然而冷静和常识并不总是占上风的。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增援的要求在增加，其中包括通过租借物资装备90个师，正如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随便允诺的。蒋介石在组织和物资方面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无力对此进行控制。由于他用人考虑更多的是对他的忠诚而不是能力，他的总参谋部和一群军官面对他们面前的众多问题不知所措。很快，伴随着从前傀儡政权手中接管各个城市，他们很快就汲汲于随之而来的各种交易和贪污行为中了。在政府缺少民众支持的华北，情况尤其不好。早在8月15日，延安军事观察团的新任团长伊顿（Yeaton）上校就警告说，尽管共产党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长期来说，即便是有美国帮助，国民党作为占领军也无法支撑下去”。

面对这种令人痛苦的前景，成立了国家——陆军——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华盛顿称之为“苦役”（Swink）］以制定政策。该委员会提出的最好方案便是10月22日发布的总体指示，申明美国的目标是视中国为友好、统一和独立的国家，“在可行的情况下有稳定的政府，该政府受到中国人民自由表达意愿的支持”。在这种幌子掩护下，美国在中国的做法和决定，继续将美国跟一个各方面都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通过美军运送到北方省份的国民党部队自然跟共产党部队对峙并发生冲突。11月11日美国驻重庆武官报告说：“战斗正在变得猛烈，大批士兵已经投入进去了。”在不卷入内战的情况下完成对日军缴械和遣散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是否按计划在年底撤消魏德迈在中国的指挥部并终止租借法案，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是准备停止对委员长的援助并任由局势自行发展——这意味着内战以及美国的意图落空——还是继续帮助一个江河日下的政府，并将其统治延伸到那些会遭到有力挑战的地区？

做出继续支持的决定是由新的世界格局所确立的。法西斯刚刚被击败，共产主义便成了新的敌人。尽管苏联人已经跟蒋介石签订正式盟约，但是苏军出现在东北，而且他们可能跟中国共产党结盟，这已经成了美国的心腹大患。美国在中国的窘境在加剧。国家——陆军——海军委员会和总统进行过各种真挚和急切的磋商，但是他们的建议不过是继续支持蒋介石，同时向国共双方施加压力，让他们都做出让步以建立代议制政府。

这种局势让赫尔利大使难以应付。尽管现在美国是新政府当政，他又一次认为自己是一场阴谋的牺牲品，杜鲁门总统、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Byrnes）以及副国务卿艾奇逊都在听信他的批评者的意见，并准备让一位“称职的民主党人”接替他。他11月回到华盛顿时跟先前一样威胁辞职，但是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劝他回到中国再试一试。但是次日，他突然变卦。在没有通知总统也未通知国务卿的情况下，赫尔利直接向报界戏剧性地宣布了他的辞职声明。

他的指责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自从解除了战时同苏联达成的联盟后，在美国，对共产主义的固有恐惧和憎恶再次抬头。在这种黑色酵母的滋养下，猜忌、野心和报复心理都得以发展，而教条主义者也趁势而上。赫尔利开了庸俗的恐怖统治的先河，不久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参议员更加轻而易举地将它施行下去了。歇斯底里的时代到来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其核心问题，蒋介石的支持者（通称为中国游说者）是其推动者。1945年6月已经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当时突然搜查了亲共杂志《美亚》（*Amerasia*），并最终导致谢伟思和其他五人一道被捕。在《美亚》的文档中发现了谢伟思从延安发出的报告的副本。在前一年秋天史迪威把报告送到华盛顿的时候，谢伟思不慎重地将这些报告的草稿借给了该杂志总编，为的是让媒体了解情况。大陪审团没有发现可以起诉谢伟思的证据，后在史迪威的推荐下，他改任麦克阿瑟驻东京的参谋。但是通过不断扩大的忠诚调查以及防颠覆搜查活动，对驻华外交官的迫害刚刚开始；其后不久，对美国对华政策甚嚣尘上的攻击和诋毁毁了很多人的前程，败坏了一批人的声誉，并通过最终解除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职务，而使得后来的外交机构中的人不敢再独立行使判断力。

对美国政府来说，中国问题目前导致了一种外交危机和国内的危险局面，两者都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杜鲁门总统迅速行动起来，为了消除赫尔利突然辞职所造成的影响，他请求马歇尔将军这位超脱政治、

并受到国人尊敬的人出面，担当促成在中国的国共双方停火并成立联合政府的使命。一周以前，马歇尔刚刚从陆军总参谋长的职位上退休；他正期望在经历了不间断的六年重负之后，跟夫人一起好好休息一下；但他和史迪威一样有很强的责任感，因此当总司令召唤他的时候只可能有一种回答：他接受了。由于他跟史迪威在中国的经历有密切联系，他也许曾经犹豫过，但是他又迫切地感到，必须挽救美国在远东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作为对日战争胜利的主要缔造者，他可能格外希望捍卫这种成果。

为迫使国共双方达成协议，马歇尔受命可以把部队往华北调遣作为自己的筹码。在确认这个指令的时候，马歇尔掌握了关键的地方。他对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说，如果共产党拒绝做出合理让步，他就会把国民党部队运到华北。另一方面，即便委员长拒绝做出让步，而且最后导致无法达成统一的话，美国也不能抛弃他，因为“这将会造成悲剧的结果，使中国分裂以及苏联可能重新在中国东北掌权……从而造成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主要意图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明白他必须“前去帮助委员长将部队运至华北”，至少要到日军遣返完毕以前。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都对此表示同意。

这本质上是一个反革命的决定。美国在过去的殖民地地区也做出过同样的选择。跟前总统的意图相反，在那些地方，美军积极帮助对抗印度支那的强大独立运动以恢复法国统治。美国的宪章和宣言是倾向于民主的，但实际上执行者选择了旧政权。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这种决定非但徒劳，而且在中国民众眼中美国还跟压迫者、地主和税吏联系在了一起，这让自由力量感到失望，并大大增加了中国未来统治者的对立情绪。虽然很多人都怀疑这种努力是误入歧途了，但是美国的政策无法进行调整。它倾向于维持现政权，哪怕这个现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似乎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抛弃中国的合法政府转向共产党是美国所不能做的，这可能意味着在美国国内政治上的自杀。另一个唯一可能的办法便是史迪威所建议的“撤出——就现在”；他提出这个建议比实际上这样做早了一年半。

当史迪威从拜罗德将军那里了解到马歇尔使命的内情时很是对之不屑。拜罗德是作为马歇尔的主要助手陪同马歇尔去的。由于在出发前最后一刻还被珍珠港事件听证会所耽搁，马歇尔派了过去曾在中缅印战区工作的拜罗德来征求史迪威的意见。史迪威问他，马歇尔接到了什么指示，然后得出结论说这个使命不会成功。一旦蒋介石察觉了真实情况，

他只会变得更加顽固。“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只尊崇权力？”他在谈话中曾经数次这样问拜罗德。后来当史迪威看到麻烦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用一句话恰当而犀利地总结了马歇尔的使命：“可是他们还能指望什么？乔治·马歇尔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

史迪威的这句评论写在1946年4月6日的一封信中，由于信中的另一句话，这封信后来变得十分有名。史迪威写道：“中国东北难道不是一场好戏吗？”接着是对马歇尔的评论，然后便是这句话：“这让我恨不得放下铁铲，到中国去跟着朱德扛枪去。”[1] 跟其他人一样，史迪威的这种冲动代表了亲共产党倾向，而这只是他憎恶国民党的逆反心理罢了。极端左翼和右翼势力都紧紧抓住他在私信中的这句闲来之笔，并以此为基础营造了他的意识形态结构，试图证明他对延安的忠诚。在艾尔索普的推动下，这种对史迪威思想的随意捏造在陈纳德将军于1952年对国会调查委员会做证时达到了巅峰。陈纳德说，在1945年7月时史迪威提出率第十集团军（该军按计划拟进攻日本本土）去“上海以北沿海，陕西河（原话如此　）以北”，史迪威可以在那里武装20万至30万的共产党军队并率领他们南下夺取上海。总之，在规模最大、最令人恐惧的战役中，陈纳德指称史迪威计划把进攻日本本土的一半美军部队引向别方，看来他是打算让八路军独自担当进攻日本的任务。只有麦卡锡时代的无穷责难跟艾尔索普和陈纳德他们的无情敌意相结合，才可能炮制出这样的虚妄之辞。

在旧金山担任指挥任务时史迪威仍然保持跟武器委员会（Weapons Board）的联系。由于这种身份，1946年7月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岛的两次原子弹效果试验中他被派去担任观察员。一个月不见，他回来后温妮发现他变化很大：他显得消瘦，很不舒服，自己也说没有力气。在这个夏天剩下的时间里他时常发冷，偶尔头晕，经常有筋疲力尽的感觉，还有好几次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医疗检查发现“我的肝部有些可疑的东西”。次日，仿佛是为了显示不服输，他步行了好几英里——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散步了。9月28日他住进赖特曼总医院(Letterman General Hospital)并在10月3日经历了一次腹腔手术，结果发现胃癌已经扩散到肝脏，其进展比原先预计的还要严重。显然他发病已经很久了。他没有感到过疼痛，这让医生很不解。

众所周知，尽管他得过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卓越服务勋章和荣誉军团勋章勋章，他仍有一个愿望是希望想得到战斗步兵勋章（Combat Infantryman Badge）；这只是一枚刻有步枪图案的纪念章，通常授予

那些在战火中经受了考验的在役步兵。10月11日，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宣布授予史迪威将军这枚奖章，并亲自把奖章送到旧金山。然而，为了避免让史迪威意识到他已经是将死之人，没有在病床边举行仪式为他别上奖章。在生命的最后两天中，史迪威大部分时间都是睡着的，有一小会儿他短暂醒来并问护士："哎，今天是不是周六？"（的确是的）。1946年10月12日，午后不久，史迪威在睡眠中去世了。

根据他的遗愿，没有为他举行公葬；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在太平洋中。在如潮的评论和悼念中，各种评论都反复提及他说过的"我认为我们被狠狠揍了一顿"，认为这证明了史迪威的"顽强"和拒绝虚饰。他们重点谈到了"酸醋乔"，据《亚特兰大宪章报》(*Altlanta Constitution* ）报道说，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军人能够像他那样激发公众的想象力。梅里尔将军言简意赅地总结道："想要再找到他那样的人可要费尽周折了。"

很少有人评价他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那里的混乱和事态的快速发展使人无暇回顾。最确当的评语是卡尔森上校那富于特色的极致说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没有再出现一个像他那样对中国人民忠心耿耿的朋友。"蒋介石在南京一座私人宅邸举行了很小的基督教纪念仪式，悼念这位一直不遗余力攻击他的人的过世，事前没有进行任何报道或者公告，在场的只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少数几位受邀的美国人，没有邀请任何中国人参加。在参加悼念的人看来，对一位美国在华战争努力过的统帅来说，这种仪式未免过于卑微，令人伤感；但是，这种不恰当反而表明史迪威有关军队的想法已经深得人心，这让委员长深感不安。



马歇尔与蒋介石夫妇

史迪威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他“撤出”的建议已经被采纳了。马歇尔的努力是徒劳的。他无法让国共双方达成和解，在这种努力失败时，也无法为中央政府注入足够的活力以使其支撑下去。在对日作战胜利后的一年中，共有40万至50万的国民党部队在美国的帮助下，被运到上海、南京以及东北和华北的主要城市中；共有5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中国登陆，以把守港口、煤矿和铁路枢纽；美国还提供了6亿美元的租借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同时还给予了经济支援。再多的援助也不够，因为中国未能有效使用之。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他不可能获胜的敌对活动，马歇尔在1946年7月中断了向国民党提供军火，但是没有效果。跟那位敏捷瘦小的魅影史迪威的看法颇为相似，马歇尔后来说，委员长“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他受到国民党中“占主导地位的反对势力”的支持，这些人坦率承认，他们认为跟共产党合作是无法想象的，唯有武力才能够解决问题；这样蒋介石便继续顽固不化，认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可以指望美国的支持。共产党占主导的势力同样不愿意尝试和谈。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们指望经济崩溃能够使政府倒台，并试图通过游击战加速崩溃。马歇尔注意到跟国民党适成对照的是，共产党从基层往上都有严密组织，“而且因为得到民众支持而具有力量”。

1946年10月1日，马歇尔提醒对张家口发动进攻的委员长，除非立即确定跟共产党达成协议的基础，否则他将中止斡旋。结果蒋介石没有表示任何让步。12月，马歇尔亲自警告蒋介石说，共产党过于强大，无法在军事上击败，只有和谈才能避免中国经济的崩溃。蒋介石对这个建

议置之不理。就在那个月，在中国努力一年后，马歇尔通知杜鲁门说他的使命已经失败。他于1947年1月初被召回并出任国务卿。华盛顿宣布停止斡旋并撤出美国军队。在远东取得胜利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美国在这里的既定目标已经遥遥不可企及，成了对美国努力的一种嘲弄。

作为国务卿，马歇尔仍然相信，没有美国的军事干预，国民党无法赢得内战。他一如既往坚决反对干预，同时公众舆论也并未要求进行干预。由于政治压力日渐增加，在其他方面给予帮助的呼声愈高。美国恢复了向国民党出售武器，派遣了各种使团，并通过1948年的“中国援助法”（China Aid Act）向国民党提供了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共产党指责这种援助无异于在延长内战，而且援助也在已经厌倦的民众中引起了一波新的反美情绪。蒋介石的部队在“世界上最糟糕的统帅”［新任陆军咨询团团长巴尔（Barr）将军的说法］率领下在许多关键战役中失利；整团整师的兵力倒向共产党；经济混乱加剧了民众对已经失去信誉的国民党的憎恨。1948年10月，蒋介石发表声明说，拯救亚洲要依靠中国，他希望“美国人民和政治家们能够为这一使命献身”。蒋夫人来到华盛顿要求美国在三年内提供30亿美元的新援助，并要求美国宣布其战胜共产主义的决心。

现在给国民党什么样的支持也无济于事。国民党诞生于1911年那场不完全的革命，尚未立下根基便受到日本的摧残，结果已经背离初衷的国民党在几十年间气数已尽。1948年12月，共产党占领了“兵家必争之地”——徐州。1949年4月，他们的部队横渡长江。在随后的几周里，蒋介石政府带着大约200万追随者迁往台湾，并在美国的帮助下立足。中国又开始经受新革命的猛烈洗礼。

如果当初史迪威得以改革中国军队并造就一支有战斗力的90个师的部队，中国的命运可能会有所不同吗？曾任缅甸战略情报局游击队队长的威廉·佩尔斯（William R. Peers）将军写道：“我本人坚信，如果史迪威将军装备、组织并训练中国地面部队的计划得以完成，日本步兵1944年就无法摧毁华南的空军基地……而对日作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地面部队也不可能达成他们的目标。”

如果亚洲只是西方人手中的一块黏土的话，这种假设或许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所谓的“革命性想法”——不管来自史迪威还是来自其他人——是无法从外界导入的。要改革国民党的军事结构就必须改革它所基于的体系，但是正如史迪威自己所认识到的，改革这种体系“就必须把它撕成碎片”。

伊拉斯谟曾经写道，就伟业而言，尝试也就足够了。史迪威的使命代表了美国在中国的卓越努力。他竭尽全力，这是本性使然；他从未懈怠，更没有放弃。然而这个使命未能达到最终意图，因为其目标本就不可企及。推动力不是来自中国人自己。就像外国传教士和顾问所引进的基督教和民主一样，战斗力与进攻精神并非被引入方社会和文化的固有要求。甚至连史迪威在1921年所筑造的黄河公路也在十二年后消失了。美国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美国维持现政权的努力无法给一个腐朽的政府注入力量，实现稳定，也无法使它获得民众支持。它无法支撑一个空壳，也无法长久延迟天命周而复始地轮回。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

---

[1] 该信收信人不详。这封信是史迪威手写并被亲共自由撰稿记者约翰斯·斯迪尔（Johannes Steel）收藏。史迪威逝世后他在自己的新闻杂志《世界事务报道》（*Report on World Affairs*）的第一期（1947年1月）上影印发表了此信，发表时隐去了收信人的名字。约瑟夫·艾尔索普对此信大肆诋毁，并在1951年参议院内部安全听证会上就史迪威提及朱德一事大做文章。

附录

1921年筑路：谈话录

约瑟夫·W·史迪威

信使

信使（据说）送信回来了。

问：你送了信吗？

答：是的。

问：你把信给谁了？

答：我把信给了奥利森（Oleson）先生。

问：可是奥利森先生不在那里。他现在在这里。你不可能把信送给了他。

答：噢，对。我把信给了翻译。

问：可是现在翻译也跟奥利森先生在一起，他说你没有把信给过他。

答：噢，我给了。我把信给了厨子。

问：什么厨子？

答：那里的厨子。

问：哪里？

答：在谢昆岭（Hsieh Kung Ling）。

问：可是谢昆岭没有厨子，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

答：是的，我真的把信给了厨子。

问：可是你听我说！那里根本就没有厨子！你把信给了谁了？

答：我把信给了马夫。

问：什么马夫？

答：奥利森先生的马夫。

问：可是奥利森先生没有马夫，所以你没有给他。

答：马夫？

问：是的，马夫马夫。奥利森先生没有马夫。

答：噢，我把信给了别的送信人了。

到这个时候，一般的外国人只能放弃，或者另外写封信，或者杀掉这个送信的，或者乘下一班船回国。第二天早晨他可能会在餐桌上发现这封信。

碛口区长

碛口区长第一次造访来到这里的工程师就想镇住他们。工程师可以让公路通过碛口，而奇怪的是，考虑到其他镇子的想法，碛口人也非常急切想得到这条路。这原因很可能是，他们意识到如果道路通往春图的话，那么碛口作为黄河港口的声誉将大受影响。看吧，这个脚穿高袜子、身高五英尺二（约157厘米）的区长带着他身高六英尺（约180厘米）的保镖威风凛凛地进来了。这个警卫走在前面，手里提着一个巨大的灯笼，上面写着显示威严的字。区长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打开扇子，轻声咳嗽一下，鞠了三四次躬，然后说：

区长:请教您贵姓？（他知道姓甚名谁，但是他必须要再问一遍。）

工程师: 岂敢岂敢，鄙姓史。

区长: 贵国是美国，不知确否？

工程师: 对，鄙国正是美国。

区长: 哦。不知道路何时通到碛口？

工程师: 噢，此事尚未最后定夺。

区长:碛口是大港——黄河上的生意都经过这里。春图不是什么有名的地方——没有生意，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往那里修路没有用。

工程师: 但是，公路是往碛口比较短还是往春图比较短？

区长可能从来没有去过春图或者看过这条道路，于是他便转过头，眉头紧锁，然后厉声厉气地朝警卫喊出了这个问题。

区长：这路到碛口近还是到春图近？

警卫:（声音小得像三岁小儿）老爷，到春图近些。

这个回答让区长非常恼怒，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并语气温和地告诉工程师（自然，工程师已经听到了警卫的回答）

区长: 到春图近些。

工程师: 有没有其他从柳林直达碛口的路？

区长:（朝警卫喊道）有没有其他从柳林直达碛口的路？

警卫: 老爷，从柳林有一条直达碛口的路。

区长:（对工程师说）是的，从柳林有一条直达碛口的路。

工程师：从柳林到这里有多远？

区长:（朝警卫喊道）从柳林到这里有多远？

警卫: 老爷，一百里（50千米）。

区长:（对工程师说）是一百里。

工程师: 这条路怎么样？

区长:（朝警卫喊道）这条路怎么样？

警卫:老爷，这条路骆驼走是不错的，没有多少石头，大都是土……

就这样这场经过两次转达的谈话继续着。

涵洞

进来一位苦力，就是普普通通的那种，显然他裤子剪裁的式样是为了方便蹲下；他没有袖子，戴着草帽，眼神游移不定。他慢慢进来，好像我们跟他一样有的是时间，在打量了所有在场的人并确定谁是头以后小声对翻译说了什么。翻译答应了，但是声音很大，周围的人都听得清："对，就是那个穿着泥鞋、没有穿衬衫的人。不过不要喊他牧师（这种场合的常用尊称）。这会让他觉得了不起的。他是个工程师。"

约翰拖着步子走上来，称工程师为先生，这是一种尊称，表明此人年龄较大，因此应该更有学问，并因为年长更应得到尊重。

约翰: 先生，那个涵洞……

工程师: 什么涵洞？

约翰: 噢，当然是那个涵洞了。

工程师: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约翰: 先生，就是有关涵洞的事。

工程师: 是的，是的。可是你想要什么？你来是为什么事？

约翰: 我来是为了涵洞的事。

约翰现在觉得这个老毛子很是无知。还总工程师呢！任何一个上年纪的工程师总要比苦力懂得多，可是他显然什么都不懂。

工程师: 好的。可是你要我做什么？我能为这涵洞的事做什么？

约翰: 我造了涵洞。

工程师: 你想要钱吗？

约翰: 什么？

工程师: 你——想——要——钱——吗？

约翰: 要什么钱？

工程师: 天哪！涵洞的钱！

约翰: 我不明白。

工程师没有把取暖器吞下去，因为四周没有取暖器。他吞咽了四五次，然后和颜悦色地说——

工程师: 你在哪个标桩干的？

约翰: 标桩？标桩？什么标桩？

工程师: （再试一次）你在哪里干活？

约翰: 我没有在干活。

哦——哦——哦——哦——哦！！！

工程师: 是的。你曾经在哪里干活？（有点希望了，一点点。）

约翰: 我在木村东边干。

工程师: 噢！！！你修过涵洞吗？

约翰: 是的，我修过一个很不错的涵洞。

工程师: 你拿到钱了吗？

约翰: 是的，可是钱还不够干活的人买粮食吃的。

工程师: 你来就是为了这个吗？你想让我多给你一些钱吗？

约翰: 噢，不是的。

工程师: 你想要什么？

约翰: 涵洞。谢村西边还有一条涵洞。（让我们做！让我们做！）

工程师: 噢，你的意思是想再修一个涵洞？

约翰充满怜悯地看着工程师，仿佛在说：“可怜的东西，你早些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只知道摇动手臂，鼓着眼珠子，嘴都冒白沫了。我可是一进来就明白怎么回事了！”然后他平静地回答：“是的。”

当然，约翰得到了那份差事。

参考文献

档案和手稿

STILWELL, JOSEPH W., Papers, Carmel, California, and Hoover Library, Stanford,California.

THE NATIONAL ARCHIVES, Army Records (now Modern Military Records Division).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OCMH).

BINGHAM, SENATOR HIRAM,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CHENNAULT, MAJOR GENERAL CLAIRE LEE, Papers, Hoover Library, Stanford, California (and microfilm copy at Library of Congress).

HOPKINS, HARRY, Papers, 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 Hyde Park, New York.

HORNBECK, STANLEY K., Papers, Hoover Library, Stanford, California.

JOHNSON, NELSON T.,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MCHUGH, COLONEL JAMES, Papers,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ew York.

ROOSEVELT, FRANKLIN D., Papers, 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 Hyde Park, New York. STIMSON, HENRY L., Papers,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FILMS: National Archives, Film Division; also Army Pictorial Center, Long Island City, New York.

ABEND, HALLETT, My Life in China, 1926-41, New York,

Harcourt, 1943.

ALEXANDER, FIELD MARSHAL EARL, “Report” in Wavell, Operations in Burma from 15 December 1941 to 20 May 1942, Supplement to the *London Gazette* , 5 March 1948.

ALSOP, JOSEPH, “Why We Lost China,” Saturday Evening Post, 7, 14, 21 January 1950.

ANDERS, LESLIE, The Ledo Road, Norman, Univ. Of Oklahoma Press, 1965.

ARNOLD, GENERAL H. H., Global Mission, New York, Harper, 1949.

ARNOLD, RALPH, A Very Quiet War, London, Hart-Davis, 1962.

BAILEY, THOMAS A., 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Betrayal, New York, Macmillan, 1945.

书籍、文章以及个人手稿

——, The Man in the Street: The Impact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BARRETT, COLONEL DAVID D., “Soldiers of Fortun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The Dixie Miss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BEALE, HOWARD K.,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1956.

BELDEN, JACK, Retreat with Stilwell, New York, Knopf, 1943.

——, Still Time to Die, New York, Harper, 1944.

BERTRAMS, JAMES, First Act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 New York, Viking,1938.

BISSON, T. A., Japan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38.

BLAND, J. O. P., China: The Pity of It, New York, Doubleday, 1932.

BLUM, JOHN M.,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3 vol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9-67. BOOKER, EDNA LEE, News Is My Job, New York, Macmillan, 1940.

BORG, DOROTHY,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28, 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7.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38, Cambridge, Harvard Univ.Press,1964.

BROUN, HEYWOOD, The A. E. F., New York, Appleton, 1918.

BRYANT, SIR ARTHUR, The Turn of the Tide: A History of the War Years Based on the Diaries of Field Marshal Lord Alanbrooke, New York, Doubleday, 1957.

——, Triumph in the West (continuation of the above), New York, Doubleday, 1959.

BUCK, PEARL S., My Several Worlds, New York, John Day, 1954.

BULLARD, MAJOR GENERAL ROBERT LEE, Personalities and Reminiscences of the War,New York, Doubleday, 1925.

BURNS, JAMES MACGREGOR, Roosevelt: Soldier of Freedom, New York, Harcourt, 1970.

BURR, LIEUTENANT COLONEL JOHN C., The Framework of Battle, Philadelphia,Lippincott, 1943.

CARLSON, COLONEL EVANS FORDYCE, The Chinese Army, 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 Twin Stars of China, New York, Dodd, Mead, 1940.CHENNAULT, MAJOR GENERAL CLAIRE LEE, Way of a Fighter, New York, Putnam,1949.

CHIANG MONLIN, Tides from the West: A Chinese Autobiography,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47.

CHURCHILL, WINSTO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II, The Grand Alliance; vol. IV, The Hinge of Fate; vol. V, Closing the 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0-51.

CLINE, RAY S., Washington Command Post: The Operations Division, Washington, Dept. of the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 1951.

CLUBB, O. EDMUND,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6(first published 1964).

COLLIER BASIL, The Second World War: A Military History in One Volume (the British view), New York, Morrow, 1967.

COLLIER, LIEUTENANT COLONEL THOMAS WATTS, “The Chinese Language Officer Program of the U.S. Army, 1919-43,” unpublished Ph.D. thesis for Department of History,Duke university, 1966.

COLLIS MAURICE, Foreign Mud, London, Faber, 1946.

——, Last and First in Burma, 1941-48 (based on Dorman Smith

papers), London, Faber,1956.

CROW, CARL, 400 Million Customers, New York, Harper, 1937.

——, Foreign Devils in the Flowery Kingdom, New York, Harper, 1940.

CULLUM, GENERAL GEORGE W., Biographical Register of the Officers and Graduates of the USMA, New York, Harper, 1940.

DAWSON, RAYMOND, The Chinese Chameleon,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67.

DEANE, JOHN R., The Strange Alliance,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DENNETT, TYLER,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DICKMAN, MAJOR GENERAL JOSEPH T. (Commander of the IVth Corps), The Great Crusade: A Narrative of the World War, New York, Appleton, 1927.

DORN, BRIGADIER GENERAL FRANK, “Walkou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ULLES, FOSTER RHEA, China and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 1784, Princeton Uuiv. Press, 1946.

DUPUY, COLONEL R. ERNEST, The Compac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New York, Hawthorn, 1956.

EISENHOWER, DWIGHT D., Crusade in Europe, New York, Doubleday, 1948.

ELDRIDGE, FRED, Wrath in Burma, New York, Doubleday, 1946.

EPSTEIN, ISRAEL,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1947.

EVANS, LIEUTENANT GENERAL SIR GEOFFREY, Slim, as Military Commander, London,Batsford, 1969.

FAIRBANK, JOHN K., The Uni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48.

FAIRBANK, J. K., REISCHAUER, E. O., and CRAIG, A. M.,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FEIS, HERBERT, The China Tangle, New York, Atheneum, 1965 (first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3).

FERGUSSON, BERNARD, The Black Watch, New York, Crowen, 1950.

FERRELL, ROBERT H., Frank B. Kellogg and Henry L. Stimson, in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vol. XI, New York, Cooper Square, 1963.

FIFTEEENTH INFANTRY, The Fifteenth Infantry Regiment, 1861-1953, n.p., n.d.

——, Customs of the Fifteenth Infantry, Peiyang Press, Tientsin-Peiping. (A facsimile reproduction is published by C. E. Dornbusch at Hope Farm Press, Cornwallville, New York,1959.)

FINNEY, CHARLES G., The Old China Hands, New York, Doubleday, 1961.

FLEMING, D. 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18-20, New York, Putnam,1932.

FORMAN, HARRISON, Horizon Hunter, New York, McBride, 1940.

FRILLMAN, PAUL, and PECK, GRAHAM, China: The Remembered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8.

GILBERT, RODNEY, What's Wrong with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926.

GOETTE, JOHN, Japan, Fights for Asia, New York, Harcourt, 1943.

GREW, JOSEPH C., Ten Years in Jap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4.

GRIFFITH, GENERAL SAMUEL B.,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cGraw Hill), 1967.

GRISWOLD, A. WHITNEY,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court, 1938.

GUNTHER, JOHN, Inside Asia, New York, Harper, 1939.

——, Roosevelt in Retrospect, New York, Harper, 1950.

HAHN, EMILY, The Soong Sisters, New York, Doubleday, 1943.

HAN SUYIN, Birdless Summer, New York, Putnam, 1968.

HARBORD, GENERAL JAMES G., The American Army in Fra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36.

HO YUNGCHI, The Big Circle: China's Role in the Burma Campaigns, New York,Exposition, 1948.

HOLCOMBE, ARTHUR N.,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30. HOSACK, ROBERT E., "The Shantung Question and the Senat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Apirl 1944.

HSIUNG, S. I., The Life of Chiang Kai-shek, London, Davies, 1948.

HUBBARD, SAMUEL T. (a neighbor of the Stilwells in Yonkers), Memoirs of a Staff Officer,Tuckahoe, Cardinal Associates, 1959.

HULL, CORDELL, Memoirs,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HUNT, ELVID, History of Fort Leavenworth, General Service Schools Press, Fort Leavenworth, 1926.

HUNTINGTON, SAMUEL,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Belknap Press, 1957.

INFANTRY SCHOOL, FORT BENNING, GEORGIA, Mailing List, vols. I-VIII, 1930-34, semi-annual.

IRIYE, AKIRA, Across the Pacific, New York, Harcourt, 1967.

ISAACS, HAROLD R.,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 Press, 1938. Rev. Ed. 1951.

——, No Peace for Asia, Cambridge, M.I.T. Press, 1967 (first published 1947).

——,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John Day,1958.

JANOWITZ, MORRIS,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Glencoe, Free Press, 1960.

JAPAN, Operations of the Japanese Forces in Burma, documents submitted by HQ Japanese Burma Area Army to HQ (British) Twelfth Army, Rangoon, issused by HQ Twelfth Army,November 1945.

JOHNSON, CHALMERS,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Univ. Press. 1962.

KATES, GEORGE N., 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 1933-40, New York, Harper, 1952. KING, ERNEST J., and WHITEHILL, WALTER MUIR, Fleet Admiral King, New York,Norton, 1952.

KIRBY, MAJOR GENERAL S. WOODBURN, The War Against Japan, 4 vols. (UK Military Series,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HMSO, 1957-65.

KLEEMAN, RITA HALLE, Gracious Lady (Sara Delano Roosevelt), New York, Appleton, 1932.

KOLKO, GABRIEL, *The Politics of War* , New York, Random, 1968.

LANGER, WILLIAM., and GLEASON, EVERETT, *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40* ,New York, Harper, 1952.

——, *The Undeclared War, 1940-41* , New York, Harper, 1953.

LEAHY, FLEET ADMIRAL WILLIAM D., *I Was There* , New York, Whittlesey, 1950.

LEONARD, ROYAL, *I Flew for China: Chiang Kai-shek's Personal Pilot* , New York,Doubleday, 1942.

LI TSUNG-JEN, *Reminiscences* ,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

LIGGETT, MAJOR GENERAL HUNTER, *A. E. F. Ten Years Ago in France* , New York, Dodd, Mead, 1928.

LINEBARGER, PAUL, M. A., *The China of Chiang Kai-shek* ,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41.

LIU, F. 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6.

LOHBECK, DON, *Patrick J. Hurley* , Chicago, Regnery, 1956.

MACARTHUR, DOUGLAS, *Reminiscences* ,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MAGRUDER, GENERAL JOHN, “The Chinese as a Fighting Man,” *Foreign Affairs* , April 1931.

MALRAUX, ANDERE, MAN’s Fate (La Condition Humaine), New York, Smith & Haas,1934.

MARSHALL, GEORGÉ C., The War Reports of Marshall, Arnold and King, Philadelphia,Lippincott, 1947.

MARSHALL, KATHERINE TUPPER, *Together: Annals of an Army Wife, New York* , Tupper & Love, 1946.

MATLOFF, MAURICE, and SNELL, EDWIN,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42, Washington, Dept. of the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 1953.

MATLOFF, MAURICE,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44, Washington, Dept. of the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 1959.

MAY, ERNEST, ed., Ultimate Decision: The President as Commander in Chief (“FDR” by

Willaim Emerson), New York, Braziller, 1960.

MCINTIRE, VICE ADMIRAL ROSS T., White House Physician, New York, Putnam, 1946.

MILES, VICE ADMIRAL MILTON E.,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MOLEY, RAYMOND, After Seven Years, New York, Harper, 1939.

MORGENTHAU, HENRY, JR., Morgenthau Diary, China, 2 vols., U.S. Senate, 89th Congress,1st Session,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Laws, Washington, GPO, 1965. (The Subcommittee’s staff, on the hunt for subversion, extracted and published in this compilation all the references to China in the Morgenthau Diaries, providing in the process a documentary source of unique and inestimable value.)

MORISON, ELTING E., Turmoil and Traditi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L. Stims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0.

MORSE, H. B., and MACNAIR, H. F.,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1.

MORTON, LOUIS, Strategy and Command: The First Two Years, Washington, Dept. of the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 1962.

MOTT, COLONEL T. BENTLEY, Twenty Years as a Military Attaché, Oxford Univ. Press,1937.

MOUNTBATTEN OF BURMA, VICE ADMIRAL THE EARL, Report to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by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South East Asia, 1943-45, London,Houghton Mifflin, 1951.

NEVINS, ALLAN, The United States in a Chaotic World, 1918-33,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50.

NIXON, EDGAR B.,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 (documents from the Hyde Park Library), 3 vo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69.

O'CONNOR, RICHARD, Black Jack Pershing, New York, Doubleday, 1961.

OGBURN, CHARLTON, JR., The Marauders, New York, Harper, 1959.

PECK, GRAHAM, Two Kinds of Tim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0.

PEERS, WILLIAM R., and BRELIS, DEAN, Behind the Burma Road, Boston, Little, Brown,1963.

PEFFER, NATHANIEL, The F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Ann Arbor, Univ. of Michigan Press, 1958.

PELISSIER, ROGER, e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1783-1949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accounts and primary sources), New York, Putnam, 1967.

PERSHING, GENERAL JOHN J., My Experiences in the World War, 2 vols., New York,Stokes, 1931.

PHILLIPS, WILLIAM, Ventures in Diplomacy, Boston, Beacon, 1952.

POGUE, FORREST C., George C. Marshall, vols. I and II, New York, Viking, 1963, 1968.

POWELL, JOHN B., My 25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45.

PRATT, JULIUS, Cordell Hull, 2 vols., in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New York, Cooper Square, 1964.

PUSEY, MERLO J., Charles Evans Hughes,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3. RASMUSSEN, A. H., China Trader, New York, Crowell, 1954.

RAVDIN, DR. ISIDOR, Reminiscences,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REINSCH, PAUL S.,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1913-19, New York, Doubleday Page,1922.

RIDGWAY, MATTHEW BUNKER, Soldier (memoirs), New York, Harper, 1946.

ROMANUS, CHARLES, and SUNDERLAND, RILEY,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ept. of the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 1953.

——,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ept. of the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1956.

——, 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ept. of the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 1959.

The authors of these volumes, with resources open to them which no individual investigation could duplicate, have produced out of the vast mass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records an extraordinarily thorough, detailed, inclusive and eclectic documentation of the war in CBI.

In making available these sources in print, they have put everyone who enters the field afterwards in their debt.

ROMANUS, CHARLES, and SUNDERLAND, RILEY, Two Interviews with General Merrill,20 and 28 April 1948; Three Interviews with General Hearn, 22 and 28 November 1948, 17

May 1950; Two Interviews with General Marshall, 6 and 13 July 1949, unpublished, on file at OCMH.

ROOSEVELT, ELEANOR, Autobiography, New York, Harper, 1961.

ROOSEVELT, ELLIOTT, As He Saw It, New York, Duell, Sloane & Pearce, 1946.

ROOSEVELT, F. D. (ed. Elliott Roosevelt), His Personal Letters, 2 vols., New York, Duell,Sloane & Pearce, 1950.

ROSENMAN, JUDGE SAMUEL, Working with Roosevelt, New York, Harper, 1952.

SCOTT, ROBERT LEE, JR., Flying Tiger: Chennault of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1959. SEAGRAVE, GORDON, Burma Surgeon, New York, Norton, 1943.

——, *Burma Surgen Returns* , New York, Norton, 1946.

SELLE, EARL ALBERT, *Donald of China* , New York, Harper, 1948.

SENTINEL, THE, Tientsin. Journal of the 15th Infantry (files in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EVAREI, ERIC, *Not So Wild a Dream* , New York, Knopf, 1946.

SHEEAN, VINCENT, *Personal History* , New York, Doubleday, 1935.

——, *Between the Thunder and the Sun* , New York, Random, 1943.

SHERIDAN, JAMES E.,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 Stanford Univ. Press, 1966.

SHERWOOD, ROBERT E., *Roosevelt and Hopkins* , New York, Harper, 1948.

SHIGEMITSU, MAMORU, *Japan and Her Destiny* , New York, Dutton, 1958.

SLIM, FIELD MARSHAL THE VISCOUNT, *Defeat Into Victory* , New York, McKay, 1961.

SMEDLEY, AGNES, *Battle Hymn of China* , New York, Knopf, 1943.

SMITH, ARTHUR 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 New York, Revell, 1907.

SNELL, JOHN L., *Illusion and Necessity: The Diplomacy of Global War, 1939-45* , Boston,Houghton Mifflin, 1963.

SNOW, EDGAR, *Far Eastern Front* , New York, Smith & Haas, 1933.

——,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44 (first published 1938).

——, The Battle for Asia, New York, Random,1941.

——,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Random, 1958.

——,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57.

STEELE, A. T.,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cGraw-Hill), 1966.

STILWELL, John E., Stilwell Genealogy, vol. III, The History of Captain Nicholas Stilwell,Son of Lieutenant Nicholas Stilwell, and His Descendants, privately printed, New York, 1930.

STILWELL, JOSEPH W., The Campaign in Burma, March 10 to June 1, 1942, Headquarters,American Army Forces, China, Burma and India, unpublished. (This is the suppressed report of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

——, History of the CBI Theatre, 21 May 1942 to 25 October 1945, unpublished. This is “The Stilwell Report” of which a revision and additions were made by Colonel Mason Wright in

November 1945. A copy of the original is at the Hoover Library (with a number of sections removed by the Department of the Defense) and another copy is at NA, Modern Military

Records Division. The revised version is on file at OCMH.)

STILWELL, JOSEPH W. (ed. Theodore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Sloane, 1948.

STILWELL, WINIFRED A., “Family Stor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TIMSON, HENRY L., The Far Eastern Crisis, New York, Harper, 1936.

STIMSON, HENRY L., and Bundy, McGEORGE,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Harper, 1947.

STONE, JAMES H., ed., Crisis Fleeting (reports by medical officers in CBI), 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Surgeon General, 1969.

STORRY, RICHARD, The Double Patriots: A Study of Japanese Nationalism, Boston,Houghton Mifflin, 1957.

STUART, JOHN LEIGHTON,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1946.

SYKES, CHRISTOPHER, Orde Wingate, New York, World, 1959.

TANG LEANG-LI,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Dutton, 1930.

THOMAS, LOWELL, Old Gimlet Eye: The Adventures of Smedley D. Butler, New York,Farrar & Rinehart, 1933.

TONG, HOLLINGTON K., Dateline China, New York, Rockport, Macmillan, 1945.

——, ed., China, After Seven Years of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45.

TOYNBEE, ARNOLD, A Journey to China, London, Constable, 1931.

TROTSKY, LEON,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Pioneer, 1932.

TSOU, 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3.

TULLY, GRACE, FDR, My Boss, New York, Scribner’s, 1949.

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 (OCMH), U.S. Army in World War I, 1917-19, vols. 1, 8, 9, 12-15, Washington, 1948.

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 (OCMH), U.S. Army in World War II, multiple volumes, Washington, various dates. See under CLINE, MATLOFF,MORTON, ROMANUS and SUNDERLAND, WATSON.

U.S. CONGRESS, 81ST , 2ND SESSION,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Hearings on Loyalty of Employees of the State Department,Washington, GPO, 1950.

U.S. CONGRESS, 82ND , IST SESSION,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Hearings of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and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Senate, Part 3. (Testimony of General Hurley, 21 June 51, pp. 2859-81.) Washington, GPO, 1951.

U.S. CONGRESS, 82ND , 1ST SESSION,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Hearings o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Washington,GPO, 1951.

U.S. CONGRESS, 89TH , 1ST SESSION. See MORGENTHAU.

U.S. MILITARY ACADEMY, The Centennial at West Point, 1802-1902, Washington, GPO, 1904.

——, "The Howitzer," Class of 1904 Yearbook.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AR EASTERN SERIES 30),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1944-49 (White Paper), Washington, GPO, 19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series,Washington, GPO, various dates.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iro-Tehran 1943, Washington, GPO, 1961.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2, China; 1943, China; 1944, China, 3 vols.,Washington, GPO, 1956-68.

VARG, PAUL A.,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ts, 1890-52,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8.

——, The Making of a My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97-1912.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 Press, 1968.

WATSON, MARK S., Chief of Staff: 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s, Washington, Dept. of the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 1950.

WEDEMEYER, 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olt, 1958.

WELLES, SUMNER,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50.

WERTENBAKER, CHARLES, “The China Lobby,” The Reporter, 15 April 1952.

WHITE PAPERS. S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HITE, THEODORE H., and JACOBY, ANNALEE,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Sloane, 1961 (first published 1946).

WILLIAMS, GENERAL ROBERT P., MC, “Diary, 1941-45” and “One Man’s CBI: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unpublished manuscriptes, Hoover Library, Stanford, California.

WILLIAMS, S. WELLES, *The Middle Kingdom* , 2 vols., New York, Scribner’s, 1883.

WILLKIE, WENDELL, *One World* , New York, Simon & Shuster, 1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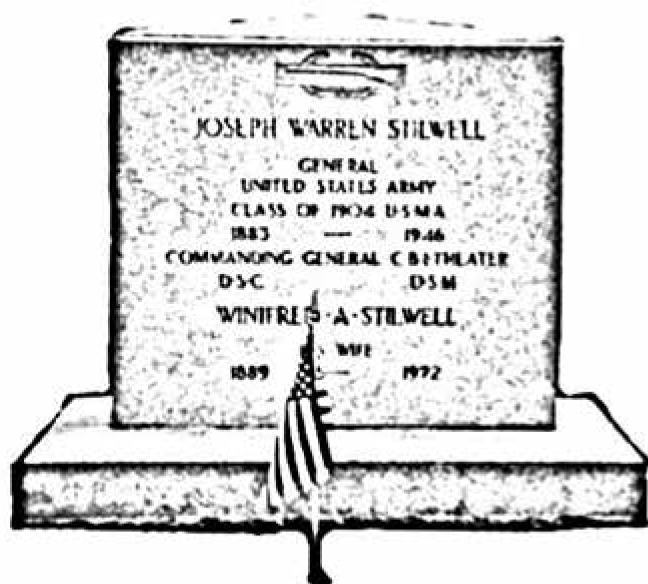
WINFIELD, GERALD F., *Chin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 New York, Sloane and Americ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8.

WOODHEAD, H. G. W. (*editor of The Peking & Tientsin Times*), *The China Yearbook,* 1928, Tientsin, Tientsin Pres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28.

WOODWARD, SIR LLEWELLY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HMSO, 1962. (Official history based on access to

official documents.)

YOUNG, ARTHUR N.,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45* ,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63.


JOSEPH WARREN STILWELL
GENERAL
UNITED STATES ARMY
1883 — 1946
DSC
DSM
WINIFRED · A · STILWELL
1889 — 1972

史迪威的墓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美）塔奇曼著；万里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0
书名原文: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in China，1911-45
ISBN 978–7–5086–4817–0
Ⅰ．①史⋯ Ⅱ．①塔⋯ ②万⋯ Ⅲ．①史迪威，J.W.（1883 ～ 1946）－生平事迹②对华政策－美国－ 1911 ～ 1945 ③中美关系－
国际关系史－ 1911 ～ 1945 Ⅳ．① K837.125.2 ② 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8732号

STI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by BARBARA W. TUCHMAN
copyright:© 1970, 1971 by BARBARA W. TUCH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USSELL & VOLKENING,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著者：[美] 巴巴拉·W·塔奇曼
译者：万里新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数：606千字
版次：2015年11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4817–0/K·41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